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三卷

人 民 出 版 社

1962年 北京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譯出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編譯、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譯校过程中参考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三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 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27 $\frac{1}{8}$ · 插頁 7 · 字數 640,000

1962 年 11 月第 1 版

196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號 1001·533 定價（四）2.15 元

目 录

第十三卷說明	VII—XXIX
卡·馬克思。政治經濟学批判	3—177
序言	7—11
第一册 資本	13—177
第一篇 資本一般	15—177
第一章 商品	15—53
A. 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	41
第二章 货币或簡單流通	54—177
1. 价值尺度	54
B. 关于货币計量单位的学說	66
2. 流通手段	77
(a) 商品的形态变化	77
(b) 货币的流通	88
(c) 鑄币。价值符号	97
3. 货币	112
(a) 货币貯藏	115
(b) 支付手段	127
(c) 世界货币	139
4. 貴金屬	143
C. 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說	148

卡·馬克思。*意大利的統一問題	178—184
卡·馬克思。歐洲的戰爭前景	185—188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歐洲的金融恐慌	189—194
卡·馬克思。路易-拿破侖的處境	195—199
弗·恩格斯。法國軍隊	200—206
弗·恩格斯。德國的兵力	207—212
弗·恩格斯。奧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	213—220
卡·馬克思。不列顛工廠工業的狀況	221—228
弗·恩格斯。在即將爆發的戰爭中雙方取勝的可能性	229—234
卡·馬克思。英國議會改革的新法案	235—239
卡·馬克思。不列顛工廠工業的狀況	240—245
弗·恩格斯。波河與萊茵河	247—299
一	249—252
二	253—281
三	282—292
四	293—299
卡·馬克思。和平還是戰爭?	300—301
卡·馬克思。土伊勒里宮的嘆息	302—304
卡·馬克思。法國的戰爭前景	305—310
卡·馬克思。普魯士的戰爭前景	311—315
卡·馬克思。歷史上的類似現象	316—319
弗·恩格斯。即將舉行的和平會議	320—324
卡·馬克思。印度財政狀況的嚴重混亂	325—333

* 用星花(*)標出的篇名是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加的。——編者注

一	325—329
二	330—333
弗·恩格斯。*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334—337
卡·马克思。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	338—34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战争逼近的征兆。—— 德国的扩军备战	343—346
弗·恩格斯。战争的前景	347—351
卡·马克思。金融恐慌	352—355
卡·马克思。甜言蜜语	356—358
卡·马克思。奥地利、普鲁士和德国对战争的态度	359—364
弗·恩格斯。战争	365—370
卡·马克思。维也纳要闻	371—377
弗·恩格斯。战况没有进展	378—382
弗·恩格斯。会战终于发生了!	383—388
弗·恩格斯。蒙特贝洛会战	389—391
卡·马克思。普鲁士对战争的看法	392—396
弗·恩格斯。意大利战争	397—400
弗·恩格斯。战略	401—405
卡·马克思。马志尼宣言	406—412
弗·恩格斯。军事行动的经过	413—417
弗·恩格斯。军事事件	418—421
弗·恩格斯。奥军的失败	422—426
弗·恩格斯。马振塔会战	427—434
卡·马克思。斯普累河与明乔河	435—438
弗·恩格斯。奥军向明乔河的退却	439—443

弗·恩格斯。戰爭的消息	444—447
弗·恩格斯。索爾費里諾會戰	448—451
弗·恩格斯。歷史的公斷	452—456
弗·恩格斯。索爾費里諾會戰	457—461
卡·馬克思。一八五九年的愛爾福特精神	462—465
卡·馬克思。意大利贏得了什麼？	466—468
卡·馬克思。媾和	469—471
卡·馬克思。維拉弗蘭卡條約	472—476
弗·恩格斯。意大利戰爭。回顧	477—490
一	477—481
二	482—486
三	487—490
卡·馬克思。被證實了的真理	491—495
卡·馬克思。入侵！	496—499
卡·馬克思。法國在裁軍	500—502
卡·馬克思。QUID PRO QUO	503—523
一	503—507
二	508—523
弗·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524—535
一	524—528
二	529—535
卡·馬克思。不列顛的貿易	536—540
卡·馬克思。路易-拿破侖和意大利	541—545
卡·馬克思。政治評論	546—548
卡·馬克思。人口、犯罪率和赤貧現象	549—554

卡·馬克思。工厂工业和貿易	555—559
卡·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侖	560—567
卡·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	568—585
一	568—571
二	572—576
三	577—581
四	582—585
卡·馬克思。英国的贿选活动	586—591
卡·馬克思。对和平的激进看法	592—595
卡·馬克思。德国的动蕩局势	596—600
卡·馬克思。对华貿易	601—605
卡·馬克思。英国对法国入侵的恐惧	606—608
弗·恩格斯。对摩尔人的战争的进程	609—615
弗·恩格斯。对摩尔人的战争	616—621
弗·恩格斯。薩瓦与尼斯	622—626
弗·恩格斯。对摩尔人的战争	627—632
弗·恩格斯。薩瓦、尼斯与萊茵	633—680
一	635—643
二	644—659
三	660—669
四	670—680

附 录

“人民报”編輯部的声明	683
报刊述評	684—695

注釋	699—762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763—779
人名索引	780—816
期刊索引	817—818
地名索引	819—833
貨幣、重量、容量名称表	834
譯后記	835

插 图

“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第一版的扉頁	5
北意大利和瑞士图	276—277
1859年意大利战争图	482—483
1859—1860年摩洛哥战争图	611

第十三卷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收集了 1859 年 1 月至 1860 年 2 月所写的著作。

1859 年是标志着无产階級运动和民主运动开始活跃的一年，也是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开始加强的一年。欧洲各国出现了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征兆；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持续很久的政治反动时期即将结束。新的革命前景展现在工人阶级的前面。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預見的，1857—1858 年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机推动了政治的全面活跃。这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矛盾所造成的。它的后果到 1859 年仍有充分的影响。

馬克思和恩格斯这个时期在理論和实践方面的革命活动，是为了准备国际无产階級在革命高潮业已成熟的条件下去迎接新的階級搏斗。馬克思继续努力钻研政治經濟学問題，恩格斯則繼續钻研軍事科学、历史和語言学。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紧张地从事政論著作。他們系統地在报刊上发表有关經濟、政治和軍事問題的文章，而且还繼續从事自 1857 年就开始的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的工作。

为了制定无产階級的革命理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特別注意发展經濟学說。早在四十年代后半期，馬克思和恩格斯

一起就为科学共产主义奠定了理論基础，制定了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表述了馬克思主义的主要政治思想和无产階級政治經濟学的許多根本原理。在此以后，馬克思便把主要的精力用来創立无产階級的政治經濟学。馬克思在确定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約着社会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后，就着手研究生产方式发展的規律，特别是資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經濟規律。他揭露了資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必然要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在許多年中馬克思深刻地研究了資本主义政治經濟学的許多极其重大的問題，他根据大量文献和資料研究了資本主义社会的經濟实况，研究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領域（技术史、农业化学、数学等），他利用这些科学領域的資料来更詳尽地闡明許多經濟学問題。完成了这项巨大的工作以后，馬克思就于1857年开始写作一部政治經濟学的巨著。我們搜集到的1857—1858年經濟学手稿就是这部著作第一部分的草稿。在这些手稿中馬克思对他在政治經濟学方面多年来的研究进行了某些总结，表述了馬克思后来在他的主要經濟学著作“資本論”中发展了的許多重要原理。1857—1858年手稿表明，正是在这个时期馬克思大体上已經制定了作为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的基石的剩余价值学說的原理。1857—1858年經濟学手稿有一部分是馬克思打算在写作他計劃写的那部經濟学巨著时加以修改、补充和利用的原始材料。馬克思准备把这部著作分册出版。第一分册于1859年1月脫稿，以“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的形式出版。

本卷的头一篇就是“政治經濟学批判”，这是馬克思主义杰出的經濟学著作之一。这部著作反映了馬克思的經濟学說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反映了他对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和对資

产階級政治經濟学的批判的一个重要阶段。正如弗·伊·列宁所指出的，这是馬克思的那些使政治經濟学革命化的著作之一。

馬克思的这部著作清晰明确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的高度科学的見解，分析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商品和劳动的本性，制定了价值学說，研究了貨幣的起源、实质和职能問題。这部著作以相当大的篇幅批判地剖析了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关于商品、价值、貨幣以及貨幣流通的各种理論。馬克思在他这部著作中为科学地闡明資本主义剝削的实质奠定了基础。

“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的开头有一篇著名的序言，这篇序言有巨大的理論意义和独立的科学意义，其中对馬克思所发现的唯一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作了天才的說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本身下了經典性的定义。用弗·伊·列宁的話來說，在这篇序言中，馬克思“对运用到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周密說明”（“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7頁）。

馬克思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領域中划分出經濟領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关系。同时他着重指出，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现实基础，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識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样就指出了科学地研究社会經濟形态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即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滿矛盾但毕竟是有規律的統一过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9頁）来研究的唯一正确的途徑。

馬克思在序言中表述了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規律，以及关于在階級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間的矛盾是社会革命、一种社会經濟形态为另一种比較进步的社

會經濟形态革命地代替的主要原因這一極其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見本卷第8—9頁）馬克思揭示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相互作用的辯證過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表現，從而證明：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死亡，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同時也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種對抗形式，未來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將擺脫階級社會的對抗性矛盾。

馬克思用唯物主義辯證法的方法來研究他在該書中闡明的經濟學問題，特別是用來分析商品、勞動、價值、貨幣。他揭示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之間的矛盾，並且指出，這個矛盾的發展及其擴展到商品和貨幣之間的關係上去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認為商品和價值是永恆的自然範疇，馬克思和他們相反，他證明了商品和價值在歷史上的暫時性質。馬克思通過對商品的研究指出，產品只是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下才具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生產是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上出現的，它在從簡單商品生產發展到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過程中經歷了不同的階段。馬克思把商品看作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細胞，其中包含着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萌芽。

馬克思以前的經濟學家就已經指出，商品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這二重性。馬克思在其對商品的分析中最先確定，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它反映着商品生產者的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之間實際存在着的矛盾。

馬克思在研究商品的過程中還弄清楚了，商品中包含的矛盾

是由生产商品时耗費的劳动的矛盾性质所决定的。馬克思深入地研究了創造价值的劳动，作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他确定并证明了体現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按照馬克思自己的說法，这个发现是使政治經濟学中許多異常复杂的問題得以闡明的“出发点”。

馬克思根据对商品和劳动的分析发展了他的价值学說。资产阶級經濟学家，包括斯密和李嘉图在內，在商品同商品的交換中、价值的交換中看到了物的交換，而馬克思則在这种交換中揭示了人与人之間的关系。馬克思在分析价值时，并不像资产阶級經濟学家那样，只限于問題的数量方面，只限于規定价值量，而是首先詳尽地闡明价值的本质，对它作出质的評定，指出价值是物化了的抽象劳动；他从理論上論证了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馬克思依据他的价值学說确定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耗費在商品生产上的劳动必然采取价值的形式。

馬克思从自己的价值学說出发，对貨幣問題也作了詳尽的研究。在經濟科学中他最先闡明了价值的貨幣形式的起源，指出了价值和貨幣的有机联系，认为貨幣是价值形式的历史发展的最終結果。他揭示了貨幣的本质，研究了貨幣在资产阶級社会中的經濟作用，科学地确定并闡明了貨幣的各种职能，以及金屬貨幣和紙币流通的規律。同时，馬克思也揭露出：资产阶級的和小资产阶級的关于貨幣和貨幣流通的各种理論是沒有根据的，企图通过消灭貨幣的方法来消除資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并“改善資本主义”的計劃是一种空想。

馬克思所創立的严整的科学的价值学說，是对无产阶級政治經濟学的发展的杰出貢獻。馬克思以他的价值学說为基础，后来

在“資本論”中詳細地、全面地制定了剩餘價值學說。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即馬克思計劃寫的那部著作的第一分冊出版以後，馬克思曾準備出版第二分冊，在這一冊中他打算闡述資本問題。但是，馬克思在進一步研究經濟的過程中對自己最初的寫作計劃作了很大的改變，決定暫時不發表他的研究成果，而對許多他認為還沒有弄得十分清楚的問題繼續作了研究。馬克思的新的想法在“資本論”中得到了體現，該書第一卷於1867年出版。

馬克思認為，“資本論”第一卷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續篇。但是，儘管如此，馬克思認為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編中扼要地敘述一下“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基本內容是必要的。馬克思之所以這樣做，不僅是為了研究上的更加連貫和完整，而且是因為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只作了初步闡述的他的關於商品、價值和貨幣的學說的個別原理，要在“資本論”中加以進一步的發展（例如關於價值實體和價值形式的學說，關於商品拜物教的原理等）。同時，正如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所指出的，他認為某些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已詳細探討過的原理，在“資本論”中可以只作比較簡略的闡述。所以，在“資本論”出版以後，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並沒有失去其獨立的科學意義，而且有理由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佔據一個卓越的地位。馬克思的這部著作對商品分析史、價值學說史和流通手段學說史等方面所作的探討具有特別的价值。它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世界經濟學文獻中一部論述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貨幣的最優秀的專題學術著作。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個時期的政論作品，在本卷中佔相當大

的篇幅，這就是他們在當時進步的美國資產階級報紙“紐約每日論壇報”（那時他們繼續為該報撰稿）和倫敦的德文報紙“人民報”上發表的文章，以及恩格斯的以單行本出版的两本小冊子——“波河與萊茵河”和“薩瓦、尼斯與萊茵”。革命政論的寫作在這個時期仍舊是馬克思主義奠基人的主要活動形式之一。這些作品的內容充分反映了歐洲政治局勢尖銳化以及新的革命事件成熟的过程。

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9 年初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他們當時注意的主要是以下幾個問題：意大利反對專制奧地利和國內反动派（它們妨礙國內政治上分裂狀態的消除和阻撓國家的民族統一）的壓迫的不斷加強的民族解放運動、法國國內外日益加強的反對波拿巴主義的鬥爭以及其他各國革命民主力量的結合。馬克思和恩格斯把這一切看作是預示歐洲新的革命高潮即將來臨的徵兆。同時他們也密切注視孕育着國際關係的新危機和新戰爭的國際衝突的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評價各種事件時，首先注意到資產階級性的改造尚未完成，在許多國家中無產階級都必須消滅封建主義殘余，必須解決在 1848—1849 年未能實現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首先是像德國的統一和意大利的統一那樣的任務，以便為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掃清道路。

馬克思在“意大利的統一問題”這篇文章中明確地闡述了無產階級革命者要通過開展群眾革命鬥爭的辦法來達到意大利人民的民族統一的方針。馬克思指出了意大利發生的各次人民騷動，他特別注意意大利民族運動中進步的資產階級分子，即反對統治集團的政策“民族派”；當時意大利的統治集團為了王朝的反人民的利益，為了在皮蒙特的霸權下統一意大利，曾力圖利用國內的局勢。馬克思看到，這些統治集團請求外國的“援助”、它們同追求自

私自利目的的路易·波拿巴結成同盟是对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威胁。馬克思希望意大利人民的斗争将会唤醒其他各国的人民起来革命,希望“意大利革命的胜利将成为一切被压迫民族为了从他們的压迫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展开共同斗争的信号”(見本卷第184頁)。

在“欧洲的战争前景”、“欧洲的金融恐慌”、“路易-拿破侖的处境”、“和平还是战争?”、“法国的战争前景”、“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等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欧洲反动势力,首先是法国波拿巴統治集团想用发动新的“局部”战争的办法来防止革命爆发的企图。馬克思和恩格斯事先就警告要防止这种战争,因为它一开始就可能“在各方面起反革命的作用”(見1859年2月4日馬克思給拉薩尔的信)。同时,他們推測欧洲反动派是不能使战争“局部化”的,“在欧洲的任何地区开始的战争决不会在开始的地方結束”(見本卷第184頁)。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大力促进各国人民的广泛开展的革命运动,使这场战争变为全欧洲性的革命战争。

虽然备战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馬克思主义奠基人早在战争开始前好几个月就預言,以法国和皮蒙特为一方和以奥地利为另一方的軍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們向“論壇报”的讀者揭露了促使路易·波拿巴及其僕从們进行新的軍事冒险的真正原因,揭示了欧洲各国政府旨在加剧冲突的外交阴谋,指出了各敌对国家所进行的备战活动。在“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等一系列文章中,恩格斯从战略观点分析了未来的战场的特点和双方軍事力量的对比情况,大体上預言了即将发生的軍事行动的性质。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新的国际危机同无产階級运动和民主运动高漲的前景联系起来，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必須更广泛地宣傳自己的观点和加强实际的革命活动。

馬克思和倫敦的德国工人組織建立了比較密切的联系，参加了許多群众大会。在新的条件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特別尖銳地感觉到发表政論性言論和影响社会輿論使之有利于无产階級的机会受到了限制。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单靠在“論壇报”上撰稿显然已經不够了。馬克思在1859年3月28日給拉薩尔的信中指出：“时代改变了，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党必須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都占領陣地，哪怕是为了不让其他政党去占領它們。”馬克思和恩格斯寻找各种办法去直接向欧洲大陆的讀者群众說話。1859年3月馬克思同意給維也納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報紙“新聞报”撰稿，但是由于奧意法战争的爆发，該报編輯部不敢让无产階級的領袖在他們的報紙上发表文章，因此談判在当时沒有获得成功。

1859年4月，恩格斯在德国出版了一本匿名小册子“波河与萊茵河”，論证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对有关意大利危机和日益临近的新战争的各个問題所持的立場。

“波河与萊茵河”一书是对复杂的国际問題进行馬克思主义分析的典范。恩格斯写这本小册子是供广大公众，其中也包括資產階級讀者閱讀的，因此他把軍事历史观点和战略观点提到了首位。但是，全书都貫穿着从无产階級立場，即从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立場出发捍卫統一意大利和德国的革命民主主义道路的思想，它证明了統治階級在維護民族利益的幌子下所执行的反动政策与意大利人民和德国人民的真正民族利益是不相容的。恩格斯的这本小册子揭露了波拿巴法国根据反动的“自然疆界論”妄想侵占萊茵河左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新的国际危机同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高涨的前景联系起来，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更广泛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和加强实际的革命活动。

馬克思和倫敦的德国工人組織建立了比較密切的联系，参加了許多群众大会。在新的条件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特別尖銳地感觉到发表政論性言論和影响社会輿論使之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机会受到了限制。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单靠在“論壇报”上撰稿显然已經不够了。馬克思在1859年3月28日給拉薩尔的信中指出：“时代改变了，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党必須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都占領陣地，哪怕是为了不让其他政党去占領它們。”馬克思和恩格斯寻找各种办法去直接向欧洲大陆的讀者群众說話。1859年3月馬克思同意給維也納資產阶级自由派的报纸“新聞报”撰稿，但是由于奥意法战争的爆发，該报編輯部不敢让无产阶级的領袖在他們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因此談判在当时沒有获得成功。

1859年4月，恩格斯在德国出版了一本匿名小册子“波河与萊茵河”，論证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对有关意大利危机和日益临近的新战争的各个問題所持的立場。

“波河与萊茵河”一书是对复杂的国际問題进行馬克思主义分析的典范。恩格斯写这本小册子是供广大公众，其中也包括資產阶级讀者閱讀的，因此他把軍事历史观点和战略观点提到了首位。但是，全书都貫穿着从无产阶级的立場，即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立場出发捍卫統一意大利和德国的革命民主主义道路的思想，它证明了統治阶级在維護民族利益的幌子下所执行的反动政策与意大利人民和德国人民的真正民族利益是不相容的。恩格斯的这本小册子揭露了波拿巴法国根据反动的“自然疆界論”妄想侵占萊茵河左

于缺乏經費而停刊了，但是它在馬克思的主持下完成了作为宣傳无产階級运动的任務、宣傳无产階級革命者的理論原則和策略原則的战斗喉舌的光荣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民報”上宣傳了許多极其重要的革命理論原理。該報轉載了前面提到过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书的序言。1859年8月“人民報”有两号連續刊登了收集在本卷中的恩格斯对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书的評論。恩格斯在这篇評論中闡明了馬克思以其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发现所完成的革命变革的实质，指出这些发现不仅对于科学，而且对于实践，对于革命运动都具有巨大的意义。恩格斯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局限性，特别是德国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落后性作了鮮明的闡述，他用无产階級的真正科学的政治經濟學去对抗那些庸俗經濟理論。恩格斯在評論的第二部分闡述了馬克思所制定的唯物主义辯證法的本质特点。

“人民報”捍卫了无产階級群众的利益，声援了无产階級的階級搏斗，特别是詳細地闡述了1859年7月爆发的著名的倫敦建筑工人大罢工的进程。馬克思在“人民報”上发表的“政治評論”一文中論证了对罢工的革命观点，认为罢工是无产階級階級斗争的合乎規律的和重要的形式之一。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英国資產階級妄想用武力强迫工人放棄有組織的斗争的企图只会导致“劳資之間本来就有很深的鴻沟”的加深，只会导致作为社会变革的可靠保证的階級仇恨的加深（見本卷第547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民報”上可以比在“論壇報”上更自由地发表自己的革命观点，因为“論壇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妨碍他們这样做。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人民報”結合欧洲各国对外和对內政策的重大事件公开闡述无产階級的策略原理，坚决地揭露反动

派，并同无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敌人进行斗争。

例如，收入本卷附录中以“报刊述评”为题的材料表明，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金克尔等人在他们的伦敦机关报“海尔曼”上所发表的浸透着庸俗气味和民族主义精神的言论，在“人民报”上遭到了多么辛辣的嘲笑。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在“人民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的主要任务是，针对1859年4月底在意大利爆发的战争论证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策略。对这场战争的估计，阐明战争爆发的原因，分析战争的进程和后果，这一切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当时所写的许多文章的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了早在意大利危机初期，即军事行动开始以前他们就已发表的观点，认为法国和皮蒙特反对奥地利的战争是波拿巴集团的反人民政策的继续。他们着重指出，这场战争是路易-拿破仑及其集团所主使的，他们力图用比较轻易地战胜“外敌”的办法来巩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蛊惑人心地利用“把意大利从奥地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民族原则”的口号来投机取巧，以获得声望，并在这个口号的掩盖下牺牲意大利和其他各国的利益以整化法国的版图并且巩固它在欧洲的政治霸权。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撕下了路易-拿破仑的“意大利解放者”的假面具，彻底揭穿了他对意大利民族运动所策划的反革命阴谋。他们强调指出，波拿巴法国和奥地利一样，都是意大利独立和统一的最凶恶的敌人。拿破仑第三所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对争取意大利统一的人民革命运动的隐蔽的干涉。马克思在“路易-拿破仑和意大利”一文中直接把这场战争比作1849年第二共和时期法国干涉者为了恢复罗马

教皇的統治而进行的远征。馬克思指出，对路易-拿破侖來說，“这次战争只是法国对羅馬的第二次远征，誠然在各方面都具有更大的規模，可是就其动机和結果而論却和那次‘共和主义’壮举毫无二致”（見本卷第 541 頁）。其实，拿破侖第三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保持意大利的分裂状态和意大利各国的反革命制度。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章都充滿了对意大利人民反对外国統治的斗争的热烈同情。馬克思主义奠基人強調指出，尽管波拿巴主义者在搞阴谋，尽管皮蒙特君主主义者在搞王朝的反革命图謀，但是在意大利有能够通过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实现国家統一的力量。馬克思贊同意大利革命家馬志尼那篇揭穿了路易-拿破侖的蠱惑人心的花招的宣言，并且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了这篇宣言的譯文（見本卷第 406—412 頁）。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杰出的意大利爱国者加里波第所率領的志願部队反对奥軍的行动看作是人民反抗外国統治的榜样，看作是真正的解放战争的典范。恩格斯指出，加里波第“不怕采取拿破侖第三告誡部下避免采取的那种迅速行动和猛攻”（見本卷第 413 頁）。恩格斯在“战略”一文中对加里波第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革命的統帥。

在“战争”、“会战终于发生了！”、“軍事行动的經過”、“軍事事件”、“馬振塔会战”、“索尔費里諾会战”、“意大利战争。回顾”等文章中，恩格斯从軍事观点分析了各次战争事件。这几篇文章和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其他軍事历史性的簡評，是对軍事科学的重大貢獻。恩格斯作为精通軍事問題的专家，在这些文章中对 1859 年的軍事行动作了全面的分析，經常对軍事学术史方面的問題进行探討并且作出了深刻的軍事理論概括。恩格斯在“人民报”上发表的“意大利战争”一文具有特別重大的意义。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

分析了从拿破侖战争以来作战方法由于掩护国界的营垒和要塞的构筑技术及其体系的发展、由于运输业随着铁路和輪船航綫的开辟有了很大改进而发生的变化。从这个例子中，恩格斯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作战方法之间的联系。恩格斯在軍事評論中以相当大的篇幅闡述了要塞战、要塞和野战軍相互配合的問題以及山地战的特点等等。

恩格斯在这些文章中批評了交战双方軍队的統帥部对軍事行动的指揮。恩格斯在評價奥地利軍队及其领导人时，揭示了武装力量的編制、战略和战术对某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从屬性。恩格斯指出了由于哈布斯堡帝国經濟上的落后性和国内保存的半封建制度所决定的奥地利軍事制度的保守主义。恩格斯給了奥地利士兵的勇敢精神以应有的評價，同时严厉地抨击了奧軍指揮部的重大錯誤和失策，指出了由于宮廷权奸和弗兰茨-約瑟夫皇帝本人干預战争进程而造成的悲惨后果。例如，談到权奸的走卒，奧軍总司令居萊时，恩格斯写道，他的軍队“显示了人民的不可战胜的生命力，而他本人則表现了君主制度的老朽和昏聩”（見本卷第 433 頁）。

恩格斯在这些文章中对法軍指揮部作了完全否定的評價。恩格斯指出，法軍指揮部沒有远大的战略計劃和主动精神，不会利用由于敌人的失策而造成的軍事上的良机。恩格斯指出，波拿巴法国的作战方法是和拿破侖第三的两面三刀的反动政治战略，和他想“把战争局限于一个地区”，以免造成严重的軍事糾紛并带来革命的后果的企图相适应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紐約每日論壇报”，特别是在“人民报”上对第二帝国头目們的对意政策的揭露，具有对整个波拿巴制度进

行广泛的揭发运动的性质。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自己的讀者要深刻地憎恨建立在警察恐怖、大肆进行蠱惑性的社会宣傳、在各个階級之間投机取巧的基础上的大資產階級的波拿巴专政。他們认为波拿巴法国是当时欧洲最危險的反革命势力，是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扼杀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斗争看作是无产階級革命者的首要任务。他們认为，特別重要的是要回击民主主义者当中尤其是德国流亡者当中的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正是这个时候馬克思开始密切注視德国庸俗民主主义者卡尔·福格特的亲波拿巴的言論，开始收集那些揭露福格特是拿破侖第三的雇佣走狗的材料。馬克思根据这些材料于1860年写成了抨击性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

馬克思在“入侵！”、“法国在裁軍”、“英国对法国入侵的恐惧”等文章中指出，第二帝国的头目們所执行的軍事冒險政策是一切新冲突和战争的根源。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許多文章中也痛斥了在策划意大利战争期間以及在战争进行期間在外交上支持法国的其他欧洲反动势力。馬克思特別揭露了路易-拿破侖同英国資產階級貴族寡头政治的代表帕麦斯顿相勾結的反革命性质，这种勾結使拿破侖第三能够放手去进行意大利冒險。馬克思和恩格斯強調指出，1859年3月波拿巴法国同沙皇俄国簽訂的协定也是为这些目的服务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意大利問題同德国的統一問題密切联系起来。在恩格斯的小册子“波河与萊茵河”和馬克思为“人民报”和“論壇报”所写的許多文章中都強調指出，無論奧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統治或者波拿巴在欧洲的霸权都是德国人民为建立一个統一的

德意志国家而斗争的道路上的障碍。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波拿巴法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既能使意大利和法国的革命力量得到发展，也能使德国的革命力量得到发展，归根到底会导致欧洲反人民的制度的崩溃，会推动民族解放运动，其中包括中欧各国被压迫人民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压迫的斗争的发展。在德国，这种形势会使主张通过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来统一国家的人获得优势，这条道路就是废除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反动君主政体并建立统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从这种观点出发，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德意志联邦的各邦都参加反对波拿巴法国的战争，并且谴责了那些主张“中立”的分子。

收集在本卷中的馬克思的许多文章是为了反对普鲁士统治集团以及同它们一鼻孔出气的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对战争的态度而写的。在“普鲁士对战争的看法”、“斯普累河与明乔河”以及那组没有写完的文章《Quid pro quo》中，馬克思痛斥普鲁士宣布的“调停大国”的中立政策是直接为波拿巴主义充当帮凶。馬克思指出，普鲁士统治者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之所以采取可鄙的、胆怯的投机取巧手法，对路易-拿破侖和俄国沙皇阿諛逢迎，其真实原因就是：害怕一旦发生战争就会出现德国革命运动的高潮，企图削弱它在争夺德国霸权的斗争中的对手奥地利。馬克思指出，普鲁士采取投机取巧的手法，避免参加战争，是希望“有朝一日用诈骗的手段去贴现德国霸权的期票”（見本卷第 510 頁）。普鲁士容克地主想在自己的霸权下统一德国的意图是普鲁士政策的基础。

馬克思在内容极其深刻的“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一文中指出，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那些所谓哥达党中的人物，他们早在 1850 年普鲁士倡议召开爱尔福特议会时就企图实现使德国

普魯士化的思想——是这个反革命計劃的热烈拥护者。馬克思強調指出，德国自由資產階級的立場完全证实它已經拋棄了任何革命的和民主主义的傳統，它已經向反动派屈膝投降。由于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性的結果，最反动的势力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的遺囑执行人，它們以歪曲的形式来实现这一革命的业已成熟的任務，特别是国家的民族統一的任务。馬克思指出，“革命的綱領在反动派的手中就变成对相应的革命意图的諷刺”（見本卷第 462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普魯士皇家社会主义者”拉薩爾的民族主义观点的論战中也捍卫了統一德国的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相反，拉薩爾在他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魯士的任务”中为普魯士的中立辯护，实质上是贊同亲普魯士的自由資產階級所主張的在普魯士领导下从上面来統一德国的方針。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譴責的拉薩爾的立場，反映出他不相信德国革命民主主义的力量。拉薩爾在当时所写的剧本“弗兰茨·馮·济金根”中企图从历史上論证他否定农民和平民大众的革命作用的观点，并替他号召同貴族君主集团結成同盟的主張辯护（參看馬克思 1859 年 4 月 19 日和同年 5 月 18 日恩格斯給拉薩爾的信）。

与拉薩爾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通过革命的道路来摆脱意大利危机，他們強調指出，这条道路就是要加强意大利和德国的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主义和爭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发动欧洲各国人民起来反对波拿巴主义和支持它的各种反革命势力。他們提出为了德国和意大利的統一、为了解放被压迫民族而进行反对波拿巴法国和沙皇俄国的革命解放战争的思想，以此来同波拿巴集团发动的反革命战争相对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旨在依靠奋起斗

爭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用彻底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在某些民族中，由于资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而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像在 1848 年那样，马克思最关心的是吸引更广泛的、更多的‘平民’大众和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以及无产阶级来参加，以扩大和加剧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马克思的这种扩大运动的社会基础、使运动发展起来的想法，就是马克思的彻底民主主义的策略与拉萨尔的不彻底的、倾向于与民族自由派联盟的策略根本不同的地方。”（“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126—127 页）

在马克思的“意大利赢得了什么？”、“媾和”、“维拉弗兰卡条约”、“路易-拿破仑和意大利”等文章中以及在恩格斯的“萨瓦、尼斯与莱茵”这本小册子中，对奥意法战争进行了总结。这些文章着重指出，维拉弗兰卡和约（它的条款稍后在苏黎世基本上被批准了）完全暴露了路易-拿破仑在战争中所追求的王朝的掠夺的目的，这些目的和解放意大利毫无共同之处。拿破仑第三的所作所为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一心想侵占萨瓦和尼斯，后来便吞并了这两个省份，他力图让意大利反动势力的主要鼓舞者罗马教皇成为当时策划中的意大利联邦的首领，他企图恢复已被人民推翻了的托斯卡纳、摩地那和帕尔马各公爵的统治。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的那样，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波拿巴反动集团和奥地利反动集团之间签订了一项牺牲意大利利益的协定，过了若干时候，只是由于拿破仑第三的“恩典”，皮蒙特统治集团才被允许参加了这项协定。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唯一的积极结果，是拿破仑第三的自我揭露，是他冒充意大利独立和统一的捍卫者这个角色

的彻底破产。这个和約簽訂得很仓卒，这也說明了第二帝国内部的不穩定，說明了这个制度已无力經受孕育着革命爆发的长期战争考驗。尽管意大利革命者在1859年沒有能像列宁所說的那樣把“小規模的自由主义运动发展为蓬蓬勃勃的民主运动”，但是这一年的事变促进了下一年即1860年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漲。

在“薩瓦、尼斯与萊茵”这本小册子中，恩格斯依据对軍事历史和語言学的分析，駁斥了第二帝国的領土野心。恩格斯从意大利和德国的統一問題尚未解决这一情况出发，在这里重新考察了早在意大利战争以前就已在国际舞台上以及上述两国国内形成的力量配置情况。他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所采取的方針就是在战后也是正确的，这一方針就在于把革命民主主义力量反对以波拿巴法国和沙皇俄国为首的反动君主主义势力的斗争看作是使意大利和德国重新恢复为統一的民族国家的問題得以彻底解决的唯一道路。同时，恩格斯也估計到了1861年改革前夕在俄国形成的革命局势，他把这种局势看作是加速欧洲革命高潮到来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他把奋起反抗沙皇制度的俄国农奴当作欧洲无产阶级的同盟軍来欢迎。

对英国經濟状况和政治状况的評述以及对英国殖民政策的揭露在本卷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不列顛工厂工业的状况”、“人口、犯罪率和赤貧現象”、“不列顛的貿易”、“工厂工业和貿易”等文章中，馬克思根据对英国官方統計資料的分析，深入地探討了资本主义經濟許多极其重要的規律性的作用——生产积聚的加强和生产发展的周期性。

馬克思分析了英国当时进出口貿易的資料，指出英国經濟发展的特点之一，是“英国对世界市場發揮它的債主作用比發揮工厂

主和商人作用的速度还要快”(見本卷第 557 頁)。

馬克思列举了許多实例來說明在資本主义社会中起作用的工人階級日益貧困化的趨勢。他引用了許多事实和数字，证明英国工人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条件在日益恶化；由于缺乏最起码的安全技术設備，生产中的不幸事故在不断增加，同时随着工业生产和貿易的发展，赤貧現象和犯罪率也在不断增加。馬克思分析了这一切事实，得出了下述結論：“这种一方面扩大自己財富，但貧困現象又不見减少，而且犯罪率甚至增加得比人口数目还快的社会制度內部，一定有某种腐朽的东西。”(見本卷第 551 頁)

馬克思批評了当时英国的工厂立法，这种立法使工厂主可以任意破坏它。他揭穿了資產階級的思想方面的奴僕——資產階級經濟学家、資本主义制度的辯護士的真面目，他們誠心用自己的理論去替統治階級的任何犯罪行为辯護。

馬克思引用的許多材料，特别是英国工厂視察員的那些揭露出英国工厂主营私舞弊、描繪出英国工人受殘酷剝削的情境的报告书，他后来都用在“資本論”第一卷中。

馬克思在“政治評論”、“英国的賄选活动”等許多文章中，揭穿了英国政治制度的反人民的实质。馬克思指出：“英国下院的真正宪法可以用一个詞来表达——賄賂。”(見本卷第 586 頁)在“英国議會改革的新法案”一文中，馬克思分析了迪斯累里于 1859 年 2 月提出的对英国現行选举制度作一些微小修改的建議，他強調指出，这个法案的基本目的是要保存当时貴族和資產階級对政权的壟断和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的无权状态。馬克思写道：“一眼就可以看出，所有这些新的选举优惠条件，虽然使資產階級中又有几部分人参加了选举，但是，其目的显然是蓄意不让工人階級参加选举，

使工人階級仍舊处于目前这样的政治上的‘賤民’的地位。”（見本卷第 237 頁）

收入本卷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文章，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奠基人為反對歐洲各資本主義強國的，首先是英國的奴役和剝削各殖民地和附屬國的丑惡制度而進行的堅持不懈的鬥爭。

馬克思在“印度財政狀況的嚴重混亂”一文中揭露了英國對印度的掠奪政策，指出了英國對這個國家的統治所造成的極有害的後果。他特別指出，英國棉織品和棉紗的大量輸入破壞了印度的地方工業。馬克思在談到英國殖民主義者殘酷鎮壓 1857—1859 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義的後果時指出，由此造成的巨大開支，以及必須在印度經常供養一支龐大的武裝力量，首先給英國的納稅人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在“新的對華戰爭”這組文章中，在“對華貿易”一文中，馬克思揭露了英法殖民主義者的政策，他們在 1859 年力圖對中國再發動一場像 1838—1842 年和 1856—1858 年的鴉片戰爭那样的掠奪戰爭。馬克思揭穿了英國人的行動的挑釁性質，強調指出，不是中國當局，而是英國和法國的殖民主義者破壞了現有的各項條約，尤其是 1858 年天津條約的條款，從而捍衛了中國政府和人民反抗殖民主義者的武裝侵略（不管這種侵略的借口是什麼）的權利。

馬克思在揭穿英國統治集團的殖民政策的同時，還揭露了英國的資產階級報刊，它們故意激發“同胞們的嗜血本能”，捏造事實來為侵略中國的行為辯護。

馬克思在“對華貿易”一文中揭露了英國資產階級政策的近視性，他們不了解經濟的規律性，指責中國政府在國內對英國貿易製造人為的障礙，從而要求通過掠奪性的軍事冒險來消除這些障礙。

馬克思指出，貿易規模比較狹小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經濟結構本身，在于只允許进行有限的对外交換的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結合。馬克思表示坚信，無論英国殖民主义者采取什么样的冒險行动，他們永远也不能征服中国。

恩格斯有三篇文章——其中有两篇的标题是“对摩尔人的战争”，另一篇是“对摩尔人的战争的进程”——論述了1859年11月至1860年3月西班牙在摩洛哥挑起的殖民战争。恩格斯指出摩洛哥人对西班牙侵略者进行了頑强的反抗。尽管西班牙正規軍在军队的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它在战争进程中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此西班牙政府被迫于1860年3月签订了和約。

本卷附录中刊載了前面提到过的由馬克思同比斯康普为“人民报”合写的題为“报刊述評”的材料，以及該报宣布馬克思和恩格斯为正式撰稿人的編輯部声明。这个文件說明了馬克思为把“人民报”变成无产阶级的机关报而斗争的历史。

* * *

編入本卷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13篇全集第一版沒有收入，而且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这就是：“欧洲的金融恐慌”、“路易-拿破侖的处境”、“德国的兵力”、“和平还是战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維也納要聞”、“意大利战争”、“馬志尼宣言”、“索尔費里諾会战”、“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法国在裁軍”、“政治評論”、“英国对法国入侵的恐惧”。編入附录的文件也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

收入本卷的全部文章发表时都沒有署名，其中有几篇是作为社論发表的。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曾多次提到的，“紐約

每日論壇報”編輯部常常任意處理他們的文章，特別是那些作為社論發表的文章，給它們增補文句，甚至加添整段的文字，竭力把這些文章改成像是在紐約寫的。本版中凡是編輯部對文章原文作了修改或補充的地方一律加注說明。這個時期所寫的某些文章保存有兩種文本，一種是德文的，載於“人民報”，另一種是英文的，載於“論壇報”，這也相應地加注說明。

在研究本卷各篇文章所引用的具體歷史資料時，應當注意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論述當時事件的很大一部分文章中，能夠利用的資料主要是“泰晤士報”、“總匯通報”、“維也納日報”、“總匯報”、“軍事總匯報”和“經濟學家”雜誌等資產階級報刊上的報道。他們從這裡取得關於軍事行動的進程、交戰國的軍隊數量、各國財政狀況等等資料。有時這些資料和以後核實的資料是有出入的。

“紐約每日論壇報”和“人民報”上印錯了的人名、地名、數字和日期等，已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過的資料加以核對和訂正。

凡是在報紙上發表時有標題的文章一律用原標題。當原文沒有標題而由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加上的時候，在標題前加一星花。

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

卡·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59年1月—1860年2月

卡·馬克思
——
政治經濟学批判¹

卡·馬克思写于 1858 年
8 月—1859 年 1 月
1859 年在柏林出版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德文

Sur Kritik

b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von

Karl Marx.

Erstes Heft.

Berlin.

Verlag von Franz Duncker.
(W. Hefner's Verlagsbuchhandlung.)

1859.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第一版的扉页

序 言

我考察資產階級經濟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資本、土地所有制、僱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在前三項下，我研究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分成的三大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其他三項的相互聯繫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冊論述資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組成：（1）商品，（2）貨幣或簡單流通，（3）資本一般。前兩章構成本分冊的內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都是專題論文，它們是在相隔很久的幾個時期內寫成的，目的不是為了付印，而是為了自己弄清問題，至於能否按照上述計劃對它們進行系統整理，就要看環境如何了。

我把已經起草好的一篇總的導言²壓下了，因為仔細想來，我覺得預先說出正要證明的結論總是有妨害的，讀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決心，從個別上升到一般。不過在這裡倒不妨談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經過。

我學的专业本來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學和歷史之次當作輔助學科來研究。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³的主編，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萊茵省議會關於林木盜竊和地產析分的討論，當時的萊茵省總督馮·沙培爾先生就摩塞爾農民狀況同“萊茵報”展開的官方論戰，最後，關於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辯論，是促使我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

因⁴。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願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識的时候，在“萊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淺言論，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⁵的一次爭論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許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評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萊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經落在該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銷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問，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⁶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結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們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謂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紀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經濟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驅逐移居布魯塞尔，在那里繼續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經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为轉移的关系，即同他們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識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約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們的意識决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会存在决定人們的意識。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現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

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語) 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經濟基础的变更, 全部龐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 必須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 一种是生产的經濟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 一种是人們借以意識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 簡言之, 意識形态的形式。我們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 同样, 我們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为根据; 相反, 这个意識必須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 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間的現存冲突中去解釋。無論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产力發揮出来以前, 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 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 是决不会出現的。所以人类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因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发现, 任务本身, 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 才会产生。大体說来, 亞細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經濟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資產階級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 这里所說的对抗, 不是指个人的对抗, 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 但是, 在資產階級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 同时又創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 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終。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經濟學范疇的天才大綱⁷ (在“德法年鑑”上) 发表以后, 我同他不断通訊交換意見, 他从另一条道路(請参考他的“英国工人階級状况”⁸) 得出同我一样的結果, 当

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魯塞爾時，我們決定共同鑽研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思想體系的見解之間的對立，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這個心願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後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八開本兩厚冊的原稿⁹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亞的出版社，後來我們才接到通知說，由於情況改變，不能付印。既然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我們就情願讓原稿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了。在我們當時從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眾表達我們見解的各種著作中，我只提出我與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和我自己發表的“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¹⁰。我們見解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為反對蒲魯東而寫的著作“哲學的貧困”¹¹中第一次作了科學的、雖然只是論戰性的表述。我用德文寫的關於“僱傭勞動”¹²一書，匯集了我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¹³上對於這個問題的講演，這本書的印刷由於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離開比利時而中斷。

1848年和1849年“新萊茵報”¹⁴的出版以及隨後發生的一些事變，打斷了我的經濟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倫敦才能重新進行這一工作。英國博物館中堆積着政治經濟學史的大量資料，倫敦對於考察資產階級社會是一個方便的地点，最後，隨着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金礦的發現，資產階級社會似乎踏進了新的發展階段，這一切決定我再從頭開始，用批判的精神來透徹地研究新的材料。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屬於本題之外的學科，在這方面不得不多少費些時間。但是使我所能夠支配的時間特別受到限制的，是謀生的迫切需要。八年來，我一直為第一流英美報紙“紐約每日論壇報”¹⁵撰稿（寫作真正的報紙通訊在我只是例外），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時時中斷。然而，由於評論英國和

大陆突出經濟事件的論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經濟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細节。

我以上簡短地叙述了自己在研究政治經濟学方面的經過，这只是为了证明，我的見解，不管人們对它怎样評論，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統治階級的自私的偏見，却是多年誠实探討的結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獄的入口处一样，必須提出这样的要求：

«Qui si convien lasciare ogni sospetto;
Ogni viltà convien che qui sia morta»^①.

卡尔·馬克思

1859年1月于倫敦

① “这里必須根絕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但丁“神曲”)——編者注

第一册
資本

第一篇

資本一般

第一章

商 品

最初一看，資產階級的財富表現為一個驚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則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原素存在。但是，每個商品表現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兩個方面^①。

商品首先是，按英國經濟學家的說法，“生活上必需的、有用的或快意的某種東西”，是人類需要的對象，最廣義的生活資料。商品作為使用價值的這種存在，和它的自然的、可以捉摸的存在是一致的。例如小麥是一種不同於棉花、玻璃、紙等使用價值的特殊使用價值。使用價值只對於使用有價值，只在消費的過程中實現。同一種使用價值可以有不同的用途。但是，它可能有多少用途全在於它作為具有一定屬性的物的存在。其次，使用價值不僅在質

^① Aristot. d. Rep. L. 1, C. 9 (edit. I. Bekkeri, Oxonii, 1837)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1卷第9章第13頁(貝克爾編1837年牛津版)]。“因為每種貨物都有兩種用途……一種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種則不然，例如鞋，既用來穿，又可以用來交換。兩者都是鞋的使用價值，因為誰用鞋來交換他所需要的東西，例如食物，誰就是利用了鞋。但不是利用鞋的自然用途，因為它不是為交換而存在的。其他貨物也是如此。”

上是一定的，而且在量上也是一定的。不同的使用價值，按照它們的自然特征，具有不同的尺度，例如小麥論舍費耳、紙論刀、麻布論碼，等等。

不論財富的社會形式如何，使用價值總是構成財富的內容，而這個內容最初同這種形式無關。我們從小麥的滋味中嘗不出種植小麥的人是俄國的農奴，法國的小農，還是英國的資本家。使用價值雖然是社會需要的對象，因而處在社會聯系之中，但是並不反映任何社會生產關係。例如，這個商品作為使用價值，是一顆鑽石。從鑽石本身看不出它是商品。當它作為使用價值時，不論是用在裝飾方面還是機械方面，在娼妓胸前還是在玻璃匠手中，它是鑽石，不是商品。成為使用價值，對商品來說，看來是必要的前提，而成為商品，對使用價值來說，看來却是無關緊要的規定。同經濟上的形式規定像這樣無關的使用價值，就是說，作為使用價值的使用價值，不屬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圍^①。只有當使用價值本身是形式規定的時候，它才屬於後者的研究範圍。它直接是表現一定的經濟關係即交換價值的物質基礎。

交換價值首先表現為各種使用價值可以相互交換的量的關係。在這樣的關係中，它們成為同一交換量。因此，1卷“普羅佩爾提烏斯歌集”和8盎斯鼻煙可以是同一交換價值，雖然煙草和哀歌的使用價值大不相同。作為交換價值，只要比例適當，一個使用價值和另一個使用價值完全同值。一座宮殿的交換價值可以用一

^① 這就是德國編輯 con amore [喜歡] 談他們稱為“貨物”的這種使用價值的緣故。例如，見 L. Stein. «System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Bd. I, den Abschnitt von den «Gütern» [羅·施泰因“政治學體系”第1卷“貨物篇”]。關於“貨物”的知識應該到“商品學指南”中去找。

定数量的鞋油表示。反过来，倫敦的鞋油厂主們曾用几座宮殿来表示他們的大批鞋油的交換价值。因此，不論商品的自然存在的样式怎样，不管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所滿足的需要的特殊性质怎样，商品总以一定的数量彼此相等，在交換时相互替代，当作等价物，因而尽管它們的样子形形色色，却代表着同一个統一物。

使用价值直接是生活資料。但是，这些生活資料本身却又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人的生命消耗的結果，是物化劳动。一切商品，作为社会劳动的化身，都是同一个統一物的結晶。这个統一物即表現在交換价值中的劳动的特性，是我們現在所要考察的。

假定1盎斯金、1吨铁、1夸特小麦、20碼綢緞是等量的交換价值。作为这样的等价物，它們的使用价值的质的差別消失了，它們代表同一劳动的相等的分量。等量地物化在它們之中的劳动，本身應該是同样的、无差別的、簡單的劳动，对这种劳动來說，不論它出現在金、铁、小麦或綢緞中都是沒有差別的，正如对氧气來說，不論它存在于铁锈、大气、葡萄汁或人血中都沒有差別一样。但是，挖金、采铁、种麦、織綢，是质上互不相同的劳动种类。事实上，那种在物体上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差別的东西，在过程中就表现为創造这些使用价值的活动的差別。生产交換价值的劳动，同使用价值的特殊物质无关，因此也同劳动本身的特殊形式无关。其次，不同的使用价值是不同个人的活动的产物，也就是个性不同的劳动的結果。但是，作为交換价值，它們代表相同的、无差別的劳动，也就是沒有劳动者个性的劳动。因此，生产交換价值的劳动是抽象一般的劳动。

如果1盎斯金、1吨铁、1夸特小麦、20碼綢緞是等量的交換

价值或等价物，那末 1 盎斯金、 $\frac{1}{2}$ 吨铁、3 蒲式耳小麦和 5 碼綢緞就是根本不等量的交换价值，这种量的差别是这些物品作为交换价值所能具有的唯一差别。作为不等量的交换价值，它們代表較多或較少的、大量或小量的簡單的、同样的、抽象一般的劳动，即构成交换价值实体的劳动。試問，怎样衡量这些量呢？或者，不如說，既然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量的差别只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的差别，那末这种劳动本身的量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呢？正如运动的量的存在是時間一样，劳动的量的存在是**劳动時間**。假定劳动的质已定，劳动本身的持續時間的长短就是劳动所能具有的唯一差别。作为劳动時間，劳动用时、日、周等自然計时尺度作自己的尺度。劳动時間是劳动的活的存在，与劳动的形式、内容和个性无关；它是作为量的存在的劳动的活的存在，同时带有这种存在的內在尺度。物化在各种商品使用价值中的劳动時間，是使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因而成为商品的实体，同时又衡量商品的一定价值量。包含同一劳动時間的不同使用价值的相当量是等价物，換句話說，一切使用价值，在它們包含的已支出的物化劳动時間相等的比例上，都是等价物。作为交换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時間**。

要理解交换价值由劳动時間决定，必須把握住下列几个主要观点：劳动化为簡單的、可以說是无质的劳动；生产交换价值因而生产商品的劳动借以成为**社会劳动**的特殊方式；最后，以使用价值为結果的劳动和以交换价值为結果的劳动之間的区别。

要按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時間来衡量商品的交换价值，就必须把不同的劳动化为无差别的、同样的、簡單的劳动，簡言之，即化为质上相同因而只有量的差别的劳动。

这种简化看来是一个抽象，然而这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把一切商品化为劳动时间同把一切有机体化为气体相比，并不是更大的抽象，同时也不是更不现实的抽象。这样用时间来衡量的劳动实际上并不表现为不同主体的劳动，相反地，不同的劳动者个人倒表现为**这种劳动的简单器官**。换句话说，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可以叫作**一般人类劳动**。一般人类劳动这个抽象存在于平均劳动中，这是一定社会中每个平常人所能完成的劳动，是人的筋肉、神经、脑等的一定的生产消耗。这是每个平常人都能学会的而且是他必须以某种形式完成的**简单劳动**^①。这种平均劳动的性质本身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是各不相同的，但在一定的社会中却是一定的。任何统计都能证明，简单劳动构成资产阶级社会劳动总量的绝大部分。甲用6小时生产铁用6小时生产麻布，乙也用6小时生产铁用6小时生产麻布，或者，甲用12小时生产铁，乙用12小时生产麻布，这显然只是同一劳动时间的不同用法。可是，那种紧张程度较高、比重较大而超过平均水平的复杂劳动又怎样呢？这种劳动可以化为复合的简单劳动，高次方的简单劳动，例如1个复杂劳动日等于3个简单劳动日。这里还不是研究那些支配这种简化的规律的地方。但是这种简化在进行是很清楚的，因为作为交换价值，复杂劳动的产品在一定比例上是简单平均劳动的产品的等价物，因而等于一定量的这种简单劳动。

其次，交换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还包含一个前提：物化在一定商品如1吨铁中的劳动，不问是甲还是乙的劳动，总是同样多，

① 英国经济学家称它作“Unskilled labour”[“不熟练劳动”]。

或者說，不同的个人在生产同一个具有一定的质和一定的量的使用价值时耗費等量的劳动時間。換句話說，它包含着这样一个前提：一个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時間是生产該商品的**必要劳动時間**，即在当时一般生产条件下生产另一个同样的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時間。

从交换价值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条件是劳动的**社会規定**，或者說，是**社会劳动**的規定，不过这里所說的社会，不是通常的意义，而是特殊的意义。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性。首先，劳动的无差别的簡單性是不同个人的劳动的**相同性**，是他們的劳动彼此作为相同的劳动的相互关系，当然，这是通过事实上把一切劳动化为同种劳动。每一个个人的劳动，只要表现为交换价值，就有相同性这种社会性，而且也只有作为相同的劳动同所有其他个人的劳动发生关系，才表现为交换价值。

其次，在交换价值中，个人的劳动時間直接表现为**一般劳动時間**，而个别劳动的这种**一般性**直接表现为个别劳动的社会性。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時間，是个人的劳动時間，但是，这个个人与其他个人沒有差别，既然大家完成的是相同的劳动，所以这样的劳动時間也就是所有一切个人的劳动時間；因此，任何个人为生产一定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時間，也就是其他每一个人为生产同一商品也会耗費的**必要劳动時間**。它是个人的劳动時間，是他的劳动時間，但只是作为大家共同的劳动時間，因此，这样的劳动時間究竟是哪一个个人的劳动時間是沒有关系的。作为一般劳动時間，它在一个一般产品、**一般等价物**、一定量的物化劳动時間中**表現出来**；这个一定量的物化劳动時間同它直接表现为某一个人的产品时所具有的一定的使用价值形式无关，可以任意換成它作为任何

别人的产品时所具有的任何别的使用价值形式。它只有作为这样的一般的量，才是社会的量。个人的劳动，要成为交换价值，就必须成为一个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说，必须使个人的劳动时间表现为一般劳动时间，或者说，使一般劳动时间表现为个人的劳动时间。仿佛是不同的个人把他们的劳动时间结合在一起，并把他们共同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不同量表现在不同的使用价值上。这样，个人的劳动时间实际上就是社会为生产一定使用价值、满足一定需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但是，这里成为问题的仅仅是劳动借以获得社会性的那种特殊形式。例如，纺工的一定量的劳动时间物化在100磅麻纱中。假定织工的产品100码麻布也代表同量的劳动时间。既然这两种产品代表同量的一般劳动时间，因而是每种包含同量劳动时间的使用价值的等价物，它们也就互为等价物。在这里，只是由于纺工的劳动时间和织工的劳动时间表现为一般劳动时间，从而他们的产品表现为一般等价物，织工的劳动才成为纺工的劳动和纺工的劳动才成为织工的劳动，一个人的劳动才成为另一个人的劳动，也就是对他们两者来说，他们的劳动才成为社会存在。相反，在农村宗法式生产下，纺工和织工住在同一个屋顶之下，家庭中女纺男织，供本家庭的需要，在家庭的范围内，纱和布是社会产品，纺和织是社会劳动。但是，它们的社会性不在于纱作为一般等价物去交换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布，不在于两者作为同一个一般劳动时间的并无差别而同样有效的表现而相互交换。倒是家庭联系同它的自然发生的分工在劳动产品上打上了自己特有的社会烙印。或者，我们就中世纪的徭役和实物租来看。在这里，成为社会纽带的，是个人一定的、自然形式的劳动，是劳动的特殊性，而不是劳动的一般性。最后，我们看一下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

期自然发生的共同劳动^①。这里，劳动的社会性显然不是通过个人劳动采取一般性这种抽象形式，或者个人产品采取一个一般等价物的形式。成为生产前提的公社，使个人劳动不能成为私人劳动，使个人产品不能成为私人产品，相反，它使个人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机体的一个肢体的机能。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是以分散的个人劳动为前提的。这种劳动要通过它采取与自身直接对立的形式，即抽象一般性的形式，才变成社会劳动。

最后，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还有一个特征：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物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只有在一个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同别的使用价值发生关系时，不同个人的劳动才作为相同的一般的劳动相互发生关系。因此，如果交换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②这种说法正确的話，那末必须补充說：它是隐藏在物的外壳之下的关系。1磅铁和1磅金，虽然具有不同的物理和化学属性，却代表同一重量，同样，两个包含同一劳动时间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代表同一交换价值。因此，交换价值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社会的自然规定性，表现为作为

① 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够在印度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

② “财富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Gal'iani. «Della Moneta», p. 221. In vol. III von Custodis Sammlung der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Parte moderna». Milano, 1803 [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3卷第221页])

物的使用價值所固有的規定性，由於這種規定性，使用價值在交換過程中按一定比例相互替換，成為等價物，正如簡單的化學物質按一定比例化合而形成化學當量一樣。一種社會生產關係採取了一種物的形式，以致人和人在他們的勞動中的關係倒表現為物與物彼此之間的和物與人的關係，這種現象只是由於在日常生活看慣了，才認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在商品上這種神秘化還是很簡單的。大家多少總感覺到，作為交換價值的商品之間的關係，不過是人們與他們相互進行的生產活動的關係。在比較高級的生產關係中，這種簡單的外貌就消失了。貨幣主義的一切錯覺的根源，就在於看不出貨幣代表著一種社會生產關係，卻又採取了具有一定屬性的自然物的形式。嘲笑貨幣主義錯覺的現代經濟學家，一到處理比較高級的經濟範疇如資本的時候，就陷入同樣的錯覺。他們剛想拙劣地斷定是物的東西，突然表現為社會關係，他們剛剛確定為社會關係的東西，卻又表現為物來嘲弄他們，這時候，同樣的錯覺就在他們的天真的驚異中暴露出來了。

既然商品的交換價值實際上不過是個人勞動作為相同的一般勞動相互發生的關係，不過是勞動的一種特殊社會形式的物化表現，那末，說勞動是交換價值的因而也是財富（就它由交換價值構成來說）的唯一泉源，就是同義反復。說自然物質本身由於不包含勞動也就不包含交換價值^①，說交換價值本身不包含自然物質，也

^① “物質在其自然狀態中總是沒有價值的。” Mac Culloch. «Discours sur l'origin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tc.», traduit par Prévost. Genève, 1825, p. 57. [麥克庫洛赫“論政治經濟學的產生”，普雷沃譯，1825年日內瓦版第57頁]。可見，連一個麥克庫洛赫都比德國“思想家們”的拜物教高明得多，後者把“物質”和半打雜物湊在一起說成是價值的原素。例如，參看羅·施泰因“政治學體系”第1卷第170頁。

是这种同义反复。但是,威廉·配第說:“劳动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¹⁶ 貝克萊主教問:

“四大原素和包括在其中的人类劳动难道不是財富的真正泉源嗎?”^①

美国人托馬斯·庫伯通俗地解釋說:

“从一块面包中抽掉耗費在它上面的劳动,抽掉面包师、磨坊工、农夫等等的劳动,还剩下什么呢?不过是一把对人没有任何用处的野草籽而已。”^②

所有这些見解所說的,都不是作为交换价值源泉的抽象劳动,而是作为物质財富源泉之一的具体劳动,总之,是創造使用价值的劳动。既然这里的前提是商品的使用价值,那末,这里的前提也就是耗費在商品上的劳动具有特殊的效用并合乎一定的目的,而从商品的观点出发,这也就充分无遺地包含了对于当作有用劳动的劳动的一切考虑。面包作为使用价值,使我們关心的是它作为食品的屬性,而决不是农夫、磨坊工、面包师等人的劳动。即使这种劳动由于某种发明减少了 $\frac{19}{20}$,这个面包的用处仍然和从前一样。即使它現成地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丧失它的使用价值的一个原子。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实現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的相同性上,而作为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劳动实現在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无限多样性上。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一般的和相同的劳动**,而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劳动**,它按照形式和材

① Berkeley. «The Querist». London, 1750 [貝克萊“提問者”1750年倫敦版]:
«Whether the four elements and man's labour therein be not the true source of wealth?»

② Th. Cooper. «Lectures on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31 (Columbia, 1826), p. 99 [托·庫伯“政治经济学原理讲义”1831年倫敦版(1826年哥倫比亞版)第99頁]。

料分为无限多的不同的劳动方式。

如果认为,劳动就它创造使用价值来说,是它所创造的东西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那就错了。既然它是使物质适应于某种目的的活动,它就要有物质作为前提。在不同的使用价值中,劳动和自然物质之间的比例是大不相同的,但是使用价值总得有一个自然的基础。劳动作为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同一切社会形式无关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则相反,它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以裁缝的劳动为例,就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活动的物质规定性来说,它生产衣服,但不生产衣服的交换价值。它生产后者时不是作为裁缝劳动,而是作为抽象一般劳动,而抽象一般劳动属于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由裁缝缝出来的。在古代家庭工业中,妇女生产衣服,但不生产衣服的交换价值。作为物质财富的源泉之一的劳动,立法者摩西同税吏亚当·斯密同样熟悉。^①

现在我们考察一下把交换价值化为劳动时间所产生的几个更切近的规定。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是当作原因发生作用的。例如,小麦是作为食品发生作用的。一部机器在一定比例上代替劳动。商品借以成为使用价值、成为消费对象的这种作用,可以称作商品的服务,即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提供的服务。但是,作为交换价值,商品总是

^① 弗·李斯特永远不能理解(对他那讲求实际的利己主义的头脑来说,理解永远是不可及的)两种劳动的区别:一种是协助造出有用物即使用价值的劳动,一种是造出财富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即交换价值的劳动;因而他把英国现代的经济学家看成只是埃及的摩西的剽窃者。

仅仅从結果的观点上被考察。这里的问题不是它提供的服务，而是在生产它的过程中給它本身提供了的服务^①。举例來說，一部机器的交换价值不是决定于它所代替的劳动時間量，而是决定于为它本身已經支出的、因而也是生产同样一部新机器所需要的劳动時間量。

因此，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不变，那末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就不变。但是，生产的难易是不断变动的。如果劳动生产力提高了，那末，用較短的时间就可以生产出同样多的使用价值。如果劳动生产力降低了，那末，要生产同样多的使用价值就需要較多的时间。因此，一个商品包含的劳动時間的量，因而它的交换价值，是一个变动的量，它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反比地增加或减少。劳动生产力在加工工业中是按照預定的程度被应用的，而在农业和采掘工业中受无法控制的自然条件的制約。同一劳动在开采不同金屬时提供的采掘量有大有小，这要看这些金屬在地壳中蘊藏多少而定。同一劳动在丰收年可以物化为两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或許只物化为一蒲式耳小麦。在这里，因为自然条件的貧瘠还是富饒决定着受自然条件限制的特殊实在劳动的生产力，于是似乎是自然条件决定着商品的交换价值。

不同的使用价值以不等的体积包含同一劳动時間或同一交换价值。一个商品如能以比其他使用价值更小的使用价值体积包含一定量的劳动時間，它的特殊交换价值就越大。我們看到，某些使用价值在前后悬隔的不同文化时代里彼此間总是构成一个特殊交

① “服务”（service）这个范畴对于像让·巴·薩伊和弗·巴师夏那样的經濟学家必然会提供怎样的“服务”是不难了解的，他們的理性智慧，正如馬尔薩斯已經正确地指出过的，到处都抽掉了經濟关系的特定的形式規定性。

换价值的系列，这些特殊交换价值彼此間虽然不是保持着絲毫不变的数字比例，但是保持着高低級次的一般关系，如金、銀、銅、铁或小麦、黑麦、大麦、燕麦，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結論：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以均等的或大体均等的程度影响着生产这种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時間。

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在它自己的使用价值上是表現不出来的。但是，作为一般社会劳动時間的化身，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就同别的种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形成各种比例。这样，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就在別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上表現出来。等价物实际上就是在別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上表現出来的某种商品的交换价值。譬如我説 1 碼麻布值 2 磅咖啡，麻布的交换价值就在咖啡的使用价值上表現出来，而且是在这种使用价值的一定量上表現出来。有了这个比例，我就能够把任何数量麻布的价值用咖啡表現出来。显然，一种商品例如麻布的交换价值，在只有一种別的特殊商品如咖啡成为它的等价物的这样一个比例中，还不能充分表現出来。这 1 碼麻布所代表的一般劳动時間的量，同时实現在一切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无限多种不同的量上。每一种別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包含等量劳动時間的比例上，都是这 1 碼麻布的等价物。因此，**这一个別商品的交换价值**，只有在一切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成为它的等价物的无限多个等式中，才充分表現出来。它只有在这些等式的总和中，或者說，只有在一种商品同每种別的商品交换的各种不同比例的总体中，才充分表現为**一般等价物**。例如，下面的等式系列：

$$1 \text{ 碼麻布} = \frac{1}{2} \text{ 磅茶叶}$$

$$1 \text{ 碼麻布} = 2 \text{ 磅咖啡}$$

1 碼麻布 = 8 磅面包

1 碼麻布 = 6 碼棉布

可以表現為：

1 碼麻布 = $\frac{1}{8}$ 磅茶葉 + $\frac{1}{2}$ 磅咖啡 + 2 磅面包 + $1\frac{1}{2}$ 碼棉布。

因此，如果我們有了足以把 1 碼麻布的价值充分表現出來的全部等式的总和，我們就能够用一個系列的形式把它的交換价值表現出來了。實際上，這個系列是無限的，因為商品的範圍從來沒有確定的界限，它是不斷地擴展的。但是，既然某一種商品用一切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衡量自己的交換价值，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換价值就反過來用這種被它們衡量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來衡量自己^①。如果 1 碼麻布的交換价值在 $\frac{1}{8}$ 磅茶葉、或 $\frac{1}{2}$ 磅咖啡、或 6 碼棉布、或 8 磅面包等等上表現出來，那末咖啡、茶葉、棉布、面包等等在它們分別等於第三者麻布的比例上是彼此相等的，這樣，麻布就成為它們的交換价值的共同尺度。每一種商品，作為物化的一般勞動時間即作為一定量的一般勞動時間，依次用一切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的一定量來表現自己的交換价值，而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換价值就反過來用這一種分離出來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來衡量自己。但是，每一種商品作為交換价值，既是這一種分離出來的商品，起着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換价值的共同尺度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在每一種其他商品用來直接表現自己交換价值的許許多種商品的总体中，又只是這許許多種商品中的一種。

① “被衡量物在某種形式上是衡量物的尺度，同被衡量物有這樣一種關係，也是尺度的一個特點。” Montanari. «Della Moneta», p. 48 in Custodis Sammlung, vol. III. Parte antica. [蒙塔納里“貨幣論”，載于庫斯托第編“意大利政治經濟學名家文集。古代部分”第 3 卷第 48 頁。]

一种商品的价值量同在它以外的其他商品种类的多少无关。但是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借以实现的等式系列的长短，取决于其他商品种类的多少。例如，表现咖啡价值的等式系列，表明咖啡的交换能力的范围，表明它起交换价值作用的界限。一个商品把无限多种的使用价值当作自己的等价这种表现，是同它的交换价值是一般社会劳动时间的化身相符合的。

我们看到，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是随着直接包含在这个商品本身中的劳动时间的量变动的。一个商品的实现了的、即表现在其他商品使用价值上的交换价值，必然也取决于生产一切其他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以什么比例变动。举例来说，如果生产一舍费耳小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而生产一切其他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增加一倍，那末，一舍费耳小麦的交换价值表现在它的等价物上就减少一半。结果，实际上好像生产一舍费耳小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减少一半，而生产一切其他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没有变动一样。各种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它们按什么比例能在同量劳动时间中生产出来。为了说明这种比例可能有什么样的变动，我们假定有甲和乙两种商品。第一，假定生产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这时，用乙来表现的甲的交换价值，随着生产甲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增减成正比地增减。第二，假定生产甲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用乙来表现的甲的交换价值，随着生产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增减成反比地增减。第三，假定生产甲和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按同一比例增减。这时，用乙表现的甲的等价表现保持不变。假定由于某种情况，一切劳动的生产力都按同一程度降低，以致生产一切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都按同一比例增加，那末，一切商品的价值都会增加，而它们的交换价值的实际表现却仍然不变；但

是，社会的实际财富减少了，因为社会要用更多的劳动時間才能生产出同样多的使用价值。第四，假定生产甲和乙所需要的劳动時間以不同的程度增加或减少，或者生产甲所需要的劳动時間增加，生产乙所需要的劳动時間减少，或者相反。所有这些情形，都可以簡化为：生产一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時間不变，而生产另一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時間有所增减。

每种商品的交换价值用每种別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现，可以用这个使用价值的整数，也可以用它的分数。作为交换价值，每种商品同物化在它本身中的劳动時間一样，都是可以分割的。商品与商品的等价关系同它們作为使用价值时在物理上有无可分割性无关，正如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相加，同它們的使用价值合成一件新商品时发生的实际的形式变换无关一样。

到此为止，商品是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方面来考察的，每次考察一面。可是，作为商品，它直接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統一；同时，它只有在同其他商品的关系中才是商品。商品相互間的实际关系是它們的交换过程。这是彼此独立的个人所参加的社会过程，但是他們只是以商品所有者的資格参加这个过程；他們互为对方的存在，是他們的商品的存在，因此，他們实际上只是作为交换过程的有意識的承担者出現。

商品是使用价值，如小麦、麻布、钻石、机器等等，但是，作为商品，它同时又不是使用价值。如果商品对于它的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就是說直接是滿足他自己需要的手段，那它就不是商品。商品对于它的所有者倒是非使用价值，就是說只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或者說只是交换手段；作为交换价值的积极承担者，使用价值变成交换手段。商品对于它的所有者只有作为交换价值才是使

用价值^①。因此，它还得**变成**使用价值，首先变成别人的使用价值。由于商品对它自己的所有者不是使用价值，所以它对别种商品的所有者是使用价值。不然，他的劳动就是无用的劳动，从而劳动的结果就不是商品。另一方面，商品必须变成**它的所有者本人**的使用价值，因为他的生活资料是在它之外，在别人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中。为了**变成**使用价值，商品就得面对一种特殊的需要，成为满足这种需要的对象。因此，商品的使用价值之**变成**使用价值，是在它们全面地变换位置、从把它们当作交换手段的人的手中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对象的人的手中的时候。只有通过商品的这种全面的**转移**，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才变成有用劳动。商品在它们彼此作为使用价值而发生的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中并没有取得任何新的经济上的形式规定性。相反，那种使它们具有商品特征的形式规定性却消失了。例如，面包从面包师手中转到消费者手中，并不改变它作为面包的存在。相反，只有消费者才把它当作使用价值、当作这种一定的食品，而在面包师手中，它本来是一种经济关系的承担者，一个既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因此，商品在它变成使用价值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唯一的形式变换，就是抛棄了它的形式存在——对它自己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而对它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商品要变成使用价值，就要全面转移，进入交换过程，但是它为交换的存在就是它作为交换价值的存在。因此，它要实现为使用价值，就必须实现为交换价值。

个别商品从使用价值的观点看来原来表现为独立的物，作为交换价值却一开始就是在它同一切其他商品的关系中被考察的。

① 亚里士多德是在这个规定性上理解交换价值的(見本章第一段脚注引文)。

但是,这种关系只是一种理論上的、想像的关系。它只是在交换过程中才成为现实。另一方面,商品固然是交换价值,因为在商品上面支出过一定量的劳动時間,因而它是物化劳动時間。但是就它的直接形式來說,它只是具有特殊內容的物化的个人的劳动時間,而不是一般劳动時間。因此,它不直接就是交换价值,而是先要变成交换价值。首先,只有当它代表着具有一定用途的、一个使用价值的劳动時間的时候,它才能是一般劳动時間的化身。这是一个物质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時間才被认为是一般社会劳动時間。因此,如果說商品只有在实现为交换价值时才能变成使用价值,那末另一方面,商品只有在它的轉移中证实为使用价值时才能实现为交换价值。一种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只能轉移給把它看作使用价值即特殊需要的对象的人。另一方面,它只有同另一种商品对換才被轉移,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站在这另一种商品的所有者的一方,那末同样,这个所有者也只有当他把自己的商品同那种以这一商品为对象的特殊需要接触时才能把它轉移,即把它实现。因此,当商品作为使用价值而全面轉移时,它們按照它們的物质差別,作为以自己的特殊屬性来滿足特殊需要的特殊物而相互发生关系。但是,作为这种單純的使用价值,它們彼此是漠不相干的存在,更恰当些說,是沒有任何关系的。作为使用价值,它們只有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才能被交换。但是,它們所以可以交换,只因为它們是等价物,而它們所以是等价物,只因为它們是等量的物化劳动時間,于是它們作为使用价值的自然屬性、从而它們同特殊需要的关系,都无需考虑了。一个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发生作用,倒是在于它作为等价物去任意替換一定量的任何別的商品,而不問自己对別的商品所有者是不是使用价值。但是,对

于别的商品所有者来说，它只有对他是使用价值的时候才成为商品，而对它自己的所有者来说，它只有对别的商品所有者是商品的时候才成为交换价值。因此，同一关系既应该是商品和商品作为质上相同而只在量上不同的量和量之间的关系，是它们作为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而相等的关系，同时又应该是商品和商品作为质上不同的物、作为满足特殊需要的各种特殊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简言之，作为各种实际使用价值而相异的关系。但是这种相等和相异是相互排斥的。所以，这里不仅因为一个问题的解决以另一个问题的解决为前提而出现一个恶性循环，而且因为一个条件的实现同另一个与它对立的条件的实现直接结合而出现一个相互矛盾的要求的总体。

商品的交换过程，应该既是这些矛盾的展开，又是这些矛盾的解决，可是这些矛盾在交换过程中不能通过这种简单的方式表现出来。上面我们只看到，商品本身怎样彼此作为使用价值发生关系，就是说，商品怎样作为使用价值在交换过程内部出现。交换价值则相反，正像我们以上所考察的那样，它只存在于我们的抽象中，或者不妨说只存在于个别商品所有者的抽象中，对于个别商品所有者来说，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放在仓库里，作为交换价值放在心上。但是在交换过程内部，商品本身不仅要彼此作为使用价值存在，而且要彼此作为交换价值存在，并且它们的这种存在应该表现为它们自己的相互关系。我们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商品要表现为交换价值，表现为物化劳动，就要先作为使用价值来转移，交给别人，而它们要作为使用价值来转移，反过来又以它们作为交换价值的存在为前提。但是假定这个困难已经解决了。假定商品已经摆脱了它的特殊使用价值，通过使用价值的转移已经实现了那个物

质条件,即成为社会有用劳动而不是个人为自己进行的特殊劳动。这样,它在交换过程中对其他商品就应该变成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物化一般劳动时间,因而不再是具有一种特殊使用价值的有限作用,而是取得一种直接用一切使用价值作自己的等价物来表现自己的能力。但是,每一个商品都是**这样一个商品**:它应当像这样通过自己特殊使用价值的转移而表现为一般劳动时间的直接化身。但是另一方面,在交换过程中彼此对立着的只是特殊商品,只是体现在特殊使用价值中的私人劳动。一般劳动时间本身是一个抽象,这个抽象本身对于商品来说是不存在的。

我們研究一下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借以得到实际表现的等式的总和,例如:

$$1 \text{ 碼麻布} = 2 \text{ 磅咖啡}$$

$$1 \text{ 碼麻布} = \frac{1}{2} \text{ 磅茶叶}$$

$$1 \text{ 碼麻布} = 8 \text{ 磅面包或其他等等}$$

这些等式只表示在1碼麻布、2磅咖啡、 $\frac{1}{2}$ 磅茶叶等等中物化着等量的一般社会劳动时间。但是,事实上,只有当这些特殊使用价值按照它们包含的劳动时间的长短的比例实际上彼此交换的时候,表现在这些使用价值上的个人劳动,才变成一般劳动,并且以这个一般劳动的形式变成社会劳动。社会劳动时间可以说只是潜伏在这些商品中,只是在它们的交换过程中才显露出来。在这里,出发点不是作为共同劳动的个人劳动,相反地是私人的特殊劳动,这种劳动只有在交换过程中扬弃了自己原有性质后才证明为一般社会劳动。因此,一般社会劳动不是现成的前提,而是变成的结果。这样就产生了新的困难,一方面,商品必须作为物化一般劳动时间进入交换过程,另一方面,个人劳动时间作为一般劳动时

間的物化，本身又只是交換過程的產物。

每個商品要通過它的使用價值的轉移，即它的原來存在的轉移，取得它作為交換價值的相應的存在。因此，商品在交換過程中必須使它的存在兩重化。另一方面，它的作為交換價值的第二存在本身也只能是另一種商品，因為在交換過程中對立着的只是商品。怎樣把一種特殊商品直接表現為物化一般勞動時間呢？換句話說，也就是怎樣使物化在一種特殊商品中的個人勞動時間直接具有一般性這種性質呢？一個商品的交換價值的實際表現，即每個作為一般等價物的商品的實際表現，是一個無限多的等式的總和，如：

$$1 \text{ 碼麻布} = 2 \text{ 磅咖啡}$$

$$1 \text{ 碼麻布} = \frac{1}{2} \text{ 磅茶葉}$$

$$1 \text{ 碼麻布} = 8 \text{ 磅麵包}$$

$$1 \text{ 碼麻布} = 6 \text{ 碼棉布}$$

$$1 \text{ 碼麻布} = \text{其他等等}$$

當商品只是被想像為一定量物化一般勞動時間的時候，上述表現是理論上的東西。只要把上面的等式系列倒置過來，一個特殊商品作為一般等價物的存在就從單純的抽象變為交換過程本身的社会結果。例如：

$$2 \text{ 磅咖啡} = 1 \text{ 碼麻布}$$

$$\frac{1}{2} \text{ 磅茶葉} = 1 \text{ 碼麻布}$$

$$8 \text{ 磅麵包} = 1 \text{ 碼麻布}$$

$$6 \text{ 碼棉布} = 1 \text{ 碼麻布}$$

既然咖啡、茶葉、麵包、棉布，總之一切商品都把它們本身包含的勞動時間在麻布上表示出來，麻布的交換價值就反過來在作為它自己的等價物的一切其他商品上展示出來，物化在麻布本身中

的劳动時間就直接变成在一切其他商品的不同量上均等地表现出来的一般劳动時間。这里，麻布由于一切其他商品对它的**全面行动**，变成了一般等价物。作为交换价值，每种商品都曾成为一切其他商品的价值尺度。这里則相反，由于一切商品都用一种特殊商品来衡量它們的交换价值，这种分离出来的商品就变成交换价值的最适当的存在，交换价值的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存在。另一方面，每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借以表现的无限系列或无限多的等式，紧縮成单独一个只有两个項的等式。2 磅咖啡 = 1 碼麻布现在是咖啡的交换价值的充分的表现，因为1 碼麻布在这种表现中直接表现为一定量的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等价物。因而，现在在交换过程内部，各种商品以麻布的形式彼此作为交换价值存在或出现。原先，一切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只当作不同量的物化一般劳动時間彼此发生关系，现在，这一点表现为：它們作为交换价值只代表不同量的**同种物品**即麻布。因而，一般劳动時間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物，一种站在一切其他商品之旁和之外的商品。但同时，一个商品对另一个商品表现为交换价值的那个等式，如 2 磅咖啡 = 1 碼麻布，是一个尚待实现的等式。商品只有通过它作为使用价值的轉移（这要看它能否在交换过程中证明自己是满足某种需要的对象），才真正从它作为咖啡的存在轉化为它作为麻布的存在，从而取得一般等价物的形式，对一切其他商品真正变成交换价值。反之，由于一切商品通过它們作为使用价值的轉移而轉化为麻布，麻布就变成一切其他商品的轉化存在，并且麻布只有作为一切其他商品向它轉化的結果，才直接变成**一般劳动時間的化身**，也就是个人劳动全面轉移、揚棄的产物。如果說，商品为了彼此表现为交换价值而把它們的存在这样地二重化了，那末，作为一般等价物分离出来

的商品也把它的使用价值二重化了。这个分离出来的商品除了它作为特殊商品所具有的特殊使用价值以外，还获得了一种一般使用价值。它的这种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性，就是说，是从它在交换过程中由于其他商品对它的全面行动所起的特殊作用产生的。作为一种满足特殊需要的对象，每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不同人的手中有不同的价值，例如，在转让者的手中是一种价值，而在获得者手中是另一种价值。作为一般等价物分离出来的商品，现在是满足从交换过程本身产生出来的一般需要的对象，它对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使用价值，即成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成为一般交换手段。于是，在这个商品上解决了商品本身所包含的矛盾：它既要作特殊使用价值，同时又要作一般等价物，因而作每个人的使用价值、一般使用价值。所以，如果一切其他商品现在首先把自己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这个分离出来的商品的观念上的、尚待实现的等式，那末，就这种分离出来的商品来说，虽然它的使用价值是实际存在的，但在过程本身中却表现为单纯的形式存在，它还需要通过转化为真正的使用价值才得到实现。原先，商品表现为商品一般，表现为物化在一种特殊使用价值中的一般劳动时间。在交换过程中，一切商品都同作为商品一般的那个分离出来的商品发生关系，都同作为一般劳动时间在一种特殊使用价值中的存在的那种商品发生关系。因此，它们作为特殊商品同一个作为一般商品的特殊商品对立起来^①。这样一来，商品所有者相互把他们的劳动作为一般社会劳动来对待的关系，就表现为他们把他们的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来对待的关系，而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彼此作为交换价值相

^① 马克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了一个注：“在詹诺韦西的著作中有这种说法。”——编者注

互对待的关系，就表现为它們把一种特殊商品作为它們交换价值的最适当的表现的全面关系，这反过来又表现为这种特殊商品同其他一切商品的特殊关系，因而表现为一个物品的一定的仿佛是天生的社会性质。这样地代表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最适当的存在的特殊商品，或者说，作为一种分离出来的特殊商品的**商品交换价值**，就是**货币**。它是商品在交换过程本身中形成的商品交换价值的结晶。因此，如果说商品在交换过程内部只有解脱了一切形式规定性，以直接的物质形态彼此发生关系，才变成互为**使用价值**，那末，它們为了彼此表现为**交换价值**就必须采取新的形式规定性，必须发展成货币。货币不是符号，正如一个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存在不是符号一样。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一个存在于个人之外的物，这些个人在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定关系表现为一个物品的特殊属性，这种颠倒，这种不是想像的而是平凡实在的神秘化，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的特点。在货币上，它不过比在商品上表现得更加夺目而已。

一切商品的货币存在应该结晶在其中的那种特殊商品所必需具备的物理属性（就其直接由交换价值的本质产生来说）是：可以任意分割，各部分是同质的，这种商品件件全无差别。作为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这种商品必须是同质的东西，只能表现量的差别。另一个必需具备的属性是它的使用价值的耐久性，因为它要经常处在交换过程中。贵金属最富于这些属性。货币既然不是思考或协商的产物，而是在交换过程中本能地形成的，所以曾经有过各种极不相同的、不大适合的商品交替地执行过货币的职能。在交换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必然把交换价值的规定和使用价值的规定两极式地分配在商品中间，于是一种商品比如说充当交换手段，

而另一种商品則作为使用价值被轉移；由于这种必然性，到处都有一种甚至几种具有最普遍的使用价值的商品最初偶然地起着貨幣的作用。它們即使不是滿足当前需要的物品，但是它們是財富的最重要的物质組成部分，这就使它們比其余的使用价值具有更大的一般性。

直接的物物交换这个交换过程的原始形式，与其說表示商品开始轉化为貨幣，不如說表示使用价值开始轉化为商品。交换价值还没有取得独立的形式，它还直接和使用价值結合在一起。这表现在两方面。生产本身，就它的整个結構來說，是为了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交换价值，因此，在这里，只有当使用价值超过消費需要量时，它才不再是使用价值而变成交换手段，变成商品。另一方面，使用价值尽管两极分化了，但只是在直接使用价值的界限之內变成商品，因此，商品所有者交换的商品必須对双方是使用价值，而每一商品必須对它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实际上，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內部出現的^①，而是在它的尽头，在它的边界上，在它和其他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出現的。这里开始了物物交换，由此浸入公社內部，对它起着瓦解作用。因而，在不同公社間的物物交换中变成商品的那些特殊使用价值，如奴隶、牲畜、金屬，通常成为公社本身內部的最早的貨幣。我們說过，一种商品的等价物的系列愈长，或者它的交换范围愈大，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就愈在較高的程度上作为交换价值表现出来。因此，物物

^① 亚里士多德在談到当作原始公社的私人家庭时也指出了这一点。但是家庭的原初形式本身是氏族，私人家庭只是从氏族在历史上的解体中才发展起来的。“因为在最初公社(而这是家庭)中，这(即交换)显然毫无必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貝克尔編 1837 年牛津版第 1 卷第 9 章第 14 頁)

交換的逐步擴大，交換次數的增加，進入物物交換的商品種類的增多，發展了作為交換價值的商品，促進了貨幣的形成，從而對物物交換起着瓦解的作用。經濟學家慣於從擴展了的物物交換所遇到的外部困難中去找尋貨幣的起源，卻忘記了這些困難是從交換價值的發展、因而是從作為一般勞動的社會勞動的發展產生出來的。舉例來說：商品作為交換價值應當可以任意分割，作為使用價值卻不能任意分割。或者，甲的商品對於乙是使用價值，而乙的商品對於甲却不是使用價值。或者，商品所有者對於他們拿來互相交換的商品有需要，但這些商品是不能分割的商品，在價值比例上也不相等。換句話說，經濟學家在借口考察簡單的物物交換時，看到了作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直接統一體的商品存在所包含的矛盾的某些方面。另一方面，他們始終堅持物物交換是商品交換過程的最適當形式，只是在技術上有某些不方便，而貨幣是為了消除這些不方便被巧妙地設計出來的手段。從這個非常膚淺的觀點出發，有位機智的英國經濟學家說得對：貨幣只是一種物質工具，如同船舶或者蒸汽機一樣，它不是一種社會生產關係的表現，因而不是經濟範疇。因此，把貨幣放在政治經濟學中來研究是弄錯了，政治經濟學同工藝學事實上是毫無共同之處的。^①

在商品世界中，發達的分工是作為前提存在的，或者更正確地

① “貨幣實際上只是買賣活動的工具（但是請問您是怎樣理解買和賣的呢？）^②，研究貨幣，同研究船舶、蒸汽機或任何用來便利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的其他工具一樣，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組成部分。”（Th. Hodgskin, «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etc.». London, 1827, p. 178—179 [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經濟學”1827年倫敦版第178—179頁]）

②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號〈〉內的話或標點符號等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譯者注

說，这种分工直接表现在使用价值的多种多样上，这些使用价值作为特殊商品彼此对立并包含着同样多种多样的劳动方式。分工作为一切特殊的生产活动方式的总体，是从物质方面、作为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来考察的社会劳动的总体形式。但是，从商品的角度以及从交换过程内部来看，分工本身只在它的结果、在商品本身的特殊性上存在。

商品交换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物质变换即私人特殊产品的交换，同时也就是个人在这个物质变换中所发生的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生。商品彼此間在过程中的关系結晶为一般等价物的种种规定，因而，交换过程同时就是货币的形成过程。表现为种种过程連續进行的这个过程的整体，就是流通。

A. 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

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①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

配第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劳动，并非不清楚劳动的创造力受自

① 对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两人的著作和性格的比较研究，——暂且不谈这一比较将異常清楚地说明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英法两国的社会对立——将是对英法两国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民族对立的起源的叙述。这种对立最后在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間又重新表现出来。

然条件的限制。关于实在劳动，他一开始就是从它的社会的总体形式上当作分工来理解的^①。这种关于物质财富的源泉的看法，

- ① 配第也把分工当作生产力来闡述，而且他的构想比亚当·斯密还要宏大。見《An Essay concerning the multiplication of mankind etc.》，3 edition, 1686, p. 35—36 [“論人类的繁殖”1686年第3版第35—36頁]。他在这一著作中說明分工对生产的好处时，不仅像后来亚·斯密以制針业为例那样举出制表业为例，而且用大工厂企业的观点来看一个城市和整个国家。1711年11月26日的“旁观者”杂志¹⁷曾引用这位“可敬佩的威廉·配第爵士的解釋”。因此，麦克庫洛赫以为“旁观者”杂志誤把配第当作另一个年輕40岁的作家，那是猜錯了。（見 Mac Culloch. 《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Economy, a classified catalogue》. London, 1845, p. 102 [麦克庫洛赫“政治经济学文献。分类目录”1845年倫敦版第102頁]）配第觉得自己是一門新科学的奠基者。他說，他的方法“不是傳統的”。他不是把一連串比較級和最高級詞汇同空論拼湊在一起，而是立志要用 terms of number, weight or measure [数字、重量和尺度]來說話，只利用从感观的經驗中得出的論据，只研究 as have visible foundations in nature [在自然界中具有可見的根据的原因]。他把那些以 mutable minds, opinions, appetites and passions of particular [个人的变化无常的意图、見解、爱好和热情]为依据的原因留給別人去研究。（《Political Arithmetic etc.》. Lond., 1699. Preface [“政治算术”1699年倫敦版。序言]）他的天才的胆略例如表現在这样的建議中，即把爱尔兰的居民和苏格兰高地的居民連同他們的动产迁移到大不列顛的其余地区。这样，劳动時間可以节省，劳动生产力可以提高，而“国王及其臣民将更加富强”（“政治算术”第4章）。又如，当荷兰作为一个貿易国家还占着优势地位，而法国似乎要变成一个称霸于世的貿易强国的时候，他在“政治算术”的一章中就证明英国負有征服世界市場的使命，他說：“英王的臣民有适宜而充裕的資本来經營整个商业世界的貿易。”（同上，第10章）“阻止英国强大的种种障碍是暫时的、可以排除的。”（第247頁及以下各頁）他的全部著作洋溢着別致的幽默。例如，他指出，荷兰（当时它在英国經濟学家的眼中正如今日英国在大陆經濟学家的眼中一样，是一个模范国）征服世界市場是合乎自然的，而“不是像有些人說的那样荷兰人有天使般的机智和理解力”（同上，第175—176頁）。他維護信仰自由，把它看作貿易的条件，“因为只要允許穷人这样想：他們的财产虽然少些，但是他們对于他們看作穷人特有财产的神的事物

不像在他的同代人霍布斯那里一样多少是无結果的，而是把他引导到**政治算术**——政治經濟学作为一門独立科学分离出来的最初形式。但是，他把交換价值看成貨幣，正如交換价值在商品交換过程中表現的那樣，而把貨幣本身看成存在着的商品，看成金銀。他受着貨幣主义的概念束縛，把特种的实在劳动即采掘金銀的劳动，叫做生产交換价值的劳动。他实际上是說，资产阶级的劳动應該生产的不是直接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是那种在交換过程中能够通过自身轉移而表现为金銀，即表现为貨幣、交換价值、物化一般劳动的使用价值。然而，他的例子显然证明，認識了劳动是物质財富的源泉，并不排斥不了解那种使劳动成为交換价值的源泉的特定社会形式。

布阿吉尔貝尔就他这方面來說，虽然不是有意識地，但是事实上把商品的交換价值歸結于劳动時間，因为他用个人劳动時間在

有着更多的机智和理解力，那末穷人就会勤勉，就会把劳动和辛勤看成是对于神的义务”。因此，貿易“不是同任何一种宗教結合着，而首先是和居民中的異教徒結合着”。（“政治算术”，第183—186頁）他主張为騙子公开征收一种特殊的捐稅，因为对于公众說来，为騙子納稅比让騙子課稅好些（同上，第199頁）。相反，他反对那种使财富从实业者手中轉入“专门吃喝玩乐和搞玄学”的人們手中的租稅。配第的著作几乎是书肆珍品，只散見于陈旧拙劣的版本；这一点尤其值得奇怪的是，威廉·配第不仅是英国政治經濟学之父，并且还是别号兰斯唐侯爵的英国輝格党的奈斯托尔——亨利·配第的先祖。但是，兰斯唐家族要出版配第全集，不附上一篇作者的傳記几乎是不行的，而显貴的輝格党門第的大多数的 *origines* [家世]，正是 *the less said of them the better* [少說为妙]。这个敢于思想而又十分輕浮的外科軍医，既能在克倫威尔的盾的保护下掠夺爱尔兰，又能为这种掠夺向查理二世跪求必要的男爵称号，这样的祖像是不便公諸于世的。同时，配第在他生前出版的大部分著作中，力图证明查理二世时期正是英国的繁荣时期，而这一看法在《glorious revolution》[“光荣革命”]的世襲冒充者看来是一种異端。

各个特殊产业部門間分配时所依据的正确比例来决定“真正价值” (la juste valeur), 并且把自由竞争說成是造成这种正确比例的社会过程。但同时他又和配第相反, 狂热地反对货币, 认为由于货币的干預, 商品交换的自然平衡或和諧被破坏了; 他认为货币是一个要求把一切自然財富作祭品的荒誕的摩洛赫。如果說, 这个反对货币的論战一方面同一定的历史条件有关, 因为布阿吉尔貝尔攻击路易十四的宮廷、包稅人和貴族的具有盲目破坏作用的求金欲^①, 而配第則把求金欲当作鼓舞一个民族去发展产业、征服世界市場的强大动力加以頌揚, 那末, 这里同时也出現了一个更深刻的原則对立, 这种对立是真正英国的經济学和真正法国的^② 經济学之間的經常对立的重复。布阿吉尔貝尔实际上只看到財富的物质內容、使用价值、享受^③, 他把劳动的資產階級形式、使用价值作为商品来生产以及商品的交换过程, 看成是个人劳动借以达到它的目的的

① 布阿吉尔貝尔在反对当时的“理财秘术”时說: “财政学不过是对农业和商业的利益的深刻認識。”《Le détail de la France》. 1697. Ausgabe von Eugène Daire der «E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 siècle》. Paris, 1843, vol. I, p. 241 [“法国詳情”1697年版, 載于欧仁·德尔編“十八世紀的財政經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1卷第241頁]。

② 不是拉丁語系的政治經济学, 因为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学派和米兰学派重演了英法政治經济学間的对立, 而早期的西班牙人, 要末只是重商主义者或像烏斯塔里斯那样的变相重商主义者, 要末像霍韦利亚諾斯那样 (見他的 Obras. Barcelona, 1839—40 [“文集”1839—1840年巴塞羅納版]) 与亚·斯密同持“中庸之道”。

③ “真正的財富……不仅是生活必需品的充分享受, 而且是剩余物品和一切足以引起快感的東西的充分享受。”Boisguillebert. «Dissertation sur la nature de la richesse etc.», l. c., p. 403 [布阿吉尔貝尔“論財富的本性”, 載于欧仁·德尔“十八世紀的財政經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1卷第403頁]。但是配第是个輕浮的、掠夺成性的、毫无气节的冒險家, 而布阿吉尔貝尔虽然身为路易十四的法官, 却既热情又勇敢地替被压迫階級声辯。

合乎自然的社会形式。因此，一遇到資產階級財富的特殊性质，例如在貨幣上，他就认为有强挤进来的外来因素的干涉，并对一种形式的資產階級劳动进行激烈的攻击，对另一种形式的資產階級劳动却空想地加以贊美^①。布阿吉尔貝尔的例子向我們证明，劳动時間还是可以看成商品价值量的尺度的，尽管把物化在商品交換价值中并用時間来衡量的劳动同个人直接的自然活动混为一談。

第一次有意識地、明白而淺显地把交換价值归結于劳动時間的分析，我們是在新世界的一个人那里发现的，在新世界，資產階級生产关系同它的承担者一起輸入进来，并且在这块由于土质肥沃而补救了历史傳統貧乏的土地上迅速生长起来。这个人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在1719年所写而在1721年付印的一本青年时代的著作中，表述了現代政治經濟学的基本規律^②。他說必須撇开貴金屬而寻找另一种价值尺度。这种尺度就是劳动。

“銀的价值可以和其他一切东西的价值一样完美地用劳动来衡量。比如我們假定，有一个人种玉蜀黍，另一个人采矿炼銀。到年底或者在任何其他一段时期以后，生产的全部玉蜀黍和全部銀互为自然价格，再假定前者是20蒲式耳，后者是20盎斯，則1盎斯銀的价值等于生产1蒲式耳玉蜀黍所耗費的劳动。但是，如果发现了更近便易采和更富的矿，現在一个人生产40盎斯銀同从前生产20盎斯一样容易，而生产20蒲式耳玉蜀黍所需要的劳动还和从前一样，那末，这时2盎斯銀的价值不会多于生产1蒲式耳玉蜀黍所耗費的那个劳动，而 *caeteris paribus*（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前1蒲式耳值1盎斯，現在1蒲式耳就值2盎斯了。因此，一国的財富要用它的居

① 蒲魯东式的法兰西社会主义患着同样的民族遺傳病。

② Franklin, B. The works of etc., ed. by J. Sparks, vol. II. Boston, 1836: «A modest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a paper currency» [斯巴克斯編“富兰克林文集”1836年波士頓版第2卷：“試論紙幣的性质和必要性”]。

民所能购买的劳动量来估計。”①

于是，劳动時間在富兰克林那里就以經濟学家的片面性立即表现为价值尺度。实在产品轉化为交换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問題只在于替它們的价值量发现一种尺度。

他說：“既然貿易整个說来不过是劳动对劳动的交换，所以一切东西的价值用劳动来估計是最正确的。”②

只要把这里的“劳动”一詞換成实在劳动，我們立刻就会发现，一种形式的劳动和另一种形式的劳动被混为一談了。既然貿易，比如說，就是鞋匠劳动、矿工劳动、紡工劳动、画匠劳动等等的交换，那末难道鞋的价值用画匠的劳动来估价就是最正确的嗎？富兰克林的意思正好相反，他是說，鞋、矿产品、紗、画等等的价值，决定于那种不具有特殊的质、因而只在量上可以衡量的抽象劳动③。但是，因为他不是把交换价值中所包含的劳动当作抽象一般的、由个人劳动的全面轉移而产生的社会劳动来闡明，他就必然看不到貨幣就是这种被轉移了的劳动的直接存在形式。因此，在他看来，貨幣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并没有內在的联系，貨幣倒是为了技术上的方便而从外面搬进交换中来的一种工具④。富兰克林关于

① 杰·斯巴克斯編“富兰克林文集”1836年波士頓版第2卷第265頁：「Thus a riches of a country are to be valued by the quantity of labour its inhabitants are able to purchase」。

② «Trade in general being nothing else but the exchange of labour for labour, the value of all things is, as I have said before, most justly measured by labour», 同上, 第267頁。

③ L. c.: «Remarks and facts relative to the American paper money», 1764 [“富兰克林文集”：“关于美国紙币的評論和事实”1764年版]。

④ 見 «Papers on American Politics» [“美国政治問題論文集”]。“关于美国紙币的評論和事实”1764年版(“富兰克林文集”)。

交換價值的分析，對科學的總的發展並無直接影響，因為他只是出於一定的實際需要探討了政治經濟學的個別問題。

究竟哪一種特殊的實在勞動是資產階級財富的源泉呢？在十八世紀，實在的有用勞動同生產交換價值的勞動之間的对立，就是以這樣的問題形式激動着歐洲。這就已經假定，並不是每一種實現為使用價值或提供產品的勞動，因而就已經直接創造財富。但是，對於重農學派來說，也像對他們的反對者來說一樣，爭論的焦點倒不是哪一種勞動創造價值，而是哪一種勞動創造剩餘價值。因此，他們還沒有把問題在初級形式上解決，就先在複雜化了的形式上進行探討，正如一切科學的歷史進程一樣，在到達它們的真正出發點之前，總要經過許多彎路。科學和其他建築師不同，它不僅畫出空中樓閣，而且在打下地基之前就造起大廈的各層住室。關於重農學派這裡不再多談，並且把一整批在正確分析商品方面表露了或多或少中肯想法的意大利經濟學家^①也略去不說，我們直接來看一看建立了資產階級經濟學整個體系的第一个不列顛人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②。在他那裡，政治經濟學的抽象範疇還處在從它們的物質內容中分離出來的過程，因而表現得模糊不清和搖擺

① 例如見 Galiani. «Della Moneta», vol. III, in den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Herausgegeben von Custodi). Parte moderna. Milano, 1803 [加利阿尼“貨幣論”，載于庫斯托第編“意大利政治經濟學名家文集。現代部分”1803年米蘭版第3卷]。他說：“只有 fatica [辛勞] 才使物品有價值。”(第74頁)把勞動叫作辛勞，是南方人的特點。

② 斯圖亞特的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eing an essay on the science of domestic policy in free nations» [“政治經濟學原理研究，或自由國家內政學概論”]一書，最初是在亞當·斯密“國富論”問世前10年即1767年在倫敦用兩卷四開本出版的。我引的是1770年的都柏林版。

不定，交換價值這個范疇也是如此。他在一個地方說**實在價值**決定於勞動時間 (what a workman can perform in a day [一個工人一天所能做的])，但同時又混亂地加上 Salair [工資] 和原料^①。在另一個地方，同物質內容進行的搏鬥表現得更加激烈。他把一個商品所含的自然物質，例如，銀器中所含的銀，叫作商品的**內在價值** (intrinsic worth)，而把商品所含的勞動時間叫作商品的**使用價值** (useful value)。

他說：“前者是某種本來就是實在的物…… 而使用價值則相反，它必須依照為生產它而耗費的勞動來估計。為改變物質形式而耗費的勞動，代表一個人的時間的一定部分……”^②

斯圖亞特比他的前輩和後輩杰出的地方，在於他清楚地劃分了表現在交換價值中的特殊社會勞動和獲取使用價值的實在勞動之間的區別。

他說：“那種通過自身轉移 (alienation) 而創造出一般等價物 (universal equivalent) 的勞動，我稱之為產業。”

他不僅把作為產業的勞動同實在勞動區別開來，而且也同勞動的其他社會形式區別開來。他認為，這種勞動是資產階級形式的，是同它的古代形式和中世紀形式相對立的。他特別注意資產階級勞動和封建勞動之間的對立，他在蘇格蘭本地以及周游大陸時，曾對沒落階段的封建勞動進行過考察。斯圖亞特當然很清楚，在資產階級以前的時代，產品就採取過商品的形式，商品也採取過貨幣的形式，但是他詳細地證明，只是在資產階級生產時期，商品才成為財富的基本的原素形式，轉移才成為占有的主導形式，因

① 斯圖亞特“政治經濟學原理研究”第1卷第181—183頁。

② 同上，第361—362頁；«represents a portion of a man's time»。

此,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①。

在农业、工場手工业、航海业、商业等等实在劳动的特殊形式輪流地被看作是财富的真正源泉之后,亚当·斯密宣布劳动一般,而且是它的社会的总体形式即作为分工的劳动,是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在这里他完全没有看到自然因素,可是在純粹社会财富即交换价值的领域内,自然因素却追跟着他。誠然,斯密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价值,但是,他又把这种价值规定的现实性推到亚当以前的时代。換句話說,从簡單商品的观点看来他以为是真实的东西,一到資本、雇佣劳动、地租等等比較高級和比較复杂的形式代替了这种商品时,他就看不清了。例如,他說:在市民階級的 *paradise lost* [失乐园] 中,人們还没有以資本家、雇佣工人、土地所有者、佃戶、高利貸者等身分互相对立,而是以簡單的商品生产者和商品交换者的身分互相对立,在那里,商品价值是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他經常把商品价值决定于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時間这一規定,同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价值这一規定混为一談,在談到細节时总是搖摆不定,把社会过程在不等劳动間强制实行的客观的均等化,誤认为是个人劳动的主观的权利平等^②。他力图用**分工**來說明实在劳动之轉

① 因此他說,以替土地所有者創造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的宗法式农业是一种“濫用”,誠然,这不是在斯巴达,或者在羅馬,或者甚至在雅典,而是在十八世紀的工业国家。这种 *«abusive agriculture»* [“濫用的农业”] 不是 *«trade»* [“經營活动”], 而“只是謀生的手段”。正如资产阶级农业清除了农村的过剩人口一样,资产阶级工場手工业清除了工厂的过剩人手。

② 例如,亚当·斯密說:“对从事劳动的人說来,等量的劳动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地点必然有同等的价值。在他的健康、体力和活动处于正常的情况下,在他的技巧处于平均水平的条件下,他所付出的休息、自由和幸福的分量总是一样

化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即轉化为資產階級劳动的基本形式。认为私人交换以分工为前提固然是对的，但是认为分工以私人交换为前提就錯了。譬如在秘魯人中曾有过非常发达的分工，但是并没有私人交换，产品并没有作为商品交换。

大卫·李嘉图与**亚当·斯密**相反，他十分清楚地作出了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時間这一規定，并且指出，这个規律也支配着似乎同它矛盾最大的資產階級生产关系。李嘉图的研究只限于价值量，在这方面他至少推測到这个規律的实现有賴于一定的历史前提。他說，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時間这一規定，只适用于这样的商品，

“这些商品可以由工业任意增加，它們的生产受无限制竞争的支配”^③。

实际上，这不过是說，价值規律的充分发展，要以大工业生产和自由竞争的社會，即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为前提。同时，李嘉图还把劳动的資產階級形式看成是社会劳动的永恒的自然形式。他让原始的漁夫和原始的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分，按照物化在魚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時間的比例交换魚和野味。在这里他犯了时代錯誤，他竟让原始的漁夫和猎人在計算他們的劳动工具时去查看 1817 年倫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看来，除了資產階級社會形式以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¹⁸是他所知道的

多。所以，不論他取得多少商品作为他的劳动的报酬，他所付的代价总是一样。誠然，用这个代价买来的商品量，有时多些，有时少些，但这只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值有了变动，而不是因为购买商品的劳动的价值有了变动。可見，只有劳动从来不改变自己的价值。因此，它是商品的实在的价格……”

③ Ricardo, Davi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3 edition. London, 1821, p. 3 [大卫·李嘉图“政治經濟学和租稅的原理” 1821 年倫敦第 3 版第 3 頁]。

唯一的社会形式。李嘉图虽然受着这种资产阶级视野的限制，但是他对深处与表面完全不同的资产阶级经济作了非常深刻的理論上的分析，以致布魯姆助爵說：

“李嘉图先生似乎是从别的行星上掉下来的。”

西斯蒙第在同李嘉图的直接論战中不仅強調指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质^①，而且指出：“我們經濟进步的特征”在于把价值量归結于必要劳动時間，归結于

“全社会的需要和足以滿足这种需要的劳动量之間的比例”^②。

布阿吉尔貝尔认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被貨幣弄得虛假了，西斯蒙第不再为这种观念所束縛，但是，正像布阿吉尔貝尔非难貨幣一样，他非难大工业資本。如果說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經濟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結論并以此結束，那末，西斯蒙第則表現了政治經濟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結束作了补充。

作为古典政治經濟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時間这一規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發揮，經濟学界发生的爭論自然就集中到他身上。如果撇开这种爭論的多半是幼稚的^③形式，它可归納为下列几点：

第一：劳动本身有交换价值，而不同的劳动有不同的交换价

① Sismondi. «E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t. 2, p. 162. Bruxelles, 1838 [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学概論”1838年布魯塞尔版第2卷第162頁]：“商业把一切东西都归結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

② 同上，第163—166頁及以下各頁。

③ 最幼稚的恐怕是让·巴·薩伊給康斯坦西奧翻譯的李嘉图著作的法文本所加的注釋，最迂腐而又傲慢的是新近出版的麦克劳德先生的《Theory of Exchanges》¹⁹，London, 1858 [“匯率論”1858年倫敦版]。

值。把交换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是一种恶性循环，因为作为尺度的那个交换价值本身还需要有尺度。这种非难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已知劳动时间是交换价值的内在尺度，试以此为基础论证工资。雇佣劳动学说将答复这个问题。

第二：如果一个产品的交换价值等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一个劳动日的交换价值就等于一个劳动日的产品。换句话说，工资应当等于劳动的产品^①。但是实际情形恰好相反。Ergo〔因此〕，这种非难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纯粹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结果竟会使劳动的交换价值小于这劳动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呢？这个问题，我们在研究资本时解决。

第三：商品的市场价格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动而低于或高于它的交换价值。因此，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实际上，在这种奇怪的结论中不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种与交换价值不同的市场价格是如何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者更正确地說，交换价值规律如何只是在自己的对立物中实现。这个问题将在竞争学说中解决。

^①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的这种非难，后来被社会主义者抓住了。他们假定这个公式在理論上是正确的，責备实际与理論相矛盾，要求资产阶级社会在实践中贯彻它的理論原則的臆想的結論。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至少就是这样把李嘉图的交换价值公式倒轉过来反对政治经济学。留給蒲魯东先生去做的，就是不仅把旧社会的基本原則宣布为新社会的基本原則，并且宣称自己是李嘉图概括英国古典经济学全部成果的那个公式的发明者。事实证明，当蒲魯东先生在海峽彼岸“发现”这个公式的时候，在英国，甚至对李嘉图公式的烏托邦式的解釋早已被人遺忘了。（参看我的《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etc.》. Paris, 1847 [“哲学的貧困” 1847年巴黎版]，关于 *la valeur constituée* [构成价值] 一节）

第四：最后一个辯駁，假如不是像通常那样用古怪例子的形式提出来，似乎也是最有力的一个。如果交换价值不过是一个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時間，那末，不包含劳动的商品怎么会有交换价值呢？換句話說，純粹的自然力的交换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将在地租学說中解决。

第二章

貨幣或簡單流通

在英國議會就 1844 年和 1845 年羅伯特·皮爾爵士的銀行條例²⁰ 進行的一次辯論中，格萊斯頓曾經說，受戀愛愚弄的人，甚至還沒有因鑽研貨幣本質而受愚弄的人多。他是對不列顛人談不列顛人。相反，在貨幣鑽營上早就有“天使般的機智”（雖然配第對此表示懷疑）的荷蘭人，在貨幣鑽研上從來沒有失去過他們的機智。

只要理解了貨幣的根源在於商品本身，貨幣分析上的主要困難就克服了。在這個前提下，問題只在於清楚地理解貨幣所固有的形式規定性，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有困難的，因為一切資產階級關係都鍍上了金或銀，表現為貨幣關係，因而貨幣形式似乎具有一種無限複雜的、對它本身說來是外來的內容。

在以下的研究中要把握住，我們所談的只是從商品交換直接產生出來的那些貨幣形式，而不是屬於生產過程較高階段的那些貨幣形式，如信用貨幣。為簡化起見，到處把金作為貨幣商品。

1. 價值尺度

流通的第一個過程，可以說，是實際流通的理論上的準備過程。作為使用價值存在的商品，首先替自己創造一種形式，它們以

这种形式彼此在观念上作为交换价值，作为一定量物化一般劳动时间而出现。这个过程的一个必要行动，我们已知，就是商品使一种特殊商品，比如金，当作一般劳动时间的直接化身即当作一般等价物分离出来。我们回顾一下商品把金转化为货币时所采取的形式：

$$1 \text{ 吨铁} = 2 \text{ 盎斯金}$$

$$1 \text{ 夸特小麦} = 1 \text{ 盎斯金}$$

$$1 \text{ 呷摩哈咖啡} = \frac{1}{4} \text{ 盎斯金}$$

$$1 \text{ 呷钾碱} = \frac{1}{2} \text{ 盎斯金}$$

$$1 \text{ 吨巴西木材} = 1 \frac{1}{2} \text{ 盎斯金}$$

$$Y \text{ 量商品} = X \text{ 盎斯金}$$

在这个等式系列中，铁、小麦、咖啡、钾碱等等彼此表现为同样的劳动即物化在金中的劳动的化身，在这种劳动中，这些商品的不同使用价值所表现的各种实在劳动的一切特点完全消失了。作为价值，它们是相同的，是同一劳动的化身或劳动的同一化身，是金。作为同一劳动的同样的化身，它们只有一种差别即量的差别，或者说表现为不同的价值量，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中包含着不等的劳动时间。它们是这样单个单个的商品，但是因为同一般劳动时间本身，即同一种分离出来的商品——金发生了关系，它们同时又作为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彼此发生关系。正是这个使商品彼此表现为交换价值的过程中的关系，把包含在金中的劳动时间表现为一般劳动时间，一定量的这种一般劳动时间在不同量的铁、小麦、咖啡等等上，总之，在一切商品的使用价值上表现出来，或者说，直接在商品等价物的无限系列上展示出来。当商品全面地通过金来表现它们的交换价值的时候，金就直接用一切商品来表现它自己的

交換價值。當商品彼此間互相賦予交換價值的形式的時候，它們就賦予金以一般等價物的或貨幣的形式。

因為一切商品都按照一定量金和一定量商品含有等量勞動時間的比例用金來衡量自己的交換價值，金就成了**價值尺度**，而金首先只是由於作為價值尺度這一規定——作為價值尺度它直接用一切現有的商品等價物來衡量自己的價值——才變成一般等價物或貨幣。另一方面，一切商品的交換價值現在都用金來表現。在這個表現中，要區別質的因素和量的因素。商品的交換價值是作為同一的同樣的勞動時間的化身存在着；而商品的價值量充分地表現出來了，因為各商品在與金相等的比例上彼此相等。這一方面表現出各商品所包含的勞動時間的一般性質，另一方面在它們的金等價物上表現出這個勞動時間的量。商品的交換價值，這樣地用一種特殊商品，或者說，用商品同一種特殊商品相等的唯一等式，作為一般等價同時也作為這個等價的程度表現出來，就是**價格**。價格是商品交換價值在流通過程內部出現時的轉化形式。

可見，商品通過它們把自己的價值表現為金價格這個過程，同時把金表現為價值尺度，從而表現為貨幣。如果它們全面地用銀或小麥或銅來衡量自己的價值，因而表現為銀價格、小麥價格或銅價格，銀、小麥或銅就會變成價值尺度，並且因此變成一般等價物。商品要在流通中表現為價格，它們在進入流通之前就應該是交換價值。金所以變成價值尺度，只是因為一切商品都用它來估計自己的交換價值。但是這種過程中的關係——金作為尺度的性質正是從這種關係中產生的——的全面性的前提是：每一單個商品都按照金和自身所包含的勞動時間的比例用金來衡量自己，因此，商品和金之間的真正尺度是勞動本身，或者說，商品和金是通過直接

的物物交换彼此作为交换价值而相等的。至于这种相等实际上如何发生，在简单流通领域内不能加以研究。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在生产金银的国家，一定量的劳动时间直接体现在一定量金银中，而在既不产金也不产银的国家，是通过迂回的办法达到同样的结果的，这就是用本国的商品，即本国平均劳动的一定部分去同那些有金银矿藏的国家直接地或间接地交换物化在金银中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金要充当价值尺度，就必须是一个潜在**可变的**价值，因为它只有作为劳动时间的化身才能变成其他商品的等价物，而同一劳动时间又随着实在劳动的生产力的变动而实现在同一些使用价值的不同量上。一切商品的价值用金来估计，正如每个商品的交换价值用一种别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现一样，其前提不过是金在一定时刻代表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前面讲过的交换价值规律也适用于金的价值变动。如果商品的交换价值保持不变，那末它们的金价格只有在金的交换价值跌落的时候才能普遍上涨。如果金的交换价值保持不变，那末金价格只有在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上涨的时候才能普遍上涨。商品价格普遍跌落的场合则相反。如果一盎斯金的价值由于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发生变动而跌落或上涨，那末它的涨落对一切其他商品都是**同等程度的**，因此，它在一切其他商品面前依旧代表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同一些交换价值现在是用比从前大或比从前小的金量来估计，但是它们是按照自身的价值量来估计的，因而它们彼此之间仍然保持着同样的价值比例。2 : 4 : 8 变为 1 : 2 : 4 或 4 : 8 : 16 时，其比例仍然不变。金的价值变动了，交换价值就以改变了的金量估计自己，这个改变了的金量并不妨碍金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正如银的价值虽然只等于金的价值的 $\frac{1}{16}$ ，但这并不妨碍银把金排斥于这个职

能之外。由于劳动時間是金和商品之間的尺度，而且金只有在一切商品都用它来衡量自己的时候才成为价值尺度，因此，以为商品的可通約性是由貨幣造成的想法，純粹是流通过程的假象^①。相反，正是作为物化劳动時間的商品的可通約性使金成为貨幣。

商品进入交换过程时所采取的实在形态，是它們的使用价值形态。它們必須通过自身的轉移才变成真正的一般等价物。它們的价格規定，是它們仅仅在观念上向一般等价物的轉化，是一个尚待实现的同金相等的等式。但是，由于商品在自己的价格上只是观念上轉化为金，或者说轉化为只是想像的金，它們的貨幣存在还没有真正同它們的現實存在脱离，所以金还只是轉化为观念的貨幣，还只是价值尺度，而一定的金量实际上还只是作为一定量劳动時間的名称起作用。商品彼此表現它們交换价值的一定方式决定着金借以結晶为貨幣的形式規定性。

現在，商品是作为两重存在而互相对立着，实际上作为使用价值，观念上作为交换价值。現在，它們彼此把自己所包含的劳动的

① 不錯，亞里士多德理解到，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商品价格的前提：“显然……还没有貨幣的时候，就已經有交换了，因为用5張床換一間屋，或者換5張床所值的貨幣，是沒有区别的。”另一方面，由于商品在价格上才取得互为交换价值的形式，所以他以为商品通过貨幣才成为可通約的。“一切物都必須有一个价格，这样才会始終有交换，因而才会有社会。事实上，貨幣就像尺度一样，使物品可以通約，从而使它們相等。因为沒有交换就沒有社会，而沒有相等就不能有交换，沒有可通約性就不能相等。”亞里士多德并不否认，这些用貨幣来衡量的不同物品是一些完全不可通約的量。他寻找的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統一物，但是他作为一个古希腊人不能找到这个統一物。为摆脱这个难关，他假定本来不可通約的物在实际需要时会借助貨幣变成可通約的物：“固然，在本质上，这样不同的物是不能通約的，但是由于实际需要，这种情况却发生了。”（Arist. 《Ethic. Nicom.》，L. 5, C. 8, edit. Bekkeri, Oxonji, 1837 [亞里士多德“尼科馬赫倫理學”貝克里編 1837年牛津版第5卷第8章]）

两重形式表现出来了，因为特殊的实在劳动作为它们的使用价值而实际存在着，而一般的抽象劳动时间则在它们的价格上取得想像的存在，在这种存在上，它们是同一价值实体的同样的、只有量的差别的化身。

交换价值和价格的差别，一方面，似乎只是名义上的，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劳动是商品的实在价格，货币是商品的名义价格。假定1盎斯金是30个工作日的产品，那末现在1夸特小麦就不用30个工作日估价，而用1盎斯金估价。另一方面，这个差别决不是单纯名义上的差别，因为实际流通过程中威胁着商品的一切风暴正是集中在这个差别上。30个工作日已经包含在1夸特小麦中，因此，没有必要现在才把1夸特小麦表现为劳动时间。但是，金是一种和小麦不同的商品，1夸特小麦能否像它的价格所预先标明的那样事实上变成1盎斯金，只有在流通中才能证明。这就要看它能否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能否证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量是社会为生产1夸特小麦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量。商品本身是交换价值，它有一个价格。在交换价值和价格的这个差别中表现出：包含在商品中的特殊的个人劳动，必须通过转移的过程才表现为它的对立面，表现为无个性的、抽象一般的、并且只有在这种形式上才是社会的劳动，就是说表现为货币。它能否得到这种表现，看来是偶然的事情。因此，虽然在价格上，商品的交换价值只是在观念上得到一个同自身不同的存在，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两重存在只是作为不同的表现方式而存在，另一方面，虽然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金还只是作为想像的价值尺度同实在商品相对立，但是，就在交换价值作为价格的存在或金作为价值尺度的存在中，已经隐藏着商品向鏗鏘的真金转移的必要性和商品转移不成的可能性，总之，

隱藏着由于产品是商品而产生的全部矛盾，或者說，隱藏着由于私人特殊劳动必須表現为它的直接对立物即抽象一般劳动才取得社会效力而产生的全部矛盾。因此，那些只要商品不要貨幣、只要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而不要这种生产的必要条件的空想主义者是作得彻底的，他們不等貨幣以可感觉的形式出現，就在它作为价值尺度的朦朧的、想像的形式上把它“消灭”。在看不見的价值尺度中，隱藏着坚硬的貨幣。

假定金变成价值尺度而交换价值变成价格的过程已經存在，一切商品在它們的价格上还只是想像的大小不同的金量。它們作为同一物即金的不同量而互相較量、互相比較和互相衡量，这样在技术上就有必要使它們同作为計量单位的一定金量发生关系，这个計量单位分为若干等分，每一等分又分为若干等分^①，因而发展成为标准。但是金量本身是用重量来衡量的。因而这个标准在金屬的一般衡制中是現成的，所以在一切金屬流通中，金屬的一般衡制便首先起了价格标准的作用。当商品不再作为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交换价值，而作为用金来衡量的同名量相互发生关系的时候，金就从价值尺度轉化为价格标准。商品价格彼此作为不同金量而进行較量，这样就結晶为一种符号，这个符号切合于想像的金量并把这个金量表現为等分的标准。作为价值尺度的金和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規定性，两者的混淆曾經引起最

^① 在英国，作为貨幣衡量单位的1盎斯金不是分成等分，这种怪事可以解釋如下：“我国的鑄币制度本来只适用銀，因此1盎斯銀分成的銀币总是一个整数；但是，后来在只适用銀的鑄币制度中采用了金，因此，1盎斯金鑄成的金币就不是一个整数了。”Maclaren. «History of the currency», p. 16, London, 1858 [麦克拉倫“通貨史”1858年倫敦版第16頁]。

荒謬的理論。金作为物化劳动时间是价值尺度，金作为一定的金屬重量是价格标准。当金作为交换价值同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发生关系的时候，它是价值尺度，而在价格标准中，金的一定量成为金的其他量的单位。金所以是价值尺度，因为它的价值是可变的，金所以是价格标准，因为它被确定为不变的重量的单位。在这里，正如在一切同名量的尺度规定中一样，尺度比例的固定性和确定性有决定的意义。把一定金量确定为計量单位并在这个单位之下确定若干等分的必要性，曾經引起一种想法，似乎一定金量（它的价值本来是可变的）同商品的交换价值被确定在固定的价值比例上了，不过这种想法沒有看到，在金发展成价格标准之前，商品交换价值就已經轉化为价格、轉化为金量了。不論金的价值怎样变动，不同的金量彼此間总是表示同样的价值比例。哪怕金的价值跌落 $1000/100$ ，12 盎斯金的价值仍然是 1 盎斯金的 12 倍，在价格上問題只在于不同金量彼此之間的比例。另一方面，1 盎斯金决不会因为它的价值漲落而改变它的重量，也不会因而改变它的等分的重量，所以，不論金的价值怎样变动，金作为固定的价格标准总是起同样的作用^①。

① “货币在价值上可以不断变动，但是它仍然可以很好地充当价值尺度，好像它根本没有变动一样。譬如說，假定它的价值跌落了…… 在价值跌落之前，1 基尼买 3 蒲式耳小麦或 6 日的劳动；后来只买 2 蒲式耳小麦或 4 日的劳动。在这两种情况下，已知小麦和劳动两者同货币的比例，就可以推出两者的相互比例；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求出 1 蒲式耳小麦值 2 个劳动日。这就是价值衡量的全部意义，而这在价值跌落以后可以和价值跌落以前一样容易地办到。一件物品适于充当价值尺度的长处，同它自己的价值的可变性毫无关系。”（Bailey. *«Money and its vicissitudes»*. London, 1837, p. 9—10 [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 年倫敦版第 9—10 頁]）

历史过程(我們在后面将根据金屬流通的本质来加以說明)造成这样的后果: 执行价格标准职能的貴金屬的重量不断变动和減輕, 但是它的重量名称却保持不变。例如, 英鎊还合不到它原有重量的 $\frac{1}{3}$; 苏格兰鎊在合并²¹ 以前只合原有重量的 $\frac{1}{36}$; 法国的利弗尔只合原有重量的 $\frac{1}{74}$; 西班牙的馬拉維第还不到原有重量的 $\frac{1}{1000}$; 葡萄牙的瑞斯同原有重量的比例还要小得多。于是, 金屬重量的貨幣名称就和金屬的一般重量名称在历史过程中脫离了^①。計量单位、它的等分以及名称的規定一方面純粹是約定俗成的, 另一方面在流通內部應該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 所以它必須成为法律的規定。这个純粹形式的手續就落在政府身上^②。充当貨幣材

① “那些現今只具有观念上的名稱的鑄币在一切民族中都是最古老的鑄币; 然而它們在一个时期全都是真实的(后一句話說得那么广泛是不正确的), 正因为它們是真实的, 人們才用它們来計算。”(Galvani. «Della Moneta», l. c., p. 153 [加利阿尼“貨幣論”, 載于庫斯托第編“意大利政治經濟学名家文集。現代部分”第3卷第153頁])

② 浪漫派的亞·彌勒說: “在我們看来, 每一个独立的君主都有权替金屬貨幣命名, 授予它們社会的名义价值、等級、地位和称号。”(S. 288. Zweiter Teil. A. H. Müller. «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Berlin, 1809 [亞·亨·彌勒“政治学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2册第288頁]) 就称号來說, 我們的宮廷顧問先生說得对; 他只是忘記了实质。比如, 下面一段話表明他的“看法”多么混乱: “每个人都看到, 正確規定造币局价格是何等重要, 特別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更是如此, 在那里政府寬宏大量地免費造币(看来, 彌勒先生以为英国政府人員从自己的私囊中开支造币費用), 并且不課造币稅等等, 因此, 如果政府把金的造币局价格定得大大高于市場价格, 如果不是像現在那样对每盎斯金付3鎊17先令 $10\frac{1}{2}$ 辨士, 而是把1盎斯金的造币局价格規定为3鎊19先令, 所有的貨幣就会流向造币局, 而从那里得来的銀会到市場上去換便宜的金, 然后再送到造币局, 而币制就陷于混乱。”(同上, 第280、281頁) 为維持英国造币局的秩序, 彌勒自己却陷于“秩序混乱”。先令和辨士只是1盎斯金的一定部分用銀記号和銅記号来表示的名称, 而彌勒以为1盎斯金是用金、銀和

料的一定金屬是社會已經提供了的。在不同的國家，法定價格標準自然不同。在英國，例如，作為金屬重量的盎斯分為 penny-weights [本尼威特]、grains [克冷]、carats troy [克拉]，但是，作為貨幣單位的 1 盎斯金分為 $3\frac{7}{8}$ 索維林，1 索維林分為 20 先令，1 先令又分為 12 辨士，這樣，100 磅 22 開金（1 200 盎斯）等於 4 672 索維林 10 先令。可是在消失了國界的世界市場上，貨幣尺度的這種民族性又消失了，它讓位於金屬的一般的衡制。

因此，商品價格或商品在觀念上轉化成的金量，現在用金標準的貨幣名稱來表現了。英國人不說 1 夸特小麥等於 1 盎斯金，而說等於 3 鎊 17 先令 $10\frac{1}{2}$ 辨士。這樣，一切價格就用同樣的名稱表現出來。商品賦予自己交換價值的那個特殊形式，轉化為貨幣名稱，它們用這種名稱彼此說明自己值多少。而貨幣這方面也就成為計算貨幣^③。

每當從交換價值的觀點來表示任何一種財富時，就會在腦中、在紙上或在談話中發生商品向計算貨幣的轉化^④。為了這種轉化，

銅來估價的，因而認為英國人有三重 standard of value [本位] 是他們的幸運。誠然，銀作為貨幣尺度同金共存的情況到 1816 年才由喬治三世第五十六年第六十八號法令正式加以廢止。可是，這種情況事實上早在 1734 年就由喬治二世第十四年第四十二號法令在法律上加以廢止了，而在實踐中廢止得還要早些。有兩種情況特別使亞·彌勒能對政治經濟學有所謂高超的理解。一方面他對於經濟事實完全無知，另一方面他對哲學只是抱愛好而空想的態度。

③ “有人問阿那卡雪斯，希臘人為什麼要用貨幣，他回答說，為了計算。”（Athen. «Deipnosophistai», L. IV, 49, v. 2, ed. Schweighäuser, 1802 [阿泰納奧斯“學者們的宴會”（十五卷集）施魏格霍伊澤爾編 1802 年版第 4 卷，49，第 2 分冊第 120 頁]）

④ 亞當·斯密著作的早期法文譯者之一加爾涅有過一種古怪想法，想在計算貨幣和實在貨幣的使用之間定出一個比例。這個比例是 10 : 1。（Garnier, G.

必須有金的物质,但只是想像中的。用若干盎斯金来估計 1 000 包棉花的价值,再用 1 盎斯金的計算名称如鎊、先令、辨士来表現这些盎斯,不需要真金的一个原子。例如,在 1845 年罗伯特·皮尔爵士銀行条例之前,在苏格兰連 1 盎斯金都沒有流通,虽然 1 盎斯金,作为英国計算标准表現为 3 鎊 17 先令 $10\frac{1}{2}$ 辨士,是法定的价格尺度。又如,西伯利亚和中国之間的商品交换,事实上虽然純粹是物物交换,但是以銀为价格尺度。因此,对于作为計算貨幣的貨幣說来,它的单位或单位以下的等分是否真正鑄造出来,是毫无关系的。在征服者威廉时期的英国,1 鎊曾是 1 磅純銀,先令是 $\frac{1}{20}$ 磅純銀,但鎊和先令只是作为計算貨幣而存在,辨士即 $\frac{1}{240}$ 磅純銀倒是当时大量存在的銀鑄币。相反,在今天的英国;虽然先令和辨士是 1 盎斯金的一定部分的法定計算名称,却并无先令和辨士存在。貨幣作为計算貨幣可以完全只在观念上存在,而实际存在的貨幣却按照完全不同的标准鑄造。例如,在北美洲的許多英国殖民地中,流通的貨幣直到十八世紀末叶还是由西班牙币和葡萄牙币組成的,但是計算貨幣却到处和英国一样^⑤。

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和商品价格表現为同样的計算名称,例如,1 盎斯金和 1 吨铁同样都可表現为 3 鎊 17 先令 $10\frac{1}{2}$ 辨士,因此,金的这种計算名称被叫作金的造币局价格。于是产生了一种奇怪

«Histoire de la monnaie depuis les temps de la plus haute antiquité etc.», t. I, p. 78 [热·加尔涅“从上古至查理大帝統治时期的貨幣史”第 1 卷第 78 頁])

⑤ 1723 年馬里兰条例規定烟草是法定的貨幣,但是烟草的价值要折合为英国金币,即每磅烟草折合 1 辨士。这件事使人想起 *leges barbarorum*²², 这种法律相反地規定一定貨幣額等于若干头公牛、母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計算貨幣的真正材料既不是金也不是銀,而是公牛和母牛。

的想法，以為金用它自身的材料來估價，而且和一切其他商品不同，它從國家取得固定的價格。確定一定重量的金的計算名稱被誤認為確定這個重量的價值^①。金作為價格規定的因素並因而作為計算貨幣發生作用時，它不僅沒有固定的價格，而且根本沒有任何價格。如果金要有價格，就是說要在一種特殊商品上使自己表現為一般等價物，那末，這另一種商品就要和金一樣，在流通過程中起一種排他的作用。但是，兩個排斥其他一切商品的商品，彼此也是互相排斥的。因此，在金和銀依法同時充當貨幣即充當價值尺度的地方，想把它們當作同一物質看待，總是徒勞無益的。如果假定同一勞動時間固定不變地物化在金銀的同一比例中，這實際上就是假定金銀是同一物質，而銀這種價值較低的金屬是金的一個固定不變的分數。從愛德華三世起到喬治二世時期，英國幣制史經歷了一連串的混亂，其原因是法定的金銀價值比例同金銀價值的實際變動不斷發生衝突。有時金的估價高了，有時銀的估價高了。估價過低的金屬退出流通，被熔化和輸出。於是兩種金屬的價值比例再由法律加以調整，但新的名義價值很快又像舊的那樣同實際的價值比例發生衝突。現代，由於印度和中國需要銀，同銀相比，金的價值暫時略微低落，結果在法國大規模地發生了上述現象：銀被輸出，被金逐出於流通之外。1855、1856和1857年，輸入法國的金比從法國輸出的金多了4158萬鎊，而從法國輸出的

① 例如，我們在戴維·烏爾卡爾特先生的《Familiar words》[“家常話”]中讀到：“金的價值應當用金自身來衡量；任何物質怎麼能夠在別的物品中有它自己的價值尺度呢？金的價值應當用它自身的重量來確定，可是這個重量要取一個假名，於是1盎斯金就應當值若干鎊和幾分之幾鎊。這是偽造尺度，不是確立標準。”

銀比輸入法国的銀多了 34 704 000 鎊。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里，两种金屬都是法定的价值尺度，两者在支付中都必須接受，每个人都可以随意用其中的一种来支付，在这里价值增大的金屬实际上有貼水，它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用估价过高的金屬来衡量自己的价格，而其实也只有估价过高的那种金屬才起着价值尺度的作用。这方面的全部历史經驗总结起来不过是这样：凡有两种商品依法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事实上总是只有一种商品保持着这种地位^①。

B. 关于货币計量单位的学說

商品在价格的形式上只是在观念上轉化为金，金从而只是在观念上轉化为货币，由于这种情况，便产生了观念的货币計量单位学說。因为在規定价格时，只是想像的金銀起作用，金銀只是当作計算货币起作用，有人就以为鎊、先令、辨士、塔勒、法郎等名称，不是指金銀的重量部分或某种物化劳动，而是指观念的价值原子。于是，比如說，如果一盎斯銀的价值提高了，那它就包含更多的这样的原子，因此它就应当算成和鑄成更多的先令。这种学說在英国最近一次商业危机中又流行起来，甚至在議會中，在 1858 年銀

^① “作为商业尺度的货币应当像其他任何尺度一样尽可能永久保持穩定。如果你們的货币是由价值比例不断变动的两种金屬构成，就做不到这一点。”(John Locke, «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lowering of interest etc.», 1691; p. 65, in seinen «Works», 7 ed., London, 1768, vol. II. [約翰·洛克“略論降低利息”1691年版;“洛克全集”1768年倫敦第7版第2卷第65頁])

行委员会报告所附的两个专门报告中提出过。这种学说最早产生于十七世纪末叶。在威廉三世即位时，1 盎斯银的英国造币局价格是 5 先令 2 辨士，或 $\frac{1}{62}$ 盎斯银称作 1 辨士，12 个这样的辨士称作 1 先令。按照这个标准，例如 6 盎斯重的银就铸成 31 个称作先令的银币。但是，1 盎斯银的市场价格升到它的造币局价格之上，从 5 先令 2 辨士升到 6 先令 3 辨士，或者说，购买 1 盎斯生银必须付给 6 先令 3 辨士。既然造币局价格不过是 1 盎斯银的等分的计算名称，1 盎斯银的市场价格怎么能升到它的造币局价格之上呢？这个谜一下子就解开了。在当时流通的 560 万镑银币中有 400 万镑已被磨损和刮削。有一次检验证明，57 200 镑银币应该重 220 000 盎斯；实重却只有 141 000 盎斯。造币局仍然按照同样的标准铸造，但是实际流通的轻先令所代表的 1 盎斯的等分却比它名称所代表的要小。因此，到市场上购买 1 盎斯生银，就得支付较多的这种变轻了的先令。这样就发生了混乱，于是决定普遍重铸，这时 Secretary to the treasury [财政部秘书长] 朗兹断言，1 盎斯银的价值已经提高，因此今后它应该铸成 6 先令 3 辨士，而不应该同从前一样铸成 5 先令 2 辨士。其实，他也就是说，因为 1 盎斯的价值已经提高，所以它的等分的价值降低了。但是，他的错误理论只是一个正当的实际目的的掩饰。国债是用轻先令借的，难道要用重先令来还吗？在名义上得 5 盎斯而实际上得 4 盎斯的地方，他不說还 4 盎斯，却反而說名义上要还 5 盎斯，但是把它的金属含量减成 4 盎斯，把从前称作 $\frac{4}{5}$ 先令的称作 1 先令。因此，朗兹实际上是维护金属含量，虽然在理论上是坚持计算名称。他的反对者只是坚持计算名称，因此把减轻了 25—50% 的先令同足量的先令說成一样，但他们反而硬說他们只是坚持金属含量。約

翰·洛克是一切形式的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他代表工廠主反對工人階級和貧民，代表商人反對舊式高利貸者，代表金融貴族反對作為債務人的國家，他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甚至證明資產階級的理智是人类的正常理智，他也接受了朗茲的挑戰。約翰·洛克獲得了勝利，貨幣借來的時候是10—14先令合1基尼，而償還的時候則是20先令合1基尼^①。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挖苦地總結這筆生意說：

“政府在賦稅上大占便宜，債權人在資本和利息上大占便宜，唯一受騙的人民也非常高興，因為他們的 *Standard* [標準]〈他們自己的價值的标准〉並未降低。”^②

① 洛克還說：“把以前稱作半克朗的稱作1克朗吧。價值仍然是由金屬含量決定的。如果你們能把一個鑄幣的銀量減少 $\frac{1}{20}$ 而不減少它的價值，那末你們同樣能把它的銀量減少 $\frac{19}{20}$ 。按照這種理論，把一個法尋稱作克朗，這個法尋就能夠同含有60倍銀的克朗一樣，購買同樣多的香料、絲綢或其他商品。你們能做到的一切，不過是拿較大的銀量的印記和名稱加在較小的銀量上。但是用來償還債務和購買商品的是銀，不是名稱。如果你們提高貨幣價值不過是對於銀塊的一個等分隨便給一個名稱，例如把 $\frac{1}{8}$ 盎斯銀稱作1個辨士，那末，你們實際上可以把貨幣價值提得多高就多高。”²³ 洛克同時還答復朗茲說，市場價格升到造幣局價格之上，原因不是“銀價值的增高，而是銀鑄幣的減輕”。77個已被刮削的先令絲毫也不比62個足量的先令重。最後，他正確地提出，如果撇開流通的鑄幣的銀量減少不談，在英國，生銀的市場價格也會多少高於造幣局價格，因為生銀的輸出是容許的，而銀幣的輸出是禁止的。（見“略論降低利息”第54—116頁）洛克非常謹慎地避免涉及迫切的國債問題，同樣他非常小心地避開下面這個細致的經濟問題：匯率，同生銀對銀幣的比例一樣，證明流通的貨幣的貶值遠不是與它實際的銀量減少成比例的。我們在流通手段的一節中將回過來對這個問題作总的研究。尼古拉·巴爾本在《A discourse concerning coining the new money lighter, in answer to Mr. Locke's considerations etc.》, London, 1696 [“新幣輕鑄論，答洛克先生關於提高貨幣價值的意見”1696年倫敦版]中企圖把洛克引入危險地帶，但沒有成功。

② 斯圖亞特“政治經濟學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2卷第156頁。

斯图亚特以为，随着商业进一步的发展，人民会更机敏一些。他錯了。大約在 120 年后，同样的 *quid pro quo* [誤会] 又发生了。

貝克萊主教是英国哲学中神秘唯心主义的代表，他給观念的貨幣計量单位学說加上了讲求实际的“財政部秘书长”所忽略的理論气质，这是合乎常理的。他問：

“难道不能把利弗尔、鎊、克朗之类的名称看成只是**比例名称**（即抽象价值本身的比例）嗎？难道金、銀或紙幣不只是用来計算、記載和监督（价值比例）的記号或符号嗎？难道支配別人的实业活动（社会劳动）的**权力**不就是財富嗎？难道貨幣实际上不只是轉移和記載这种权力的符号或記号，而用什么材料做这种符号是十分重要的嗎？”^①

这里一方面混淆了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另一方面混淆了作为价值尺度的金銀和作为流通手段的金銀。因为貴金屬在流通行为中可以用記号代替，貝克萊就得出結論說，这些記号本身不代表任何东西，只代表抽象的价值概念。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对观念的貨幣計量单位学說發揮得如此充分，以致他的追隨者（无意識的追隨者，因为他們不知道他）既找不到一个新的說法，甚至也找不到一个新的例子。

他說：“計算貨幣不过是为了衡量可售物品的相对价值而发明的任意的等分标准。計算貨幣与鑄幣（*money coin*）完全不同，鑄幣是价格^②，而計算貨幣即使在世界上沒有一种实体作为一切商品的比例等价物的情况下，也能够存在。計算貨幣对物品的价值所起的作用，就像度、分、秒等等对角度的作用，标尺对地图的作用等等一样。在这一切发明中，总是采用一个名称作

① “提問者”。順便提一下，《*Queries on money*》[“关于貨幣問題”]一篇写得很有才智。其中貝克萊正确地指出，北美洲殖民地的发展恰恰“最清楚地证明，金銀对于一国的財富，并不是像各阶层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必要”。

② 价格在这里按照十七世紀英国經濟学著作家的用法，是指实在的等价物。

为单位。所有这些措施的用途不过是在于**指示比例**，貨幣单位的用途也是一样。因此，貨幣单位不能同任何一部分价值有固定不变的比例，也就是說，它不能固定在任何一定量的金、銀或任何其他商品上。单位一經确定，用乘法就可以求出最大的价值。因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对商品发生影响的环境的总的結合以及人們的癖性，所以应当把商品价值看作只是在它們的相互关系中变动着的。凡是用共同的、一定的、不变的标准妨碍和扰乱确切規定比例变动的做法，必定对貿易发生有害的影响。貨幣只是具有等分的**观念标准**。如果有人問：一个部分的价值的計量单位应当是什么，我就用另一个問題来回答：度、分、秒的标准大小是什么？它們沒有标准大小；但是，只要一个部分已經确定，依据标准的本质，其余的必定全都依比例确定下来。阿姆斯特丹的銀行貨幣和非洲海岸的安哥拉貨幣就是这种观念貨幣的例子。”^①

斯图亚特所說的只是貨幣在流通中充当**价格标准**和**計算貨幣的現象**。如果几种商品在价格表上分別标价为 15 先令、20 先令、36 先令，那末，在比較它們的价值量时，实际上我所关心的既不是先令的含銀量，也不是先令的名称。15、20、36 这些数的比例已經說明一切，1 这个数成为唯一的計量单位。比例的純抽象的表現始終只是抽象的数的比例本身。因此，为彻底起見，斯图亚特不仅要撇开金銀，而且还要撇开它們的法定的教名。他由于不了解价值尺度向价格标准的轉化，自然就以为用作計量单位的一定量金，不是对其他的金量作尺度，而是对价值本身作尺度。因为各种商品通过自己的交换价值轉化成价格而表現为同名的量，他就否定了使各种商品成为同名的那个尺度的质；又因为在各种不同金量的比較中用作計量单位的金量的大小是約定俗成的，他就連对这个大小总得有个規定都加以否定。他可以不说圓周的 $\frac{1}{360}$ 是 1 度，而說 $\frac{1}{180}$ 是 1 度；这时，直角就不是用 90 度計算，而是用 45

① 斯图亚特“政治經濟学原理研究”第 2 卷第 102—107 頁。

度計算，銳角和鈍角的計算以此类推。虽然如此，量角器仍然首先是有一定质的数学形式——圓，同时又是有一定量的圓的部分。至于斯图亚特的經濟例证，一个反駁了他自己，另一个什么也沒有证明。阿姆斯特丹銀行貨幣实际上只是西班牙多布隆幣的計算名称，当辛勤流轉的鑄幣因为同外界劇烈磨擦而消瘦下来的时候，多布隆幣却因懶洋洋地躺在銀行地窖里而保持着自己的全部脂肪。至于那些非洲的观念論者，在有批判眼光的旅行家作出关于他們的詳細报道之前，我們只能讓他們听天由命了。^①法国的阿西涅可以說是近似斯图亚特所了解的观念貨幣：“国民財產。阿西涅 100 法郎”。誠然，这里阿西涅所应代表的使用价值，即被沒收的土地，是确切指明了的，可是計量单位的量的規定被忘記了，因而“法郎”便成为一个沒有意义的詞。一个阿西涅法郎代表多少土地，要看土地公开拍卖的結果而定。但是实际上，阿西涅法郎是作为銀幣的价值符号来流通的，因而它的貶值也是用这个銀标准来衡量的。

在英格兰銀行停止兌現时期，貨幣理論几乎比战报还要多。由于銀行券貶值和金的市場价格高于造幣局价格，銀行的某些辯护人重新提出观念的貨幣尺度學說。卡斯尔里子爵給这种混乱見解找到了典型的混乱說法，他把貨幣計量单位說成是 «a sense of value in reference to currency as compared with commodities» [“通貨同商品比較所产生的价值感”]。巴黎和約簽訂以后几年，

① 在最近一次商业危机中，英国某些方面的人士盛贊非洲的观念貨幣，而这一次观念貨幣的住址从海岸移到貝尔貝萊內地去了。有人认为，貝尔貝萊人沒有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是由于他們用 «Bars» [金屬条块] 这种观念的計量单位。把商业和工业的存在說成是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的 *conditio sine qua non* [必要条件]，岂不是更簡單嗎？

情况又容許恢复兌現，这时，威廉三世时代朗茲曾提出的問題，几乎原封不动地又被提出来了。龐大的國債，二十多年积下的大量私人債務和定額債券等，都是用貶值的銀行券訂立的。这些債務是否應該用每 4 672 鎊 10 先令不仅名义上而且实际上也代表 100 磅 22 开金的銀行券来偿还呢？北明翰銀行家托馬斯·阿特伍德以 *Lowndes redivivus* [朗茲轉世] 的姿態出現。他主張債權人在契約中名义上借出多少先令，就該在名义上收回多少先令；不过，如果按照从前的鑄币含金量把大約 $\frac{1}{78}$ 盎斯金称作 1 先令，那末現在應該比如把 $\frac{1}{90}$ 盎斯金称作 1 先令。阿特伍德的門徒以 «*little Shillingmen*» [小先令人] 的北明翰派而著称。从 1819 年开始的关于观念的貨幣尺度的爭論，到 1845 年仍然在罗伯特·皮尔爵士和阿特伍德之間进行着，阿特伍德在貨幣作为尺度的职能方面所有的智慧，可以全部总结在下面所引的一段話中：

“在与北明翰商会論战中罗伯特·皮尔爵士問道：你們的一鎊銀行券代表什么？什么叫作一鎊？…… 反过來說，对現行的价值計量单位应如何理解？3 鎊 17 先令 10 $\frac{1}{2}$ 辨士是表示 **1 盎斯的金**，还是它的价值？如果是 **1 盎斯金** 本身，那为什么不用它的名字称呼它，为什么不称盎斯、本尼威特、克冷而要称鎊、先令、辨士呢？如果这样的話，我們就回到直接的物物交換制度去了…… 或許它們指的是价值？如果 1 盎斯金 = 3 鎊 17 先令 10 $\frac{1}{2}$ 辨士，为什么它有时又值 5 鎊 4 先令，有时又值 3 鎊 17 先令 9 辨士呢？…… ‘鎊’ (£) 这个用語是指价值，但不是指固定于一个不变的金量上的价值。鎊是一个观念的单位…… 劳动是形成生产費用的实体，它把金的相对价值賦予金，就像把铁的相对价值賦予铁一样。因而，不論用什么特别的計算名称来表示一人的一日劳动或一周劳动，这种名称总是表現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①

① «*The currency question, the Gemini letters*». London, 1844, p. 266—272 *passim* [“通貨問題，兩人書簡” 1844 年倫敦版散見第 266—272 頁]。

在最後幾句話中，觀念的貨幣尺度的模糊概念消散了，而這種概念的固有的思想內容顯露出來了。金的計算名稱，如鎊、先令等等，應該是一定量勞動時間的名稱。既然勞動時間是價值的實體和內在尺度，那末，這些名稱實際上就應該代表價值比例本身。換句話說，勞動時間被認為是真正的貨幣計量單位。關於北明翰派，我們就說到這裡為止，但是還要順便指出，觀念的貨幣尺度學說在銀行券可兌現或不可兌現的爭論中獲得了新的意義。如果紙幣的名稱是從金或銀得來的，那末，銀行券可以兌現、即可以兌換為金或銀，總是一條經濟規律，不論法律如何規定。例如，普魯士的紙塔勒，法律上雖然規定不兌現，但是，當它在日常流通中低於銀塔勒，因而實際上不能兌現時，就立刻貶值。因此，英國那些堅決維護不兌現紙幣的人，就把觀念的貨幣尺度作為藏身之所。如果貨幣的計算名稱，如鎊、先令等等，是一個商品在同其他商品交換時或多或少地吸進或吐出的一定數目的價值原子的名稱，那末，比如一張英國的五鎊券，就不依賴於它同金的比例，正像不依賴於它同鐵和棉花的比例一樣。既然它的名稱不再使它同一定量的金或其他任何商品在理論上相等，所以它的可兌現的要求，即它同一定量的某種特殊物實際上相等的要求，就被它的概念本身排除了。

勞動時間是直接的貨幣計量單位的學說，由約翰·格雷^①第

① John Gray. «The social system. A treatise on the principle of exchange». Edinburgh, 1831 [約翰·格雷“社會制度。論交換原理”1831年愛丁堡版]。并參看他的«Lectures on the nature and use of money». Edinburgh, 1848 [“關於貨幣的本質和用途的講義”1848年愛丁堡版]。在二月革命以後，格雷送給法國臨時政府一份備忘錄，其中教訓說，法國所需要的不是一個«organisation of labour»[“勞動組織”]，而是一個«organisation of exchange»[“交換組織”]，這個組織的方案在他想出的貨幣制度中已經完

一次加以系統地發揮。他主張國家中央銀行通過支行來確定生產各種商品所需的勞動時間。生產者以自己的商品換回一張正式的价值憑證，即換回一張表明他的商品包含多少勞動時間的收據^②；而這種代表1個工作周、1個工作日或1個工作小時等等的銀行券，同時又是領取存放在銀行倉庫中的其他一切商品中的一個等價物的證據^③。這就是他的基本原則，他把這個原則的細節研究得非常周到，並且使這個原則處處適合英國各種現行機構。在這種制度下，格雷說：

“為取得貨幣而賣，在任何時候都和現在用貨幣來買一樣地容易；生產將同需求相等而成為需求的永不枯竭的源泉。”^④

貴金屬將失去它們對其他商品的“特權”，

“將在市場上與黃油、雞蛋、棉布、花布並列，取得它們應有的地位，它們的价值不會比金剛石的价值更使我們關心”^⑤。

“我們應該保持我們想像出來的价值尺度——金，從而束縛一國的生產力呢，還是應該改用自然的价值尺度——勞動，從而解放一國的生產力呢？”^⑥

全設計好了。老實的格雷想不到在他的“社會制度”出現了16年之後，這個發明的專利權會被善於發明的蒲魯東拿去了。

② 格雷“社會制度”第63頁：“貨幣應該僅僅是一張收據，證明這張收據的持有者曾經對現存的國民財富貢獻了一定的价值，或者曾經從貢獻這一价值的人那里取得了對於這一价值的支配權。”

③ “產品在事先經過估價後可以存入銀行，一有需要又可以把它提取出來，但是大家要同意一個條件：凡是把任何種類的財產存入這種國家銀行的人，都可以從銀行取出同等价值的任何物品，而不是只准提取他所存入的物品。”同上，第67—68頁。

④ 同上，第16頁。

⑤ 格雷“關於貨幣的本質和用途的講義”第182頁。

⑥ 同上，第169頁。

既然劳动時間是价值的內在尺度，为什么除了劳动時間之外还有另一种外在尺度呢？为什么交换价值发展成为价格呢？为什么一切商品都用一种分离出来的商品来估計自己的价值，因而使这一商品变成交换价值的最适当的存在，变成貨幣呢？这是格雷應該解决的問題。他不去解决这个問題，反而去空想商品能够直接当作社会劳动产品而相互发生关系。但是，它們是什么，就只能当作什么来相互发生关系。商品直接是彼此孤立的、互不依賴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必須在私人交换过程中通过轉移来证明是一般社会劳动；或者說，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劳动只有通过个人劳动的全面轉移才成为社会劳动。但是，既然格雷把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時間直接当作社会劳动時間，那他就是把这种劳动時間当作共同的劳动時間，或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劳动時間。这样一来，实际上，一种特殊的商品，如金和銀，就不会当作一般劳动的化身来同其他商品相对立，交换价值就不会变成价格，而使用价值也就不会变成交换价值，产品也就不会变成商品，因而資產階級生产的基础也就会消灭。然而，这决不是格雷的本意。在格雷看来，**产品要当作商品来生产，但不当作商品来交换。**格雷指靠国家銀行来实现这个虔誠的願望。一方面，社会通过銀行使个人不依賴私人交换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又让个人在私人交换的基础上繼續生产。因此，这里的內在邏輯迫使格雷一个又一个地廢棄資產階級生产的条件，虽然他只是想产生于商品交换的貨幣“改良”一下。这样他就把資本变成国家資本^①，把地产变成国家財產^②，

① “每个国家的实业應該靠国家資本来經營。”（約翰·格雷“社会制度”第171頁）

② “土地應該成为国家財產。”（同上，第298頁）

如果仔細地看一下他所說的銀行，就會發現它不僅一手收進商品和另一手發出對提供的勞動的憑證，而且還調節着生產本身。格雷在他的最後一部著作“關於貨幣的本質和用途的講義”中小心翼翼地想表明他的勞動貨幣純粹是資產階級的改良，在這裡他陷入了更加尖銳的矛盾中。

每種商品直接就是貨幣。這是格雷從他的不充分的、因而是錯誤的商品分析中得出的理論。“勞動貨幣”、“國家銀行”和“商品堆棧”的“有機”結構不過是一種幻影，使人誤認為這種教條是支配世界的規律。關於商品直接就是貨幣或商品中的私人特殊勞動直接就是社會勞動的這種教條，當然不會因為有一個銀行相信它並按照它經營就會變成現實。相反，在這種情形下，破產會來扮演實際批評家的角色。格雷的著作中所隱藏的、連他自己都未察覺的，就是勞動貨幣是一種經濟學上的空話，它用來表示下面這種虔誠的願望：廢除貨幣，同貨幣一起廢除交換價值，同交換價值一起廢除商品，同商品一起廢除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這一點被英國的一些社會主義者，有些在格雷前，有些在格雷後，直截了當地講出來了^①。但是，把貶低貨幣和頌揚商品當作社會主義的核心來認真宣傳，從而使社會主義變成根本不了解商品和貨幣的必然聯繫^②，這要等蒲魯東先生和他的學派來完成了。

① 例如見 W. Thompson. «An inquiry into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etc.». London, 1824 [威·湯普遜“財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倫敦版]；Bray. «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 Leeds, 1839 [布雷“對勞動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1839年里子版]。

② Alfred Darimon. «De la réforme des banques». Paris, 1856 [阿爾弗勒德·達里蒙“銀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 可以看作是這種滑稽的貨幣理論的綱要。

2. 流通手段

在商品通过确定价格的过程取得它适于流通的形式、金取得它的货币性质后，流通将表现并解决商品交换过程所包含的矛盾。商品的实际交换，即社会物质变换，表现为一种形式变换，在这种形式变换中，商品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展开了，同时商品本身的形式变换也结晶为货币的一定形式。说明这种形式变换，也就是说明流通。我们已知，商品成为发达的交换价值，是以商品世界，因而是以实际发达的分工为前提的，同样，流通是以全面的交换行为和这种行为的经常更新为前提的。第二个前提是商品要当作**具有一定价格**的商品进入交换过程，或者说，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彼此要当作二重的存在出现，即实际上作为使用价值，观念上——价格上——作为交换价值。

在伦敦最热闹的大街上，商店鳞次栉比，橱窗中陈列的世界各地的财富琳琅满目，有印度披肩、美国手枪、中国磁器、巴黎胸衣、俄国毛皮、热带香料；但这一切娱世物品，额上都贴着决定命运的白标签，上面写着阿拉伯数码和简写字 £, sh., d. [镑、先令、辨士]。这就是商品出现在流通中的景象。

(a) 商品的形态变化

仔细考察起来，流通过程表现出两种不同形式的循环。如果用W代表商品，用G代表货币，我们就可以把这两种形式表示为：

$$W-G-W$$
$$G-W-G$$

本篇只論述第一形式，即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

W—G—W 的循环，分解为 W—G 的运动即商品換货币或卖，和 G—W 的逆运动即货币換商品或买，以及这两个运动的統一 W—G—W，即为了用货币換商品而把商品換成货币或为买而卖。但是，过程結束时得出的結果是 W—W，即商品換商品，实际的物质变换。

W—G—W，从第一个商品那端出发，表现为它向金的轉化和它从金向商品的逆轉化，或者說，表现为这样一个运动：商品最初作为特殊的使用价值存在，而后摆脫了这种存在，取得了同它的自然存在脫离一切关系的作为交换价值或一般等价物的存在，然后又摆脫了这种存在，最后仍然作为滿足个别需要的实际的使用价值。商品以最后这个形态离开流通而进入消費。因此 W—G—W 这个流通的全程，首先是每个商品成为它的所有者的直接的使用价值时所要通过的形态变化的整个系列。第一形态变化在流通的前半段 W—G 上完成，第二形态变化在流通的后半段 G—W 上完成，而整个流通形成商品的 *curriculum vitae* [生命旅程]。但是，W—G—W 这个流通，要成为单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的全程，它只有同时是其他商品的一定的、单方面的形态变化的总和，因为第一种商品的每一次形态变化就是它向另一种商品的轉化，因而也就是另一种商品向第一种商品的轉化，因而，是在流通的同一阶段上完成的双方面的轉化。对于 W—G—W 这个流通所分成的两个交换过程，我們首先應該分別加以考察。

W—G 或卖：W 即商品在进入流通过程时，不仅是作为特殊的使用价值，如 1 吨铁，而且是作为具有一定价格的使用价值，如值 3 鎊 17 先令 $10\frac{1}{2}$ 辨士或 1 盎斯金。这个价格，一方面是铁

包含的劳动时间量即铁的价值量的指数，同时又表示出铁的虔诚愿望——想变成金，也就是想赋予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以一般社会劳动时间的形式。如果这个变体没有实现，这吨铁就不仅不再是商品，而且不再是产品，因为它所以是商品，只是由于它对它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或者说，它的所有者的劳动只有作为对别人有用的劳动才是真正的劳动，它只有作为抽象一般劳动才对它的所有者有用。因此，铁的任务，或者说，铁的所有者的任务，是在商品世界中找到铁吸引金的地方。但是，如果像我们在这里分析简单流通时所假定的那样，卖确实完成了，那末这种困难即商品的 *salto mortale* [惊险的跳跃] 就渡过了。这吨铁通过它的转移，即通过从把它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的手里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的人的手里而实现为使用价值，同时也就实现了自己的价格，从不过是想像的金变成了实在的金。现在，1 盎斯实在的金代替了 1 盎斯金的名称或 3 镑 17 先令 10¹/₂ 辨士，而这吨铁也让出了位置。由于卖即 W—G，不仅原来通过价格在观念上转化成金的商品实际上转化成金，而且由于这同一过程，原来作为价值尺度只是观念上的金而实际上只是作为商品本身的货币名称出现的金，也就转化成实在的货币^①。过去，由于一切商品都用金来衡量它们的价值，金在观念上变成了一般等价物，现在，金作为一切商品向它全面转移——卖 W—G 就是这种全面转移的过程——的产物，变成

① “货币有两种，一种是观念的货币，一种是实在的货币，因而有两种用法：一种是用来对物品进行估价，一种是用来购买物品。就估价来说，观念的货币同实在的货币一样适用，而且也许更适用些…… 货币的另一种用法是用来购买它所估价的物品…… 价格和契约是用观念的货币来估算，而用实在的货币来实现的。”（加利阿尼“货币论”第 112 页及以下各页）

了絕對可以轉移的商品，變成了實在的貨幣。但是，金在賣的過程中變成實在的貨幣，只是由於商品的交換價值在價格中已經是觀念上的金的緣故。

不論是賣 $W-G$ 或是買 $G-W$ ，其中總是有兩種商品對立着，這兩種商品都是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統一體，但是，在商品方面，它的交換價值只是在觀念上作為價格存在，而在金方面，雖然它本身也是實際的使用價值，但是它的使用價值只是作為交換價值的承擔者存在，因而只是作為同任何實際的個人需要無關的形式上的使用價值存在。這樣一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對立，就分配在 $W-G$ 的兩極，商品在金的面前是使用價值，這個使用價值必須通過金才能實現它的觀念上的交換價值即價格，而金在商品面前是交換價值，這個交換價值只有通過商品才能把它的形式上的使用價值變為物質。只有通過商品的這種二重化——分為商品和金，通過這二重對立的关系——每方觀念上是對方實際上的東西，而實際上是對方觀念上的東西，也就是說，只有通過商品表現為兩極對立物，商品的交換過程所包含的矛盾才得到解決。

到這裡為止，我們是把 $W-G$ 當作賣，當作商品向貨幣的轉化來考察的。但是，如果我們站在另一極，同一過程就相反地表現為 $G-W$ ，表現為買，表現為貨幣向商品的轉化。賣必然同時是它的對立面——買，從一方面來看這個過程，是賣；從另一方面來看這個過程，是買。或者說，實際上這個過程的區別只是在於：在 $W-G$ 上，主動方面是商品或賣者，在 $G-W$ 上，主動方面是貨幣或買者。因此，我們把商品的第一形態變化即商品向貨幣的轉化當作第一流通階段 $W-G$ 完成的結果來說明，同時也就是假定有另一個商品早已轉化為貨幣，因而現在已經處在第二流通階段 $G-W$ 上。

这样，我们就陷入互为前提的恶性循环。流通本身就是这种恶性循环。如果我们不把 $W-G$ 中的 G 看作已经是另一种商品的形态变化，那末，我们就是把交换行为从流通过程中分离出来。但是，在流通过程之外， $W-G$ 的形式就消失了，只剩下两个不同的 W ——如铁和金——互相对立，它们的交换不是流通行为，而是直接的物物交换。在金的产地，金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也是商品。在这里，金的相对价值也和铁或其他任何商品的相对价值一样，是用它们彼此交换时的量来表现的。但是，在流通过程中，这个行为已经是前提，金本身的价值在商品价格中是既定的。因此，以为金和商品在流通过程中发生直接的物物交换关系，因而以为它们的相对价值是通过它们作为简单商品交换来确定，这是再错误不过的。从表面上看来，金在流通过程中似乎只是作为商品和种种商品交换，但这种假象的产生只是由于一定量的商品在价格上已经等于一定量的金，就是说，已经同作为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发生关系，从而可以直接同金交换。就商品的价格通过金实现来说，商品同金交换是同商品，同劳动时间的特殊化身交换，但是，就通过金实现商品的价格来说，商品同金交换就不是同商品交换，而是同货币，同劳动时间的一般化身交换了。而在两种关系上，商品在流通过程中交换的金量，都不是由交换来决定的，相反地，交换是由商品的价格即用金估计的交换价值来决定的^①。

在流通过程中，金不论在谁的手里都是卖 $W-G$ 的结果。但是，因为 $W-G$ 卖同时就是 $G-W$ 买，这就表示，当过程的起点商

^① 自然，这并不妨碍商品的市价可以高于或低于它的价值。但是，这方面的考察不属于简单流通的领域，而是属于完全另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我们在后面要加以考察，在那里要研究价值和市价之间的关系。

品 W 正在完成它的第一形态变化时,另一个处于对极 G 的商品,正在完成它的第二形态变化,因而正在通过流通的后半段,这时前一个商品还在它的旅程的前半段上。

作为流通的第一过程卖的结果而出現的,是第二过程的起点即货币。代替第一形态上的商品的,是商品的金等价物。这个结果首先可以造成一个休止点,因为商品在这第二形态上有它自身的持久的存在。商品在它的所有者手里原来不是使用价值,现在却具有永远可以交换因而永远可以使用的形式,而它究竟在什么时候、在商品世界表面的什么地点再进入流通,那要看情况而定。它的金蛹成了它生命中的独立的一段,它可以在这里停留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在物物交换时,一种特殊使用价值的交换是直接同另一种特殊使用价值的交换結合在一起的,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一般性质,却表现为买和卖的行为的分裂和任意脱离。

G—W, 买, 是 W—G 的逆运动, 同时又是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或終結的形态变化。商品作为金或者在它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存在上, 能够直接表现为一切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 这些商品在自己的价格上都把金当作自己的来生来追求, 同时又表示出金应该奏出什么样的音符, 才能使它们的肉体即使用价值跳到货币那边, 使它们的灵魂即交换价值跳进金本身。商品轉移的共同产物, 是绝对可以轉移的商品。金轉化为商品, 沒有任何质的限制, 只有量的限制, 即金自身的量或价值量的限制。“現金可买一切。”商品在 W—G 运动中通过它当作使用价值的轉移, 实现了它自己的价格和別人的货币的使用价值, 而商品在 G—W 运动中通过它当作交换价值的轉移, 实现了它自己的使用价值和別的商品的价格。商品通过自己的价格的实现, 同时使金轉化为实在的货币, 而商品通

过自己的逆转化,使金转化为商品自身的只是瞬息间的货币存在。商品流通既然以发达的分工为前提,因而是以与个人产品的单面性成反比的个人需要的多面性为前提,所以买 $G-W$ 时而表现为与一种商品等价物相等,时而分裂为一系列的商品等价物,这个系列现在决定于买者的需要范围和他的货币额的大小。正如卖同时就是买,买同时也就是卖, $G-W$ 同时也就是 $W-G$,可是在这里主动属于金或买者。

我们回头来看 $W-G-W$ 这个流通的全程,可以看出,一个商品在这里通过了它的形态变化的整个系列。可是,当一个商品开始流通的前半段,完成第一形态变化的时候,第二种商品进入流通的后半段,完成它的第二形态变化而离开流通;反过来说,第一种商品进入流通的后半段,完成它的第二形态变化而离开流通,是在第三种商品进入流通,通过它的旅程的前半段,完成第一形态变化的时候。因此,流通的全程 $W-G-W$,作为一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的全程,同时总是第二种商品的形态变化全程的结束和第三种商品的形态变化全程的开始,因而它是一个无始无终的系列。为了明白起见,我们把商品加以区别,给两极的 W 加上不同的记号,如 $W'-G-W''$ 。实际上,第一环节 $W'-G$ 是以另一个环节 $W-G$ 的结果 G 为前提,就是说,它本身不过是 $W-G-W'$ 的最后一环节;而第二环节 $G-W''$ 的结果是 $W''-G$,所以这一环节本身是 $W''-G-W'''$ 的第一环节,以此类推。其次可以看出,最后一环节 $G-W$ 中的 G 虽然不过是一次卖的结果,但这个环节却可以表现为 $(G-W') + (G-W'') + (G-W''') + \dots$,因而可以分裂为许多次买,也就是许多次卖,即许多次新的商品形态变化全程的第一环节。因此,如果单个商品的形态变化全程不仅表现为一个无始无

終的形态变化鎖鏈的一个环节，而且表现为許多个这样的鎖鏈的一个环节，那末，商品世界的流通过程，由于每一个单个商品都要通过 $W-G-W$ 这个流通，就表现为在无数不同地点不断結束又不断重新开始的这种运动的无限錯綜的一团鎖鏈。但是每一次单独的卖或买同时又作为互不相关的孤立行为而存在，它的补充行为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可以和它脫离，因此无需作为它的繼續而直接同它銜接起来。由于每一特殊流通过程 $W-G$ 或 $G-W$ ，作为一种商品向使用价值的轉化和另一种商品向貨幣的轉化，作为流通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从两方面形成一个独立的休止点，而另一方面，由于一切商品都以它們共同的一般等价物的形式即金的形式开始它們的第二形态变化而站到流通的后半段的起点上，所以在实际流通中，任意一个 $G-W$ 接在任意一个 $W-G$ 之后，一个商品的生命史的第二章接在另一个商品的生命史的第一章之后。例如，甲卖了铁，得 2 鎊，因而完成了 $W-G$ 或商品铁的第一形态变化，可是他把买推迟到較远的时候。同时，乙在 14 天前卖了两夸特小麦，得 6 鎊，現在用这 6 鎊向“摩瑟父子公司”买衣褲，因而完成了 $G-W$ 或商品小麦的第二形态变化。 $G-W$ 和 $W-G$ 这两个行为在这里只是表现为一个鎖鏈的两个环节，因为在 G 即金上，一种商品看起来和另一种商品是一样的，从金的身上再也看不出它是經過形态变化的铁，还是經過形态变化的小麦。这样一来，在实际流通过程中， $W-G-W$ 就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全程的形形色色的环节的无限偶然的并行和連接。因而，实际的流通过程不是表现为商品的形态变化全程，不是表现为商品通过对立阶段的运动，而只是表现为許多偶然并行发生或彼此連接的买卖的集合。这样，这个过程的形式規定性就消失了，并且由于每

一次单独的流通行为卖同时是它的对立面买，而买同时是它的对立面卖，这种形式规定性就更加消失得干干净净。另一方面，流通过程是商品世界的形态变化运动，因此必然也会在自己的总运动中反映这个运动。关于流通过程如何反映这个运动，我们将在下一篇加以研究。这里只要指出，在 $W-G-W$ 中，两极的 W 同 G 不是处在同样的形态关系中。第一个 W 是作为特殊商品同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发生关系，而货币则是作为一般商品同作为个别商品的第二个 W 发生关系。因此， $W-G-W$ 可以抽象地从逻辑上归结为 $B-A-E$ [特殊——一般——个别] 的推理式，其中特殊是第一极，一般是联结中项，个别是终极。

商品所有者只是以商品监护人的身分进入流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彼此以买者和卖者的对立形式出现，一个是人格化的糖块，另一个是人格化的金。糖块一变成金，卖者也就变成买者。这种特定的社会身分，决不是来自人的个性，而是来自以商品这个特定形式来生产产品的人们之间的交换关系。买者和卖者之间所表现的关系，不是纯粹的个人关系，因为他们两者发生关系，只是由于他们的个人劳动已被否定，即作为非个人劳动而成为货币。因此，把买者和卖者的这种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身分理解为人的个性的永恒的社会形式，是荒谬的，把他们当作个性的消灭而伤心，也同样是错误的^①。这些身分是个性在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定阶段上

^① 从伊萨克·贝列拉先生的《Leçons sur l'industrie et les finances》. Paris, 1832. [“关于工业和财政的讲义” 1832年巴黎版] 中摘出的下面一段话表明，甚至在买卖中表现得十分肤浅的对抗形式已经如何深深地损伤了高尚的灵魂。就是这个伊萨克，这个《Crédit Mobilier》²⁴ 的创办人和经理，享有巴黎交易所之狼的臭名。这就表明这种对政治经济学的伤感的批评究竟有什么意义。贝列拉先生当时还是圣西门的信徒，他说：“因为人们不论在劳动上或在

的必然表現。此外，資產階級生產的對抗性質，在買者和賣者的對立上表現得還很膚淺很表面，這種對立在資產階級以前的社會形式中也存在，因為它只要求人們彼此當作商品所有者來發生關係。

現在我們來考察 $W-G-W$ 的結果，它歸根到底是物質變換 $W-W$ 。商品換商品，使用價值換使用價值，而商品的貨幣化或商品作為貨幣，只是用來作這種物質變換的媒介。因而，貨幣表現為只是商品的交換手段，但不是一般的交換手段，而是以流通過程為特征的交換手段，即流通手段^②。

由於商品的流通過程總是歸結為 $W-W$ ，因而好像僅僅是以貨幣為媒介的物物交換，或者，由於 $W-G-W$ 不僅分裂為兩個孤立的过程，而且同時也表現出兩者在運動中的統一，於是就得出結論說，買和賣之間只有統一，沒有分裂，——這種思想方法是要由邏輯學而不是由經濟學來批判的。買和賣在交換過程中的分裂，破壞了社會物質變換的地方的、原始的、傳統虔誠的、幼稚荒謬的界限，它同時又是社會物質變換中相互聯繫的要素彼此分裂和對立的一般形式，一句話，是商業危機的一般可能性，其所以如此，只是因為商品和貨幣的對立是資產階級勞動所包含的一切對立的

消費上都是孤立的、彼此分離的，所以他們要彼此交換他們各自的产品。由於必須進行交換，就必須決定物品的相對價值。因而價值和交換的觀念是密切聯繫的，兩者在實際形式中表現了個人主義和對抗性…… 產品價值之所以能夠確定，只是因為存在着買賣，換句話說，存在着社會不同成員之間的對抗性。只是在有買賣的地方，就是說，在每一個人被迫為獲得維持生存所必需的物品而鬥爭的地方，人們才為價格和價值操心。”（貝列拉“關於工業和財政的講義”第 2、3 頁及以下各頁）

② “貨幣只是手段和動力，而對生活有用的商品才是目標和目的。”布阿吉爾貝爾“法國詳情”1697 年版，載于歐仁·德爾編“十八世紀的財政經濟學家”1843 年巴黎版第 1 卷第 210 頁。

抽象的一般的形式。因此，可以有貨幣流通，而不發生危機，但是沒有貨幣流通，卻不會發生危機。然而這只是說，在以私人交換為基礎的勞動還沒有發展到形成貨幣的地方，這種勞動自然更不會引起以資產階級生產過程的充分發展為前提的那些現象。因此，那種想用廢除貴金屬的“特權”、用所謂“合理的貨幣制度”來消除資產階級生產的“弊害”的批判的深刻程度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另一方面，下面這段曾經被吹噓為特別透徹的言論，足以作為經濟學辯護論的標本。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父親詹姆斯·穆勒說：

“一切商品从来不会缺少买者。任何人拿出一种商品来卖，总是希望把它換回另一种商品，因此，单单由于他是卖者这个事实，他就是买者了。因此，由于一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总起来看，一切商品的买者和卖者必然保持平衡。因此，如果一种商品的卖者多于买者，另一种商品的买者必然多于卖者。”^①

穆勒建立平衡的办法是把流通过程变成直接的物物交換，又把从流通过程中搬来的人物买者和卖者偷偷地塞到直接的物物交換中去。用他的混乱的話來說，在一切商品都賣不出去的時候，像

① 1807年11月，在英國出版了威廉·斯賓斯的一本著作，書名叫《Britain independent of commerce》[“不依靠商業的不列顛”]，這一著作的基本思想由威廉·科貝特在他的《Political register》[“政治紀事”]中用《Perish commerce》[“打倒商業”]這個更激烈的形式作了進一步的發揮。為了與此相抗衡，詹姆斯·穆勒在1808年發表了他的《Defence of commerce》²⁵，其中已經有我們在正文中從他的《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經濟學原理”]引用的那個論據了。讓·巴·薩伊在同西斯蒙第和馬爾薩斯就商業危機進行論戰時把這一套妙論攬為己有，由於不可能說出這位可笑的《prince de la science》[“科學王子”]用什麼新的思想豐富了政治經濟學，所以他的大陸上的崇拜者把他吹噓成找到買和賣之間的形而上學的平衡論這種寶藏的人，其實倒不如說，他的功績在於以一視同仁的態度來曲解他的同時代人馬爾薩斯、西斯蒙第和李嘉圖。

倫敦和漢堡在 1857—1858 年商業危機的某些時候那樣，其實是有一種商品即貨幣的買者多於賣者，而所有其他的貨幣即各種商品的賣者多於買者。買和賣之間的形而上學的平衡，不過是說每次買就是賣，每次賣就是買，這對於那些不能賣出，因而也不能買進的商品監護人，並不是什麼特別的安慰^①。

由於賣和買的分裂，除了真正的貿易外，有可能在商品生產者和商品消費者之間的最後交換之前造成許多虛假的交易。這樣一來，許多寄生者就有可能鑽進生產過程並利用這種分裂來牟利。但這仍然只是說，有了作為資產階級勞動的一般形式的貨幣，這種勞動的矛盾也就有了發展的可能性。

(b) 貨幣的流通

實際的流通首先表現為許多偶然地並行發生的買和賣。不論

① 我們從下面幾個例子可以看到，經濟學家們用什麼方法來表現商品的不同形式規定：“有貨幣在手，要得到所要的東西，我們只須作一次交換；有其他剩餘產品在手，我們就得作兩次交換，其中第一次（換取貨幣）比第二次困難得多。” G. Opdyke.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 1851, p. 287—288 [喬·奧普戴克“政治經濟學專論”1851年紐約版第 287—288 頁]。

“貨幣的較高的可售性，正是商品的較低的可售性的影響或自然結果。” (Th. Corbet.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modes of the wealth of individuals etc.》. London, 1841, p. 117 [托·柯貝特“個人致富的原因和方式的研究”1841年倫敦版第 117 頁]) “貨幣有一種屬性，即總是可以同它所衡量的物品相交換。” (Bosanquet. 《Metallic, paper and credit currency etc.》. London, 1842, p. 100 [博贊克特“硬幣、紙幣、信用貨幣”1842年倫敦版第 100 頁])

“貨幣總是能購買其他商品，而其他商品並不總是能購買貨幣。” (Th. Tooke. 《An inquiry into the currency principle》，2 ed. London, 1844, p. 10 [托·圖克“通貨原理研究”1844年倫敦第 2 版第 10 頁])

在買或賣中，商品和貨幣总是在同樣的關係上彼此對立：賣者在商品一方，買者在貨幣一方。因此，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总是表現為購買手段，于是它在商品形態變化的兩個對立階段上的不同的規定，就變得無從分辨了。

在同一行為中，商品轉到買者的手里，貨幣轉到賣者的手里。商品和貨幣以相反的方向運動，商品走向一方而貨幣走向另一方，這種位置變換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表面上的無數地點同時進行的。但是，商品在流通中所走的第一步，同時也是它的最後一步^①。不論商品移動位置是由于金受了它的吸引(W—G)，還是它受了金的吸引(G—W)，只要它這樣一移動，一變換位置，它就脫離流通而進入消費。流通是商品的不斷運動，但总是新的商品的不斷運動，每個商品只運動一次。每個商品在開始它的流通的後半段時，已不是原來的商品，而是另一種商品金。因此，經過形態變化的商品的運動，是金的運動。同一塊貨幣或同一金塊在 W—G 的行為中曾經一度同一种商品變換位置，現在反過來又成了 G—W 的起點，再次同另一種商品變換位置。過去它是從買者乙的手里轉到賣者甲的手里，現在它是從變成買者的甲的手里轉到丙的手里。因此，一個商品的形態運動，它向貨幣的轉化和它從貨幣的逆轉化，或者說，商品形態變化全程的運動，表現為同一塊貨幣同兩種不同商品兩次變換位置的外部運動。不論買和賣如何分散地偶然地并行發生，在實際流通中，買者對面总是站着賣者，而移動到被賣商品的位置上去的貨幣，在它轉到買者手里以前，一定已經

① 同一商品可以多次買了又賣。這時它不是作為簡單商品流通，而是在這樣一種規定中流通，這種規定從簡單流通的觀點、從商品和貨幣簡單對立的觀點來看，還不存在。

一度同另一商品变换过位置。另一方面，货币迟早会再从已经变成买者的卖者手里轉到新的卖者手里，货币通过它的反复不断的位置变换，表现出各商品形态变化的連結。因此，同一些货币总是朝着和商品运动相反的方向从流通中的一处移动到另一处，有的移动次数多些，有的移动次数少些，从而画出或长或短的流通曲线。同一块货币的这些不同的运动只能在时间上相继发生，相反地，大量的分散的买和卖，则表现为同时发生的、空间上并行的、单次的商品和货币的位置变换。

商品流通 $W—G—W$ 的简单形式是：货币从买者手里轉到卖者手里，再从已经变成买者的卖者手里轉到新的卖者手里。商品的形态变化即以此结束，货币的运动，就它是这个形态变化的表现而论，也随之结束。但是，由于新的使用价值必须不断作为商品生产出来，因而必须不断地重新投入流通，所以 $W—G—W$ 就由同一些商品所有者不断重复和更新。他们作为买者付出的货币，一到他们重新作为商品的卖者出现时，又回到他们手里。因此，商品流通的不断更新就反映成：货币不仅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表面上不断地轉手，而且同时画出许多不同的小循环，从无数不同地点出发，又回到这些地点，以便重新再作同样的运动。

商品的形式变换表现为货币的单纯的位置变换，只是货币一方才具有流通运动的连续性，这是因为商品总是按照同货币相反的方向只走一步，而货币总是代替商品去走第二步，在商品报了“一”的地方，货币报“二”。因此，看来好像整个运动都是从货币出发的，虽然卖时是商品吸引货币离开原位，从而使货币流通，就像买时是货币使商品流通一样。其次，因为货币总是在作为购买手段这样一种关系上与商品对立着，而作为购买手段，只有通过实现

商品價格才能使商品運動，所以，流通的整個運動總是表現為貨幣去同商品變換位置，不論是在同時並行發生的特殊流通行為中實現商品的价格，或者是連續地實現商品的价格，即由同一塊貨幣依次地實現不同商品的价格。例如，我們就 $W—G—W'—G—W''—G—W'''……$ 來考察，如果不考慮在實際流通過程中變得無從辨認的質的要素，那末它不過是表示同一個單調的動作。G 在實現了 W 的价格之後，依次地實現 $W'—W''$ 等等的价格，而 $W'—W''—W'''$ 等商品，總是補上貨幣所讓出的位置。因而，表面看來，是貨幣通過實現商品價格使商品流通。貨幣在執行實現價格的職能時本身不斷流通，時而只變換一次位置，時而通過一條流通曲綫，時而畫出一個出發點和歸宿點相合的小圓圈。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有它自身的流通。因此，過程中的商品的形態運動表現為貨幣自身的、替本身不運動的商品的交換作媒介的運動。於是，商品流通過程的運動就表現為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的運動，表現為**貨幣流通**。

商品所有者把自己的私人勞動產品表現為社會勞動產品，是通過把一種物即金轉化為一般勞動時間的直接存在，因而轉化為貨幣，而現在，他們自身借以完成其勞動的物質變換的全面運動，就作為一種物所特有的運動即金的流通而同他們對立。社會運動本身，對商品所有者來說，一方面是外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只是形式上的媒介過程，使每一個人能夠用他投入流通的使用價值從流通中取回價值量相等的另一些使用價值。商品的使用價值在商品離開流通時才開始發生作用，而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的使用價值則是貨幣的流通本身。商品在流通中的運動不過是瞬息間的要素，而在流通中不息奔走卻成為貨幣的職能。貨幣在流通過程中

的这种特殊的职能,使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具有新的形式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是现在我们要详细阐述的。

首先我们看到,货币的流通是一个无限分散的运动,因为它反映着流通过程无限地分散为买和卖,反映着商品形态变化中相互补充的阶段的任意脱离。在货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相合的小循环中,固然表现出回归运动,真正的循环运动。可是,有多少商品,便有多少出发点,单单由于出发点无限多这一点,这种循环就根本无法控制、衡量和计算了。从离开出发点到再回到出发点所经过的时间同样是无法确定的。这种循环在某一场合是否完成也是毫无关系的。一个人可以用一手付出一笔货币而没有用另一手把这笔货币收回,这个经济事实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了。货币从无限不同的点出发,回到无限不同的点,可是出发点和归宿点相合是偶然的,因为在 $W-G-W$ 运动中,买者反过来变为卖者,并不是必要的条件。货币流通更少可能表现为这样一个运动:从一个中心辐射到圆周上各点,再由圆周上各点回到这一中心。所谓货币的循环,呈现在我們面前的,不过是我们的一切点上都能看到货币的出现和消失,看到它的不息的位置变换。在货币流通的较高的媒介形式中,例如在银行券的流通中,我们会看到货币发行的条件包含着它回笼的条件。相反地,在简单的货币流通中,同一买者再变为卖者是偶然的。真正的循环运动在简单的货币流通中经常出现,不过是更深刻的生产过程的反映。例如,工厂主在星期五从他的银行家那里取得货币,星期六付给他的工人,工人把其中大部分立刻付给店主等,后者在星期一又把它交回银行家。

我們已經知道,在空間上并行发生的各式各样的許多买和卖中,货币在同一時間內實現着一定量的价格,并且同商品只变换一

次位置。可是，另一方面，既然商品形态变化全程的运动和这些形态变化的連結表现为货币的运动，同一块货币就实现着各种不同的商品的价格，因而进行了若干次流通。因此，我们拿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内（例如在一日内）的流通过程来看，实现价格所需要的金量，因而也就是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金量，便决定于两个要素：一方面是这种价格的总额，另一方面是同一块金币的平均流通次数。这个流通次数或货币流通速度，又决定于或只是表现出商品通过其形态变化的不同阶段的平均速度，这些形态变化鎖鏈般发生的平均速度，经过形态变化的商品在流通中由新商品代替的平均速度。因此，如果说，在确定价格时，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在观念上转化为具有同一价值量的金量，在两个孤立的流通行为 $G-W$ 和 $W-G$ 中，同一价值量双重地存在，一方面在商品上，另一方面在金上，那末，金作为流通手段的存在不是决定于它同个别静止商品的孤立的关系，而是决定于它在过程中的商品世界里的动的存在；决定于它用自己的位置变换来表现商品形态变化的职能，也就是决定于它用自己的位置变换速度来表现商品形态变化速度的职能。因此，它在流通过程中的实际的存在，即流通中的实际的金量，就决定于它在整个过程本身中的职能存在。

货币流通的前提是商品流通，就是说，货币使具有价格的商品即已经在观念上等于一定金量的商品流通。在确定商品本身的价格的时候，用作计量单位的金量的价值量，或者说金的价值，是假设为既定的。在这个前提下，流通所需要的金量就首先决定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的总额。而这个总额本身又决定于：（1）价格水平，即用金来计算的商品交换价值的相对的高低，（2）按一定价格流通的商品的数量，也就是按既定价格进行的买卖的数

量^①。假定一夸特小麦值 60 先令，那末同它只值 30 先令相比，要使它流通或实现它的价格，就要有多一倍的金。假定每夸特小麦的价格是 60 先令，那末要使 500 夸特流通，就比使 250 夸特流通，要有多一倍的金。最后，要使每夸特值 100 先令的 10 夸特小麦流通，同使每夸特值 50 先令的 40 夸特小麦流通相比，只要有一半的金就行了。由此可见，如果流通的商品数量的减少在比例上大于价格总额的增加，那末即使价格上涨，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金量仍会减少；反之，如果流通的商品数量减少，而其价格总额以更大的比例增加，那末流通手段量也会增加。例如，英国人曾以出色而细致的研究证明，在英国谷物涨价的初期，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了，这是因为减少了的谷物量的价格总额高于以前较大的谷物量的价格总额，同时其他商品量的流通在若干时间没有受到影响，还保持着原来的价格。在谷物涨价的后期，流通中的货币量却相反地减少了，这或者是因为除了谷物以外，其他商品按原有价格出卖而数量减少了，或者是因为这些商品出卖的数量同样多而价格降低了。

可是，我们知道，流通的货币量不仅决定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同时也决定于货币流通的速度，或者说，决定于货币在一定时间内完成这种实现业务的速度。同一个索维林在同一天内完成了 10 次买，每次买的商品的价格是一个索维林，它一共转手 10

① 货币量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它足以维持同商品相应的价格”。布阿吉尔贝尔“法国详情”第 209 页，“如果 4 亿镑商品的流通需要 4 000 万镑金，而这 1/10 的比例是适当的水平，那末，当流通的商品的价值由于自然原因增加到 45 000 万镑时，为了维持原有水平，金的数量就必须增加到 4 500 万镑。”W. Blake. «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s produced by the expenditure of government etc.». London, 1823, p. 80 [威·布莱克“论政府支出的影响”1823 年伦敦版第 80 页]。

次，它所完成的業務正好是一天內每一個只流通一次的 10 個索維林所完成的業務^①。因此，金的流通速度可以代替金的數量，或者說，金在流通過程中的存在不僅決定於它在商品旁邊作為等价物的存在，而且也決定於它在商品形態變化運動中的存在。可是，貨幣流通的速度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貨幣的數量，因為無限分散的買和賣，在每個一定的時刻是在空間上並行發生的。

如果流通的商品價格總額增加，但是這種增加在比例上小於貨幣流通速度的增加，那末，流通手段量會減少。相反，如果流通速度的降低，在比例上大於流通的商品量的價格總額的減少，那末，流通手段量會增加。流通手段量隨着價格普遍降低而增加，或流通手段量隨着價格普遍上漲而減少，是商品價格史上充分証實了的現象之一。但是，引起價格水平提高同時引起貨幣流通速度更加提高的原因，以及引起相反的運動的原因，不是屬於簡單流通的研究範圍。可以舉一個例子說說，當信用活躍的時期，貨幣流通的速度比商品價格增加得快，而在信用緊縮的時期，商品價格比流通速度降低得慢。簡單貨幣流通是表面的和形式的，這種性質正是表現在：決定流通手段量的一切要素，如流通的商品量、價格、價格的漲落、同時進行的買和賣的次數、貨幣流通速度，都依賴於商品世界的形態變化的過程，而後者又依賴於生產方式的總的性質、人口數、城鄉關係、運輸工具的發展，依賴於分工的粗細、信用等等，——簡言之，依賴於一切處於簡單貨幣流通之外而只反映在簡單貨幣流通中的情況。

因此，如果流通速度已定，流通手段量就只是決定於商品的價

^① “影響貨幣量多少的，是貨幣的流通速度，而不是金屬的量。”（加利阿尼“貨幣論”第 99 頁）

格。因此，价格的高或低，不是因为有較多或較少的貨幣在流通，相反，有較多或較少的貨幣在流通，倒是因为价格高或低。这是最重要的經濟規律之一，根据商品价格史对这个規律作詳細的证明，也許是李嘉图以后的英国經濟学的唯一貢獻。經驗表明，在某一个国家內，金屬流通的水平或流通的金銀量虽然有过暫时的、有时甚至是极其猛烈的退潮和漲潮^①，但是总的說来，在較长时期內是不变的，同平均水平的偏离只是微弱的波动，这只是因为决定流通貨幣量的种种因素具有对立的性质。这些因素的同时变动，使它們的作用互相抵銷，使一切照旧。

已知貨幣流通速度，已知商品价格总額，流通手段量就已决定，这一規律也可以表述如下：已知商品的交換价值，已知商品形态变化的平均速度，流通的金量就决定于金本身的价值。因此，如果金的价值，即生产金所需要的劳动時間增加或减少，那末，商品价格将以反比例上漲或下跌，而同价格的这种普遍的上漲或下跌相适应，在流通速度不变的情况下，要使同一商品量流通，就需要一个較大或較小的金量。同样，在原来的价值尺度被价值較高或較低的金屬排挤的时候，也会发生这种变动。例如，荷兰由于体貼國債持有人，由于担心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新金矿的发现的后

① 例如，在1858年，英国的金屬流通量異乎尋常地降到它的平均水平以下，这可以从倫敦“經濟學家”杂志²⁶中引來的下面一段話中看到：“按照現象的本質（即簡單流通的分散性）不可能獲得關於在市場上和非銀行階級手中流通的現金數量的十分精確的材料。但是，大商業國家的造幣局的活躍與否，或許是現金數量變動的最確切的指標之一。需要多就鑄得多，需要少就鑄得少……英國造幣局1855年共鑄造9 245 000鎊，1856年共鑄造6 476 000鎊，1857年共鑄造5 293 858鎊。在1858年造幣局幾乎是無事可做。”“經濟學家”雜誌1858年7月10日。同時，銀行庫存大約有1 800萬鎊。

果，用银币代替了金币，于是使同一商品量流通所需的银量就得等于过去的金量的十四五倍。

既然流通的金量以变动的商品价格总额和变动的流通速度为转移，金属的流通手段量就必须有紧缩和扩张的能力，简言之，金必须适应流通过程的需要，时而作为流通手段进入这个过程，时而再退出这个过程。流通过程本身如何实现这些条件，我们到后面再谈。

(c) 铸币。价值符号

金在它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上取得了一种特有的 Façon [形状]，它变成铸币。为了使它的流通不因技术困难而受到阻碍，它是按照计算货币的标准来铸造的。铸币是这样的金块，它以一定的花纹和形状表示它含有镑、先令等货币计算名称所指的金的重量。正如造币局价格由国家规定一样，铸造的技术事务也由国家担任。作为铸币的货币，同作为计算货币的货币一样，有地方性和政治性，讲不同的国家语言，穿不同的民族服装。因此，作为铸币的货币的流通领域是不同于商品世界的普遍流通的、限于国界内部的商品流通。

可是，金块和金铸币的差别，并不比金的铸币名称和它的重量名称的差别更大。在后者表现为名称差别的，现在只表现为形状差别。金铸币可以投进熔炉，再 sans phrase [直截了当地] 变成金，反过来，金块只要送到造币局去，就能取得铸币形式。从一种形状转到另一种形状，又从另一种形状回到原来的形状，看来是一种纯粹技术性的事务。

把金衡 100 磅或 1 200 盎斯的 22 开金拿到英国造币局去，可

以換得 4 672 $\frac{1}{2}$ 鎊或金索維林，把這些金索維林放在天平的一端，把 100 鎊金條放在另一端，它們的重量相等，這證明索維林不過是在英國造幣局價格中用這個名稱來表示的具有特定的形狀和印記的金的一定重量。這 4 672 $\frac{1}{2}$ 金索維林從許多不同地點投入流通，被流通吸收後一天完成一定的流通次數，有的完成的次數多些，有的完成的次數少些。如果每一盎斯一天平均流通 10 次，那末 1 200 盎斯金將實現 12 000 盎斯或 46 725 索維林的商品價格總額。不論你把 1 盎斯金怎樣顛來倒去，它決不會重 10 盎斯。可是在這裡，在流通過程中，1 盎斯事實上重 10 盎斯。鑄幣在流通過程中的存在，等於它所含的金量乘它的流通次數。因此，鑄幣除了它作為具有一定重量的單個金塊的實際存在外，還取得了一種從它的職能產生的觀念存在。可是，索維林不論流通 1 次或 10 次，在每一次單獨的買或賣中，總只是當作 1 個索維林發生作用。好比在 1 個作戰日，1 個將軍及時出現在 10 個不同的地點而代替了 10 個將軍，可是在每個地點上還只是這同一個將軍。在貨幣流通中由於速度代替數量而引起的流通手段的觀念化，只涉及鑄幣在流通過程中的職能存在，而不包括單個鑄幣的存在。

然而，貨幣流通是外部的運動，索維林雖然 *non olet* [沒有臭味]，却在複雜的社會中周旋。鑄幣由於同各種各樣的手、荷包、衣袋、褡褳、腰包、匣子、箱子、櫃子等摩擦而磨損了，這裡掉一個金原子，那裡掉一個金原子。它在塵世奔波中磨來磨去，日益失去自己的含量。它因使用而損耗。讓我們來看一個其本來面目看來只是略受損害的索維林吧。

“麵包師今天剛從銀行領到一個嶄新的索維林，明天便把它付給磨坊主，他支付的索維林，已經不是那個本來的(*veritable*)索維林，它已經比領取它

的時候輕了一些。”^①

“顯然，單單由於日常的不可避免的摩擦的作用，鑄幣也就必然一個一個地不斷貶值。要在任何時間內，哪怕是在一天內，把輕量鑄幣完全排斥於流通之外，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②

杰科布估計過，1809年歐洲有38 000萬鎊，到1829年，即過了20年，有1 900萬鎊因磨損而完全消失了。^③因此，如果商品在跨進流通的第一步上就脫離流通，那末鑄幣在流通中走過幾步之後所代表的金屬含量卻比它實有的還大。在流通速度不變時，鑄幣流通得越久，或者在同一時間內它流通得越活躍，它作為鑄幣的存在就越是同它的金銀的存在脫節。余下的是 *magni nominis umbra* [一個偉大名字的影子]^④。鑄幣的肉體只是一個影子。它原來因流通過程而加重，現在卻因流通過程而減輕，但是在每一次單獨的買或賣中仍舊當作原來的金量。索維林成了虛幻的索維林，成了虛幻的金，但是仍然執行着法定金幣的職能。其他物因為同外界接觸而失掉了自己的觀念性，而鑄幣卻因為實踐反而觀念化，變成了它的金體或銀體的純粹虛幻的存在。由流通過程本身所引起的

① Dodd. «Curiosities of industry etc.». London, 1854. [多德“工業奇蹟”1854年倫敦版第16頁]。

② «The currency question reviewed etc. by a banker». Edinburgh, 1845, p. 69 etc. [“一個銀行家評通貨問題”1845年愛丁堡版第69頁等等]。“如果一個稍受磨損的埃巨的價值比一個全新的埃巨的價值少些，那末流通就會不斷遇到障礙，而且沒有一次支付會不引起爭論。”（熱·加爾涅“從上古至查理大帝統治時期的貨幣史”第1卷第24頁）

③ W. Jacob. «An historical inquiry into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he precious metals». London, 1831, Vol. II, ch. XXVI, p. 322 [威·杰科布“貴金屬生產和消費的歷史研究”1831年倫敦版第2卷第26章第322頁]。

④ 引自古羅馬作家路卡努斯的历史敘事詩“發薩羅戰役”。——譯者注

金屬貨幣的第二次觀念化，或者說它們的名義含量和實際含量的分離，一方面被政府、另一方面被私人冒險家利用來從事各式各樣的鑄幣偽造活動。從中世紀初至十八世紀末的整個貨幣鑄造史，就是這兩方面的、互相對抗的偽造鑄幣的歷史。庫斯托第所編的多卷本的意大利經濟學家文集大部分就是討論這個問題的。

可是，金在它的職能範圍內的虛幻存在，同金的實際存在發生衝突。在流通中，一個金鑄幣喪失的金屬含量較多，而另一個喪失的較少，於是一個索維林的价值實際上比另一個更大。但是，因為它們在作為鑄幣的職能存在上是等值的，實際重 $\frac{1}{4}$ 盎斯的索維林並不比表面重 $\frac{1}{4}$ 盎斯的索維林有更大的价值，所以分量十足的索維林一部分就會在不老實的所有者手中受到外科手術，流通本身曾經在它們分量輕的兄弟身上自然地做過的事就會人為地加在它們身上。它們被刮削，它們的多余的金脂進入熔爐。如果 $4\ 672\ \frac{1}{2}$ 金索維林放在天平上，平均重量不是 1 200 盎斯，而只是 800 盎斯，那末它們在金市上就只能買到 800 盎斯的金，換句話說，金的市場價格就升到它的造幣局價格以上。每個貨幣，儘管分量十足，但它在鑄幣形式上的价值會比它在鑄塊形式上的价值少。分量十足的索維林會反過來變成它的鑄塊形式，因為在這種形式上，較多的金比較少的金有較多的价值。一旦相當多的索維林減少了金屬含量，以致金的市場價格經常高於它的造幣局價格，那末鑄幣的計算名稱雖然不變，但是它今後只會表示一個較小的金量。換句話說，貨幣的標準會改變，金今後會按照這個新標準來鑄造。金作為流通手段而發生的觀念化，會反過來改變金曾借以成為價格標準的法定比例。這樣的革命過了一定的時間會重新發生，所以金無論在它作為價格標準的職能上或作為流通手段都會發生不斷的變

動，而一種形式的變動會引起另一種形式的變動，反過來也是一樣。這就說明了我們在前面提到過的現象：在所有現代民族的历史上，金屬含量本身雖不斷減輕，但仍採用同一個貨幣名稱。作為鑄幣的金和作為價格標準的金之間的矛盾同樣也變成作為鑄幣的金和作為一般等價物的金之間的矛盾，而作為一般等價物的金就不僅在國界以內而且在世界市場上流通。作為價值尺度，金總是分量十足的，因為它只是當作觀念的金來用的。金在孤立的 W—G 行為中充當等價物時，從它運動的存在立即回到它靜止的存在，但是在它充當鑄幣時，它的自然實體就不斷同它的職能發生衝突。要完全避免金索維林變成虛幻的金，是不可能的，但是立法想在它的實體減輕到一定程度時把它收回，不准它再當鑄幣通用。例如，按照英國的法律，1 個索維林失去的重量超過 0.747 克冷，它就不再是合法的索維林。英格蘭銀行從 1844 年到 1848 年間稱過 4 800 萬個金索維林，用的是柯頓氏金秤這種機器，它不僅辨別得出兩個索維林之間 $\frac{1}{100}$ 克冷的差別，而且像一個有理智的生物那樣，把分量不足的索維林立刻推上一塊滑板，使它滑進另一架機器，這架機器就以東方式的殘酷無情把它鋸碎。

在這種情況下，不把金鑄幣的流通限制在它磨損得較慢的一定流通範圍內，它就根本無法流通。如果一個金鑄幣在流通中當作 $\frac{1}{4}$ 盎斯，而只重 $\frac{1}{5}$ 盎斯，那末它的 $\frac{1}{20}$ 盎斯金實際上變成了單純的符號或象徵。這樣，由於流通過程本身，所有的金鑄幣或多或少地變成了自己的實體的單純符號或象徵。但是任何一種東西不能是它自身的象徵。畫的葡萄不是真葡萄的象徵，而是假葡萄。分量輕的索維林更不能是分量十足的索維林的象徵，正如瘦馬不能是肥馬的象徵一樣。由於金變成了它自己的象徵，又不能當作

自己的象征来用,所以它在自己磨損得最快的流通範圍內,即在买和卖以最小規模不断重新进行的範圍內,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存在脫离的象征性的存在即銀存在或銅存在。在全部金貨幣中总有一定部分(虽然不是同一些金块)在这个範圍內当作鑄币来流通。这一部分金就被銀記号或銅記号所代替了。因此,如果說能够作为价值尺度、因而作为貨幣在一國之內发生作用的只有一种特殊商品,那末,当作鑄币来用的除金外可以有几种商品。这些輔助的流通手段,如銀記号或銅記号,在流通中代表金鑄币的一定部分。因此,它們自己的含銀量或含銅量不是由銀对金或銅对金之間的价值比例决定的,而是由法律任意确定的。它們的发行量只应该限于它們所代表的金鑄币的細小部分为兌換較大金鑄币或实现相应的小額商品价格所需要的經常流通的量。在零售商品流通中,銀記号和銅記号又分別屬於特定的範圍。就事物的本质來說,它們的流通速度同它們在每一次单独的买和卖中所实现的价格成反比,或者說,同它們所代表的金鑄币部分的大小成反比。我們可以想一想像英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日常的小額交易量是如此龐大,而流通的輔币总量却占着相对不大的比例,这就表示它們的流通的迅速和頻繁的程度。例如,我們从不久以前发表的一篇議会报告中看到,1857年英国造币局鑄造的金是4 859 000 鎊,鑄造的銀名义价值是373 000 鎊,而金屬价值是363 000 鎊。截至1857年12月31日为止的10年間,鑄造的金总共是55 239 000 鎊,鑄造的銀总共有2 434 000 鎊。1857年鑄造的銅币的名义价值总共只有6 720 鎊,其中3 136 鎊是辨士,2 464 鎊是半辨士,1 120 鎊是法寻,而銅的价值有3 492 鎊。最近10年間鑄造的銅币总額的名义价值是141 477 鎊,金屬价值是73 503 鎊。金鑄币由于按法律規

定損失金屬含量到一定程度就失去鑄幣資格，不能永遠執行鑄幣的职能，同樣，銀記號和銅記號則由於按法律實現的價格限額是一定的，不能從自己的流通領域走進金鑄幣的流通領域而固定為貨幣。例如，在英國用銅支付以 6 辨士為限，用銀支付以 40 先令為限。如果銀記號和銅記號的發行量大於它的流通領域所需要的量，商品價格不會因此提高，但是這些記號會在零售商那里累積起來，最後不得不被他們當作金屬賣掉。例如，在 1798 年，英國的小販手里累積的由私人發行的銅幣額達到 20、30、50 鎊，他們無法再把它們投入流通，最後不得不把它們當作商品投入銅市場^①。

在國內流通的一定領域內代表金鑄幣的銀記號和銅記號，有一個法定的含銀量和含銅量，但被流通吸收後，就同金鑄幣一樣受到磨損，並且隨着它們的流通的迅速和頻繁程度而觀念化，更快地變成單純的影子。如果再規定銀記號和銅記號損失多少金屬就失去鑄幣資格的界限，那末它們在自己的流通領域的一定範圍內，又要被另一種象徵性的貨幣如鐵和鉛來代替，而用一種象徵性的貨幣來代表另一種象徵性的貨幣是一個永無止境的过程。因此，在一切流通發達的國家中，由於貨幣流通本身的必要性，不得不使銀記號和銅記號不論損失多少金屬仍具有鑄幣資格。這就表明，從事情的實質來說，它們成為金鑄幣的象徵，不是因為它們是銀制的或銅制的象徵，不是因為它們有價值，而是因為它們沒有價值。

因而，相對沒有價值的東西，如紙，可以作為金貨幣的象徵發生作用。用銀銅等金屬記號作的輔幣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為在

^① David Buchanan. «Observations on the subjects treated of in Doctor Smith's Inquiry on the wealth of nations, etc.». Edinburgh, 1814, p. 31 [大衛·布坎南“論斯密博士的‘國富論’的內容”1814年愛丁堡版第31頁]。

大多数国家,价值較低的金屬过去是作为貨幣流通的,例如銀在英国,銅在古羅馬共和国、瑞典和苏格兰等地,直到流通过程把它們降为輔币和貴金屬代替它們为止。此外,直接从金屬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貨幣象征,最初本身又是金屬,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正如那部分必須經常当作零錢而流通的金被金屬記号代替一样,那部分經常当作鑄币被国内流通領域吸收的因而必須不断流通的金,也可以被无价值的記号所代替。流通中鑄币量的最低水平,在每个国家是根据經驗規定的。可見,金屬鑄币的名义含量和金屬含量之間最初并不显著的差別可以发展到絕對的分裂。貨幣的鑄币名称离开了貨幣的实体,而存在于实体之外,存在于沒有价值的紙片上。正如商品的交換价值通过商品的交換过程結晶为金貨幣一样,金貨幣在流通中升华为它自身的象征,最初采取磨損的金鑄币的形式,而后采取金屬輔币的形式,最后采取无价值的記号、紙片、單純的价值符号的形式。

可是,金鑄币所以最初产生金屬代用品,后来又产生紙代用品,只是因为它尽管損失金屬,但仍然执行鑄币的职能。它不是由于磨損才流通,而是由于不断流通才磨損成一个象征。只有在流通过程中金貨幣本身变成了它自己价值的單純的符号,單純的价值符号才能够代替它。

只要 $W-G-W$ 这个运动是直接互相轉化的两个因素即 $W-G$ 和 $G-W$ 的过程中的統一,或者只要商品是在經歷着它的形态变化的全程,商品把自己的交換价值发展成价格和貨幣,是为了立即再放棄这个形态而再变成商品,或者不如說再变成使用价值。因此,商品达到的是它的交換价值的**仅仅在表面上的独立化**。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只要金仅仅作为鑄币发生作用或經常处

在流通中，金实际上只是商品形态变化的連結，是商品的仅仅瞬息間的货币存在；金实现一种商品的价格，只是为了去实现另一种商品的价格，但是无论在哪里，它都不是表现为交换价值的靜止的存在，或本身靜止的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所得到的和金在它的流通中所表现的现实性，仅仅是閃电一样的现实性。金虽然是实在的金，但只执行虛幻的金的功能，因而在这个职能上可以由它自己的符号来代替。

执行鑄币职能的价值符号，如紙片，是用金的鑄币名称表示的金量的符号，因此是金的符号。一定量的金本身并不表示一种价值比例，代替它的符号也是如此。只就一定量的金作为物化劳动時間具有一定的价值量而言，金的符号代表价值。可是，它代表的价值量，每一次都决定于它代表的金量的价值。价值符号在商品面前代表商品价格的现实性，它是 *signum pretii* [价格的符号]，而只因为商品的价值已經表示在商品的价格上，它才是商品价值的符号。在 $W-G-W$ 过程中，只要这个过程表现为只是两个形态变化的过程中的統一或直接的相互轉化，——这个过程在价值符号发生作用的流通領域內就是这样表现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在价格上得到的只是观念的存在，在货币上得到的只是代表性的、象征性的存在。这样，交换价值只是表现为想像的或用物代表的东西，它除了在商品本身中物化着一定量劳动時間以外不具有任何现实性。因此，表面上看来，价值符号直接代表商品的价值，它不表现为金的符号，而表现为在价格上只表示出来、在商品中才实际存在的交换价值的符号。但是，这个表面現象是錯誤的。价值符号直接地只是价格的符号，因而是金的符号，它間接地才是商品价值的符号。金不是像彼得·施萊米尔那样出卖自己的影

子²⁷，而是用自己的影子购买。因此，价值符号起的作用，只是在过程内部对另一个商品代表一个商品的价格，或对每个商品所有者**代表金**。某种相对没有价值的东西，如一块皮、一片纸等等，最初按照习惯变成货币材料的符号，可是，只有在它作为象征的存在得到商品所有者公认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在它取得法定存在而具有强制通用的效力的时候，它才肯定为货币材料的符号。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是**价值符号**的完成形式，是直接**从金属流通或简单商品流通本身中产生出来的纸币的唯一形式**。**信用货币**属于社会生产过程的较高阶段，它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象征性的纸币实际上同金属辅币毫无区别，只是流通范围较广。价格标准或造币局价格的纯技术性的发展以及后来把金块铸成金币的成型工作，已经引起国家的干预，并因此使国内流通和普遍商品流通显然分离，而铸币发展成价值符号，就使这种分离最终完成。货币作为单纯的流通手段只有在国内流通的领域内才能独立存在。

我们的叙述已经证明，金的铸币存在，作为与金的实体本身脱离的价值符号，是从流通过程本身中产生，而不是从协议或国家干预中产生的。俄国提供了价值符号自然产生的鲜明实例。当兽皮和皮货在俄国用作货币的时候，这些不经久不方便的物质和它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之间发生了矛盾，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用打上印记的小块熟皮代替这种物质的习惯，小块熟皮变成了可以兑换兽皮和皮货的凭证。后来它们称作戈比，变成银卢布等分的单纯符号，在某些地方一直用到1700年彼得大帝命令把它们换成国家发行的小铜币为止^①。古代的著作家虽然只能看到金属流通的现象，

^① Henry Storch.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etc. avec des notes par J. B. Say». Paris, 1823, t. IV, p. 79 [亨利希·施托尔希“政治经

但已經把金鑄币理解为象征或价值符号。柏拉图^②和亚里士多德^③就是这样。在信用完全沒有发展的国家,如中国,早就有了强

济学教程。附让·巴·薩伊注釋”1823年巴黎版第4卷第79頁]。施托尔希在彼得堡用法文发表了他的著作。让·巴·薩伊立即在巴黎翻印,并补充了一些所謂“注釋”,实际上这些注釋不过是陈詞滥調。施托尔希对于这位“科学王子”所加的附录絲毫不表示欢迎。(見他的《*Considérations sur la nature du revenu national*》, Paris, 1824 [“論国民收入的性质”1824年巴黎版])

- ② Plato. *De Rep.*, L. II: «νόμισμα ἔμβολον τῆς ἀλλαγῆς», *Opera omnia*, etc., ed. G. Stallbaumius, London, 1850, p. 304 [柏拉图“理想国”第2篇“鑄币是交換的象征”。格·施塔耳鮑姆出版的“文集及其他”1850年倫敦版第304頁]。柏拉图只在当作价值尺度和当作价值符号的两种規定上发展了货币的概念;但是除了那种用于国内流通的价值符号以外,他还要求有另外一种用于希腊同外国的交易的价值符号。(参看柏拉图“論法律”第5卷)
- ③ 亚里士多德“尼科馬赫倫理学”第5編第8章:“货币根据協議成为交換相互需要的唯一的交換手段。它所以称为 νόμισμα,因为它不是天然地,而是通过法律(νόμος)存在的,我們有权改換它,廢除它。”亚里士多德对于货币的認識,比柏拉图全面和深刻得多。他在下面一段話中很好地闡明了,由于不同公社之間的物物交換,如何产生了一种必然性,使一种特殊商品,即一种本身貴重的实体具有货币的性质。“在不足物品的輸入和剩余物品的輸出这种互相帮助在較远的距离之間进行时,就必然采用货币……于是大家同意在相互交換中只收付本身貴重而又便于使用的物品……如铁、銀之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篇第9章。米歇尔·舍伐利埃引用了这段話,他或者是沒有讀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或者是沒有讀通,所以才引用这段話来证明,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意見,流通手段必然由一种本身貴重的实体构成。相反地,亚里士多德說得很明确,作为單純流通手段,货币似乎只是习惯的或法定的存在,这从它的名称 νόμισμα 上已經表示出来,而且从下面这一点上也表示出来,即实际上货币作为鑄币的使用价值,只是从它的职能本身得来的,而不是从它本身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得来的。“货币似乎是一种虛空的东西,不是天然的,而是法定的,因此,它处于流通之外就毫无价值,对任何需要都沒有用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5頁])

制通用的紙幣^①。早期的紙幣擁護者也曾明白地指出，金屬鑄幣是在流通过程本身中轉化為價值符號的。本杰明·富蘭克林^②和貝克萊主教^③就是這樣。

可以把多少令紙切成紙票當作貨幣來流通呢？這樣提出問題是毫無意義的。沒有價值的記號，只有在它們在流通过程中代表金的限度內，才成為價值符號，它們又只有在金本身原來就會作為鑄幣進入流通过程的限度內，才代表金，這個量，在商品交換價值和商品形態變化速度既定的時候，是由金本身的價值決定的。名義為 5 鎊的紙票只能以等於名義為 1 鎊的紙票的 $\frac{1}{5}$ 的數量來流通，而一切用先令票來支付，流通的先令票就等於鎊票的 20 倍。如果用各種不同名義的紙票，例如五鎊票、一鎊票、十先令票等來代表

- ① Mandeville, Sir John. *«Voyages and Travels»*. London, ed. 1705, p. 105 [約翰·孟德維爾爵士“航海與旅行”1705年倫敦版第105頁]：“這個皇帝（中國皇帝）可以無限制地盡情揮霍。因為除了烙印的皮或紙以外，他不支出也不製造任何其他貨幣。當這些貨幣流通太久，開始破爛時，人們把它們交給御庫，以舊幣換新幣。這些貨幣通行全國和各省……他們既不用金也不用銀來製造貨幣”，孟德維爾認為，“因此他可以不斷地無限制地支出”。
- ② Benjamin Franklin. *«Remarks and facts relative to the American paper money»*. 1764, p. 348, l. c. [本杰明·富蘭克林“關於美國紙幣的評論和事實”1764年版，“富蘭克林文集”第348頁]：“目前，連英國的銀幣，就它價值的一部分來說，都不得不是法定的支付手段；這一部分就是它的實際重量和它的名義價值之間的差額。現在流通的先令和 6 辨士銀幣，大部分由於磨損而減輕 5%、10% 或 20%，有些 6 辨士銀幣甚至減輕 50%。在實際價值和名義價值之間的這個差額上，沒有任何內在價值，連一張紙的價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只值 3 辨士的銀幣所以能當作 6 辨士流通，僅僅因為這是法定的支付手段，誰都知道不難把它按同樣的價值交付出去。”
- ③ 貝克萊“提問者”1750年倫敦版第3頁：“當鑄幣的金屬已經消蝕而它的名稱仍被保持的時候，商業流通難道就不能繼續了嗎？”

金铸币，那末这各种不同的价值符号的量，不仅决定于总流通所必需的金量，而且决定于每种纸票的流通范围所必需的金量。如果 1 400 万镑（这是英国银行立法承认的数额，但不是指铸币，而是指信用货币）是某国流通的最低水平，那末可以有 1 400 万张每张一镑的价值符号流通。如果由于生产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增减，金的价值有了增减，那末当同一商品总量的交换价值不变时，流通的镑票就会与金的价值变动成反比地增减。如果作为价值尺度的金被银代替，银同金的价值比例为 1 : 15，而每一张纸票以后代表的银量同它以前代表的金量相等，那末以后流通的镑票将不是 1 400 万张，而是 21 000 万张。因此，纸票的量决定于它们在流通中所代表的金货币的量，而因为它们只有代表金货币才成为价值符号，所以它们的价值只是决定于它们的量。可见，流通的金量决定于商品价格，相反，流通的纸票的价值则完全决定于它自身的量。

国家发行强制通用的纸币（我们这里讲的只是这种纸币）这种干预，似乎废除了经济规律。过去国家规定造币局价格只是给金的一定重量起一个数名，而制造铸币只是把自己的印记加在金上，现在国家似乎用自己的印记的魔术点纸成金。因为纸票有强制通用的效力，所以谁也不能阻止国家任意把大量纸票硬塞到流通中去，并在它们上面印上任意的铸币名称，如一镑、五镑、二十镑。纸票一进入流通，就不可能再抛出来，因为不仅国境界碑阻止它们流出，而且它们在流通之外便失去一切价值，不论是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它们离开自己的职能存在，就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可是，国家的这种权力纯粹是假象。国家固然可以把印有任意的铸币名称的任意数量的纸票投入流通，可是它的控制同这个机械动作一起结束。价值符号或纸币一经为流通所掌握，就受流通的内在规

律的支配。

如果 1 400 万鎊是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金的數額，而國家把 21 000 万張名義為一鎊的紙票投入流通，那末這 21 000 万張紙票就變為 1 400 万鎊金的代表。這就好比國家用鎊票來代表其價值只等於金的 $\frac{1}{15}$ 的另一種金屬，或者用鎊票來代表其重量只等於從前 $\frac{1}{15}$ 的金。除了價格標準的名稱改變外，什麼也沒有改變，而這種名稱自然是約定俗成的，無論它直接地由於鑄幣含金量改變而產生，或間接地由於按照新的、較低的价格標準所需要的量增發紙票而產生。既然現在“鎊”的名稱是指只相當於以前 $\frac{1}{15}$ 的金量，一切商品價格就會增加到以前的 15 倍，於是 21 000 万張鎊票事實上就會同以前的 1 400 万張一樣，全部是必需的。隨着價格符號的總數的增加，每一符號所代表的金量就按同一比例減少。價格的上漲不過是流通過程強制價值符號去等於它們代替流通的金量而產生的反應。

在英法兩國政府貨幣偽造的歷史上，我們一再看到價格不是按照銀鑄幣成色減低的比例而上漲。這只是因為鑄幣增加的比例同鑄幣成色減低的比例不相當，也就是因為金屬成色較低的鑄幣的發行量還不足以使商品的交換價值以後用這種成色較低的金屬當作價值尺度來計算，並且用同這種較低的計量單位相適應的鑄幣來實現。這一點解決了洛克和朗茲的爭論中沒有解決的困難。價值符號——不論是紙或降低了成色的金銀——按什麼比例代表按造幣局價格計算的金銀重量，不是決定於這些符號本身的物質，而是決定於它們在流通中的數量。這個比例所以難於理解，是因為貨幣在作為價值尺度和作為流通手段這兩種職能上受到不僅是相反的、而且似乎是同這兩種職能的对立相矛盾的規律所支配。

在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上，货币只是用作计算货币，而金只是用作观念的金，对于这种职能来说，一切看货币的自然物质而定。交换价值用银计算或表现为银价格，自然完全不同于用金计算或表现为金价格。相反，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上，货币不仅是想像的，而且必须作为实在的东西同其他商品并列，对于这种职能来说，货币材料变得毫无关系，而一切决定于它的数量。对于计量单位来说，有决定意义的是它究竟是1磅金、1磅银、还是1磅铜；而使铸币成为每个这种计量单位的适当体现者的，只是铸币的数量，不论它自己的材料究竟是什么。但是，就只是想像的货币而论，一切决定于它的物质实体，就感觉上存在的铸币而论，一切决定于观念上的数的比例，这一点是同人类的常识相矛盾的。

由此可见，商品价格随着纸票数量的增减而涨跌（这种现象发生在纸票成为唯一流通手段的地方），不过是由流通过程强制实现一个受到外力机械地破坏的规律，即流通中金量决定于商品价格，流通中价值符号量决定于它在流通中所代表的金铸币量。因此，另一方面，不论多少纸币都可以被流通过程所吸收，仿佛被消化掉，因为，价值符号不论带着什么金招牌进入流通，在流通中总是被压缩为能够代替它来流通的那个金量的符号。

在价值符号的流通中，实际货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反着表现出来了，颠倒过来了。金因为有价值才流通，而纸票却因为流通才有价值。已知商品的交换价值，流通的金量决定于金自己的价值，而纸票的价值却决定于流通的纸票的数量。流通的金量随着商品价格涨跌而增减，而商品价格却似乎是随着流通中纸票数量的变动而涨跌。商品流通只能吸收一定量的金铸币，因而流通的货币量交替地紧缩和扩张是必然规律，而纸票却似乎不论增加多少都

可以进入流通。国家发行的鑄币哪怕只少于名义含量 1 % 克冷，就是减低金銀鑄币的成色，因而破坏它們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而国家发行只具有鑄币名称而不包含任何金屬的无价值的紙票，却是执行了完全正确的措施。金鑄币显然只有在商品价值本身用金計算或表现为价格的时候才代表商品价值，而价值符号却似乎直接代表商品价值。由此可知，那些片面地根据强制通用的紙币流通来研究货币流通現象的观察家为什么必定对货币流通的一切內在規律发生誤解。实际上，这些規律在价值符号的流通中不仅顛倒了，并且消失了，因为，当紙币发行数量适当时，紙币完成的并不是它作为价值符号所特有的运动，而它特有的运动不是从商品形态变化直接产生的，而是由于它同金的正确比例遭到破坏产生的。

3. 貨 币

不同于鑄币的货币， $W-G-W$ 这种形式的流通过程的結果，成为 $G-W-G$ （即货币換商品是为了再把商品換成货币）这种形式的流通过程的起点。在 $W-G-W$ 形式中，商品是运动的起点和終点；在 $G-W-G$ 形式中，货币是运动的起点和終点。在前一形式中，货币充当商品交換的媒介，在后一形式中，商品充当货币变成货币的媒介。货币在前一形式中表现为單純的流通手段，在后一形式中表现为流通的最終目的；商品在前一形式中表现为最最終目的，在后一形式中表现为單純的手段。因为货币本身已經是 $W-G-W$ 这种流通的結果，所以在 $G-W-G$ 的形式中，流通的結果同时表现为流通的起点。在 $W-G-W$ 中，物质变换是过程的实际內容，从这第一过程产生的商品的形式存在本身却是第二

过程 $G-W-G$ 的实际内容。

在 $W-G-W$ 形式中，两极是具有同一价值量的商品，但同时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它们的交换 $W-W$ 是真正的物质变换。在 $G-W-G$ 形式中则相反，两极是金，同时是具有同一价值量的金。金换商品是为了再把商品换成金，或者我们就 $G-G$ 这个结果来看，以金换金，似乎是荒谬的。但是，如果把 $G-W-G$ 译成“为卖而买”这个公式，这不过是说金通过一个中介运动来换金，那我们立即就会认识到，这是资产阶级生产的主导形式。可是，人们在实践中不是为卖而买，而是为贵卖而贱买。货币换商品，是为了用这同一商品再去换数量更多的货币，因此两极 G 和 G ，虽然质上并无差异，但是量上是不同的。这种量的差别以非等价物的交换为前提，而这里的商品和货币只是商品本身的对立形式，因而只是同一价值量的不同的存在方式。所以， $G-W-G$ 的循环，在货币和商品的形式后面掩藏着进一步发展了的生产关系，在简单流通范围内，它不过是一种更高级的运动的反映。因此，我们必须从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 $W-G-W$ 中引出不同于流通手段的货币。

金，即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特殊商品，不要社会的进一步协助，就变成货币。在英国，银既不是价值尺度，又不是占统治地位的流通手段，它不成为货币，正如在荷兰，金一失去价值尺度的王位，就不再是货币一样。因此，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可是，作为这样的统一，金又有了一个独立的、同它在两个职能上的存在不同的存在。作为价值尺度，金只是观念上的货币和观念上的金；作为单纯的流通手段，金只是象征性的货币和象征性的金；但在它的简单的金属实体形式上，金是货币，或者

說，貨幣是實在的金。

現在我們對於作為貨幣的、在靜止狀態中的商品金從它同其他商品的关系上來略加考察。一切商品在它們的價格上代表一定數額的金，因而它們只是想像的金或想像的貨幣，只是金的代表，正如反過來貨幣在價值符號上只是商品價格的代表一樣^①。既然一切商品都只是想像的貨幣，貨幣就成了唯一實在的商品。商品只是代表着交換價值、一般社會勞動、抽象財富的獨立存在，而金與商品相反，是抽象財富的物質存在。從使用價值方面看，每種商品通過它們同一種特殊需要的關係，僅僅表現出物質財富的一個要素，財富的個別方面。但是貨幣能滿足任何需要，因為它可以直接轉化成任何需要的對象。它所特有的使用價值，在成為它的等價物的種種使用價值的無限系列上實現。在它的堅固的金屬實體中，它隱秘地包含着在商品世界中展開的一切物質財富。因此，如果商品在它們的價格上代表着一般等價物或抽象財富——金，那末金在它的使用價值上代表着一切商品的使用價值。金因此是物質財富的物質代表。它是 «*précis de toutes les choses*» [“萬物的結晶”]（布阿吉爾貝爾），是社會財富的集成。就形式上說，它是一般勞動的直接化身，就內容上說，它又是一切實在勞動的總匯。它是表現為個體的一般財富^②。在作為流通的媒介的形式上，金受到種種虐待，被刮削，甚至被貶低為純粹象征性的紙片。但是，作為貨幣，金又恢復了它那金光燦爛的尊嚴。它從奴僕變成了

① “不僅貴金屬是物的符號……而且，反過來，物……也是金銀的符號。” A. Genovesi. «*Lezioni di Economia civile*» (1765), p. 281 [安·詹諾韋西“市民經濟學講義” (1765 年版)], 載于庫斯托第編“現代部分”第 8 卷第 281 頁。

② 配第說：“金銀是 «*universal wealth*» [“一般財富”]”，“政治算術”第 242 頁。

主人^①。它从商品的区区帮手变成了商品的上帝^②。

(a) 货币贮藏

金最初作为货币同流通手段分开，是由于商品中断了自己的形态变化过程，并在它的金蛹形式上停顿下来。每逢卖不转为买，就会出现这种情形。因此，金作为货币独立起来，首先是流通过程或商品的形态变化分裂为两个彼此孤立的、互不相关的行为的明显表现。铸币的行程一经中断，铸币本身就变成货币。铸币在用商品换得它的那个卖者手中是货币，不是铸币；一离开他的手，它又变成了铸币。每一个人都是他所生产的单方面的商品的卖者，

- ① E. Misselden. «Free trade or the means to make trade flourish etc.», London, 1622 [爱·米塞尔登“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之道”1622年伦敦版]。“贸易的自然对象是商品，which merchants from the end of the trade have stiled comodities [即商人在业务上称为货物的东西]。贸易的人为对象是货币，它被称为 sinewes of warre and of state [战争和国家的神经]。货币无论从性质上说或从时间上说都是在商品之后出现的，yet for as much as it is now in use has become the chiefe [虽然如此，现在它在实践中却居于首要地位]。”(第7页)他把商品和货币比作“老雅各的两个儿子，雅各把右手放在小儿子身上，把左手放在大儿子身上”(同上)。Boisguillebert. «Dissert. sur la nature des richesses etc.», l. c. (p. 395, 399) [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的本性”，载于欧仁·德尔编“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1卷(第395、399页)]中说：“于是，在这里，贸易的奴隶变成了贸易的主人…… 人民的苦难的产生，就是由于人们使过去的奴隶成了主人，或者不如说，成了暴君。”
- ② 布阿吉尔贝尔说：“人们把这些金属(金、银)变成了偶像，人们忘记了把它们召到贸易中来的企图和目的是为了使它们在交换和相互交付中充当抵押品，而几乎让它们解脱了这种任务，把它奉为神明。为了它们，人们牺牲了并且仍然牺牲着许多财富、重要的需要、甚至人的生命，而且比在愚昧的古代为其假神牺牲的还多。”(同上，第395页)

又是他为了社会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其他商品的买者。他以卖者身分出現是以他的商品在生产上所需要的劳动時間为轉移，而他以买者身分出現是由他的生活需要的不断更新决定的。他要能够不卖而买，他必須曾經卖而不买。事实上， $W-G-W$ 的流通，只是由于同时是卖和买不断分裂的过程，才是卖和买在过程中的統一。貨幣要作为鑄币而不断地流动，鑄币就必須不断地凝結为貨幣。鑄币的不断流通，以鑄币的或多或少的一部分不断停頓下来成为鑄币准备金为条件，这种准备金在流通内部到处发生，同时成为流通的条件，这种准备金的形成、分配、消失和恢复經常更替着，它的存在不断消失，它的消失不断存在。关于鑄币变貨幣、貨幣变鑄币的这种不息的轉化，亚当·斯密这样說过：每一个商品所有者除了他所出卖的特殊商品之外，必須經常准备一定数額用于购买的一般商品。我們知道，在 $W-G-W$ 的流通中，第二个环节 $G-W$ 分裂为許多次买，它們在時間上不是一下完成，而是先后完成的，因此 G 的一部分作为鑄币而流通，另一部分則作为貨幣而停留。貨幣在这里实际上不过是暫歇的鑄币，流通中的鑄币总量的各个組成部分，总是时而以这种形式，时而以那种形式交替出現。因此，流通手段变成貨幣的这个第一种轉化，仅仅是貨幣流通本身的一个技术因素^①。

財富的最初的自然发生的形式，是剩余或过剩的形式，是并非

① 布阿吉尔貝尔从这个 *perpetuum mobile* [永动机] 的初次变为不动，即从它的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存在的否定中，立即察觉到貨幣对商品關独立。他說：貨幣應該处于“不断的运动中，只有它是可动的，它才能是这样，一旦它不动了，就一切都完了”（見“法国詳情”第 213 頁）。他沒有看到貨幣的这种靜止是它的运动的条件。实际上他是要說，商品的价值形式不过是它們的物质变换的瞬息間的形式，决不應該作为目的本身固定下来。

作为使用价值而直接需要的那一部分产品，或者说，是对那些其使用价值不属于最需要范围的产品占有。在研究从商品到货币的过渡时，我们已知，在尚未发达的生产阶段上，正是产品的这种剩余或过剩形成商品交换的固有范围。剩余产品变成可以交换的产品即商品。这种剩余的最适当的存在形式是金和银，这是财富被当作抽象的社会财富保存时采取的第一种形式。商品不是只能在金银的形式上被保存，就是说，不是只能在货币材料中被保存，然而金银却是在被保存形式上的财富。每种使用价值本身都是由于被消费，即被消灭而起使用价值的作用。但是，作为货币的金的使用价值，是去充当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是作为无定形的原料去充当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作为无定形的金属，交换价值取得了一种永久的形式。这样作为货币而静止下来的金银就是贮藏货币。在纯粹以金属流通的民族如古代民族中，货币的贮藏是从个人到国家普遍进行的一个过程，国家保护着自己的国库。在更古的时代，在亚洲和埃及，国王和僧侣保护下的这种贮藏货币，毋宁说是他们的实力的见证。在希腊和罗马，建立国库成了一种政策，国库被看成是剩余品的永保安全而随时可用的形式。这种贮藏货币被侵略者从一国迅速移往他国，以及它的一部分突然涌入流通，是古代经济的特点。

作为物化劳动时间，金保证了它自己的价值量，而且由于它是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流通过程就保证了金能经常作为交换价值发生作用。正是由于商品所有者能够把商品在其交换价值形式上保存，或者说，能够把交换价值本身当作商品保存，那种为了在金这个转化形式上收回商品而进行的商品交换就成了流通本身的动机。商品的形态变化 $W-G$ ，就是为了商品的形态变化本身，为了

商品从特殊自然財富轉化为一般社会財富。形式变換代替物质变換而成了目的本身。交換价值从單純的形式变成了运动的內容。商品只有当它保持在流通領域的时候,才能作为財富、作为商品保持下来,只有当它硬化为金銀的时候,才能保持这种流动状态。它是作为流通过程的結晶而保持流动状态的。同时,金銀本身只在不是流通手段时才固定为貨幣。作为非流通手段,它們变成了貨幣。因此,把商品在金的形式上从流通中抽出,是使它經常保持在流通中的唯一办法。

商品所有者只能把他作为商品投入流通的东西从流通中作为貨幣收回。因此,从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經常地卖、不断地把商品投入流通,是貨幣貯藏的第一个条件。另一方面,貨幣作为流通手段不断地在流通过程本身中消失,因为它經常实现为使用价值而化为短暫的享受。因此,貨幣必須从吞沒一切的流通洪流中被拯救出来,或者說,商品必須被固定在它的第一形态变化上,这样,貨幣就被阻止去履行它的购买手段的职能。現在变成貨幣貯藏者的商品所有者必須尽量多卖,尽量少买,正如老卡托所教导的: *patrem familias vendacem, non emacem esse*²⁸。如果勤劳是貨幣貯藏的积极条件,节儉便是貨幣貯藏的消极条件。从流通中取出商品等价物,以特殊商品或使用价值形式取出的越少,以貨幣或交換价值形式取出的就越多^①。因此,要占有一般形式的財富,就要放棄物质的現实的財富。因此,推动貨幣貯藏的活力是吝嗇,对吝嗇說来,所需要的不是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而是作为商品的交換价值。要取得一般形式的剩余物,就必须把特殊的需要当作奢

① “商品的儲存越多,貯藏貨幣(in treasure)的儲存越少。”爱·米塞尔登“自由貿易或貿易繁榮之道”第23頁。

侈和浪费。例如，1593年西班牙议会给菲力浦二世的呈文中说：

“伐利亚多利德的议会在1586年曾请求陛下不再准许蜡烛、玻璃器皿、珠宝、刀子等类物品向王国进口；这些对人类生活无用的东西从外国运来是为了换取黄金，西班牙人似乎成了**印第安人**。”

货币贮藏者蔑视世俗的、一时的、短暂的享受，追求既不蛀又不锈、完全是天上的又完全是人间的永恒的财宝。米塞尔登在前面所引的著作中说：

“我们缺乏黄金的总的根本的原因，是我国消费外国商品太多，事实上，这些商品对于我们不是 commodities [有益之物]，而是 discommodities [无益之物]，因为它们使我们丧失了许多本来可以代替这些玩意(toys)进口的财宝。我们消费了过多的西班牙的、法兰西的、莱茵区的和近东的葡萄酒，西班牙的葡萄干，近东的无核小葡萄干，埃诺的细麻布（一种上等麻布）和细棉布，意大利的丝绸，西印度的糖和烟草，东印度的香料，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绝对必需**的物品，可是这些东西都得用真金来买。”①

在金银的形式上，财富是长久的，一方面这是因为交换价值存在于不朽的金属中，另一方面特别是因为金银被阻止作为流通手段去变成只是商品的瞬息间的货币形式。于是，暂时的内容为长久的形式牺牲了。

“如果通过税收把一个人用在吃喝上的货币拿来，交给另一个人去改良土地、捕鱼、开矿、办工厂、甚至做衣服，对于社会总有好处，因为即使衣服也不像吃喝那样不长久。如果把货币用来购买家具，好处就更大，用来盖房子等等，好处还要大，而好处最大的，是把金银运回国内，因为只有金银不会毁坏，并且不论何时何地都被当作财富；而其他一切东西只是 pro hic et nunc [一时一地的] 财富”②。

把货币从流通洪流中拯救出来而不让它参与社会的物质变

① 米塞尔登“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之道”第11--13页及以下各页。

② 配第“政治算术”第196页。

換，還明顯地表現為窖藏，這樣一來，社會的財富變成了地下的長久的庫藏，與商品所有者發生一種完全秘密的私的關係。在德里的奧朗則布的宮殿里住過一段時間的貝爾尼埃博士，曾談到商人們，特別是幾乎掌握了全部貿易和貨幣的不信回教的異教徒，怎樣把他們的貨幣秘密地、深深地埋在地里；他們

“深信生前埋下的金銀，對他們死後在另一個世界裡有用。”^①

可是，只要貨幣貯藏者的禁欲主義與勤勞相結合，在宗教上他就實際上成了新教徒，尤其是清教徒。

“不可否認，買賣是必需的，沒有它是不行的；人們盡可以按照基督教的道理來購買，特別是購買必需品及和體面有關的東西，因為就是長老們也會買賣過牲畜、羊毛、谷物、牛油、牛奶等物品。這是上帝從大地拿來分配給人類的賜物。但是對外貿易從加爾各答、印度等地運回的商品，是貴重的絲綢、金器和香料，只供奢侈而別無用處，耗費了國家和人民的金錢；如果我們有統一的政權和君主，就不應該允許這種對外貿易存在。但是關於這一點我現在不想多寫，因為我認為，當最後我們已經不再有錢的時候，這種貿易自然就會終止，奢侈和大吃大喝也是如此，因為不到貧困逼着我們的時候，文章和說教都是徒然的。”^②

① François Bernier. «Voyage contenant la description des états du Grand Mogol», tome I, conf. p. 312—314 [弗朗斯瓦·貝爾尼埃“大莫臥兒帝國游記”第1卷第312—314頁] 1830年巴黎版。

② Dr. Martin Luther. «Bücher vom Kaufhandel und Wucher». 1524 [馬丁·路德博士“論商業與高利貸”1524年版]。路德在同一個地方說：“上帝把我們德國人置於這樣的境地：我們不得不讓自己的金銀流到外國，讓全世界變富而自己淪為乞丐。如果德國不買英國的布，英國的金就沒有這麼多；如果我們不買葡萄牙的香料，葡萄牙國王的金也會少些。要是你計算一下，通過法蘭克福一個集市有多少金錢毫無必要和毫無理由地從德國運出，你就會奇怪，怎麼在德國境內還會留下一個銅板。法蘭克福是金銀的豁口，通過這個豁口從德國流出的，是在我們這裡剛剛湧現、產生、鑄造或打成的東西；如果堵塞這個

在社会的物质变换发生动荡的时期，甚至在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货币也会作为贮藏货币而窖藏起来。社会联系(对于商品所有者来说，这个社会联系在于商品，而商品的最适当的存在是货币)在其坚固的形式上从社会的运动中被救了出来。社会的 *nervus rerum*^③ 和它所依附的肉体一起被埋葬了。

如果贮藏货币不是经常渴望流通，它就仅仅是无用的金属，它的货币灵魂就会离它而去，它将变成流通的灰烬，流通的 *caput mortuum*^④。货币，或独立化了的交换价值，按它的质来说，是抽象财富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任何一定的货币额都是量上有限的价值量。交换价值的量的界限同它的质的普遍性发生矛盾，货币贮藏者感到这个界限是障碍，而这个障碍事实上同时就变成了质的障碍，换句话说，使贮藏货币仅仅成为物质财富的有限的代表。我们已知，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直接表现在一个等式中，它自己成为等式的一边，商品的无限系列则成为等式的另一边。货币

豁口，现在就会听不到这样的怨言：到处都只有债务而没有货币，乡村和城市都受着高利贷的盘剥。但是，该怎么就怎样吧；我们德国人应该始终是德国人！我们决不罢休，我们应该干。”

米塞尔登在“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之道”中希望把金钱至少保留在基督教国家的范围内。他说：“由于同土耳其、波斯和东印度等非基督教国家进行贸易，货币减少了。这种贸易大部分是用现金进行的，但是这和基督教国家之间的贸易完全不同。因为基督教国家之间的贸易虽然也用现金，但这些现金仍保留在基督教国家内。基督教国家之间进行的贸易中实际上也有货币的顺流和逆流，涨潮和退潮，因为这个国家欠缺，那个国家有余，有时这个地方的货币多，那个地方的货币少；货币在基督教国家范围内来回周转，但始终没有超出它的范围。可是用来同上述非基督教国家进行贸易的货币，就总是不断支出而永不返回。”

③ 直译是：物的神经；转意是：万物的动力。——编者注

④ 直译是：骷髅；这里的意思是：残渣。——编者注

在实现自己的时候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这样的无限系列，也就是说，货币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它是交换价值这个概念，决定于交换价值的量。交换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自动器的运动，只能是突破它的量的界限的运动。但是当贮藏货币的一个量的界限被超越时，就又有另一个新的障碍，必须再加以克服。表现为障碍的，不是贮藏货币的某一个界限，而是它的任何一个界限。因此，货币贮藏在它本身并无任何内在的界限，并无任何限度，它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它每次的结果中就有再次开始的动机。贮藏货币只有保存才能增加，它也只有增加才能保存。

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并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这种欲望本质上是 *auri sacra fames* [万恶的求金欲]^①。致富的欲望与追求特殊的自然财富或使用价值（如衣服、首饰、畜群等等）的欲望不同，只有在一般财富本身个体化为一种特殊物品，因而可以当作单独的商品保存的时候，才可能发生。因此货币既表现为致富欲望的对象，同样又表现为致富欲望的源泉^②。实际上成为基础的是，交换价值本身及其增加成了目的。吝啬死守着贮藏货币，不让货币变成流通手段，但是求金欲保持着贮藏货币的货币灵魂，保持着它对于流通的经常的渴望。

这样，贮藏货币借以形成的活动，一方面是通过不断重复的卖从流通中取出货币，另一方面是简单的收藏、积累。事实上，只有在简单流通范围内，而且正是在货币贮藏的形式上，才有真正的财

① 引自罗马诗人维吉尔的长诗“亚尼雅士之歌”。——译者注

② “货币是吝啬之源……这里逐渐燃起一种狂热，这已经不是吝啬而是求金欲了。” Plin. «Hist. nat.», I. XXXIII, c. III, [sect. 14] [普林尼“博物志”第33卷第3章第14节]。

富积累，至于其他的所謂积累形式，我們在下面会看到，只是由于濫用名詞，只是由于联想起簡單的貨幣积累，才被当作积累。其他一切商品，或者当作使用价值来积累，这时，它們的积累方法决定于它們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例如，粮食的积累需要有特殊的設備。积累羊群使我变成牧人，积累奴隶和土地使主奴关系成为必要，等等。特殊財富的儲备要有不同于积累本身这种簡單行为的特殊过程，并且发展着个性的特殊方面。或者是，把商品形式的財富当作交换价值来积累，这时，积累就表現为一种貿易业务或特殊經濟业务。經營这种业务的人变成粮商、畜販等等。金銀所以是貨幣，不是由于积累金銀者个人的任何活动，而是由于沒有这种个人的协助而进行着的流通过程的結晶。他別的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把金銀放在一边，一两又一两地堆积起来就行了，这是一种毫无內容的活动，这种活动如果应用在其他一切商品上，就会使商品丧失价值^①。

① 賀雷西的下面这几句詩表明他完全不懂貨幣貯藏的哲学 (Satir. L. II, Satir 3. [諷刺詩第二卷第三首]):

“买来弦琴置一旁，不爱音乐不彈唱，
不作鞋匠买刀剪，不去航海买帆桨；
世間若有这等人，誰不說他是疯狂。
今有人焉攬黄金，黄金到手即埋藏，
平生不敢动銖两，試問此人狂不狂？”

西尼耳先生却比較了解，他說“貨幣似乎是唯一的普遍要求的东西，这是因为貨幣是**抽象的財富**，人們有了貨幣，就可以滿足自己的一切需要，不管是哪一種”。《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Ec. pol.》，traduit par le comte Jean Arrivabene, Paris, 1836, p. 221 [“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让·阿里瓦本伯爵譯 1836 年巴黎版第 221 頁]；施托尔希也說：“因为貨幣代表着一切其他財富，人們只要把貨幣积累起来，就可以取得世界上一切种类的財富。”（“政治經濟學教程”第 2 卷第 135 頁）

我們的貨幣貯藏者表現為交換價值的殉道者，坐在金塔頂上的神聖的禁欲主義者。他關心的只是社會形式的財富，因而他把這種財富埋藏起來不讓社會見到。他追求的是具有永遠適於流通的形式商品，因而他把這種商品從流通中抽出。他熱衷於交換價值，因而他不進行交換。財富的流動形式和財富的化石，長命之漿和哲人之石，像在煉金術中一樣，彼此瘋狂地糾纏着。為了想像中的無限享受，他放棄了一切享受。因為他希望滿足一切社會需要，他就幾乎不去滿足必需的自然需要。他把財富保存在它的金屬實體中，他也就把財富化成幻影。但實際上，為貨幣而積累貨幣是為生產而生產的野蠻形式，也就是社會勞動生產力超越慣常需要的界限的發展。商品生產愈不發達，交換價值的最初獨立化為貨幣即貨幣貯藏就愈為重要；因此，在古代各民族，在直到目前為止的亞洲，在交換價值尚未掌握所有生產關係的現代農業民族中，貨幣貯藏起着重大的作用。我們現在就要考察貨幣貯藏在金屬流通本身中的特殊的經濟職能，但我們先指出貨幣貯藏的另一種形式。

金銀制的商品不管具有什麼樣的美學屬性，既然它們用的材料是貨幣材料，那就可以轉化成貨幣，就像金幣或金條可以轉化成這些商品一樣。因為金銀是抽象財富的材料，所以炫耀財富的最好方法是把它們用作具體的使用價值，如果商品所有者在一定的生產階段上把貨幣藏起來，那末只要安全，他總是力圖在別的商品所有者面前以 *rico hombre* [大財主] 的姿態出現。他把自己和自己的家鍍上黃金^①。在亞洲，特別是在印度，貨幣貯藏不像在

① 就在商品所有者已經變得文明而發展為資本家的時候，他的 *inner man* [本

資產階級經濟中那樣表現為總生產機構的附屬功能，這種形式的財富卻總是被當作最後的目的，在那裡，金銀制的商品實質上不過是貯藏貨幣的美學形式。在中世紀的英國，由於加在金銀制的商品上的那一點粗糙勞動使它們的價值增加得很少，因此在法律上金銀制的商品只是被看作貯藏貨幣的一種形式。它們的目的是重新投入流通，因此它們的成色定得完全同鑄幣本身的成色一樣。用作奢侈品的金銀隨着財富的增加而增加，這個很簡單的事實，在古代人看來，是十分明白的^②，可是現代經濟學家卻提出了錯誤的論點，說金銀制的商品的使用不是按照財富增加的比例而增加，而只是按照貴金屬價值跌落的比例而增加。因此，他們關於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金的消費情況的資料，在其他方面雖然確實，但是總有一個缺陷，因為用作原料的金的消費量的增加不是像他們想像的那樣有相應的金價值的降低來證明。從1810年到1830年間，由於美洲殖民地同西班牙的戰爭²⁹以及革命所引起的礦山勞動的停頓，貴金屬的平均年產量減少了一半以上。1829年在歐洲流通的鑄幣比1809年減少了几乎 $\frac{1}{6}$ 。可見，雖然產量減少了，生產費用——如果有變動的話——增加了，但是，英國在戰時，大陸從巴黎和會時起，用作奢侈品的貴金屬的消費量却大大地增加了。它隨着一般財富的增加而增加了^③。作為一般的規律可以這樣說：在和平時，以金銀貨幣變成奢侈品為主，只有在動蕩的局面下，

性]也絲毫沒有改變，這可以從下面的例子得到證明：有一個國際銀行的倫敦代理人，把一張十萬鎊的銀行券裝在鏡框里當作恰當的家徽。妙在這張銀行券嘲笑而高傲地俯視着流通。

② 見后面色諾芬的話。

③ 杰科布“貴金屬生產和消費的歷史研究”第2卷第25章和第26章。

才以奢侈品倒过来变成条块或鑄币为主^①。从下面的情况可以看出，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金銀貯藏貨幣同充当貨幣的貴金屬对比起来占的比例是多么大：在 1829 年，据杰科布說，在英国这个比例是 2:1，而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貴金屬比以貨幣形式存在的貴金屬多 $\frac{1}{4}$ 。

我們已經知道，貨幣流通不过是商品形态变化的表現，或者說，不过是社会的物质变换所借以實現的形式变换的表現。因此，流通中的金的总量，一方面随着流通中的商品的时时变动的价格总额或同时发生的商品形态变化的規模，另一方面随着商品形式变换每次的速度，必須不断地擴張或收縮；这一点只有在一国的貨幣总量与流通中的貨幣量之比不断发生变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个条件是靠貨幣貯藏來實現的。如果价格跌落或流通速度提高，貯藏貨幣的蓄水池就吸收从流通中游离出来的那部分貨幣；如果价格上涨或流通速度降低，貯藏的貨幣便开放，有一部分就回到流通中去。流通中的貨幣凝結为貯藏貨幣和貯藏貨幣注入流通，是一种不断交替的摆动；在摆动中哪一个方向占优势，完全是由商品流通的摆动决定的。这样，貯藏貨幣就表现为流通中的貨幣的引水渠和排水沟，因而，当作鑄币而流通着的，总只是由流通本身的直接需要所規定的貨幣量。如果总流通量突然扩大，卖和买的流暢的統一占着主导地位，因而待實現的价格总额比貨幣流通速度增长得更快，貯藏貨幣就显著地縮减；一旦总的运动異常停滯，或者卖和买的分离加强，流通手段就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凝結为貨

① “在动蕩不安的时期，特別在內乱外患时期，金銀器急速变成貨幣；而在太平繁荣时期，貨幣就变成食具和飾品。”（杰科布“貴金屬生产和消費的历史研究”第 2 卷第 357 頁）

幣，貯藏貨幣的蓄水池就大大超過平均水平。在純粹用金屬流通的或者處於不發達的生產階段的國家，貯藏貨幣無限零散，遍布全國各地，但在發達的資產階級國家，它就集中到銀行的金庫中了。不能把貯藏貨幣同鑄幣準備金混為一談，鑄幣準備金本身是經常處在流通中的貨幣總量的一個組成部分，而貯藏貨幣與流通手段的能動的關係卻以流通中的貨幣總量的減少或增加為前提。前面已經說過，金銀制的商品同樣既是貴金屬的排水溝，又是貴金屬的潛在來源。但在平時，對於金屬流通的經濟來說，只有它們的第一種職能是重要的^①。

(b) 支付手段

到現在為止貨幣不同於流通手段的兩種形式，是**暫歇的鑄幣**的形式和**貯藏貨幣**的形式。第一種形式在鑄幣暫時轉化成貨幣中反映出， $W-G-W$ 的第二環節即買 $G-W$ ，在一定流通範圍內

① 在下面的一段話中，色諾芬把貨幣在其作為貨幣和貯藏貨幣的特殊形式規定性上作了論述：

“在我所知道的一切部門中，只有這一部門的新企業家不引起舊企業家的妒忌……銀礦越豐富，它的採銀量越大，它吸引到這種勞動上的人也越多。實際上，當家庭中有足夠的家具時，人們便很少再去添置；可是，誰的銀也不會多到不想再要的地步，如果真有人覺得太多，他會把多餘部分埋藏起來，他所感到的喜悅，不會比使用這些錢時少。當國家繁榮時，國民特別需要銀；男人除了優良的武器以外還想买駿馬、豪華的房屋和設備，女人需要各種服裝和金飾；如果國家遭受歉收或戰爭，那末由於田地荒蕪，為了取得糧食，或者為了招募補充兵員，都需要貨幣……” Xen. «De vectig.», c. IV [色諾芬“賦稅論”第4章]。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第1篇第9章中，用“經濟”和“貨殖”兩個名詞，在對立中論述了 $W-G-W$ 和 $G-W-G$ 這兩種流通的運動。希臘的悲劇作家們，特別是歐里庇得斯，把這兩種形式作為 $\delta\acute{\iota}\chi\eta$ [公正] 和 $\kappa\acute{\epsilon}\rho\delta\omicron\varsigma$ [貪欲] 對立起來。

必然分裂为一系列先后相继的买。而货币贮藏只是基于 W—G 行为的孤立,即不向 G—W 继续发展,或者说,它只是商品第一形态变化的独立发展,是作为一切商品转移后的存在而发展起来的货币,同商品在其不断转移形式上的存在即流通手段正相反。铸币准备金和贮藏货币之成为货币,只因为它们是非流通手段,而它们之所以成为非流通手段,只因为它们不流通。我们现在要在这样一个规定上研究货币,在这个规定上,货币流通着,或者说,货币进入流通,但是,它并不履行流通手段的职能。作为流通手段,货币总是购买手段,现在,它却作为非购买手段起作用。

货币一旦由于货币贮藏而发展成为抽象社会财富的存在和物质财富的物质代表,它就在它这一个当作货币的规定性上,在流通过程内部取得特殊的职能。如果货币当作单纯的流通手段、因而当作购买手段流通,这就表示商品和货币同时对立着,因而同一个价值量具有二重形式:在一极上是在卖者手中当作商品,在另一极上是在买者手中当作货币。两个等价物在对立两极的这种同时存在,以及它们同时变换位置或相互转移,又是表示卖者和买者只是作为现有等价物的所有者相互发生关系。可是,产生货币的各种形式规定性的商品形态变化过程,使商品所有者也发生形态变化,或者说,改变着他们出现时彼此所具有的社会身分。商品监护人在商品形态变化过程中,每逢商品发生一次变化或货币采取一种新形式,就改变一次自己的外皮。例如,商品所有者最初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对立着,后来一个成为卖者,另一个成为买者,然后每一个都交替地作买者和卖者,后来又成为货币贮藏者,最后成为富人。可见,商品所有者走出流通过程的时候,同他走进流通过程的时候不一样了。实际上,货币在流通过程中所取得的各种形式

規定性,不过是商品本身的結晶了的形式变换,而这种形式变换又不过是商品所有者借以完成其物质变换的那种变化着的社会关系的物化表现。在流通过程中产生了新的交往关系,而商品所有者作为这种改变了的关系的承担者,就获得了新的经济身分。正如在国内流通过程中,货币把自己观念化,单纯一张纸片就作为金的代表来履行货币的职能一样,这同一个过程又使那些作为货币或商品的单纯代表而进入流通过程的、即代表着未来货币或未来商品的买者或卖者,具有现实的买者或卖者的效力。

金发展为货币时的一切形式規定性,不过是商品形态变化中所包含的那些規定的展开,那些規定在简单货币流通中,在货币作为铸币的表现中,或在作为过程中的统一的 $W-G-W$ 运动中,还没有分化为独立的形式,或者像商品形态变化的中断那样还只是表现为一种可能性。我們已经知道,在 $W-G$ 过程中,作为实际的使用价值和观念上的交换价值的商品同作为实际的交换价值和只是观念上的使用价值的货币发生关系。当卖者把商品当作使用价值转移时,他就实现了商品自己的交换价值和货币的使用价值。相反,当买者把货币当作交换价值转移时,他就实现了货币的使用价值和商品的价格。与此相应,发生了商品与货币的位置变换。现在,这个两极对立的活的过程,在它实现的时候又重新分裂开来。卖者实际转移商品,但最初只在观念上实现商品的价格。他已经把它照它的价格卖出,但是它的价格只是后来在约定的时间才实现。买者作为未来货币的代表者来买,而卖者则作为现在商品的所有者来卖。就卖者方面说,商品当作使用价值实际上被转移了,却没有当作价格实际上被实现;就买者方面说,货币实际上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实现了,却没有当作交换价值实际上被转移。

从前，是价值符号象征地代表貨幣，而这里，是买者本身象征地代表貨幣。但是，正如从前价值符号的一般象征要求国家的保证和規定其强制流通一样，現在买者的人身象征則在商品所有者之間引起一种法律上有强制性的私人契約。

相反，在 G—W 过程中，貨幣可以在其使用价值实现之前，或者說，在商品轉移之前，作为现实的购买手段轉移出去，从而实现商品的价格。例如通常的預付貸款的形式就是如此。英国政府向印度农民购买鴉片时就是采取这种形式，駐俄国的外商购买俄国农产品时大部分也是采取这种形式。但是，这里貨幣不过是在我們已經知道的购买手段的形式上起作用，因此并没有取得新的形式規定性^①。所以我們对于这种情况就不再多說；不过关于 G—W 和 W—G 这两个过程在这里所借以表現的那种轉化形式，我們必須指出：买和卖之間的區別，在流通中直接出現时只是想像的區別，現在却变成了现实的区别，因为，在一种形式上，只有商品存在着，在另一种形式上，只有貨幣存在着，在两种形式上，都只有过程开始的那一极存在着。此外，这两种形式的共同点是，在这两种形式中，等价物之一只存在于买卖双方的共同意志中，这种共同意志約束着双方，并且取得一定的法律形式。

卖者和买者变成了債权人和債務人。如果先前作为貨幣貯藏者的商品所有者曾經扮演了可笑的角色，那末現在他却变成了可怕的人物，因为現在他不是把自己而是把他的邻人看成一定貨幣額的存在，他不是把自己而是把他的邻人变成为交换价值的殉道者。他从信徒变成了債主，他从宗教走进了法律。

^① 誠然，資本也是以貨幣形式預付的，預付貨幣可以是預付資本；可是这个观点不屬於簡單流通的範圍。

«I stay here on my bond!»

〔“我照契約行事!”〕^①

因此，在 W—G 的这个改变了的形式中，即在商品存在着而货币只是被代表着的形式中，货币首先起着价值尺度的作用。商品的交换价值用货币来计算，把货币当作它的尺度；但是价格，作为在契約上规定的交换价值，不仅存在于卖者的头脑中，而且同时也是买者所负的义务的尺度。其次，货币在这里起着购买手段的作用，虽然它不过是把自已的未来存在的影子投射在自已面前。这也就是，它使商品离开自己的位置，把商品从卖者手中转入买者手中。一旦契約到期，货币就进入流通，因为它变换位置，从过去的买者手里转入过去的卖者手里。但是它进入流通，不是作为流通手段或购买手段。它作为这种手段起作用，是早在它存在之前，它的出现，是在它已经不再作为这种手段起作用之后。它进入流通，倒是作为商品的唯一适当的等价物，作为交换价值的绝对存在，作为交换过程的最后一言，总之，是作为货币，而且是作为起一般支付手段这个特定职能的货币。在这个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上，货币表现为绝对商品，但是不像贮藏货币那样在流通之外，而是在流通之内。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差别，会在商业危机时期令人非常不快地显露出来^②。

产品在流通过程中转化为货币最初只是表现为商品所有者的个人的必需，因为他的产品对他并不是使用价值，只有通过转移之后才对他使用价值。但是，为了在契約到期时支付，他就必须先

① 引自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编者注

② 马克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了一个注：“路德曾着重指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差别。”——编者注

把商品出賣。所以，這種出賣，與他的個人需要完全無關，已經由於流通過程的運動變為他的一種社會必需。作為某種商品的過去的買者，他被迫成為另一種商品的賣者，不是為了取得作為購買手段的貨幣，而是為了取得作為支付手段、作為交換價值的絕對形式的貨幣。作為終結行為的由商品向貨幣的轉化，或者說，作為目的本身的商品第一形態變化，在貨幣貯藏上曾經彷彿是商品所有者的隨心所欲的行為，現在卻成瞭一種經濟職能。為支付而賣的動機和內容，是從流通過程本身的形式中產生的內容。

在賣的這一形式中，商品變換自己的位置，流通着，可是它推遲自己的第一形態變化，即推遲自己向貨幣的轉化。從買者方面說則相反，在第一形態變化完成之前，即商品向貨幣轉化之前，就完成第二形態變化，即貨幣向商品逆轉化。因此，在這裡，第一形態變化在時間上晚於第二形態變化。因此，貨幣，即商品在其第一形態變化中的形態，獲得了新的形式規定性。貨幣，或者說交換價值的獨立發展，已不再是商品流通的中介形式，而是它的最終結果。

賣的兩極在時間上分離開來的這種**期賣**，是從簡單商品流通中自然產生的，這一點無需詳細證明。首先，流通的發展使得同一一些商品所有者彼此反復地作為賣者和買者交替出現。這種反復出現，並不只是偶然的，而是，例如說，約定在未來的某一期限交出商品和付清款項。在這種情況下賣是在觀念上完成的，也就是說在這裡是在法律上完成的，並無具體的商品和貨幣出現。這裡，作為流通手段和作為支付手段的兩種貨幣形式還結合在一起，因為一方面貨幣和商品同時變換位置，另一方面貨幣並非购买商品，而是實現過去賣出的商品的价格。其次，許多使用價值的性質，使得使用價值不是在商品實際移交的時候被轉移，而是在商品使用了

一定期限之后才真正被转移。例如，把房屋的使用权出卖一个月时，虽然房屋在月初已经移交，但是它的使用价值要到月底才转移完毕。这里，由于使用价值的实际移交同它的真正转移在时间上是彼此分开的，所以它的价格的实现也就迟于它的位置变换。最后，各种商品在生产上有时间长短和先后的不同，使得这个人作为卖者出现时，别一个人还不能作为买者出现；当买卖在同一些商品所有者之间更加频繁地反复进行的情况下，卖的两个要素就适应着他们的商品的生产条件而彼此分离开来。在商品所有者之间就发生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这种关系虽然是信用制度的自然基础，但是可以在信用制度存在之前就十分发达。然而很明显，随着信用事业的发展，因而随着一般资产阶级生产的发展，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将靠缩小其作为购买手段的职能，尤其是缩小其作为货币贮藏因素的职能而扩展起来。例如，在英国，当作铸币的货币几乎完全被排挤到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零售贸易和小额贸易的领域之内，而当作支付手段的货币则在大规模交易的领域内居于支配地位^①。

货币作为一般支付手段，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这最初

^① 麦克劳德先生虽然以教条式地下定义而自鸣得意，可是他这样不理解最基本的经济关系，竟认为货币起源于最发达的货币形式，即支付手段的形式。他说：因为人们需要相互的服务并不总是同时的，而且价值量也不相等，“于是第一人就要对第二人支付一些差额或一定量的服务，——这就是债务”。这个债务的债主需要第三人的服务，但第三人并不直接需要他的服务，于是他“把第一人欠他的债转给第三人。债券就这样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人的手里，——这就是流通…… 当一个人得到用金属货币表示的债券时，他不仅能够支配原来债务人的服务，而且能够支配整个生产社会的服务”。Macleod.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anking etc.»*. London, 1855, v. I, ch. 1 [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1855年伦敦版第1卷第1章]。

仅限于商品流通領域之內^①。可是，随着它的这一职能的发展，其他一切支付形式都漸漸地变为貨幣支付。貨幣发展成为唯一的支付手段的程度，表示交換价值在深度和广度上掌握生产的程度^②。

作为支付手段流通的貨幣量首先决定于支付总额，即已轉移的商品的价格总额，而不是像在簡單貨幣流通中那样决定于待轉移的商品的价格总额。可是，这样决定的总额，受着两种情况的校正：第一，是同一块貨幣重复这同一职能的速度，或者说許多笔支付形成一个过程中的支付鎖鏈的速度。如甲付給乙，而后乙又付給丙等等。而同一块貨幣重复其支付手段职能的速度，又一方面决定于商品所有者之間債权人和債務人的关系的鎖鏈，——同一个商品所有者对于一个人是債权人，对于另一个人又是債務人等等，另一方面决定于不同的各个支付期間隔的长短。这个支付鎖鏈，即推迟了的商品第一形态变化的鎖鏈，在质上不同于那个在貨幣作为流通手段流通时表現出来的形态变化的鎖鏈。后者不但在時間上是先后銜接的，而且是在这种先后銜接的过程中才初次形

① 貝利“貨幣及其价值的变动”第3頁上說：“貨幣是契約上的一般商品，或者说，是用来訂立大部分将来要履行的财产合同的东西。”

② 西尼耳“政治經濟学基本原理”第221頁上說：“因为一切东西的价值在一定时期內都会发生变动，所以人們就选了价值最少变动而且最能长久保持一定平均购买力的东西作为支付手段。于是，貨幣变成了价值的表現或代表。”而事实正好相反。正因为金銀之类已經变成貨幣，即变成独立的交換价值的存在，它們才变成一般支付手段。在对于貨幣价值量的稳定性发生西尼耳先生所提到的那种顾虑的时期，即在貨幣为形势所迫而确定为一般支付手段的时期，恰好也是貨幣价值量的波动被发现的时期。这样的一个时期，在英国是伊丽莎白时代，那时柏坦勋爵和托馬斯·斯密斯爵士鉴于貴金屬的显著贬值，通过了一个議會法案，實成牛津大学和劍桥大学在它們所收的地租中必須有三分之一用小麦和麦芽保存起来。

成的。商品变成货币，而后再变成商品，这样使另一种商品能够变成货币，如此等等，换句话说，卖者变成买者，由此另一个商品所有者就变成卖者。这种联系是在商品交换过程本身中偶然产生的。但是，甲支付给乙的货币被乙支付给丙，被丙支付给丁等等，并且在时间上一个紧接着一个，——这种表面联系不过是表现一种已经现成地存在的社会联系。同一货币流过不同的手，并不是因为它们作为支付手段出现，可是它们作为支付手段流通，却是因为不同的手已经彼此相握。因此，同货币作为铸币或购买手段流通的速度比较起来，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流通的速度表明个人已更深得多地卷入了流通过程。

同时发生的、因而在空间上并行的买和卖的价格总额，对于铸币流通速度代替铸币数量，是一个界限。这个障碍对于起支付手段作用的货币就消失了。如果应当同时履行的许多笔支付都集中在同一地点，——这种情形最初自然只是发生在商品流通的大集中点，——那末这些支付就可以作为负数和正数相互抵销，因为甲要支付给乙，而同时丙要支付给甲等等。因此，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需要量，不是决定于应当同时实现的支付的价格总额，而是决定于支付的集中程度和它们作为负数和正数互相抵销以后的余额的大小。在信用事业还完全没有发展的时候，例如在古罗马，就已经产生为这种抵销而设的专门机关。但是这里不是要考察这种机关，也不是要考察在一定社会圈子里到处规定着的一般支付期。这里只需指出，关于这种支付期对流通中货币量的周期性波动的特殊影响，直到最近才作了科学的研究。

只要许多笔支付作为正数和负数互相抵销，就根本没有现实的货币参与。这里，货币仅仅在其价值尺度的形式中起作用，即一

方面在商品价格中，另一方面在彼此間的債額中起作用。因此，交换价值在这里除了它的观念上的存在之外，并没有获得任何独立的存在，哪怕是作为价值符号的存在，或者说，货币只变为观念上的計算货币。因此，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矛盾：一方面，只要許多笔支付互相抵銷，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作为尺度发生作用，另一方面，只要支付必須实际进行，货币就不是作为瞬息間的流通手段进入流通，而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靜止的存在、作为絕對商品，簡言之作为货币进入流通。因此，在支付鎖鏈和一种抵銷支付的人为制度已經发达的地方，如果有什么震动强制地打断了支付之流，破坏了它們的抵銷机制，货币就会突然从它的价值尺度的虛无縹緲的姿态一变而为坚硬的货币或支付手段。于是，在发达的資產階級生产情况下，当商品所有者早已变成了資本家，已經熟悉自己的亚当·斯密，并且高傲地嘲笑那种以为只有金銀是货币或以为货币根本不同于其他商品而是絕對商品的迷信的时候，货币却又突然不是作为流通的中介出現，而是完全像货币貯藏者所理解的货币一样作为交换价值的唯一适当的形式、作为唯一的財富出現。货币作为財富的这样的唯一存在，不是像货币主义所設想的那样只是表現在一切財富在观念上貶低价值或丧失价值，而是表現在一切財富在实际上貶低价值或丧失价值。这就是世界市場危机中称作货币危机的特殊时机。人們在这种时机当作唯一財富渴求的 *Summum bonum* [至善] 就是货币，就是現金，而其他一切商品，正因为它們是使用价值，就在現金旁边表現在无用之物，表現在廢物和玩具，或者就像我們的馬丁·路德博士所說的，是供奢侈和大吃大喝的东西。这种由信用主义突然轉变到货币主义，使得实际恐慌又加上了理論恐惧，流通的當事人在他們自

己的關系的深不可測的秘密面前瑟瑟發抖了^①。

支付又必需有一筆準備金，一筆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的積累。這種準備金的形成，不像貨幣貯藏那樣是流通本身之外的活動，也不像鑄幣準備金那樣僅僅是鑄幣的技術性的滯留，而是必須把貨幣逐漸積聚起來，以便到未來的約定支付期屆滿時握有現款。因此，如果在抽象形式上被當作致富之道的貨幣貯藏隨着資產階級生產的發展而減少，那末，這種為交換過程所直接需要的貨幣貯藏却在增加，或者不如說，一般在商品流通領域之內形成的貯藏貨幣的一部分被吸收為支付手段準備金。資產階級生產越發展，這種準備金越是限于必需的最低限度。洛克在論利率降低的著作中^②，關於當時這種準備金的規模，提供了有趣的資料。從這些資料中可以看到，在英國，正是在銀行業開始發展的時代，支付手段準備金曾經從一般流通的貨幣中吸收了多麼大的一部分。

研究簡單貨幣流通時所得出的流通中的貨幣量的規律，因支付手段的流通而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在一定的貨幣流通速度下，——不論貨幣是作為流通手段或作為支付手段，——一定時期內流通中的貨幣總量決定於待實現的商品價格總額，[加上]同一時期中到期的支付總額，減去彼此抵銷的支付。流通中的貨幣量

① 那位想不讓資產階級生產關係去猛烈反對資產者本人的布阿吉爾貝爾，對於只是觀念上的和只是瞬息間的貨幣形式有所偏愛。以前他對流通手段如此，現在對支付手段也是如此。他又沒有看到的是，貨幣從它的觀念的形式直接變為它的外在現實，他沒有看到堅硬的貨幣已經隱伏在僅僅是想像的價值尺度中了。他說，貨幣只是商品本身的形式，這一點表現在批發貿易上，在那里，*«les marchandises sont appréciées»* [“商品被估價”] 之後，交換是在沒有貨幣參與的情況下進行的。“法國詳情”第 210 頁。

② 洛克“略論降低利息和提高貨幣價值的結果”第 17、18 頁。

决定于商品价格这个一般規律，并不因此而受到絲毫影响，因为支付总額本身是由契約上規定的价格决定的。但是，很明显，即使假定流通的速度和支付上的節約不变，一定时期例如一日內，流通的商品量的价格总額和同一日內流通的貨幣量也决不相符，因为，有一定量正在流通的商品，它們的价格只是在将来才实现为貨幣，又有一定量的貨幣正在流通，同它相当的商品早已退出流通。后面这一定量的貨幣本身又决定于各个不同时期簽訂而在同一日到期的各笔支付的价值总額的大小。

我們已經知道，金銀价值的变动并不妨碍金銀执行价值尺度或計算貨幣的职能。可是，这种变动对于当作貯藏貨幣的貨幣却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随着金銀价值的漲落，金銀貯藏貨幣的价值量也会提高或降低。这种变动，对于作为支付手段的貨幣就更加重要。支付只是发生在商品卖出之后，換句話說，貨幣在两个不同的时期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后是作为与这个尺度相适应的支付手段。在先后两个时期之間，如果貴金屬的价值有变动，或者說，如果生产貴金屬所需的劳动時間有变动，那末，同量金銀的价值，当它作为支付手段出現时，就会比它作为价值尺度时或簽訂契約时高些或低些。这里，像金銀这样的特殊商品，它們作为貨幣或作为独立化了的交換价值的职能，就同它們作为随生产費用的变动而变动价值量的特殊商品的性质发生了冲突。貴金屬价值的跌落在欧洲引起的社会大革命，正像在古羅馬共和国初期平民用来計算債務的銅的价值的上漲引起了相反的革命一样，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用不着再去研究貴金屬的价值变动对于資產階級經濟制度的影响，我們这里就可以看出，貴金屬价值的跌落有利于債務人而不利于債权人，相反，它的价值的上漲則

有利于債權人而不利于債務人。

(c) 世界貨幣

金變成不同于鑄幣的貨幣，最初是由于它作為貯藏貨幣而退出流通，後來是由于它作為非流通手段而進入流通，而最後則是由于它突破國內流通的界限以便在商品世界中起一般等價物的作用。這樣，金就成了世界貨幣。

如果貴金屬的一般衡制曾經充當最初的价值尺度，那末在世界市場上，貨幣的計算名稱又變成相應的重量名稱。如果無定形的原金屬(aes rude)曾是流通手段的最初的形式，而鑄幣形式本身原來不過是金屬條塊所含重量的官方記號，那末作為世界鑄幣的貴金屬，就又拋棄了它的形狀和官方印記，回到無差別的條塊形狀，換句話說，如果民族鑄幣如俄國的伊彼利阿耳、墨西哥的塔勒和英國的索維林在國外流通，那末它們的名稱就變得毫無關係，只有它們的內容才有意义。最後，作為國際貨幣，貴金屬重新起着它們原來的作為交換手段的作用，這種作用，如同商品交換本身一樣，不是在原始公社內部，而是在不同公社的接觸點上發生的。因此，貨幣作為世界貨幣又採取它的原始的最初的形式。貨幣離開國內流通，就重新拋棄了那些由這種特殊領域內的交換過程的發展所引起的特殊形式，即它的作為價格標準、鑄幣、輔幣和价值符號的地方形式。

我們已經知道，在一國的國內流通中，只有一種商品充當价值尺度。但是，由于執行這種職能的在一國是金，在另一國是銀，在世界市場上就有兩種价值尺度，貨幣在其他一切職能上也就有兩種存在。商品价值從金價格改成銀價格以及相反的情況，每次都

决定于两种金屬的相对价值,这种相对价值是不断变动的,因而相对价值的确定表现为一个經常的过程。每个国家国内流通領域的商品所有者不得不在对外流通中时而用金时而用銀,这就要把在国内作为貨幣的金屬,拿去同他所需要的在国外作为貨幣的金屬交换。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把金銀这两种金屬当作世界貨幣。

在国际間的商品流通中,金和銀不是表现为流通手段,而是表现为一般交换手段。但是,这种一般交换手段,只是以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这两种发展了的形式起作用,而两者之間的关系在世界市場上是相反的。在国内流通中,只要貨幣是鑄币,是 $W-G-W$ 这个过程中的統一的中介,或者說,是交换价值在商品不断的位置变换中的瞬息間的形式,它就只起购买手段的作用。在世界市場上則相反。这里,当物质变换只是单方面的,因而买和卖彼此分离的时候,金和銀才起购买手段的作用。例如,在恰克图的边境貿易,事实上或条約上³⁰都是物物交换,銀在其中不过是价值尺度。1857—1858年的战争³¹迫使中国人只卖不买。于是銀就突然成了购买手段。俄国人为了遵守条約上的字句,把法国的五法郎銀币改鑄成粗陋的銀器,用来当作交换手段。在欧美同亚洲之間,銀一直充当购买手段,而在亚洲,它就沉淀为貯藏貨幣。其次,一旦两国之間通常的物质变换的平衡突然遭到破坏,例如,歉收使其中一国不得不大量购买的时候,貴金屬也就起国际购买手段的作用。最后,貴金屬是生产金銀的国家手中的国际购买手段,在那些国家里,它們是直接的产品和商品,而不是商品的轉化形式。不同各国流通領域之間的商品交换越发展,世界貨幣作为支付手段以平衡国际差額的职能也就越发展。

同国内流通一样,国际流通也需要有一个經常变动的金銀量。

因此，每一個民族都有一部分積累起來的貯藏貨幣充當世界貨幣準備金，這筆準備金隨着商品交換的波動而時枯時滿^①。世界貨幣除了往返於各國流通領域之間的特殊運動以外，還有一種一般的運動，其起點是金銀的產地，金銀的源流由這裡四面八方地流向世界市場。這裡，金銀作為商品進入世界流通，並且作為等價物，依它們所含的勞動時間的比例同商品等價物相交換，這發生在它們進入國內流通領域以前。因此，它們在國內流通領域出現時，已經具有一定的價值量了。因此，它們的生產費用的每一增減，在世界市場上以同樣的程度影響着它們的相對價值；這種相對價值，與不同各國流通領域吸收多少金銀完全無關。商品世界中每一特殊領域所吸收的那部分金屬源流，一部分直接進入國內貨幣流通，以補償磨損了的鑄幣，一部分被貯蓄在鑄幣的、支付手段的和世界貨幣的各種準備金蓄水池中，一部分變成奢侈品，至於其餘的部分，干脆成了貯藏貨幣。在資產階級生產的發達階段上，貯藏貨幣被限制在不同流通過程為本身自由地發揮作用所需要的那個最低限度以內。在這裡，成為原來意義上的貯藏貨幣的，只是閑置的財富——只要它不是支付差額的瞬息間的形式，不是物質變換被中斷的結果，不是商品在其第一形態變化上的凝結。

如果作為貨幣的金和銀按其概念是一般商品，那末它們在世界貨幣上就取得了普遍商品這種相應的存在形式。一切產品在什

① “為了實際上留在流通之中，為了滿足貿易上可能的需要，便有一定的數額離開並退出流通領域本身，積累起來的貨幣就是加到這個數額上。” 詹·黎·卡爾利在 Verri, «Meditazioni sulla Economia Politica», t. XV, p. 162 [維里“政治經濟學研究”]一書上加的注，載於庫斯托第編“意大利政治經濟學名家文集。現代部分”第15卷第162頁。

么規模上向它們轉移，它們也就在什么規模上變成一切商品的轉化形式，因而變成可以全面轉移的商品。實在勞動的物質變換在全世界擴展到什么程度，它們就在什么程度上變成一般勞動時間的化身。成為它們的交換領域的特殊等價物的系列發展到什么程度，它們就在什么程度上變成一般等價物。因為商品在世界流通中普遍地展開了它們自己的交換價值，所以這個交換價值的轉化形式金銀，就表現為世界貨幣。因此，如果說商品所有者各國由於其全面的工業和普遍的貿易而使金變成最適當的貨幣，那末對這些國家來說，工業和貿易只是從世界市場吸取金銀形式的貨幣的手段。因而，金銀作為世界貨幣，既是一般商品流通的產物，又是進一步擴展流通範圍的手段。正如煉金術士想煉出黃金時，在他們背後產生了化學一樣，商品所有者追求那具有迷人姿態的商品時，在他們背後涌現了世界工業和世界貿易的源泉。金銀幫助了世界市場的形成，因為金銀在自己的貨幣概念中已經預示著世界市場的存在。它們的這種魔力決不局限於資產階級社會的童年時期，而且必然會從商品世界的承擔者對自己社會勞動的曲解中產生出來，十九世紀中葉新的產金地的發現對於世界貿易所發生的非常影響證明了這一點。

貨幣發展為世界貨幣，商品所有者也就發展為世界主義者。人們彼此間的世界主義的關係最初不過是他們作為商品所有者的關係。商品就其本身來說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語言的限制的。它們的共同語言是價格，它們的共性[Gemeinwesen]是貨幣。但是，隨著同國家鑄幣對立的世界貨幣的發展，商品所有者的世界主義就發展為對實踐理性的信仰，而與阻礙人類物質變換的傳統的宗教、民族等等成見相對立。如果同一塊金，先以美國

eagles〔鷹幣〕的形式在英國登陸，變成索維林，三天後在巴黎當作拿破侖幣來流通，幾星期後又在威尼斯變成杜卡特幣，但是它總是保持着同一個價值，那末，商品所有者就會清楚地看到，民族性 «is but the guinea's stamp»〔“不過是基尼上的印記而已”〕。在他看來，整個世界都融化在其中的那個崇高的觀念，就是一個市場的觀念，世界市場的觀念^①。

4. 貴金屬

資產階級生產過程最初所掌握的金屬流通是一種現成地移交下來的機構，這個機構雖然逐步經過改造，但是始終保持着它的基本結構。為什麼是金銀而不是別的商品充當貨幣材料，這個問題不屬於資產階級制度的範圍。因此，我們只概括地談談最重要的幾點。

因為一般勞動時間本身只容許有量的差別，所以要充當它的特殊化身的那種物體必須能夠表現純粹的量的差別，因而首先要有同一性，同質性。這就是一個商品執行價值尺度職能的第一個條件。如果我用牛、獸皮、谷物等等來計算一切商品的價值，那末實際上我就必須用觀念上的平均牛、平均獸皮等等來計量這些商品的價值，因為牛和牛、谷物和谷物、獸皮和獸皮之間，在質上是不同的。金銀則不然，它們是一種單純的物體，本身總是相同的，因

^① 蒙塔納里“貨幣論”(1683年版)，載于庫斯托第編“意大利政治經濟學名家文集。現代部分”第3卷第40頁：“各民族之間的联系如此遍及全球，几乎可以说全世界变成了一座城，其中举行着一切商品的不散的集市，每个人坐在家裏就可以用貨幣取得別處的土地、牲畜和人的勤勞所產生的一切來供享受。真是一個奇妙的發明。”

而等量的金銀代表同样大小的价值^①。要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还需有另一个条件，一个直接从它应当表現純粹量的差别的职能产生出来的条件，这就是它要能够任意分为若干部分，并且能够重新合而为一，以便計算貨幣在外表上可以感觉出来。金銀特別富于这种性质。

用作流通手段，金銀比其他商品优越；它們的比重大，一个小的体积代表着較大的重量，它們在經濟上的比重与此相适应，一个小的体积包含着較多的劳动時間，就是說包含着較大的交换价值。这就保证了运送的方便，便于从一手轉到另一手，从一国轉到另一国，保证了它們既能迅速出現又能迅速消逝，总之，保证了物质的灵便性，这是要充当流通过程的 *perpetuum mobile* [永动机] 的商品的 *sine qua non* [必要条件]。

貴金屬比值高，耐久，比較不易損坏，在空气中不氧化，特別是金，除王水外不溶解于其他酸类，这一切自然屬性，使貴金屬成为貨幣貯藏的天然材料。因此，那位似乎特別喜欢巧克力的殉道者彼得，关于曾充当墨西哥的一种貨幣的袋装可可說过：

“哦，有福的貨幣，既供給人类以甜美滋养的飲料，又不会使它的无辜的所有者染上可怕的貪婪病，因为它既不能埋藏，也难于长期保存。”（“新大陆”32）

一般金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重大意义是同它們当作生产工具的作用联系在一起。撇开金銀很稀少不談，仅就它們比铁甚至比銅（指古人所用的硬銅）軟而論，这已經使它們不适于这种用途，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它們丧失了一般金屬的使用价值所依

① “金屬有这样的屬性和特点，就是只有在金屬中，一切关系才归結为一种关系，即它們的量，因为它們不論在內部构成上或外部形状和构造上，天然沒有不同的质。”（加利阿尼“貨幣論”第126—127頁）

以存在的那种属性。它们不仅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没有什么用处，而且作为生活资料，作为消费对象，它们同样不是必需的。因此，不论把多少金银投入社会流通过程，也不致对直接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发生不利的影晌。它们本身的使用价值并不与它们的经济职能发生冲突。另一方面，金银不只是消极意义上的剩余的、即没有也可以过得去的东西，而且它们的美学属性使它们成为满足奢侈、装饰、华丽、炫耀等需要的天然材料，总之，成为剩余和财富的积极形式。它们可以说表现为从地下世界发掘出来的天然的光芒，银反射出一切光线的自然的混合，金则专门反射出最强的色彩红色。而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雅科布·格林曾经指出过印度日耳曼语系的各种语言中的贵金属名称与色彩的相互关系的词源联系（见他的“德意志语言史”³³）。

最后，金银可以从铸币形式变为条块形式，从条块形式变为奢侈品形式，并且也可以变回来，因此，金银比其他商品优越之处是不受一成不变的、一定的使用形式的束缚，这就使它们成为货币的天然材料，因为货币是必须经常从一种形式规定性变为另一种形式规定性的。

自然界并不出产货币，正如自然界并不出产银行家或汇率一样。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生产必须把财富在一种唯一的物的形式上作为物神结晶起来，金银就成了这种财富的相应的化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金银。一方面，银质或金质的货币结晶不仅是流通过程的产物，而且实际上是流通过程留下的唯一产物。另一方面，金和银是现成的自然产物；它们既直接是前者又是后者，没有任何形状的差别可以区分。社会过程的一般产物，或者说作为产物的社会过程本身，是一种特殊的自然产物，是一种藏在

地壳里并从那里发掘出来的金屬^①。

我們已經知道，如果要求作为貨幣的金銀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价值量，金銀是不能滿足这种要求的。不过，正像亚里士多德已經指出的，金銀同其他商品的平均情况比較起来，还是具有比較稳定的价值量。撇开貴金屬价值的漲落所引起的一般影响不談，金銀之間的价值比例的变动是特別重要的，因为两者在世界市場上同时充当貨幣材料。这种价值变动的純經濟的原因，——征服或其他政治事变在古代世界曾对金屬价值发生过重大的影响，現在只能起局部的暫时的影响，——必須归之于生产这些金屬所需要的劳动時間的变动。劳动時間本身又决定于金銀自然蘊藏的相对稀少程度，也决定于获得純金屬状态的金銀时困难的大小。金实际上是人所发现的第一种金屬。一方面，自然界本身赋予金以純粹結晶的形式，使它孤立存在，不与其他物质化合，或者如炼金术士所說的，处于处女状态；另一方面，自然界本身在河流的大淘金場中担任了技术操作。因此，对人說来，不論淘取河里的金或挖掘冲积层中的金，都只需要最簡單的劳动；而銀的开采却以矿山劳动和一般比較高度的技术发展为前提。因此，虽然銀不那么絕對稀少，但是它最初的价值却相对地大于金的价值。斯特拉本曾断言，在一个阿拉伯部落里用 10 磅金換 1 磅铁，用 2 磅金換 1 磅銀。这一断言絕不是不可置信的。可是，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日益发展，从而簡單劳动的产品貴于复杂劳动的产品，随着地壳到处被开发，

① 在 760 年，許多穷人移居到布拉格以南去淘沙金，3 个人 1 天可以淘 1 馬克的金。結果，放棄农业而去采金的人这样多，以致第二年国内鬧飢荒（見 M. G. Körner. «Abhandlung von dem Altertum des böhmischen Bergwerks». Schneeberg, 1758 [格·克尔納“波希米亚矿业往昔情况的研究” 1758 年施奈堡版 [第 37—38 頁]]）。

原来的那些在地表面的金矿来源日益枯竭，銀的价值就低于金的价值了。最后，在技术和交通工具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新的金銀产地的发现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古代亚洲，金銀价值的比例是 6 : 1 或 8 : 1，在十九世纪初期，后一比例还存在于中国和日本；色諾芬时代的 10 : 1 可以看作古代中期的平均比例。迦太基以及后来罗马开采西班牙銀矿在古代所发生的影响，同美洲矿藏的发现现代欧洲所发生的影响相似。在罗马帝国时代，大致的平均数是 15 : 1 或 16 : 1，虽然我们不知道在罗马銀的价值常常跌得更低。在以后的时代里，即从中世纪直到最近时期，这种以金的价值相对跌落开始而以銀的价值跌落结束的运动不断地反复发生。同色諾芬时代一样，中世纪的平均比例是 10 : 1，由于美洲矿藏的发现，又变成 16 : 1 或 15 : 1。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和哥伦比亚金矿的发现大概又会使金的价值跌落。①

① 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等地金矿的发现还没有影响金銀的价值比例。米歇尔·舍伐利埃所持的相反见解，同他这位过去的圣西门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值同样的价钱。诚然，伦敦市場上銀的牌价表明，1850 年至 1858 年間用金表示的銀的平均价格比 1830 年至 1850 年期間几乎提高 3 %。可是这种提高只能用亚洲对于銀的需要来说明。1852 年到 1858 年間，个别年份和月份銀的价格发生变动，完全是由于这种需要造成的，决不是由于新发现的金矿的金的供給造成的。下面是伦敦市場上用金表示的銀的价格的一覽表：

1 盎斯銀的价格

年份	3 月 (辨士)	7 月 (辨士)	11 月 (辨士)
1852	60 ¹ / ₈	60 ¹ / ₄	61 ⁷ / ₈
1853	61 ³ / ₈	61 ¹ / ₂	61 ⁷ / ₈
1854	61 ⁷ / ₈	61 ³ / ₄	61 ¹ / ₂
1855	60 ⁷ / ₈	61 ¹ / ₂	60 ⁷ / ₈
1856	60	61 ¹ / ₄	62 ¹ / ₈
1857	61 ³ / ₄	61 ⁵ / ₈	61 ¹ / ₂
1858	61 ⁵ / ₈	—	—

C. 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說

在十六、十七世紀这个現代資產階級社会的童年时期，一种普遍的求金欲驅使許多国家的人民和王公組織远征重洋的十字軍去追求黄金的圣杯^①，同样，現代世界的最初解釋者即貨幣主义（重商主义不过是它的变种）的創始人宣布金銀即貨幣是唯一的財富。他們正确地說出了資產階級社会的使命就是賺錢，从簡單商品流通观点来看，也就是积聚既不蛀又不锈的永恒的財宝。用价格3鎊的1吨铁同3鎊的金是同样大的价值量这种說法是不能駁倒貨幣主义的。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交換价值的大小，而在于它的最适当的形式。貨幣主义和重商主义把世界貿易以及国民劳动中同世界貿易直接有关的特殊部門当作財富或貨幣的唯一真正源泉划分出来，这是由于在那个时代国民生产大部分还处在封建形式中，还是当作直接的生存源泉为生产者本身服务。产品大部分并不轉化为商品，因而也不轉化为貨幣，它們根本不参加总的社会物质变换，因而不表現为一般抽象劳动的化身，实际上不形成資產階級財富。把貨幣当作流通的目的，就是把交換价值或抽象財富、而不是把財富的任何物质因素当作决定生产的目标和推动生产的动机。同資產階級生产的萌芽阶段相适应，那些不被承认的預言家坚持交換价值的坚实的、可以捉摸的和閃閃发光的形式，坚持它同一切特殊商品对立的一般商品的形式。当时真正的資產階級的經濟領

① 馬克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了一个注：“黄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誰有了它，誰就能要什么有什么。黄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哥倫布1503年寄自牙买加的一封信）——編者注

域是商品流通的領域。所以他們從這個基本領域的觀點來判斷資產階級生產的整個錯綜複雜的過程，混淆了貨幣和資本。現代經濟學家不斷與貨幣主義和重商主義作鬥爭，這多半是因為這種主義粗野而坦率地吐露了資產階級生產的秘密：資產階級生產受交換價值支配。李嘉圖曾在什麼地方（儘管他是用來達到錯誤的目的）說過：即使在鬧飢荒的時候，輸入穀物也不是由於國民挨餓，而是由於谷商要賺錢。因此，政治經濟學在批判貨幣主義和重商主義時，攻擊這種主義是一種純粹的幻想和完全虛構的理論，不承認它是自己的基本原理的野蠻形式，那是錯誤的。此外，這種主義不僅在歷史上保留着它的權利，而且在現代經濟的一定領域中也完全享有它應得的權利。在財富採取商品這個原素形式的資產階級生產過程的一切階段上，交換價值採取貨幣這個原素形式，而在生產過程的一切階段，財富總是不斷有一剎那再回到商品這個一般原素形式。甚至在最發達的資產階級經濟中，金銀作為貨幣的這一特殊職能（不同於其作為流通手段的職能而同一切其他商品相對立），也沒有取消，而只是受到限制。因此，貨幣主義和重商主義還保留着它們的權利。金銀作為社會勞動的直接化身、因而作為抽象財富的存在而與其他普通商品對立這種舊教式的事實，自然有傷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新教式的 *point d'honneur*〔體面〕，資產階級經濟學由於唯恐染上貨幣主義的偏見，長期對貨幣流通現象失去判斷能力，下面的敘述就表明這一點。

貨幣主義和重商主義把貨幣只是在它作為流通中的結晶體的形式規定性上來認識；與此相反，古典經濟學把貨幣首先在它的流動形式上，作為在商品形式變換本身內部產生而又消失的交換價值形式來理解，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此，正如對商品流通單單

是从 $W-G-W$ 这一形式来理解，而对这个形式又单单从卖和买的过程中的統一这个形式規定性上来理解一样，对于貨幣就是从它作为流通手段的形式規定性上来认定，而不是从它作为貨幣的形式規定性上来认定。如果流通手段本身在它作为鑄币的职能上被孤立起来，它就会像我們看到的那样轉化为价值符号。可是，由于摆在古典經济学面前的，首先是作为流通的支配形式的金屬流通，所以它就把金屬貨幣理解为鑄币，而把金屬鑄币理解为單純的价值符号。于是，按照价值符号的流通規律，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中的貨幣量而不是相反地流通中的貨幣量决定于商品价格这一原理就被提出来了。我們看到，十七世紀的意大利經济学家已經多多少少提到过这种見解，洛克有时加以肯定有时加以否定，而“旁观者”杂志（1711年10月19日的那一期）、孟德斯鳩和休謨則明确地把它發揮了。因为休謨是十八世紀这一理論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所以我們的評論从他开始。

在一定前提下，流通中的金屬貨幣量的增減，或流通中的价值符号量的增減，对商品价格似乎起着同样的影响。如果商品交换价值借以表现为价格的金銀的价值降低或提高，那末，由于商品的价值尺度发生了变动，商品的价格就提高或降低，而由于价格提高或降低，就有較多或較少的金銀作为鑄币来流通。但表面現象是，在商品交换价值不变时价格随流通手段量的增減而变化。另一方面，如果流通中价值符号量降到必要水平之下或升到必要水平之上，那末，这个价值符号量就通过商品价格的降低或提高被强制地化为那个必要水平。在这两种情况下，似乎是同一原因产生同一結果，休謨就紧紧地抓住了这种表面現象。

要对流通手段量和商品价格变动之間的关系进行任何科学研

究，必須假定货币材料的价值是一定的。相反，休谟所考察的仅仅是贵金属本身的价值发生革命的时代，也就是价值尺度发生革命的时代。自从美洲矿山发现以来随着金属货币量的增加同时发生的商品价格的提高成为他的学说的历史背景，正如反对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的论战构成他的学说的实际动因一样。当然，贵金属的进口在贵金属生产费用不变的条件下也是可以增加的。而另一方面，贵金属价值即生产贵金属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最初只在贵金属进口的增加上表现出来。因此，后来休谟的門徒说，贵金属价值的减少表现为流通手段量的增加，而流通手段量的增加表现为商品价格的提高。然而实际上只有这样的出口商品的价格是提高了，这些商品同金银交换时，是把金银当作商品，而不是当作流通手段。这些商品用价值降低了的金银来估计，而一切其他商品则继续以金银的原来生产费用为标准用金银来估计自己的交换价值，对比起来，前者的价格是提高了。这种在同一个国家对商品交换价值的双重计算当然只能是暂时的；用金或银表示的各种价格必然会按照交换价值本身所决定的比例彼此拉平，于是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最终都会按照货币材料的新价值来估计。这个过程的发展，正如在市场价格波动中实现商品交换价值的方式和方法一样，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但是，在资产阶级生产还不很发达的时期，这种拉平的过程进行得极其缓慢，经历了很长的时期，而且无论如何赶不上流通中现金的增加。最近关于十六世纪商品价格变动的批判性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①。休谟的門徒喜欢

^① 休谟也承认这一过程是缓慢地进行的，虽然这并不符合他的原理。见 David Hume. «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 London, 1777, vol. I, p. 300 [大卫·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7年伦敦版第1卷第300页]。

引用古羅馬由于征服馬其頓、埃及和小亞細亞而引起價格上漲的事實，這完全是文不對題。古代世界所特有的用暴力把積累起來的貨幣財寶突然從一國運到另一國的現象，某一國家的貴金屬生產費用由于單純的劫掠而暫時降低的現象，並不涉及貨幣流通的內在規律，正如在羅馬免費分配埃及和西西里谷物並不涉及支配谷物價格的一般規律一樣。為了仔細研究貨幣流通，一方面需要可靠的商品價格史，另一方面需要關於流通媒介物的膨脹和緊縮、貴金屬的輸入和輸出等等官方的經常的統計，這樣的資料只有在銀行業充分發展時才能產生，而休謨同十八世紀的所有其他著作家一樣，都缺少這些資料。休謨的流通理論可以歸結為下列幾條原理：（1）一國中商品的价格決定于國內存在的貨幣量（實在的貨幣或象徵性的貨幣）。（2）一國中流通着的貨幣代表國內現有的所有商品。按照代表即貨幣的數量增加的比例，每個代表所代表的被代表物就有多有少。（3）如果商品增加，商品的价格就降低，或貨幣的價值就提高。如果貨幣增加，那末，相反地，商品的价格就提高，貨幣的價值就降低。^①

休謨說：“貨幣過多所造成的物價昂貴，對現存的一切商業都不利，因為它能使較貧的國家在一切國外市場上用低廉的價格與較富的國家競爭^②……如果我們單就一個國家來看，那末，用來計算或用來代表商品的鑄幣不論多少，都不會產生任何好的或壞的影響，這就像某個商人不用數碼少的阿拉伯記數法而用數碼多的羅馬記數法記賬，並不改變他的賬款一樣。是的，較大量的貨幣就像羅馬數碼一樣，反而不方便，無論在保管上或搬運上都更費事。”^③

① 參看斯圖亞特“政治經濟學原理研究”第1卷第394—400頁。

② 大衛·休謨“對若干問題的論述”第300頁。

③ 同上，第303頁。

休謨如果真想證明一點什麼的話，他應該指明，用一定的記數法時，所用數碼的個數不是決定於數值的大小，而是相反地，數值的大小決定於所用數碼的個數。的確不錯，用價值跌落了的金銀來估計或“計算”商品價值是沒有好處的，所以，隨着流通中商品價值總額的增加，各個國家都覺得用銀計算比用銅計算方便，用金計算又比用銀計算方便。隨着國家日益富裕，國家就使價值較低的金屬變成輔幣，使價值較高的金屬變成貨幣。另一方面，休謨忘記了，在用金銀計算價值的時候，既不需要“現存的”金，也不需要“現存的”銀。在他看來，計算貨幣和流通手段是一回事，兩者都是鑄幣 (coin)。由於價值尺度或執行計算貨幣職能的貴金屬的價值變動使商品的价格提高或降低，從而在流通速度不變時也使流通中的貨幣量增加或減少，休謨就得出結論說，商品价格的提高或降低決定於流通中貨幣的數量。在十六、十七世紀，不僅金銀的數量增加了，而且它們的生產費用同時減少，這一點是休謨可以從歐洲礦山的停止開采上看到的。在十六、十七世紀，歐洲的商品價格隨着從美洲輸入的金銀數量的增加而提高；因此，一國中商品的价格決定於該國內部存在的金銀的數量。這就是休謨的第一個“必然的結論”^①。在十六、十七世紀，价格的提高與貴金屬的增加並不一致；商品价格在過了半个多世紀之後，才顯出有一點變動，至於商品交換價值普遍按照金銀的降低了的價值來估計，即這一革命掌握所有商品价格，那更是很久以後的事了。因此，休謨完全違背了他的哲學的基本原理，把片面觀察到的事實不加批判地變成一般原理，得出結論說，商品价格或貨幣價值不是決定於一國中存在的

^① 大衛·休謨“對若干問題的論述”第303頁。

貨幣的絕對數量，而是決定於實際進入流通的金銀數量，但是一國中存在的全部金銀最後必然作為鑄幣被流通所吸收^①。顯然，如果金銀有自己的價值，那末撇開其他一切流通規律不談，作為一定商品價值總額的等價物來流通的只能是一定數量的金銀。因此，如果一國中偶然存在的任何數量的金銀，不顧商品價值總額如何，都必然作為流通手段參加商品交換，那末金銀就沒有什麼內在的價值，因此實際上也就不是真正的商品。這是休謨的第三個“必然的結論”。他使商品不帶價格、金銀不帶價值進入流過程。因此他從來不談商品的價值和金的價值，而只談它們的數量關係。洛克已經說過，金銀只有一種想像的或習慣的價值；這是對於貨幣主義的唯有金銀才有真正價值的論斷的第一個粗野的對立形式。金銀的貨幣存在完全從它們在社會交換過程中的職能產生，這一點被解釋成：金銀靠一種社會職能才有自己的價值，從而才有自己的價值量^②。這樣一來，金銀就是沒有價值的東西，不過它們在流過程中作為商品的代表獲得一個虛擬的價值量。它們經過流過程不是轉化為貨幣，而是轉化為價值。它們的這種價值是由它們自己的數量和商品數量之間的比例決定的，因為這兩個數量是必定相抵的。因此，一方面休謨讓金銀以非商品的資格進入商品世

① “顯然，與其說價格決定於一國內商品和貨幣的絕對數量，不如說決定於進入或能夠進入市場的商品數量和流通着的貨幣。如果鑄幣鎖在箱子里，那末對於價格來說它就好像消滅了一樣；如果商品堆在倉庫和谷倉里，結果也會相同。既然貨幣和商品在這種情況下從來不相遇，它們也就不會彼此發生作用。結果，總的價格水平同一國中金屬貨幣的新的數量確立了一個正確的比例。”（大衛·休謨“對若干問題的論述”第303、307、308頁）

② 馬克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了一個注：“見羅和富蘭克林關於金銀應該從充當貨幣的職能中得到追加價值的論點；并見福爾邦奈的著作。”——編者注

界，但是另一方面，一旦金銀在鑄幣的形式規定性上出現，他又反過來把它們變成一種通過簡單物物交換同其他商品交換的單純商品。現在假定商品世界只由一種單一的商品組成，例如由 100 萬夸特的谷物組成，那末不難想像，如果現存的金有 200 萬盎斯，每夸特谷物就換 2 盎斯金，如果現存的金有 2 000 萬盎斯，每夸特谷物就換 20 盎斯金，商品價格和貨幣價值同現存的貨幣數量成反比地提高或降低^①。但是商品世界是由無數不同的使用價值組成的，它們的相對價值無論如何不是由它們的相對數量來決定的。然而，休謨關於一堆商品和一堆金之間的這種交換究竟是怎樣想的呢？他滿足於空洞模糊的想像，說每一個商品作為商品總量的一個分數同金量中的一個相當分數交換。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對立引起的、表現在貨幣流通中並結晶為貨幣的各種形式規定性的、過程中的商品運動就消失了，代替它的是幻想的、一國中現存貴金屬重量和同時存在的商品數量之間的機械相等。

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對鑄幣和貨幣的研究是從詳細批判休謨和孟德斯鳩開始的^②。實際上，他是第一個提出流通中的貨幣量決定於商品價格還是商品價格決定於流通中的貨幣量這個問題的人。雖然，由於他關於價值尺度的奇怪觀點、關於一般交換價值的搖擺不定的解釋和重商主義的殘余，他的闡述模糊不清，但他還是發現了貨幣的各種基本的形式規定性和貨幣流通的一般規律，因為他不是機械地把商品放在一邊和把貨幣放在另一邊，而是實

① 馬克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了一個注：“在孟德斯鳩那里也見到過這種虛構，連詞句都一樣。”——編者注

② 斯圖亞特“政治經濟學原理研究”第 1 卷第 394 頁及以下各頁。

事求是地从商品交換本身的各种因素中來說明貨幣的各种职能。

“貨幣在國內流通中的用途可以歸結为两个要点：用来支付債務和用来購買所需要的东西；两者合在一起构成对現金的需要 (ready money demands) …… 商业和工业的状况，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日常开支，这一切加在一起，調节并决定所需現金的数量，即轉移的数量。为了實現这各种各样的支付，必須有一定比例的貨幣。这个比例虽然在轉移的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又可以依照情况不同而增減…… 無論如何，一国的流通只能吸收一定量的貨幣。”①

“商品的市場价格是由需求和竞争 (demand and competition) 的复杂作用决定的，需求和竞争同一国中存在的金銀数量完全无关。那末，不需要用作鑄币的金銀又怎样呢？它們当作貯藏貨幣积累起来，或当作奢侈品的原料被加工。如果金和銀的数量低于流通所需要的水平，人們会用象征性的貨幣或其他輔助手段来代替金銀。如果一个有利的汇率使國內貨幣过剩，同时又切断了把它运出国外的需要，那末貨幣常常就会在保險箱里堆积起来，就像躺在矿山里一样无用。”②

斯图亚特所发现的第二条規律是以信用为基础的流通回到自己的出发点。最后，他闡明各国利率差異对貴金屬在国际輸入輸出上所起的影响。后面两点同我們所談的簡單流通这个題目相去甚远，在这里只是为了求完全起見才提到它們③。象征性的貨幣或

① 斯图亚特“政治經濟学原理研究”第2卷第377—379頁及以下各頁。

② 同上，第379—380頁及以下各頁。

③ “多余的金銀会鎖起来，或者制成銀器…… 至于紙币，只要它达到第一个目的，即滿足了借錢人的需要，就会回到債務人手里而被實現…… 因此，不論一国的金屬貨幣增減到什么程度，商品仍然会依照需求和竞争的原則漲跌，而需求和竞争总是决定于那些握有财产或某种可以給付的等价物的人的意图，而决不是决定于他們所拥有的鑄币数量…… 假定它（即一国的金屬貨幣量）很少，但只要有一种实在财产，只要握有这种财产的人爭着要消費，那末，价格将会通过物物交換、象征性的貨幣、抵銷以及其他千百种方法而保持住高水

信用貨幣——斯圖亞特還沒有把貨幣的這兩種形式區分開——能夠在國內流通中代替充當購買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貴金屬，但是不能在世界市場上代替它們。因此，紙幣是社會的貨幣 (money of the society)，而金銀是世界的貨幣 (money of the world)^④。

法的历史學派³⁴所說的“历史”發展的民族有一個特點，就是經常忘記自己的历史。因此，雖然商品價格對流通手段量的關係這個爭論問題，在這半個世紀中一直驚動着議會，在英國為它出版了成千種大大小小的書刊，但是斯圖亞特依然是“死狗”，有過於萊辛時代的莫澤斯·門德爾森眼中的斯賓諾莎。連最新的《currency》〔“通貨”〕史家麥克拉倫都把亞當·斯密看作斯圖亞特學說的創立

平…… 如果這個國家同其他國家有來往，那末，許多商品在本國的價格和在國外的價格之間必然有一個比例，金屬貨幣的突然增減，假定它本來會起提高或降低價格的作用，那末國外競爭就會限制它的作用。”（斯圖亞特“政治經濟學原理研究”第1卷第400—401頁）“每個國家的流通，必須同生產投入市場的商品的居民的生產活動相適應…… 因此，如果一國的硬幣太少，與提供銷售的產業活動的價格不成比例，人們就會想出象徵性的貨幣之類的辦法為此創造一個等價物。但是，如果金屬貨幣在比例上超過了產業活動的規模，它就不會使價格提高，也不會進入流通：它將當作貯藏貨幣堆積起來……一國的貨幣數量不論比世界上其他部分大多少，留在流通中的只能是同富者的消費和貧者的勞動和產業活動大致成比例的数量”，而這個比例不是決定於“國內實際存在的貨幣量”。（同上，第403—408頁及以下各頁）“一切國家都會努力使本國流通所不必要的現金投到貨幣利息比本國高的國家去。”（同上，第2卷第5頁）“歐洲最富的國家就流通中的金屬貨幣而言，可以是最窮的國家。”（同上，第6頁）（見阿瑟·楊格對斯圖亞特的論戰）。〔圓括弧中最後一句話是馬克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的注。——編者注〕

④ 同上，第2卷第370頁。路易·勃朗把只是指國內民族貨幣的《money of the society》〔“社會貨幣”〕變成什么都不是的社會主義貨幣，於是也就合乎邏輯地使約翰·羅變成社會主義者（見他的“法國革命史”第1卷）。

者，正如把李嘉图看作休謨学說的創立者一样^①。李嘉图曾使休謨的学說更加完善，而亚当·斯密却只是把斯图亚特的研究成果当作死的事实记录下来。亚当·斯密把他的苏格兰格言“得到了一点，就不难得到許多，但是困难就在于得到这一点”，也用到精神财富上，因而小心翼翼地隱瞞了他实际上借以得到許多的那一点的来源。当明确的表述迫使他同前輩清算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避开了問題的鋒芒。在貨幣理論上就是这样。他偷偷地采用了斯图亚特的理論，說一國中存在的金銀一部分轉化为鑄币，一部分积累起来，在沒有銀行的国家变成商人准备金，在有信用流通的国家則变成銀行准备金，一部分当作貯藏貨幣用来平衡国际支付，一部分被加工成奢侈品。他把流通中的鑄币量問題悄悄地抹掉了，因为他完全錯誤地把貨幣当作單純的商品。^② 亚当·斯密学說的庸俗化者、乏味的让·巴·薩伊——法国人称他为 *prince de la science* [科学王子]，正如約翰·克利斯托夫·哥特謝德把他的雪恩奈希奉为荷馬和彼得罗·阿雷蒂諾把自己称作 *«terror principum»* [“王公的恐怖”] 和 *«lux mundi»* [“世界之光”] 一样，——郑重其事地把亚当·斯密这个并非完全出于无知而犯的錯誤奉为信条^③。亚

① 麦克拉倫“通貨史”1858年倫敦版第43頁及以下各頁。爱国主义使一位死得过早的德国作家(古斯塔夫·尤利烏斯)誤认为老毕希是与李嘉图学派对立的权威。可敬的毕希把斯图亚特的精美英語譯成汉堡方言，并且尽量用自己的修正損害原文。

② 馬克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了一个注：“這句話不确切。有些地方亚当·斯密正确地說出了这个規律。”——編者注

③ 因此，在“国富論”中找不到 *«currency»* 和 *«money»*，即流通手段和貨幣之間的区别。亚当·斯密非常熟悉他的休謨和斯图亚特，而老实的麦克拉倫却被他表面的公正所蒙蔽，說：“价格决定于通貨数量的理論直到目前还没有引起

當·斯密關於信用貨幣的觀點是獨創的而且深刻的，但是，反對重商主義幻想的激烈論戰，使他不能客觀地理解金屬流通的現象。正如在十八世紀古生物學理論中總有一股來自對聖經上洪水傳說的批判或擁護的暗流，在十八世紀的一切貨幣理論背後也隱藏着一種反對貨幣主義——這個幽靈曾經守護過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搖籃並且還一直把自己的陰影投到立法上——的暗中鬥爭。

十九世紀對於貨幣本質的研究，不是直接由金屬流通的現象引起的，倒是由銀行券流通的現象引起的。回頭去研究前者只是為了發現後者的規律。1797年以來英格蘭銀行停止了銀行券兌現，隨後許多商品價格上漲，金的造幣局價格跌到市場價格以下，銀行券特別是從1809年以後貶值，——這一切是議會中黨派鬥爭和議會外理論論戰的直接實際原因，兩者都很激烈。這次爭論的歷史背景是：十八世紀的紙幣的歷史，羅氏銀行的破產³⁵，十八世紀初期至中期北美洲英國殖民地地方銀行券隨價值符號量的增加而產生的貶值；後來獨立戰爭中美國中央政府用法律強制流通的紙幣（Continental bills），最後是規模更大的法國阿西涅幣的試驗。當時英國大部分著作家都把完全遵循另一種規律的銀行券流通，同價值符號或強制通用的國家紙幣的流通混為一談；他們借口這種強制流通的現象要用金屬流通的規律來說明，實際上反而是從前一種現象中抽出後一種現象的規律。我們跳過1800年到1809年間的許多著作家而直接來研究李嘉圖，不僅因為他對前輩作了總結，更明確地表述了他們的觀點，而且因為他給予貨幣理論的形式，直到目前還支配着英國的銀行立法。李嘉圖同他的前輩一樣，

注意：斯密博士也同洛克先生（洛克的觀點是動搖不定的）一樣，把金屬貨幣只看成一種商品。”（麥克拉倫“通貨史”第44頁）

把銀行券流通或信用貨幣流通同單純的價值符號流通混為一談。他所依據的事實主要是紙幣的貶值和與此同時發生的商品價格的上漲。美國礦山對休謨的意義，與針綫街³⁶紙幣印刷廠對李嘉圖的意義是相同的，李嘉圖本人也曾在某處明確地把這兩個因素同等看待。他的專門研究貨幣問題的初期著作正好屬於英格蘭銀行同其反對者進行最激烈爭論的時期，站在前者一邊的是內閣大臣和主戰派，而聚集在後者周圍的是議會反對派即輝格黨和主和派。這些著作直接是採用了李嘉圖觀點的1810年金條委員會的著名報告的前身^①。李嘉圖和他的追隨者雖然認為貨幣只是一種單純的價值符號，卻被稱為«Bullionists»(金條黨人)，這種怪事不僅是從這個委員會的名稱來的，而且是从李嘉圖學說本身的內容來的。李嘉圖在他的政治經濟學著作中重複並進一步發展了這個觀點，但是他從來沒有像研究交換價值、利潤、地租等等那樣研究過貨幣的本質。

李嘉圖像決定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一樣，首先用物化在金銀中的勞動時間量來決定金銀的價值^②。金銀作為具有一定價值的商品，用來衡量一切其他商品的價值^③。因而，一國中流通手段的

① David Ricardo. «The high price of bullion a proof of the depreciation of banknotes», 4 edition. London, 1811 [大衛·李嘉圖“金銀條塊價格高昂是銀行券貶值的證明”1811年倫敦第4版](第1版在1809年出版)。此外«Reply to Mr. Bosanquet's pract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report of the bullion committee». London, 1811 [“答博贊克特先生關於金條委員會報告的具體意見”1811年倫敦版]。

② 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和租稅的原理”第77頁：“貴金屬的價值和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一樣，最終決定於取得它們並把它們運到市場所必需的勞動總量。”

③ 同上，第77、180、181頁。

數量，一方面決定於貨幣單位價值，另一方面決定於商品交換價值總額。這個數量因支付手段的節約而變更^①。因此，既然具有一定價值的貨幣所能夠流通的量是有一定的，而它的價值在流通中又只表現在它的量上，那末它的單純的價值符號如果按照由它的價值所決定的比例來發行，就可以在流通中代替它；並且，

“如果流通中的貨幣完全由跟它所應代表的金幣同值的紙幣組成，那它就處於最完善的状态”^②。

因此，到此為止，李嘉圖認為在貨幣價值已定的前提下，流通手段的數量決定於商品的价格，並且把作為價值符號的貨幣看成一定金量的符號，而不像休謨那樣看成商品的沒有價值的代表。

當李嘉圖突然離開了他說明問題的正路而採取了相反的見解時，他立即轉向貴金屬的國際流通，於是由於引進了無關的觀點便使問題混亂不清了。我們現在且跟隨他的內在思路，首先撇開一切人為的偶然情況，假定金銀礦就處在把貴金屬當作貨幣來流通的國家。那末從李嘉圖以上的闡述得出的唯一的結論就是：如果金的價值已定，流通中的貨幣量就決定於商品價格。因而在一定的時候，一國中流通的金量只是決定於流通中的商品的交換價值。現在假設這個交換價值的總額縮小了，這或者是由於交換價值不變而生產的商品減少了，或者是由於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使同一個

① 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和租稅的原理”第421頁：“一國內可以使用的貨幣量決定於貨幣的價值。如果單單用金來流通，就只需要單單用銀來流通時的十五分之一。”并見 Ricardo: «Proposals for an economical and secure currency». London, 1816, p. 8 [李嘉圖“關於一種既經濟又可靠的通貨的建議”1816年倫敦版第8頁]，其中說：“流通中銀行券的數量決定於一國流通所需要的量，後者又決定於貨幣單位的價值、支付量以及履行支付時的節約。”

② 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原理”第432、433頁。

商品量所包含的交換價值變小了。我們也可以反過來假定這個交換價值的總額增大了，這或者是由於在生產費用不變的情況下商品數量增加了，或者是由於勞動生產力的降低使同量的或較少量的商品的價值增加了。在這兩種情況下，流通中金屬的已定數量會怎麼樣呢？如果金之所以成為貨幣只因為它當作流通手段而流通，如果它同國家所發行的強制流通的紙幣一樣（李嘉圖正是這樣想的）非留在流通中不可，那末在前一種情況下，流通中的貨幣量對金屬的交換價值來說是過多了，在後一種情況下則低於它的正常水平。因此，金雖然有自己的價值，但是在前一種情況下卻變成一種交換價值比自己低的金屬的符號，在後一種情況下則變成一種交換價值比自己高的金屬的符號。它作為價值符號，在前一種情況下低於自己的實際價值，在後一種情況下高於自己的實際價值（這又是從強制流通的紙幣得出的一個抽象）。在前一種情況下，好像商品是用一種價值比金低的金屬來估計，在後一種情況下，好像商品是用一種價值比金高的金屬來估計。因此，商品價格在前一種情況下會提高，在後一種情況下會降低。在這兩種情況下，商品價格的運動，即它們的漲跌，都是流通中的金量在與它本身價值相適應的那個水平（也就是由它本身的價值和要流通的商品的價值之間的比例所決定的正常數量）上下相對膨脹或相對緊縮的結果。

如果流通中的商品價格總額不變，但流通中的金量由於礦山沒有生產相當的金來補償流通中磨損了的金鑄幣而低於正常水平，或者由於礦山中新的供給超過了流通的需要而高於正常水平，也會出現同樣的過程。在這兩種情況下，都假定金的生產費用或它的價值不變。

現在歸納一下：在商品交換價值已定的情況下，如果流通中的貨幣量是由貨幣本身的金屬價值決定，流通中的貨幣就處於正常水平。如果商品交換價值總額減少，或者礦山提供的金增多，流通中貨幣就超過這個水平，金就跌到它本身的金屬價值之下，商品的价格就提高。如果商品的交換價值總額增加，或者礦山所提供的金不足以補償被磨損了的金量，流通中貨幣就緊縮到它的正常水平之下，金就升到它本身的金屬價值之上，商品的价格就降低。在這兩種情況下，流通中的金是一個價值符號，代表着一個大於或小於它實際包含的價值的價值。它能變成一個它自己的升值或貶值了的符號。一旦商品全都按照貨幣的這個新價值來估計，一切的商品價格相應地提高或降低，則流通中的金量又將與流通的需要相適應（這是李嘉圖特別滿意地強調的結論），但與貴金屬的生產費用相矛盾，因而與它作為商品對其他商品發生的關係相矛盾。依照李嘉圖的交換價值理論，金漲到自己的交換價值以上，即漲到它包含的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價值以上，就會引起金的生產增加，直到它的供給的增加再把它降到它的正常價值量為止。反過來說，金降到自己的價值以下，就會引起它的生產減少，直到它再提高到它的正常價值量為止。由於這種相反的运动，金的金屬價值與它作為流通手段的價值之間的矛盾得到解決，流通中的金量的正常水平得到恢復，商品價格水平又同價值尺度相適應。流通中金的價值的這種波動，會對條塊形狀金產生同樣的影響，因為依照假定，所有不用作奢侈品的金，都處在流通中。既然金本身，不論是鑄幣或是條塊，都能變成大於或小於它自己金屬價值的一個金屬價值的價值符號，那末顯而易見，流通中的可兌銀行券也有同樣的命運。雖然銀行券可以兌換，也就是它的實在價值符合於名義價

值，但是由金和銀行券構成的流通中的貨幣總量 (the aggregate currency consisting of metal and of convertible notes) 可以升值或貶值，這要看這一總量由於上述原因升到由流通中商品交換價值和金的金屬價值所決定的水平之上或降到這一水平之下而定。從這個觀點看來，不可兌紙幣勝過可兌紙幣的地方只是它可以雙重貶值。它跌到它所應該代表的金屬的價值之下，可以是因為發行量太大，也可以是因為它所代表的金屬跌到了金屬自己的價值之下。這種貶值不是紙幣對於金的貶值，而是紙幣和金共同的貶值，或一國流通手段總量的貶值，這是李嘉圖的主要發現之一；奧維爾斯頓男爵之流利用了這一發現，把它用作 1844 年和 1845 年羅伯特·皮爾爵士銀行立法的基本原理。

應該證明的是，商品價格或金的價值決定於流通中的金量。要證明這一點必須先證明：用作貨幣的貴金屬的任何數量，不論與其內在價值成何比例，必定成為流通手段，成為鑄幣，因而成為流通中商品的價值符號，而不管這些商品的價值總額如何。換句話說，這個證明就在於抹煞貨幣除了作為流通手段的職能以外的一切其他職能。李嘉圖完全受價值符號因它的數量而貶值的現象所支配，當他被逼得很緊的時候就武斷了事，例如同博贊克特爭論時就是這樣^①。

如果李嘉圖像我們剛才所說的那樣抽象地建立這個理論，而不引進一些具體情況和與本題無關的偶然情節，那末它的空虛是很明顯的。然而他給整個闡述塗上了一層國際的色彩。但是不難證明，表面上的規模宏大一點也不改變他的基本思想的渺小。

^① 大衛·李嘉圖“答博贊克特先生的具體意見”第 49 頁：“商品價格按貨幣增減的比例而漲跌，我以為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因此，他的第一條原理是：當流通中金屬貨幣量決定於流通中商品的使用貨幣的金屬價值估計的價值總額時，這個流通中的金屬貨幣量是正常的。這個原理從國際看就是：在正常的流通情況下，每個國家具有與它的財富和實業相適應的貨幣量。貨幣依照它的實際價值或符合它生產費用的價值流通，這就是說，貨幣在一切國家具有同等的價值^①。因此，貨幣就不會從一個國家輸出或輸入到另一個國家^②。於是，各國的 currencies (流通中的貨幣總量) 之間就保持平衡。一國的 currency 的正常水平表現為 currencies 的國際平衡，這實際上不過是說，國別絲毫不改變一般的經濟規律。現在我們又像前面那樣遇到了這個關鍵性的問題。正常水平是怎樣打破的？也就是說，currencies 的國際平衡是怎樣打破的？或者說，貨幣怎麼會不再在一切國家中具有同等價值的？最後或者說，它是怎麼會不再在每一個國家中保持着它本身的價值的？前面，正常水平的打破是由於流通中的金量在商品價值總額不變時有了增減，或者是由於商品交換價值增減時流通中的貨幣量不變，現在，國際的、由金屬本身價值決定的水平的打破，是由於一國內存在的金量因國內發現新金礦而有了增加^③，或者是由於個別國家流通中的商品的交換價值總額有了增減。前面，貴金屬生產的增減是根據 currency 的緊縮或膨脹以及商品價格相應地降低或提高的需要，現在，發生作用的是從一個國家向另一個國家的輸出和

① 大衛·李嘉圖“金銀條塊價格高昂”第4頁：“貨幣將在一切國家具有同等的價值。”李嘉圖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修正了這種說法，但這個修正在這裡並不重要。

② 大衛·李嘉圖“金銀條塊價格高昂”第3—4頁。

③ 同上，第4頁。

輸入。如果某国的价格上涨，金的价值由于流通中的货币过多跌到它的金属价值之下，那末同其他国家相比，这个国家的金是贬值了，因而商品价格是提高了。这样，金就会输出，商品就会输入。如果情况相反，结果也就相反。前面，金的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价格的涨跌会继续到金属和商品之间的正常价值比例恢复为止，现在，金的输入或输出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价格的涨跌会继续到国际 currencies 的平衡恢复为止。在前一种情况下，仅仅因为金高于或低于自己的价值，金的生产才有增减，现在，也仅仅由于这个原因，金才在国际间流动。在前一种情况下，金的生产上的每一变动都会影响流通中的金属量，从而影响价格，现在，金的国际间的输入和输出会发生这种影响。一旦金和商品之间的相对价值或流通手段的正常量恢复，那末除了为补偿被磨损了的铸币和满足奢侈品制造业的消费以外，在前一种情况下金就不会继续生产，在后一种情况下金就不会继续输出或输入。由此可见，

“除了由于流通手段量过剩以外，决不会有把金当作商品的等价物来输出的企图或不利的贸易差额”^①。

好像金的输入和输出始终只是由于流通手段量膨胀到它的正常水平之上或紧缩到这个水平之下而发生的金属的升值或贬值。^② 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在前一情况下金的生产的增减，在后一情况下金的输入和输出，只是因为金量高于或低于它的

① «An unfavourable balance of trade never arises but from a redundant currency» (Ricardo, l. c., p. 11, 12) [“除了由于流通手段过剩以外，决不会有不利的贸易差额”（大卫·李嘉图“金银条块价格高昂”第11、12页）]。

② “硬币的输出是由它的价值低引起的，这不是不利的贸易差额的结果，而是它的原因。”（同上，第14页）

正常水平,只是因为金漲到高于或跌到低于它的金屬价值,因而商品价格太高或太低,那末,每一个这样的运动都起着校正手段的作用^①,因为它通过流通中货币的膨胀或紧缩使价格再回到它的正常水平,在前一种情况下指金的价值和商品的价值之间的水平,在后一种情况下指 currencies 的国际水平。换句话说,货币在不同各国流通,只是因为它在每一个国家作为鑄币流通。货币只是鑄币,所以一国中存在的金量必然进入流通,因而它可以当作它自身的价值符号升到它的价值之上或跌到它的价值之下。于是我們繞了复杂的国际圈子,又幸运地回到成为出发点的那个简单的教条。

李嘉图怎样硬用他的抽象理論解釋实际現象,有几个例子可以說明。例如他断言,在1800—1820年間英国常常遇到的荒年里,金的輸出并不是因为需要谷物,也不是因为金是货币,因而始終是在世界市場上有效的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而是因为同其他商品比較起来金貶值了,从而遇到荒年的国家的 currency 与其他国家的 currencies 相比貶值了。正因为歉收减少了流通中的商品数量,流通中货币的既定数量就超过它的正常水平,因而一切商品的价格上漲^②。同这种怪論相反,統計材料证明,从1793年到最

① 大卫·李嘉图“金銀条块价格高昂”第17頁。

② 同上,第74、75頁:“由于歉收,英国将处于失去一部分商品因而对流通媒介物的需要量也减少的国家的状态。过去同支付相适应的流通手段現在过多了,而且按照生产减少的比例相对地便宜了。因此,这个金額的輸出会使流通手段的价值重新同別国的流通手段的价值相一致。”他在下面一段話中可笑地把货币和商品、货币和鑄币混淆起来:“如果我們設想,英国在遭受歉收以后有必要輸入很多谷物,而另一个国家的谷物有多余,但它不需要任何商品,那末毫无疑问,这个国家不会輸出自己的谷物来換取商品,但是它也不会輸出谷物来換取货币,因为货币不是任何国家絕對需要而只是相对需要的一种商品。”(同上,第75頁)普希金在他的一首叙事詩中,說他的作品的主人公的父亲怎样也

近，每逢英国遇到荒年的时候，流通手段的现有数量不是过多，而是不足，因此就有并且必须有比从前更多的货币流通。^③

同样，李嘉图在拿破侖实行大陆封鎖³⁷和英国实施封鎖令³⁸的时候硬說，英国人向大陆輸出金而不輸出商品是因为与大陆各国的货币相比英国的货币貶值了，英国的商品价格因而相对地較高，所以不輸出商品而輸出金是更有利的投机买卖。照他的說法，英国是商品貴而货币賤的市場，而大陆上則是商品賤而货币貴。

有一位英国著作家說：“实际上在过去6年战争期間，我們的工业品和殖民地产品的价格由于大陆封鎖的影响低得要命。例如，糖和咖啡在大陆上用金計算的价格比在英国用銀行券計算的价格要高三四倍。这是法国化学家发现甜菜糖并用菊苣代替咖啡的时候，同时也是英国农場主試用糖浆和果汁来育肥牛的时候，是英国占領黑尔郭兰島，想把它当作堆棧以便于向北歐走私的时候，是英国輕工业品設法繞道土耳其轉輸德国的时候……几乎全世界的商品都堆在我們的貨棧里，死攔在那里，只有少量商品得到一張法国进出口貿易許可证才得救，为了得到這張許可证汉堡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付給拿破侖一笔四五万鎊的款子。如果商人花这样多的錢去換取一种把商品从昂貴市場运往低廉市場去的自由，那簡直是可笑的事情。或者按每磅銀行券6辨士买进咖啡，把它送到可以按每磅值金三四先令直接卖出的地方，或者用銀行券按每盎斯5鎊买进金又把它送到每盎斯值3鎊17先令10½辨士的地方。这两种办法，一个商人显然会选择哪一种呢？因此，把輸出金不輸出咖啡說成有利的买卖，是荒謬的……当时世界上任何別的国家都不能像在英国那样可以用1盎斯金买到这么多想买的商品。波拿巴經常仔細观察英国

不懂得商品就是货币。但是，俄罗斯人早就懂得货币就是商品，不但1838—1842年把谷物輸入英国这件事，而且他們的全部貿易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③ 参看 Thomas Tooke. «History of prices» [托馬斯·图克“价格史”] 和 James Wilson. «Capital, currency and banking» [詹姆斯·威尔遜“資本、通貨与銀行業”]。（后一著作是1844、1845和1847年倫敦“經濟學家”杂志上发表的許多篇論文的翻印。）

價目表。只要看見英國金貴而咖啡便宜，他就為他的大陸體系見效感到滿意。”^①

在 1810 年，正是李嘉圖最初提出他的貨幣理論和金條委員會在議會報告中採用了這一理論的時候，英國所有商品的价格与 1808—1809 年相比發生了慘跌，然而金的價值却相應地提高了。農產品則是例外，因為從國外輸入遇到障礙，而國內的存量又因歉收大大減少^②。李嘉圖完全不理解貴金屬作為國際支付手段的職能，他 1819 年在上院委員會的發言中竟說：

“只要現金支付一恢復，貨幣流通一恢復到它的金屬水平，金的輸出就會完全停止。”

他恰好在 1825 年危機爆發以前去世，那次危機證明他的預言是錯誤的。李嘉圖從事著作活動的時期，是不適宜於觀察貴金屬作為世界貨幣的職能的時期。在大陸體系實施之前，貿易差額幾乎總是對英國有利，而在大陸體系實施期間，同歐洲大陸的交易太少了，不足以影響英國的匯率。貨幣的輸送主要是政治性的，而李嘉圖對於補助金在英國金的輸出中所起的作用看來是一無所知的^③。

詹姆斯·穆勒是李嘉圖同時代人中創立學派來崇奉他的政治經濟原理的最重要的人物。他企圖根據簡單金屬流通來說明李嘉圖的貨幣理論，不想涉及與問題無關的、被李嘉圖用來掩飾自己貧乏無力的觀點的複雜國際關係，也根本不打算去抨擊英格蘭銀行

① James Deacon Hume. «Letters on the cornlaws». London, 1834, p. 29—31
[詹姆斯·迪肯·休謨“關於谷物條例的書信集”1834年倫敦版第29—31頁]。

② 托馬斯·圖克“價格史”1848年倫敦版第110頁。

③ 參看前引威·布萊克“論政府支出的影響”。

的措施。他的主要論点如下^①：

“貨幣的价值等于人們用它交換別种物品的比例，或人們在交換一定量的其他物品时所給的貨幣量。这个比例决定于一国中存在的貨幣总量。假定一方是一国的全部商品，另一方是一国的全部貨幣，那末显然，当两方交換时，貨幣的价值，即貨幣所交換的商品量，完全决定于貨幣本身的数量。实际情况完全如此。一国中商品总量并不是一下子同貨幣总量交換，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而且往往以很少部分在一年中的各个不同时期进行交換。同一块貨幣今天用在这一次交換，明天又可能用在另一次交換。一部分貨幣用于交換行为的次数很多，另一部分用的次数很少，第三部分則被貯藏起来，一次也不用于交換。虽然情况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平均数，就是每块金幣在实现同样多次数的交換行为时被用于交換行为的次数。我們随意假定这个平均次数，譬如說是10。如果国内存在的每块貨幣用于10次购买，那末这就好比貨幣总块数增加到10倍而每块只用于一次购买。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商品的价值等于貨幣价值的10倍，等等。反过来說，如果每块貨幣不是一年用于10次购买，而是貨幣总量增大为10倍，每块貨幣只用于一次交換，那末显然，只要这个总量一增加，就会引起其中每块单个的金幣的价值按比例地减小。既然假定貨幣能交換的商品总量不变，那末，貨幣总量的价值在貨幣数量增加之后也沒有比从前大。假定貨幣数量增加 $\frac{1}{10}$ ，那末貨幣总量的每一部分的价值，譬如1盎斯的价值就必然减少 $\frac{1}{10}$ 。因此，在其他物品的数量不变的条件下，不論貨幣总量减少或增加到什么程度，这个总量和总量中每一部分^②会成反比地减少或增加。显然，这个原理是絕對真理。只要貨幣价值有了增减而人們能用貨幣交換的商品数量和流通速度保持不变，这个变动的的原因必然是貨幣的成比例的增减，而不会是什么别的。如果商品量减少而貨幣量不变，情形就同貨幣总量增加一样；反之亦然。流通速度的每一变动也产生类似的变动。流通次数的每一增加产生同貨幣总量增加一样的結果；流通次数

① James Mill.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学原理”]。正文中的这段引文譯自1823年巴黎出版的伊·特·帕里索的法譯本。

② 根据俄文版和英文版这里有“的价值”三字。——譯者注

的减少直接引起相反的结果…… 如果年产品中某一部分根本不用于交换，如生产者自己消费的部分，这一部分就不计在内。它既然不同货币交换，它对货币来说就等于根本不存在…… 只要货币的增加和减少可以自由发生，一国中存在的货币总量就由贵金属的价值来调整…… 但金银是商品，它们的价值同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一样，是由它们的生产费用，即它们所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①

穆勒的全部智慧不外是一套强词夺理的假定。他想证明商品价格或货币价值决定于“一国中现存的货币总量”。如果假定流通中商品的数量和交换价值不变，流通速度不变，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贵金属的价值也不变，同时假定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同一国现存货币量成比例增加或减少，那末这事实上“很明显”，是把应当证明的东西已经假定好了。并且穆勒犯了同休谟一样的错误，认为处在流通中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具有一定交换价值的商品，因此，即使我们承认了他的一切“假定”，他的原理还是错误的。流通速度可以不变，贵金属的价值也可以不变，流通中的商品的数量也可以不变，但是随着商品交换价值的变动，商品流通需要的货币量有时就大一些，有时就小一些。穆勒看到了一国中现存的货币一部分在流通，另一部分停留不动这个事实。但是，他却借助于一种十分可笑的平均计算假定一国中存在的全部货币实际上都在流通，虽然实际上看来不是这样。假定某一个国家有 1000 万银塔勒一年流通两次，那末，如果每个塔勒只用于一次购买，就可以有 2000 万在流通。如果一国中以各种形式存在的银的总额有 1 亿塔勒，那末就可以假定，如果每一块货币 5 年只用于一次购买，这 1 亿就全部可以流通。还可以假定全世界的货币都在汉普斯泰

^①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 128—136 页及以下各页。

特³⁹一地流通，不过其中每一部分不是一年流通三次而是300万年流通一次。对确定商品价格总额和流通手段量之间的比例来说，一个假定同另一个假定是同等重要的。穆勒认为，对他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把商品直接同流通中现存货币量联系起来，而是同一国每个时期存在的货币的储备总量联系起来。他承认，一国的商品总量“并不是一下子”同货币总量相交换，而是分成不同部分在一年中的不同时期同货币的不同部分交换。为了排除这个不合适的情况，他就假定这种情况不存在。同时，这种商品和货币直接对立和直接交换的全部观念，是从简单的买和卖的运动中或货币当作购买手段的职能中抽出来的。在货币当作支付手段的运动中，商品和货币同时出现的现象已经消失了。

十九世纪的商业危机，特别是1825年和1836年的大危机，并没有使李嘉图的货币学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确实使它得到新的应用。这已经不再是个别的经济现象，像休谟那时候的十六、十七世纪的贵金属贬值，或者像李嘉图那时候的十八世纪中和十九世纪初期的纸币贬值，而是使资产阶级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因素的矛盾都爆发出来的世界市场大风暴；人们从这个生产过程的最表面和最抽象的领域即货币流通的领域中去寻找这种大风暴的根源和抵御它的方法。这个经济气象学派所依据的真正的理论前提，实际上不过是以为李嘉图已经发现了纯粹金属流通规律这一信条。留给他们去做的，是使信用券或银行券流通也从属于这个规律。

商业危机的最普遍和最显著的现象，就是商品价格在长期普遍上涨之后突然普遍跌落。商品价格的普遍跌落可以说成货币同一切商品对比起来它的相对价值上涨，相反，价格的普遍上涨也可

以說成貨幣的相對價值的跌落。兩種說法都是敘述現象而不是解釋現象。如果我這樣提出課題：試說明交替發生的價格的周期性普遍上漲和價格的普遍跌落，或者這樣提出課題：試說明貨幣同商品對比起來它的相對價值的周期性的跌落和上漲，說法雖然不同，但課題並沒有改變，正如這一課題從德文譯成英文也並不改變一樣。因此，李嘉圖的貨幣理論用在這裡特別合適，因為它賦予同義反復以因果關係的外貌。商品價格為什麼周期性地普遍跌落？因為貨幣的相對價值周期性地上漲。反過來問，商品價格為什麼周期性地普遍上漲？因為貨幣的相對價值周期性地跌落。可以同樣正確地說，價格的周期性的漲跌就是由於價格的周期性的漲跌。課題的提法本身就假定貨幣的內在價值，即它的由貴金屬生產費用所決定的價值**不變**。如果這個同義反復有超出于同義反復的地方，那是由於它不理解最基本的概念。如果用乙衡量的甲的交換價值跌落，那末我們知道，這可能是由於甲的價值跌落，同樣也可能是由於乙的價值上漲。反過來說，如果用乙衡量的甲的交換價值上漲，情形也就相反。只要同意把同義反復變成因果關係，其他一切就好辦了。商品價格的上漲是由於貨幣價值的跌落，而貨幣價值的跌落，我們從李嘉圖那裡知道，是由於流通中的貨幣過多，也就是由於流通中的貨幣量超過了貨幣本身的內在價值和商品的內在價值所決定的水平。反過來也是這樣，商品價格的普遍跌落是由於流通中的貨幣不足使貨幣價值超過它的內在價值。因此，價格周期性地上漲和跌落是由於周期性地有過多或過少的貨幣在流通。如果有人證實，價格在流通中的貨幣減少時上漲，在流通中的貨幣增加時跌落，那末即使這樣，也仍然可以斷言，由於流通中的商品量有了某種雖然在統計上完全無從證明的減少或增加，流通

中的貨幣量就有了虽然不是絕對的然而却是相對的增加或減少。我們已經知道，在李嘉圖看來，價格的這種普遍波動就是在純粹的金屬流通中也必然發生，但由於漲跌的交替發生而抵銷，例如，流通中的貨幣不足引起商品價格的跌落，商品價格跌落引起商品向國外輸出，商品輸出引起貨幣輸入，貨幣輸入再引起商品價格上漲。流通中的貨幣過多則相反，那時會輸入商品和輸出貨幣。儘管這種普遍的價格波動產生於李嘉圖式的金屬流通的性質本身，但是它的尖銳的和急劇的形式即危機形式屬於發達的信用事業時期，所以十分明顯，銀行券的發行不是完全按照金屬流通的規律來調節的。金屬流通以貴金屬的輸入和輸出作為補救手段；而貴金屬是立即當作鑄幣進入流通的，因此，它們的流進或流出使商品價格跌落或上漲。對商品價格的這種作用，現在必須人為地由銀行仿照金屬流通規律來進行了。如果金從國外輸入，那末這就證明流通中貨幣不足，貨幣價值太高，商品價格太低，因而銀行券必須同新輸入的金成比例地投入流通。反之，它必須同金的流出國外成比例地從流通中收回。換句話說，必須依照貴金屬的輸入和輸出或依照匯率來調節銀行券的發行。李嘉圖錯誤地假定金不過是鑄幣，因此所有輸入的金都增加着流通中的貨幣，從而使價格上漲，所有輸出的金都減少着鑄幣，從而使價格跌落。這個理論上的假定在這裡變成了實際的試驗，有多少金存在就要使多少鑄幣流通。奧維爾斯頓男爵（銀行家瓊斯·勞埃德）、托倫斯上校、諾曼、克萊、阿伯思諾特以及一大批其他在英國以 «currency principle» [“通貨原則”] 派著名的著作家，不僅宣揚這種信條，而且通過 1844 年和 1845 年的羅伯特·皮爾爵士銀行條例把它變成現行英格蘭和蘇格蘭銀行立法的基础。這一信條在最大的、全國規模的試驗之後，

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遭到了可耻的破产，关于这点到研究信用學說時才能加以說明^①。但是，人們看到：李嘉圖把貨幣在其流動形式上當作流通手段孤立起來的理論，最後得出這樣的結論：貴金屬的增減對資產階級經濟起着連貨幣主義的迷信都從未夢想過的絕對影響。這樣一來，稱紙幣為最完善的貨幣形式的李嘉圖就成了金條黨的先知。

在休謨的理論或貨幣主義的抽象對立物這樣發展到了它的最後的結論以後，斯圖亞特對於貨幣的具體觀念終於由托馬斯·圖克恢復了它的權利^②。圖克不是從某種理論中，而是從認真分析1793年到1856年的商品價格史中得出他的原理的。圖克在1823年出版的他的“價格史”第一版中還完全受着李嘉圖學說的影響，徒勞無益地力圖使事實來遷就這一理論。他的“論通貨”這本在1825年危機之後出版的小冊子，甚至可以看成後來奧維爾斯頓所實際運用的那些觀點的第一次系統敘述。可是，對商品價格史的

① 在1857年的普遍商業危機爆發之前幾個月，下院的一個委員會開會研究1844年和1845年的銀行法的效果。這些銀行法的理論之父奧維爾斯頓男爵在委員會上的發言中夸口說：“由於嚴格而及時地奉行了1844年條例的原則，一切都進行得有条不紊和十分順利，貨幣制度穩固可靠，國家的繁榮無庸置疑，公眾對1844年條例的信任與日俱增。如果委員會還需要什么實際例證來說明條例所依據的原則的健全以及它所已經保證的效益，正確而完善的答復就是：請您看看四周吧；看看國內的貿易現狀，看看民眾的滿意心情，看看社會上各階級的財富和繁榮；在觀察了這一切以後，委員會就能夠決定，對於一個取得了這些成果的條例，是否應該干涉它的繼續存在。”這是奧維爾斯頓在1857年7月14日的夸口，同年11月12日，內閣却不得不由自己負責宣布停止執行這個奇妙的1844年條例。

② 圖克完全不知道斯圖亞特的著作，這從他所著的《History of prices from 1839—1847》，London, 1848 [“1839—1847年價格史”1848年倫敦版]中可以看出，書中對貨幣學說史作了綜合的敘述。

繼續研究使他不得不看到：这个理論所假定的那种价格和流通手段量之間直接联系完全是臆想出来的；当貴金屬的价值不变时，流通手段的膨脹和紧縮始終是价格波动的結果，而不是它的原因；貨幣流通只是居于第二位的运动；貨幣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还取得与流通手段这一形式規定性完全不同的其他的形式規定性。图克的精心研究不是屬於簡單金屬流通的領域，而是屬於另一个領域，因此这里还不能詳細討論，屬於同一流派的威尔逊和富拉頓的研究也一样^①。所有这些著作家都不是片面地而是从貨幣的不同要素上来理解貨幣，可是仅仅注重材料，而无視在这些要素之間或它們同經濟范疇的总体系之間的任何生动的联系。因此，他們錯誤地把不同于流通手段的貨幣同資本，甚至同商品混淆在一起，虽然另一方面他們有时也不得不承认它同后两者的区别^②。例如，如果

① 图克的重要著作，除了他的合作者紐馬奇用六卷出版的“价格史”以外，是《An inquiry into the currency principle, the connection of currency with prices etc.》，2 edition, London, 1844 [“通貨原理研究、通貨与价格的关系”1844年倫敦第2版]。威尔逊的著作我們已經引过。最后要提到的是 John Fullarton. 《On the regulation of currencies》，2 edition. London, 1845 [約翰·富拉頓“論通貨的管理”1845年倫敦第2版]。

② “應該把当作商品的貨幣也就是資本和当作流通手段的貨幣区别开来。”(图克“通貨原理研究”第10頁)“人們可以指望，当金銀到手的时候，它們能够几乎正确地实现所需要的款項……金銀和其他各种商品相比有一种无限的好处……因为到处用它們作貨幣……契約上規定用来偿还內債外債的通常总是茶叶、咖啡、糖或靛青，而是鑄币；因此，汇款时不論是用指定的鑄币，或者用能够在收款地的造币局或市場上立即变成那种鑄币的金銀条块，对于汇款人总是提供了达到汇款目的的最穩当、最直接和最确实的手段，能避免因无人需要或价格变动而产生的落空的危險。”(富拉頓“論通貨的管理”第132、133頁)“其他任何物品(金銀除外)都可能在数量上或品种上超出它們被送去的那个国家的正常需要。”(图克“通貨原理研究”)

把金運出國外，那末實際上是把資本運出國外，但是如果輸出鐵、棉花、谷物，簡言之，輸出任何商品，結果也是一樣。兩者都是資本，因此它們不是作為資本彼此區別，而是作為貨幣和商品彼此區別。所以，金作為國際交換手段的作用並不是從它作為資本的這個形式規定性產生，而是從它作為貨幣的這個特殊功能產生。同樣，當金或代替金的銀行券作為支付手段在國內貿易中發揮作用時，它們同時也是資本。但是它們不能由商品形式的資本來代替，這一點譬如說已經由危機十分清楚地證明了。因此，金成為支付手段，是由於它作為貨幣不同於商品，而不是由於它作為資本的存在。就在資本直接作為資本輸出的時候，例如，把一定的價值總額按一定利息貸給國外的時候，還要看市場的情況才能決定這筆資本是用商品的形式還是用金的形式輸出，如果用金的形式輸出，那末這是由於貴金屬作為貨幣具有不同於商品的特殊形式規定性。一般說來，這些著作家觀察貨幣，不是首先從抽象的形式上，看貨幣怎樣在簡單商品流通內部發展和怎樣從那正在經歷發展過程的商品本身的关系中成長起來。因此，他們經常動搖於同商品對立的貨幣所具有的抽象的形式規定性和隱藏着像資本、revenue〔收入〕等等更具体的关系的貨幣的規定性之間^①。

^① 關於貨幣轉化為資本我們將在論述資本的第三章即這第一篇的最後部分中加以研究。

卡·馬克思

*意大利的統一問題

像牧童謊報狼來了⁴⁰一樣，意大利人一味重複說，“意大利的激昂情緒已經達到頂點，它已經處在革命的邊緣”，而歐洲的帝王們又一味空談“解決意大利問題”，所以如果狼真的來了而沒有人發覺，如果真正的革命和全面的歐洲戰爭突然爆發而使我們感到意外，那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1859年的歐洲戰雲密布，即使法國和皮蒙特對奧地利的敵對態度和公開的備戰不會引起什麼後果，意大利人對壓迫者的刻骨仇恨隨同日益加深的痛苦也並不是不可能爆發為全面的革命的。我們僅僅說“並不是不可能”，是因為長久不能實現的希望使人痛苦，而長久不能證實的預言使人懷疑。然而，如果相信英國、意大利和法國報紙的報道，那末那不勒斯的輿論便是本國實際情況的 *fac simile* [真實反映]，而革命熔岩的奔騰也就不會比老維蘇威火山的又一次爆發更加令人吃驚。記者們從教皇國詳細地報道了教權主義政府日益嚴重的濫用職權的情況，並且還談到，羅馬居民深深相信：改革或者改良是不可能實現的，唯一的辦法是徹底推翻這個政府，假如不是駐有瑞士、法國和奧地利的軍隊⁴¹，這個辦法也許早就採用了，而且儘管有這些重大的障礙，這種行動還是隨時可能採取的。

威尼斯和倫巴第的報道則更加明確，這些報道使我們強烈地

感觉到 1847 年底和 1848 年初在这两个省出現的那些征候⁴²。大家一致抵制奥地利的烟草和工业品，叫民众不到娱乐场所去的呼吁也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意大利人有意处处表现出对大公^①以及所有的奥地利官吏的仇恨，以致忠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意大利贵族阿尔丰梭·帕尔恰公爵不敢当着民众的面向路过的大公妃脱帽致敬；为了惩罚这一行为，大公命令公爵立即离开米兰，这就使得公爵那一阶级的人也同意了普遍的要求：fuori i Tedeschi! [德意志人滚出去!] 如果民众情绪的这种无言的表露，再加上民众同兵士之间每天都发生的纠纷——这种纠纷总是由民众挑起的——以及帕维亚大学生的風潮和继之而来的大学的封闭，那末在我们面前就将重新揭开 1848 年米兰五日⁴³的序幕。

虽然我们也相信，意大利不可能永远处于目前这种状况，因为凡事都有个终结，虽然我们不知道，整个半岛都在进行积极的组织活动，不过我们暂时还是不能說，这些活动是人民意志的完全自发的表现呢，还是由路易-拿破侖及其同盟者卡富尔伯爵的代理人鼓动起来的。从表面迹象看来，得到法国，可能还得到俄国支持的皮蒙特，企图在今年春季进攻奥地利。从法皇在巴黎接見奥地利大使的情况看来，法皇对許布納尔先生所代表的政府似乎没有什么友好的願望⁴⁴；从那样强大的兵力集中在阿尔及利亚这点看来，自然会认为，对奥地利的敌对行动将从进攻奥屬意大利各省开始；皮蒙特的战争准备及其官方和半官方报纸每天所登載的近似向奥地利宣战的言論，使我们有理由推測，国王一有借口就会渡过提契諾河。此外，根据私人的可靠消息，蒙特維多和羅馬的英雄加里波

① 斐迪南-馬克西米利安。——編者注

第⁴⁵被召往都灵一說是确实的。卡富尔同他談了話，把不久即将发生的战争的前景告訴了他，并且說最好能召集和組織志願軍。作为主要当事方面之一的奥地利清楚地表示，它相信这些傳說。除了集中在它所屬的意大利各省的 12 万人以外，它正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扩充兵力，不久以前它派出了 3 万人的援軍。威尼斯、的里雅斯特等地的防御工事正在扩大和加固；在奥屬其他各省已經要求地主和一切有馬的人交出馬匹，因为騎兵和工兵需要乘騎。奥地利一方面抓紧一切机会准备“以明智的奥地利方式”进行抵抗，另一方面又采取措施准备应付可能遭到的失敗。对于普魯士这个在利害关系上正好与奥地利針鋒相对的德国的皮蒙特，奥地利至多只能指望它保持中立。奥地利派了澤巴赫男爵到圣彼得堡爭取俄国在奥地利遭受侵犯时給予支援，看来他的使命是完全失敗了。沙皇^①在許多方面的意图，以及在并不是最次要的地中海（在那里，他的船只也有了停泊場⁴⁶）問題上的意图，同他在巴黎的旧时的敌人、今日的忠实盟友的計劃太相吻合了，因此他不想保护“感恩图报的”奥地利⁴⁷。大家清楚地知道，英国人民对意大利人仇恨 *giogo tedesco* [德意志人的桎梏] 是同情的，因此，不論英国所有的大臣是怎样希望援助奥地利，但是任何一届英国內閣是否敢于这样做，这是使人不能不深表怀疑的。此外，奥地利也像其他許多国家一样坚信，以“滑铁卢的雪耻者”自居的野心家^②絕不会放棄他貶低“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⁴⁸的强烈願望，他虽然不会冒險深入敌巢实行进攻，但却会毫不犹豫地东方向它挑衅，同俄国一起进攻土耳其帝国（尽管这違背他保证土耳其帝国不受侵犯的誓

① 亚历山大二世。——編者注

② 拿破侖第三。——編者注

言)，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迫使英軍的一半兵力在東方戰場上作戰，而利用瑟堡來牽制英軍的另一半兵力，使他們不得不防守本國的海岸而不能調動。因此，奧地利非常惶惑地感到，一旦戰爭真正爆發，它就只有依靠自己。但是應當指出，為了尽可能減少萬一失敗時所受的損失，奧地利採取了許多辦法，其中之一可以說明它的厚顏無恥的創造才能。在整個威尼斯—倫巴第地區的營房、宮殿、軍火庫和其他官用建築物，雖然在營造和維修上曾使意大利人擔負了極其繁重的捐稅，然而都算是帝國的財產。現在，政府強迫各市政府以特別昂貴的价格把這些建築物全部收買下來，借口是將來政府不再把它們作為自己的財產，而願意租賃。可是即使奧地利將來還能保持統治權，市政府在什麼時候才能得到一文錢的租金，這至多只能成為一個疑問；而如果奧地利從它在意大利的全部領地或部分領地上被趕了出去，那末它就可以庆幸自己由於想出了這條妙計而把它原來要損失掉的很大一部分財產變成了便于隨身攜帶的現金。此外，有人肯定地說，奧地利正在千方百計地力圖說服羅馬教皇、那不勒斯國王以及托斯卡納、帕爾馬、摩地那的公爵們像它那樣堅決地對人民群眾或帝王企圖改變意大利現狀的一切行為反抗到底。但是誰都沒有奧地利那樣清楚地知道，它的這些可憐的工具為抗拒人民起義浪潮或外國干涉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將無濟於事。雖然每一個真正的意大利人都渴望着對奧作戰，但是我們一點不用懷疑，相當大一部分意大利人認為，法國和皮蒙特所發動的戰爭，從前景看來，結局至少是可疑的。儘管誰也不會真正相信，羅馬的劊子手在某種慈悲感的影响下會變成倫巴第的救主，然而有一小撮人贊成路易—拿破侖把繆拉特扶上那不勒斯王位的計劃，並且聲稱，他們相信路易—拿破侖的意圖是把教皇逐出意大

利或将其权力限制在羅馬城和羅馬近郊平原之內，并且帮助皮蒙特把整个北意大利并入它的版图。其次，还有一派为数不多却是正直的人，他們认为，意大利的王冠引誘着維克多-艾曼努尔，就像它曾引誘过他的父亲^①一样；他們相信，他焦急地等待着，只要有适当的时机，就拔出劍来夺取意大利的王冠，他将利用法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帮助来达到他的唯一目的——取得这个垂涎已久的宝物。此外，还有人数多得多的派，他們在受奥地利压迫的意大利各省特别是在倫巴第以及在倫巴第侨民中到处都有拥护者，他們并不特別相信皮蒙特国王或皮蒙特君主制度，但还是說：“不管他的目的怎样，皮蒙特毕竟拥有 10 万人的陆軍，还有海軍、軍火庫和資金，让他向奥地利挑战吧，我們一定跟他上戰場；他如果对事业保持忠誠，那就会得到奖賞；如果辜負了希望，那末在民族中还是有足够的力量来繼續进行已經开始了的斗争，直到胜利为止。”

与此相反，意大利民族派声称：他們认为，在法国和皮蒙特的庇护下宣布为爭取意大利的独立而战是民族的不幸。在他們看来，問題不是像人們所經常錯誤地认为的那样，在于摆脱了外国統治的意大利是以共和制政体还是以君主制政体的形式統一起来，而是在于这个办法并不能为意大利人爭得意大利，最多也只能以同样殘酷的另一个外国压迫代替这一个外国压迫。民族派认为，十二月二日的英雄⁴⁹如果不是在自己的軍队日益增长的急躁情緒或法国人民带有威胁性的态度的压力之下，是不会进行战争的；一旦被迫进行战争，他将选择意大利作为戰場以便完成他伯父^②的

① 查理-阿尔伯特。——編者注

② 拿破侖第一。——編者注

計劃——把地中海变为“法国的內湖”——，只要把繆拉特扶上那不勒斯王位，他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他将迫使奥地利接受他的条件，力图完成已經在克里木开始的对 1815 年条約的报复，因为当时奥地利是迫使法国接受使波拿巴家族受到极大耻辱的条件的一方。民族派认为，皮蒙特只是法国手中的一个工具，并且深信，拿破侖第三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就不会再冒险帮助意大利去争取他不許法国获得的那种自由，而会同奥地利媾和，并扼杀意大利人继续进行战争的一切尝试。如果奥地利大体上能守住自己的陣地，那末皮蒙特就不得不满足于将帕尔馬和摩地那两个公国并入它現在的版图；但是如果奥地利在这次战争中失败，那末就会在阿迪杰河媾和，把整个威尼斯省和倫巴第的一部分留在可恨的奥地利人的手中。关于在阿迪杰河媾和一事，民族派断言，皮蒙特和法国已經互相达成默契。虽然民族派相信，一旦发生反对奥地利的民族战争，意大利民族必定胜利，但是他們仍然断言，如果这次战争以拿破侖为鼓舞者，以撒丁国王为独裁者，那末意大利人就不能采取任何步骤来反对他們自己所承认的領袖，他們决不能防止外交騙局、投降、签订条約，結果必定是使自己重新戴上枷鎖；民族派指出了皮蒙特在 1848 年对待威尼斯和米兰以及 1849 年在諾瓦拉的所作所为⁵⁰，并且劝告同胞們从自己不幸地信任了君主的这一事件中吸取沉痛的教訓。民族派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把整个半島組織起来，喚醒民众团结起来作最后的努力，在民众还没有感到有足够的力量来发起偉大的民族起义的时候暫不进行斗争，因为民族起义在推翻了教皇、炮彈国王^①之流以后，就有可能利用有关各省的

① 庇护九世和斐迪南二世。——編者注

陸軍、海軍和軍用物資來消滅外來的敵人。他們認為，皮蒙特軍隊和人民是熱心爭取意大利自由的戰士，因而覺得，只要皮蒙特國王願意，就完全能夠促進意大利的自由和獨立；如果他站在反動派一邊，那末他們知道，軍隊和人民是會站在民族事業一邊的。如果國王不辜負他的擁護者對他的期望，意大利人很快就會以最鮮明的態度來表示他們的謝意。不管怎樣，民族本身是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的。民族派估計意大利革命的勝利將成為一切被壓迫民族為了從他們的壓迫者的奴役下解放出來而展開共同鬥爭的信號，因此他們並不害怕法國的干涉，因為拿破侖第三自己國內的麻煩事將層出不窮，即使想實現他好大喜功的野心，也無力干涉別國的事務。那末 *chi tocca-tocca* [誰先開始呢]？——意大利人這樣問道。我們不敢預言是誰最先出現在戰場上：是革命者呢，還是正規軍。然而，看來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說，在歐洲的任何地區開始的戰爭決不會在開始的地方結束；如果這種戰爭確實不可避免，那我們就由衷地、誠心誠意地希望它能真正而公正地解決意大利問題以及其他各種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它們就會常常破壞歐洲的和平，從而妨礙整個文明世界的進步和繁榮。

卡·馬克思寫於 1859 年 1 月 5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作為社論載於 1859 年 1 月 24 日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5541 號

卡·馬克思 歐洲的戰爭前景⁵¹

1859年1月11日于巴黎

奧皇對於以“奧斯特利茨會戰的荷蘭侄子”⁵²的名義從巴黎給他寄來的不平常的新年賀詞的回答，以及德行高尚的艾曼努爾在撒丁議會開幕時的講話，絲毫沒有使籠罩着歐洲的害怕會爆發戰爭的不安氣氛消散下去。在一切金融市場的中心，晴雨表都指向“暴風雨”。那不勒斯國王突然變得寬大為懷了，並對俄國抱敵對情緒；他開始整批整批地釋放政治犯，驅逐波埃利奧及其擁護者，拒絕為俄國提供亞得利亞海的煤炭基地；在米蘭、洛迪、克雷莫納、布里西亞、貝爾加莫、帕爾馬和摩地那，同德國人的爭吵和反對政府雪茄煙的消費者的運動正在繼續，而在帕維亞，奉政府的命令，大學暫時停課；被召到都靈去的加里波第受命改組志願軍；都靈正在新編一個約有 15 000 人的獵兵軍，而卡薩勒正加緊修築工事。一個約有 3 萬人的奧地利軍團，即一個滿額的 corps d'armée [軍] (第三軍) 當時大概已經開進了倫巴第一威尼斯王國，而拉德茨基學派的將軍居萊伯爵，一個具有海獺的本能的人，已經到達米蘭，要從溫和的、好心腸的、但懦弱無能的斐迪南-馬克西米利安大公手中把權柄奪取過來。在法國，軍事演習已成為經常現象，皇帝本人對於在文森試驗新式火炮一事也表現得十分熱心。最後，普

魯士政府为了扩充常备軍并把后备軍变为基干部队的附庸，向議院要了一笔款項以后，也实行起它那新自由主义制度⁵³来了。在欧洲的地平綫上烏云密布的情况下，倫敦交易所的行市下跌不多，这可能使我們感到惊奇，因为倫敦交易所通常总是比巴黎和大陆其他各地的金融观察台更准确地表明欧洲社会脉搏跳动的状况。

首先，倫敦交易所中有眼力的观察家們并不反对把拿破侖的新年怪想单纯看做是他們至圣的盟友方面所施展的一种交易所的投机手法。的确，法国的有价证券剛一开始下跌，群众便拚命冲进巴力神庙，以能够脱手的随便什么价格赶紧把国家債券以及Crédit Mobilier⁵⁴的債券和铁路股票抛售出去。后来，当把賭注押在行市上漲上的一部分投机商垮台以后，由于流傳說“通报”⁵⁵将要刊登政府的一篇短評，以冲淡“陛下”对奥地利大使的談話所产生的印象，1月6日巴黎交易所便立即稍微活跃起来了。这篇短評在1月7日星期五那天果然出現了。于是国家有价证券回升，不少以土伊勒里宮的自己人知名的精明人在那个星期五获得了巨額利潤。这些老爷就这样用最賺錢的方法撈回了他們送年礼所花去的錢。在倫敦也曾經策划了类似的阴谋，但是沒有得逞，看来并不是由于不列顛的財政能手們具有非凡的洞察力，而是由于他們暗中控制着某些負責爱丽舍宮的 menus plaisirs^①的財政管理人。可是，不列顛的有价证券之所以会比较稳定，主要却是由于另外一种对路易-拿破侖不很光彩的、而对欧洲局势則很典型的情况所引起的。沒有一个接受懺悔的牧师对悔罪美女心中的隐痛的了解，能够像礼拜堂街、倫巴特街和針綫街⁵⁶的金融生意人对欧洲各国

① 直譯是：“小乐趣”；轉意是：“花在各种怪癖上的額外費用”。——編者注

执政者的困难的了解那样清楚。他们知道：俄国需要大约 1 000 万英镑的贷款；法国虽然可以指望预算的收入能够超过支出（人们谈起这种情况时总是用的将来时），但迫切需要钱用；奥地利为了偿付一部分债务，正竭力设法至少弄到 600—800 万英镑；小撒丁正渴望得到贷款，不仅是为了进行新的意大利战争，而且也是为了偿付它因克里木战争而背上的旧债；在军队出动，血洒沙场，大炮轰鸣以前，帝王们和武士们首先必须从英国的钱包中得到总数达 3 000 万英镑的贷款。但是，要把这些金融业务全部办妥，起码还要拖上两个月；这样一来，不管从军事观点看来怎么样，如果仗非打不可，那也得推延到春天。

可是，如果匆忙作出结论，认为由于好战的恶犬们要依赖爱好和平的资本家们的裁夺来行事，这种依赖性一定会妨碍它们挣脱锁链，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利率勉强达到 $2\frac{1}{2}\%$ 的情况下，在有 4 000 万以上的黄金在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的金库中长期搁置不用的情况下，在对商业投机活动普遍失信的情况下，如果恶魔要发放新战争贷款的话，它是能够在几次假意推托和两三次虚伪劝说之后，以高于票面价值的价格售出自己的债券的。

那些可能推迟欧洲战争的情况，也正是促使欧洲战争爆发的情况。俄国在亚洲获得一连串外交上的辉煌成就⁵⁷以后，正力图在欧洲重执牛耳。事实上，正如小撒丁的国王的御前演说事先在巴黎受过审查一样，波拿巴（小拿破仑）⁵⁸的新年 *boutade*（厥辞）也只不过是圣彼得堡提出的口号的回音而已。法国和撒丁唯圣彼得堡之命是从，奥地利正处于威胁之中，英国被孤立了起来，普鲁士则动摇不定，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爆发战争，俄国的势力便会占统治地位，至少在一段时间是如此。俄国可能袖手旁观，让法奥在

斗争中互相削弱,最后它就会“减轻”奥地利这个大国的困难,而奥地利现在擋着它的南进去路并阻碍它进行泛斯拉夫主义宣传。俄国政府迟早总要过問的;它的内部困难可能通过国外的战争得到解决,并且依靠战争中的胜利,皇帝的权力就可能粉碎国内的贵族反对派。但是,另一方面,因克里木战争引起的财政负担也将大大增加,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就不得不请求贵族的帮助,这样一来贵族便会获得一种攻守两利的新武器,而农民面对着尚未履行的诺言⁵⁹,被一再的延期、连接不断的征兵和层出不穷的苛捐杂税所激怒,可能会被逼得发动起义。至于奥地利,那它是害怕战争的;但是,当然也可能把战争强加于它。波拿巴也很可能做出正确的结论:现在已经到了拿出自己主要的王牌的时候了。Aut Caesar, aut nihil! [或是完全成功,或是彻底失败!]^①第二帝国的虚伪的光荣正在迅速消失,而为了重新证明这种闻所未闻的诈骗是真实的,就需要流血。要不是波拿巴扮演意大利的解放者这样一个得益匪浅的角色,要不是现在出现英国被迫保持中立,俄国暗中支持他,皮蒙特承认自己是他的藩臣这些极其有利的情况,波拿巴能够指望获得成功吗?另一方面,法国的教权派正激烈地反对上帝的十字军远征;资产阶级正向他提醒他说过的话:«L'Empire c'est la paix»⁶⁰;英国和普鲁士暂时被迫保持中立这一情况将使得这两个国家在战争进程中能够左右局势的发展,而在伦巴第平原上的任何失败都将为这个假帝国敲起丧钟。

卡·馬克思写于1859年1月11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59年1月31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5547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① 这被认为是尤利烏斯·凱撒說的話。——編者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歐洲的金融恐慌⁶¹

1859年1月13日于巴黎

歐洲交易所中的恐慌情緒還沒有安定下來，根據十分審慎的估計，國家有價證券的價值大約下降了3億元。法國、撒丁和奧地利的國家證券下降5%，這幾個國家的鐵路股票下跌了15—35%，而倫巴第一威尼斯鐵路股票幾乎下跌了50%。除了倫敦交易所以外，所有的歐洲交易所現在都深信將會爆發戰爭。我沒有根據來改變不久前我對這個問題所發表的意見^①。我深信，路易-拿破侖實際上並不打算打仗，他的想法出不了在外交上戰勝奧地利這個圈子，這種外交勝利能使他本人和他的婁羅們即巴黎交易所的冒險家們大發橫財。波拿巴派的報刊以及賣身求榮的謠言收集家“比利時獨立報”⁶²的大叫大嚷、對戰爭準備的吹噓，都十分清楚地證明，問題不在於進行戰爭，而在於用戰爭來進行恫嚇。現在連倫敦“泰晤士報”⁶³的記者也承認，債務纏身的朝廷奴僕們又可以利用行市的下跌來大肆投機，以前所未見的規模洗劫全法國的“可敬的”投機商和少量有價證券的持有者了。據說，到1月5日為止，僅僅德·莫爾尼伯爵一人在這場交易中就至少賺了200萬法郎，

① 見本卷第186—187頁。——編者注

而从资产阶级的荷包落到波拿巴派冒险家们的荷包中去的金钱的总数，一定要比这个数目多许多倍。

促使路易-拿破仑去努力取得意大利的好感并占领对奥地利具有威胁性的障地的，有三个因素。首先是从巴黎和约⁶⁴签订以来一直把路易-拿破仑当作自己的工具使用的俄国。第二个因素人们不太知道，因为拿破仑和他的宫廷挖空心思地加以掩盖，不让公众看见它，然而这个因素的存在已被证实了。从奥尔西尼行刺以来，在他被处死前后，法国皇帝不断地收到秘密团体意大利烧炭党最高温特的许多信件，因为他在1831年曾经是这个团体的成员⁶⁵。他们提醒他，他加入这个团体时是怎样宣誓的，他怎样违背了这些誓言，以及根据该团体的章程如何惩处这类叛徒。奥尔西尼被捕入狱后，烧炭党人曾警告法皇，如果处死奥尔西尼，对他的行刺活动将继续进行下去，直到成功为止。奥尔西尼被处死以后，路易-拿破仑就收到了温特给他做出的正式死刑判决书。这位迷信很深的走运的冒险家对秘密法庭的这种判决极为震惊。他那虽然不是钢铁般的，但是已经变得迟钝和像鞣革般坚韧的神经（他在赌桌前熬夜的20年中锻炼出来的）经不起这达摩克利斯剑的经常威胁。对这种看不见的力量的神秘干预，他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根据不久前皮阿诺里的枪击和奥尔西尼的炸弹，已经有所认识；这种神秘干预恰好能使这样一种人丧魂落魄：他在直接利益的日常政策中看不出历史上的因果联系，而只是看到人类理智无法揣测的、常常把荒谬绝伦的东西奉为最高权力的某种宿命力量在神秘莫测地行动。对于威胁着他的危险的经常恐惧，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作为最近一年来他的统治特点的一连串的明显的重大失策。

事实上，为了逃避这种厄运（因为他相信意大利恐怖分子的万

能，并不亚于相信埃普塞姆賽馬場⁶⁶上茨岡女人的占卜），他必須使这种看不見的力量大发慈悲。因此，便公布了捏造的奥尔西尼的信件，企图混淆视听，使人们由此得出结论，以为实现意大利人的希望是路易-拿破侖所担负的一种神圣的义务⁶⁷。但是，要使燒炭党人滿意并不那么容易：他們仍然不断地提醒被告，說他仍然被判处了死刑，只有立功贖罪才能撤銷这种判決。最后，近来他在法国国内的处境大大地尖銳化了。最重要的問題——到哪里去弄錢？——越来越严重地摆在他的面前。已經沒有絲毫希望得到貸款，因为近来國債飞速增加，所以根本談不上這個問題。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和Crédit Foncier⁶⁸，借口兴修灌溉工程、排除沼地积水、植树造林、修筑堤壩去搜刮千百万的金錢，——所有这一切都已經做过，不能再做了。但是，在目前形势下，要用的錢越来越多；他本人的揮霍浪費，首先是貪婪的軍閥們、官吏們、冒險家們（他不得不每天出錢收买这些人，使他們忠实于他）的日益增长的要求，使金錢問題成了他的生死攸關的問題；因此，純粹从金錢着眼，以发行强制公債、掠夺和向被征服的省份要求軍事賠款为前景的战争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将是摆脱現狀的唯一出路。但是，問題不仅在財政方面，而且还在于他在法国的地位总的說来是不巩固的。問題在于意識到，他虽然依靠軍队的恩典当上了皇帝，可是他不管在反对資產階級的还是无產階級的社会輿論的斗争中都不能越过一定的界限。同时，既然他是依靠軍队的恩典当上皇帝的，他就应当执行軍队的意旨。由于这一切，他本人以及全世界都早已看得很清楚，一旦出現极端的危險，他的最后一張王牌就是战争，而且是收复萊茵河左岸地区的战争。这场战争并不一定要在萊茵河进行。相反地，上述領土可能在意大利爭奪，确切些

說，上述領土的爭奪可能在意大利開始，就像對這些省份的初次爭奪由於波拿巴將軍在倫巴第戰場上的幾次勝仗而完成一樣。

這場戰爭必然是路易-拿破侖的最後一張牌。他會把全部賭注都押在這張牌上，他這個老賭棍非常清楚，跟他對峙的是多么可怕的力量。他明白，不管他以多么神秘的姿態保持沉默，全世界還是知道，而且從他一上台就知道，他的最後一張牌是什麼。拿破侖明白，他戴着這種斯芬克斯^①的假面具在這方面並不能愚弄任何人。他明白，任何一個歐洲大國都不會容忍法國這樣擴張自己的領土，而俄國友誼的可靠性，幾乎像他自己誓言的可靠性一樣。他大為發展了路易十五的箴言 *«Après moi le déluge»* [“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並且知道這將是什麼樣的洪水，對於這樣一個人來說，每一小時都是肯定的、不可估價的一筆贏錢，用這筆贏錢他可以將賭局拖下去，贏得時間和愚弄他周圍的那些賭棍。

同時他却根本不是局勢的主宰者：必要性會迫使他比他所希望的時間更早地打出主要的王牌。至少在最近三個月中，武裝法國的工作會大規模地進行。在大量的老兵歸休以後，1858年總共征召了10萬名新兵，而和平時期通常每年只征召6萬名。一切軍火庫和兵工廠的緊張工作早在三個月以前就已使最高指揮部的全體成員確信，正準備進行一場嚴重的戰爭。現在我們得悉，各個國營鑄造廠接受了製造75個炮兵連的用炮或者說450門路易-拿破侖的新式火炮（輕型十二磅炮）的訂貨；槍彈已進一步改進（根據米涅的正式繼承人奈斯勒的建議改進）；獵兵營的人數已由400人增加到700人，基干團各營的人數已由900或1000人增加到1300

^① 希臘神話中半截獅身、半截美人的怪物，它向過路人提出難猜的謎語，誰猜不出，它就殺掉誰；轉意是：不可解的怪物，謎樣的人。——譯者注

人，增加的办法是从后备部队（它是由新兵补充的）调来 6 万左右的人；土倫正儲存軍用物資，并計劃建立两个兵营，地点还不知在哪里。可是，这两个兵营的配置是不难猜到的：一个将在里昂附近，或者偏南，靠近土倫，另一个靠近麦茨，作为对付普魯士和德意志联邦⁶⁹的監視軍。这一切不可避免地会在軍隊中极度地煽起好战情緒，他們滿有把握地估計战争必然爆发，甚至軍官們都已不再定做便服了，因为他們认为，在一个时期內他們只能穿軍装。

在法国情况是这样，而在皮蒙特，国王早在圣诞节前就已向自己的將軍們宣称，要他們做好准备，因为可能在春天来临以前他們就要聞到火药味。他不久前在議會會議上所作的開幕詞竟充滿了这样多称赞意大利爱国主义的华丽辞藻，并且竭力暗示奥地利的統治是非正义的，以致不禁使人要得出結論：他或者是下定决心打仗，或者就是甘願让全世界称他为大傻瓜。在倫巴第、羅馬和各个大公国都发生了騷动，只有 1848 年大爆发以前的騷动才能与此相比；显然，居民对外国軍隊公开表示了反抗，他們力求做到：显示对現存政权的极度蔑視，完全相信几个月以后奥地利軍隊不得不离开意大利。为了回答这一切，奥地利十分沉着地加强它在倫巴第的駐軍。这支軍隊是由 3 个軍（第五軍、第七軍和第八軍）組成的，总共有 10 万人左右。我在前一篇文章^①中已經指出，第三軍正开来增援。据报道，有 6 个步兵团（30 个营）、4 个提罗耳猎兵营、2 个騎兵团、6 个炮兵連以及第三軍的整个參謀部和工程輜重队正在途中，或者已到达倫巴第。这样一来，奧軍人数就增加到 13 万或者 14 万。这支軍隊占据着阿迪杰河和明乔河之間的陣地，至少

① 見本卷第 185 頁。——編者注

能够对付一倍以上的敌人优势兵力的襲击。

可見,到处都堆滿了易燃物。路易-拿破侖能不能应付这一切事件呢?不能。許多事情是他力所不及的。如果在倫巴第、羅馬或哪一个大公国里爆发了战争,如果加里波第將軍打进紧邻的領土并发动人民举行起义,皮蒙特和路易-拿破侖有办法坚持下去嗎?既然实质上已經答应让法国軍隊征服意大利,让那里的人把它作为解放者来欢迎,而同时奥地利軍隊又正在踐踏意大利起义的发源地,那怎么能够要求法国軍隊稍息,枪放下呢?这就是問題的关键。意大利事件的进程已經不受路易-拿破侖的意志支配了;法国国内事件的进程也随时可能摆脱他的控制。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9年1月13日

載于1859年2月1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554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路易·拿破侖的处境

1859年1月26日于巴黎

你們當然已經知道路易·波拿巴的新意大利政策和他对意大利恐怖主义者的栗栗畏惧之間的秘密联系。几天以前，你們或許已在“法国中部报”(可惜这家地方报纸从未越过大西洋)上讀到下面这段故事：

“我們提到了上星期一在土伊勒里宫举行的一次舞会。許多巴黎来信向我們报道了一件在这次盛会上引起軒然大波的事情。宾客滿堂。不知是因为一位太太暈厥，还是由于别的緣故，出現了一場混乱，三四千来宾以为发生了什么不幸，于是惊惶不安。有几个人急忙向御座奔去，皇上为了让在場的人放心，便到各个大厅走了一遍。”

不过，参加上面提到的在 Salle du Trône [宝殿] 举行的舞会的人大約有两三百人，他們是这一事件的目睹者；而这一事件并不像“法国中部报”所描写的那样。其实，来宾們不知为什么突然在各个大厅里乱窜起来了，所有的人都涌向 Salle du Trône，这时，路易·波拿巴和欧仁妮便急忙离开御座，穿过大厅，拚命地往出口跑去，并且皇后一边跑，一边勉强提着自己的裙子，面色那样蒼白，以致后来她的摯友們說：“她面无人色。”

从奥尔西尼行刺以来，这个篡位者及其伙伴們提心吊胆的不

安状况，酷似柏拉图“理想国”中很有名的一段話：

“暴君甚至不能达到他的基本目的——成为統治者。凡是暴君都是奴隶。他的内心永远充滿惊惶，为恐惧和良知的譴責所鞭撻。他日益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即成为受人嫉妒、憎恨和怀疑的人，众叛亲离和不公正的人，一切圣物的敌人和一切邪恶的庇护者与鼓励者。因此暴君是一个最不幸的人。”

波拿巴对奥地利所采取的敌对立場，虽然无疑是为了給不滿的軍隊以采取性质和它現在所执行的警察职务不同的积极行动的某种希望，但是其主要目的終究是为了消除意大利匕首的危害性，并使意大利爱国者确信，皇帝是恪守自己过去的燒炭党人的誓言⁶⁵的。拿破侖亲王，或者如巴黎人所称呼的普隆-普隆將軍，同撒丁公主克洛蒂尔达联姻，在全世界看来必然要导致法国和意大利的联合，因此，正如居住在土伊勒里宮的人們想要描述的那样，这应当是波拿巴家族第一次还意大利人的債。然而，你們是了解这位薩托里的英雄⁷⁰的！他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固执性格而聞名，但是，他的道路是曲折的，他的前进有經常的后退伴随着，而且每当他达到最高点的时候，他就要碰到会使他束手无策的极大的困难。

在发生布倫事件、斯特拉斯堡事件⁷¹，和1851年12月1日夜晚的事件⁴⁹这样一些时刻，总有一些厚顏无耻、自以为是和狂热的亡命之徒站在他的背后，不让他再延宕执行他早已想好的計劃，而迫使他走向卢比康河。在安然越过卢比康河^①后，他又照旧搞他慣于搞的狡詐勾当、罪恶詭計、秘謀，照旧犹豫不决和委靡頹丧。他由于虛伪成性，对自己的計劃也采取两面手法。例如，这一次和

① “越过卢比康河”是句成語，即破斧沉舟之意，源出公元前49年，古羅馬凱撒不顾禁令，揮师越过卢比康河，引起內战，結果建立了羅馬帝国。——譯者注

撒丁結亲的事情，就是 8 个月以前在一場应由法国领导的意大利十字軍远征的借口下策划出来的。在屡次企图置身皇室之列都未得逞之后，竟能在虛伪的借口下把欧洲一个最古老王朝的代表人物的女儿誘入波拿巴家族的罗网，这倒是一种不坏的政治手腕啊！

但是，路易-拿破侖有更加充分的理由，使他在召唤人們进行战争的末日审判的号声响起之后实行 *reculade*〔退却〕并采取安撫的策略。在他統治的整个期間，資產階級还从来没有表现出这样明显的不滿迹象，而資產階級仅仅由于战争的傳聞而引起的惊慌，在交易所、农业市場和工业中心汇成了巨大的震蕩。金融巨头們提出了抗議。法兰西銀行經理德·日尔明尼伯爵亲自告訴皇帝說，坚持执行危險的政治方針，必然会使全国的商业生活受到震蕩。

馬賽、波尔多以及其他大商业城市的行政官在报告商业界空前未有的混乱状况时，突出地暗示了这些“财产和秩序之友”的不忠順的迹象。梯也尔先生认为这是打破自己的长期沉默，在布满政府密探的沙龙里公开而尖銳地批評土伊勒里宮的“瘋狂政策”的良好时机。他从政治上和战略上对战争的可能性作了詳尽的分析，证明說，如果法国在战争初期除驻扎在阿尔及利亚和留守国内的士兵以外不能拥有 40 万士兵的話，它就不能避免失敗的命运。甚至政府的“立宪主义者报”⁷²，虽然用的是假装憤懣的腔調，但也不得不承认，法国的威風凜凜的气焰已經消失了，它像一个胆小鬼似的一想到严重的战争就怕得要命。另一方面，下級密探異口同声地报告，单是法国的专制者打算扮演意大利的解放者这一角色的想法就已引起了居民的嘲笑。而且除了这些嘲笑之外，还起勁地唱着极不恭敬的譏諷与撒丁結亲的歌曲。有一首諷刺歌曲是这样开头的：

“这一次普隆-普隆应该成为瑪丽亚·路易莎的丈夫。”⁷³

尽管向所有的行政官发出了旨在安定民心的訓令，尽管官方严詞駁斥了关于存在什么威胁 *status quo* [現狀] 的危險的謠言，而普遍的混乱远沒有平息下去。首先，在这里大家都知道，有人曾迫使土伊勒里宮的这位半神人走得比他打算的还要远些。据傳，克洛蒂尔达公主虽然年輕，但却性格坚强，她在接受普隆-普隆的求婚时說道：“我和您結婚，是为了保证我的父王得到法国的支持。如果对这一点沒有充分的信心，我是不会和您結婚的。”当她的父王还沒有得到法国給予积极援助的“坚决保证”时，她拒絕訂婚。因此，路易·波拿巴应该同維克多-艾曼努尔訂立攻守同盟⁷⁴——这是普隆-普隆的代理人力图馬上在“比利时独立报”上向全欧洲宣布的事实。这个普隆-普隆及其僕从們所追求的，实际上是，在目前充当培尔西尼在布倫远征时以及莫尔尼、弗略里和圣阿尔諾在12月1日夜晩所充当的角色，即把路易·波拿巴拋向卢比康河。正如你們所知道的，普隆-普隆并沒有英勇善战的名声。在克里木战争期間，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物，連一个普通士兵所必须具备的勇敢精神都沒有；他甚至連騎馬都騎不穩。然而，他現在却是波拿巴王朝的真正的瑪尔斯。做倫巴第的准国王，在他看来，是登上法国宝座的一个必經的步驟。他的伙伴們变得这样傲慢，以致在談到皇帝的意旨时，他們的首領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竟敢当着差不多20个人的面宣称：“你們說的是哪一个皇帝？唯一的真正的皇帝是住在帕勒-乐雅尔宮⁷⁵里的那个。”当政府的报纸装模作样地宣揚和平的时候，普隆-普隆的喉舌“新聞报”⁷⁶却极其冷靜地天天鼓吹备战。当路易·波拿巴故作姿态地劝說維克多-艾曼努尔抑制馬志尼分子的时候，普隆-普隆却在唆使国王“鼓

励他們”。当波拿巴把像尼耶尔將軍这样一些最保守的人派去做他的堂弟到都灵去时的随員时，普隆-普隆为了使自己的 entourage〔周圍〕具有一种革命外观，同意只有在曾任 1848 年法兰西共和国部长的比克西奥先生的陪同下，才肯前往。可是人們却說：“如果路易-拿破侖不准备鋌而走險的話，那就再没有什么比普隆-普隆的装腔作势及其伙伴們所发表的文章更危險的了。”这就是顾虑仍然沒有消除的原因。另一方面，誰都明白，如果路易-拿破侖慑于法国资产阶级的叫囂和欧洲各个王朝的反对，而在維克多-艾曼努尔声誉敗坏和法国軍隊的好战狂达到最高峰之后实行退却，这就无异自杀。为了給軍隊一个 quid pro quo〔代用品〕，据說他打算派軍隊进行一次不管什么样的海外远征——远征摩洛哥、馬达加斯加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未列入維也納議定书⁷⁷的遙远的地方。但是，与这个戴皇冠的騙子手的願望相反，任何一个意外事件都可能導致同奧地利的战争。

卡·馬克思写于 1859 年 1 月 28 日

載于 1859 年 2 月 18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56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法国军队

巴黎“立宪主义者报”不久以前发表了一份材料，想要证明法国在一旦发生战争时可以向国外派出 50 万军队。⁷⁸ 根据昨天“美国信使报”⁷⁹ 上发表的、盖亚尔德先生从巴黎寄出的那封信来看，这份材料及其所依据的数字是皇帝本人直接交给我们的巴黎同行发表的，事先并没有通知他的任何一个大臣。这份材料的第一点说，如果把所有的归休兵都召回，并且不再让他们归休，那末到今年 4 月 1 日法军将有 568 000 人；如果把 1858 年的全部应当征集的人员都征集入伍，法军人数将再增加 64 000 人；并且一旦宣战，法国政府可以完全有把握地召集服役期满的老年兵作为志愿兵，同时召集年轻的志愿兵，总数至少为 5 万人。这样加在一起就有 682 000 人；按照我们的戴皇冠的统计家的统计，各类军队的人数如下：

步兵.....390 978 人	辎重兵..... 10 120 人
骑兵..... 83 000 人	近卫军..... 29 942 人
炮兵..... 46 450 人	其他..... 49 000 人
工兵..... 12 110 人	
	共 計.....621 600 人

这个总数少了 6 万人，是一个明显的错误；皇帝笔下疏忽，忘

了把这 6 万人归类。但是問題不在这里。我們假定 682 000 人这一数字是正确的。一旦爆发战争，将有 10 万人作为担任国内警备勤务的后备部队。他們要 25 000 名宪兵来支援；而在阿尔及利亚，有 5 万人就足够了。从上述总数中减去这 175 000 人，还有 507 000 人。但不知皇帝陛下又把 1 万人弄到哪里去了，他不从 682 000 人而从 672 000 人中减去这 175 000 人，結果野战部队的数量就减少到了 497 000 人。这样，根据我們这位权威人士的資料，到 1859 年 6 月 1 日，法国不必对军队的現行編制作任何变动，就可以有 50 万人用于国外作战。

現在我們来看一看，法軍实际的編成是怎样的。任何一支军队所采用的現行編制，在某种程度上都限制着扩充军队的能力；各兵种的营和連(步兵营、騎兵連、炮兵連)的人員、馬匹和火炮，都不能超过一定数量，否則就会破坏体制，使各兵种失去自己的战术特点。例如，法軍步兵营是由 8 个連編成的，每連通常有兵士 118 人，要把各連的人数增加一倍，就必须根本改变兵士的基本訓練和营訓練；同样地，法軍炮兵連要把火炮数量由 6 門增加到 8 門或 12 門，就不能不引起类似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步兵連和炮兵連如不分为更小的单位，就会非常臃肿龐大。可見，任何军队的編制都給军队的人数規定了一个限度；如果超过了这一限度，就必须編成新的部队。但是，既然建立一定数量的新的部队就瞞不住社会輿論，既然“立宪主义者报”声称目前还没有必要建立新的部队，那末我們可以用法軍在对俄战争⁸⁰結束时的編制作为今天法軍所能容納的人数的最大限度。

編制复杂的法軍基干营，由 6 个基干連和 2 个精兵連組成，其人数未必能超过 1 000 人。这样，100 个基干团，每团 3 个营，就有

30万人。我們之所以特意把第三营包括在內，是因为第三营虽然一直到对俄战争开始时还只作为后备营，但是以后就編成了基干营，而每团又建立了3个补充后备連，这些連目前无疑还存在。这300个后备連共計約36 000人。chasseurs à pied〔猎步兵〕共20个营，它們主要应当以单个連为单位，而不是以整个营为单位进行战斗，每营兵力可能多些，約有1 300人；20个营共有26 000人，而且它們几乎沒有后备部队，因为它們由其他各团得到大量人員的补充。近卫軍由2个步兵师組成，一直到同俄国締結和約时每团都只有2个营，这一数量和“立宪主义者报”的說法是一致的，按照他們的說法，近卫軍的步兵將編成18个营，即18 000人。上述各部队組成法軍的全部步兵，担任非洲勤务的部队不包括在內。担任非洲勤务的部队計有：9个朱阿夫营，共9 000人，此外約有500人編为后备連；3个惩戒营(捷菲尔兵)，共3 000人；9个阿尔及利亚(土著)猎兵营，滿額时共有9 000人⁸¹。这样，法軍步兵各部分的总数如下：

基干部队(包括后备部队在內)——336 000人，編为300个营和300个后备連。猎兵——26 000人，編为20个营。近卫軍——18 000人，編为18个营。朱阿夫兵——9 500人，編为9个营。捷菲尔兵——3 000人，編为3个营。阿尔及利亚土著猎兵——9 000人，編为9个营。

共計401 500人，編为359个营和300个后备連。

其中有36 500人屬於后备連，換句話說，就是在法国国内和国外担任作战勤务的部队有365 000人。

据估計，法国騎兵在1856年包括：12个重騎兵团，其中有72个騎兵連(14 400人)，12个騎兵后备連(1 800人)；20个基干团，

其中有 120 个騎兵連(24 600 人), 20 个騎兵后备連(3 820 人); 21 个輕騎兵团, 其中有 126 个騎兵連(27 100 人), 21 个騎兵后备連(4 230 人); 4 个非洲团, 其中有 16 个騎兵連(3 000 人), 4 个騎兵后备連(450 人); 3 个土著团为 12 个騎兵連(3 600 人)。

共計 346 个野战騎兵連(72 700 人) 和 57 个騎兵后备連(10 300 人)。此外, 还必須加上近卫軍騎兵的 30 个野战騎兵連(6 000 人)。

总計 376 个野战騎兵連, 共有 78 700 人; 57 个騎兵后备連, 共有 10 300 人。

然而不应当忘記, 法国虽然从 1840 年起在改良馬种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 但是所产的馬仍然很不适于担任騎兵勤務。只是在最近几年作了很大努力, 耗費了大批經費之后, 法国才得以主要用自己的馬匹来装备騎兵, 但是情况仍然不很好。而且, 这实际說来也只能滿足軍隊平时的需要, 即大概不超过 5 万匹馬的需要; 虽然法国可以用阿尔及利亚的馬來装备軍隊, 但是仍然必須从国外购买大量馬匹, 其中有不少是其他国家的騎兵卖出的不适于服役的馬匹。目前, 法国騎兵的馬匹是从德国购买的, 而奥地利政府在不久前已禁止經過西南边境輸出馬匹。由于存在以上这些困难, 就不用担心法国騎兵有一天会超过上述数字, 而且, 如果它不依靠掠夺手段得到比現在更多的好馬, 那末除了装备有阿尔及利亚馬匹的人数不多的騎兵部队以外, 也不用担心法国騎兵有一天会出色地作战。

炮兵, 包括近卫軍炮兵在內, 可能有 5 万人左右, 編成 207 个野炮連, 共有 1 242 門火炮。其中至少有 5 000 人編入各炮兵后备連。工兵的数量不会超过 9 000 或 10 000 人, 但是我們根据“立宪

主义者报”的說法，將工兵算作 12 000 人。輜重兵、工役連、医务人員等一切非战斗人員，在战时大約有 11 000 人。可見，法軍按其現行編制可以容納的人數最多为：

	战斗部队	后备部队	共 計
步兵·····	365 000 人	36 500 人	401 500 人
騎兵·····	78 700 人	10 300 人	89 000 人
炮兵·····	45 000 人	5 000 人	50 000 人
工兵·····	12 000 人	—	12 000 人
非战斗人員·····	—	11 000 人	11 000 人
总 計·····	500 700 人	62 800 人	563 500 人

这一总数，和法軍采用通常的补充措施所达到的数量是完全一致的。每年有 10 万青年应征入伍，但是以前在平时实际上編入各团的只有 6 万人，而且因为他們服役期限規定为 7 年，所以軍队数量不可能超过 40 万或 42 万人。但是，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实际的服役期限很少超过 4—5 年，因此，那时軍队的实际数量不超过 30 万人，而其余的都是归休兵。但是，由于从那时起每个步兵团增加了一个营，每个騎兵团增加了一个連，此外还建立了近卫軍⁸²，因此軍队的編制扩大了許多，軍队数量几乎可以增加到 60 万人；除了进行民族防御战争以外，法国在任何时候也未必能同时拥有比这更多的受过訓練的兵士。

这样，如果我們把上述数字加上 49 000 名宪兵、市警备队以及任何人都不知道的、“立宪主义者报”为了得出他們所需的总数而加进去的“其他兵力”，那末軍队的总数和这家报纸所說的法軍到 1859 年 4 月 1 日应有的人數大体是一致的。但是这里开始发生分歧。我們最后得出的总数包括有 300 个步兵后备連和 57 个

騎兵后备連，它們的編制只够容納本身現有的 46 800 名步兵和騎兵，并对他們进行初步訓練。我們假定，这些步兵和騎兵突然編入各团，补上那些服役期滿的兵士的位置，而把新兵編入各个后备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后备連应当訓練多少新兵呢？应当訓練 1859 年征召的 10 万新兵以及至少 2 万名未受訓練的志願兵，一共 12 万人，也就是比后备部队所能容納的数量多 7 万人。这时，无疑地在 4 月 1 日到 6 月 1 日这段期間內每个步兵团的 3 个后备連将扩大为 1 个滿額的营，而在每个騎兵团里，騎兵后备連必須由 1 个增加到 2 个。因为如果說現在全軍只是担任警备勤务，后备連只不过是新兵的轉运站，尙未受过訓練或者稍受訓練的新兵要尽快地由后备連轉到团內去接受訓練，那末不应当忘記，在战时，当軍队担任战斗勤务时，后备部队就必须充分地装备和訓練兵士，使他們在編入各团时就能够担任勤务。由此可見，“立宪主义者报”断言，法軍不需要建立新的部队，就可以扩充到 70 万人，这种說法是完全脫离实际的。由 300 个后备連編成 100 个后备营和建立 57 个补充騎兵后备連，就必须要在作战部队特別需要軍官和軍士的时候至少抽調出 2 000 名軍官和 1 万名軍士。

但是，我們假定法国将征集 70 万人（不过我們完全沒有肯定地說法国在战争开始时不能征集这么多青年），那末其中能有多少人能够担任勤务呢？不超过 58 万人；根据“立宪主义者报”的看法，其中 5 万人应当用来駐守阿尔及利亚。宪兵和担任內务勤务的其他部队的数量，我們不应当算 25 000 人，而应当按照“立宪主义者报”最初的統計算 49 000 人。这样，还剩下 481 000 人。然而，我們的戴皇冠的笔友如果认为，保卫王朝可以只依靠 12 万名未受訓練的新兵、49 000 名宪兵和其他的軍事警察，那末大概是过

于相信自己王朝的穩固了。后备部队要組成除巴黎和里昂以外的其他重鎮的守备部队，未必够用。巴黎和里昂这两个城市，路易-拿破侖是无论如何不会交給未受訓練的新兵去防守的；虽然“立宪主义者报”认为，有4万人就足够用来扼守这些地方，但是可以肯定地說，为了这一个目的而使用10万人，也并不太多。然而，如果我们減去守卫法国各大城市以及受保皇派影响的南方地区所必需的10万人，那末法国可以用于国外作战的軍队总数將减少到381 000人。其中至少要有181 000人作为監視軍，駐守在同比利时、德国和瑞士接壤的边界上，而用来进攻意大利的兵力，就只有20万了。我們肯定地說，在明乔河与阿迪杰河强大陣地上的15万奧軍，至少同30万法軍和撒丁軍队勢均力敌，如果真正爆发战争，那末总有一天他們会证明这一点的。

弗·恩格斯写于1859年1月31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1859年2月24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5568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弗·恩格斯

德国的兵力

不久以前，路易-拿破侖把他能用来对付奥地利的兵力吹嘘了一番，于是德国的报纸也发表了一些材料来吹嘘德国在爆发战争时可能联合起来对付法国的军事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总的说来很不确凿，也缺少根据，因此我们不得不从原始资料和官方文件中搜集一些事实和数字，并且在这里提供给读者。

一旦发生对法战争，奥地利军队无疑比其他各邦用来对法作战的军队强大得多。奥地利的步兵包括 62 个基干团（每团包括 1 个掷弹兵营、4 个基干营和 1 个预备营），共有 310 个野战营和 62 个后备营；14 个边屯团（每团包括 2 个野战营和 1 个预备营），除 1 个独立营外，共有 28 个野战营和 14 个后备营，此外还包括 32 个猎兵营。奥军各营的人数是不一样的，因为每营包括 4—6 个连不等。满额时，奥军步兵人数为：

基干部队·····	370 000 人
边屯区 ⁸³ 各团·····	55 000 人
猎兵部队·····	32 000 人

共 計·····457 000 人(包括后备营在内)

基干团和边屯团装备的是滑膛短銃枪，这种短銃枪的击发机虽然结构特殊，但决不是最完善的，不过这种枪的性能很不错。边

屯团的每个連有 20 枝步枪。32 个猎兵营装备的都是步枪，但是这种枪的射程比法国米涅式步枪或英国恩菲耳德式步枪要近得多。奥地利步兵在各方面都是第一流的，虽然同英国步兵或普魯士步兵（他們的每个兵士都装备着远射程的步枪）比起来，装备較差是一个不利的条件，但是奥軍兵士并不比任何欧洲国家的兵士差。而且如果不算法軍的 20 个猎兵营，如果将来法軍不改变基干步兵的装备，那末奥軍同法軍或俄軍比起来，也不存在装备差这一劣势。

奥地利騎兵包括 16 个重騎兵团和 24 个輕騎兵团，重騎兵团由 6 个連組成，輕騎兵团由 8 个連組成，此外，每团各有 1 个后备連。重騎兵連在其編成內有 194 人，輕騎兵連有 227 人。这样編成的奥軍騎兵团比法軍騎兵旅要强。总計奥軍有 67 000 名配有駿馬的騎兵，而且大部分輕騎兵是由匈牙利和波兰这两个生来就是騎手的民族組成的。无疑，这 67 000 人比路易-拿破侖所要派出的 81 000 名法国騎兵强。現在，奥地利騎兵无疑是无与倫比的。

炮兵包括 12 个野炮团（每团 13 个八門制炮兵連）、1 个岸防炮团和 1 个包括 20 个連的火箭团，共計 1 248 門火炮、240 个火箭发射管，共有 5 万人。此外，工兵、医务人員以及其他人員共約 2 万人。

全部奥軍，包括輜重兵和其他人員在內，在平时总共有 58—60 万人。其中通常約有 20 万人是归休兵（目前也是如此），只有 40 万人服現役。但是一旦发生战争，可以征集入伍的不仅有这 20 万人，还有 12 万預备兵（就是服役 8 年回家后轉入 2 年預备役的兵士），如果相信奥地利人的說法，那末所有这些应征人員在 14 天內就可以武装起来。而奥地利帝国的潜在力量决不只限于这些。

边屯区沒有预备兵，但那里每一个男子在 60 岁以前都是兵，随时都可以应征入伍。1848 年，这一地区提供的军队在意大利拯救了拉德茨基，同时也就是拯救了奥地利君主国。大家都还记得，这些健壮的斯拉窝尼亚人是怎样被编成了一营又一营而派到意大利去的；顺便提一句，从起义者手中夺回维也纳的那支军队中，就有这样的部队⁸⁴。这一地区在平常的情况下只有 55 000 人的军队，必要时则可提供 20 万名兵士。所以，奥地利军队（包括预备兵在内），只要加上边屯区的 8 万名兵士，就有整整 80 万人，而随着边屯区各营的陆续编成，还可增加 10 万人以上。由此可见，奥地利如果有必需的财力的话，它就有足够的兵力单独防守自己的意大利领地，对付法国和皮蒙特联军的袭击。

普鲁士是第二个强国。这个王国的步兵包括：36 个基干团和近卫团（共有 108 个营）；9 个预备团（共有 18 个营）；加上 8 个预备营和 10 个猎兵营，总共有 144 个营，战时约有 15 万人。加上第一类后备军 116 个营，约 12 万人，一共就有 27 万人。战时，8 个预备营根据 36 个基干团和近卫团的数量，扩编为 36 个后备营，而 9 个预备团以及与其相应的用后备军编成的 9 个营担任警备勤务；这样，野战部队共有 228 个营，约 23 万人。

骑兵包括 38 个基干团，每团 4 个连，共 152 个连，以及第一类后备军的 34 个骑兵团，136 个连，共约 49 000 人。

炮兵包括 9 个团（每团 11 个八门制炮兵连）和担任要塞勤务的 4 个连，共有 792 门野炮和 2 万人。

工兵、辎重兵以及其他部队，共为 4 万人。

由此可见，普鲁士军队的基干部队和第一类后备军，总共有 38 万人，其中至少有 34 万人可以随时出动。第二类后备军没有组

織，它实际上只用来担任要塞勤务。但是一旦发生战争，以步兵和炮兵而言，大约在4个月内可以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而骑兵还不見得能較好地执行野战勤务。但无论如何，可以大胆地估計，第二类后备軍有10万或12万人可以代替同样数量的基干部队担任警备勤务。可見，普魯士能够征集一支50万人的軍队；此外，还有大量受过战斗訓練的人員，按現行編制无法編入第一类后备軍，但可以用来編成新的部队。

由于普魯士軍队規定的服役期限不长（3年），以及整个第一类后备軍平均有4—5年不在軍队內服役（除了几个很短的时期外），因此在战争开始时，普魯士軍队的人員质量将不如奥地利軍队。但是，普魯士人很爱好軍事，因此只要經過几个星期的軍事行动，他們就能成为很好的兵士。普魯士所担心的，只是战争最初的一两个月。由于軍队一大半是由民兵組成的，因此不适于进攻，但是能很出色地进行防御，因为除了瑞士⁸⁵以外，各国都沒有像普魯士这样一支拥有全民武装的軍队。在装备方面，整个近卫軍以及每个基干团中的1个营，都装备着射程达1000碼的新式針发枪，除英国恩菲耳德式步枪外，这种針发枪在射程方面超过了目前軍队装备的其他一切火枪。其余的基干部队装备的是普通火枪，但是用极簡單的方法按照米涅的原理刻上膛綫以后，在射程和射击精度方面和真正的米涅式步枪相差不了多少。第一类后备軍在征集入伍后，也装备針发枪。可見，在欧洲，除了英国步兵外，普魯士步兵的装备是最优良的。

奥地利編成德意志联邦軍队的第一、二、三軍，普魯士編成第四、五、六軍。巴伐利亚則編成第七軍，它有义务按一般編制員額提供36500名兵士，并提供17800名預备兵，共計54300人。但

是，巴伐利亚军队的实有人数要多得多，它一共有 54 个步兵营，54 000 人，56 个骑兵连，9 000 人，火炮 224 门，炮兵 5 600 人，此外还有工兵等等，总共有 72 000 多人，而且服完现役的、年龄在 27 到 40 岁的预备兵还没有计算在内；他们可以编成新的部队。

第八军按编制员额和预备兵员额应有：

维尔腾堡.....	21 000 人	实有.....	19 000 人
巴登.....	15 000 人	实有.....	15 000 人
黑森—达姆斯塔德...	9 300 人	实有.....	10 500 人
<hr/>		<hr/>	
共 计.....	45 300 人	实有.....	44 500 人

第九军按编制员额和预备兵员额应为 36 000 人，但是实有 44 000 人。

第十军应有 42 000 人，我们假定实有人数与此大致相同。预备师（诸小邦军队的编制员额）约有 17 000 人。这样，得出的总数如下：

奥地利.....	800 000 人
普鲁士.....	400 000 人
巴伐利亚.....	70 000 人
第八军.....	45 000 人
第九军.....	44 000 人
第十军.....	42 000 人
预备师.....	17 000 人
<hr/>	
总 计.....	1 418 000 人

在这支庞大的兵力中，后五个组成部分，共 218 000 人，经常处于充分的战斗准备状态，而且这只是有关各邦召回全部归休兵后的平时正规部队。因此，这些邦能够很容易地再提供 10—15 万人，但是因为对这些人员没有进行任何组织，所以同普鲁士第二类

后备軍一样,我們根本沒有把他們計算在內。毫無疑問,奧地利在两个星期內可以武装起 70 万人。普魯士征集預备兵(归休兵)所需的时间更少,征集以后,基干部队可以按滿員的建制扩充到 225 000 人。所以,在两个星期內,德国可以派出 115 万人,过一个月可以再派出 27 万人。甚至在这以后,德国仍掌握有普魯士的全部第二类后备軍、巴伐利亚的全部預备兵員以及奥地利边屯区約 10 万名兵士。在这些力量全部动用以后,而且也只有在这以后,才有必要采取非常措施。

由此可見,德国所拥有的兵力十分雄厚,只要有統一的坚强的指揮,即使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同时进攻,也沒有什么可怕的。但是能否这样使用軍隊,当然还是个問題;不过,如果在共同作战中有一些猜忌、犹豫和因循,就会使軍隊行动困难,以致失敗,而現在的德国各邦的政府就可以卷起鋪盖,因为它們很快就得逃跑。1859 年的德国不同于巴塞尔和約时期以及耶拿、奧斯特利茨和瓦格拉姆时期的德国⁸⁶,正如今天的法国不同于 1793 年革命时的法国一样,因为 1848 年虽然沒有什么重大的結果,但是毕竟在德国全境各个角落的人民中間激起了民族感情,甚至在过去被指責为亲法分子的那些人中間也激起了民族感情。路易-拿破侖可能还想扮演意大利解放者的角色,但是他在萊茵地区是不敢这样做的;即使他在战争取得了局部的胜利,那也只能引起德国的革命,这将使他遭到彻底的失敗,而革命的影响会使他搖搖欲墜的帝位受到威胁。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2 月 10 日

載于 1859 年 3 月 12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58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

1796年，波拿巴將軍下了濱海阿尔卑斯山，在德果、密雷栖摩、蒙特諾特和蒙多維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会战，就夺取了整个皮蒙特和倫巴第。⁸⁷ 他的軍隊在进到明乔河以前，一直順利前进，沒有遇到任何抵抗。但是到了明乔河，形势就根本改变了。曼都亚的城墙擋住了他，而这个当代最偉大的統帥为了征服这一障碍，竟用了9个月的时间。第一次意大利战争的整个后半期都是为了攻占曼都亚。里沃利、卡斯提奥涅、阿尔科列会战以及經過布兰塔河河谷的进军——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达到这个主要目的。⁸⁸ 拿破侖一生有两次为要塞所阻：第一次是在曼都亚，第二次是在但澤⁸⁹。拿破侖很清楚地知道，曼都亚是意大利的鎖钥。这个地方，他从占領时起，直到离开帝位时止，就一直沒有放棄过；这一时期，他在意大利的統治从来沒有遇到过重大的危險。

意大利的地理形势清楚地說明，哪一个强国能够控制北意大利，即羅馬人的南阿尔卑斯高卢，它就能統治整个意大利。波河流域总是决定半島命运的戰場。从馬利尼亞諾会战和帕維亚会战起，經過都灵、阿尔科列、里沃利、諾維和馬達峨等会战，一直到庫斯托查和諾瓦拉会战，所有爭夺意大利統治权的决战，都正是在这里发生的⁹⁰。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不論是法国人或者德国人，只

要能把对方逐出波河河谷，就能够使对方同狭长的半島隔絕，并使这个半島同它的同盟国隔絕。这个半島是意大利人口最少、文化最低的部分，它如果被迫仅仅依靠本身的资源来維持，很快就不得不屈服。而在这个波河流域，最居中的一个障地就是曼都亚。它距亚得利亚海和地中海同样远，約为 70 英里；因此，这个障地如果由野战軍来防守，便可以确实封鎖半島的一切入口。此外还应当补充一点：这个障地处于湖泊之間，并有三个桥头堡供軍隊进出，而且在四周的地形上有許多纵横交錯的河流，能把圍攻軍隊割裂成彼此孤立的各个部分，曼都亚的这一形势在战术上有巨大的优势；无怪乎古諺說：曼都亚在誰手，意大利归誰有。

这几点就足以說明，纵然奧軍仅仅握有曼都亚一地，想把他們赶出意大利，也不是很容易的。当代第一个統帅需要 9 个月来完成的事情，前瑞士炮兵上尉⁹¹在同样期間是做不到的。但是，倫巴第的情况从軍事观点来看，从 1796 年以来，甚至从 1848 年以来，已經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848 年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來說与 1796 年的战争正好相反。1796 年的战争证明了曼都亚在防御战中所能起到的作用，而 1848 年的战争則证明了曼都亚同培斯克拉、列尼亚哥和維罗那合在一起在进攻战中所具有的作用。从此以后，奥地利参謀部和奥地利軍事工程师苦心孤詣、ensemble〔同心协力地〕从各方面研究并改进了这个出色的障地——大概是全欧洲最好的障地，这使他們得到了最大的荣誉。

我們来看一下地图。明乔河是由加尔达湖流入波河的一条很小的河，在夏季有許多地方可以徒涉而过，但是整个說来，它是适于作为防御障地的。这一綫应由培斯克拉算起到博尔戈福特（虽然后者并不在明乔河边），長約 30 英里，因此居中配置的軍隊能以

一日行程到达这条綫的任何一端。这条 30 英里的短綫，右方（北方）为加尔达湖和提罗耳阿尔卑斯山脉所掩护，左方为波河所掩护，成为奥軍用来抵抗从西方入侵的敌人的第一道有利的防綫。但是这不是它唯一的长处。在加尔达湖和明乔河、波河东面 10—30 英里处，几乎与它們平行地流着一条阿迪杰河，形成第二道更为强大的防綫，这是在一年四季都只有架了桥才能通过的障碍。我們看一下地图就可以知道，这条双綫使提罗耳和邻近的奥地利各省天然地紧密連成一个整体；从軍事观点来看，这条双綫成为这一整体中必要的补充部分。奥地利政策的原則声称明乔河綫是德国的防御所必需的，必須在波河上保卫萊茵河，其根据也就在这里。

这个障地按其天然条件來說已很坚固，再經過人工修筑就更坚固了。明乔河綫被曼都亚要塞截为两段。这个要塞离河口非常近，所以要塞下游那一段河流可以完全不必考虑。这样，明乔河綫又大約縮短了七八英里；該綫的南端由形成两岸桥头堡的第一流要塞所加强。該綫的另一端，即河湖相連的地方，有培斯克拉小要塞作掩护。当然，这个要塞不很坚固，并且在 1848 年曾被皮蒙特軍队占領过。但是，它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抗偶然的攻击，因此只要奥軍进行野战，这一要塞就能守住；同时它保障奥軍能到达明乔河西岸。

1815 年以前，阿迪杰河綫一直被忽視。从 1797 年到 1809 年，它是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間的边境綫；但是从 1815 年起，奥地利占領了該河两岸。在离曼都亚約 25 英里的地方，在阿迪杰河上有一个小要塞列尼亚哥；然而离培斯克拉最近的城市維罗那当初却没有設防。但是，奥地利人很快就发现，要使这个障地真正發揮它应有的作用，就必须使維罗那成为要塞。而他們也就这样做了。

不过，由于奥地利人所特有的办事迟缓的旧习性，他们对完成这个任务极不重视，以致到 1848 年革命爆发时，虽然阿迪杰河左岸（即东岸）的、可以被用来对付奥地利的工事倒构筑得相当不错，但是朝着敌人的那一岸，相对说来却几乎是沒有设防的。

拉德茨基和他的参谋长海斯和雪恩海斯，在被革命逐出米兰以后，就立即开始纠正这个缺点。他们在西面围绕维罗纳的高地上构筑了工事，使敌人不能对要塞围墙进行射击。他们做到这一点，是奥地利的一件幸事。当时，明乔河线被迫放弃。培斯克拉受到了皮蒙特军队的围攻；皮蒙特军队几乎接近了维罗纳多面堡的围墙。但是在这里，他们被挡住了。桑塔路其亚会战（1848 年 5 月 6 日）向他们表明，继续对维罗纳防御工事进行任何攻击，都是完全无济于事的。

但是整个北意大利完全为革命军掌握了。拉德茨基除了他的四个要塞（其中，他以维罗纳作为自己军队的营垒）以外，已经一无所有。当时，在他的正面前和两侧的地区以及几乎整个后方地区，都为敌人所控制。甚至和提罗耳的交通也受到威胁，有时还被截断。但是，由努根特将军指挥的一个师还是在起义的威尼斯省打开了一条道路，并在 5 月底与拉德茨基会合。那时，拉德茨基表明，他掌握了这个刚刚为自己筑成的出色的障地，能发挥多大的作用。由于在这个搜括一空的维罗纳四郊再也无法养活自己的军队，由于兵力过于薄弱不能进行决战，拉德茨基便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巧妙的侧敌行军，把自己的军队经过列尼亚哥转移到曼都亚；然后，在敌人尚未弄清真相以前，拉德茨基又由曼都亚向前推进，到明乔河西岸攻击敌人；他把敌人的封锁线向后压缩，使皮蒙特的主力军不得不撤离维罗纳。然而他无力防止培斯克拉的陷落。在

取得了向曼都亚的进军所预期的一切战果以后，他重新集合了自己的军队，经由列尼亚哥向维琴察出发，并从意大利军队手中夺回了该城；于是，他便控制了大陆上的整个威尼斯地区，恢复了自己的交通线，并得到了自己后方广大富饶地区的资源；此后，拉德茨基又重新退入他的要塞维罗纳，但是，皮蒙特军队对于把奥军逐出维罗纳这一点已经完全失望，以致无所事事地消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正在这时，奥军3个强大的旅开到了，于是局势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3天的时间内，拉德茨基肃清了阿迪杰河和明乔河之间的高地上的皮蒙特军队，同时在曼都亚附近迂回皮蒙特军队的右翼，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使他们在退到提契诺河彼岸之前，一直没有作任何抵抗。

拉德茨基进行的这个战局说明，一个将军，即使他的兵力比敌人薄弱，只要依靠防御得很好的河网体系，就可以扭转局势。无论皮蒙特军队在什么地方或者想把战线转到哪一方面，他们总是无法攻击奥军，并且，他们在最后失败前的5个星期内的混乱行动显然说明，他们处于怎样一种无能为力的境地。那末，拉德茨基障地的力量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简单地讲，这些要塞的作用在于它们不仅掩护拉德茨基的军队不受攻击，而且还迫使敌人分散兵力，而拉德茨基却可以在要塞掩护下，集中兵力在任何一点上，来对抗当面的那一部分敌军。培斯克拉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敌军；拉德茨基在维罗纳的时候，曼都亚则牵制了另外一部分敌军，而当拉德茨基刚刚前往曼都亚时，维罗纳又迫使意大利军队留下一个军来监视它。不仅如此，皮蒙特军队还不得不以分散的部队在两岸地区行动，并且这些部队中没有一个可以迅速支援其他部队，而拉德茨基却能够凭借他的要塞和桥头堡任意把他的全部军队从河这

岸轉移到河那岸。如果皮蒙特軍隊能够支援維琴察和威尼斯省，那末这些地方是决不会丢失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拉德茨基攻占了这两地，而皮蒙特軍隊却被維罗那和曼都亚的守軍牵制住了。

在阿尔及利亚，当法軍纵队需要通过敌人的地区时⁹²，他們編成四个步兵方队，使这些方队居于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四角，而騎兵和炮兵則在中間。如果阿拉伯人来进攻，步兵便以坚决的火力击退他們，一当进攻者陷入混乱，騎兵立即冲到他們中間，这时，火炮卸下前車，以便對他們进行射击。騎兵如果被击退，就可以在步兵方队后面得到可靠的掩护。对于同优势敵軍作战的軍隊來說，要塞体系，特別是設在河网中的要塞体系所發揮的作用，正如成密集队形的步兵对于这些非正規的紊乱部队作战时所發揮的作用一样。維罗那、曼都亚、培斯克拉和列尼亚哥形成方队的四个角，只要其中的三个沒有被敌人占領，那末就不可能迫使較弱的軍隊放棄它的障地。但是怎样才能攻占这些要塞呢？如果奧軍无力进行野战，培斯克拉的确随时都是容易被攻克的；而曼都亚，在1848年敵軍甚至沒有企图对它进行封鎖，更不用說圍攻了。封鎖曼都亚需要三路軍隊：一路在明乔河西岸，一路在东岸，这两路軍隊用来圍攻，第三路軍隊則用来对付維罗那的奧軍，以掩护圍攻。但是，奧軍如果在河流和要塞之間进行巧妙的机动，就可以用**全部**兵力 ad libitum〔任意〕攻击这三路軍隊中**任何**一路。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进行圍攻呢？仅仅一个曼都亚，波拿巴將軍經過9个月的努力才用圍困的方法夺取了它，那末在依托于維罗那、列尼亚哥和培斯克拉各要塞的軍隊的支援下（这支軍隊能够在明乔河或者阿迪杰河两岸集中兵力，进行机动，同时他們的退路也絕不会被截断，因為他們有两条交通綫，一条經過提罗耳，另一条經過威尼斯省），曼

都亚会比以前强大多少呢？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这个障地是欧洲最强大的障地之一，并且因为奥地利人不仅在那里构筑了足够的工事，而且也完全了解它的意义，所以我们认为，配置在这个障地上的 15 万奥軍，是用不着害怕数量比他們多一倍的敌軍的。

然而我們假定他們被逐出这个障地，假定他們丢失了曼都亚、培斯克拉和列尼亚哥，但只要他們握有維罗那，并且沒有被完全逐出野战障地，他們就可以使得任何一支法軍向的里雅斯特和向維也納的进軍成为非常冒險的行動。奥軍一方面守住維罗那作为前哨障地，一方面可以退到提罗耳补充人員，再迫使敌人分散兵力。一部分敌軍将圍攻維罗那，另一部分必須防守阿迪杰河谷；这样一来，敌人是否还有足够的兵力向維也納进軍呢？即使有的話，提罗耳的軍队也可以經過布兰塔河谷（波拿巴將軍在 1796 年曾使奥軍接受了一次极其惨痛的教訓，因此他們了解到布兰塔河在战略上的意义）来襲击他們。但是如果奥軍沒有其他部队防卫直接通往德国的道路，这样的做法就是絕對錯誤的。因为奥軍把主力調到提罗耳阿尔卑斯山，敌人也仍然能繞过該地，并在奥軍走出山地以前到达維也納。但是我們假定維也納已經設防（我們估計，这一工作正在进行），那末这种考虑就不存在了。奥地利軍队会及时赶到，来为維也納解圍，并且只要扼守住阿尔卑斯山，就能保卫克倫地亚边境，从而威胁入侵軍队的左翼，使他們担心在巴薩諾附近或者在科涅利安諾附近遭受襲击，担心在通过該地区后交通綫立刻会被截断。

附带說一下，奥地利人借口明乔河綫是德国南方的自然疆界，企图以此证明他們侵占意大利是有理由的，而德国南方疆界这样的間接防御正好駁斥了这种論調。如果情况真如这种論調所說的

那样，那末莱茵河就应当是法国的自然疆界。在一种场合有效的一切论据，在另一场合也可能完全适用。但是，幸而法国既不需要莱茵河，德国也不需要波河或者明乔河。谁要从翼侧迂迴别人，他也会被别人迂迴。威尼斯省可以从翼侧威胁提罗耳，而提罗耳则可以威胁整个意大利。直通米兰的博尔米奥山口，可以用来为进攻的里雅斯特和格腊迪斯卡的敌人准备第二个馬連峨，这恰恰就和大圣伯納德山口对于向瓦尔河一綫进攻的梅拉斯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⁹³。归根到底，在战争中，谁能够更持久、更成功地进行野战，谁就有更大的可能获得胜利。让德国紧紧握有提罗耳吧，那样，它便完全可以让意大利在平原上为所欲为。只要德军能够进行野战，威尼斯省是否在政治上从属于德国，那是沒有多大意义的。从军事观点看来，德国的阿尔卑斯山疆界控制着威尼斯省，这对于德国說来，应当是很够了。

当然，这純粹是意大利和德国之間的关系問題。一当法国插手，情形便不同了；如果法国以全力来干涉，交战的每一方当然都会尽可能保卫自己的障地。德国将会放棄明乔河綫以及阿迪杰河綫；但是只有把它們让給意大利而不是让給其他国家，它才能够放棄它們。

一直到現在，我們还只是研究了奥軍方面采取防御战的前途。但是如果发生战争，那末他們的处境将迫使他們采取进攻战的計划。关于这个題目，我們在下一篇文章里再談。

弗·恩格斯写于1859年2月中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59年3月4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5575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卡·馬克思

不列顛工厂工业的状况

1859年2月25日于倫敦

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工厂視察員們公布了关于他們各自的視察区到1858年10月31日为止定期的半年报告,我也照例把我对这些极端重要的工业通报⁹⁴的簡評寄給你們。綜合报告这一次压缩得只有几行字,它仅仅指出,除了苏格兰一地而外,工厂主違反关于未成年工和女工的工作時間,特别是他們吃飯時間的法律的事件,确实急剧地增加了。因此,視察員們认为,他們有責任坚决要求頒布一个补充法令来取締这些違法行为。

他們說：“工厂立法的缺点使視察員及其助理极难执行揭发和惩处違反工厂立法的人的任务,而且极难实现本立法有关限制工作時間、保证工人們在一天中有充分的可能来休息和吃东西等极其重要的事情的确切意图。因此有必要对各項法律做某些修改。如果議會預料到,有人会这样規避法律,它就一定会事先做出相应的决定,以防止这种情况。”

因为我认真地研究了产生現行工厂法的热烈的議會辯論,所以,我不贊同工厂視察員們的結論,并繼續坚持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制定工厂法的明显意图,就是使人有一切可能去違反和迴避这些法律。促使这些法律产生的土地占有者和工厂主之間的强烈敌意,終究由于这两个統治階級对那些他們称之为“黎民百姓”的人

的共同仇恨而緩和了。同时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向那些不顾万能的階級利益，以道义上的英勇气概、頑强的毅力和出众的智力起来保护被压迫群众的不列顛工厂視察員表示敬意。在我們这个普遍崇拜瑪門的时代，这样的人是不可多得的。

第一篇报告的作者是萊昂納德·霍納先生，他的視察区包括英格兰的工业中心，即整个郎卡郡、柴郡和得比郡的一部分、約克郡西区和北区以及英格兰北部的四个郡。因为工厂法現在还在受到工厂主方面的毫不調和的反对，而且几乎每年都要进行爭取廢除这些法律的議会运动，所以，霍納先生一开始就維護一項使童工和女工摆脱无情的自由貿易法的无限控制的立法。官方的經濟学家們宣称，工厂立法是与一切合理的“原則”相矛盾的，其后果对工业无疑将是十分有害的。霍納先生回答第一种反对意見时說：

“因为在一切工厂中大笔固定資本都投到厂房和机器上去了，所以机器工作的时数越多，得到的收入也就越多。不言而喻，如果完成这种工作对人沒有害处，也就不会从立法上对这种事情进行任何干涉了。但是，已經发现，为了使資本获得更多的利潤，童工、男女未成年工和女工每天工作時間过长，而且常常加夜班，这种現象根本不能保持他們的健康，同道德、儿童教育、正常生活完全不能相容，使人根本不能合理地享受絲毫的生活乐趣，所以，道德原則最起碼的要求促使立法机关取締这种极其不良的現象。”

換言之，霍納先生說出了这样一个思想，就是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在經濟学家和他从理論上代表的那些階級看来，随便什么原則，不仅是違反人类良心一切准則的原則，而且像毒瘤一样吮吸整代人的生命液那样的原則都可以认为是“合理的”原則。至于那些工厂法的反对者借口說什么这些工厂法阻碍着工业的发展，霍納先生举出事实来反駁他們的空談。在根据下院 1835 年 3 月 19 日的決議出版的一个报告中，这个視察区的工厂数和在厂里做工的

人数为：

	工厂数目	在厂里做工的人数
棉紡織业·····	775	132 898
毛紡織业和精梳毛紡織业·····	220	8 738
亚麻·····	60	3 546
絲綢·····	23	5 445
共 計·····	1 078	150 627

在 1857 年 2 月提交下院的一个报告中，数字是这样的：

	工厂数目	在厂里做工的人数
棉紡織业·····	1 535	271 423
毛紡織业和精梳毛紡織业·····	181	18 909
亚麻·····	49	6 738
絲綢·····	46	10 583
共 計·····	1 811	307 653

这两个統計表的資料表明，在 22 年中棉紡織厂几乎增加了一倍，在厂里做工的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在毛紡織业和精梳毛紡織业中工厂数目大大减少，而在厂里做工的人数却增加了一倍以上，这证明資本在积聚，小工厂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工厂排挤掉了。在亚麻生产中也可以看見同样的过程，只是規模比較小些。絲綢工厂数目增加了一倍，在厂里做工的人数也几乎增加了一倍。

霍納先生指出：“但是，工业的进步并不是限于工厂数目的增加，因为对各种机器实行的重大改进大大地提高了机器的生产力。”

这里重要的关键是，这些改进（特别是有关在一定時間內大大增加机器速度的問題）的动因无疑地是由于立法上限制工作時間所提供的。

霍納先生說：“這些革新和工人有可能更認真工作的情况，产生了我有机会不止一次肯定过的一种結果，即在較短的时间內可以完成通常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完成的工作。”

就在霍納先生的視察区，自从工业状况在不久以前得到了改善以来，愈来愈經常地发生蓄意和自觉違反限制工作时间的各項規定的事件和違反关于工人年齡和从8—13岁的童工(法律規定，他們的工作時間應該減半)上学的各項規定的事件。報告說：

“一些工厂主迷恋于增加利潤，在他們的道德規範中違反議會決議并不是犯罪，他們的盤算是，就算他們的行為被揭露而被課以任何数量的罰款，那在他們由于不遵守法律規定而賺得的利潤中也只占很小一部分。”

要了解这个在历次报告中一再提出的平常的控訴，首先必須注意到，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官都是工厂主或他們的親屬，其次，法律規定的罰款是很少的，最后，只是在“沒有反证”的情况下，未成年工和女工才被認為是在工作。可是，霍納先生說：

“对于不誠实的工厂主來說，再也沒有比提出反证更容易的了。为此，他只要在視察員剛一出現的时候关上他的蒸汽机就行了，那时全部工作都会停止；在每一次报告中，視察員都要证明，控訴中所提到的人是真正在工作时被发现的。剛一开始非法的工作（这在一天的不同時間里要发生六次，因为一天的工时总数是由許多小部分組成的）就派人出去望哨，只要視察員一来，就馬上发出信号，关上机器，叫工人离开工厂。”

助理視察員只有采用正派人所厌恶的警探手法，才能抓到罪证。由于視察員及其助理在他們的視察区里很快就被别人熟識了，所以他們就失去了发现最狡猾的違法者的可能性，于是他們只剩下一个唯一的办法——求助于他們邻区的同行，这些同行由于被誤认为是前来办貨的外地商人，才能逃过工厂主設在各个火車站上的密探的眼睛。

下述这份霍納先生視察区在半年內工业生产中的伤亡通报一定会使那些研究軍事科学的人感到兴趣,他們会相信,以人体的各个部分,例如手、手臂、骨胳、脚、头部和面部作为奉献給現代工业的經常貢品,超过了許多被认为是流血最多的战役中的伤亡。

机器造成的不幸事故

伤害的种类	成年工		未成年工		童工		总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死亡.....	4	—	3	1	2	—	9	1
截断右臂或右手.....	2	—	1	—	—	—	3	—
截断左臂或左手.....	2	—	1	1	1	—	4	1
截断右手的一部分.....	8	19	14	14	6	4	28	37
截断左手的一部分.....	14	14	8	12	5	3	27	29
四肢和身体骨折.....	18	4	10	4	3	3	31	11
手或脚骨折.....	26	27	23	19	8	9	57	55
头、面部受伤.....	11	16	12	13	7	1	30	30
裂伤、碰伤和上列伤亡以外的其他损伤.....	146	97	122	138	33	35	301	270
共 計.....	231	177	194	202	65	55	490	434

非机器造成的不幸事故

伤害的种类	成年工		未成年工		童工		总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死亡事件.....	3	1	—	—	—	—	3	1
头、面部受伤.....	2	—	1	—	—	—	3	—
裂伤、碰伤和上列伤亡以外的其他损伤.....	3	2	4	2	—	1	7	5
共 計.....	8	3	5	2	—	1	13	6

第二篇报告是約翰·金凱德爵士写的，其中包括了全苏格兰的資料；正如他指出的，在苏格兰，調整工厂中女工、未成年工和童工劳动的各项法律，仍然得到严格的遵守。这种情况并不包括关于童工的学校教育的規定，因为苏格兰的工厂主显然有一种慣用的手段，能够使他們的年幼的工人从专门为发文凭而建立的学校中得到文凭，童工根本不到这些学校去上課，即使有人去上課，那里也根本不能对童工进行什么教育。为了证实这一点，只要举出两件事来就够了。1858年，約翰·金凱德爵士在助理視察員坎伯尔先生陪同下，訪問了两所学校，在格拉斯哥的几个印花工厂做工的童工通常是从这两所学校获得文凭的。报告中說：

“第一所学校屬於布里季頓的斯密斯小巷的安·基林女士；我們去訪問时，校舍里沒有儿童；当我们請基林女士按字母說出她的姓来时，她就手足无措地先說了一个«C»，但馬上更正說，她的姓的头一个字母是«K»。但是，我察看她在儿童文凭上的签字时发现，她的姓并不是始終都写得一样的，而且她的笔迹证明，她根本没有能力教书，她自己也承认，她不会記課堂日志。我訪問的第二所学校屬於考尔頓的朗德列西街的威廉·洛古，他发的文凭我也认为有責任說是无效的。校舍長約15英尺、寬10英尺，我們數了一下，这个校舍中共有75个儿童，他們在那里大声乱叫乱嚷。我請教师給我叫出几个儿童的名字来，根据他来回环視那群儿童的神情，我了解到，他不知道哪个儿童来上課了，哪个沒有来。”

实际上，工厂法有关教学的条款虽然要求童工要有上学的证明，但是，並沒有要求童工从那里得到什么知識。

在苏格兰，机器造成的不幸事故是237起，其中男工58起，女工179起；其他不幸事故只有10起。需要做截除手术的不幸事故的数目在增加，輕伤事故也在增加；但是，不同的是受害者大都是1858年下半年就业的工人。死亡事故只有一起。根据苏格兰西部各区助理視察員的报告看来，1857年停业的一些棉紡織厂还没有

复工，时兴的印花布生产全年的开工情况也萎靡不振。約翰·金凱德爵士从东部地区得到的最新报告說，丹第和阿布罗思有些工厂由于不久前破了产和其他原因，已經停工，其他几个被认为是充分开工的工厂，也有許多机器沒有开动；报告說，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生产过剩，从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运来的亚麻比往常少，以及由此引起的原料价格的昂貴。平常在厂里做工的人数减少了，可以看出，亚麻厂主們实际上已經企图在蕭条現象尚在繼續的时候把工厂开工的时间縮减到每周 42 小时。另一方面，在那些生产毛織品的地区，特别是制造“苏格兰呢”的地区，在这个日益扩大的生产部門，在哈里季、加拉希耳茲、塞耳克尔克等地，却出現十分兴旺的复苏景象，而且一切工业部門都在开足馬力进行生产，只有手紡織业是例外，由于机器紡織机数量的增加，手紡織业正逐漸衰落，很快就会完全消失。

約翰·金凱德爵士提出了下面这个統計表來說明 1835 年到 1857 年这 20 年中，苏格兰工厂工业各部門的变化情况：

年 份	工 厂	工 人 人 数		
		男 工	女 工	总 計
1835.....	各种棉紡織厂 159	10 529	22 051	32 580
1857.....	152	7 609	27 089	34 698
1835.....	毛 紡 織 厂 90	1 712	1 793	3 505
1857.....	196	4 942	4 338	9 280
1835.....	亚 麻 厂 170	3 392	10 017	13 409
1857.....	168	8 331	23 391	31 722

关于其他两篇报告,我在下一篇文章中再作评述,尤其因为罗伯特·貝克先生的报告中包含有会使任何国家的工业家感兴趣的

材料。

卡·馬克思写于 1859 年 2 月 25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9 年 3 月 15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584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弗·恩格斯 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 取胜的可能性

最热心拥护和平的朋友们，对保持欧洲和平开始失去了最后一点微弱的希望。他们现在不再谈论和解的可能性，而在谈论将要交战的双方取胜的可能性。因此，让我们继续从军事观点来研究一下波河河谷的特点，以及这一河谷能够给彼此对峙的法国-撒丁联军和奥地利军队提供哪些作战条件。

我们已经叙述了奥军在明乔河和阿迪杰河的坚强障地^①。现在谈谈另一方面。大体从西向东流的波河有一个大河湾，它从西北向东南流约16英里，然后又折向东流。这个河湾位于撒丁境内，距奥地利边境约25英里。由阿尔卑斯山向南流的塞齐亚河在这个河湾的北端流入波河，而从亚平宁山向北流的博尔米达河则在河湾的南端流入波河。无数小河在上述两河与主流汇合处附近流入这两条河，因此在地图上看来，这两条河以西的地区是一片宽广的河网地区，这些河流都是起源于呈半圆形从三面环抱皮蒙特的山脉，并且流向一个共同的中心，好像是从圆周引到圆心的许多半径。皮蒙特这一有利的防御障地的情况就是这样。对于这一

① 見本卷第213—220頁。——編者注

障地，拿破侖早就了解得很清楚；但是，不論拿破侖还是接替法国統治这一地区的撒丁政府都忽視了这一障地，一直到 1849 年撒丁遭到惨敗后才开始在这里构筑防御工事。但是甚至在那时，防御工事也是构筑得非常緩慢，而且在用錢方面极其吝嗇，以致到目前这一工程还没有完成，并且那些本来应当有石砌內岸和外岸的防御工事，現在为了在今春能够完工，也筑成了简单的野战工事。

在塞齐亚河和波河汇合处以西約 4 英里，在波河上有一个卡薩勒城，它設有防御工事并且还在繼續加固中，目的是使它成为障地北翼（即左翼）防御的基础。在塔納罗河和博尔米达河汇合处，也就是在博尔米达河和波河汇合处上游 8 英里的地方，有一个皮蒙特最强大的要塞亚历山大里亚，現在这一要塞已成为掩护整个障地南翼（即右翼）的巨大营垒的中心。这两个城市之間的距离为 16 英里，并且波河又与連接这两个城市的道路平行，距道路約 5—6 英里。配置在这个障地上的軍队，左翼既有塞齐亚河掩护，又有卡薩勒和波河掩护，而右翼則有亚历山大里亚以及在該城附近汇合的奥尔巴河、博尔米达河、貝尔博河和塔納罗河掩护。障地的正面有波河河灣作掩护。

如果撒丁在这个障地上集中 8—9 万人的一支軍队，那末它便有 5 万人可以进行积极行动，来襲击那些企图在南面諾維和阿庫伊附近或者在北面韦尔切利附近迂迴这个障地的任何軍队的翼側。因此可以认为，都灵也受到这个障地的很好的掩护，而且，这个首都有一個城砦，要占領它，必須預先进行正規的圍攻，但是，如果不預先把皮蒙特軍队逐出营垒，那末迂迴这个障地的任何一支軍队，都无法进行圍攻。然而，卡薩勒—亚历山大里亚障地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沒有纵深，而且它的后方又完全沒有掩护。奧軍在明

乔河和阿迪杰河之間有一个四边形要塞区，四个角上各有一个要塞作掩护；而皮蒙特军队在波河和博尔米达河上的一条防綫，只是两翼各有一个要塞作掩护，正面有很好的防御，但他們的后方却是完全暴露的。由南面迂迴亚历山大里亚是冒险的，并且作用較小；但是却可以由北面迂迴卡薩勒，即使在韦尔切利附近不能迂迴，那末至少可以在塞斯托-卡兰德、諾瓦拉、比耶拉、桑提亚和克列申丁諾附近进行迂迴。如果数量上占优势的军队在卡薩勒以西渡过波河，并攻击皮蒙特军队的后方，皮蒙特军队将不得不立即放棄坚固的筑垒陣地这一有利条件，而在平地上应战。这种情形将是馬連峨会战的重演，不同之处只是在博尔米达河的另一岸而已。

这样，我們叙述了波河流域的两个作战基地——在前一篇文章中叙述了奥军的基地，在本文以上各段中則叙述了法国—皮蒙特联军的基地，——現在我們研究一下如何利用这些基地的問題。展开地图，我們首先看到，属于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脉整个东北部分，也就是由日内瓦到距离斯特尔維奧山口不到 1 英里的地方，将成为中立地区，一直到交战的一方认为有必要破坏这个中立的时候为止。由于目前瑞士人正在聚集一支相当强大的军队来进行防御，所以在战争一开始时这种中立馬上遭到破坏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此，在目前，我們把瑞士看作是真正中立的、双方不可侵入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法军进入皮蒙特的道路只有四条。里昂军团将經過薩瓦和蒙塞尼山口。較小的部队可以通过布里昂松和蒙热涅夫尔山口；这两支兵力都将通过阿尔卑斯山，在都灵会合。集中在普罗凡斯的军团，一部分可以由土倫通过尼斯和田达山口，一部分可以在土倫乘船用短得多的時間到达热那亚。这两部分军队的集中地点是亚历山大里亚。虽然在这里还有其他几条道路，

但是这些道路不是不便于大的部队通过，便是在通往上述集中地点的各条道路中只有比較次要的意义。

法国的意大利軍团（我們現在可以大胆地这样称呼它），已根据上述形势配置好了。軍队的两个主要集中地点是里昂和土倫；小部队集中在这两地之間的罗尼河河谷，准备經由布里昂松出动。为了迅速地把一支强大的法軍集中在波河河谷的亚历山大里亚和卡薩勒地区，的确需要利用上述所有的道路，这时，最大的部队将通过里昂和蒙塞尼山口，較小的部队将通过布里昂松和蒙热涅夫尔，在普罗凡斯的軍团則应当把尽可能多的兵力由海道运到热那亚，因为从瓦尔山口經過田达山口前进的軍队，到亚历山大里亚需要 10 天以上的時間，而取道海路，則可以在 24 小时內由土倫到达热那亚，由此再經過 3 天强行軍或者 4 天正常行軍，就可以到达亚历山大里亚。

如果我們假定（而实际上可能就是这样的），只要有一个法国步兵营进入皮蒙特，奥地利就会立即宣战，那末請問，奥地利的意大利軍团可能采取哪一种行动呢？他們可能留在倫巴第按兵不动，靜待 20 万法軍和 5 万皮蒙特軍队集中，然后放棄整个倫巴第，在敌人面前退到他們在明乔河上的作战基地。这种行动会使奥軍意志沮丧，而使他們的敌人因为輕易取得意外的胜利而士气昂揚。或者奥軍可能在倫巴第开闊的平原上等待法軍和皮蒙特軍队的进攻。在这种場合下，因为他們只有 12 万人来对抗数量上多一倍的敵軍，所以会被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击败，并且还会因为意大利人在全国各地举行起义而处于困境。固然，奥軍可以勉强到达他們的要塞，但是这个强大的作战基地将只能用来进行沒有成果的防禦，因为野战軍的进攻力量在这时已消耗殆尽。在增援部队由

奥地利内地赶来以前，这个要塞体系的最重要的作用——使比较薄弱的军队利用它作为基地，有掩护地向比较强大的军队进行有效的攻击——就完全不能发挥了；而在这一期间，培斯克拉可能陷落，列尼亚哥也可能陷落，经过威尼斯省的交通线也必定会被截断。上述两种作战方法都是不利的，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能采用。但是，奥军还有一着棋可以走。

奥军至少可以出动 12 万人。如果他们很好地选择战机，那末和他们对抗的仅仅会有 9 万皮蒙特军队，并且其中只有 5 万人可以参加作战。法军正沿着四条都是通往亚历山大里亚的道路前进。在这四条道路之间，也就是在蒙塞尼山口到亚历山大里亚的一线与热那亚到亚历山大里亚的一线之间，总共约有 140 度的角度；因此，法军各个集团在尚未集中之前是谈不上相互协同的。如果奥军能够很好地选择战机（我们在 1848 年和 1849 年曾经看到他们善于做到这一点），从正面攻击皮蒙特军队的作战基地，或者由北面迂回它，那末我们就敢断言，即使皮蒙特军队发挥了应有的勇敢精神，他们也很少可能经受住奥军优势兵力的攻击；一当皮蒙特军队在野战中被逐退而不得不只进行消极的要塞防御战时，奥军便能在法军各个集团从阿尔卑斯山或者亚平宁山走出时，以优势兵力逐个地攻击他们。纵然奥军被迫退却，只要瑞士保持中立，奥军的北翼就有掩护，退却也是有保障的，并且奥军在到达曼都亚以后仍然能在自己的作战基地进行积极的攻势防御。

奥军另一个可能的作战方法是：在托尔托纳郊区占领阵地，等待法军纵队由热那亚向亚历山大里亚进发，因为这时它必然要在奥军面前暴露自己的翼侧。但是，这个进攻方法是非常不高明的，因为法军也许会安然地停留在热那亚，一直等到其他的纵队集

中在亚历山大里亚为止，到那时，奥军不仅会完全失掉一切优势，而且与明乔河和阿迪杰河的通道也可能被切断。

我们假定，奥军被击败而不得不退到他们的作战基地；但是法军一进到米兰以东，也可能为奥军所迂回。经由斯特尔维奥山口来的道路从提罗耳沿阿达河河谷直通米兰；经由托纳列山口来的道路沿奥利奥河河谷、经由朱迪卡里耶来的道路则沿基泽河河谷通到伦巴第的中心，通到从西方攻击明乔河的任何一支军队的后方。奥军经过提罗耳，可以迂回整个伦巴第和威尼斯省，并且如果有必要的准备，奥军在任何一天都可以在伦巴第平原上给敌人造成新的马连峨。只要瑞士保持中立，敌人是无法施用同样的军事计谋来对付进攻皮蒙特的奥军的。

因此，在意大利目前的情况下，奥地利最好的作战方法就是进攻。直接插到正在集中的敌军之间，是拿破仑善于巧妙使用的、现代战争中最出色的有效战法之一。而且正是在同奥军作战中，拿破仑最成功地使用了这一战法；蒙特诺特、密雷栖摩、蒙多维和德果等会战⁸⁷便证明了这一点，阿本斯堡和埃克穆尔会战⁹⁵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奥军在索马康帕尼亚⁹⁶和库斯托查，尤其是在诺瓦拉，显然表明他们已从拿破仑那里学会了这个战法。因此，这样的战法在目前对奥地利来说似乎是最适合的；虽然采取这一战法必须极其慎重，并且必须准确掌握作战的时间，但是，如果奥军仅限于单纯防御他们的领土，那末终究会错过极好的胜利机会的。

弗·恩格斯写于1859年2月底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1859年3月17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86号

卡·馬克思

英国議会改革的新法案⁹⁷

1859年3月1日于倫敦

迪斯累里先生在2月28日下午的會議上向下院透露了政府的議会改革法案的秘密。这个法案可以簡略地叫做洛克·金先生法案,因为这个法案規定把各郡的选民选举資格限制由50英鎊降低到10英鎊。⁹⁸这种降低在某种程度上被抵銷了,因为居住在有权选派代表参加議会的各城市中的有40先令收入的自由农⁹⁹在各郡中都被剝夺了投票权;而且这个法案也被斑駁杂陈的一大堆难以理解的选举特权裝飾着;这些特权一方面总的說来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它們也只会加强現存的阶级壟断。关于让大多数人民参加选举、对一切选区权利平等、保证秘密投票这些重要問題,甚至沒有提到。我对这个法案的評語是确切的,这可以从对法案基本原則的下列簡要叙述中得到证明;这些基本原則就是:应该为各郡和各城市的租賃者制定一种統一的选举法;換句話說,1832年的議会改革法案中規定各郡的租地者的財產資格限制为50英鎊的契安多斯的条文应该取消¹⁰⁰。不动产租賃者的选举法适用于各种不动产,不管这种不动产是否包括建筑物。根据紐馬奇先生估計,在各郡实行10英鎊的財產資格限制,将使各郡选民人数增加103 000人,而迪斯累里先生认为,各郡选民将增加20万。另

一方面，40先令的自由农名义上照旧都有选举权，但是，居住在城市中的、由于自己占有自由土地在此以前一直在各郡享有投票权的40先令的自由农，现在却失去了这种权利，因为他们必须在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投票。这样一来，大约有10万选票将从各郡转移到城市，同时，大约有4万名（甚至可能更多）不是经常居住在各郡的选民的权力完全被剥夺了。这就是新法案的实质。它用一只手夺去了另一只手给予各郡选举权的东西，它所特别关心的是，要彻底消除1832年议会改革以来城市通过购买40先令的自由农的土地而对各郡选举所起的影响。迪斯累里先生在议会提出法案时所做的长篇演说中，想竭力证明，最近15年来，40先令的自由土地已由各城市广泛地建立了工厂，以致：

“各郡不住在那里的选民人数，目前已超过了根据关于租赁者选举权的条文进行投票的选民人数”，结果在选举那天，“一些大城市就会乘铁路之便把城市里的选民大批运往各郡，仅仅某一个城市俱乐部的成员人数就会在数量上压到经常居住在那里的选民”。

为了维护各郡的利益，布莱特先生对这位绅士的演说作了有力的回答：

“您的目的是还要进一步限制各郡的选举权。看来，你最害怕不过的就是那些积极的选区，特别是各郡的那些积极的选区。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在英国大部分地区，各郡选民人数都没有增加，而且有很多郡甚至还减少了。纽马奇先生指出，有11个郡，在1837—1852年这15年中，选民人数减少了2000人以上，但是仅英格兰和威尔士各郡有投票权的总人数在这15年中却增加了36000人，其中17000人以上都是郎卡郡、柴郡和约克郡西区增加的。在英国的其他地区，购买自由土地是如此困难，农场的规模扩充得这样大，结果总的说来，各郡的选民人数，几乎不是没有变化，就是必定减少了。”

現在我們放下各个郡來談談小城市吧，这里我們會看到一些新的難以理解的選舉特權，這些特權部分地是從 1852 年和 1854 年約翰·羅素勛爵提出的兩個未獲通過的法案¹⁰¹ 中抄來的，部分地也應該歸功於費盡心機想出矛盾百出的倒霉的印度法案的埃倫伯勒勛爵的天才¹⁰²。在這些特權中，首先有所謂教育優惠條件，正如迪斯累里先生諷刺地指出的，這些教育優惠條件雖然不以某一學科為轉移，但是這意味着各有關階級的教育“要求耗費相當多的金錢”，因此可以歸入合乎財產資格限制的總的一類。根據這種優惠條件，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英國教會以及其他一切宗教團體的教士、律師、私法律師和公證人、辯護士和法院代訴人、醫生、領有執照的教師，總之，從事各種自由職業的人，或者法國人在基佐先生時代通常稱之為“賢者”的人，都享有選舉權。因為這些“賢者”有很大一部分已作為有 10 英鎊收入的契約農¹⁰³ 而享有選舉權了，所以這條規定雖然可能助長教權派的影响，但未必能使選民人數增加多少。其他重新實行的選舉優惠條件給予了：（1）每周交房租 8 先令或每年交房租 20 英鎊的房屋住戶和租戶，不論其房屋有沒有家具；（2）持有國家證券或無期公債、東印度公司的股票或銀行股票等動產每年可以得到 20 英鎊收入的人，或者由於在陸軍、海軍或民政機關長期服務現在已經不再供職而每年可以領到 20 英鎊撫恤金或津貼的人；（3）在儲蓄所有 60 英鎊存款的存戶。

一眼就可以看出，所有這些新的選舉優惠條件，雖然使資產階級中又有幾部分人參加了選舉，但是，其目的顯然是蓄意不讓工人階級參加選舉，使工人階級仍舊處於目前這樣的政治上的“賤民”（迪斯累里先生不慎地這樣稱呼那些沒有選舉權的人）的地位。所有反對政府的人，從約翰·布萊特先生到約翰·羅素勛爵，都強調

指出，新改革法案的这一点是最使人反对的，可以说这是在下院发言的反对派的一个新的特点。迪斯累里先生本人宣称：

“1831年提出选举改革法案的时候，大家都承认，法案的目的是要使英国资产阶级能够在立法机关有一个合法的反对派。”

約翰·罗素勋爵說：“爵士，您知道嗎，从我反对把1832年的法律看做是极限的时候起，我持这一观点是根据一个我认为唯一足以破坏广泛而复杂的协议的事实，即有大量完全应该有选举权的人被排斥在选举之外，而且这些人都属于我们国家的劳动阶级。”

罗巴克先生說：“1832年的法案是要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在这种场合，如果没有劳动阶级参加，就不可能有任何的选举改革法案。工人的表现使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英国资产阶级也不应该忘记这一点。为了我国的劳动阶级，现在我要向资产阶级呼吁。”

布莱特先生說：“如果我能够设想，英国的劳动阶级会甘心让别人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像迪斯累里的法案所做的那样，那我一定会极端鄙视他们，更正确些說，我不仅会鄙视他们而且会对他们失去任何信心。”

把劳动阶级排斥在选民之外，同时又剥夺居住在城市的自由农的选举权，这是向目前的议会改革法案及其起草人发起进攻的战斗号召。同时，由于沃尔波尔先生和汉利先生退出内阁而显露出来的，因为契安多斯的条文被取消而引起的政府阵营内部的分歧，絕不会有助于加强他们的防御手段。

至于法案的其他条款，它们的意义是比较小的。没有一个有权选派議員的城市，是被剥夺了这种权利的，而且还新設了15个席位，其中約克郡西区将得到4个，南郎卡郡将得到2个，密多塞克斯将得到2个；同时，有7个议会中的新席位将分别给予7个不久以前发展起来的小城市，即哈特耳普耳、伯肯海德、合并了的西布罗姆威奇和温斯柏利、貝恩利、海利布里奇、克劳伊登和格累夫森德。为了给这些新添的議員腾出席位来，有15个人口不超过

6 000 人的小城市选派的議員人数, 要从 2 名减为 1 名。这就是应该实现对一切选区“权利平等”的比例。

在拥有 200 名选民以上的每一个或几个教区都应当設立选民点; 新設置的选民点的費用由各郡負担。为了同秘密投票的拥护者取得妥协, 不願在进行选举的地方投票的选民, 可以用发給选民的选票进行选举; 而且选民要用挂号信把选票寄回給选举委員, 在挂号信上签名时須有两个证人在場, 其中一个必須是房东; 信应该由特別委托的人在投票那一天开启。最后, 这个法案对各郡选民的登記制度作了某些改进。除了“泰晤士报”和政府的机关报¹⁰⁴以外, 倫敦沒有一家报纸对这一法案的成功寄予任何希望¹⁰⁵。

卡·馬克思写于 1859 年 3 月 1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9 年 3 月 17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586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卡·馬克思 不列顛工厂工业的状况

1859年3月4日于倫敦

今天我打算概述一下前面一篇文章^①中所提到的两个工厂报告。第一个是亚·雷德格雷夫先生編写的，他的工厂区包括密多塞克斯(倫敦及其近郊)，薩雷，艾塞克斯，柴郡、得比郡、郎卡郡的一部分，以及东区(約克郡)。半年来——到1858年10月31日为止——在这个厂区共发生331件因机器引起的不幸事故，其中有12件是死亡事故。雷德格雷夫先生的报告几乎只提到了一点，即关于印花工厂及其他工厂的童工的教育問題的規定。在招收童工或未成年工到印花工厂或其他工厂做长期工之前，雇主必須得到分教区医师的证明书。根据維多利亞女王在位的第七年頒布的法律第十五章附則A 106的規定，凡申請檢查身体的人

“如果不具有最起碼的力气和一般8岁儿童的外貌，而青少年如果不具有至少13岁的外貌，或者因疾病和体力孱弱以致这些年輕人不能在法律允許的時間內每天在工厂工作”，

分教区医师應該拒絕发給证明书。

8—13岁的儿童按照法律被认为是不适宜全天工作的，他們

① 見本卷第228頁。——編者注

应当用自己的一部分时间去上学，而且医生有权只发给他们工作半日的证明书。从雷德格雷夫先生的报告中可看出，一方面，当家长们能为自己的孩子获得全工作日的工资时，他们总是尽量设法不让他们的孩子进学校和获得半份工资，另一方面，对于工厂主来说，孩子只作为能够完成这种或那种工作的一种体力而使他们感到兴趣。当家长们得到全工作日工资时，工厂主也得到了全日工作的工人。下面这则刊登在雷德格雷夫先生工厂区中巨大工厂中心的报纸上的广告，令人震惊地想起贩卖奴隶的手段；它表明工厂主是如何履行法律规定的。广告上径直这样说：

“兹征求 12—20 名男孩，其外貌起码要像 13 岁…… 工资每周 4 先令。”

依据法律规定，雇主实际上不必要求某种有可靠根据的关于儿童年龄的证明书；对他来说只要按照儿童的外貌来判断他的年龄就够了。半日工作制所依据的原则是，如果儿童在工厂工作的同时没有每天上学，就不应允许童工劳动。这种制度由于两种原因遭到了工厂主们的反对。他们不愿意对半日工作者（13 岁以下的儿童）必须上学这点负责，并且认为使用一班童工代替两班轮流工作 6 小时的童工比较便宜和省事。因此，实行半日工作制的第一个结果是 13 岁以下在厂童工名义上几乎缩减了一半，从 1835 年的 56 455 人降低到 1838 年的 29 283 人。但是，这种缩减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有名无实，因为签发证明书的分教区医师的效劳使联合王国幼年工人的相应年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因此，随着签发证明书的医生受到工厂视察员及其助理的较严格的监视，随着根据出生登记表查明儿童实在年龄的可能性的增长，1838 年以后开始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动。13 岁以下的童工的人数又从 29 283

人(1838年在厂工作的童工曾下降到这个数目)上升到1850年的35 122人和1856年的46 071人,况且最近发表的官方报告书远没有反映出使用童工劳动的真正规模。一方面,很多签发证明书的医师仍然能巧妙地躲过视察员的警戒,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儿童辍学,并由于有关丝织厂的法律的改变¹⁰⁷在11岁时就已经不再受半日工作制的束缚了。

正如一个工厂视察员所说的:“这是可能供奉给工厂主的一种牺牲品,但这种牺牲品对丝织工业区的社会福利是有害的。”

虽然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现在在联合王国印花工厂及其他工厂工作的8—13岁童工的人数超过了1835年从事同样工作的童工的人数,然而无可怀疑的是,半日工作制在刺激发明代替童工劳动的办法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雷德格雷夫先生这样声称:

“现在有一类工厂主——毛纺织厂的厂主——事实上很少使用13岁以下的即做半个工作日的童工的劳动。他们采用了各种类型的经过改良的和新的机器,这些机器完全消除了使用童工劳动的必要性。为了说明参加生产的童工人数缩减的情形,我可以举一个生产过程为例:由于把一种称为捻线机的装置和目前使用的机器连接起来了,6个或4个——视每台机器的特点而定——做半个工作日的童工的劳动仅需一个未成年工就能完成了。”

现代工业(至少在那些现代工业早就发达的国家里)迫使童工寻找工钱的情况达到了什么程度,这在不久前普鲁士的例子中再次得到了明显的说明。1853年普鲁士工厂法规定,从1855年7月1日起,任何一个未满12岁的儿童都不得进工厂工作,12—14岁的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每天至少要有3小时去上学。这项法律遭到了工厂主们的强烈反对,以致政府不得不实

行让步，不再在普魯士各地普遍施行，而只在两个紧相毗連并有大批从事紡紗、印制花布等工作的工厂居民的工业城市爱北斐特和巴門試行。爱北斐特和巴門貿易局 1856 年年度总结中就这一問題向普魯士政府提出了如下的报告：

“工資的提高，同煤价和一切为这些工业部門所必需的材料，如皮革、油脂、金屬等价格的上漲一样，对于生产非常不利。除此以外，严格实行 1853 年 5 月 1 日頒布的关于在工厂中使用童工劳动的法律也是非常有害的。它不仅使相当数量的童工离开生产，而且也使他們失去了受到能把他們培养成熟练工人的早期訓練的机会。某些工业企业由于缺少这些幼年工人，机器停止开动了，因为使用成年工来管理这些机器不合算。我們建議修改一下上述法律，縮短达到一定知識水平的儿童必需上学的时间，这是一种对无数家庭和工厂主都有利的办法。”

最近的一份由爱尔兰視察員貝克先生写的工厂报告，着重对造成不幸事故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对一般生产状况作了評述。談到前一个問題时，貝克先生确定：每 340 名工人中就有一件不幸事故，同到 4 月份为止的半年相比增长了 21%，而在机器造成的不幸事故中（只有 10% 的不幸事故与机器无关），有将近 40% 的事故只消稍微破費一点錢本来是可以避免和預防的，但是

“由于不久前修改了法律，現在是很难增加費用了，因为单靠規劝是不起作用的”。

貝克先生断定說，生产状况改善了，但在他看来，

“在很多情况下重又达到了最高限度，超出这个限度，工厂工业将逐漸变得愈来愈无利可图，直到它完全不再成其为工厂工业”。

他公正地把原料价格和工厂制成品价格之間的对比的变化列为同增加机器設備一起引起景气周期和不景气周期互相更替的主要原因之一。貝克先生举出精梳毛紡織业方面的变化作为例子：

“在精梳毛紡織业有利可图的年份,即 1849 年和 1850 年,梳整好的英国羊毛的价格每磅是 1 先令 1 辨士,而澳洲羊毛的价格则波动在每磅 1 先令 2 辨士和 1 先令 5 辨士之間。在 10 年——从 1841 年到 1850 年,包括上述两年在內——中,英国羊毛的平均价格从未超过每磅 1 先令 2 辨士,而澳洲羊毛的价格却超过了每磅 1 先令 5 辨士。在倒霉的 1857 年初,澳洲羊毛的价格起初是 1 先令 11 辨士,以后在恐慌达到最高点的 12 月份,跌到 1 先令 6 辨士,然而后来在 1858 年間又逐渐回升到 1 先令 9 辨士;与此同时英国羊毛的价格起初是 1 先令 8 辨士,1857 年 4 月和 9 月上漲到 1 先令 9 辨士,1858 年 1 月又跌到 1 先令 2 辨士;从那以后它又上漲到 1 先令 5 辨士,这和上述 10 年的平均价格相較每磅增加了 3 辨士。这证明,不是忘記了 1857 年这种价格所引起的破产,就是生产出来的羊毛只是勉强够維持現有加工羊毛的錠子轉动。”

总的說来,貝克先生显然持这样一种見解,即不論錠子和紡織机的数量还是它們所达到的轉数,都在以和羊毛生产不相适应的比例增加着。在这方面英国沒有可靠的統計資料;但是,警察局收集的爱尔兰农业統計資料和霍尔·麦克斯威尔先生收集的苏格兰的統計資料,对于一切实际目的已足够用了。这些資料表明,1857 年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某些谷物的耕种以及整个畜牧业都有很大的扩大,只有牧羊业例外。1858 年爱尔兰的羊的头数比 1855 年减少了 114 557 头;虽然在 1858 年中羊的头数比 1857 年增加了 35 533 头,但其总数仍比前 3 年的平均数少了 95 177 头,而且主要是母畜。苏格兰的有关数字如下:

	作种畜的各种 年岁的羊(头)	供屠宰的各种 年岁的羊(头)	羊 羔
1856 年.....	2 714 301	1 146 427	1 955 832
1857 年.....	2 632 283	1 181 782	1 869 103
减少.....	82 018	增加 35 355	减少 86 729

这不仅说明，总共减少了 133 392 头羊，而且说明，屠宰的羊比以往多了。假定每头羊的剪毛量为 7 磅，从以上数字我们知道，1855 年爱尔兰能提供 16 810 934 磅羊毛（不算羔羊毛），而 1858 年则只能提供 16 276 330 磅，1857 年苏格兰羊毛的产量（羔羊毛也不算在内）减少了 326 641 磅。因此，两地羊毛总共减少了 861 245 磅，或者，按照比较精确的计算，约相当于精梳毛纺织业每年需要加工的英国羊毛总产量的 $\frac{1}{95}$ 。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3 月 4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9 年 3 月 2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92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
波河与莱茵河¹⁰⁸

弗·恩格斯写于1859年2月底—
3月初
1859年4月以单行本在柏林出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单行本译的

今年一开始，“应当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这一公式就成了德国大部分报刊的口号。

这个口号由于波拿巴的备战活动和威胁而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在德国，大家凭本能正确地感觉到，波河只是路易-拿破侖的借口，而莱茵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他的主要目标。也许，只有为确定莱茵河上的疆界的战争，才能成为波拿巴主义的避雷针，帮他应付在国内威胁着它的两个因素：革命群众“爱国主义的威焰”^①和“资产阶级”不可遏止的不满情绪。这样做就会给前者提出一个具有民族意义的任务，而给后者一个夺取新市场的希望。因此，关于解放意大利的谈论在德国迷惑不了任何人。这就正如古谚语所说的：打麻袋，赶驴子。如果说意大利被迫当了麻袋，那末这次德国却根本不想当驴子。

因此，固守波河在目前只具有这样一种意义，那就是德国虽然处于最终目的在于夺取它的最好几个省份的这种袭击的威胁之下，但是绝对不想不经过战斗就把它即使不是最坚强的军事障地，也是最坚强的军事障地之一拱手让与他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然整个德国都非常关心波河的防御。在战争前夜，也和战争中一样，双方通常都力图占领每一个可以威胁敌人和挫伤敌人的有

① 海涅“夜巡邏来到巴黎”（“新诗集”）。——编者注

利障地，而不从道德原则方面去考虑这是否合乎永恒的正义或者民族原则。那时大家都只愿维护自己的私利。

但是，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这种提法，完全不同于德国许许多多军事家及政治家的意图，他们宣布波河即伦巴第和威尼斯省在战略上是德国的必要补充部分，甚至说是它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观点从1848年和1849年意大利战争以来提得特别多，在理论上也不断得到更多的论证；拉多维茨将军在圣保罗教堂¹⁰⁹以及维利森将军在他所著的“1848年意大利战局”¹¹⁰一书中都论证了这一观点。在非奥地利的南德，巴伐利亚将军海尔布隆纳尔也以极大的热情评论过这一问题。在所有这些场合所提出的主要论据全都是政治性的，说什么意大利根本不能独立；意大利不是应当由德国统治，就是应当由法国统治；如果今天奥地利人被赶出意大利，明天在艾契河流域，在的里雅斯特的大门口，就会出现法国人，接着德国整个南部边境就会暴露于“宿敌”之前。因此，奥地利是代表整个德国而且是为了整个德国的利益而控制伦巴第的。

据我们所知，主张这一观点的军事权威是德国最有名的人物。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最坚决地反对他们。

对于以充当德国在意大利的利益的官方辩护士为己任的奥格斯堡“总汇报”来说，这个观点成了它真正狂热地加以辩护的信念的象征。这家基督教德意志的报纸，虽然痛恨犹太人和土耳其人，却宁愿自身接受“割礼”也不让在意大利的“德国”诸省受到“割礼”。那些热心于政治的将军们所辩护的，归根到底无非是使德国获得最好的军事障地，而对奥格斯堡“总汇报”来说这却是某种政治理论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理论就是所谓“中欧大国”论，根据这个理论，奥地利、普鲁士及德国其他各邦应当在奥地

利的霸权下形成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对于匈牙利和沿多瑙河的斯拉夫—罗马尼亚各国应当用殖民、办学校和怀柔的方法使它们德意志化；从而使这个国家集合体的重心逐渐转向东南方，转向维也纳；此外，还应当重新夺取亚尔萨斯和洛林¹¹¹。这个“中欧大国”应当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¹¹²的复活，并且除了其他的目的以外，似乎还要兼并原奥属尼德兰¹¹³以及荷兰作为藩属。这样一来，德意志祖国也许几乎要比现在操德语的范围扩大一倍；如果所有这一切真正实现了，德国就要成为欧洲的仲裁者和主宰。命运已经在设法使所有这一切得以实现。罗曼语系各民族正在迅速地衰落着；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已经完全灭亡了；法国人目前也正衰落中。另一方面，斯拉夫人完全无力建设真正的现代的国家，世界历史的进程注定他们要德意志化，而复兴的奥地利则一定要再度成为执行天意的主角。因此，保持精神力量而又能完成历史创举的，就只有日耳曼各民族了，但是其中英国人已经深深陷入了自己岛国的唯我主义和实利主义，以致欧洲大陆不得不以关税壁垒来隔绝他们的影响，隔绝他们的工商业，而自己另搞一套合理的大陆体系¹¹⁴。因此，纯粹的德意志的美德和年轻的“中欧大国”就绝对有把握在短期内争得陆上和海上的世界霸权，从而开辟历史的新纪元，那时德国在经过长期休养生息之后将会重执牛耳，而其他各民族则将唯命是从。

法国人和俄国人占有了陆地，
海洋是属于英国人的，
只有在梦想的空中王国里，
德国人的威力是无可争辩的。①

①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七章。——编者注

我們根本不想在这里談論这些爱国幻想的政治方面。我們只是一般地就这个題目概括地說几句，使得以后沒有人再能利用这些堂皇的詞句作为确定“德国”必須統治意大利的新的論据。这里我們关心的只是問題的軍事方面，也就是，德国为了本身的防禦需不需要永远統治意大利，特別是需不需要在軍事上完全占領倫巴第和威尼斯省？

从純粹的軍事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可以表述如下：德国为了防守它的南部边境，需不需要占領艾契河、明乔河和波河下游及其桥头堡培斯克拉和曼都亚？

在設法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們应当牢牢記住：我們这里所說的德国，是指一个統一的国家而言，它对武装力量的領導和它的行动都是由一个中心来实行的；我們不是把德国看做某种臆想的政治机体，而是把它看做一个真正存在的政治机体。否則，就根本談不上什么德国的政治需要或者軍事需要。

二

在整整几个世紀中，北意大利較之比利时在更大程度上是法国人和德国人逐鹿的場所。占領比利时和波河谷地总是进攻者必要的条件，無論是德国进攻法国或法国进攻德国都是这样；只有占領这些地方才能充分可靠地掩护攻入法国或德国的军队的后方和翼側。只有比利时和北意大利完全中立，这种常規才能发生例外；但是这样的情况一直到現在还没有出現过。

自帕維亞会战¹¹⁵以来，在波河流域的战場上，間接决定着法国和德国的命运，直接决定着意大利的命运。自近代大規模的常备軍出現以来，由于德国和法国力量的不断增长，由于意大利在政治上的解体，古意大利，也就是卢比康河以南的意大利已失去任何軍事价值，只要占領旧南阿尔卑斯的高卢，随之就必然能統治整个狹长的亚平宁半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是波河和艾契河流域以及热那亚沿岸、罗曼尼亚沿岸和威尼斯沿岸；在这些地区，农业最繁荣，工业最发达，商业也最活跃。半島（即那不勒斯和教皇国）的社会发展比較緩慢；从軍事观点来看，这些地区已經有几世紀沒有起过任何作用了。过去誰占領了波河谷地，切断了半島同大陆的陆上交通，誰就能够一有机会就不費力地征服整个意大利。法国人在革命战争中曾两次做到这一点；奥地利人在最近这一世紀也曾两次获得这样的結果。因此，只有波河和艾契河流域才具有軍事意义。

这个流域为連綿不断的阿尔卑斯山脉和亚平宁山脉三面环抱，而第四面——自阿克維列亚到里米尼——則与亚得利亚海相連；大自然把这一块土地的輪廓勾划得非常鮮明，波河在这上面自西向东流过。这个地区的南部边界，即亚平宁山边界，目前我們对它沒有任何兴趣，但北部边界，亦即阿尔卑斯山边界，却使我們很感兴趣。那里只有少数地方才有石鋪大道通向終年积雪的山峰；甚至車行道、騾馬道和人行小道也很有限；狹谷里漫长的隘路通向穿越高山的山口。

北意大利由伊宗察河口到施蒂尔夫山口的一段为德国边境所环抱，由施蒂尔夫山口到日内瓦与瑞士接壤，由日内瓦到瓦尔河口則与法国毗連。由东向西，即由亚得利亚海向施蒂尔夫山口逐渐推移，山道就一个比一个更深入波河流域的心臟，因而就能迂迴在它东面的一切意大利或法国军队的陣地。伊宗察河疆界綫也可以通过它西面最近的卡尔弗利特（卡波列托）山口从契維达列方向来迂迴。通过龐塔菲尔山口可以迂迴塔腊門托河附近的陣地，从克倫地亚和卡多烈的两条非石鋪的山道也可以对这个陣地进行側击。出勃倫納山口可以經過佩特耳施坦山口——从布魯內克到科丁納·达姆佩佐和貝卢諾——迂迴皮亚韦河綫；經由苏甘納谷地到巴薩諾可以迂迴布兰塔河綫，沿艾契河谷可以迂迴艾契河綫。基澤河上的陣地可以由朱迪卡里耶来迂迴，奥利奥河上的陣地可以沿通过托納列山口的非石鋪道来迂迴；最后，阿达河以东的整个区域可以由施蒂尔夫山口和瓦尔特林納来迂迴。

因此，可以說，在这样有利的战略形势之下，是否真正占有到波河为止的这一平原，对我們德国人說来是无所謂的。只要双方兵力相等，不論敌軍配置在任何地方，配置在阿达河以东或者波河

以北他們所有的障地都可能被迂迴。不論他們在什么地方渡过波河或阿达河，他們到处都会使自己的翼側受到打击；如果他們配置在波河以南，他們与米兰和皮蒙特的交通就要受到威胁；如果他們退到提契諾河以西，他們就有与整个半島丧失联系的危險。最后，如果他們竟敢轉而向維也納进攻，他們就随时都可能被切断而不得不在背靠敌国領土而面向意大利的情况下应战。如果他們遭到失敗，那就会是第二个馬連峨，只是法国人和德国人互換角色而已；即使德国人在这次会战中失敗，他們也决不至于傻到錯過向提罗耳退却的机会。

奥地利人修筑通过施蒂尔夫山口的道路一事证明，他們从馬連峨失敗中得出了正确的結論。拿破侖修筑了通过辛普朗山口的道路，以便能有进入意大利腹地的安全的道路；奥地利人从施蒂尔夫山口向博尔米奧鋪設了一条大道，因而补充了自己在倫巴第的积极防御体系。有人可能会說，这一山道地势太高，冬季无法通行；整个路綫上难走的地方太多，因为它至少有 50 德里^①（从巴伐利亚的菲森到科摩湖濱的萊科）通过对行人不便的山区；在这个地区，它必須通过三个山口；最后，它很容易在科摩湖和山地的狭长隘路上被阻塞。我們現在来分析一下。

这个山口实际上正是阿尔卑斯山脉中所有能通行的山口中最高的一个：它高达 8 600 英尺，冬季积雪很深。但是如果我們回想一下麦克唐納 1799—1800 年通过什普留根山口和托納列山口的冬季进軍这件事，那末就不会把这样的障碍看得太了不起了。冬天，阿尔卑斯山所有的山道都有积雪，但仍然能够通行。全部炮兵

① 1 德里等于 7 420 米。——編者注

的改編(自阿姆斯特朗发明了操作方便的后装的綫膛炮以来,这已成为迫不及待的任务了)使較輕的火炮也可編入野战炮兵,从而大大提高它的运动性。較严重的障碍是在山区的行程很长,要接連不断地越过一个个的山口。施蒂尔夫山口位置不在阿尔卑斯山南北斜面的分水岭上,而在亚得利亚海区域的两条河流——阿达河和艾契河的分水岭上。要从音河谷地到艾契河谷地,必須先經由勃倫納山口或芬斯特閔茨山口,通过阿尔卑斯山主脉。但是由于音河在提罗耳地区是在两条山脉之間大致上自西向东流的,所以由博登湖和巴伐利亚出发的軍队也必須越过这两个山脉中的北面那个山脉。这样一来,仅仅在这一段道路上,我們大約就得通过两三个山口。但是無論怎样困难,这样的障碍也决不能成为阻擋軍队从这一条道路进入意大利的决定因素。如果音河谷地已部分通車的铁路以及艾契河谷地正在設計修筑的铁路完全建成,这一段行程的困难很快就会减少到最低限度。固然,拿破侖所选择的从洛桑通过大圣伯納德山口到伊符雷的道路仅經過約 30 德里的高山区,但是 1797 年拿破侖进軍时所經過的,也就是 1809 年欧仁亲王和麦克唐納为了与拿破侖会师于維也納而經過的从烏迪訥到維也納的道路,却有 60 多德里的山路,而且也要通过阿尔卑斯山的三个山口。从龐-迭-博富阿森經過小圣伯納德山口到伊符雷的道路不經過瑞士而直接由法国深深进入意大利境內,因而最便于进行迂迴,但是这条道路也有 40 德里通过高山,从洛桑經過辛普朗山口到塞斯托-卡兰德的道路也是一样。

至于說在山口上或科摩湖附近道路有被封鎖的可能,那末自法軍在阿尔卑斯山多次进軍以来,人們已經不大相信这些筑垒封鎖点的效果了。瞰制它們的高地和迂迴的可能性几乎使它們失去

作用。法軍曾以猛攻夺取了許多封鎖点，而山道上的工事从来没有真正阻擋住他們过。在阿尔卑斯山面向意大利这边的斜坡上构筑的山道上的工事可以从切韦达列山口、蒙特科尔諾和加維阿来迂迴，也可以从托納列山口和阿普里卡来迂迴。从瓦尔特林納有几条騾馬道通到貝尔加馬斯加，科摩湖上狭长的隘路上的封鎖点有一部分可以从这里，有一部分可以从德尔維奧或貝拉諾通过薩辛納谷地来迂迴。况且山地战术本来也要求几个纵队同时行进，其中一个突破敌人防綫，通常目的就达到了。

最困难的山口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通过，只是要派精銳的部队和果斷的將領来完成这一任务；最不重要的、甚至車輛都不能通行的平行的山道也同样可以成为良好的作战綫，特别是可以用来进行迂迴运动；山地封鎖点的用处已經不大，——所有这些事实，都已为 1796—1801 年在阿尔卑斯山的多次进軍再好不过地证明了。当时，阿尔卑斯山还没有一个山口鋪上了石道，然而，軍隊还是从各个方向通过了山岭。1799 年，路瓦松在 3 月初就率領法軍一个旅从人行小道通过了萊斯河和萊茵河的分水岭；同时，勒庫尔布通过伯納丁和維阿馬拉山口，从这里再越过阿耳布拉和尤列尔（高 7 100 英尺）两山口，在 3 月 24 日就用迂迴的方法占領了馬丁斯布魯克隘路，同时又派德索尔取道閔斯德谷地通过皮佐克和伏尔姆斯山口（高 7 850 英尺的人行小道）进至艾契河上游谷地，由此再进至雷申-舍迪克山口。5 月初，勒庫尔布又經由阿耳布拉山口退回。

同年 9 月，接着就是苏沃洛夫的远征，用这个老兵自己的形象的豪語來說，在这次远征中，“俄国的刺刀穿透了阿尔卑斯山”（*Ruskij štyk prognal čres Alpow*）。他派大部炮兵通过什普留根山口，又把迂迴的纵队沿布倫尼奧谷地派到卢克曼尼尔山口（高

5 948 英尺的人行小道)，由这里通过西克斯-馬敦山口（約 6 500 英尺）进入萊斯河上游谷地，他自己則沿当时勉强可以通行的車行道（高 6 594 英尺）通过圣哥达山口。9 月 24—26 日，他以强攻夺取了鬼桥附近的封鎖点；但是到阿尔多夫后，他前面是一个湖，周圍又都是法軍；于是他不得不沿舍亨塔尔而上，經過金齐庫尔姆到穆塔塔尔。他把全部炮兵和輜重留在萊斯河谷，到了这里以后，他又碰到了优势的法軍，而勒庫尔布仍然尾随其后。于是苏沃洛夫又通过普拉格尔山口进入克倫河谷，想从这条路到达萊茵河平原。在涅費尔斯隘路上，他遇到了敌人的不可克服的抵抗，因此被迫沿小徑通过高达 8 000 英尺的龐尼克斯山口到达萊茵河上游谷地并恢复与什普留根山口的联络。行軍自 10 月 6 日开始，到 10 日，他的大本营就到了依朗茲。这次行軍是到当时为止所进行的一切阿尔卑斯山行軍中最出色的一次。

我們不想多談拿破侖越过大圣伯納德山口的行軍。这一战斗行动还比不上当时其他类似的战斗行动。季节很有利，唯一值得注意的只是拿破侖为了迂迴巴尔德堡垒这一封鎖点所采取的一种巧妙的方法。

反之，1800—1801 年冬麦克唐納所进行的一次战斗行动是特別值得贊揚的。麦克唐納奉命率領法軍左翼 15 000 人的一支部队迂迴明乔河和艾契河上的奧軍右翼，他在严冬統率各兵种越过了什普留根山口（高 6 510 英尺）。一路經歷了极大的困难，时常为雪崩和暴風雪所阻，但他于 12 月 1—7 日率領軍队通过了山口，溯阿达河而上由瓦尔特林納向阿普里卡山口前进。奧軍也同样不怕山地的冬天。他們扼守阿耳布拉山口、尤列尔山口和布劳利奧（伏尔姆斯山口），在布劳利奧甚至还襲击了法軍，俘获了一队徒步的

驃騎兵。麦克唐納由阿达河谷通过阿普里卡山口到达奥利奥河谷后,就由人行小道登上特別高的托納列山口,于12月22日进攻奥軍,后者以冰块阻塞了山道的隘路。因为他当日的攻击和第二次攻击(这是在12月31日,可見他已在山中停留了9天!)都同样被击退了,他就沿卡莫尼卡谷地而下抵达伊澤奥湖,命令騎兵和炮兵沿平原行进,自己亲率步兵越过通往特隆皮亚谷地、薩比亚谷地和朱迪卡里耶(他也到过这里)的三个山岭到了諾罗,这时已經是1月6日了。与此同时,巴拉盖·狄利埃由音河谷地經過雷申-舍迪克山口(芬斯特閔茨山口)进入艾契河上游谷地。既然这样的行軍在60年前可以做到,那末在現在,当大部分山口都有了很好的石鋪大道的时候,我們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从这一簡短的叙述中,我們就可以看出,在所有的封鎖点中只有那些因時間仓卒或指揮人員无能而未能迂迴的各点才能暫時守住。例如,巴拉盖·狄利埃一出現在艾契河上游谷地,托納列山口就无法扼守了。其他几次战局也证明,封鎖点可以用迂迴的方法来夺取,也常常可以用强攻的方法来夺取。卢齐延什泰格曾两三次被攻下,1797年和1809年龐塔菲尔山口的馬尔鮑尔格情况也一样。提罗耳的封鎖点既沒有在1797年阻止住茹貝尔,也沒有在1805年阻止住奈元帅。拿破侖有句名言,任何小徑只要山羊能走过,就可以用来迂迴敌軍。从那时起,战争就是以这种迂迴各种封鎖点的方法来进行的。

因此,不能想像,一支与德国人为敌的軍队在兵力相等的情况下怎么能够在阿达河以东的平地上抗击越过阿尔卑斯山进攻的德軍,而守住倫巴第。这支敌軍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配置在現有的或者应当重新修筑起来的要塞之間并在其間进行机动。这个可

能，我們下面再分析。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法國要攻入意大利可以利用哪些山口。德國的疆界環抱着北意大利的一半，而法國的疆界則由北到南幾乎成一條直綫，因而使法國沒有圍攻之利。只有占領薩瓦和熱那亞沿岸的一部分地方，法軍才能通過小聖伯納德山口和濱海阿爾卑斯山的山口進行迂迴運動；但是這些迂迴運動也只能影響到塞齊亞河和博爾米達河；因此，無論是倫巴第或者是各公國都不會遭到從法國方面迂迴的危險，半島本身則更是如此。只有在熱那亞登陸才能造成迂迴整個皮蒙特的形勢，但這對於一支大軍是有很多困難的。在更靠東的地方，例如在斯佩威亞登陸，那就不能以皮蒙特和法國為基地而只能以半島為基地，因此，迂迴敵人和被敵人迂迴的機會是相等的。

上面我們一直是把瑞士當作一個處於中立地位的国家來談的。如果它被卷入戰爭，法國就可以多一個山口，即辛普朗山口（大聖伯納德山口和小聖伯納德山口一樣，都通到阿奧斯塔，除路途較短以外，沒有任何更多的好處）。通過辛普朗山口的道路通至提契諾河，因此使皮蒙特暴露於法軍之前。在同樣的情況下，德軍也會取得具有次要意義的什普留根山口，它在科摩湖附近與施蒂爾夫道路會合；此外，德軍還可以利用伯納丁，它的影響可以一直擴展到提契諾河。聖哥達山口，能為哪方所利用要看情況而定，但是它对雙方都只有很少的側擊之利。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法軍和德軍通過阿爾卑斯山的迂迴運動，都能影響到現在倫巴第和皮蒙特的交界綫即提契諾河。但是，如果德軍到了提契諾河附近，即使他們僅僅到達皮阿琴察和克雷莫納附近，他們就可以封鎖法軍連接意大利半島的陸上道路。換句話說，如果說法國控制着皮蒙

特，那末德国就控制着意大利其余的整个地区。

德軍还有一个战术上的优势，就是在整个德国边境上的所有最重要的山口上，除施蒂尔夫山口外，分水岭都位于德国境内。龐塔菲尔山口的費拉河起源于克倫地亚；佩特耳施坦山口的博伊泰河发源于提罗耳。在提罗耳省，上述这一优势具有决定的意义。布兰塔河上游谷地（苏甘納谷地）、基澤河上游谷地（朱迪卡里耶）和艾契河的大部都在提罗耳境内。虽然在每一个別場合，不很好地研究当地地形就不能最后肯定，占領高山山口的分水岭是否真正具有战术优势，但是照一般慣例，誰占領山脊和向敌斜坡的一部分，誰无疑就有制高和迂迴的可能性；不仅如此，而且这样无疑也就可能在战争尚未开始之前設法使次要山口上最險阻的地方能通过各个兵种，这一点在提罗耳对于保证交通有决定性的意义。既然我国領土正像德意志联邦在提罗耳南部的領土一样深深楔入敌国；既然像現在一样，两个主要的山口——勃倫納和芬斯特閔茨——都距离敌国边境很远；此外，既然最重要的各平行山道，例如通过朱迪卡里耶和苏甘納谷地的山道，也完全位于德国境内，那末所有这一切就使得攻入北意大利的战术条件非常有利，因此一旦发生战争，只要合理地利用它們，胜利就是有把握的。

只要瑞士保持中立，德軍对意大利作战时最近的道路总是提罗耳；如果瑞士放棄中立，那捷徑就是提罗耳和格劳宾登（音河和萊茵河的河谷）。霍亨施陶芬王朝当日就是沿这一道路侵入意大利的。在軍事上作为一个統一的国家来行动的德国，从其他方向都不能在意大利进行迅速而坚决的打击。但是，从这一方向进攻的作战基地不是奥地利内地，而是从博登湖到薩尔茨堡的巴伐利亚和上士瓦本。在整个中世紀时期情况就是这样。只是奥地利在

多瑙河中游建国以后，在維也納成为帝国的中心以后，在德意志帝国崩潰以后，在意大利进行的已經不再是德国的战争而只是奥地利的战争以后，才放棄了由音斯布魯克到維罗那和由琳道到米兰的那条旧的捷徑，而开始利用由維也納經克拉根富特和特雷維佐到維琴察的一条漫长的、曲折的和不好走的道路。这条路，德軍从前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在敌軍威胁下退却时才利用，而無論如何不是用来进攻的。

当德意志帝国真正作为一个軍事强国存在的时候，当它因此以上士瓦本和巴伐利亚作为进攻意大利的基地的时候，它总是从政治上考虑，而絕不是純从軍事上考虑来力图統治北意大利。在爭夺意大利的长期战争中，倫巴第有时屬于德国，有时独立，有时屬于西班牙，有时屬于奥地利；但是不要忘記，倫巴第是从威尼斯分出来的，而威尼斯本来是独立的。虽然倫巴第拥有曼都亚，但是，明乔河綫和明乔河与伊宗察河之間的地区却不在倫巴第的境內，也正是这个地区，目前有人要我們相信，不占領它，德国就不能高枕无忧。但是，德国(通过奥地利)是从1814年起才完全占領了明乔河綫。如果說德国作为一个統一的政治机体，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也沒有起过十分显著的作用，那絕不是因为它沒有占領明乔河綫。

無論如何，从战略上整化各国版图并根据便于防御的河流綫来确定它們的疆界的思想，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侖創立了运动性較大的軍队并帶領这些軍队横扫全欧洲以后，更加受到重視了。在七年战争¹¹⁶时，軍队作战的区域还仅限于一省，軍队的运动在整整几个月里都圍繞着个别的要塞、陣地或个别的作战基地进行，而現在在每一次战争中都必须注意到許多国家的地形；以前个别战

木障地所具有的意义，现在只有很大的要塞群、很长的河流线或高而险峻的山脉才具有。从这个观点来看，当然像明乔河和艾契河这样的一些河流线现在的意义就要比以前大得多了。

那末，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些河流线。

自辛普朗山口以东的阿尔卑斯山沿北意大利平原流入波河或直接流入亚得利亚海的一切河流，都与波河形成或者各自形成一个凹部向东的圆弧。因此，位于河东的军队要比位于河西的军队更便于防守这些河流。试看提契诺河、阿达河、奥利奥河、基泽河、明乔河、艾契河、布兰塔河、皮亚韦河和塔腊门托河，这些河流中的每一条都各自形成或者与和它相连的波河的一部分形成一个圆弧，其圆心位于河流以东。因此，位于这些河流左岸，即东岸的军队可以占领河流东面的中心障地，这样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赶到河道上受攻击的任何一点；他们扼守着若米尼称为“内线”¹¹⁷的河流线，可以沿半径或弦运动，而敌军却不得不沿较长的路线即圆周进行机动。如果位于右岸的军队必须进行防御，这种情况对他们也不利，因为地形便于敌人进行佯攻，原来使敌人在防御中易于进行机动的距圆周各点较短的距离，现在又使敌人在进攻时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因此，伦巴第一威尼斯各河流线无论是防御或是进攻，正好都对德军极其有利，而对意大利军队或者意法联军不利。如果再加上前面所说提罗耳的各个山口都便于迂迴所有这些河流线这一情况，那末即使在意大利疆土上没有奥地利一兵一卒，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德国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因为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随时都能占领伦巴第。

此外，伦巴第的这些河流大部分都很小，不太适合于进行真正的防御。除了波河（关于波河我们以后还要谈到）本身以外，无论

对于法国或者对于德国，在这一河流的整个流域里只有两处真正有价值的障地；两国的总参谋部都正确地估计到了这些障地的力量；它们已被加固，而且在最近将来的战争中当然会起决定的作用。在皮蒙特，原来一直向东流的波河在卡萨勒以东 1 德里处转弯，有整整 3 德里的一段流向南南东方向，而后又折向东流。在北面河弯处，塞齐亚河自北流入波河，在南面河弯处，博尔米达河自西南流入。在博尔米达河与波河的汇合处不远，在亚历山大里亚附近，有塔纳罗河、奥尔巴河和贝尔博河流入博尔米达河，这些河流共同形成向一个中心点辐射的河网体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枢纽又为亚历山大里亚营垒所掩护。军队从亚历山大里亚出发可以随意到这些小河的任何一岸作战：可以防卫直接位于前方的波河线；此外也可以在同样设有工事的卡萨勒渡过波河或者沿河在右岸行动。这一设有相当工事的障地是掩护皮蒙特或者可以作为进攻伦巴第和各公国的基地的唯一障地。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纵深，同时因为它既可以被迂回，又可以被正面突破，所以这种形势极为不利；有力而巧妙的进攻可以迅速把这个障地压缩到尚未完工的亚历山大里亚营垒的边界上；至于说这一障地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它的防御者无需在不利的条件下应战，这一点我们无法判断，因为我们既没有关于那里最新的筑垒的材料，也没有关于它们完成情况的材料。这一障地可使皮蒙特抵御来自东方的进攻，它的这一意义早就为拿破仑所承认，所以亚历山大里亚又重新加固。在 1814 年，要塞没有发挥它的防御力量；现在它的防御力量究竟有多大，可能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

另一个障地可以抵御来自西方的进攻，它之对于威尼斯省同亚历山大里亚之对皮蒙特有同等的，甚至是大得多的意义，这就是

明乔河和艾契河所形成的障地。明乔河发源于加尔达湖，向南流4德里到曼都亚，在这个地区形成一个小河湾，周围都是湖泊似的沼澤，然后向东南流入波河。該河从曼都亚沼澤以南到波河入口处的这段流程过短，无法使整个军团渡过，因为敌人从曼都亚出击，就可以攻击他们的后方并且迫使他们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应战。因此，迂迴运动必须在曼都亚以南更远的地方进行，并且必须在列維勒或費拉拉附近渡过波河。在北面，明乔河障地有很长一段为加尔达湖所掩护，可防止敌人迂迴，所以明乔河上真正需要防御的从培斯克拉到曼都亚这一綫不超过4德里，同时在两翼都有要塞为依托，可以保证军队轉至河的右岸。明乔河本身不是什么重大的障碍，同时由于地形关系，有时右岸高，有时左岸高。因为所有这一切，所以明乔河綫在1848年以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蔑視，如果不是由于一个特殊情况的影响而使它大大得到加强，它未必会得到这样大的名声。这一特殊情况就是在它东面4德里的地方有北意大利第二条河流——艾契河流过，它成弧形，几乎与明乔河和波河下游平行，因而形成第二道更加强大的障地，而傍河的两个要塞——維罗那和列尼亚哥又加强了它。这两条河流連同它们的四个要塞一起形成德国或奥地利军队对付从意大利或法国进攻的军队的非常坚固的防御障地，欧洲任何其他障地都不能和它相比；而且只要有一支在派出守备部队后还有能力进行野战的军队，就可以在这个障地上从容地抗击甚至兵力超过自己一倍的敌人的进攻。1848年，拉德茨基就曾证明这样的障地可以起什么样的作用。在米兰三月革命¹¹⁸以后，在几个意大利团脱离奥军而皮蒙特军队渡过提契諾河以后，拉德茨基率领他的残部約45 000人退向維罗那。分出15 000人作为要塞的守备部队后，他所能調动的只

剩下3万人左右。他的敌人近6万人，包括皮蒙特、托斯卡纳、摩地那和帕尔马的军队，配置在明乔河和艾契河之间。在拉德茨基后方有杜兰多的军队45000人，由志愿军和罗马教皇及那不勒斯派出的军队¹¹⁹编成。当时拉德茨基只有一条交通线，即通过提罗耳的交通线，但就连这条通过山区的交通线也受到伦巴第志愿军的威胁，虽然威胁并不十分严重。尽管如此，拉德茨基还是支持下来了。监视培斯克拉和曼都亚就用去皮蒙特很多的军队，以致他们在5月6日只能用4个师的兵力（40000—45000人）攻击维罗纳附近的阵地（桑塔路其亚会战）；而拉德茨基则连维罗纳的守备部队在内，可以有36000人投入战斗。因此，如果把奥军在战术意义上极强大的防御阵地估计在内，战场上就已经恢复均势，结果皮蒙特军队被击败了。5月15日那不勒斯的反革命事件使得同拉德茨基作战的那不勒斯军队调走了15000人¹²⁰，从而使威尼斯军队减少到3万人，但是其中仅有5000瑞士人组成的教皇军和大约同等数量的意大利人组成的教皇基干部队适于进行野战；其余都是志愿军。4月在伊宗察河编成的几乎有2万人的奥地利预备军团在努根特的率领下，很容易地冲过了这些部队的防线，在5月25日与拉德茨基在维罗纳会师。于是，这位老元帅终于可以摆脱其消极防御的状况了。为了解救被皮蒙特军队围困的培斯克拉并扩大他所占领的地区，他率领全部军队向曼都亚进行了有名的侧敌行军（5月27日）；5月29日，他在这里渡到明乔河右岸，以猛攻夺取了库尔塔唐附近的敌军阵地，30日在戈伊托附近进到意大利军队的后方和翼侧。但是，同日培斯克拉陷落了，天气也不利，加之拉德茨基也觉得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决战。因此，6月4日他又经由曼都亚回师艾契河，派一个预备军去维罗纳，自己

則率領其余的部队經列尼亚哥向維琴察进发，当时維琴察正由杜兰多和他的 17 000 人設防固守。10 日拉德茨基以 3 万人猛攻維琴察，11 日杜兰多在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以后投降。第二軍（即达斯普雷軍）占領了帕多瓦、布兰塔河上游谷地和威尼斯全省，然后随第一軍进至維罗那；与此同时，另一个預备軍团在韦尔登指揮下由伊宗察河方面开来。在整个这段時間內，直到整个战局結束时，皮蒙特軍队执迷不悟地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里沃利高原，大概从拿破侖胜利时起他們就把这个高原視为占領意大利的鎖钥，但是，在 1848 年，当奥地利人新开辟了一条經由达尔薩谷地到提罗耳的可靠的交通綫，即經伊宗察河到維也納的直接交通綫后，这个高原就再沒有任何意义了。同时皮蒙特軍队还必须采取某种行动来对付曼都亚，因此他們在明乔河右岸上封鎖了曼都亚；这个行动只能有一种意义：证明束手无策的状态支配着皮蒙特兵营，把軍队分散在里沃利和博尔戈福特之間整整 8 德里的战綫上，并且让明乔河把軍队分为两半，不能互相支援。

正当皮蒙特軍队企图在明乔河左岸也封鎖曼都亚的时候，拉德茨基又从韦尔登的軍队得到 12 000 人的增援，于是决定对力量已經削弱的皮蒙特軍队的中央进行突破，然后将敌人前来增援的部队各个击破。7 月 22 日，他下令攻击里沃利，23 日皮蒙特軍队即全部退出該地；7 月 23 日，他亲自率領 4 万人由維罗那出击，向索恩河和索馬康帕尼亚附近仅仅由約 14 000 名皮蒙特軍队防守的陣地进攻，攻占了該陣地，从而打乱了敌人整个防綫。7 月 24 日，皮蒙特軍队左翼完全被赶过明乔河，而这时已集中并轉入对奥地利軍进攻的他們的右翼，也于 25 日在庫斯托查被粉碎；26 日，全部奧軍渡过了明乔河，又一次在沃尔塔附近击败了皮蒙特軍队。战

局到此結束；皮蒙特軍几乎未作抵抗，即退过提契諾河。

上面对 1848 年战局的簡述比任何理論根据都更好地证实了明乔河和艾契河这一陣地的力量。皮蒙特軍隊到达四边形的要塞区以后，不得不分派很多的兵力来監視这些要塞，以致他們进攻的力量，正如桑塔路其亚会战所表明的那样，就因此而大为削弱；而拉德茨基剛获得第一批增援，就能在要塞之間完全自由地行动，有时以曼都亚为基地，有时以維罗那为基地，今天在明乔河右岸威胁敌人后方，过几天又攻占維琴察，一直把战局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固然，皮蒙特軍隊會接連犯了錯誤。但是，陣地的作用也就在于能使敌人陷入困境，而且几乎是迫使他們去犯錯誤。对各个要塞的監視，尤其是对这些要塞的圍攻，迫使他們分散、削弱自己現有部队的进攻力量；河流又使他們加大了軍隊分散的程度，使他們的几个軍几乎不能相互支援。在敌人的野战軍时刻都可能从維罗那的独立堡垒出动并向圍攻者猛扑的条件下，要想圍攻曼都亚，那該需要多么巨大的兵力啊！

1797 年只有曼都亚才阻住了波拿巴將軍的常胜軍。他一生只有两次对要塞感到敬畏，一次是在曼都亚，另外一次是十年之后在但澤。1797 年战争的整个后半期，即卡斯提奧涅、美多列、卡利阿諾、巴薩諾、阿尔科列、里沃利等会战¹²¹，都是圍繞着曼都亚进行的，只是在这一要塞陷落后，胜利者才敢繼續东进渡过伊宗察河。那时維罗那还没有构筑好工事；1848 年，在艾契河右岸的維罗那周圍仅构筑好城墙，桑塔路其亚会战就是在不久以后奥地利构筑多面堡、后来又接着构筑独立堡垒的地方进行的；只是在有了这些工事以后，維罗那营垒才成为整个陣地的核心——內堡，而陣地也因此而具有极大的威力。

可見，我們并不是要竭力縮小明喬河綫的作用。但是不应当忽視，只是在奧地利開始獨自担当風險在意大利進行戰爭，而博岑—因斯布魯克—慕尼黑這一交通綫由于另外一條交通綫，即特雷維佐—克拉根富特—維也納交通綫的出現而退居次要地位以後，這一條河流綫的作用才顯示出來。對於現在的奧地利來說，占領明喬河綫確實是一個頭等重要的問題。奧地利作為不受制於德國的、以歐洲大國身分行動的獨立國家，必須或者把明喬河及波河下游控制在自己手里，或者放棄提羅耳的防禦；不然，提羅耳就可能從兩個方面受到迂迴並且只有經過托勃拉赫山口才能與帝國的其餘部分保持聯繫（由薩爾茨堡通過巴伐利亞到因斯布魯克）。但是，老一輩的軍事家中，有人認為提羅耳本身就具有很大的防禦能力，它既能瞰制多瑙河流域，又能瞰制波河流域。然而這個意見無疑是以幻想為基礎的，從來沒有為經驗證實過，因為像 1809 年的戰爭¹²² 那樣的起義戰爭，不能作為給正規軍作戰下結論的根據。

提出這個觀點的是畢洛夫。他在他所著的霍根林登¹²³ 和馬連峨戰史中順便提出了這個觀點。當拿破侖在世時被派到聖海倫島去的一位英國軍事工程師埃梅特曾有过該書¹²⁴ 的法譯本，這本書在 1819 年落到被囚的統帥手中。他在該書上作了許多眉批，埃梅特於 1831 年將該書連同拿破侖的眉批一起再版。

看來，這本書開始一部分給拿破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對於畢洛夫提出的將全部步兵展開成散兵綫的意見，他贊許地指出：«De l'ordre, toujours de l'ordre, les tirailleurs doivent toujours être soutenus par les lignes». [“隊形，總是隊形，散兵綫始終應當由橫隊支援。”] 以後又幾次寫道：«Bien, c'est bien» [“好，這很好”]，又是 «bien» [“好”]。但是到了第 20 頁，拿破侖看到可憐的

毕洛夫煞费苦心地想要用他的离心退却和向心进攻的理论来说明（说得极不成功而且又很笨拙）战争的各种变化无常的现象，看到他用幼稚的解释使巧妙的几步棋失去意义的时候，就忍耐不住了。开始拿破仑一连几处指出：«Mauvais», «cela est mauvais», «mauvais principe» [“不好”], [“这不好”], [“不好的原则”], 接着他指出：«cela n'est pas vrais», «absurde», «mauvais plan bien dangereux», «restez unis si vous voulez vaincre», «il ne faut jamais séparer son armée par un fleuve», «tout cet échafaudage est absurde» [“这不对”], [“胡说”], [“不好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计划”], [“如果想要取得胜利，就得坚持集中”], [“任何时候都不能让河流把自己的军队隔开”], [“这简直是一派胡言”] 等等。及至以后当拿破仑发现毕洛夫总是夸奖坏的战例而指责好的战例，把最愚蠢的动机强加于一些将军并向他们提出一些最可笑的劝告，甚至还想废除刺刀而用长矛装备步兵第二列的时候，他不禁叹道：«bavardage inintelligible, quel absurde bavardage, quelle absurdité, quel misérable bavardage, quelle ignorance de la guerre». [“莫名其妙的空谈，毫无意义的空谈，荒谬绝伦，可怜到极点的空谈，对战争简直无知已极。”]

毕洛夫指责克赖指挥的奥地利多瑙河军团，因为它退到乌尔姆，而不进入提罗耳。提罗耳——这是由许多山峰和峭壁形成的不可攻破的棱堡，如果有相当强大的军队将它占领，就能同时控制巴伐利亚和一部分伦巴第地区（这里拿破仑批道：«On n'attaque pas les montagnes, pas plus le Tirol que la Suisse, on les observe et on les tourne par les plaines». [“对山地不能进攻，无论对提罗耳或者对瑞士都不能这样作，应当监视它们，沿平原迂迴它

們。”)。接着毕洛夫又指責莫罗不应当让克賴軍团把自己牵制在烏尔姆附近,而应当不理睬它,直接去占領駐軍很少的提罗耳;毕洛夫认为,占領提罗耳对奥地利帝国是致命的打击(拿破侖批道:«Absurde, quand même le Tirol eût été ouvert, il ne fallait pas y entrer». [“胡說八道,纵然提罗耳完全开放,也不应当进占。”])。

拿破侖讀完全书以后,他对向心进攻和离心退却的体系和山地瞰制平原的理論下了如下的評語:«Si vous voulez apprendre la manière de faire battre une armée supérieure par une armée inférieure, étudiez les maximes de cet écrivain; vous aurez des idées sur la science de la guerre, il vous prescrit le contre-pied de ce qu'il faut enseigner». [“如果你想要知道使比較强大的軍队被比較弱小的軍队打敗的方法,就請你研究这个作者所提出的原理;你将会得到一个关于軍事科学的概念,他教你不要去做的,恰好就是你应当学习的东西。”]

拿破侖三次甚至四次重复这一警告:«il ne faut jamais attaquer le pays des montagnes». [“絕不应当进攻山地。”]他对山地的这种恐惧无疑产生在較晚的时期,那时他的軍队已經非常龐大,必須依靠平原来解决給养問題和造成战术展开的条件。西班牙¹²⁵和提罗耳大概也促使他得出这样的結論。以前他并不是这样惧怕山地的。他的1796年远征前半期完全是在山地进行的,而在以后的几年中,馬森納和麦克唐納充分证明;在山地战中,而且首先是在山地战中,也能以較小的兵力获得很大的成果。但是,总的說来,有一点是显而易見的,就是我們現代的軍队在平原和小丘陵相間的地形上能够最好地發揮自己的力量,而主張率領大軍进入高山(不是因为要通过这些高山,而是要在那里长期地占領障地)的

理論，尤其是在左右两面有像巴伐利亚或倫巴第这样四通八达的平原可以解决战争的結局的条件下，是錯誤的。比如說，提罗耳对于一支 15 万人的军队能够供养多久呢？饥饿很快地就会把他們重新赶到平原上，而敌人在这段时间內却可以在平原上巩固自己的陣地，因此他們可能被迫在极不利的条件下应战。最后，在狭窄的山谷中，这支军队又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展开全部兵力的陣地呢？

如果奥地利不再占有明乔河和艾契河，那末提罗耳对于它就会成为命中注定一旦遭受来自北方或南方的攻击就得被迫放棄的陣地。德国却可以通过提罗耳的各山口迂迴直到阿达河的倫巴第地区，但是，在奥地利单独行动时則相反，从倫巴第和威尼斯省却可以迂迴直到布兰塔河的提罗耳地区。只有当奥地利北有巴伐利亚作掩护，南又由于占領了明乔河綫而有了掩护时，它才能守住提罗耳。莱茵联邦¹²⁶ 建立以后使得奥地利甚至連提罗耳和威尼斯省两地合在一起都完全不能真正防守，所以，拿破侖根据普勒斯堡和約从奥地利割去这两省¹²⁷ 是完全貫徹了他的主張。

因此，对于奥地利說来，占領連同培斯克拉和曼都亚在內的明乔河綫是絕對必要的。对于整个德国，虽然从軍事观点来看占領这一綫也还是有很大的好处，但是沒有任何必要。好处在什么地方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这一河流綫使我們可以在倫巴第平原預先占有一个强大的陣地，而不需要一开始先去夺取它，同时这一河流綫使我們的防御地带变得十分完整并且大大加强了我們的攻势。

可是如果德国不占有明乔河綫又怎么样呢？

假定整个意大利是独立的、統一的，并同法国結盟以进攻德国，那末从前面所讲的一切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作战綫

和退却綫就会不是維也納—克拉根富特—特雷維佐方向，而是慕尼黑—音斯布魯克—博岑和慕尼黑—菲森—芬斯特閔茨山口—格留恩斯方向，这些路綫通往倫巴第平原的出口都在苏甘納谷地和瑞士边境之間。那末在这种情况下攻击所应指向的决定性地点是什么地方呢？显然，这将是北意大利的把半島同皮蒙特和法国連結起来的那一部分地区，亦即波河中游从亚历山大里亚到克雷莫納的这一段。但是，德国人要进入这一地区，有加尔达湖和科摩湖之間那些山口就完全够了，并且这些道路还可以作退却之用，万不得已时也可以經由施蒂尔夫山口退却。这时，位于明乔河和艾契河畔的那些要塞（根据我們前面的假設，它們是在意大利軍隊手中）就离决战戰場很远。对我們的敌人來說，派一支强大得足以采取进攻行动的部队去占領維罗那营垒，只是无謂地分散兵力。或者可以想像，意大利軍隊也許会以主力在他們所喜爱的里沃利高原上掩护艾契河谷以抵御德軍吧？自从通往斯特爾維奧山口（通过施蒂尔夫山口）的道路筑成以后，艾契河谷的出口就不再起那样重要的作用了。但是，即使里沃利重新起占領意大利的鎖钥的作用，而且那里的意大利軍隊能誘使德軍向它进攻，那时維罗那又有什么用呢？它不能封鎖艾契河谷的出口，否則，意大利軍隊向里沃利的进軍就成为多余的了。要在失敗时掩护退却，有培斯克拉就足够了，因为它能保证渡过明乔河，这样就可以繼續安全地向曼都亚或克雷莫納前进。如果意大利軍隊把全部兵力集中在四个要塞之間，不进行战斗而在这里等待法軍到来，这在战局一开始就会把敌人的兵力分成两半，这就使我們能够处于两軍之間，首先以联合的兵力向法軍猛扑，粉碎他們，然后再把意大利軍隊从他們的要塞里赶出来，当然，这个过程会比较长些。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每当

它遭到来自北面和东面的胜利进攻时，它本国的军队都不可避免地要作出抉择：以半岛或者以皮蒙特作为它的作战基地，这样一个国家显然应当在它的军队可能面临这种抉择的地区构筑大规模的防御工事。在这种情况下，提契诺河和阿达河与波河的汇流处就可作为据点。维利森将军（在他所著的“1848年意大利战局”一书中）曾表示希望，这两个地点都由奥地利人设防。但是，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筑垒所需的这块领土不属于奥地利（在克雷莫纳附近，波河右岸属于帕尔马，而在皮阿琴察，奥军也只有权留驻守备部队）；此外，这两个地点都太深入意大利，奥军在任何一次战争中都会受到起义者的包围。维利森一看到两条河流的汇合点，就不能不立即设计构筑大型营垒，但是他又忘记了，无论提契诺河还是阿达河都不适于做防线，因此，甚至根据他自己的意见来看，它们也不能掩护位于其后的地区。但是，对奥军说来是白白浪费兵力的地方，对意大利军队却是绝好的障地。对他们说来，波河是主要防线；匹威格顿、克雷莫纳和皮阿琴察这个三角地带连同其左面的亚历山大里亚和右面的曼都亚能成为这一防线的真正的屏障，使军队可以在它的掩护下静待远方盟军的到来，或者甚至可以在一定场合下在决定性的战场上，在塞齐亚河和艾契河之间的平原上实行进攻。

冯·拉多维茨将军曾就这个问题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发表过意见，他说，如果德国失去了明乔河线，它就将陷入目前只有在整个战局失败时才能遇到的那种处境。那时，战争立刻就会在德国本土上展开；战争将会在伊宗察河和意大利提罗耳开始，而包括巴伐利亚在内的整个南德意志将被迂回，所以甚至在德国，战争也将在伊扎尔河地区进行，而不是在莱茵河上游地区进行。

看来，馮·拉多維茨將軍对于自己听众的軍事知識有完全正确的判断。确实不错，如果德国放棄明乔河綫，从領土和陣地方面說它受的重大損失，等于让法軍和意大利軍隊打了一次大胜仗。但是，德国即使这样让步，也絕不会处于战敗时所處的那种地位。难道說，集中在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麓、經過提罗耳山口进攻倫巴第的一支强大的、新銳的德国軍隊的处境，会同一支因战敗而士气沮丧的、在敌人追击下仓卒向勃倫納山口退却的軍隊的处境完全一样嗎？难道从一个能在許多方面瞰制法軍和意大利軍隊的会合地区的陣地上发动胜利进攻的条件，能够同一支战敗的軍隊把炮兵拖过阿尔卑斯山的条件相提并論嗎？我們在未占領明乔河綫的时候征服意大利的次数远比我們占領了它以后为多。在必要时我們还会重演这个把戏，这一点誰能怀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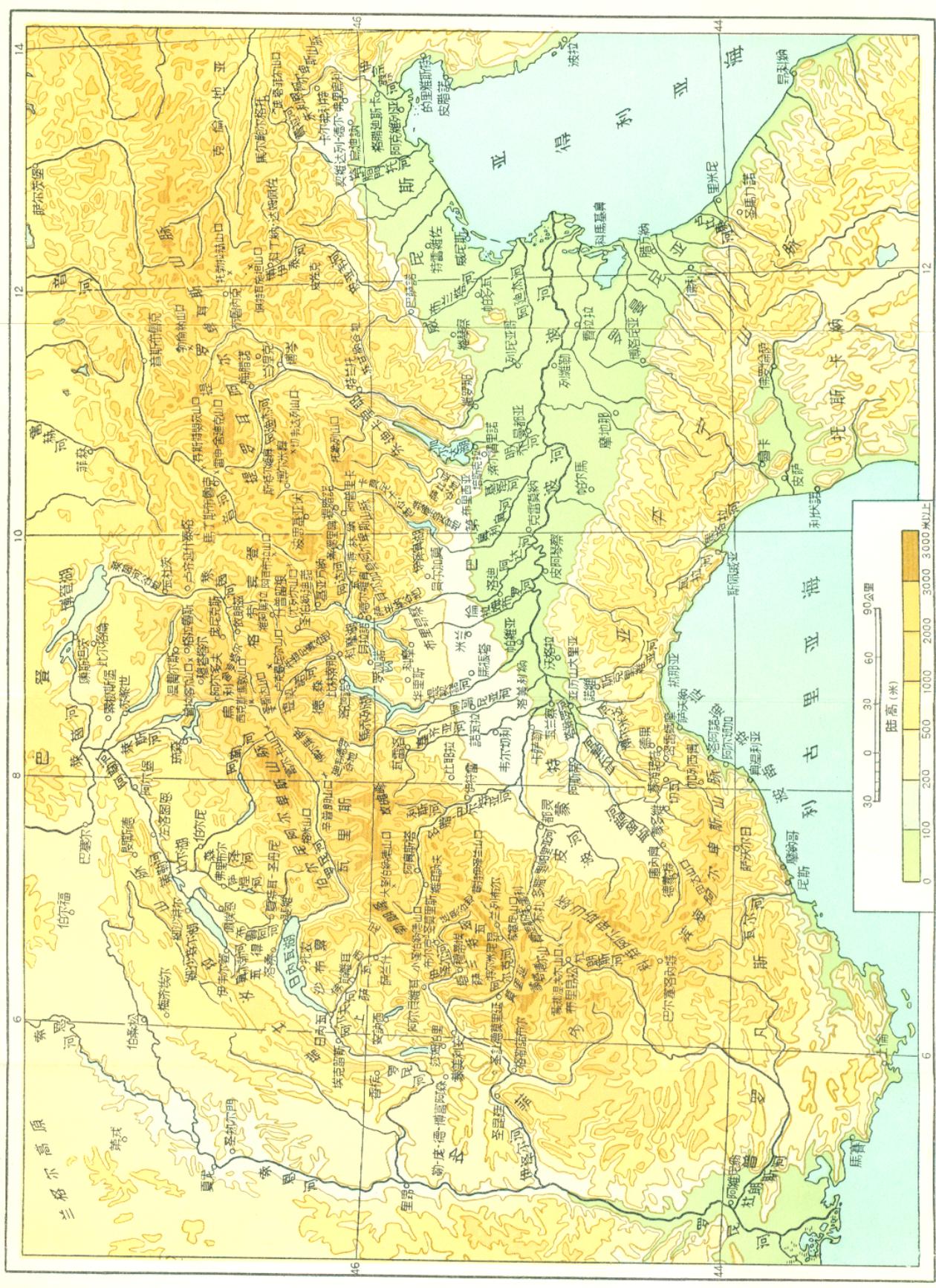
至于断言沒有明乔河綫，战争馬上会在巴伐利亚和克倫地亚开始，这也同样是不正确的。我們对这一問題的看法总括如下：沒有明乔河綫，南德边境的防御只能是攻势的。这是由于德国边境諸省多山，不能作为决战的場所，同时阿尔卑斯山各条山道的有利形势也决定了这点。战场位于这些山道前面的平原上。我們必須冲下山去，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們这样作。不能想像还有比我們在这里所具有的条件更有利于进攻了，甚至在法意結成同盟这种对我們最不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整修經過阿尔卑斯山的山道，在提罗耳各道路交叉点构筑工事，还会使形势更为有利，道路交叉点的工事应当十分坚固，万一我們退却，即使不能完全阻住敌人，至少也要能迫使他們分派大量部队来保证自己的交通綫。至于阿尔卑斯山的道路情况，在阿尔卑斯地区的一切战争都向我們证明，不仅大部分主要的非石鋪道，而且甚至許多騾馬

道，各兵种通过都不太困难。在这样的条件下，德国向倫巴第的进攻确实可以組織得使它具有取胜的一切可能。当然，尽管如此，我們仍然可能会打敗仗，那时才可能发生拉多維茨所說的那种情况。那时关于維也納会失去掩护和敌人会通过提罗耳迂迴巴伐利亚的問題又将是个什么情况呢？

首先非常明显，在提罗耳的德国军队沒有完全彻底被赶过勃倫納山口之前，沒有一营敌人敢于渡过伊宗察河。从巴伐利亚成为德国对意大利作战的基地以来，意法联軍向維也納的进攻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因为这种进攻只会是不利地分散兵力。但是，即使在那时維也納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中心，敌军会派遣自己的主力来占領它，这也不过說明，它应当設防。如果維也納設了防，那末拿破侖的 1797 年远征及其 1805 年和 1809 年的侵入意大利和德国都会使法軍遭到极不利的結局。前进到这样远的一支进攻的军队，常常有使自己最后的兵力为設防的首都的抵抗所粉碎的危險。纵然敌人把德国军队赶过了勃倫納山口，那他們需要有多么巨大的优势兵力才能分兵向奥地利内地作有效的行动啊！

但是，通过意大利迂迴整个南德的可能性又怎样呢？事实上，如果說从倫巴第有可能迂迴直到慕尼黑的南德，那末試問：德国能够迂迴意大利多少地方呢？至少也能够迂迴到米兰和帕維亞。因此，在这方面，机会是均等的。但是，德国的領土比意大利广闊得多，所以配置在上萊茵地区的德国军队在遭到敌军通过意大利向慕尼黑方向的“迂迴”时，完全不必立即撤退。上巴伐利亚的营垒或者慕尼黑的临时工事可以掩护被击败的提罗耳軍团并迅速阻止敌人的追击，这时上萊茵軍团只需要选择烏尔姆和英果尔施塔特或者美因河作为基地来作战，就是說在最坏の場合也只不过要变

北意大利和瑞士



換作战基地。对于意大利，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敌军通过提罗耳各山口从西面迂迴意大利军队，那末只要把意大利军队赶出要塞，就可以征服整个意大利。在同时对意大利和法国作战时，德国经常会有好几支——至少有三支军队——作战，而胜败也要看所有三个战局的总的结果如何。但是，意大利只能提供一支军队展开的战场；任何分散兵力的作法都是错误的；如果这一支军队被歼灭，意大利也就被征服了。对于在意大利的法国军队来说，在任何情况下主要的问题都是保持与法国的交通线；由于这一交通线不是只到田达山口和热那亚为止，因此法军就得把自己的翼侧暴露给驻在提罗耳的德军；而且法军在意大利前进得愈远，暴露得也愈多。既然在意大利将反复进行德国战争，而且作战基地将由奥地利转到巴伐利亚，那末法军和意军经过提罗耳进入巴伐利亚的可能性当然应该预计到。但是，只要有按照要塞为军队服务而不是军队为要塞服务的现代原则构筑的相应的筑城工事，那末侵入德国比德国侵入意大利要容易粉碎得多。因此，我们不当用所谓“迂迴”整个南德这种说法吓唬人。敌人即使经过意大利和提罗耳迂迴了德国的上莱茵军团，也必须在前进到波罗的海之后才能利用这一迂迴的成果。拿破仑由耶拿向施特廷的进军¹²⁸恐怕不能在慕尼黑到但泽的方向上重复了。

我们决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放棄明乔河和艾契河綫德国就会失去一个非常强大的防御障地。但是，认为这个障地对南德边境的安全必不可少，那我们是坚决地反对的。当然，如果从一个假定出发（看来持相反观点的人就是从这种假定出发的），认为随便哪一支德国军队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现，总是要被击败的，那就可以设想艾契河、明乔河和波河对于我们绝对必要的。果真如此，

这些防綫实际上对于我們也就不会有任何好处；無論要塞还是軍隊也都不能給我們帮什么忙；我們也最好是干脆从卡夫丁的軛形門下面走过吧¹²⁹！我們不是这样設想德国武装力量的，因此我們认为，我們的南部边境給我們提供的向倫巴第領土进攻的那些有利条件，完全足以保证它本身的安全。

当然，这里还有一些政治上的理由在起作用，我們对此也不能不加以注意。自 1820 年开始在意大利掀起的民族运动¹³⁰，每經過一次失敗就重新兴起而且更加壮大。所謂自然疆界和民族疆界恰恰相合而且同时又非常明显的国家并不很多。如果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而且又有 2 500 万人口，民族运动已經愈来愈加强起来，那末只要它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最重要的而且人口約占四分之一的这一部分領土处于反民族的外国統治之下，这种运动就不会再平息下去。1820 年以来，奥地利只是依靠暴力，依靠对此起彼伏的起义进行鎮压，依靠戒严的恐怖手段才統治住了意大利的。为了維持在意大利的統治，奥地利不得不采用比对待普通犯人还要坏的办法对待自己的政治敌人，即每一个有民族意識的意大利人。奥地利过去并且現在有些地方仍然采用的对付意大利政治犯的手段是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聞所未聞的。为了使意大利的政治犯失节，奥地利人特別喜欢對他們进行杖笞，以此来向他們逼供和懲罰他們。不少人对意大利人的匕首或者对于政治性的暗杀流露出道义上的憤懣，但是他們似乎完全忘記了这一切都是对奥地利杖笞的回答。奥地利为了維持自己在意大利的統治所不得不采用的方法，就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統治是不能长久的；德国在意大利的利益恰恰与拉多維茨、維利森和海尔布隆納尔的說法相反，是和奥地利的利益不一致的，德国必然会問：这些利益是不是大到超过了随这

些利益而产生的許多不利呢？

北意大利是一个附屬物，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有在战时对德国有利，在平时却只能有害。为了使意大利繼續屈从所需要的兵力，从1820年开始，一直在增加，从1848年起甚至在最太平的时期也超过7万人，这些军队总是觉得身在敌国，必須时刻提防受人襲击。非常明显，奥地利虽然从皮蒙特获得了軍事賠款，在倫巴第反复勒索軍稅，又发行强制公債和征收特別稅，但是它在1848—1849年的战争和对意大利的占領所付出的代价仍然远远超过了它1848年以来从意大利所得到的利益。而在1848—1854年这个时期，奥地利有计划地把意大利当作临时占領的国家来对待，在离开以前尽量搜刮。只是从东方战争时期起，也就是在几年中，倫巴第在某种程度上才处于比較正常的条件下；但是在目前混乱的形势下，在意大利人的民族感情再次被极强烈地激发起来的时候，这样的局面还能持續多久呢？

但是，更重要的是弄清下列問題：占領倫巴第所得的利益比起因此在全意大利引起的对我們的仇恨和极强烈的敌視来究竟孰輕孰重？这种利益比起德国人由于奥地利（它以德国的名义，而且要我們相信，也是为了德国的利益）想在这个国家里保持自己的統治而采取的措施所負的共同責任来究竟孰輕孰重？这种利益比起經常干涉意大利整个其余部分的內政而带来的不利来究竟孰輕孰重？迄今的實踐表明，而且奥地利人要我們相信，不这样干涉，倫巴第就保持不住；而进行这种干涉更加激发了整个意大利对我們德国人的仇恨。在我們上述的所有軍事探討中，我們总是把最坏的情况，即法意同盟作为前提。只要我們占据着倫巴第，在法国对德国的一切战争中意大利都无疑总是法国的盟邦。但是，只要我

們放棄倫巴第，這一點就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保有四個要塞而使我們必然受到極強烈的敵視，使法國人同 2 500 萬意大利人結成同盟，這難道對我們有利嗎？

說意大利人政治上無能，說他們注定不是受德國人統治便是受法國人統治的這種自私的謠言以及關於能否建立統一的意大利的各種議論，竟出自德國人之口，實在使我們有些奇怪。我們——人口比意大利多一倍的偉大的德意志民族，擺脫“注定”不是受法國人統治便是受俄國人統治的命運，難道是很久以前的事嗎？關於德國是統一還是分裂的問題難道今天實際上已經解決了嗎？難道此刻我們不正是處在將決定我們未來的方向問題的重大事變的前夜嗎？難道對愛爾福特的拿破侖或者奧地利在華沙會議上對俄國的態度或者布隆采耳會戰¹³¹我們都忘記得乾乾淨淨了嗎？

我們姑且假定意大利應該處於德國或者法國的勢力之下。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同情或憎惡的問題外，決定的關鍵仍舊還有向意大利擴展自己勢力的兩個國家的軍事地理形勢。就算法國和德國的軍力是相等的，雖然德國顯然可能會強大得多，但是我們認為現在已經證明，即使是在對法軍最有利的情況下，即瓦里斯和辛普朗對法軍是開放的，法軍的直接軍事勢力也只能達到皮蒙特，如果想把勢力擴展到更遠的地區，他們首先就要打勝仗，而我們的勢力却遍及整個倫巴第以及皮蒙特與半島相接的地區，要使我們失去這種勢力，我們的敵人首先必須打敗我們。不過有保證德國居于優勢地位的這種地理形勢，德國是不必害怕與法國爭雄的。

不久以前，海爾布隆納爾將軍曾在奧格斯堡“總匯報”上發表了如下的意見：德國的存在並不是為了給將遭雷殛的波拿巴王朝作避雷針。意大利人也同樣有權說：意大利的存在並不是為了給

德国人作缓冲国，以缓和法国对他们的打击，而为此所得到的报答是挨奥地利的杖笞。如果德国愿意保有这样一个缓冲国，那末它实现这个目的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同意大利搞好关系，承认民族运动，让意大利人能决定自己的事务，因为意大利人是不会干涉德国事务的。拉多維茨硬說，如果奥地利今天退出北意大利，法国明天必然会統治那里，这种說法不仅在他那个时候，就是在三个月以前也是毫无根据的。今天正在形成的局势证明，拉多維茨的說法开始成为现实，不过是就同他所說的完全相反的意义来讲。如果說 2 500 万意大利人都不能捍卫自己的独立，那末 200 万丹麦人、400 万比利时人和 300 万荷兰人就更做不到这一点了。虽然如此，我們却没有听到，拥护德国在意大利的統治的人們抱怨法国和瑞典在上述国家的統治并要求以德国的統治来代替它。

至于統一的問題，我們的意見是这样的：或者意大利可以形成一个統一的整体，那时它将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絕對不会是法国的，也絕對不会是德国的，因此對我們也不会比對法国人更有害些；或者意大利仍然保持分裂状态，那时这样的状态也可以使我們在每一次对法国的战争中在意大利获得同盟者。

只有一点是毫无疑問的，那就是**只要我們本身强大**，不管我們是否占領倫巴第，我們总会在意大利保持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們让意大利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意大利人对我們的仇恨自然就会消失，而我們对他們的自然的影响无论如何会大得多，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以跃居真正的領導地位。因此，如果我們不是把占領別国領土和鎮压別国民族（只有被偏見弄瞎了眼睛的人才会否认它們有历史发展的能力）当作自己力量的源泉，而是**关心使自己在本国内成为統一的和强大的**，那样我們就会做得好一些。

三

你有权要求的，別人当然也有权要求。如果我们与其說是为了抵御意大利人不如說是为了抵御法国人而要求取得波河和明乔河，那末，如果法国人为了抵御我們同样也要求取得一些河流的話，我們就不应当奇怪了。

法国的重心不在它的中部，即奥尔良附近的卢瓦尔河上，而是在北部，在塞納河上，在巴黎，而且两次經驗也证明，只要巴黎一陷落，整个法国也就要陷落了¹³²。因此，法国疆界形势的軍事意义首先在于这些疆界所起的防护巴黎的屏障作用。

由巴黎到里昂、巴塞尔、斯特拉斯堡、洛特布尔的直綫距离几乎相等，大約都是 55 德里。每当以巴黎为目标由意大利攻入法国时，如果攻入的軍隊不願意使自己的交通綫受到威胁，就必须突入罗尼河和卢瓦尔河之間的里昂地区或者更向北推进。因此，在敌人向巴黎前进的时候，法国对自己在格勒諾布尔以南的阿尔卑斯疆界可以不予注意，因为巴黎在这一方面是完全有掩护的。

自洛特布尔起，法国疆界即离开莱茵河，与它成直角轉向西北；自洛特布尔到敦克尔克，法国疆界几乎是一条直綫。因此，我們以巴黎—里昂为半徑經過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洛特布尔划出的圓弧，到洛特布尔即中断；法国北部疆界簡直成了这一圓弧的弦，弦那边的弓形地区不屬於法国。由巴黎到北部疆界最短的交通綫，即巴黎—蒙斯綫，只有巴黎—里昂或巴黎—斯特拉斯堡半徑

的一半。

从这些简单的几何关系中可以看出，为什么法国和德国之间在北方进行的一切战争中比利时总是成为战场。经过比利时，可以迂迴从凡尔登和馬尔納河上游直到莱茵河的法国整个东部。也就是说，不等配置在莱茵地区的法国军队经过凡尔登或肖蒙赶回巴黎，从比利时攻入的军队就可能先到达巴黎城下。因此，从比利时攻入法国的军队在胜利进军的情况下总是可以在巴黎和法国莱茵军团或摩塞尔军团之间楔入；因为从比利时疆界到对迂迴有决定意义的馬尔納河上各点（莫市、梯叶里堡、埃佩尔訥）的路綫比直接到巴黎的路綫还要短，这一点就更容易做到了。

但是不仅如此，敌人沿着从麦士河到海边整个这一綫在向巴黎方向前进时，在到达安訥河和瓦瑟河下游以前，都不会遇到任何天然障碍，而且这两条河流的分布也非常不利于从北方防守巴黎。无论是 1814 年或者是 1815 年，这些河流都没有给攻入的军队造成严重的困难。即使把它们也划入塞納河及其支流所形成的防御体系区内（在 1814 年，这些河流曾部分地被这样利用），那末同时也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法国北部的真正防御只是在貢比泉和苏瓦松附近才开始，而且从北方掩护巴黎的第一道防御障地距巴黎仅 12 德里。

很难想像有比法国与比利时接壤的疆界更为薄弱的国境了。大家都知道，沃邦費了多少心血以人工的防御手段来弥补这一疆界的自然防御手段的不足；大家还知道，1814 年和 1815 年攻入法国的敌军几乎毫不介意地通过了三层要塞带。誰都知道，1815 年在受到仅仅一个普魯士军的攻击并经过空前的短期圍攻和炮击之后，要塞便一个接着一个投降了。阿温在受到 10 門野战榴彈炮半

日的射击之后于 1815 年 6 月 22 日投降。吉茲要塞一彈未发，就在 10 門野炮之前投降了。莫貝日在圍攻开始后的第 14 天，即 7 月 13 日投降了；兰德列西在圍攻开始和两小时炮击之后，即在圍攻者总共发射了 126 发爆炸彈和 52 发实心彈之后 36 小时，即 7 月 21 日就打开了城門。馬里昂堡仅仅 *pro forma* [为了装样子]，让敌人对它开始圍攻并发射了一发 24 磅的实心彈，然后于 7 月 28 日投降。菲利普維耳只支持住了两昼夜的圍攻和几小时的炮击。罗克魯阿在敌人开始塹壕作业和两小时炮击之后 26 小时便投降了。只有梅济埃尔在圍攻开始后支持了 18 昼夜。在要塞司令中間投降之風极为盛行，这和普魯士在耶拿会战后所表露的情緒相差无几；如果借口說 1815 年所有这些要塞都已坍塌傾頽，守軍薄弱，装备不好，那末毕竟不能忘記，这些要塞除了少数例外，不可能不是經常无人过問的。沃邦的三层要塞带目前已失去任何意义，它对于法国是絕對有害的。麦士河以西的要塞沒有一个能独自掩护任何一块領土，而且我們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四五个要塞在一起組成要塞群，使軍隊能在其中掩蔽而同时保持机动能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任何一个要塞都不在大河岸旁。利斯河、些耳德河和松布尔河，从軍事观点来看，只有在比利时境內才有意义；因此，分散在开闊地上的这些要塞的威力不能扩展到火炮射程以外。除了在向比利时进攻时可以加以利用的疆界上的几个大筑垒基地和麦士河及摩塞尔河上几处有战略意义的据点以外，法国北部疆界上其他一切要塞和堡垒都只能无謂地分散兵力。哪一个政府如能鏟平这些要塞，就可以說是造福于法国了。但是法国傳統的迷信对此又会說些什么呢？

因此，法国的北部疆界是极端不利于防御的；实际上这里是无

法防守的，沃邦的要塞带并没有加强它，在目前只是它的弱点的供认和标志而已。

正如“中欧大国”的理论家在意大利寻找河流一样，法国人也正在他们北部疆界的那一边寻找一条河流充当良好的防御障地。那末这能是哪一条河流呢？

第一条可能引起注意的是些耳德河下游和迪尔河一直到松布尔河与麦士河的汇合处这一线。这一条线把比利时最好的一半划入了法国。它几乎把法国人和德国人交战的所有著名的比利时战场都包括在内，如奥登纳德、热马普、弗略留斯、利尼、滑铁卢¹³³。但是，即使有这一线也还不能作为防线，因为它在些耳德河和麦士河中间留有巨大的空隙，敌人仍可由此长驱直入。

第二条线可能是麦士河。可是，纵然法国占领了麦士河左岸，它的地位仍然不如德国在意大利只占领艾契河时所处的地位那样有利。艾契河一线可以使德国的疆界非常完整，而麦士河在这一点上还差得很远。如果麦士河由那慕尔直接流向安特卫普，那它就会成为一条相当好的疆界线。但麦士河却由那慕尔转向东北，只是到文洛以后才成大的弓形流入北海。

那慕尔以北麦士河和北海之间的整个地区在战时只能由自己的要塞来掩护；因此，敌人一渡过麦士河，就一定会与法国军队相遇于南布拉班特平原，而法军向德国莱茵河左岸进攻时却立即会碰到坚固的莱茵河防线，也就是直接碰到科伦营垒。麦士河在色当和柳提赫之间所形成的凹角也会使这一线受到削弱，虽然这一凹角为阿尔登高原所弥补。因此，麦士河一线在一个地方给予法国人的好处太多，而在另一个地方却又太少，因而不能成为一条好的国防线。所以我们还得进一步找寻。

現在我們再把圓規的一脚放在巴黎，以巴黎一里昂為半徑由巴賽爾到北海划一弧綫。這時我們就會發現，萊茵河由巴賽爾非常準確地沿着這一圓弧流到它的河口。萊茵河上的各要點與巴黎的距離都相等，相差僅數德里。這也就是法國企圖獲得萊茵河疆界的真正的現實的理由。

如果萊茵河屬於法國，那末在同德國作戰時，巴黎就真正成為國家的中心了。由巴黎向受威脅的疆界（不論萊茵河還是汝拉山）所引的一切半徑，長度都是相等的。凸出的圓弧到處朝向敵人，敵人不得不在這個圓弧的外面進行迂迴機動，而法國軍隊卻可以沿較短的弦運動而趕過敵人。幾個軍團的作戰綫和退却綫等長，極其便於它們進行向心退却，而能在預定進行主要突擊的地点集中其中兩個軍團來對抗還處在分散狀態的敵人。

如果法國人佔有了萊茵河疆界，法國的防禦體系，就自然的條件而論，就將屬於被維利森將軍稱為“理想的”、再好不過的那一類疆界了。成扇形流入塞納河的云納河、奧布河、馬爾納河、安訥河和瓦瑟河在塞納河流域形成了堅強的內部防禦體系（拿破侖在1814年曾利用這一體系在戰略上給聯軍以非常嚴重的教訓¹³⁴），只有在萊茵河作為疆界綫的條件下，這一河流防禦體系才能在各個方向受到同等的掩護；敵人將差不多同時自各方接近這一地區，並可被河流阻止，直到法國軍隊能以集中的兵力分別向敵軍各個孤立的縱隊進擊時為止；但是，如果沒有萊茵河一綫，在決定性地區如貢比臬和蘇瓦松一帶的防禦就只能在距巴黎僅12德里的地点開始。在歐洲任何地區的鐵路，都不能像在萊茵河和塞納河之間這塊地區的鐵路那樣，可以迅速集中大批兵力來大力支援防禦。鐵路綫以巴黎為圓心，沿半徑分別通往布倫、布魯治、根特、安特衛

普、馬斯特里赫特、柳提赫和科倫，通往曼海姆并經過麦茨通往美因茲，通往斯特拉斯堡、巴塞尔、第戎和里昂。無論敌人最大的兵力在什么地方出現，到处都会遇到由巴黎沿铁路开来的全部后备軍的迎击。塞納河流域的内部防御能力特别是由于在这一地区內的所有作为半徑的铁路都沿河谷(瓦瑟河、馬尔納河、塞納河、奥布河、部分云納河)通过而更为加强。但是不仅如此，三条同圓心的铁路弧綫，每一条的长度至少都有圓周的四分之一，以彼此几乎相等的距离环繞着巴黎：第一条弧綫是莱茵河左岸的铁路綫，現在几乎由諾伊斯直通巴塞尔；第二条弧綫由奥斯坦德和安特卫普經那慕尔、阿尔隆、提翁維耳、麦茨和南錫到厄比納尔，也几乎全部連接起来；最后，第三条弧綫由加来經利尔、杜埃、圣昆廷、里姆、馬尔納河岸夏龙和圣迪济埃到肖蒙。因此，在这一地区內，到处都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內将大批軍隊集中在任何一个地点；在这里，由于自然和人工的条件，甚至沒有任何要塞也可以借軍隊机动的能力进行非常坚强的防御，使侵入法国的敌人遇到与他們在1814年和1815年所遇到的完全不同的抵抗。

以莱茵河作为疆界河流仅有一点不足之处。只要莱茵河的一岸完全屬於德国而另一岸完全屬於法国，那末两国人民誰也不能控制这一河流。無論在什么地方都不能阻止較强的軍隊(無論它屬於哪一個国家)渡过莱茵河；这种事情我們已見過几百次，而且战略也告訴我們，为什么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德国人以优势兵力进攻，法国人就只好在較近的接近地上进行防御：北方軍团在文洛和那慕尔之間的麦士河上进行防御；摩塞尔軍团在摩塞尔河上，大約在薩尔河流入摩塞尔河的汇合处附近进行防御；上莱茵軍团在摩塞尔河上游和麦士河上游进行防御。为了完全控制莱

茵河，为了能够有力地阻擋敌人渡河，法軍必須在萊茵河右岸占据桥头堡。因此，当时拿破侖直截了当地把威塞尔、卡斯特尔和克尔并入法兰西帝国¹³⁵，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在目前的情况下，他的侄子除了德国人在萊茵河左岸为他构筑的絕好的要塞以外，一定还会要求取得埃倫布萊施坦、多伊茨，而必要时还要取得盖尔曼尔斯海姆附近的桥头堡。这样，法国的軍事地理体系，無論从进攻或者从防御的观点來說，才算是完备的，任何更多的加添只能是有害的。至于这一体系的自然条件是多么好，多么不言而喻，1813年联軍已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法国在这以前大約17年建立了这一体系，而且人們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可敬的联軍尽管处于优势而法国无力抵御，但是他們却惊惶地退却了，連想也不敢想动摇这一体系，就像不敢褻瀆圣物一样；如果不是运动的德意志民族分子把联軍吸引到自己方面的話，萊茵河也許在今天还是法国的河流。

但是，法国人只有当我們不仅把萊茵河而且把萊茵河右岸的桥头堡都让給他們时，他們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正如在拉多維茨、維利森和海尔布隆納尔看来，我們德国人要保住艾契河和明乔河以及这两条河上的桥头堡培斯克拉和曼都亚，才算完成自己的职责。但是，那时我們就会使得德国对法国完全无能为力，就像目前意大利对德国一样。那时，俄国就会像在1813年那样，成为德国的当然“解放者”（正如目前法国，或者更正确地說，法国政府成为意大利的“解放者”一样），而且为了补偿它的大公无私的行为，它一定会只要求一些“小块”領土——如加里西亚和普魯士——以便使波兰的版图完整，因为經過这些省份不是也可以“迂迴”波兰嗎！

萊茵河对于法国，就像艾契河和明乔河对于我們一样，只是萊

茵河更加重要而已。如果說通过在意大利手中或者可能在法国手中的威尼斯省，可以迂迴巴伐利亚和莱茵河上游并打开通向維也納的道路，那末比利时和德国通过比利时則可迂迴法国整个东部并且使得通向巴黎的道路更加暢通无阻。由伊宗察河到維也納的距离到底还有 60 德里，在这一地区內还有某些防御的可能性；由松布尔河到巴黎一共才有 30 德里，而且只是在距巴黎 12 德里处，即苏瓦松或貢比泉附近，才可以找到多少能作为掩护的河流进行防御。如果像拉多維茨所說的，德国让出艾契河和明乔河，就会使自己事先处于像整个战局失敗后所处的地位，那末法国在現有疆界的条件下所处的地位，就好像它有了莱茵河疆界却打了两次敗仗一样，其中一次是为了爭夺莱茵河和麦士河上的要塞而进行的，另外一次是在比利时平原的田野上进行的。甚至像北意大利要塞的强大障地，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在莱茵河下游和麦士河上找到类似的情况；难道說就不能把馬斯特里赫特、科倫、幽里希、威塞尔和文洛稍事修筑，再加上两个中間据点，来构成同样强大的防御体系，使它完全能够掩护比利时和北布拉班特并使野战能力极弱的法国軍隊能够在河流間机动，以阻止有强大优势的敵軍，最后借助铁路毫无阻碍地退到比利时平原或杜埃地区嗎？

在进行这种研究的时候，我們都是从德国人向法国进攻的时候比利时对德国人完全开放并与德国人結盟这样一个假定出发的。因为我們应当用法国人的观点来論证，所以我們有权要求这个，就如同我們的敌人认为意大利——即便自由和統一的意大利也一样——是經常和德国人敌对的国家而有权要求明乔河一样。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首先考虑最坏的情况并准备应付它是非常自然的；法国人現在考虑他們北部疆界的防御能力和战略形势的

时候,就应当这样作。至于說比利时和瑞士一样,根据欧洲条約都是中立国,这种情况我們在这里可以不必注意。因为第一,历史实践一定会再次证明,这种中立在任何一次欧洲战争中都无非是一紙空文而已;第二,法国无论如何不能坚决指靠这种中立,不能在军事上这样来对待与比利时接壤的全部疆界,就好像那里已出现一个能掩护法国免遭德国进攻的海灣似的。因此,不管今后是否真正积极地防守疆界或者只派出部队占领以防可能的袭击,这段疆界仍然是很薄弱的。

我們已經把波河和萊茵河作了充分的比較。除了萊茵河的問題涉及的范围比波河更大以外(这只能加强法国的要求),沒有比这更加相似的情况了。可以相信,一旦爆发战争,德国兵士在波河上保卫萊茵河,实际上将比“中欧大国”鼓吹者在理論上所作的更为成功。当然,这些鼓吹者也是在波河上保卫萊茵河,但……只是为了法国人。

不过德国人也可能在什么时候一再吃败仗,以致失去自己在明乔河和波河上的“自然疆界”,对于这样一种情况,我們願意再作个比拟。法国人占有自己的“自然疆界”共 17 年,从此以后几乎已經 45 年沒有这样的疆界了。在这个期間,他們优秀的軍事权威也同样在理論上得出了这样的結論:沃邦要塞带对防止敌人侵入毫无作用,这一点已在現代軍事学术的原則中找到了根据,可見在 1814 年和 1815 年,并不是偶然的機會,也不是人們极喜欢說的 «trahison» [“叛变”] 使联軍得以安然地在要塞之間通过。此后,就很明显了,为保障易受袭击的北部疆界,必須采取某种措施。但是,虽然如此,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恢复萊茵河疆界,这是非常清楚的。那末該怎么办呢?

法国人找到了使这个伟大的民族获得光荣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把巴黎建筑成要塞，在近代史上他们最先试图把自己的首都变为规模宏大的营垒。旧派军事专家看到这种不智的举动，大摇其头。这不过是为了法国式的自夸而浪费金钱罢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纯粹是吹牛。谁听说过有方圆9德里、居民百万的要塞呢？除非将一半军队作为守备部队，否则怎样来防御这样的要塞呢？怎样供应这样多人的粮食呢？糊涂、法国式的自负、犯罪、修建巴比伦塔^①的重演！守旧的军事家这样指责这一新的举动，这些人正按沃邦式的六角形要塞研究围攻战，他们所知道的消极的防御方法中，没有比一个步兵排由隐蔽路向斜堤底部出击的规模更大的反击了！但是，法国人还是沉着地继续他们的工程，虽然巴黎还没有受到战争的考验，但是他们已心满意足，因为全欧洲非守旧的军事家都认为他们作得对，威灵顿已开始设计伦敦的筑城，在维也纳周围，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也已经开始构筑独立堡垒，柏林的设防问题至少也正在讨论中。他们从塞瓦斯托波尔的例子中亲身体会到，巨大的营垒，如果为进行大规模的积极防御的一支大军所防守，将具有多么巨大的威力。而且塞瓦斯托波尔周围仅有一道要塞围墙，根本没有独立堡垒；只有野战工事，没有任何石砌的内岸！

自从巴黎要塞筑成以后，法国就不再需要以莱茵河为疆界了。就像德国在意大利一样，法国将首先以进攻来防守自己的北部疆界。铁路网的分布说明，这个问题正应当这样来理解。如果进攻

① 根据圣经传说，有人企图在巴比伦修建一座高可接天的塔，在开工后，天神发怒，“弄混了建筑者的语言”，使他们不能互相了解，以致停工。建筑巴比伦塔一语的转意是：混乱、愚蠢、瞎忙。——译者注

被打退，法軍可以堅守在瓦瑟河和安訥河之間；敵人繼續前進就會失去任何意義，因為對於攻打巴黎來說，由比利時攻入的軍隊本身將過於薄弱。法國的北方軍團可配置在安訥河後，保證與巴黎的交通綫，靜待其他軍團的到來，在最壞的場合，也可在馬爾納河後，左翼以巴黎為依托，占領側方陣地進行積極防禦。敵人除了向梯里堡前進以攻擊法國在摩塞爾河及萊茵河的軍團的交通綫以外，別無他法。但是這些行動遠不像巴黎未設防時那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甚至在最壞的場合，法軍其他軍團向盧瓦爾河後的退路也不會被截斷；集中在盧瓦爾河地區後，法軍仍然會有相當強大的力量，可以威脅已被削弱並因圍攻巴黎而兵力分散的敵軍，或者可以突入巴黎。一句話，由於巴黎的設防，經過比利時的迂迴已不再是危險的了；這一迂迴的影響也不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迂迴而產生的不利因素以及抵抗這一迂迴所需的手段，現在就容易計算了。

仿照法國人的例子，我們就會做得很好。如果我們不使自己為必須占領德國以外的領土（這些領土對於德國來說已日益不鞏固）的呼聲所蒙蔽，而事先準備應付我們必須放棄意大利的這一不可避免的情況，我們會做得好得多。我們在這種場合所必需的要塞構築得愈早愈好。至於在什麼地方以及如何配置這些要塞，我們在前面已大略談過，要更詳細地談就不是我們的事了。不要只耽於幻想和構築築壘封鎖點，不應只依靠這些封鎖點而輕視唯一能使退却的軍隊停駐的那種類型的工事，即營壘和河岸上的要塞群。

四

我們現在已經明白，“中欧大国”鼓吹者所提出的“自然疆界”論將導致什麼結果。德国有權利要求波河，法國也有同樣的權利要求萊茵河。如果說法國不應當為了一個好的軍事障地而把900萬瓦倫人、尼德蘭人和德國人併入法國，那末我們同樣也沒有任何權利為了一個軍事障地而去奴役600萬意大利人。波河這一自然疆界歸根到底不過僅僅是一個軍事障地，可是有人對我們說，只是為了這個緣故德國就必須保持它。

“自然疆界”論也可以用一個口號來徹底解決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問題：Danmark til Eideren! 丹麥到埃德爾河！¹³⁶ 丹麥人不要他們的明喬河和波河，即埃德爾河，以及他們的曼都亞，即弗利得利赫什達特，又要求什麼呢？

“自然疆界”論使德國有權要求波河，同樣也使俄國有權要求加里西亞和布柯維納，並且在波羅的海方面整化領土，至少把普魯士的維斯拉河右岸地區全部囊括進去。再過幾年，俄國又可以同樣有權利提出要求說：俄屬波蘭的自然疆界是奧得河。

“自然疆界”論如用於葡萄牙，這個國家也可以要求把領土擴大到比利牛斯山並把整個西班牙劃入葡萄牙。

如果考慮到永恒正義的法則，羅伊斯-格萊茨-施萊茨-羅賓斯坦公國¹³⁷的自然疆界至少應當擴展到德意志聯邦的疆界或者甚至更遠些——到波河，也可能到維斯拉河。要知道羅伊斯-格萊

茨-施莱茨-罗宾斯坦公国和奥地利一样，同样都有实现自己权利的要求！

如果“自然疆界”論，也就是純粹以軍事观点为根据的疆界論是正确的，那末对于那些出席維也納會議的德国外交家，我們應該怎样来称呼呢？他們使我們面临德国人打德国人的战争的威胁，使我們失去麦士河，使德国东部疆界門戶洞开，让外国人确定德国的外部疆界和从内部分割它。老实說，哪个国家也不像德国这样，有那么多的理由来抱怨維也納會議；但是，如果我們从自然疆界的观点来看問題，那末当时那些德国的国家偉人的名誉将如何呢？何况拥护波河自然疆界論，靠 1815 年外交家的遺產过活并继承維也納會議的傳統的也正是这些人。

你們願不願意听这种事情的一个实例呢？

1830 年比利时从荷兰分立出来的时候¹³⁸，也是現在把明乔河作为生死問題提出来的这些人在大喊大叫。他們为毗邻的尼德兰强国的分裂而大声疾呼，因为这个强国应当作为对付法国的屏障，而且应当負有义务以薄薄的要塞带来与当时确实是极为龐大的工事的沃邦式要塞带相抗衡（甚至在有了 20 年的經驗以后，偏見还是这样深）。各大国似乎很担心，有朝一日，棱堡、半眼鏡堡和眼鏡堡櫛比皆是的阿拉斯、利尔、杜埃和瓦郎西恩会突然出現在比利时并安然屹立在那里！我們在本文中与之力爭的这一狹隘思想的代表者們那时痛哭抱怨，說什么德国处于危急中，因为比利时只是唯法国之命是从的附庸，必然要成为德国的敌人；說什么用德国的（也就是从法国人手中夺来的）金錢建筑起来对付法国的寶貴的要塞現在可能被法国人用来反对我們。他們說，法国的疆界已經推进到麦士河和些耳德河以至更远的地方，再向前推进到萊茵河，还

需要很久嗎！我們大多數人都還清楚地記得這些號泣。但是實際情況怎樣呢？從 1848 年以來，特別是從波拿巴復辟以來，比利時愈來愈堅決地脫離法國而接近德國。現在甚至可以把比利時看作是德意志聯邦的一個外國成員國。比利時人採取這種反對法國的立場時做了些什麼呢？他們把根據維也納會議的決定從上面強迫他們國家建立的所有要塞作為**完全無法對付法國**的廢物全部鏟平了，然後在安特衛普周圍建成了一座營壘。這個營壘的規模相當大，足以容納整個軍團並在法國侵入時可以使它在那裡等待英國或德國的援助。他們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

正是 1830 年曾經想把主要操法語的信天主教的比利時與操荷蘭語的信新教的荷蘭硬縛在一起的那個英明政策，從 1848 年以來又想用暴力把意大利置於奧地利壓迫之下並使我們德國人對奧地利在意大利的行為負責。所有這一切都完全是由於害怕法國而產生的。這些先生的全部愛國主義看來就在於，一談到法國就狂熱地激動起來。好像五六十年以前老拿破侖所賜予他們的打擊，至今痛猶在身。當然我們不屬於把法國軍事力量估計過低的這類人。比如說，我們清楚地知道，德國沒有一支軍隊在輕步兵、小規模戰爭的經驗和技術方面以及在炮兵學的某些方面能與法國軍隊相比。但是，當我們看到這些人起初夸耀他們擁有 120 萬名德國兵，似乎這些兵士已經作好戰鬥準備，如同科尔布博士為了亞爾薩斯和洛林與法國下一盤棋而擺好的棋子一樣¹³⁹，可是後來在每一個別場合下，同樣是這些人卻又表現得非常畏縮，似乎這 120 萬兵士不躲在不可摧毀的障地內，就一定會被人數少一半的法軍打得落花流水，這種情況確實使人再也無法忍耐。為了反對這一消極防禦政策，我們認為提醒下列事實是適時的，就是即使德國總的說

来注定要利用反击来进行防御，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提醒下列事实也是适时的，就是我們已經很多次地证明，正是在进攻方面我們优于法国及其他国家。

“进攻毕竟是我們军队所特有的精神，这正是非常好的，”——弗里德里希大帝曾这样讲过他的步兵。¹⁴⁰

至于他的騎兵如何善于进攻，有罗斯巴赫、措尔恩多夫和霍恩弗里德貝尔格等会战¹⁴¹可以作证。而1813年和1814年德国步兵如何善于进攻，最好的证明是1815年战争之初所頒发的布呂歇尔的有名訓示：

“因为經驗教导我們，法国军队抵擋不住我們成营兵士的刺刀冲鋒，所以要想打败敌人或攻占某一陣地，照例都应当采用刺刀冲鋒。”

我們最成功的会战是进攻的会战；如果說德国兵士还有不及法国兵士的地方，那就是德国兵士还不善于为了防御的目的而坚守村庄和房屋；至于在进攻中，他們证明自己完全不亚于法軍，并且多次地证明了这点。

不管产生这个政策的动机是什么，我們可以看到，这一政策起初在保卫可疑的或者夸大到荒謬程度的德国利益的借口下使我們受到一切較小邻国的憎恨，然后又对它們倾向于法国表示憤慨。波拿巴复辟整整五年才使比利时脫离了与法国的联盟，而比利时是被1815年开始的、1830年繼續执行的神圣同盟¹⁴²的政策驅入这一联盟的；在意大利，我們为法国人造成了一种和明乔河意义相同的形势。但是，法国对意大利的政策一直是狹隘的、自私的、剝削的，所以，只要我們稍有誠意，意大利人无疑地就会倒向我們，而不是倒向法国。大家都很清楚，拿破侖及其地方官員和將軍們在1796年到1814年期間如何从意大利勒索金錢、粮食、艺术珍品和

兵員。1814年，奧軍以“解放者”的身分來到意大利並且也被作為解放者接待了。（至於他們如何解放意大利，關於這點每一個意大利人對 Tedeschi [德國人] 所抱的仇恨態度可作為最好的說明。）法國在意大利的政策的做法就是如此；至於這一政策的理論，我們只能說，它所遵循的唯一原則是：法國永遠不會容許一個統一的、獨立的意大利存在。一直到路易-拿破侖，這一原則始終沒有動搖，而且為了避免一切的誤會，拉·格隆尼埃爾還不得不再一次宣布它是永恆的真理¹⁴³。難道在法國實行這種狹隘而庸俗的政策，實行這種毫無顧忌地要求干涉意大利內政的政策的情況下，我們德國人還怕已經不再直接受德國統治的意大利會永遠作為法國的溫順僕從來反對我們嗎？這種擔心是十分可笑的。這仍然是1830年對比利時問題所發出的那種驚叫。但是，儘管如此，比利時還是走到我們這邊來了，不邀而來地走到我們這面來了；意大利一定也會同樣地向我們靠攏。

但是，必須牢牢記住，占領倫巴第的問題是意大利與德國的相互關係問題，決不是路易-拿破侖與奧地利的相互關係問題。對於像路易-拿破侖這樣只為了自己的、在某些方面是反德國的利益才願參與其間的第三者來說，問題只在於簡單地握有一個省份，只是在萬不得已時才放棄它，問題只在於簡單地扼守一個軍事障地，只是在不能再守時才放棄它。在這種場合，政治問題就立即讓位於軍事問題；有人襲擊我們——我們自衛。

如果路易-拿破侖願意扮演捍衛意大利獨立的武士的角色，那他用不着與奧地利作戰。◀Charité bien ordonnée commence chez soi-même▶. [“好事先自為之。”] 科西嘉“省”雖然是波拿巴主義的誕生地，却原是意大利的島嶼。讓路易-拿破侖首先把科西嘉島讓

給他的姻伯維克多-艾曼努尔，那时也許我們还可以听听他的談論。在他沒有这样作以前，他最好还是不要談他热烈地忠实于意大利的利益吧！

在整个欧洲，沒有一个大国境內不包括有一部分其他民族。法国有佛来米族的、德意志族的、意大利族的地区。英国是唯一真正具有自然疆界的国家，可是它走出这个疆界向四面八方擴張，在各国进行征服；在以真正的奥地利式的手段鎮压了規模宏大的印度起义后，現在它又和自己的保护地之一——伊奥尼亚群島进行斗争¹⁴⁴。德国有半斯拉夫族的地区，有居住着斯拉夫族、馬扎尔族、瓦拉几亚族和意大利族的附屬地。而彼得堡白帝又統治着多少种操其他語言的民族啊！

誰都不能肯定說，欧洲的地图已最后确定。但是一切改变，如果希望能长期保持，就应当从下列原則出发，这就是应当愈来愈多地使那些大的、有生命力的欧洲民族具有由語言和共同感情来确定的、真正自然的疆界；同时在某些地方还保留着的、但是沒有能力再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的那些殘余的民族，仍然应当留在比較大的民族里面，或者溶化到他們中間，或者沒有任何政治意义地作为人种学的紀念品¹⁴⁵。軍事观点在这里只能具有次要的意义。

但是，如果欧洲的地图要重新繪制的话，我們德国人有权要求做得公平合理，不能再像以往所常发生的那样只让德国做出牺牲，而所有其他国家則在这样的重新分配中光占便宜，不牺牲任何东西。我們可以放棄給我們国境加添的許多东西，可以放棄使我們牽涉在最好不直接干預的事件中的許多东西。但是所有別的国家也应当这样；让他們給我們树立大公无私的榜样，不然就让他们閉上嘴。从整个这一研究中所得的最后結論是，我們德国人如果以

波河、明乔河、艾契河以及所有意大利的廢物換得德国的統一，那就是作了一桩漂亮的生意，因为統一会使我們不蹈华沙和布隆采耳的复轍，只有統一才能使我們在國內和国外强大起来。一当我們取得了这个統一，我們就可以不再防御了。那时我們就不再需要什么明乔河了，那时“我們特有的精神”又将重新是“进攻”了；要知道現在还有一些腐朽的地方非常需要这种“进攻”精神。

卡·馬克思 和平还是战争?¹⁴⁶

我們在另一版上轉載一篇不久前发表在“通报”上的文章，这篇文章带預言性地否认它的主子和鼓舞者路易-拿破侖有任何想使欧洲卷入战争的意图¹⁴⁷。看来，这篇文章提高了交易所的证券牌价，并把旧大陆的担心消除了一半。但是，只要仔细地讀一讀，仍旧会从这篇文章中看出，它所唤起的那些希望是沒有多大根据的。在这篇宣言中，除了仅仅肯定說皇帝对撒丁国王的义务只限于保证保护撒丁免受奥地利的侵略（这个保证維克多-艾曼努尔无疑是不需要了，至少在他的军队已派遣去支援塞瓦斯托波尔城下的法、英军队之后）以外，我們看到的只是对輿論的新的嘲笑。这篇文章实际上建議全世界为了法国僭位者的利益而忘掉：不是报纸而正是他本人在新年那天通过奥地利大使^①对奥地利进行的毫无根据的和盛气凌人的威胁惊动和扰乱了欧洲；正是他的报刊，他那批专写抨击性小册子的作者，他的堂弟^②，他积蓄武器和购置軍火的行动散布了对战争的惊慌情緒，这是他自己蓄意說出来的話的結果。在这篇文章中沒有一行字，沒有一句話包含有哪怕是一点暗示他打算放棄他的野心和在意大利以及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

① 許布納尔。——編者注

② 波拿巴，拿破侖·約瑟夫·沙尔·保尔。——編者注

亞两公国¹⁴⁸的陰謀的迹象。他可能是決定向歐洲輿論让步(意大利除外,但法國并不除外);但也可能是他決定使用愛好和平和溫和的語言,以便掩飾交易所的駭人聽聞的投機,并用欺騙的手腕使那些他打算加以攻擊的人產生一種不幸的安全感。在他的整個新宣言中,從頭到尾絲毫也看不出,這種與其說是立場本身的改變不如說是語調的改變,是由于奧地利傲慢態度的緩和,外交氣候的轉晴所決定并從中得到解釋的。一個正在準備進行殲滅性打擊的人看來是不可能表現出這種愛好和平的情緒的;不要忘記,這個路易-拿破侖也就是那個在用叛賣手段扼殺法蘭西共和國的前夕還向一位共和主義者埋怨那些認為他是會干出類似卑鄙勾當的人的路易-拿破侖。因此,我們認為拿破侖的這個宣言是個“什麼也沒有總結的結論”。這只是一團白色的東西,它可能是普通的面粉,也可能是在面粉里面打過滾的一只公貓,但究竟是什麼——這只有將來才能見分曉。

倫敦“泰晤士報”的評論中勸告人們對宣言持審慎態度的那一部分比公開贊同宣言的那一部分有更大的意義。路易-拿破侖永遠再也不能成為交易所和資產階級的半神人了。今後他只能靠劍來進行統治了。

卡·馬克思寫于 1859 年 3 月 8 日
左右

作為社論載于 1859 年 3 月 25 日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5593 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卡·馬克思 土伊勒里宮的嘆息

拿破侖皇帝的處境大概確實非常悲慘，因為他不僅寫了一封淒愴的信，而且還把這封信寄給了弗·赫德爵士。後者在小政治家家中遠不是最樂觀愉快的人。赫德爵士把這封信在倫敦“泰晤士報”上發表了¹⁴⁹，這家報紙在不列顛的報紙中也遠不是最樂觀的報紙，因而使整個事件具有一種高盧人的快樂的國家中從未見過的特別莊嚴的氣氛，甚至在這裡，在多霧的英國，這聽起來也像是送葬的鐘聲一樣。皇帝在信的開頭親切地稱這個肥皂泡從男爵¹⁵⁰為“我親愛的弗蘭西斯爵士”，在信的結尾同樣寫着：“我親愛的弗蘭西斯爵士”。看來弗蘭西斯爵士在此以前給倫敦“泰晤士報”寫過一些維護皇帝的信。用不着懷疑，這些信是寫得很出色的，就像通常報紙的記者自動寫的通訊報道那樣。但是，不知為什麼我們總想不起會讀過或者至少是瀏覽過這些信。我們相信，這些信件在帝國議會中幾乎沒有或者根本沒有討論過。拿破侖陛下從作者那裡收到了這些作品，由於偉人們通常總是要對送給他們的蕩刀布或大塊干酪表示感激，因此拿破侖陛下也帶着憂郁的神情感謝弗·赫德爵士所寫的文章。皇帝很高興地相信，在英國還有人未忘記他，他感動地回憶起在英國的那些日子，那時候這個國家的小店主曾經給與他任何一個流浪親王¹⁵¹都不曾享受過的貸款。

他說：“現在我清楚地看到，權力會帶來多少麻煩，在我看來最不愉快的，正是那些你所最器重並願意同他和睦相處的人不了解你，不正確地指責你。”

此外，他還公然宣稱，自由就是欺騙。

他說：“我深感惋惜，自由像一切美好的東西一樣，有自己的極限！為什麼它不傳播真理而要盡力掩蓋真理？為什麼它不鼓勵和發展高尚的情操而要播種不信任和仇恨呢？”

於是這位聖體被自由束縛住的皇帝非常感謝親愛的弗蘭西斯爵士，因為他毫不动摇地、真摯地、無私地和堅決地起來反對類似的謬誤。

我們絲毫也不了解拿破侖第三陛下目前的悲哀的政治細節，所以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他希望他今後的心情將經常歡樂而愉快。難道家庭的生活道路（他是這個家庭的一個冒充的成員）曾是那樣可喜可樂和光輝燦爛，以致當他竊據了法國的王位，當他以自己的生命、自由和他能借到的錢作賭注冒險進行了一些小小的侵襲¹⁵²以後，他就可以追求奢侈逸樂的玫瑰花冠，追求支配人的權力，追求個人享受，追求約翰牛的祝福和追求對歐洲的控制（為了達到這一點需要有招搖撞騙的本領）了嗎？難道他從未聽見過“聖威廉”的意見：

“戴王冠的頭是不能安於枕席的！”^①

難道他不是認為在所有的人當中偏偏是他命中註定要為了全民族的幸福而在土伊勒里宮中受偏頭疼的折磨嗎？為什麼他要投入弗·赫德爵士的寬廣的懷抱並因為他熱心追求的皇冠把他的頭壓得太緊而啼哭呢？如果他认为需要給“泰晤士報”寫信，為什麼

① 莎士比亞“亨利四世”後篇第三幕第一場。——編者注

他自己不去写，而要由一个沒落的从男爵越俎代庖呢？要知道他曾一再粗暴地蔑視过礼节，难道他現在就不能那样做了嗎？

可卑的欺騙伎俩（如果对于达官貴人們可以使用这种不恭敬的詞句的話）是伯父擅長的手法，侄儿显然相当成功地仿效了他。王朝的締造者喜欢痛哭流涕地、多愁善感地和漫无边际地侈談自己的痛苦、煩惱、忧患和遭到的危險，特别是“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对他的恶劣态度。但是我們以为，他一次也未能做到使他写給英国人的信在倫敦“泰晤士报”上发表。拿破侖第一做到了使英国人尽情地嘲笑他，使法国人极其真誠地惋惜他，然而有时他也能使他的嘿嘿窃笑的邻居哭泣。但是，如果拿破侖第一所关心的只是給他的同时代的弗兰西斯·赫德爵士們写信，而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好事，那末，恐怕早在他被送往圣海倫島上靜穆的修道院以前，人們就把他从土伊勒里宮中的使他受折磨的职务中解放出来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59 年 3 月 8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作为社論載于 1859 年 3 月 26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594 号

卡·馬克思

法国的战争前景

1859年3月9日于巴黎

当战争将临的惊慌气氛笼罩着欧洲的一切交易所的时候，我曾写道，波拿巴远远没有最终下定决心打仗，但是，不管他的真实意图如何，看来他将要失去对事件的控制力^①。然而现在，当欧洲的大部分报纸似乎倾向于相信和平的时候，我相信，如果不是某种情况的巧合导致突然推翻僭位者和他的王朝的话，战争将会爆发。甚至是最肤浅的观察家都会承认，和平的前景仅局限于谈判的范围，而相反地，战争的前景却有物质因素作依据。无论法国或奥地利都在以空前的规模进行备战。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这两个帝国的金库的绝望状况的话，用不着详细论证，我们就可以作出结论说，战争正在策划，而且在不远的将来就会爆发。我敢说，奥地利正遭到厄运的追逼，厄运的线索大概一直延伸到圣彼得堡。每当它的财政眼看就要巩固的时候，厄运就不可避免地把它抛到后面去，抛向财政灾难的深渊，就像每当息息法斯快要到达山顶的时候，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把这个命定受折磨的人费尽千辛万苦推上山去的倒霉的石头推下山来一样。例如，在经过多年不断的努力之后，奥地

^① 見本卷第189—194頁。——編者注

利在 1845 年才接近于收支平衡的状况；但是突然爆发了克拉科夫革命¹⁵³，迫使它增加非常开支，以致造成了 1848 年的災变¹⁵⁴。另一次，在 1858 年，它向全世界宣布維也納銀行恢复現金結算，但是突然从巴黎送来的新年賀詞¹⁵⁵ 又猛然粉碎了奥地利实行节约的一切希望，使它遭到这样大的损失和消耗这样多的物资，甚至使最冷靜的奥地利政府要員也不得不把战争看做是获得拯救的最后手段。

在所有能够吹嘘不仅具有地方意义的报纸中，“論壇报”大概要算是唯一的一家从来没有堕落到为了追求时髦（我还不說是贊美路易·波拿巴的性格，因为这样就太糟糕了）而說路易·波拿巴英明和毅力超群的报纸。“論壇报”分析了他在政治、軍事和財政方面的功績，依我看来，这家报纸无可辯駁地证明了，他所获得的在民众眼里是如此惊人的成功，是由于各种机会的巧合造成的，这些机会不是他創造的，而且在利用这些机会方面，他从来不比一个普通賭棍更为高明；一个普通賭棍就有本領作各种可能的妥协，敢于采取突然的手段和 *coups de main* [勇敢的打击，坚决的行动]，然而始終只是做机会的恭順的奴隶，并竭力把自己的罪惡心腸隱藏到铁的假面具后面去。这也正是欧洲列强一开始就心照不宣地决定对 *grand saltimbanque* [偉大的丑角]（这是俄国外交家給他起的綽号）所持的观点。列强知道他是一个危險人物，因为他把自己置于一个危險的地位，所以它們同意让他把自己装扮成拿破侖的继承者，但是心照不宣地約定一个条件，那就是他始終只应满足于表面上的煥赫声势，任何时候都不能越过那条把演員和他所扮演的角色分隔开来的界綫。这个把戏一度耍得很成功。但是，外交家們按照他們的慣例，在打自己的如意算盘时总是忽略一个重要

因素——人民。当奥尔西尼的炸弹爆炸的时候，薩托里的英雄⁷⁰摆出一副对英国发号施令的姿态，而不列颠政府也表示完全同意让他采取类似举动；但是人民的强烈要求对議院施加的压力是这样大，以致不仅帕麦斯顿被免职¹⁵⁶，而且实行反波拿巴的政策变成了要主宰唐宁街¹⁵⁷就不得不接受的条件。波拿巴让步了，从这个时候起，他的对外政策遭到了一連串的挫折、屈辱和失败。这只要指出他的迁移自由黑人的计划和對葡萄牙的冒险举动¹⁵⁸就够了。其实，如果说奥尔西尼的謀刺导致了法国专制制度的恢复，那末由于欺詐行为而从急性寒热病变成慢性病的商业危机使这个暴发户的宝座失去了它所依靠的唯一现实基础——物质繁荣。军队中出现了不滿的迹象；证明资产阶级开始反抗的信号已经发出了；奥尔西尼的同胞进行人身报复的威胁使得这位僭位者夜不安寐。这时僭位者突然想为自己造成一种新的局面，他 *mutatis mutandis* [作相应的变化后]，重复了拿破侖在呂內維爾和約¹⁵⁹后向英国大使发出的大声呵斥，并用意大利的名义向奥地利挑战。这个謹小慎微的人物，妥协的元帅，夜間突襲的英雄，并非出于本意，而是为大勢所迫，鋌而走險。

毫无疑义，他的虛情假意的朋友們推着他走了这一步。帕麦斯顿在貢比臬阿諛逢迎地向他保证說，英国自由党人同情他，但在議會开幕的时候却慷慨激昂地反对他。¹⁶⁰ 曾用秘密的照会和在上公开发表文章来唆使他的俄国，显然已在同自己的奥地利邻邦进行外交 *pourparlers* [談判]。但是大勢已定，挑战已经发出，因此欧洲不得不重新考察一下这个终于活到意大利远征（他的伯父就是靠这个远征起家的）的走运的賭徒的过去、現在和将来。在12月的日子里⁴⁹，他在法国恢复了拿破侖主义，現在他显然决定用

意大利远征在全欧洲恢复拿破侖主义。他所关心的不是意大利战争，而是不經任何战争使奥地利受到屈辱。他企图依靠对革命的恐惧来夺取他的同名者用火炮赢得的胜利。非常明显，他并不打算打仗，而只是希望 *succès d'estime* [仅仅依靠声望获得成功]。否则，他会从外交談判开始，以战争告終，而不是相反。在談到战争之前，他会先准备战争，总之，他不会把車放在馬的前头。

但是，他对同他发生爭吵的强国的估計大錯而特錯了。英国、俄国和合众国可以作很多似是而非的让步而絲毫也不丧失它們的实际势力；但是奥地利——特别是当問題牵涉到意大利的时候，如果不是帝国本身遭到危險的話，是不可能改变它的道路的。因此波拿巴从奥地利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准备战争，这使得波拿巴也不得不采取同样的行动。装模作样的爭吵逐漸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冲突，这完全違反他的意志和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此外，一切都事与願違。在法国他碰到了消极的然而却是頑强的抵抗，而同他休戚相关的朋友們竭力希望阻止他采取丧失理性的举动，使人毫不怀疑，他們是不相信他具有拿破侖的天才的。在英国，自由党背棄了他，并譴責他企图把自由看做是法国的出口項目。在德国，对他的一致的蔑視向他表明，不管 1848 年因循守旧的法国农民的观念怎么样，在萊茵河彼岸却坚信他只是个假的拿破侖，德国統治者們給予他的尊敬只不过是一般的客套，总之，他是“礼貌上尊称的”拿破侖，就像英国公爵的幼子們是“礼貌上尊称的勛爵”¹⁶¹ 一样。

难道你們真的以为，在 1859 年 1 月使这个人 and 奥地利的关系复杂化的那些困难将会用可笑的和可耻的 *reculade* [退却] 来克服，或者薩托里的英雄本人认为他用他曾經遭到过的最大的和最明显的失敗改善了他的絕望处境嗎？他知道，法国的軍官們即使

照顾面子也不会掩饰他们对他在“通报”上侈谈目前战争准备情况的可笑谎言的极端愤怒的；他知道，巴黎的小店主已经开始把1840年路易-菲力浦向欧洲同盟的让步¹⁶²，和1859年路易·波拿巴的 *grande retraite* [大退却] 进行比较；他知道，资产阶级已经满怀着明显的、尽管是压抑着的憎恨，因为他们必须服从一个本来是懦夫的冒险家；他知道，在德国对他的普遍鄙视是毫不掩饰的，只要他朝着同一方向再走几步，就会使他成为全世界讥讽嘲笑的对象。维克多·雨果说过：«N'est pas monstre qui veut»（“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怪物”）^①，但是这位荷兰冒险家所需要的不单是加西莫多的名声，他要使人把他看做是令人感到恐怖的加西莫多。他目前指望当真开始进行战争（而他知道，他应当开始它）的时机是这样的：奥地利在即将举行的外交谈判中不作任何微小的让步，这就会给他一个相当冠冕堂皇的借口来诉诸武力；由于普鲁士在对奥地利2月22日照会的复照¹⁶³中表示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两个德意志强国之间的敌意可能会加深。英国的对外政策在得比内阁垮台之后将转入帕麦斯顿勋爵之手。俄国将对奥地利进行报复，但它自己却不一兵一卒，也不花一个卢布，它主要将在欧洲制造纠缠，以便利用自己在多瑙河两公国，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给土耳其政府所设下的罗网坐收渔人之利。最后，当外交的浓烟笼罩着巴黎会议的时候，在意大利将燃起熊熊烈火，欧洲人民将把他们拒绝给予自封的意大利保卫者的东西给与起义的意大利。这些就是路易·波拿巴希望能够再一次使他的幸福的大船驶向辽阔海洋的时机。至于他现在不得不忍受多大的恐怖的煎熬，这一点即使从

① 雨果“小拿破仑”。——编者注

下面这个事实中也可以看出：在不久前召开的內閣會議上他突然劇烈地嘔吐了。对意大利人复仇的恐惧也是执拗地推动他进行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意大利 Vehme¹⁶⁴ 的法官們正在暗中窺伺他，这一点三个星期以前他重新查明屬實了。在土伊勒里宮的花园中抓到了一个行迹可疑的人，对他进行了搜查，发现他身上有一枝手枪和两三个带有起爆管的手榴彈，这种手榴彈同从奥尔西尼身上搜出的相似。当然，把他逮捕起来并关进監獄里去了。他說出了自己的意大利姓名，讲话的时候也带有意大利口音。他說，他可以向警察提供許多情报，因为他和秘密团体有联系。但是在两三天內他一語不发，后来他請求給他的禁閉室再增添一个人，并声明說，如果繼續对他实行单独監禁的話，他什么也不能讲，而且也不願意讲。于是找了一个档案管理員或者图书馆管理員之类的獄吏給他做伴。这时，意大利人揭露了或者装出一副正在揭露很多秘密的样子。但是过了几天，負責审讯的人回来了，向他說道，根据調查，他所招认的一切都不符合事实，他应当說实話。意大利人答应在第二天这样做。这天晚上沒有人打扰他。但是他在早上4点钟左右就起来了，用同室人的剃刀割断了自己的咽喉。据召来的医生的檢驗，剝伤很重，大概立即死去。

卡·馬克思写于1859年3月11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載于1859年3月31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5598号

卡·馬克思

普魯士的战争前景

1859年3月15日于柏林

战争在这里已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法国和奥地利之间行将发生的这场斗争中，普鲁士应当起什么作用，还是一个引起普遍争论的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舆论，显然都没有确定的意见。有一件事实应当使你们感到惊异，这就是，送到柏林的唯一的一批好战的请愿书，不是来自普鲁士，而是来自莱茵省省会科伦。但是用不着对这些请愿书给予多大的重视，因为这显然是天主教党干的事。无论在德国或在法国和比利时，天主教党都是亲奥地利的。在一个问题上可以说整个德国是完全一致的：谁也不表示支持路易-拿破仑，谁也不对这位“解放者”表示丝毫同情，相反地，憎恨和蔑视他的真正洪流日甚一日地在汹涌。天主教党认为他是反对教皇的叛乱者，自然也就诅咒那把褻瀆神明的宝剑，这把宝剑眼看着就要指向一个以其与罗马教廷所签订的宗教条约使相当大一部分欧洲重新隶属于教皇宝座的大国¹⁶⁵。封建政党虽然也装出一副憎恨法国僭位者的样子，实际上它所憎恨的是法兰西民族，它期望通过反对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圣战，把从伏尔泰和让·雅克·卢梭的国家输入的新东西消除净尽。一度把路易·波拿巴誉为伟大的“秩序、财产、宗教和家庭的救主”的工商业资产

階級，現在也不遺余力地揭露喪心病狂的和平破壞者。這個破壞者不甘心於鎮壓法蘭西的充沛盈溢的力量以及在拉姆別薩和凱恩¹⁶⁶用有益的勞動來馴服那些不屈不撓的社會主義者，他硬要想出荒唐的主意來降低有價證券的牌價，破壞經濟生活的平穩進程，重新喚起革命的熱情。廣大人民群眾在多年被迫保持沉默之後，現在有可能對他們認為是造成 1848—1849 年革命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的那個人任意表示自己的憎恨了，他們對此至少是感到非常滿意的。關於拿破侖戰爭的回忆引起了人們的憤怒，他們隱約地懷疑反對奧地利的戰爭就是反對德國的一個隱蔽步驟，這就足以使那些出於各種動機的抨擊波拿巴的演說帶有某種全民族感情的假象。“通報”上的彌天大謊，皇帝的御用文人所編造的無聊的小冊子，以及被迫扮演獅子的狐狸所表現出來的動搖、驚惶失措以至恐懼的明顯跡象，——這一切再也不能令人容忍了，它們把普遍的憎恨變成了普遍的蔑視。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結論說，由於整個德國的情緒都是反對波拿巴的，因而統一的德國會站在奧地利一邊，那就大錯特錯了。第一，我沒有必要提醒你們關於奧地利政府和普魯士政府之間的根深蒂固的和不可避免的矛盾，因為關於華沙會議，關於不流血的布隆采耳會戰，關於奧地利在漢堡和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武裝游歷或者甚至關於俄土戰爭¹⁶⁷的回忆未必能使這個矛盾緩和。你們知道，普魯士政府最近幾個聲明保持着何等審慎的態度。這些聲明說，作為一個歐洲大國，普魯士在事實上並不認為它有什麼理由必須表明擁護哪一方。作為德國的一個大邦它保留研究奧地利在意大利的要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符合德國的利益這一問題的权利。普魯士的態度還遠不局限于此。它聲明說，奧地利同帕

尔馬、摩地那、托斯卡納和那不勒斯单独簽訂的条約以及提上議事日程的关于廢除这些条約的問題，应当从整个欧洲的角度来考虑，它們絕不是仅仅涉及德意志联邦的問題。普魯士在多瑙河問題上公开反对奥地利。它从法兰克福的联邦議會中召回了自己的全权代表^①，因为他显然是奥地利利益的过分坚决的拥护者。¹⁶⁸ 最后，为了不致让人怀疑它有不爱国的举动，它仿效德意志各小邦的例子，禁止輸出馬匹；但是，为了把這項禁令的反法矛头移开，它就把這項禁令扩大到整个关税同盟¹⁶⁹，这样一来，这个矛头就既指向奥地利也指向法国。普魯士仍然是曾經在巴塞尔簽訂了单独条約¹⁷⁰，而在1805年曾派豪格維茨給拿破侖軍营送去两封信的那个大国；这两封信中有一封应当在奥斯特利茨会战遭到失敗的时候轉交給皇帝，另一封的内容是对这位外国侵略者的奴顏婢膝的祝賀。不管霍亨索倫王朝一貫坚持的傳統的家族政策如何，普魯士仍然害怕俄国。它知道这个国家在暗中同波拿巴保持着良好关系，甚至还促使波拿巴在新年那天发表那个不祥的声明。我們看到，像“新普魯士报”¹⁷¹这样的机关报都在保护皮蒙特国王而反对弗兰茨-約瑟夫，因而用不着多大的洞察力就可以断定，現在刮的是什麼風。为了消除任何怀疑，馮·曼托伊費尔先生出版了一本匿名小册子，鼓吹俄法同盟以反对奥英同盟¹⁷²。

但是，問題的真正实质与其說在于政府的意图，不如說在于人民的同情。我应当向你們指出，除了天主教党、封建政党以及1813—1815年間的愚蠢的条頓空談家的某些殘余分子而外，全德国人民，特別是德国北部的居民都感到，德国正处在左右为难的境

① 俾斯麦。——編者注

地。德国人民要坚决站在意大利方面来反对奥地利，同时又不能不站在奥地利方面来反对波拿巴。当然，如果我们从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的话来判断，我们就会一致相信，奥地利是每个德国人心中的偶像。我愿简单地叙述一下这家报纸所提出的理论。除了德意志民族而外，欧洲的所有民族都在分化。法国正在分崩离析；意大利应当因自己变成德国的兵营而感到特别幸福；各斯拉夫民族缺乏自己管理自己所必需的道德品质；英国因贸易而腐化了。因此，只有一个德国还是巩固的，而奥地利则是德国在欧洲的代表。它一方面使意大利，另一方面使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受到德国的 Sittlichkeit^①（这个字无法翻译）的崇高的影响。奥地利控制了加里西亚、匈牙利、达尔马威亚沿岸和莫拉维亚并企图占领多瑙河两公国借以保卫祖国不受俄国的侵略，同时它也紧紧控制意大利以保卫德国这个人类文明的心脏不受法国的道德堕落、轻浮和爱虚荣的有害影响。不过，我没有必要对你们说，在奥地利境外，这个理论从来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承认，只是一些巴伐利亚的 Krautjunker〔落后的容克地主〕除外，他们妄想充当德国文明的代表，其理由就和古代贝奥提亚人¹⁷³妄想充当古希腊智慧的代表时所持的理由差不多。但是，在这一伙人中间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另一种比较平庸的观点。他们硬说，需要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奥地利在波河、明乔河和阿迪杰河上的障地是德国反抗法国侵略的自然军事疆界。1848年拉多维茨将军在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中提出的这个理论占了上风，它使得议会站到奥地利方面来反对意大利；但是对于这个竟然把执行权授与奥地利大公¹⁷⁴的所谓的革命的议

① 近似的意思是：德行、伦常。——编者注

会早已作出了判决。德国人开始懂得，quid pro quo〔混淆是非〕的作法使他們墜入迷雾，开始懂得保卫奥地利所必需的軍事障地，对于保卫德国完全是不需要的，法国人也有同样的权利，甚至有更多的权利把萊茵河看做是自己的自然軍事疆界，就像德国人对波河、明乔河和阿迪杰河所持的看法一样。

卡·馬克思写于 1859 年 3 月 15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9 年 3 月 31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598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卡·馬克思 历史上的类似现象

当路易-拿破侖决意要超过不太走运的威尼斯总督馬林諾·法利埃罗，借助于違誓和叛变，夤夜阴谋和在床上逮捕那些不能收买的議會議員，并依靠开到巴黎街头的巨大的軍事力量爬上了皇帝宝座的时候，欧洲的統治君主和貴族、大地主、工业家、食利者和交易所的經紀人几乎毫无例外地为他的胜利欢呼，就好像这是他們自己的胜利一样。他們洋洋得意地嘿嘿窃笑，并異口同声地說：“罪行由他負責，而果实却归我們。路易-拿破侖在土伊勒里宮中称孤道寡，我們却可以在自己的領地、工厂、交易所和我們的事务所中更可靠地、更自由自在地为王称霸。打倒社会主义！Vive L'Empereur！〔皇帝万岁！〕”

僥幸的僭位者使出了自己一切手腕，以便继軍閥之后把富人、有权势的人、慳吝人和投机家吸引到自己的旗帜下来。他高呼“帝国就是和平”，而百万富翁們則几乎把他当做神一样来崇拜。羅馬教皇亲切地称他为“我們最亲爱的耶穌基督的儿子”；而羅馬天主教的僧侶們也（*pro tempore*〔暂时〕）欢迎他，竭力表示对他的信任和忠誠。有价证券的牌价上漲了；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的各家銀行开办并兴隆起来了；在新的铁路中，新的奴隶买卖中，新式的五花八門的投机活动中，大笔一揮就撈到了千百万財

富。不列颠的贵族把过去的一切置诸脑后，兴高采烈地欢迎新的波拿巴，并向他大献殷勤。他闖家訪問了維多利亞女王¹⁷⁵，倫敦西蒂区为他举行了欢迎会，巴黎和倫敦的交易所碰杯相庆；从事交易所投机活动的使徒們中間发出了一片欢騰的祝賀声，所有的人都互相握手，并深信，金犢终于变成了真正的神，而新的法国专制君主則成了它的亚倫。

七年过去了，一切都变了。拿破侖第三說的那句話永远不能收回或遺忘。不管是他自己像他的前輩在西班牙和俄国所作的那樣，盲目地奔向毀灭，还是欧洲当权人物和資產階級普遍憤懣的怨声迫使他暫時服从他們的意旨，反正魔力永远消失了。他們早就知道他是一个恶棍，但他們曾設想，他是一个願意效劳的、順从的、听話的和知恩图报的恶棍；現在他們看到自己錯了并为此而懊悔。他始終都利用他們来为自己服务，而他們却以为他們在利用他。他完全像喜欢自己的飯和酒一样喜欢他們。迄今为止，他們都以一定方式为他服务；現在他們应当用另一种方式为他服务，不然就得准备对付他的报复。如果今后仍然“帝国就是和平”，那末这就是明乔河或多瑙河上的和平，是他的綉着帝国之鷹的旗帜在波河和阿迪杰河上胜利飄揚的和平，要不然就是莱茵河和易北河上的和平，这将是把铁制王冠¹⁷⁶戴在他的头上的和平，把意大利变为法国总督管轄区的和平，把大不列颠、普魯士和奥地利变成繞着法国运轉的、沐浴着查理大帝的新帝国这颗位居中央的巨星的光澤的簡單卫星国的和平。

当然，从各个王宮中都发出了咬牙切齿的声音，但是在銀行家和商业巨头的客厅里这种声音也迭有所聞。要知道，1859年一开始就出現了預示1836年和1856年的黄金时期¹⁷⁷重新到来的征

兆。由于工厂生产长期停頓，金屬、商品和工厂制品的儲备都已消耗殆尽。大批的破产显著地澄清了貿易气氛。船舶的价格重新上漲了；商品倉庫又开始建設并堆滿了各种貨物。交易所活跃起来了，百万富翁們全都感到兴致勃勃；一句話，从来还没有出現过比这更光輝的貿易前景，比这更明朗的預兆着吉利的天空。

仅仅一句話就把这一切都改变了；这句話是 coup d'état [政变]的英雄，十二月的当选人和社会救主說的，是他无缘无故地、冷靜地、完全有意地向奥地利大使許布納尔先生說的，而这句話显然表明了一种蓄謀已久的意图，就是打算和弗兰茨-約瑟夫爭吵或者用恫吓的手段使他遭到甚至比吃三場敗仗还要厉害的屈辱。虽然說这句話的目的是希望在交易所中能够产生瞬息的效果以利于交易所的投机生意，然而它也暴露了重新划分欧洲地图的强烈願望。奥地利应当放棄那些名义上独立而实际上正被它占領着的（根据在它們的統治者同意下簽訂的条約）意大利国家，否則法国和撒丁就要占領米兰并将用一支波拿巴將軍在意大利从来没有支配过的軍隊威胁曼都亚。教皇在教皇国内应当停止濫用教权制度——順便提一提，这种濫用教权制度的行为曾长期受到法国武器的支持，——或者跟在托斯卡納、帕尔馬、摩地那等国的小暴君的后面急急忙忙地逃跑到他們以为安全的維也納去¹⁷⁸。由于波拿巴对許布納尔的威胁而造成的证券的貶值使路特希尔德家族遭到了1100万美元的損失，他們为此而悲痛，并断然拒絕安慰。工厂主和商人們痛心地知道，他們所期待的1859年的丰收看来要让位于“死亡的丰收”了。恐惧、不滿和憤恨到处都在动搖着总共不过几个月前十二月英雄的宝座那样牢靠地建立在上面的基础。

被推倒了的、搗碎了的神像永远再也不能在它的台座上恢复

起来了。他可能由于害怕他自己所造成的風暴而退却，从而再次得到教皇的贊美和不列顛女王的垂青；但不管是贊美还是垂青都将是口头上的东西。現在教皇和女王都知道他就是各国人民早就知道的那种人了，——他是一个冒失的賭徒，是一个不顾死活的冒險家，只要賭博能使他贏錢，他情願用各个皇族来作賭注，就像用任何其他东西作賭注一样。他們认为他是一个像麦克佩斯那样經過血腥道路爬上皇位的人，这种人容易向前进，而不太容易退回到和平和安宁。路易-拿破侖从发表反对奥地利的威懾性的言論时起，在受过加冕典礼的人物中就一直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年輕的俄国皇帝^① 为了自己的目的看起来还好像是他的朋友；但这只是假象而已。1813年的拿破侖第一是1859年的拿破侖第三的原型。看来后者也将像前者当年一样急速地去迎接自己的厄运。

卡·馬克思写于1859年3月18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作为社論載于1859年3月31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5598号

① 亚历山大二世。——編者注

弗·恩格斯

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

路易-拿破侖同意关于召开会议来讨论意大利问题的建议，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欧洲和平的良好的征候，不如说是不祥之兆。这位君主在最近6个月内的每一个活动无疑都加速了战争的到来，如果他现在突然大转变，抓住那个表面看来是维护和平的建议，那末我们立刻可以得出结论说，幕后一定有阴谋，一旦这些阴谋被揭露，感到他的行为不合逻辑的疑问就会消除。欧洲会议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初看起来，它好像是为了维护和平，现在看来，不过是为了赢得时间完成战争准备的一种新借口。召开会议的建议提出来还不久，关于开会的地点和条件都还没有确定，即使肯定要召开，至少也要拖到4月底，可是法国军队已奉命在各团着手编组第四营，而6个法国师也要进行战斗准备。这些事实，值得研究一下。

法国步兵，除了猎兵、朱阿夫兵、外籍军团、阿尔及利亚土著部队以及其他特种部队以外，共有8个近卫团和100个基干团。这100个基干团，在平时每团由3个营（2个野战营和1个后备营）组成；这样，一个团共有1500—1800名战斗人员。但是，除此以外，每个团还包括与此数字相同的、甚至更多的归休兵，他们在部队转入战时状态时必须立即回队。在这种情况下，3个营的总数

将达 3 600—4 000 人。其中除后备营 500—600 人以外，2 个野战营每营就有 1 500—1 700 人，这样多的人数使一个营根本不能灵活机动。为了在军事行动中有效地使用所有这些受过训练的兵士，必须立即在每个团内增编一个新的野战营，这样，作为战术单位的营的人数就可减少到大约 1 000 人，这是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军队中所采用的平均数字。因此，编组第四营是法军进入战斗准备状态之前必须采取的一个步骤；只有那时，军队才具有为容纳现有受过训练的人员所必需的組織。这一情况使上述编组第四营的措施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第四营的编成意味着准备发动战争。建立第四营的方法极其简单，就是把原有的 3 个营（每营 6 个连）的第五连和第六连合并成第四营，而其余 4 个连则拨出必要数量的官兵在每个营内组成两个新的连。新编成的营成为后备营，而第三营则成为野战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加上近卫军、猎兵和其他特种部队，那末法国军队中步兵营大约将有 480 个，这个数量足够安插 50 万人左右；如果这还不够，那末可以把第四营改为野战营，再新编第五营作为后备营。这种办法在克里木战争末期确实采用过，那时，法军共有 545 个步兵营。

法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一步骤，实际上除了直接准备发动战争以外并不说明其他任何问题，这一点为紧接第一步而采取的另一措施所证实。6 个师奉命转入战时状态，也就是召回自己的归休兵。法军步兵师包括 4 个基干团（即 2 个基干旅）和 1 个猎步兵营，总共 13 个营，约 14 000 人。虽然法军没有指明这 6 个师的番号，但是不难猜出是哪些师接到了命令。我们看来首先是现在已经在罗尼河的 4 个师（其中有一个师刚从阿尔及利亚回来，是由勒诺将军指挥的），其次是现在奉命在阿尔及利亚上船的布尔巴基

师，最后是巴黎軍团的 1 个师，据报道，該师已奉命准备随时出动。这 6 个师約有 85 000 名步兵，加上相应数量的炮兵、騎兵和輜重兵，可以編成大約 10 万人以上的一支軍队。这些师可以看做是在当前的战争組成意大利軍团的那些兵力的基本核心。

由于法国国内普遍要求和平，在德国又爆发了强大的反法的民族运动，以及考虑到英国所采取的立場，看来路易-拿破侖还没有决心采取动員軍队这样一个步驟，因为他还没有能使人相信，他不是非发动战争不可，而是乐意尽可能地通过會議使意大利的状况得到改善。备战的过程证实了这一看法，并揭露了路易-拿破侖的計劃中之所以包含这样一个騙局的另一些原因。

当土伊勒里宮的新年接見剛表明他企图使对奥关系复杂化以后，法国和撒丁同奥地利就开始了我們可以称之为軍备竞赛的活动。然而，这后一个强国立刻表明它超过了自己的对手。整整一个軍以惊人的速度在数日内調到了意大利，当法国軍队和撒丁軍队集結的消息具有更严重的威胁时，意大利軍团的归休兵在 3 个星期以内就集結好了，并回到了自己的部队，这时意大利两省的归休兵和新兵也已征集入伍，并派往国内各駐防地点的自己所屬的部队。这样有秩序地、迅速地完成这一切措施是奥地利軍事制度达到完善程度以及奥地利軍队具有充分的战斗力的最好的证明。誠然，奥軍曾經以緩慢、守旧和笨拙聞名，但是拉德茨基在 1848—1849 年的用兵已經十分令人信服地改变了这个名声，然而整个机构能这样毫无故障地发挥作用，軍队能在最短期限内达到这样的战斗准备，还是出人意料的。在这里，奥軍不需要編組任何新的部队；在意大利的各野战营只要用預备兵員补充滿額即可，同时后备营改編为野战营以及組織新的后备营的工作都是在深远后方进行

的，絕不会耽擱各野战部队的补充工作。

应当承认，撒丁也不需要編組任何新的部队。它的組織是十分令人滿意的。而法軍的情况則不同。整个动員工作需要相当长的時間。建立第四营的工作必須在召集归休兵回队以前进行。此外，路易-拿破侖一旦进攻奥地利，必須預見到同德意志联邦作战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奥地利只有自己的意大利边境，即南部边境是暴露的，而西面則有德国作掩护，从而能够把絕大部分的兵力調到意大利，因此必要时能够立即开始战争，而法国政府却必須在决心采取进攻以前集中自己的全部兵力，因此首先就必須同时征集1859年的新兵和5万名志願兵（这个数字是法国在发生战争时一般指望得到的）。这一切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時間，因此，仓卒发动战争絕對不利于路易-拿破侖。实际上，如果我們讀一下“立宪主义者报”上关于法国軍隊的那篇有名的文章——讀者們記得，这篇文章直接来自拿破侖本人^①——那末，我們就会知道，他确定法軍扩充到約70万人的時間是5月底。这就是說，在此以前，奥地利对法国占有相对的优势；既然事态已經显然地迅速地走向公开的决裂，那末和平会议就是贏得時間的最好的手段。

还必须估計到另一个因素。俄国在这件事情中也插了一手，这一点現在已經毫无疑問了。不言而喻，它力图削弱奥地利；同时也很显然，干預西欧的事务可以使它在多瑙河地区自由行动，从而挽回它在巴黎和約中所失去的东西；它对羅馬尼亚各公国和塞爾維亞，以及对土耳其的斯拉夫人，是有它自己一套算盘的，这一点已为不久以前它对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所证实。¹⁷⁹ 俄国为了对

^① 見本卷第200—206頁。——編者注

奥地利进行报复所能采取的最有力的手段，就是当奥地利进行战争的时候在奥地利统治的数百万斯拉夫人中间挑起泛斯拉夫主义运动。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如果有可能的话，还不止于此——它也必须集中自己的军队，并为此准备条件；但是进行这一切工作也需要时间。此外，为了对奥地利采取消极敌对的态度，也必须有个借口，而挑起一场轻松的争吵的好机会，再也没有比在这样的会议上更容易找到的了。因此，这个会议只要召开，就只不过是一种“骗局、笑柄和圈套”，而不是认真地、至少不是真心诚意地维护和平；恐怕用不着怀疑，所有列强现在都完全相信，整个这件事情虽只是空洞地走走形式，但必须进行到底，才能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和掩饰那些还没有公开暴露的真实企图。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4 月初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4 月 23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18 号

卡·馬克思

印度財政狀況的严重混乱

一

1859年4月8日于倫敦

印度的財政危机同战争傳聞和竞选宣傳一样，是吸引英国輿論界注意的一个重要問題。对于这个危机應該从两方面来看：它不但引起暂时困难，而且也引起經常的困难。

2月14日斯坦利勋爵向下院提出了一个法案，建議授权政府在英国发行700万英鎊的公債来弥补印度事务管理机关今年的非常开支。6个星期后，約翰牛由于沒有付出多少代价就把印度起义¹⁸⁰鎮压下去而产生的沾沾自喜的胜利心情，被大陆寄来的一个邮件无情地打消了，这个邮件把加尔各答政府关于印度財政状况困难的哀号傳进了它的耳朵。3月25日得比勋爵在上院站起来声称，为了弥补今年的需要，除了現在提交議會批准的700万英鎊的公債以外，还需要再发行500万英鎊的印度公債，而且就是这样，也还剩下一些要求支出的至少达200万英鎊的賠償費和奖金¹⁸¹沒有着落，必須另行設法开銷。斯坦利勋爵为了給苦药丸裹上一层糖衣，他在第一篇声明中只提到倫敦的印度金庫資金缺乏，让印度的英国政府用自己的資金来开支，虽然他从收到的那些紧急

报告中不可能不知道，这些资金是远远不够用的。坎宁勋爵根据普通收入增加 80 万英镑和军费开支减少 200 万英镑的情况，不算英国政府或伦敦的印度事务管理机关本身的开支，他估计今年（1859—1860 年度）加尔各答政府的预算赤字为 1 200 万英镑。加尔各答政府已经拮据到停发一部分文职人员的薪金，它的信贷下跌到连利率 5% 的政府证券的市价也要按票面额减低 12%，而它的财政混乱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于只有在几个月内从英国经海路把 300 万英镑的白银运到印度去，才能使它不致于破产。这说明了三种情况。第一，斯坦利勋爵的最初声明是“支吾搪塞”：他不仅没有考虑到印度的全部债务，而且甚至没有提到印度政府在印度的直接需要。第二，在整个起义期间，如果不算 1857 年从伦敦运到印度去的 100 万英镑的白银，那末加尔各答政府就只有自力更生，用自己的收入来抵偿大部分理应在印度支付的非常军费开支，安顿新补充的约 6 万名欧洲士兵和赔偿被抢走了的贵重物品所需的开支，以及由于起义而完全没有得到的地方管理机关的收入。第三，除了在英国的印度事务主管部门资金缺乏以外，还有今年必须弥补的 1 200 万英镑的赤字。借助各种手段（这些手段的可疑性质我们暂且不谈），这个数目将减少到 900 万英镑，其中 500 万英镑要用于在印度发行公债的办法来取得，400 万英镑要用于在英国发行公债的办法来取得。后一部分有 100 万英镑的银锭已经从伦敦经海路运往加尔各答，尚有 200 万英镑必须在最近期间启运。

从这个简短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英国主子们对待印度政府是相当不老实的，他们在印度政府处于困境时撒手不管，为的只是想蒙骗约翰牛；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坎宁勋爵在财政活动方面的庸碌无能甚至超过了他的军事的和政治的功勋。直到 1859 年 1 月

底，他才通过在印度发行公債的办法获得了必要的資金，这些公債一部分是用政府有价证券的方式发行的，一部分是用国庫期票的方式发行的。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他的努力在革命时期达到了目的，而在英国以武力恢复統治以后却彻底失败了。而且不仅失败了，甚至在对待政府证券方面也发生了混乱現象；各种证券价值空前下跌，以致孟买和加尔各答貿易局提出了抗議；在加尔各答，英国和当地的金融商人举行的公众大会紛紛譴責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不稳定、太随便、軟弱无力、考虑不周。在1859年1月以前向政府提供資金的印度借貸資本在此以后开始涸竭，政府获得借貸的可能性看来也已經消失了。事实上，在1841至1857年間借貸的2100万英鎊，仅仅在1857和1858年两年中就耗費了約900万英鎊，几乎等于过去16年内貸入款項的一半。虽然这种資金不足的情况說明了后来把政府公債的利率从4%提高到6%是必要的，但是，它显然远不能說明印度证券市場的混乱状况和总督完全无力弥补最迫切需要的情形。这个謎可以从下述情况中得到解答：坎宁勋爵养成了常常采用这样一种手法的习惯，即在前一种公債尚未认购完毕时，他就以更高的利息发行新公債，而事先絲毫不告知公众，并且还完全不让公众对以后的財政措施有任何了解。由于采取这种手法造成的证券貶值估計在1100万英鎊以上。坎宁勋爵困于国庫涸竭，慑于证券市場的混乱情况，迫于各貿易局以及加尔各答各种集会的抗議，于是认为必須做一个乖孩子，并且尽力按照金融界的意願办事；但是，他1859年2月21日的报告再次表明，人的理智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轉移的。他应该怎么办呢？他不該以不同的条件同时发行两种公債，而应该立即向金融界提出今年所必需的款額，不必用接二連三的、彼此矛盾的声明去欺騙他

們。那末坎宁勋爵在他报告中是怎样做的呢？起初他說，必須用在印度市場上发行利率为 $5\frac{1}{2}\%$ 的 1859—1860 年度公債的办法来弄到 500 万英鎊，而且

“当这个数目推銷完毕时，1859—1860 年度公債的认购就将停止，并且今年在印度将不再发行新的公債”。

然而在这个报告中他又說了一句話，使得剛才做的保证失去了任何价值，他說：

“1859—1860 年度在印度将不发行利息更高的公債，除非是英国的印度事务管理机关有所指示。”

不仅如此。实际上他正以不同的条件发行着**双份公債**。他一面宣布，“以 1859 年 1 月 26 日公布的条件发行的国庫期票将在 4 月 30 日結束”，一面又声明，“从 5 月 1 日起将宣布发行新的国庫期票”，并且，这次发行的期票的利率将是 $5\frac{3}{4}\%$ 左右，自发行之日起一年以后还本付息。两种公債是同时发行的，因为 1 月間宣布发行的公債尚未认购完毕。看来，坎宁勋爵所懂得的唯一的財政問題，就是他的年薪名义上是 2 万英鎊，而实际上却达到 4 万英鎊。因此，尽管得比內閣譏笑他，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无能，但他出于“义务感”，仍然抓住自己的职位不放。

印度財政危机对英国本国市場的影响已經完全显露出来了。首先，在通常从墨西哥輸入的白銀由于那里发生严重騷动¹⁸² 而不能运到的时期，由政府撥运出了一批白銀，再加上根据商业結算撥运出的大量白銀，結果自然使得銀錠的价格上漲。3 月 25 日銀錠价格暴漲到每盎斯 $62\frac{3}{4}$ 辨士，这就使欧洲各地的白銀大量流入，結果倫敦的白銀价格又回跌到 $62\frac{3}{8}$ 辨士，同时，汉堡的貼現率却从 $2\frac{1}{2}\%$ 上漲到 3% 。由于白銀大量輸入，交易所的行市变得不

利于英国，金条也开始外流，这现在暂时使英国金融市场避免了货币过剩现象，但是，如果注意到，除了这种情况，还有相当数量的大陆公债，那末，归根到底，这将严重地影响英国的金融市场。不管怎样，印度政府证券和有保证的铁路股票在伦敦金融市场上的贬值——这对于将在本季度发行的政府公债和铁路公债会发生不良影响——无疑是印度财政危机在英国本国市场上产生的最严重的后果。虽然印度铁路股票的5%的利息的收入是由政府保证的，但是许多铁路股票仍然按票面额减价2%或3%出售。

不过，我虽然注意到了这一切情况，但仍然认为，同印度国库的总危机相比，印度财政短时期的混乱还是次要的事情，这个总危机我也许还有机会来谈谈。

二

1859年4月12日于倫敦

最近的大陆邮件所带来的消息不仅沒有談到印度的財政危机有什么緩和,相反地,却透露了几乎难以預料的混乱状况。印度政府为了弥补自己最迫切的需要而被迫玩弄的詭計,可以从孟买总督不久以前采取的措施中得到最好的說明。孟买是一个每年平均可以銷售3万箱馬尔瓦鴉片的市場。馬尔瓦每月可以供应2 000—3 000箱鴉片;这笔交易是用在孟买支付的期票計算的。輸入孟买的鴉片每箱抽稅400卢比,政府每年从馬尔瓦鴉片中得到120万英鎊的收入。現在,为了充实涸竭了的国庫和預防即将到来的破产,孟买总督宣布,馬尔瓦鴉片每箱的稅額从400卢比提高到500卢比,但同时也指出,只是从7月1日起才开始按新稅額征收,这样一来,馬尔瓦鴉片的所有主还可以在4个月內,按旧稅額輸入他們的药物。因为6月15日才开始刮貿易風,所以从宣布提高稅額的3月中旬起到7月1日,一共只有两个半月可以輸入鴉片。不言而喻,馬尔瓦鴉片的所有主将会利用給他們提供的这一段时间按照旧的稅率来运入鴉片,因此在两个半月內,他們将把自己的全部現有存貨推銷給管区¹⁸³。由于馬尔瓦最近两次收获的鴉片还剩下26 000箱,而馬尔瓦鴉片的价格每箱达1 250卢比,因此馬尔瓦的商人就要孟买商人支付300万英鎊以上的期票,其中有100多万英鎊将要落入孟买的金庫。这种財政上的詭計目的非常明显。

稅額的即將提高對鴉片商人說來 in terrorem [是一種威脅]，其目的是為了能夠把全年的鴉片稅提前弄到手，迫使做這種生意的商人立即把稅款交出來。在這種發明的詐騙性質上耗費筆墨是完全多餘的，這種發明現在正充實着國庫，然而它將在最近幾個月中造成國庫的相應的空虛，不過，也很難舉出更加令人吃驚的例子來說明大莫臥兒王朝的繼承者們¹⁸⁴ 資金涸竭的情況了。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在最近一次起義之後印度財政的總的狀況。根據最近的官方報告，不列顛人從他們在印度的領地上獲得的純收入是 23 208 000 英鎊，按整數算是 2 400 萬英鎊。這樣的年收入總是不夠彌補年支出。從 1836 年到 1850 年，純赤字共計 13 171 096 英鎊，平均每年約 100 萬英鎊。甚至在 1856 年由於達爾豪西勳爵大肆吞併、掠奪和勒索，國庫空前充實的時候，收支不僅沒有達到平衡，反而還在已經積累起來的赤字上加上了約 25 萬英鎊。1857 年的赤字是 900 萬英鎊，1858 年達到 1 300 萬英鎊，而 1859 年的赤字根據印度政府自己的計算是 1 200 萬英鎊。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的第一個結論是，甚至在一般情況下赤字也總是不斷增加的，而在非常情況下赤字要達到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

這裡就出現一個問題：由於不久以前發生的事件，印度政府的收支之間已有的差額已經擴大到了什麼程度？甚至根據最樂觀的英國財政學家們的估計，由於鎮壓西帕依起義而增加了的新的長期債務有 4 000 萬到 5 000 萬英鎊，而威爾遜先生估計，固定赤字，或者說必須從年收入中支付的這筆新債的年息至少在 300 萬英鎊以上。但是，如果認為，這 300 萬英鎊的固定赤字就是起義者留給勝利者的唯一的遺產，那就大錯特錯了。用於鎮壓起義的費用不僅是過去的事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和將來有關。甚至在

平靜的时期，在起义开始以前，軍費开支至少也占全部普通收入的60%，因为这笔开支超过1 200万英鎊，但是現在情况变了。在起义初期，在印度的欧洲軍隊有战斗人員38 000人，土著軍隊为26万人。而現在在印度服役的兵力却包括112 000欧洲士兵和32万土著士兵。可以有充分把握地說，随着使兵員增加到現有数目的非常情况的消失，这个空前的数目将会縮减到較为适当的程度。但是，不列顛政府任命的軍事委员会却做出結論說，如果有土著軍隊20万人，在印度还需要有8万人的欧洲常备軍，这就是說軍費开支将比原来的数目增加一倍。在4月7日上院辯論印度财政的时候，所有有声望的发言人在两点上取得了一致意見：他們认为，一方面，仅仅軍隊的年开支几乎就要占2 000万英鎊，这同总共才有2 400万英鎊的印度純收入不相容，另一方面，很难設想，目前局勢会允許英国人在許多年內不在印度駐扎比起义开始前多一倍的欧洲軍隊而毫无危險。但是，就算欧洲軍隊在一个长时期內只比原有人員增加三分之一，每年新增加的固定赤字至少也有400万英鎊。可見，新的固定赤字一方面是由起义期間所形成的长期債務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印度的英国駐軍人数不断增加造成的，这笔新的固定赤字根据最保守的估計，至少要有700万英鎊。

此外还必須加上債務增加和收入减少这两項。根据倫敦印度事务主管部門所屬鐵路局不久前发表的声明，批准在印度修筑的铁路全长为4 817英里，到現在才修成559英里。各铁路公司的投資总額为4 000万英鎊，其中1 900万英鎊已經支付，还有2 100万英鎊尚待支付，而且这个总額的96%是在英国筹措的，在印度筹措的只有4%。政府保证这笔总数为4 000万英鎊的款項能得到5%的利息的收入，因此，每年應該从印度收入中支付的利息达

200 万英镑，这些利息还必须要在铁路通车并带来某些收入以前支付。据埃伦伯勒伯爵计算，这项投资给印度财政造成的损失在最近 3 年中为 600 万英镑，而这些铁路在以后带来的固定赤字将是 50 万英镑。最后，印度的 2 400 万英镑的纯收入中有 3 619 000 英镑是靠把鸦片卖给别的国家取得的，现在到处都承认，这笔收入的来源由于最近同中国签订了条约¹⁸⁵ 在很大程度上将要减少。可见，很明显，除了彻底镇压起义的必要性所造成的紧急开支以外，每年至少有 800 万英镑的固定赤字必须从 2 400 万英镑的纯收入中支出，这个纯收入，政府依靠征收新的赋税可能会增加到 2 600 万英镑。这种形势的必然结果是必须把印度债务的责任推给英国的纳税人，正如乔·康·路易斯在下院宣布的。

“每年要拨款 400 万或 500 万，作为对不列颠皇室的所谓重要的殖民地的补助金。”

必须承认，“光荣”收复印度的这种财政后果造成了远远不是令人愉快的印象，而为了保证曼彻斯特自由贸易派在印度市场上的垄断地位，约翰牛不得不缴纳相当高的保护关税。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4 月 8 日
和 12 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载于 1859 年 4 月 30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624 号

弗·恩格斯

*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1859年4月15日星期五于伦敦

虽然外交界还在尽一切力量设法召开会议，企图通过这个途径来和平解决意大利问题，但是已经没有人相信战争有可能避免了。英国内阁和普鲁士无疑是有诚意谋求和平的，但是法国和俄国参加目前的谈判，仅仅是为了赢得时间。法军进入意大利的必经之地蒙塞尼山口，现在积雪还很深。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还要编成一些新的法国团和阿拉伯团，而把军队从马赛和土伦运送到热那亚的准备工作也还没有结束。同时，俄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组织瓦拉几亚的国民军和塞尔维亚的非正规军。而在维也纳，占上风的是主战派，弗兰茨-约瑟夫渴望听见第一声炮响的心情已经胜过了一切。既然他知道外交上的拖延只会消耗他的财力和加强他的敌人，那末他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关于召开会议的提议呢？普鲁士亲王的立场就是答案。他没有受到控制着德国人的激昂情绪的影响，而企图寻找一个堂皇的借口来保持真正的中立，以避免迟早会导向战争的武装中立所造成的国力的大量损耗。如果奥地利为了消灭皮蒙特军队而发动战争，那末柏林内阁的这种政策，甚至在德国人看来都会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法军在伦巴第进攻奥地利，那末弗兰茨-约瑟夫必然要向德意志联邦发出正式的

呼吁，号召联邦军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因为奥地利的真实企图正是这样，所以各方面的外交家都在勾心斗角，企图迫使对方首先进攻，这种情景看来实在可笑。法国抱怨奥地利人专制；那个把法国共和党人流放到拉姆别萨和凯恩的人，却对弗兰茨-约瑟夫把意大利共和党人塞满监狱这点感到愤慨！而另一方面，占领克拉科夫和废除匈牙利宪法¹⁸⁶的奥地利，却在一本正经地大声疾呼，说什么条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突然想起纸币是一大祸害因而大量借债的俄国，当然也不希望战争，因此提出了四项条款作为召开会议的基础。这四项条款同大家都知道的克里木战争期间奥地利向俄国提出的四项条款¹⁸⁷如出一辙。这些条款要求：奥地利放弃对意大利各公国的保护，召开会议以调整意大利的管辖关系，解决意大利国内必要的改革问题以及修改许多重大条约的次要条款，例如关于奥地利在费拉拉、科马基奥和皮阿琴察保持驻军的权利的条款¹⁸⁸，因为这些驻军在意大利宣布中立以后将是多余的。英国真心诚意地赞同这些建议，并且用和缓的词句将这些建议通知了奥地利。布奥尔伯爵当然赶紧接受了这些建议，但是措词含糊，所以丝毫不用怀疑，他是希望彻底推翻这些建议的。他还补充了一项条款，就是首先要全面裁军。马姆兹伯里勋爵认为这一建议非常明智，并且请卡富尔伯爵解散一部分撒丁军队，以减轻国家的沉重负担。卡富尔伯爵一点也不反对这个出色的建议，但是指出奥地利在伦巴第有大量的兵力，并向布奥尔伯爵提出：“你们先裁。”布奥尔伯爵的答复是，在拿破仑没有裁军以前，不可能解散他自己的宝贵的部队。拿破仑冷淡地反驳说：“我没有扩军，因此不可能裁军。我既没有向路特希尔德借款，也没有向贝列拉借款；我没有军事预算。我是用国家一般的预算来维持自己的军队的；我怎

么可能裁軍呢？”馬姆茲伯里勳爵对于这一厚顏无耻的答复感到吃惊，但是仍然满怀希望地想在外交上碰碰自己的运气，又建議會議首先討論和解决裁軍問題；但是，交易所里的人以及欧洲一切明智的人士都暗中嘲笑他头脑簡單，并且都作最坏的打算。德国民情激昂。但是，在汉諾威，受到宮廷鼓励的激烈的反法情緒突然轉變了。觉醒的人們认为，在国内以及在国外清算的时候到来了，如果目前不稳定的局面再繼續两个月左右，德国必定会行动起来反对法国，但是这需要有自己国家的自由和統一作为这一行动的必要条件。普魯士亲王对于他的同胞的这种情緒，比弗兰茨-約瑟夫或者巴伐利亚国王^①了解得更清楚，因此他設法阻止这种激烈情緒的扩展，因为这种情緒必然要威胁到他实行半专制統治的企图。

現在，俄国面临着一个好的时机，或者是利用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起义来摧毀土耳其帝国，或者是对奥地利帝国进行报复。当然，俄国是不会采取战争的手段来反对弗兰茨-約瑟夫的，但是它可以煽动并支持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侵犯特兰西瓦尼亚，煽动并支持塞尔維亚侵犯匈牙利。沙皇正是企图通过瓦拉几亚人和斯拉夫人在匈牙利引起騷动，因为如果不这样，自由、独立的匈牙利会成为比被削弱的奥地利集权专制政体更严重的阻撓沙皇推行侵略政策的障碍。

那不勒斯国王^②已經奄奄一息。王国到处动蕩不安；有些人在談論宪法，另一些人在談論繆拉特的拥护者的暴动。但是可能性最大的是組成以薩特里安諾公爵菲兰杰里为首的內閣，他是主張照普魯士的样子建立开明专制政体的代表人物。但是由于意大

① 馬克西米利安二世。——編者注

② 斐迪南二世。——編者注

利的危机,这种制度不可能是巩固的,它也许很快会首先让位给宪法,然后再让位给西西里岛的起义,而在这期间,繆拉特的拥护者将会混水摸鱼。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4 月 11 日
左右

载于 1859 年 4 月 30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62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即将举行的和平會議

1859年4月14日于巴黎

不列顛政府終于认为需要让各界人士知道欧洲會議——这是俄国和法国的导演們看到自己在备战方面大大落后于奥地利而搬上舞台的 *deus ex machina*^①——的正史了。首先可以指出，标明“1859年3月23日于維也納”的布奥尔伯爵給俄国大使巴拉宾先生的照会，和另一个标明“3月31日于維也納”的奥地利首相給不列顛駐維也納宮廷大使奧·勞夫塔斯勛爵的照会，已于4月8日由奥地利政府秘密通知維也納各家報紙，而約翰牛却在4月13日以后才看到了这些照会。不仅如此，英国政府向倫敦“泰晤士报”透露的布奥尔伯爵給巴拉宾先生的照会只是奥地利照会的一部分；其中一些极为重要的地方被删去了；在这篇文章中我力求指出这些被删去的地方，好让約翰牛能够通过紐約去了解英国政府认为交給它那大智大慧的头脑去考虑是不无危險的那些外交新聞。

只要看一下布奥尔給巴拉宾先生的照会，就会明白，召开會議的建議是俄国提出来的，或者換句話說，这是圣彼得堡和巴黎的联合棋手們共同走出的一着棋。这个事实大概是想讓我們为唐宁街

① 直譯是：从降神机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劇場里，扮演神的演員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出舞台）；轉意是：突然出現以挽救危局的人物或情况。——編者注

主子们的智慧或诚意而惊叹，这些人甚至在议会中野心勃勃地要求把这项发明的专利特許证发给他们。从照会本身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奥地利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同意与其他大国会談（法国“通报”关于奥地利贊成召开大会的建議的报道煞費苦心地掩盖了这一点）。

布奥尔伯爵說：“除了这个问题（即消灭“撒丁的政治制度”）以外，各大国如果认为还应当提出其他问题来討論，就必须事先明确規定，既然这些问题将要涉及其他主权国家的国内制度，本人不能不首先坚决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討論程序必须符合 1818 年 11 月 15 日亚琛議定书上規定的原則。”

可見，奥地利是根据以下四个条件接受俄国关于召开大会的建議的：第一，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貶斥撒丁并通过有利于奥地利的决定；第二，必須承认亚琛議定书¹⁸⁹是討論的基础；第三，“在召开任何会议以前，撒丁必須解除武装”；最后，需要討論的问题“必須事先明确規定”。第一点用不着再加解釋。为了不致对这一点的意义有任何怀疑，布奥尔伯爵特意补充說，他认为这“对于从道义上安撫意大利是唯一的、极端重要的”一点。

第二点——承认亚琛議定书——就是要法国直接承认 1815 年条約和奥地利同意大利各国簽訂的各项专门条約。但是，波拿巴所希望的，恰好是廢除奥地利据以对倫巴第一威尼斯王国实行統治的 1815 年条約，以及廢除保证奥地利对那不勒斯、托斯卡納、帕尔馬、摩地那和羅馬的重大影响的各项条約。第三个条件——預先解除撒丁的武装——是奥地利方面打算預先取得只有打胜仗时才能使它得到的优势。最后一个条件——預先規定需要討論的问题——将使波拿巴失去他除了备战所必需的时间以外还希望依靠会议来取得的主要成果，即失去这样一些机会；出其不意地抓住

奧地利，使它陷入錯綜复杂的外交談判的圈套，迫使它斷然拒絕滿足法國和俄國向它突然提出的要求，發出和談破裂的信號，從而在歐洲輿論面前使它威信掃地。

奧地利在給俄國大使的同意參加大會的照會中提出的條件可以概括如下：奧地利可以參加歐洲會議來解決意大利問題，但在會議開幕前歐洲各大國必須同意支持奧地利反對撒丁，強迫撒丁解除武裝，承認維也納條約和以維也納條約為基礎的各項補充條約，最後，還必須使波拿巴失去破壞和平的一切借口。換句話說，奧地利同意參加會議，只要會議在開幕前就接受一種義務的約束，即把奧地利現在宣稱準備以武力去獲得的一切都讓給它。如果我們注意到，奧地利非常了解會議不過是決心要發動戰爭的敵人為它設置的一個圈套，那誰也不會因為它對俄法兩國的建議採取如此譏諷的態度而責難它了。

我所評述的奧地利文件中的這些地方，恰好是不列顛政府認為適宜於發表的。而布奧爾信件中的下面幾個地方，在馬姆茲伯里的編輯部發表的奧地利照會中卻被刪去了：

“皮蒙特一旦解除武裝，奧地利亦將解除武裝。奧地利將用一切方法維護和平，因為它希望和平，也善於珍視和平。但是，它希望的是真誠的、持久的和平。它公正地認為，它在自己的威力和榮譽不遭受損害的情況下能夠保證這樣的和平。為了在意大利保持安定的局面，奧地利已經做出了許多犧牲。在上述先決問題未作規定和處理以前，奧地利可以減少自己的備戰活動，但是不能完全停止。它的軍隊將繼續開往意大利。”

在俄法兩國的詭計因此被揭穿以後，英國由於受到拉芒什海峽對岸它的至聖的盟友的唆使，也插進手來，想使奧地利接受關於召開大國會議來研究意大利問題上的糾葛的建議，並表示希望奧皇政府同意唐寧街草擬的初步建議。在外交編年史中，恐怕找不

到比布奥尔伯爵給英国駐維也納大使的复照更帶有侮辱性諷刺的文件了。首先，布奥尔重申了他自己的要求，即在召开任何會議以前撒丁必須放下武器，从而听凭奥地利摆布。

他說：“在撒丁尚未完全解除武装并开始解散 *corps francs* (志願軍) 以前，奥地利不可能出席會議。奥皇政府声明，如果这些条件实现了，它准备以最正式的方式提出保证，既然撒丁尊重帝国及其各同盟国的領土，因此在會議进行期間，奥地利将不进攻撒丁。”

可見，如果撒丁解除武装，奥地利只答应在會議进行期間不再进攻已解除武装的撒丁。布奥尔对英国的建議的答复完全是按照尤維納利斯的精神写成的。至于英国建議“1815年各項有关領土的协定和条約原封不动”这点，布奥尔高声答道：“完全同意！”只是补充說，甚至連“为了履行1815年的条約而簽訂的条約也应当原封不动”。英国想找到保证維護奥地利和撒丁之間的和平的办法，这个願望被布奥尔解釋为“會議将研究迫使撒丁履行其国际义务的方法”。对于“解放教皇国并討論在意大利各国实行改革”这项建議，布奥尔同意让欧洲“全面地討論”这些問題，但是，他同时认为“直接有关的各国”“应保留最后是否接受拟定的建議”的权利。至于英国打算用以“代替奥地利和意大利各国之間的專門条約的計劃”，布奥尔坚持“条約繼續有效”，但是，如果撒丁和法国同意把关于它們的領地（撒丁据有热那亚，法国据有科西嘉島）的問題作为討論的对象，他同意修改这些条約。奥地利对英国的建議所做的答复，实质上也就是它已經对俄国的紧急公函所做的答复。在遭到了这第二次的失敗以后，俄国和法国就促使倒霉的馬姆茲伯里伯爵向奥地利提出**全面裁軍**作为先决步驟。显然，在土伊勒里宮中人們都以为，奥地利在軍备方面既然超过了它的一切对手，对

于这种建議就一定会断然拒絕。但是，波拿巴的这个主意又打錯了。奥地利知道，波拿巴不使自己同时摆脱皇冠这种令他烦恼的負担，是不可能裁軍的。因此，奥地利同意了那个以为它必然会拒絕而提出的建議。这使土伊勒里宮陷于极端仓皇失措的境地，它經過 24 小时的考虑以后，以一个发明丰富了世界，它說“各大国同时裁軍除了意味着奥地利裁軍以外，不可能有任何別的意思”。請讀一下直接受拿破侖第三支持的報紙“祖国报”¹⁹⁰ 下面这篇蛮横无理的短文吧：

“無論如何，关于裁軍的建議应当只涉及两个大国——奥地利和皮蒙特。奥地利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在意大利集結自己的兵力，皮蒙特由于倫巴第駐有奥地利軍队，不得不准备防御以对付战争的威胁。奥地利提出的裁軍問題，首先應該由它自己来解决；当它从意大利撤回自己的軍队时，皮蒙特就只有效法它的榜样了。

至于法国，它沒有理由要实行裁軍 (*elle n'a pas à désarmer*)，原因很简单，它沒有进行任何特別的扩軍活动，它沒有陈兵边境，它甚至不願意使用自己对付奥地利威胁的权利，这种威胁旨在反对皮蒙特，反对欧洲和平。对于法国來說，連裁减它的軍队战斗人員中的一个士兵，把一門多余的大炮交回軍火庫的問題也談不上。如果說事情与它有关，那末裁軍只能意味着承担不进行扩軍活动的义务。

我們不认为，奥地利对这一点会有什么異議；奥地利建議裁軍（它非常清楚，它应当倡議裁軍），希望以此——毫无疑义，是怀着比較良好的情緒 (*mieux inspirée*) ——作为对維護欧洲和平的保证，而它的異議就等于使这种保证化为烏有。”

卡·馬克思写于 1859 年 4 月 14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9 年 4 月 30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624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战争逼近的征兆。——德国的 扩軍备战¹⁹¹

1859年4月22日于倫敦

在德国的大学里，每当学校领导在夜間 11 时左右把学生赶出啤酒館以后，如果天气好的話，各社团的学生通常便聚集在市場的廣場上。在这里，各个社团或“派別”的成員开始同其他“派別”的成員做互相“嘲笑”的竞赛，目的是想挑起一場流行的不太危險的决斗，这种决斗是大学生生活中最明显的特色。在市場的廣場上进行这种挑衅性的口角竞赛时，主要的技巧在于嘲笑得体，不加正式的或公开的侮辱，但同时又能尽可能地激怒对方，使他最后失去冷靜，破口辱罵，而你也就不得不向他提出决斗。

正是这样的預賽已經在奥地利和法国之間进行了几个月了。法国在今年 1 月 1 日挑起了這場口角，奥地利也反唇相稽。双方言来語去，指手划脚地越来越接近挑战了；但是，根据外交礼节，这种口角还需要进行到底。于是就有了无穷无尽的建議、反建議、让步、条件、保留意見和詭辯。

下面就是外交口角的最近的一个例子。4 月 18 日，得比勋爵在上議院宣称，英国正在作最后的努力，如果失敗，它将放棄調停。只过了 3 天，即 4 月 21 日，“通报”就报道英国已向其他四大强国

提出了下列建議：（1）在和平會議召開之前就實行同時的全面裁軍。（2）裁軍應在軍事的或非軍事的委員會的領導下進行，不受和平會議約束（這個委員會應由6名委員組成，其中1名由撒丁委派）。（3）上述委員會一開始工作，就同時召開和平會議討論政治問題。（4）和平會議開幕後，應完全像1821年會議¹⁹²那樣，立即邀請意大利各國的代表與列強的代表一起討論。同時，據“通報”報道，法國、俄國和普魯士都表示同意英國的建議，而都靈發來的電報又帶來了使歐洲各交易所安心的喜訊：路易-拿破侖促使皮蒙特採取了同樣的步驟。到目前為止，一切都異乎尋常地平靜，似乎召開會議的一切障礙必然會消除。實際上，計劃是非常明顯的。法國還沒有作好戰爭準備，而奧地利則準備好了。路易-拿破侖為了使人對他的真實企圖不致產生任何懷疑，曾通過半官方的報刊清楚地表示，這次裁軍只適用於奧地利和皮蒙特，因為法國並沒有擴軍，自然不可能裁軍；同時他在官方的“通報”上發表的文章中措詞巧妙，對於把“裁軍原則”擴大到法國來的義務推卸得干乾淨淨。顯然，他的下一步是把關於法國沒有擴軍的半正式聲明變為正式聲明；這樣一來，就可以順利地把問題置於談論軍事細節的捉摸不定的基礎上，於是也就可以輕易地用主張、反主張、要求證據、反駁、發表公報和諸如此類的狡猾手段，把爭論幾乎永無休止地拖延下去。這時，路易-拿破侖就能夠從容地做好準備，而根據他的新原則，他可以不承認這些準備是擴軍，因為他需要的不是人（至於人，他在任何一天都可以征集），而是軍用物資和新編部队的組織。他自己宣布，在今年6月1日以前，他不能作好戰爭準備。實際上，如果他的準備工作在5月15日以前完成，他就能利用自己的鐵路，在這個期限內召回歸休兵，到6月1日前後，歸休兵就能歸

队。但是，可以有可靠的根据来设想，由于宫廷做出的好榜样，在法国军事主管部门内存在着大量盗用公款、混乱、受贿和挥霍的现象，因而物资的必要准备甚至在路易-拿破侖本人最初确定的期限内也不可能全部完成。不管怎样，战争的爆发每推迟一个星期，无疑都使路易-拿破侖占便宜，使奥地利吃亏。奥地利由于这一外交插曲的结果，不仅会失去它在军事准备方面先于其他国家所造成的军事优势，而且会被继续以现有规模进行军事准备所必需的大量军费的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

奥地利很了解目前的情况，因而不仅拒绝了英国关于根据来巴赫会议所依据的条件召开会议的建议，而且还第一个发出了战争的信号。居莱将军代表奥地利向都灵宫廷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它裁军和遣散志愿军，而且限皮蒙特在3天以内作出决定，超过3天就要宣战。同时，奥军还有两个师计3万人开赴提契诺河。由此可见，拿破侖在外交上把奥地利逼得无路可走了，因为他迫使奥地利最先说出了这句神圣的话——宣战。然而，如果奥地利不因伦敦和圣彼得堡的威胁性的照会而放弃自己的步骤，那末，波拿巴的外交胜利可能使他失去皇帝的宝座。

与此同时，备战狂热也遍及其他国家。德国各小邦正确地认识到路易-拿破侖备战对它们的威胁，已使自己的民族感情发挥到从1813年和1814年以来在德国从未有过的高度。它们正使自己的行动适应于这种“民族感情”。巴伐利亚及其邻近各邦正在征集预备兵和后备军，建立新的部队。德意志联邦军队的第七军和第八军（由上述各邦组成），原来的编制名额为66 000名现役兵和33 000名预备兵，将来参加战争时可能达到10万名现役兵和4万名预备兵。汉诺威和北德意志其他小邦（它们组成联邦军队的第

十軍),也在同样程度上进行扩軍,同时还加强海岸防御以防来自海上的襲击。普魯士由于在 1850 年动員¹⁹³ 期間和动員以后进行了准备,在軍事技术方面处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高的水平。最近一段時間以来,它已經从容地进行了动員軍隊的准备工作。現在,它正日益普遍地用針发枪装备自己的步兵,并在不久以前用十二磅炮装备了全部步炮兵;同时正在使萊茵河上的要塞作好战斗准备。它已經命令它的 3 个軍作好軍事行动的准备。同时,它在法兰克福的联邦軍事委员会內的态度令人信服地证明,它非常了解路易-拿破侖的政策对它的危害程度。虽然它的政府还在犹豫不决,但是輿論已經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虽說这时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間的敌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少,但是毫无疑问,路易-拿破侖在德国方面将遇到法国从未遇到过的最齐心的、最坚决的敌人。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4 月 21—22 日

載于 1859 年 5 月 9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63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弗·恩格斯

战争的前景

近两个月来，每当我們探討目前将欧洲卷入其中的这场大规模的残酷的战争开始以前各方面的潜力和战略形势时，总有人对我们提出一些肤浅的批评。对于这一切，我們曾认为沒有答复的必要。可是現在我們得到了证实我們观点的极其完备而詳細的、而且无疑也是讀者們很关心的論据，以致我們认为可以让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问题。这些論据就是今天本报滿栏刊载的許多詳細报道，这些报道鮮明地描述出这个可怕而激动人心的戏剧的最初几幕。

早在两个月以前，我們就已指出，奥地利正确的防御方法是进攻^①。我們曾經断言，虽然奥軍駐意大利部队基本上已經集中在皮蒙特防御陣地附近，而且还有良好的装备和充分的战斗准备，但是如果利用他們对于还在分散中的敌人的这种暫时的优势，不迅速进入撒丁領土，首先击败撒丁軍队，然后进攻那些必然以几个纵队通过阿尔卑斯山因而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險的法軍，那末，他們还是会犯大錯誤的。我們这个結論，在多少有些名气的、多少了解一些战略的各种評論家之中，遇到了相当多的反对意見。但是很清

① 見本卷第 229—234 頁。——編者注

楚，就这个问题发表文章的一切军事专家都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奥地利将军们的意见也是这样。不过，关于这一点已经谈得很多了。

既然战争已经开始，那末就来看一看双方的兵力对比和取胜的可能性吧。

奥军在意大利有5个军——第二、三、五、七、八军，至少有26个步兵团（每团5个营，其中有1个掷弹兵营）和26个轻步兵营，共计156个营，192 000人。加上骑兵、炮兵、工兵和守备部队，他们的兵力至少有216 000人。我们不知道，在新锐的边屯团和预备兵员开入意大利之后这个数字增加了多少，但是兵力增加这点是几乎用不着怀疑的。不过我们还是以216 000人这个最低数字为准。其中为了防守奥军企图在伦巴第固守的一切要塞、堡垒和营垒，有56 000人就足够了。但是我们按最多需要66 000人计算，那末用来侵入皮蒙特的军队还有15万人。根据某些电讯报道，入侵的奥军为12万人，对这些材料当然是不能全信的。不过，为了防备万一，我们假定它用来作战的至多有12万人，那末同这支兵力充实的军队交战，法军和皮蒙特军队会怎样配置呢？

皮蒙特军队集中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卡萨勒之间，在我们几个星期以前所提到的那个阵地上^①。他们由5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组成，共有基干步兵（包括预备兵员在内）45 000人，猎兵6 000人，骑兵和炮兵将近9 000人，全部共计6万人。这是皮蒙特所能派出作战的最大兵力。其余15 000人要用来执行警备勤务。意大利的志愿军还不能用来和敌人在战场上作战。

^① 见本卷第229—231页。——编者注

我們已經說过，从战略上来看，皮蒙特的陣地不能从南面迂迴，但可以从北面迂迴；然而在北面，皮蒙特的陣地有在卡薩勒以东約 4 英里处流入波河的塞齐亚河作掩护，如果电訊报道可信的話，撒丁軍隊准备坚守該河。

6 万人在遭到占一倍优势的敵軍攻击时，要在这个陣地上进行决战，那是十分荒唐的。根据一切可能性看来，撒丁軍隊将在塞齐亚河上进行一些表面的抵抗，使奧軍暴露全部兵力，然后放棄直通都灵的道路，退到卡薩勒和波河以南。假定英国的外交不使軍事行动再次延期的話，这一行动可能在 4 月 29 日或 30 日发生。到第二天，奧軍将企图渡过波河，如果渡河成功，他們会在平原上把撒丁軍隊驅逐到亚历山大里亚。他們可能让撒丁軍隊在那里停留一些时候。必要时，奧軍纵队将由波河以南的皮阿琴察出动，来破坏热那亚和亚历山大里亚之間的铁路，并攻击由热那亚向亚历山大里亚运动的法軍的任何一个軍。

那末根据我們的推測，法軍在整个这段時間內会采取什么行动呢？当然，他們将仓卒地向未来的戰場——波河上游谷地出动。当关于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的消息傳到巴黎的时候，阿尔卑斯軍团的兵力，駐在里昂附近的有 4 个师多一点，还有 3 个师可能駐在法国南部和科西嘉島，也可能正在集結。此外有 1 个师由非洲开来，現正在途中。这 8 个师应編成 4 个軍；法軍的第一支預备队是駐巴黎的基干师，第二支預备队是近卫軍，算在一起共有 12 个基干师和 2 个近卫师，編为 7 个軍。12 个基干师（每个师在归休兵回队以前計有 1 万人）共有 12 万人，如加上騎兵和炮兵，則有 135 000 人，再加上 3 万近卫軍，总数将为 165 000 人。如把召回的归休兵計算在內，这支軍隊的总数将达 20 万人。目前一切都很順利；这

是一支很出色的军队，并且人数也很多，足以征服甚至比意大利大一倍的国家。他们需要在5月1日或者在这前后到达皮蒙特谷地，但是到那时，他们可能在什么地方呢？麦克马洪军大约在4月23日或者24日已被派往热那亚；但因为事先没有集中，所以在30日以前不能由热那亚出发。巴拉盖·狄利埃军在普罗瓦斯，有一个消息说，该军将经过尼斯和田达山口前进，另一个消息说，该军将乘船出发并在地中海岸登陆。康罗贝尔军必须经过蒙塞尼山口和蒙热涅夫尔山口进入皮蒙特，其余各部队则在先后到达边境后随即沿同样的道路前进。现在我们确实知道，在4月26日以前任何法军部队都没有进入撒丁领土，而巴黎军团中的3个师在24日仍然在巴黎，只有1个师在当天由铁路调往里昂。此外，可以预料到，近卫军出动不会早于27日。这样，假定我们前面列举的其余一切部队都已集中在边境，并准备出动，那末共有8个步兵师，即8万人。其中2万人正调往热那亚；2万人在巴拉盖指挥下，由田达山口进入皮蒙特（只要他们确实是开往皮蒙特）；还有康罗贝尔和尼耶尔指挥的4万人将经由蒙塞尼山口和蒙热涅夫尔山口前进。这便是路易-拿破仑在皮蒙特军队急需他援助的时候，也就是奥军可能在都灵出现的时候，所能握有的全部兵力。同时顺便指出，这一切情况完全符合我们在几星期以前对这个问题所发表的意见。但是，路易-拿破仑即使能控制全世界所有的铁路，也无法在最初几次战斗开始以前把余下的巴黎军团的4个师及时调来，他将不得不任奥军在整整两个星期内对皮蒙特人为所欲为；但即使在两个星期以后，路易-拿破仑胜利的希望也非常小，因为他的8个师这时还分别在两条山道上，而在他们的会合地点则有着至少在数量上与他们相等的敌军。不过，处于他这样地位的一个人，

从政治上說是不能允許敵人在整整两个星期內橫行于皮蒙特的，因此一当奧軍挑战，他就不得不应战，而且将在不利的情况下作战。法軍通过阿尔卑斯山越早，对于奧軍便越有利。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4 月 28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9 年 5 月 12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5634 号

卡·馬克思 金融恐慌

1859年4月29日于倫敦

昨天是外国证券和股票的支付日期，23日开始的交易所的恐慌状况也几乎达到了顶点。从上星期一以来，证券交易所的成员宣布破产的就有28家，其中18家都是在28日发生的。引起破产的債額中有一家达到了10万英镑，大大超过了这种“死刑的执行”通常所要求的平均額。英格兰银行的經理們同时把貼現率从 $2\frac{1}{2}\%$ ——这是1858年12月9日規定的水平——提高到 $3\frac{1}{2}\%$ ，这种由于购买运往印度的白銀所引起的黄金外流而产生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混乱現象更为加剧。利率3%的統一公債在4月2日是以 $96\frac{1}{4}\%$ 开盘的，4月28日就跌到89%，有几个小时甚至跌到 $88\frac{1}{4}\%$ 。利率 $4\frac{1}{2}\%$ 的俄国证券在4月2日按足价开盘，4月28日就下跌到87%。在同一个時間内，撒丁证券从81%跌到65%，利率6%的土耳其公債券从 $93\frac{1}{2}\%$ 跌到57%，虽然后来又回升到61%。利率5%的奥地利证券开盘牌价很低，只有49%。引起本国和外国的有价证券这样大跌价以及随之而来的铁路股票尤其是意大利铁路股票的同样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关于奥地利軍隊侵入撒丁，法国軍隊开往皮蒙特，法国、俄国和丹麦簽訂攻守同盟条約¹⁹⁴的消息。誠然，在这一天，電訊曾报

道說，“立宪主义者报”对法国和俄国签订攻守同盟条约一事进行辟謠。但是，尽管证券交易所的聪明人无疑地具有一切輕信和乐观的秉賦，他們这一次却敢于不相信法国的这些半官方的声明。他們还不能够忘記，只不过在一个星期以前，“通报”曾大胆否认法国在进行武装或者打算武装起来。况且，虽然法国的預言家否认条约的存在，但是他承认，在东西方两位专制君主之間已經达成“協議”，所以，辟謠最多只不过是文字游戏。同破了产的不列顛經紀人一起垮台的还有 1 200 万英鎊的俄国公債。如果当时奥地利沒有突然决定向撒丁发出最后通牒，这批俄国公債是一定会被倫巴特街吞掉的。倫敦“泰晤士报”金融論文的作者辛普森先生对于俄国公債这个肥皂泡是怎样破灭的，发表了如下有趣的意見：

“当前形势中特別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公众摆脱了这次預定要发行的俄国公債。虽然从克里木战争由于我們‘盟国’的影响以及各国皇帝随后在斯图加特的会晤而提前結束的时候起，这个大国的阴谋就已昭然若揭，但是很明显，除了提出完全无可辯駁的证据以外，無論什么警告也不能阻止它得到它所希望的任何数目的款項，只要有一家殷实的銀行肯承担这项交易就行了。因此，在一两个月以前，当取得 1 200 万英鎊的方案提出来的时候，一切有关方面都显得精神振奋和充滿信心。让英国的財主們随意去做吧，他們能够得到的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柏林和其他地方，人們操心的是，想以比在倫敦市場上的售价高一两厘的利息得到这批公債券。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讓他們听取任何警告，那希望是很小的。的确，在这些事情上通常竞争得相当激烈的貝林先生和路特希尔德先生，在这一次并没有表现出想同公債发生关系的任何兴趣。此外，有消息說，在格魯吉亚秘密地集結了 10 万俄国軍隊。还有消息說，俄国駐維也納大使已經公开声明說，拿破侖皇帝关于修訂 1815 年条约的要求是完全公正的；最后，不久以前想要廢除巴黎和約有关多瑙河两公国这部分的努力，康斯坦丁大公在地中海所做的旅行，为了使考萊助爵的和平使命遭到破产而作的巧妙的安排，——这一切可以料想得到已經足以引起波动了。但是，無論什么也不能影响抱着乐观情緒的英国存款人，他們

貪恋一切能使他們得到利率 5 % 收入的証券,对那些危言聳听之徒鄙視到极点。所以,負責推銷公債的那些人的希望不会减少,事实上就在奥地利提出最后通牒的消息发出以前一两天还开过最后几次會議,为随时宣布发行公債做好一切准备。只要法国的‘通报’最后再作一次安定人心的保证,重申以前已經做过的关于法国没有进行武装也不打算武装起来的保证,就算万事大吉了。但是,不願意坐待它的敌人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全部东西的奥地利采取了一个‘罪恶’的步驟,結果事情完全搞糟了,这样一来,为数 1 200 万英鎊的款子現在仍旧不得不留在英国了。”

在巴黎,金融市場上的恐慌状况以及随之而来的破产現象,当然要比倫敦交易所的混乱現象厉害得多。但是,剛剛通过自己在立法团中的奴僕为自己表决了发行 5 亿法郎的新公債的路易-拿破侖,严格禁止在报刊上对这些不利的事件作任何报道。不过,看了下面我从官方的行情通报上摘来的这个表以后,我們就能够对当前形势作出一个正确的估計:

	3 月 24 日		4 月 7 日		4 月 28 日	
	法郎	生丁	法郎	生丁	法郎	生丁
利率 3% 的无期公債.....	69	20	67	95	62	00
法兰西銀行的股票.....	2 865	00	2 840	00	2 500	00
Crédit Mobilier 的股票...	805	00	707	50	530 至 542	00
奥尔良铁路股票.....	1 368	00	1 257	50	1 150	00
北部铁路股票.....	940	00	915	00	835	00
东部铁路股票.....	682	00	627	50	550	00
地中海铁路股票.....	850	00	830	00	752	00
南部铁路股票.....	523	00	503	75	412	50
西部铁路股票.....	600	00	537	50	485	00
日內瓦铁路股票.....	540	00	520	00	445	00
奥地利铁路股票.....	560	00	536	25	406	25
維克多-艾曼努尔铁路 股票.....	400	00	390	00	315	00
倫巴第一威尼斯铁路股票...	527	50	512	50	420	00

英国金融界的聪明人现在对不列颠政府非常愤恨，指责它使自己成了欧洲外交界的笑柄，更重要的是，它由于固执地无视事实和考虑不周贻害了商界。的确，得比勋爵在演这出谈判喜剧的全部过程中都让法国和俄国把他当足球一样踢来踢去。他并不满足于已往接连不断地失策，在得到奥地利提出最后通牒的消息时，他又上了同样的当。他在伦敦市长家中进午餐时把奥地利最后通牒痛斥为“罪恶的”，可是甚至在当时，他对俄法条约也是一无所知。他那个自以为奥地利不可能不接受的最后的调停建议，只不过是一个竞选诡计，它只能有一个结果，就是再给波拿巴 48 小时的时间去集结军队，阻碍奥地利必然要采取的行动。这个骄傲的贵族的外交洞察力不过如此而已，而他还在反抗议会的民主改革¹⁰⁵，说什么这种改革会从世袭政治家的老练的手中把对外政策的领导权夺去。最后我要指出，托斯卡纳和各公国¹⁹⁵的起义为奥地利占领这些地方提供了理想的借口。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4 月 29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9 年 5 月 12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634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馬克思 甜言蜜語

4月27日路易-拿破侖通过他的外交代表送交欧洲各国政府的照会,以及5月3日他向自己的立法团发出的呼吁表明,这位皇帝完全明白,干涉意大利事务的动机和最終目的遭到了多么普遍的怀疑,他正竭尽全力来消除这些怀疑。在照会中,他力图证明,在干涉的問題上,他一直不过是按照英国、普魯士和俄国的意图行事的。他把事情說成这样,好像所有的大国都和他一样不滿意意大利的現狀,同样都相信由于那里流行的不滿和进行的秘密鼓动而造成的危險,都在同样程度上力图通过明智的預防措施来防止不可避免的危机。但是,当他举出考萊勋爵前往維也納的使命¹⁹⁶、俄国提出的召开大会的建議和普魯士对这些措施的支持作为证明时,他显然忘記了,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决不是意大利,这些措施的目的和促使采取这些措施的动机,是奥地利和法国之間已經形成的决裂,同这种决裂比較起来,意大利的不滿和騷动就无足輕重了。

只是由于拿破侖对意大利事务突然表现出特別的兴趣,才使其他欧洲大国把意大利問題看得異常重要。虽然奥地利首先开始了軍事行动,但是确定不移的事实是,如果撒丁沒有受到拿破侖的唆使(無論普魯士或英国都沒有参加这种唆使),并且随后又采取

了一些步驟，那就沒有任何根據可以設想，軍事行動會開始。其實，法國根本沒有協同其他大國一起來友好地調解奧地利和撒丁之間的糾紛；一個無可諱言的事實是：只是在法國實際上已經卷入這一衝突的時候，其他國家才認為有必要較認真地關心這件事，並且已經不再把它當作意大利問題，而是當作全歐性的問題來看待了。只有法國一個國家感到自己負有使命來捍衛撒丁以反對奧地利的進攻，正是這個情況反駁了那種企圖硬說法國在意大利問題上同其他大國步調完全一致的意見。無論是在這份照會中，或者是在向立法團的呼喚中，法國皇帝都特別堅決地否認他個人有任何虛榮心，有任何占領欲，有任何在意大利確立法國勢力的願望。他想使人相信，他只是致力於確立意大利的獨立和恢復由於奧地利的優勢而遭到破壞的均勢。誰記得法皇所作的聲明和他在當法蘭西共和國總統時所立的誓言，誰就未必會盲目地相信他的一紙宣言；甚至連他的這些安定歐洲的恐懼情緒和消除歐洲的懷疑的企圖，也包含着在很大程度上指望產生相反效果的暗示。

誰也不會懷疑，路易一拿破侖現在真心希望防止英國和德國對他的反奧戰爭的任何干涉。但是，這遠遠不足以證明，他只是力圖解決意大利問題。我們假定他是力圖稱霸歐洲。在這種情況下，他當然寧願一個一個地對各個大國作戰。他對籠罩着德國某些邦的激昂情緒感到驚異，雖然引起這種激昂情緒的仍然是他用來解釋他急于幫助撒丁的那些原因。

如果說法國和撒丁接壤，並且由於已往的傳統、共同的起源和不久前締結的聯盟而和撒丁聯繫在一起，那末在德國和奧地利之間也存在着同樣的，甚至是更密切的聯繫。如果拿破侖不想坐待自己有一天不得不面對奧地利戰勝撒丁的既成事實，那末德國人

也不打算眼看着让法国彻底战胜奥地利成为既成事实。至于路易-拿破侖力图侮辱奥地利，至少力图把奥地利从意大利驅逐出去，这一点他是不否认的。誠然，他否认有任何占据意大利領土或在意大利获得势力的意图，他宣称，战争的目的旨在恢复意大利的独立，而不是要强迫它更換主子。但是請大家設想一下这样一种情况：当有人打算恢复各意大利政府的对奥独立的时候，而那些被路易-拿破侖說成是“騷乱的煽动者和旧集团的不可救药分子”的人却要去惊扰——看来定会发生——这些政府。

那时会怎么样呢？

路易-拿破侖說道：“法国表示了它对无政府状态的憎恨。”

按照他的声明，他之所以享有現在的权力，正是归功于这种对无政府状态的憎恨。他把这种对无政府状态的憎恨作为一种理由，用来替自己解散国民議会、違背自己的誓言、用武力推翻共和政府、取消一切出版自由、把所有反对他的絕對专制的人加以放逐或发配到凱恩去的行为辯护。扑灭无政府状态在意大利是否也能同样好地为他效劳呢？既然“对騷乱的煽动者和旧集团的不可救药分子的镇压”证明取消法国的自由是正确的，难道这就不能同样作为取消意大利独立的漂亮借口嗎？

卡·馬克思写于 1859 年 5 月 6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作为社論載于 1859 年 5 月 18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639 号

卡·馬克思

奥地利、普魯士和德国

对战争的态度

1859年5月10日于維也納

战争的来势看起来是那样凶猛，而进程却很缓慢，这使維也納公众产生了不耐烦和失望的情绪，于是政府只得在首都的所有墙壁上张贴下面的通告：

“奥地利报纸所发表的一切有关帝国军队调动的消息，完全有可能在几小时内就为敌人获悉并加以利用，因此我们有责任在向公众作所有这类报道时持最审慎的态度。根据最近的消息，帝国军队占领了波河和塞齐亚河之间的阵地，它可以作为进攻的基地。塞齐亚河上的一切渡口都在帝国军队的控制之下，虽然波河水势继续上涨，使帝国军队无法把足够的兵力调到右岸去，但是龐特庫罗涅和沃格拉之间的地区仍有帝国军队重兵把守；同时瓦兰察附近的铁路桥梁已被我軍炸毁。”

不言而喻，奥地利政府多少有些惶惶不安地在注视着意大利各小国中的局势。陆军部发表了下列有关这些国家军事力量的材料。

托斯卡納。 4个基干步兵团，每团2个营，每营6个连，共6833人；1个猎兵营，由6个连组成，共780人；1个海島猎兵营，780人；若干志愿猎兵营，共2115人；1个老兵营，320人；1个惩戒队，150人；2个龙騎兵连，共360匹马；1个炮兵团，由8个连组

成，每連 6 門炮；1 个岸防炮兵營，計 2 218 人；1 个宪兵團，1 800 人。加上相应的司令部、工兵、水兵等等，共 15 769 人。

帕尔馬。 禁卫軍、執戟兵和响导兵，共 179 人；2 个基干營，1 个猎兵營，共 3 254 人；1 个炮兵連，84 人；工兵 14 人；4 个宪兵連，共有 417 人；加上司令部、指揮人員、教导队和工役連，共有 4 294 人。

摩地那。 4 个基干團，每團只有 1 个營，共有 4 880 人；1 个猎兵連，120 人；3 个龙騎兵連，共 300 人；1 个六門制野炮連，150 人；1 个十二門制岸防炮連，250 人；1 个工役連，130 人；1 个工兵連，200 人；此外，还有若干数量的老兵、執戟兵等等，共有 7 594 人。

圣馬力諾。 这个小共和国的軍隊共有 800 人。

羅馬。 2 个瑞士步兵團(第三个團目前正在建立)，共有 1 862 人；2 个意大利團，人数同前；2 个駐地固定的營(相当奇怪的兵種)，共有 1 200 人；1 个龙騎兵團，670 个騎手；1 个炮兵團，由 7 个連組成，每連 4 門炮，共有 802 人；宪兵 4 323 人；加上司令部、工兵等等，共有 15 255 人。

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島。 4 个瑞士團、2 个那不勒斯近卫擲彈兵團、6 个擲彈兵團、13 个步兵團、1 个有若干后备連的馬枪兵團，共計 57 096 人；12 个猎兵營，共 14 976 人，再加上若干后备連，共 16 740 人；9 个騎兵團，2 个重龙騎兵團，3 个龙騎兵團，1 个馬枪兵團，2 个枪騎兵團，1 个猎騎兵團，共有 8 415 个騎手；2 个炮兵團，每團有 2 个野炮營和 1 个攻城炮兵營，或者說每一个團有 16 个共有 128 門火炮的野炮連和 12 个攻城炮兵連，連同輜重隊共有 52 000 人。再加上執戟兵、工兵、响导兵，禁卫軍等等，总計

130 307 人。

那不勒斯舰队包括 2 艘有 80 門和 84 門火炮的战列舰，50 艘有 10 門火炮的帆力巡航舰和 12 艘有 10 門火炮的蒸汽巡航舰，2 艘帆力輕巡航舰和 4 艘蒸汽輕巡航舰，2 艘纵帆船，11 艘不大的輪船，10 艘臼炮舰和 18 艘炮艇。

奥地利政府多少預見到了托斯卡納事件¹⁹⁵，因此，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已經估計到了这些事件。但是真正使它担心的倒是普魯士政府所采取的漠不关心的、犹豫不决的和毫不友好的立場。普魯士政府在进行武装，因为輿論的坚决要求迫使它这样做，但同时可以說，它进行的外交活动又在解除这种武装。讀者都知道，目前普魯士內閣的成員，尤其是外交大臣馮·施萊尼茨，都是屬於那个在德国以哥达党¹⁹⁷聞名的政党的。这个党自我陶醉于一种幻想，以为奥地利的复灭会帮助普魯士建立起一个在霍亨索倫王朝統治下的新德国。这个党假装相信波拿巴外交家們的保证，他們說战争将“局限”在意大利，在南錫建立一个由佩利西埃指揮的法国監視軍，其目的不过是稍稍安慰一下这位“名揚四海的軍人”。en passant〔順便〕提一下，宣揚这种安定人心的論調的那一号“通报”同时还公布了关于在巴黎建造一座洪堡雕像的敕令。这种手法至少表明，在波拿巴看来，用雕像收买哥达党，也像用腊腸收买法国的朱阿夫兵¹⁹⁸一样容易。据一个可靠的消息說，奥地利駐法兰克福联邦議会的全权代表^①提出了一項建議，要德意志联邦表明态度：波拿巴参加意大利斗争是不是对联邦本身的威胁，但是由于普魯士的奸計，議會至今拒不回答这个問題。也許普魯士是对的，它

① 萊希堡，約翰·伯恩哈特。——編者注

抗議大多數德國小邦的《Landesväter》〔“國父”〕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它的企圖，但是，既然這樣，它就應當自己採取主動，自己拿出捍衛德國所必需的办法來。它至今却遵循着完全相反的行動路線。4月29日，普魯士向德意志聯邦各個成員國發出了一份照會，相當堅決地勸告它們要慎重和小心。為了回答這份照會，南德意志各邦政府以意味深長的語調提醒柏林內閣記住一句羅馬名言：《Caveant consules ne quid respublica detrimenti capiat》¹⁹⁹。

它們宣稱，它們相信，嚴重威脅德國安全的時刻已經到來，可以無所作為的時期無疑已經過去。普魯士政府在自己的領地上，找到各種各樣的同盟者。除了哥達黨本身而外，首先還有，宣揚中立的親俄派。其次是一個以“科倫日報”²⁰⁰為代表的，由銀行家、交易所經紀人和商人組成的極有影響的黨派，他們的物質利益從屬於巴黎的Crédit Mobilier〔動產信用公司〕，因而也從屬於波拿巴制度。最後，還有一個冒牌民主派，這伙人裝作對奧地利暴行是那樣的憤慨，以致打算把十二月英雄的政策看成是自由主義。我敢斷言，這派人中的某些人無疑已經被拿破侖的金币收買了，這樁出賣良心的生意的主要組織者住在瑞士，他本人按國籍來說不僅是德國人，而且還曾是1848年德國國民議會的議員和狂熱的激進分子²⁰¹。你們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在維也納這裡人們正警惕地注意着普魯士反中立主義的每一次表現；一位普魯士十字軍遠征史專家弗里德里希·馮·勞麥先生以“普魯士的觀點”²⁰²為題寫的一篇不長的、公開批駁哥達黨理論的宣言被捧上了天。從下面摘錄的幾段文字中讀者可以了解這篇宣言所流露的思想：

“有一派人硬說，普魯士應該保持最充分的獨立自主，既不要受各種事件的迷惑，也不要聽信那些想把德國的政策引上錯誤道路並促使它採取倉卒措

施的人的迫不及待的要求。这派人說，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反对这种倾向；既然德国的大邦之一卷入了意大利战争，那末德国的其他各邦就应该团结在作为德国政治的天然中心的普魯士周围。

不对这些規劝的真正意义加以詳尽的分析，我們是不能随便听信的。首先，硬說普魯士有最充分的独立自主，这是夸大其詞。相反地，普魯士完全正确地作了观察，它探詢过、表示过願望、警告过、劝导过，因为它处于四个强国包围之中，事实上不可能企求充分的独立自主，它要顾及自己邻邦的行动，而又不能牺牲自己的真正使命。普魯士进入大国的行列，不是由于它的疆域，而是由于它的明智、它的决心和毅力。如果缺少这些品质，正如历史所表明的，它就会沦为二流国家，受其他大国的輕視，而且可能还会受其他大国的統治。

整整四个月，外交界在全力同拿破侖第三这样的敌人进行斗争，但是毫无結果，而且彻底破了产。飽經忧患的德国人深刻了解到，荣誉、責任和确保自身的利益所要求的是什麼，他們开始不能忍受，不願意再把虛幻的云彩当成坚固的岩石，这难道不是自然的，难道不值得称赞嗎？

当一切基本条件都已发生变化，而对我們來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已經来到的时候，怎么还能死抱住旧有的观点！既然調停的立場沒有带来什麼結果，那末，可以怀疑，这种立場是否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呢？在法国和奥地利之間的关系这个問題上采取像在法国和土耳其之間的关系上采取的立場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錯誤呢？普魯士持这种虛伪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对德国沒有任何好处，也沒有博得法国人的同情，然而却减少了德国其他各邦对普魯士的好感和信任。

我們再說一遍：沒有德国，普魯士归根到底不能成为一个大国。那种让奥地利听天由命和把一切希望完全寄托在普魯士身上的建議和忠告，无異于断送德国。有人建議：应当仿效美狄亚，把终于感到自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德国切成碎块，扔进女妖的魔鍋里；同时还要它相信外交厨师們会設法把它再拼在一起而使它复活！我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这种公开宣揚和暗中偷运的关于奥地利德国和普魯士德国的理論更荒唐、更缺乏爱国主义和更有害的了，因为正是这一应受譴責的关于某一条把我們祖国弄得支离破碎的分界綫的理論，在1805年傳播得很广，并导向了1806年。

整个德国的利益同时也就是普魯士的利益，而奥地利几百年以来，虽然

有許多缺点、錯誤和失敗，却始終是德國反對斯拉夫人、土耳其人和法國人的支柱。再過幾個星期，意大利戰爭中決定性的轉折必然要到來。如果拿破侖把萊茵河左岸當作將來的自然疆界以誘惑法國，而要求普魯士根據巴賽爾和約表示同意，德國是否能在幾個星期內就準備好呢？

直到現在總是謹慎有餘，預見不足；事件趕過了一切等待時機的人，使他們忘記了一句精辟的古老諺語：‘失去時間就是失去一切！’”

為了不錯過郵政班期，我把關於這個歡樂而淳樸的城市的商業恐慌和人民運動的情況的某些看法推到下一次再來敘述。

卡·馬克思寫於 1859 年 5 月 10 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 1859 年 5 月 27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5647 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弗·恩格斯 战 争

拿破侖第三在5月11日由馬賽乘船到达热那亚，他将在那里担任法軍总指揮，据说那里已經准备用特別隆重的仪式来迎接他。他在軍事上的功績是否能同他在外交上的不可爭辯的輝煌胜利相提并論，这是一个問題，也許，我們不久就会有充分的材料來說明这个問題。但是到現在为止，用以证明他的战略才能的唯一证据是他的克里木作战計劃，这个計劃的基本原則陈旧过时，是毕洛夫軍事学派的東西，至于毕洛夫，大拿破侖曾指出，他的学說是失败的学說，而不是致胜的学說²⁰³。

不容爭辯，法国皇帝是带着巨大的精神胜利进入意大利的。他由于更狡猾更詭詐而逼使奥地利負起宣战的重責以后，又僥幸地亲眼看到，奧軍在沒有实际行动的两星期內失去了他們在实行这个重要步驟时所凭借的唯一优势。奧軍沒有利用自己数量上的优势和迅速的运动在法軍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击潰皮蒙特軍隊，坐失了良机，以致現在同它对敌的联軍在兵力上完全同它相等，并且日甚一日地胜过它。奧軍将不但不能采取攻势并乘胜前进，而且甚至很可能要迅速地被迫放棄米兰，向明乔河綫退却，在那里，他們将只限于采取在大型要塞掩护下的单纯防御行动。这样，路易-拿破侖由于他的敌人犯了巨大的、几乎是无法解釋的錯誤，而掌握

了优势，并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他的统帅生涯。他的福星如今依然高照着。

战争的最初两个星期，对奥地利来说是一段单调然而有趣的经历，同关于法国国王的有名的讽刺诗所描写的情形非常类似。4月29日，奥军前卫没有遇到什么重大抵抗就渡过了提契诺河，第二天，主力部队便紧随着过了河。根据奥军向阿隆纳（在马乔列湖旁）、诺瓦拉和维吉瓦诺方面的最初的调动情况来判断，奥军似乎要向韦尔切利和都灵大道进攻。5月1日或者2日晨奥军占领韦尔切利这一行动，以及从瑞士发来的关于入侵的军队集中在塞齐亚河岸的电讯，似乎证实了这个看法。但是这一进攻看来只是佯动，其目的是在提契诺河和塞齐亚河之间的所有地区索取军税，并破坏皮蒙特和瑞士之间的电报通讯。进攻的真正目的已为居莱将军的战报所指出，从战报中显然可以看出，科佐和坎比奥是主要的集中地点，5月2日傍晚他的大本营是在洛美洛。因为上述第一个地点位于塞齐亚河和波河汇合处附近（稍偏东），第二个地点位于波河河岸，博尔米达河与波河汇合处稍东的地方，第三个地点则较靠后方，但与前两者的距离相等，所以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奥军正在从正面进攻配置在波河彼岸从卡萨勒到亚历山大里亚一线而以瓦兰察为中心的皮蒙特阵地。在以后经由都灵所获得的报道中可以知道，5月3日奥军在坎比奥附近的波河上架了桥，并向波河南岸托尔托纳方向派出了侦察队；同时，他们几乎对皮蒙特阵地的整个正面、特别是在瓦兰察附近进行了侦察，在某些地方还与敌人进行了战斗，企图使敌人暴露兵力。此外还听到一个消息：奥军有一个军由皮阿琴察出动，正沿波河南岸直趋亚历山大里亚，不过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但是由于在坎比奥附近的波

河上架了桥，因此这个运动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5月5日前的战况便是这样。那时奥军机动的特点是极端的缓慢和谨慎，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此以后情况也一样。由提契诺河到波河的瓦兰察，大概不超过25英里，也就是两天正常行军的路程，因为军事行动是在4月29日开始的，所以全部入侵的奥军本应在5月1日中午就集中在瓦兰察的对面。前卫也能够同一天完成侦察任务，而在夜间，奥军便能够下定次日展开决战的决心。由于我们手头仅有万德比尔特邮局送到的消息，因此我们和以前一样，仍然无法解释目前所发生的行动迟缓的现象。但是情况迫切要求奥军迅速行动，同时居莱将军作为指挥官享有果断、勇敢的盛名，因此我们自然设想到，他们是由于意外的情况而不得不采取这种慎重的行动的。是否他们原来有过经由韦尔切利前往都灵的计划，而只是由于以后接到消息，知道法军大量兵力到达热那亚，使这个迂迴机动有了危险，然后才取消了这个计划呢？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和皮蒙特军队到处截断和堵塞道路这种情形有关呢？或者是由于居莱将军（他作为总司令所具有的才能，目前人们还完全不了解）受了他必须指挥的庞大部队的牵累呢？所有这些问题，很难答复。不过，观察一下另一方占领的阵地，就可能对情况多少有一些了解。

在奥军连一个兵士都没有越过皮蒙特疆界以前，法军已经开始大量进入皮蒙特。4月26日，第一批部队到达了热那亚；同日，布阿将军的师通过了萨瓦，越过了蒙塞尼山口，而于4月30日到达了都灵。在这一天，亚历山大里亚已有24000名法军，而在都灵和苏扎则约有16000名。从此以后，法军源源不断地开来，但是到达热那亚的法军兵力远比到达都灵的要多。他们由这两个地点继

續前进到亚历山大里亚。这样調到前綫去的法軍，数量当然不能确定，但是根据我們将在下面指出的情况来判断，无疑，到5月5日他們的数量看来已足以保证联軍守住陣地，并阻撓奧軍在韦尔切利附近迂迴他們的陣地。联軍原来的計劃是：以皮蒙特軍隊的主力 and 可能由热那亚調来的法軍部队扼守波河沿岸从亚历山大里亚到卡薩勒这一綫，而以皮蒙特軍隊其余的兵力（薩瓦各个近卫旅）会同經過阿尔卑斯山調来的法軍扼守多腊-巴尔特亚河从伊符雷到基瓦索这一綫，并以此掩护都灵。因此，奧軍向多腊河一綫发起任何进攻，都可能遭到来自卡薩勒的皮蒙特軍隊的側击，而不得不分散兵力，以致使进攻归于失敗。虽然如此，联軍的陣地只适于作为临时陣地，并且实质上是一个不好的陣地。这一陣地由亚历山大里亚到伊符雷，长约50英里，有一个凸角和一个凹角；虽然这一陣地提供了側击的可能性，从而大大加强了陣地本身，但是这样长的一条战綫毕竟使敌人极便于进行佯攻，而且在这一陣地上不能組織有力的抵抗来对付敌人坚决的进攻。一旦奧軍占領了多腊河一綫，并用少量兵力在一定時間內抵住了側击，胜利的奧軍就能够自由地轉到波河的任何一岸，并以优势兵力逼使亚历山大里亚地区的敵軍退到該要塞的炮火掩护之下。如果奧軍在战争开始的最初两三天內奋力作战，以上这一切是很容易实现的。那时法軍还没有集中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卡薩勒之間，还不能威胁奧軍的行动；但是在5月3、4和5日，形势改变了；到达这一陣地的以及不断由热那亚調来的法軍，数量似乎已經相当龐大，足以使防守这个陣地的兵力大約增加到10万人，其中有6万人可以用来經過卡薩勒发起进攻。至于这个数量的兵力被认为足以掩护都灵，是間接地由以下事实证明的，这就是說，还在5月3日，无论是法軍部队

或者是撒丁部队，就都已经由多腊河一线前进到亚历山大里亚。可见，奥军行动的迟缓使联军得以安然地完成了这个危险的机动——把兵力集中在亚历山大里亚阵地。这样，奥军的进攻便失去了任何意义，而联军却获得了我们所说的精神胜利。

到目前为止，奥地利将军先后似乎至少根据三个不同的作战计划行动过。看来，在最初渡过提契诺河时，他企图直抵韦尔切利和多腊河；以后当他知道法军大量兵力到达了热那亚，认为在卡萨勒附近进行侧敌行军过于危险时，就改变了进攻方向，转向洛美洛和波河；最后，他再次改变自己的意图，完全放弃了进攻，而在塞齐亚河上设防坚守，等待联军到来以便交战。诚然，关于奥军移动的消息，我们掌握得非常少，因为这些消息差不多都是取自法国和撒丁的电讯，但是奥军主力长时间没有活动，先头部队在5月5日到11日这一段时间进行的各种机动又是无关紧要、而且看来是犹豫不决的，从这一切情况中我们似乎只能得出上述的结论。

如果联军的进攻将因为某种事故再推延几天，我们很可能看到奥军又一次改变战略——甚至会不战而退向提契诺河，因为居莱的军队不能毫无活动地长久停留在疫病流行的沼泽般的稻田地区（根据最近我们得到的消息，他的军队正配置在那里），他们只有抱着非常不可靠的成功希望去冒险进攻，或者转移到对健康危害较少的地区占领新的阵地。但是，应当预料到，联军方面很快就会发起进攻和展开会战；我们很可能在最近的邮件中接到这个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我们得自维也纳的消息所报道的，那就无怪乎海斯——奥军总司令居莱的最可能的继任者——不赞成居莱的作法。我们几乎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如果奥军不在当前的会战中取得胜利，那末不必等到战争的第一个月结束，他们将会有

一个新的总司令，而这在奥地利军事史上也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5 月 12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5 月 23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43 号

卡·馬克思 維也納要聞

1859年5月14日于維也納

普魯士維利森將軍（另一個同姓的普魯士將軍的弟弟。這位將軍以其在軍事科學方面的著作²⁰⁴獲得了某些聲望，但由於對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戰爭的指揮又失去了這些聲望）顯然是奉柏林之命到這裡來會晤正在返回普魯士途中的昏庸的普魯士國王和王后^①。據說，他的真正目的有兩個。第一，要求奧地利停止它在法蘭克福議會中的陰謀活動，因為普魯士不願意服從以徒有其名的德意志聯邦為掩護來進行活動的維也納內閣的操縱。第二，給以這種方式送上的苦藥丸裹上一層糖衣，即肯定地保證說，普魯士已經堅決決定進行“武裝調停”。這個含糊的名詞可以作如下的解釋：普魯士先在本國整頓好秩序並使自己全副武裝起來，然後再向波拿巴提出一些新的和平建議，在這些建議遭到拒絕後便把自己的劍扔到秤盤上²⁸⁶。在得知這一重要消息的同時，奧地利政府通過伯爾尼获悉，俄法條約¹⁹⁴除了還不知道的秘密條款之外，責成法國把軍事行動限制在符合它公開宣布的解放意大利的目的範圍內，而俄國則答應一旦德意志聯邦真正開始干預鬥爭，就把為數不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和伊麗莎白。——編者注

少于 30 万人的军队开出自己的国境。

这里可以听到人们对居莱将军的过时战略的纷纷埋怨，甚至还流行着他要去职的传闻，而且据说海斯将军已被提名为他的继任者。但是，看来还不会采取这样的步骤，因为库恩上校（他是奥地利总参谋部最杰出的军官）已被派去加强以优柔寡断为其特色的居莱的领导。居莱本人是马扎尔人，1798 年 9 月 1 日生于佩斯。16 岁时以少尉军衔加入他父亲指挥的步兵团，之后被调到骠骑兵团，1827 年 9 月成为帝国枪骑兵少校。此后不久，升为第十九步兵团团长。1837 年获少将军衔并担任圣漂尔顿旅的旅长的职务。1845 年指挥维也纳第三十三步兵团；1846 年获得次帅的称号并以师长和总司令的身分被派往的里雅斯特。在这里，1848 年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他亲自负责统率海军之后，革除了有嫌疑的意大利军官和水兵，把军舰安全地停泊在达尔马威亚沿岸的各个基地，并救出了几艘正开往威尼斯的军舰²⁰⁵。他下令在的里雅斯特、波拉、皮腊诺和沿岸其他重要据点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加强了受到起义威胁的边境，并准备了在内地各省援兵开到后于 1848 年 4 月 17 日由炮兵总司令努根特伯爵实行的进攻。居莱所组织的橈桨舰队配合了沿岸军队的活动。5 月 23 日，皮蒙特舰队出现在的里雅斯特前面，但是，由于居莱预先有准备，这支舰队不得不在相当远的地方行驶。舰队企图偷袭位于圣巴尔科拉的一个边远的炮垒，也遭到失败。皮蒙特舰队在 6 月 8 日对的里雅斯特进行了最后一次袭击，但是在确信居莱防范严密之后，便于 7 月 4 日离去，而经过库斯托查一战，舰队就完全撤离了亚得利亚海。由于这些功绩，居莱获得了皇帝颁发的各种勋章和的里雅斯特市政府授予的荣誉公民称号。1849 年 6 月初他被任命为奥地利陆军

大臣之后，據說，他表現得很勤勉很干練。占領腊布²⁰⁶的時候，他是皇帝的侍從官。當他回到維也納自己的部里以後，由於得到了阿契戰敗²⁰⁷的消息，就立即從維也納趕到科莫恩，以便在那里採取必要的措施。不久以後，他被派去巡視帝國全境并向弗蘭茨-約瑟夫提出自己的報告。1850年7月他由陸軍大臣職務調任米蘭第五軍的指揮官以後，被提升為炮兵總司令並獲得金騎士勳章。拉德茨基退職後，他獲得了第二軍的指揮權，他現在正帶領這支軍隊去反對皮蒙特。居萊是奧地利的那些按出身來說大多數是斯洛文尼亞人或馬扎爾人，並由於鞭笞婦女及其他卑劣暴行而聲譽敗壞的將軍之一。

維也納志願軍的兩個營已經開赴戰場，第三個營今天也出發了。這些身穿1848年**大學生軍團的士兵**²⁰⁸的制服和**歷來屬於城郊貴族階層的志願軍**，起初是舉世矚目的風頭人物。為他們舉辦了數不清的舞會、音樂會以及戲劇表演，甚至連奧地利圓舞曲的奧菲士——施特勞斯先生在自己極不愛國的彼得堡之行前也創作了一首新的進行曲獻給他們。但是，不能否認，最近以來這些初露頭角的軍人的聲譽已一落千丈了。這些城郊的粗野漢耽于啤酒和雪茄煙，他們對於女性過分放肆無禮，往往甚至超出了維也納式“幽默”的範圍。他們是什麼樣的人，這從他們的一首心愛的歌曲中可以看出：

«Ich bin ein ächter Wiener,
Führ ein lustiges Leben,
Und da hat mich mein Vater
Zu den Deutschmeistern gegeben;
Deutschmeister ist ein

Gar lustiges Regiment,
Hält in der einen Hand den Säbel,
In der andern das Ciment».

（“我是一个真正的維也納人，我喜愛愉快的生活，因而我的爸爸把我交給了德國騎士團；騎士團是一個愉快的團隊，一手拿着馬刀，一手拿着戚明特。”）

應該說明一下，戚明特是一種容量極大的啤酒杯。

這些“自由而愉快的”人的英勇行為之一發生了相當嚴重的轉變，因而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報刊的嚴正申斥。我們這批朋友的兵營設在薩爾茨格里斯街，這條街和通往兵營的各條街一樣，主要居住着猶太人。從加里西亞到維也納來辦事的猶太人通常也羈旅於這些相當污穢的地區。有一天晚上，當這些游手好閑的英雄們從“施佩爾”^①（在那裡曾公開為他們舉行了盛會，預祝他們英勇殺敵）回到自己的兵營時，興致勃勃，憧憬着自己未來的業績，突然襲擊了不幸的猶太人。他們搗毀了一些猶太人家裡的窗子，把另一些猶太人打倒在地，把很多猶太人的鬍子剪掉，他們甚至把一個不幸的猶太人扔進了煤焦油桶。他們詢問和他們不相干的過路人：“你是猶太人嗎？”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他們就毫不容情地把他狠狠揍一頓，一面還大聲狂叫：«Macht nichts, der Jud wird gefarn gelt»（“沒關係，猶太人應該挨揍”）。從下述事實可以看出這些維也納游手好閑之徒的崇高情操：有一個15歲的鞋匠學徒，由於招募新兵的中士不允許他參加志願軍而絕望地上吊了。

各個社會階層，從最上層到最下層，在金錢和財政方面都遇到

① 維也納一家有名的咖啡館。——譯者注

了困难。第一，你們大概早已從歐洲報刊上獲悉，皇帝本人已把他珍貴的傳家寶典當了。第二，無論你們拿起哪一家維也納報紙，都必然會看到登在顯著地位的一欄醒目標題：“愛國捐款”。這些愛國捐款或者用作一般軍事目的，或者專門用來組織志願部隊，其數目多寡不定。有的少到只有 2 弗羅倫 12 克勞澤，有的則達到 10 000—12 000 弗羅倫之多。有的地方捐款和更帶有中世紀性的饋贈摻雜在一起，如像武器商捐獻兩支手槍，造紙廠廠主捐獻包裝彈藥的紙張，呢絨商捐獻作制服的衣料，等等。在個人的捐款中被提到（很值得懷疑）的是在小市政官吏和市長的官方壓力下在外省鄉鎮里募集的錢財。但是，一切比較有價值的捐款都有一個特點，即它們不是用任何貨幣，而是用國家債券和國家有息證券的息票交付的。因而，實際上只不過是國家“自掏腰包”。小額硬輔幣從日常貨幣流通中完全消失了，這是財政混亂的最正確無誤和最顯著的徵兆。當官方剛一宣布停止現金支付和準備採取相應的財政措施之後，小額鑄幣，不論銅幣或銀幣，好像魔法棍一揮一樣，頃刻之間就不見了。居民採用舊的原始辦法把大額銀行券按倍數分成小塊，這種辦法曾使在 1848 年訪問過維也納的外國人感到困惑，因為每個持有價值為 1 弗羅倫的銀行券的人都把它剪成他零購物品時所需要數量的小幣。在維也納和外省里，政府企圖制止這種亂剪銀行券的作法，並宣布收稅人和銀行將不收這種剪成小塊的銀行券。對銀行來說，提出這種警告是不合法的，因為 1848 年頒布的一項法律中規定，銀行應該收這種小塊的銀行券。這項法律直到現在還有效，在銀行里甚至還有統計這種小塊銀行券的一整套方法。非官方的聲明說，在流通中有 2 800 萬弗羅倫小額鑄幣，這個數目似乎超過了實際需要的一倍。為此，當局

“决心以最严厉的办法来对付当前造成輔币不足的毫无意义的投机行为”。

当然，类似的关于小額鑄币綽綽有余的臆測，决不能弥补这个必需品的显而易見的缺乏。

当局應該了解，銀币票面价值的补加費急剧地增长了，甚至对于銅币，这一差額也达到了 10%。因此，农民到处都把一切能发出金屬声音的东西藏到錢罐里。波希米亚和下奥地利的总督向民众重申了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凡是进行銀币和銅币投机买卖的人处以 50 弗罗倫的罰金，甚至更重的懲罰，但仍然是枉費心机。这种懲罰措施不会有任何結果，而如果在采取这种措施时还发表一些像登載在“維也納日报”²⁰⁹ 官方消息栏中的官方声明，規定从 6 月 1 日起价值为 6 克劳澤的銀币在倫巴第一威尼斯王国将停止合法流通，那就更不会有結果了。政府到最后将不得不滿足下奥地利貿易局的請求（不管这看起来多么有失尊严），发行票面額为 5、10 和 25 克劳澤的国家紙币以便在零售中流通。

現在我們撇开低級領域即零售中的流通，来看看金融市場和真正商业的領域。我們首先应当指出你們已經知道的阿恩斯坦和厄斯克勒斯大公司于 5 月 5 日宣布破产这件事。他們是首都的主要期票經紀人，銀行不直接貼現的期票的貼現以及各省的工业期票和商业期票的再貼現主要由他們来办理。除了首都的以外，他們手里还集中了匈牙利、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企业主的金融业务。这家公司引以自豪的是它有 80 年的历史，它的老板馮·厄斯克勒斯男爵一人身兼数职：国民銀行行长、駐丹麦总領事、下奥地利期票貼現公司董事长、国营铁路公司总裁、南部铁路經理，等等。总之，除路特希尔德之外，他就是帝国財政方面最有声勢的人物了。

在維也納會議期間，阿恩斯坦和厄斯克勒斯起了显著作用，那时候馮·阿恩斯坦夫人的沙龙是当时政治界和文艺界名人聚会的中心。导致破产（几乎欠下了3 000万元的債務）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巴黎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拒絕支付維也納公司的匯票。在这次破产之后，在維也納證券交易所每天都有成批的公司登記破产。在这些破产的公司中最大的公司有：索洛蒙-康曼多公司、艾达姆股份公司、格·布兰克公司、普列歇尔股份公司、迪耶姆和印格利什公司、伊·弗·加尔特涅尔公司、弗·斯·施米特公司、姆·格莱格尔股份公司、波卡尔尼兄弟公司、莫里茨·科林斯基公司、卡尔·卓列尔公司、阿·基尔什曼公司和其他公司。在布隆、布拉格、賴兴堡、列姆堡等省，許多奥地利公司由于直接受到这一災难的影响而破产了。其中最大的事件是里雅斯特的魯帖罗特股份公司的破产，这家公司老板是普魯士領事，他也是奥地利的劳埃德²¹⁰的經理。在奥地利境外，在布勒斯劳、馬格德堡、慕尼黑、法兰克福有几家大銀行以及加塞尔的借貸銀行和商业銀行破产了。总之，目前的恐慌和1857年秋天在汉堡发生的商业恐慌很相像，并且当时为減輕恐慌而采取的措施²¹¹也成了奥地利政府打算效法的榜样。有关匯票的法律将会放寬一些；国民銀行正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支持那些由于普遍缺乏商业信貸因而只是在短期內不得不停止支付的公司，200万紙币将交給布拉格和布隆的銀行。

卡·馬克思写于1859年5月14日

載于1859年6月6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565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战况沒有进展

我們昨天从“亞細亞号”輪船收到来自战場的最近电訊，报道了5月13日以前的消息，也就是說，比万德比尔特邮局多带来了3天的消息。这些电訊都是撒丁政府发出的一些簡短而又极其混乱的战报，而奧軍却沒有发表关于他們行动的报告。在这3天中，沒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目前的战况同前一时期一样，就其迟緩程度來說，在現代战争史上要算第一位了。我們开始感到好像回到了被拿破侖突然而坚决結束了的、場面宏偉但沒有积极行动的、过时的战争的时代。这里，我們看到两支龐大的軍队在长达40余英里的战綫上彼此对峙着，每一方面都可以用10—14万人来作战。一支軍队正在逼近，另外一支軍队正进行偵察，时而向敌人陣地的这一点，时而向那一点謹慎地前进，然后又退回，而第一支軍队却不从他們所占領的地点前进；因此，两軍現在相距大約8英里到20英里。

誠然，某些事实能够給予这种不正常的現象以合理的說明，但是这种現象仍然是不正常的，这正是由于进攻一方在战争开始时所犯錯誤的結果。我們已經說过^①，奧軍侵入皮蒙特的目的和任务已由于奧軍运动的迟緩无力和犹豫不决而不能实现，这大概只能

^① 見本卷第366—370頁。——編者注

归罪于居莱將軍的优柔寡断，而不能归罪于其他。从那以后所得的消息完全证实了这个看法。奥地利人对于自己军队这种离奇的行为沒有給予任何說明，这显然证明，他們把責任完全归之于总司令。的确，直到战争开始一星期以后，奥軍战报才談到天气恶劣和各地洪水泛濫的情形，指出这就是迫使他們的將軍不得不把部队从波河河谷瘡疾流行的沼澤般的稻田地区开拔出来的原因。而現在，本报消息灵通的倫敦記者給我們写的报道說，奥皇已与海斯將軍偕行，准备免去居莱的职务，并仿效路易-拿破侖的做法，亲自担任指揮。

根据我們目前所能作出的判断，战争看来是这样进行的：首先，奥軍右翼向諾瓦拉和韦尔切利方向前进，同时在馬乔列湖方向上进行佯攻。中央，并且可能还有左翼，在后面很远的地方沿着平行的路綫通过維吉瓦諾和帕維亞前进。来自帕維亞的纵队主力在5月2日才到达洛美洛。右翼前进的目的，現在知道，第一是用进攻多腊河和都灵的威胁来轉移联軍的注意力，第二是夺取上洛美利納的資源，以供军队的需要。直到5月3日，奥軍主力才开始对卡薩勒和瓦兰察一綫展开进攻；5月4日，对弗拉西涅托（在塞齐亚河与波河汇合处的对面）和瓦兰察方向进行佯攻，这时右翼已向中央靠攏；同时，奥軍在坎比奥和薩累之間的波河上架設了桥梁，并在波河南岸构筑了桥头堡。根据某些报道，奥軍第八軍据說由皮阿琴察沿波河南岸行进，并在那里与主力会合，对托尔托納和沃格拉进行了小規模的进軍，破坏了斯克里維亞河的铁路桥梁，以后渡到了波河北岸。但是根据其他报道（其中包括本报最近的一些电訊），奥軍現在还在皮阿琴察和斯特拉杰拉之間的道路。至于上述这个对沃格拉的进軍，奥軍是否把它作为对諾維以及对热那

亚和亚历山大里亚之间的交通綫进行的一种佯攻,还难以断定。但至少这个进军迷惑了都灵、巴黎和倫敦各报纸大部分有經驗的編輯,以致他們預言在諾維附近的旧战场上,即在馬連峨附近某处将进行决战;但是奧軍撤退到波河北岸和破坏他們架設的桥梁,就立刻否定了这个預言。此外,5月初又开始下暴雨。在帕維亚附近,波河水位漲到10—12英尺,支流的水位也相应上漲。波河河谷的稻田充水,在平时对于行軍的軍隊不是障碍,因为道路設在高于水位的堤壩上,但是現在却由于整个地区和許多道路都被淹沒而成为严重的障碍。同时,奧軍又沒有移动,仍然留在这些沼澤地上,被迫在道路上或者在潮湿的田野里露营。因此,他們在这个洪水中停留了几天以后,便感到迫切需要轉移到比較高和比較干燥的地区。看来,他們由于疾病,特別由于霍乱和瘧疾而受到了严重的損失。結果,奧軍便向摩尔塔拉和諾瓦拉地区退却和集中,这一退却不是敌人面前的退却(因为后者仍然十分安靜地守在他們的陣地上),而是在自然威力面前的退却。以后奧軍便在塞齐亚河上构筑了防禦工事,并把偵察队和粮秣队派遣到联军陣地最左翼的多腊河一綫。

在所有这些行动中,我們沒有看到一个行动可以說明軍事指揮是良好的。实际上,在最初錯过了对联军陣地攻击的有利时机以后,整个向洛美利納的行进都已經完全沒有目的、沒有意义了。奧軍右翼的推进无疑是一个錯誤。不应当把時間浪費在这些假动作上;在敌人兵力还沒有完全集中以前直接扑向敌人,攻击并粉碎敌人——这才是唯一正确的行动計劃。如果貝奈德克將軍的第八軍真是沿着波河南岸前进的話,那末这就是第二个錯誤。因为这样,他和主力就被寬闊的河流隔开,如果雨要早下一两天,就无法在坎比奧附近架桥,奧軍本身便会处于他們曾希望敌人所处的那

种被隔絕的状态中。奥軍似乎是由于必須与貝奈德克会合而不得不渡过河去的。为什么貝奈德克最初不在波河北岸呢？在波河上架桥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行动，使奥軍不得不在对身体极为有害的沼澤地多停留几天，如果采取其他行动，可能就不致如此。总之，整个战争看来进行得不好。奥軍的一切行动都不果断；他們在各个方向都进行佯攻，但是我們却沒有看到过一次真正的进攻。可見，他們沿敌軍全綫摸索前进，一直到最后洪泛区在两个交战軍队中間造成了一个寬約数英里的不可通过的障碍时为止。到那时候，奥軍由于无所事事，但又想表明自己正在采取一种行动，便在多腊河方向进行了偵察。但是所有这些偵察任务都是以兵力不大的机动部队来执行的，他們不能进行有力的攻击，而且一遇到敌人的先头偵察群几乎就得立刻退却。

就这样，奥軍实际上什么也沒有作，而这时他們的敌人似乎也在玩这个把戏。現在法軍已經最大限度地集中在他們占据的这条漫长的战綫上。他們的陣势是这样：最左翼在多腊河和波河一綫到卡薩勒为止，为尼耶尔將軍指揮的法軍 1 个軍（由 2 个师編成）所占領；左翼在卡薩勒附近，配置有皮蒙特軍队 2 个师和在加里波第指揮下的 3 000 人的志願軍；中央在瓦兰察，配置有麦克馬洪將軍指揮的法軍 1 个軍和皮蒙特軍队 1 个师，共有 3 个师；右翼在亚历山大里亚附近，配置有康罗貝尔指揮的法軍 1 个軍和皮蒙特軍队 1 个师，共有 3 个师；最右翼在諾維和阿尔尼亚托附近，配置有巴拉盖·狄利埃指揮的法軍 1 个軍和皮蒙特軍队 1 个师，共有 3 个师；預备队由配置在热那亚的法軍 2 个近卫师組成。假定每师有 1 万人（这个估計数字已經相当高，因为法軍沒有時間召回归休兵，所以每师的人数小于这个数字，而撒丁师的人数則大于这个数

字), 則总数是 15 万人, 这个数字与当时联軍的总人数大致相等。其中有 11 万到 12 万人可以直接参加作战。他們的行动极端消极, 可能一方面是由于法軍准备不够, 火炮和彈药都很少, 另一方面則是由于路易-拿破侖的命令造成的, 他无疑是想亲自来获得战争的最初的荣誉。这个新統帅在 5 月 12 日到达热那亚, 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13 日, 他与国王^① 会見, 后者是为了这次会見而由兵营来到这里的。当天, 他发表了拿破侖式的宣言(宣言見本报另版), 5 月 14 日他就要到軍队里去了。

現在, 雨大概也停了, 不久邮局可能給我們带来有关比較坚决的行動的消息。这种犹豫不决和无所事事的状态不可能繼續太久。或者奧軍将再次渡过波河, 或者在洛美利納进行会战。奧軍可能在寻找和构筑足以击退联軍猛攻的坚固的防御障地。如果他們找到了这样的障地, 那将是他們所能采取的上策, 因为他們不能不战而退, 同时在这样的障地上, 他們能够利用現有的全部作战軍队, 而联軍却会由于在卡薩勒、亚历山大里亚和瓦兰察留下守备部队而减弱。

目前, 交战双方都在等待援軍。奥地利把文普芬將軍指揮的为数 5 万人的 1 个軍派到的里雅斯特及其郊区, 作为它的意大利軍团的預备队; 同时, 路易-拿破侖又組織了两个軍, 編入他的意大利軍团。現在还傳聞, 拿破侖亲王将率領一支杂湊的远征軍, 想要在半島沿岸某处登陸, 以便为自己夺取一个王国。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5 月 16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9 年 5 月 27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坛报”

“紐約每日論坛报”第 5647 号

① 維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編者注

弗·恩格斯 会战终于发生了!

5月25日由利物浦启航于上星期四傍晚通过莱斯角的“华盛顿市号”轮船，给我们带来了比平常更有意思的来自战场的消息。奥军的退却和联军为了夺回洛美利纳的进攻无疑已经开始了，虽然，这一切行动看来进行得并不特别迅速。这可以由以下事实看出来，5月19日奥军大本营转移到加尔拉斯科（提契诺河附近的一个庄园，位于维吉瓦诺到格腊波洛的道路上），到5月24日还在那里未动。但是在波河以南，在蒙特贝洛（斯特拉杰拉到沃格拉道路上的一个小城市）附近，施塔迪昂军的部队和巴拉盖·狄利埃的前卫发生了冲突。根据他们自己的战报，当时联军占绝对优势。到目前为止，本报关于这次冲突只能发表一些极其简短的报道。法军报道说，为数6000—7000人的福雷师（满额时为1万人）和皮蒙特1个骑兵团，对15000人的一支奥军部队，也就是对施塔迪昂的半个军进行了战斗；经过4小时激战，奥军被击退，伤亡1500—2000人，被俘200人，其中有一部分已被押送到马赛，而联军仅损失600—700人。但是，奥军的失败并不很严重，因此联军未能对退却的奥军进行追击。根据奥军的说法，施塔迪昂向波河南岸派出了一支侦察队。这个部队沿沃格拉方向前进到蒙特贝洛时，与数量占优势的法军遭遇，经过激烈的战斗后，秩序井然地

退回到波河北岸。双方战报上的这一分歧，应当认为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在沒有确实可靠的正式报告时，在这类事情中經常都有夸大現象。要想判断战斗的意义及其真正的性质，我們还須等待比較确切的消息。但是無論如何，这仅仅是先头部队的冲突，而不是真正能考驗交战双方军队的力量和統帥才干的那种大規模会战。

戏剧的第二幕无疑就这样开場了，这时倫敦“泰晤士报”和奧格斯堡“总汇报”駐奧軍大本营的記者所提供的极其重要的报道，充实了我們批判地研究第一幕的战斗行动的材料。如果沒有这些通訊报道，对于奧軍的行动，我們就只好根据那些目的本来就不在于說明真情的皮蒙特战报以及几乎毫无內容的奥地利战报来判断了。为了弥补許許多多的空白点，我們在初期除了利用現在在皮蒙特的軍官和各報記者之間流傳的一些互相矛盾的傳說和猜測以外，沒有其他任何材料，——当然，这些傳說是十分不可靠的。同时，因为奧軍握有战争的主动权，并且一直到他們退出韦尔切利为止，仍然保持着这个主动权，而联军則比較被动，所以我們基本上是注意我們完全得不到消息的或者至多只能得到反面消息的那个军队。因此，在一些具体的細节問題上，我們所作出的結論現在沒有为事实所证实，这是不奇怪的。相反，比較奇怪的倒是，我們竟能僥幸地在总的方面正确地預見到战争的主要特点。只在一个要点上，我們与現在所宣布的奧軍原定計劃不一致；但是，这个計劃究竟是像現在所說的那样最初就已經明确制定了呢，还是目前的这个“原定計劃”是以后才想出来的，这个問題还有待查明。

我們最初接到奧軍侵入皮蒙特的消息时曾认为，他們的企图仍然是(过去他們的企图显然总是这样的)在法軍主力尚未开到之

前迅速襲击皮蒙特军队及法军前卫。现在我們得知，奥军早就放棄了这个想法。看来，他們以为法军在4月24日就开始进入皮蒙特了，虽然法军没有一个团是在4月26日之前进入皮蒙特国土的，很可能是这个错觉促使他們放棄了对当面出現的任何部队进行 coup de main〔坚决攻击〕的一切企图。因此，奥军的入侵便失去了迅速的特点，如果他們追求更重大的目的，是会具有这种特点的。这不过是皇帝所規定的军事行动的開始，其目的只是为了占領敌人的一部分領土，夺取那里的资源，并使防御的军队不能利用这些资源。假如目的是这样，那就非常明显，奥军的入侵便应当停止在塞齐亚河和波河沿岸韦尔切利和瓦兰察附近。在这种情况下，匆匆前进便沒有必要了。奥军有步骤地、緩慢地、确有把握地向皮蒙特境内深入。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奥军这种行动方式。奥军沿着由东到西通过洛美利納的两条主要道路运动：一条道路由帕維亚到瓦兰察，另一条由阿比亚帖格腊索到維吉瓦諾和卡薩勒。北面由博法洛拉到韦尔切利的道路，奥军根本沒有利用。前两条道路被从西北流向东南的許多河流截断，其中特尔多皮奥和阿哥尼亚两条河是比較大的。由于桥梁被破坏，道路坍塌的地方很多，而道路两旁的低地不是被水淹沒，便是泥濘不堪，所以军队前进非常緩慢，而为数15—18万人的整个军队都要沿这两条道路运动。因此，现在当我們知道奥军最后一个军在5月1日以后才渡过提契諾河这个消息时，也就沒有什么奇怪的了，因为30 000—35 000人的一个军，带着它的全部輜重，沿着唯一的一条道路运动，它的行军队形通常至少长达12—15英里，即一日行程的距离。而帕維亚到卡薩勒的道路上有3个军运动，由此可見，最后一个军比第一个军迟两天在帕維亚附近渡过了提契

諾河。

前卫是在4月29日于帕維亞附近渡過河的；這是由費希泰提奇將軍指揮的第五軍的一個旅。隨後跟進的是向格腊波洛運動的整個第三軍（由施瓦尔岑堡指揮）。同一天，另外一個軍，即第七軍（由措貝爾將軍指揮）在北面貝雷古阿尔多附近渡過了河，向汉鮑洛前進。30日，第八軍（由貝奈德克指揮）緊隨第三軍在帕維亞附近渡過了河，第五軍（由施塔迪昂指揮）緊隨第七軍在貝雷古阿尔多附近渡過了河。5月1日，第二軍（由利希頓施坦指揮）在帕維亞附近渡過了河。按照這一次序，第七軍在極右翼，第五軍、第三軍和第二軍在中央，第八軍在極左翼，先渡過了特尔多皮奧河，然後渡過了阿哥尼亞河，最後大約在2日傍晚到達了波河與塞齊亞河沿岸。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皮蒙特的關於有大批奧軍部隊通過博法洛拉和阿隆納的報道，是根本錯誤的（加里波第部隊毫無阻擋地向馬喬列湖附近的格腊韦洛納前進，就完全証實了這一點），而且在這些報道中關於貝奈德克將軍率領第八軍由皮阿琴察出動，並作為獨立的縱隊沿波河南岸運動的推測，也同樣是不正確的。相反地，奧軍是沿剛够15萬人的一支軍隊運動的狹窄正面（12英里）前進的。他們尽可能集中地和有步驟地行動，只向自己的兩翼——諾瓦拉、阿隆納地區和波河南岸派出了幾支機動部隊。這種非常有步驟的推進，在我們看來，証明奧軍並沒有完全放棄進攻皮蒙特軍隊的想法。由於皮蒙特軍隊在奧軍到達他們的防綫以前顯然無力進行堅決的抵抗，所以奧軍如果沒有這種想法，便一定不會使部隊擠在這樣狹小的地帶，徒然地在行軍中疲憊不堪。奧軍本可以利用通往諾瓦拉的道路，這樣作沒有任何坏处，只有很大好處，因為在任何情況下，要占領洛美利納和諾瓦列捷，就必須占領韦尔

切利。既然奥军无视这些好处，那末在我们看来，这显然证明奥军大本营仍未放弃在有利情况下以优势兵力在卡萨勒和亚历山大里亚附近攻击敌军的希望。我们认为，奥军无疑将对诺维（连接热那亚、亚历山大里亚和斯特拉杰拉各线的铁路枢纽）进行 coup de main〔坚决攻击〕。为此，奥军于5月2日夜在波河上的科尔纳列附近架设了桥梁，而且贝奈德克将军率领他的第八军通过了该桥。他的行动非常坚决，不到12个小时便占领了沃格拉、斯克里维亚河上的卡斯特努沃，并占领了托尔托纳，破坏了铁路桥梁；如果不是因为下雨，波河水位突然上涨，部分地冲毁了桥梁，而迫使他退却以便与主力保持联系的话，他很可能会决定向诺维挺进。后来，桥梁修复了，全部奥军又重新集中在波河北岸。但是因为天气不好，他们无法停留在被水淹没的低洼的波河河谷；因此，军队便向北移，在加尔拉斯科、摩尔塔拉和韦尔切利之间占领了阵地，利用主力靠近塞齐亚河这一有利条件，在该河以西地区进行侦察并征收粮秣。奥军没有遇到任何重大的抵抗，便完成了这一任务，9日，除韦尔切利外，他们放弃了塞齐亚河西岸，把大本营转移到摩尔塔拉，如我们所指出的，他们在那里停留到19日。在这一期间，他们在贝耳焦伊奥索附近、靠近提契诺河河口的波河上架设了桥梁；并且有1个军（兵力编成不详）在斯特拉杰拉附近占领了阵地，开始在邻近帕尔马公国的南皮蒙特各地征收粮秣。我们猜测，这就是同福雷在蒙特贝洛附近进行战斗的那一个军。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需等待更可靠的消息。看来，撒丁人不久就会体会到与法国结盟的一切好处了。他们的军队将不能编为独立的军，用自己的力量为自己争得荣誉，而不得不分为几个部分，他们的5个师必须分别附属于法国的5个军，当然每个师将完全溶合在法军中，

这样，全部指揮权和所有的荣誉都将完全属于法軍。热那亚及其堡垒和其他的一切都已完全轉入法軍手中，現在，撒丁軍队也将只作为法軍的附屬品而存在。这真正显出了拿破侖解放意大利的曙光呵！虽然在撒丁人对奥軍在洛美利納的暴行和搶掠的非难中，并没有什么意料不到的或者难以置信的东西，但是必須公正地指出：倫敦“泰晤士报”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从奥軍大本营发出的通訊报道对这个事件的說法却不同。根据这些可靠的材料，洛美利納以及倫巴第的农民，对于地主的仇恨远超过他們对于外国压迫者的厌恶。至于洛美利納（原先是奥地利的一个省）的地主，他們大部分是 *sudditi misti* [有双重国籍的人]，也就是說他們既有奥地利国籍，又有皮蒙特国籍。米兰所有的大貴族在洛美利納都有大块的地。他們是皮蒙特人，在內心里仇恨奥地利人；但是这一省的农民，由于同这些貴族对立，所以比較倾向于奥地利。奥軍在洛美利納所遇到的热忱的接待就证实了这一点，同时奥軍的征集物資和摊派捐稅看来也是尽量只限于貴族和那些意大利爱国运动中心的城市，而对农民則尽可能地豁免。这是奥地利所特有的政策，它从1846年以来便一直奉行这样的政策。²¹² 这一政策完全說明了为什么奥軍征集物資虽然归根到底并未超过一般认为是現代战争中正常征集的規模，也还没有达到法軍通常征集的程度，但是皮蒙特报刊却已对此議論紛紛。

弗·恩格斯写于1859年5月24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作为社論載于1859年6月6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5655号

弗·恩格斯 蒙特貝洛会战

“阿非利加号”輪船带来的邮件，对于我們以前所知道的关于这个轰动一时的、被大西洋两岸的波拿巴派报纸这样大肆渲染的会战的情况，只提供了很少一点补充材料。

我們只得到了居莱的报告的簡短的电訊摘录，至于法国和撒丁的許多报道，无非是巴黎和都灵散布的一些謠言而已，并且它們是如此不确切，甚至連参加这次会战的各团的番号都沒有正确地指出。固然，在星期一傍晚“华盛顿市号”輪船到来之后，我們得到了福雷將軍的报告，部分地弥补了資料的不足，但是福雷并没有提出有关奥軍的数量和伤亡的数字。除了福雷师以外，巴拉盖·狄利埃軍的一些部队也参加了这次会战，所以他的报告无疑会說明一些令人怀疑的問題，但遺憾的是，我們从巴拉盖·狄利埃那里什么也沒有得到。不过，在等待比較完整可靠的消息的时候，我們把一切現有的、毕竟还有一定价值的材料作了仔細的对照，并据此提出我們的一些看法。奥軍在得悉法軍拟向帕維亞和皮阿琴察之間的波河一綫运动以后，便在距帕維亞不远的瓦卡里察架設了通过波河的桥梁。由施塔迪昂將軍指揮的一个軍被派到了波河南岸，偵察敌人的这一陣地和意图。他占領了斯特拉杰拉陣地——波河附近的一条隘路，在这里，一个沒有車馬道的亚平宁山支脉一直伸

展到波河，——同时又向沃格拉方向派出了3个旅(15个营，大约有18门火炮，可能还有一些骑兵)。无疑地，奥军在他們行进的道路留下了有力的部队，以保障自己的撤退，而在卡斯泰卓附近，奥军与敌人先头部队遭遇，结果把敌人逐出了該城和蒙特貝洛村。随后，他們便向下一个村庄即向吉涅斯特列洛前进，但是在那里遇到了福雷师的一个旅(即貝雷旅，包括第十七猎兵营、第七十四和第八十四基干团)，于是战斗便具有了陣地战的性质。到这时为止，奥军参加作战的部队显然不多，可能将近一个旅。而法军的增援部队——福雷将军的另一个旅的4个营(布朗沙尔指挥的第九十八团，以及第九十一基干团的一个营)迅速地开来了。这使法军在数量上占了优势。貝雷旅准备好了攻击；它夺取了吉涅斯特列洛，随后经过頑强的战斗又夺取了蒙特貝洛；而奥军在卡斯泰卓附近，即在該地附近的那条小河的右岸，停下来进行了战斗。看来，奥军这时得到了新的增援部队，因为他們击退了法军，使法军混乱地退向蒙特貝洛，当时奥军准备重新冲入該村，但是和維努亚师的部分兵力(第六猎兵营和第五十二基干团)发生了冲突。情况又轉而对法军有利，于是奥军秩序井然地退到了卡斯泰卓，在那里留下了后卫，直到他們的纵队編成行军队形时才撤去。这样，奥军在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并查明了巴拉盖·狄利埃军(該军是法军的极右翼)的位置以后，便毫无阻碍地撤到了波河北岸，他們确信，联军目前并没有向皮阿琴察运动的意图。

当时奥军在战场上的兵力不会多于2个旅，因为至少有3个营必須留下保护道路，并且还有2个营必須在奥里欧罗附近和法军第九十一团的2个营进行战斗，因此那一个团只有1个营在蒙特貝洛作战。在这2个旅、即10个营中，只有一部分能参加战斗，

因为奥地利将军如果把预备队中最后的部队都用于侦察，那当然应当受到极严厉的责备。

法军方面有 3 个团（第七十四、八十四和九十八团）和 1 个基干营（属于第九十一团），此外还有 1 个猎兵营，总共 11 个营，到战斗快结束时，他们又得到第五十二团的 2 个营和第六猎兵营的支援。因此，总的说来，法军用 15 个营对付奥军 10 个营左右的兵力。虽然奥军的营无疑比法军的营大，但在战斗的转折时机，数量上的优势仍在法军方面。此外，不应当忘记，奥军这次作战与其说是为了战胜敌人，不如说是为了迫使敌人暴露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兵力；这个任务，奥军是圆满地完成了。因此，把这个不重要的战斗看作是重大的胜利，那是荒谬的。在两支庞大的军队于意大利平原上对峙的情况下，像蒙特贝洛这样的战斗，并不比规模较小的战争中一般前哨战具有更大的意义。如果说这是胜利，那末战果在什么地方？法军说，他们俘获了 140 个受伤的和 60 个未受伤的俘虏，这个战果并不比他们在夺取某一村庄的两小时战斗中所能够得到的多。此外，他们夺得了一辆弹药车，但是也损失了一辆。他们没有进行任何追击。虽然法军有相当多的皮蒙特骑兵，但是并没有试图获取战果。显然，奥军在最后一次击退了敌人的攻击以后，接着便毫无阻碍地、秩序井然地撤退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5 月 24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6 月 10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5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馬克思

普魯士对战争的看法

1859年5月24日于柏林

法国专制君主所发动的战争，无疑地不仅不可能是政治术语中所指的那种“局部”战争，即战斗行动不应越出意大利半岛，而且相反，这场战争不会局限于两个专制政府之间进行的、由正规军的行动来决定的一般战争的规模。这场战争进一步发展下去将变成一场燃遍欧洲大陆的革命大火，看来，当代的统治者中间有许多人未必能从这场大火中救出自已的宝座和王朝。德国可能成为这一震荡的中心，因为当俄国准备把自己的剑扔到秤盘上去²⁸⁶的时候，德国必定要成为军事行动的中心。用不着多加思考就能得出结论：在战场上的严重失败，将在法国或奥地利引起革命震荡。但是，要找到必要材料来说明德国在不久的将来必须经受的严峻考验有多大的规模，柏林或许是个唯一的地方。几乎用肉眼就可以看出，那些成熟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巨大危机的前提在与日俱增，即使各种庸人恐怕也不会怀疑这种危机。风暴将临的征兆可以用几句话概括如下：德国各邦君主的嫉妒和勾心斗角将使他们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袖手旁观；人民的灾难和愤怒像燎原大火一样燃遍了从维斯拉河到莱茵河的一切地方，在战争的第二阶段不仅会有

外来的进攻,而且还会有人民的灾难和愤激所激起的人民起义;最后还有德国境内斯拉夫族居民的起义,——这在对外战争和革命震荡以外又加上内部的民族间的斗争。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在局势发展终于迫使德国各邦君主采取某种协同动作的时候他们所依靠的社会基础。众所周知,1849—1859年这个时期是德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空前未有的时期。在此期间德国可以说已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就拿柏林这一个城市作例子来看吧。1848年柏林勉强有5万男女工厂工人,而现在他们的总数已达18万人。只拿一个工业部门来看:在1848年以前向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出口羊毛是德国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现在德国加工的羊毛只勉强够本国工厂的需要。同时,随着工厂、铁路、轮船运输和地下资源勘探的发展,信用制度也极其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种信用制度按其规模来说不仅是和工商业的总的进步相适应的,而且由于像从法国剽窃来的 *Crédit Mobilier* [动产信用公司] 之类的经不起风险的发明,它的发展还超出了自己的合法范围。直到现在都占民族大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到1848年革命时依然固守着把现金存放在自己家里的古老的亚洲风俗;现在他们把现金换成了各种类别、各种颜色和各种面额的有息证券。1857年的汉堡危机²¹¹ 稍稍震动了一下这一新出现的繁荣的大厦,但并未使它受到稍微严重的损害,而现在这座大厦却被波河和提契諾河岸边传来的第一陣炮声震坍了。无疑,你们已经获悉,奥地利的商业危机怎样波及了德国的其余地区,在莱比錫、柏林、慕尼黑、奥格斯堡、馬格德堡、加塞尔、法兰克福和德国的其他商业中心,破产是怎样迅速地一个跟一个发生。然而,这些灾难只不过是更高级的“实业”界中行将来临的滔天大祸的征兆。为

了使你們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我认为不妨提醒你們注意一下普魯士政府剛剛发表的公告。普魯士政府在这个公告中指出，在西里西亚、柏林、薩克森和萊茵普魯士成批地遣散工业大軍是危險的，同时宣称，它不能同意柏林、布勒斯劳、施特廷、但澤和馬格德堡的貿易局建議它大量发行币值不变的紙币来进行可疑試驗的請願书，它更加坚决地拒絕仅仅为了使工人就业和掙得工資这个唯一的目的而在公共工程中使用工人。在政府由于缺乏資金而被迫突然停止业已开始的公共工程的时候，后一种要求确实显得有些奇怪。战争剛剛开始普魯士政府就不得不发布这样一个公告，仅仅这一事实就說明了很多問題。除了工业生活所遭到的这种突然破坏之外，再加上整个德国普遍征收新稅，日用必需品价格的普遍上漲，以及由于征召預备兵員和后备軍而引起的一切企业的普遍衰落，你們就可以大致想像到这一社会灾难再过几个月会有多大的規模。但是，大部分德国人民习惯于把人世的灾难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天降惩罚的时期已經过去了。現在可以听到人民在低声但清楚地說：“責任啊！如果 1848 年革命沒有被欺騙和暴力所扼杀，那末，法国和德国就不会重新互相武装对峙了。如果德国革命的殘酷的扼杀者不向什么波拿巴或什么亚历山大低下自己的戴皇冠的头，那末，甚至現在也不会有战争。”这就是人民的喃喃怨言，这种怨言将逐渐汇成隆隆的雷声。

現在我們来看看德国各邦君主向很不耐煩的观众所表演的那出戏吧。从 1 月初起，奥地利內閣就玩弄种种外交阴谋，想促使德国各邦把一支龐大的、主要由奥地利兵力組成的联邦軍队集中到南德意志的某一地点，而且这种集中一定要威胁到法国，使其东部边境有受到攻击的危險。这样一来，德意志联邦必然会卷入一場

进攻战中，而奥地利也会稳有把握地把这场战争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5月13日以汉诺威的名义向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提出的这种性质的决议案，遭到了普鲁士全权代表馮·烏澤多姆先生的反对，他宣读了自己政府的正式抗议。这样便引起了南德意志各邦君主的爱国主义愤懑的总爆发。于是，普鲁士便采取了一些相反性质的措施作为对自己这些行动的补充。

在议会解散之前，普鲁士政府为自己取得了广泛的声誉，因为它宣布决定坚持“武装调停”的政策。但是，议会刚一解散，这种“武装调停”的规模就大为缩小，变成普鲁士不顾法国和俄国的要求而拒绝宣布自己中立。这种出尔反尔的勇敢，虽然足以引起彼得堡宫廷的盛怒，但却绝不符合普鲁士人民的期望。武装西部和东部要塞同时征召预备兵员和后备军服役，其目的在于平息由此引起的人民的怨言。但是，5月19日馮·烏澤多姆先生代表自己政府请求联邦议会把联邦的监视军直接交给普鲁士指挥，而且在必须采取哪些军事措施的问题上，给监视军充分的主动权。现在是奥地利暗中支持的德国各小邦君主证明自己的爱国热忱的真诚的时候了。巴伐利亚宣称，把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军队交给霍亨索伦王朝指挥，还不是时候。汉诺威愤懑地说：«Tu quoque!»〔“你也一样！”〕，提醒普鲁士自己也曾反对把联邦的监视军集中在南德意志的某一个地点。萨克森则认为没有什么理由不可以把最高指挥权交给它的至圣的君主，即使是为了制止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的互相倾轧也应当这样做。维尔腾堡几乎准备承认，法国的入侵比普鲁士的领导还好些。于是，神圣德意志帝国¹¹²的一切劣点都在庆幸自己可耻的复活了。德国的势力已化为乌有，——这就是目前德国各小邦君主之间这些内讧的总结。恢复德国国民

議會的要求不过是对这些王朝紛爭的第一个軟弱的抗議，这一抗議不是来自革命群众，而是来自胆怯的爱妥协的資產階級。

关于德国境内业已成熟的斯拉夫人的騷动，以后再談。

卡·馬克思写于1859年5月24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59年6月10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5659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Printed and Published by
J. G. Fisher, at the
Printing Office, No. 11, St. Paul's Churchyard, London.
Subscription price 10s. per Annum in Advance.
Single Copies 6d.

Das Volk.

Expedition: 3, Kitchfield Street, Soho.

Printed
The Publisher, J. G. Fisher, at the
Printing Office, No. 11, St. Paul's Churchyard, London.
Subscription price 10s. per Annum in Advance.
Single Copies 6d.

No. 13.

(London, Saturday 30, July 1859.)

Price: 2 Dents.

弗·恩格斯 意大利战争²¹³

继续了近一个月的意大利战争，发生了独特的出人意料的转变。两支各有近 20 万兵力的大军于 5 月初都已面对面地集中起来了。当双方的前哨接近到火炮射程以内的时候，双方军队都在监视着对方，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进行试探，并在某些地方进行小战斗，战线不断改变，忽而向前推进这一翼，忽而向前推进那一翼，但是都没有把主力投入战斗。这样的作战方法似乎不符合现代的、迅速坚决攻击的常规，同拿破仑神速进军和勇猛作战的方法比较起来，好像是倒退了一步。

从拿破仑时代以来，有两个新的因素使作战方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第一个因素是在适当地点构筑营垒和要塞体系，使国境线得到较好的掩护。拿破仑时代的要塞不是很不坚固、彼此孤立，便是设在战略上无关紧要的地点，因此在采用拿破仑的作战方法时，不能成为严重的障碍。拿破仑往往利用野战中取得的胜利或者迂回运动，迫使敌军退出要塞。

至于要塞究竟能起什么作用，1813 年的但泽、1848 年的伦巴第四边形要塞区、1849 年的科莫恩²¹⁴、1855 年的塞瓦斯托波尔都

已說明了這個問題。目前，法国—皮蒙特联軍在波河和塔納罗河那一边的卡薩勒、亚历山大里亚和瓦兰察之間所占領的陣地，就是以这样一个强大的要塞体系为依托的，这一要塞体系使他們甚至能够抵擋数量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在奥軍来到以前，法軍在这一陣地上集中了相当数量的兵力，使奥軍在攻击中获取决定性胜利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而法軍却因此赢得了時間来集中其余的兵力和补充武器装备。这时，奥軍在卡薩勒和瓦兰察附近的进攻受阻，而且因为既不能进行正面攻击，又不能进行真正的迂迴运动，所以只能在塞齐亚河以西、波河以南对法軍的两翼进行佯攻，同时在这些地区征集軍队所需的物資。

使拿破侖时代以来的作战方法发生极大变化的第二个因素是蒸汽。法軍就因为掌握有铁路和輪船，才得以在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到他們入侵的五天内把相当数量的兵力运到皮蒙特，使奥軍对皮蒙特陣地的一切攻击毫无結果，而在以后一个星期內，法軍又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兵力，所以到5月20日在阿斯蒂和諾維之間至少有13万法軍。

但是，由于在路易·波拿巴的欺詐政权統治下不可避免的营私舞弊現象以及管理上的混乱，法軍終究沒有得到及时的和足够的供应。而有充分战斗准备的奥軍有秩序地、迅速地进入意大利，却与此形成了很好的对照。在战争过程中，这种情况是必然会发生影响的。

奥軍不能前进，是因为遇到了皮蒙特要塞之間的筑垒陣地，而法軍之所以不能发起进攻，是因为运送軍用物資的工作还没有結束。这就是双方行动迟緩的原因，而且也是不值得注意的蒙特貝洛的小冲突使人感到兴趣的原因。当时的全部經過如下。奥軍获

悉，法軍右翼向皮阿琴察方向运动；根据这一行动，有理由认为法軍企图在帕維亞和皮阿琴察之間渡过波河，从而迂迴奧軍在洛美利納的陣地，并向米兰方向前进。因此，奧軍第五軍（由施塔迪昂指揮）派出了3个旅，通过了瓦卡里察附近（帕維亞下方）波河的桥梁，目的是占領斯特拉杰拉附近的陣地和向沃格拉方向进行偵察。这3个旅在卡斯泰卓遇到了联軍的前哨，而在蒙特貝洛遇到了法軍福雷师的第一个旅，并把这个旅逐出了蒙特貝洛。法軍另一个旅很快赶到了这里，經過頑强的战斗，把奧軍赶出了蒙特貝洛，但是奧軍击退了法軍向卡斯泰卓的攻击，迫使法軍混乱地退向蒙特貝洛；当时如果法軍維努亞师的一个旅沒有开来的話，奧軍无疑是能占領蒙特貝洛的（当时奧軍大部分兵力还没有投入战斗）。在法軍这一增援部队来到后，奧軍停止了进攻。他們已經达到了目的：現在他們已弄清楚了法軍右翼最近的配置地点，并毫无阻擋地从卡斯泰卓退向波河，以后渡到了波河北岸，与主力会合；他們确信，法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向皮阿琴察运动。奧軍在沒有充分的理由把**全部**軍队調到波河南岸以前，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波河北岸，这是完全正确的。分兵 *à cheval* [两岸] 的任何做法，都是錯誤的。奧軍利用瓦卡里察附近的桥梁和桥头堡，随时都可以渡河，并在法軍向斯特拉杰拉进攻时對他們进行側击。

加里波第率領5 000人的志願軍，迂迴了奧軍的右翼，目前正在倫巴第。根据最近的报道，奧軍已經插到他的后方，使他面临着退路被切断的严重威胁，这无疑会使波拿巴这个“解放者”感到非常高兴。

拿破侖亲王普隆-普隆受命在利伏諾（在托斯卡納）組織一个軍，向奧軍进行側击。法国兵气势汹汹，而奧地利人則在窃笑。

星期六和星期日,撒丁军队企图在塞齐亚河左岸巩固下来,但是奥军阻挠了他们的这一行动。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5 月 27 日
左右

载于 1859 年 5 月 28 日“人民报”
第 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战 略

我們对于最近論述蒙特貝洛附近的軍事行动的那篇文章^①只能作很少一点补充。从最后终于发布出来使本报在昨天增色不少的奥軍公报中可以看出，在施塔迪昂將軍率領下向蒙特貝洛运动的3个旅的部分兵力被留在后面，以掩护行軍队形的翼側。其余的兵力到达了卡斯泰卓，該地是由黑森亲王的那个旅占領的。当这个旅据守卡斯泰卓的时候，另外两个旅（不是全部）向前推进，占領了蒙特貝洛和吉涅斯特列洛。他們承受了福雷的全师兵力和德·桑納茲將軍的两个騎兵团（皮蒙特皇家团和蒙費拉托团）的主要攻击，而当他們最后被驅逐到卡斯泰卓时，看来黑森亲王旅給了他們很大的支援，以致敌人不敢攻击，于是他們得以秩序井然地而且在他們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时机撤走。但是，根据奥軍公报推测，很可能至少有巴拉盖·狄利埃元帅的整整一个軍曾在战斗将近結束时到达了战场。这个軍由3个步兵师和1个騎兵师組成，共有12个步兵团、3个猎兵营、4个騎兵团（20个騎兵連）和相应数量的炮兵。这和奥軍的公报相符合，該公报指出，从法軍俘虏的供詞中得知，那里有法軍12个步兵团。同时这也和来自都灵的两个报

^① 見本卷第389—391頁。——編者注

道相符合；按照第一个报道的說法，福雷曾得到維努亚师的支援，而按第二个报道的說法，他曾得到巴贊师的支援。这3个师便是巴拉盖的全部步兵。还有人說，那里曾經有法国騎兵和皮蒙特步兵，但是这个消息看来不大可靠。因此，战斗的結果是这样的：除了偵察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目的的奥軍（否則，以3个兵力薄弱的旅发起进攻，那是太愚蠢了），在迫使巴拉盖暴露全部兵力以后，完全达到了目的。在会战中，奥軍和他們的敌人打得同样出色。当他們被逐出蒙特貝洛的时候，他們不得不在敌人优势兵力的面前退却，但追击在卡斯泰卓被阻住了，奥軍在这里甚至掉轉头来如此有力地赶走追击的敌人，以致敌人沒有企图再襲击他們，虽然这时在戰場上法軍的人数比奥軍多三倍。这样，如果法軍以他們最后控制了蒙特貝洛而奥軍在战斗后即行退却这一点为理由，說胜利是屬於法軍的，那末奥軍也可以說胜利是屬於他們的，因为他們把法軍从卡斯泰卓附近赶走而在战斗終結时得到了胜利，特别是因为他們圓滿地完成了原定的任务，而进行这次会战的目的本来就在于同敌人的优势兵力接触，当然还要在敌人面前退却。

蒙特貝洛会战后，在奥軍的中央和右翼也发生了战斗。根据“福尔頓号”輪船带来的、并在昨天发表的消息，撒丁軍队于5月30日在韦尔切利附近渡过了塞齐亚河，攻击并占領了奥軍在帕勒斯特罗、卡薩林諾和文察利奧附近的一些野战工事。战斗由維克多-艾曼努尔亲自指揮，經過白刃格斗后才获得胜利。根据撒丁軍队的报道，奥軍伤亡非常严重。我們从“欧罗巴号”輪船送到哈里法克斯的邮件得知，奥軍曾两次企图夺回帕勒斯特罗，并且有一次几乎成功，但是朱阿夫部队赶来增援，把他們击退了。在这次战斗中，据撒丁軍队說，他們俘虏了敌人1000名。但是由于沒有任何

可靠的詳細資料，因此不可能对这次战斗加以判断。我們沒有想到奧軍(据說他們正全力向提契諾河东岸退却)在塞齐亚河附近的前进陣地上会进行这样頑强的战斗。但是，他們在自己的极右翼却沒有表现出这种勇敢和坚忍不拔的精神。5月25日，加里波第率領他的阿尔卑斯猎兵和一些其他部队共約5000人迂迴奧軍的极右翼，渡过了提契諾河，向馬乔列湖与科摩湖之間的华里斯进发，并占領了該城。5月26日，他击败了向他攻击的奧軍部队，連一分钟也沒有耽擱便立即开始扩大战果；27日，再次击败了奧軍的这支部队(它已得到科摩守軍的增援)，并在同日夜間进入科摩城。烏尔班將軍的机动部队开来对抗加里波第，曾把他赶入山区。但是我們从今天夜間剛由“欧罗巴号”輪船接到的最后消息得知：加里波第部队掉轉头来，突然襲击奧軍并夺回了华里斯。加里波第的胜利在科摩湖旁以及在瓦尔特林納的各个城市，即在阿达河上游谷地，也就是在1848年起义中表現得比倫巴第平原上各城市更加坚决的那个山区中，引起了起义。科摩湖上的輪船掌握在起义者的手中，来自瓦尔特林納的800人加入了加里波第的軍隊。据說，虽然加里波第暂时失利，但起义仍在倫巴第这一部分地区扩展。

加里波第这次的襲击是联軍的巨大胜利，而奧軍則犯了很大的錯誤。奧軍让加里波第占領了华里斯，这对他們并不是什么特別大的灾难，但是，他們应当用加里波第所不敢与之作战的强大部队来扼守科摩，并向塞斯托-卡兰德派出另一支部队截断加里波第的退路。这样，当加里波第被困在两湖之間的狭小地区时，奧軍进行猛烈的进攻一定会迫使他放下武器或者进入中立的瑞士領土，而在那里他将被解除武装。但是，奧軍低估了这个人，把他叫做土

匪头儿。其实，只要他们很好地研究一下罗马围攻战以及他由罗马向圣马力诺进军的历史²¹⁵，那末他们一定会认识到他是一位具有非凡的军事天才而且英勇超群和足智多谋的人物。他们不这样做，却对他的袭击漠然视之；就像对待 1848 年阿勒曼迪率领的伦巴第志愿军的入侵²¹⁶ 一样。他们完全没有看到这个事实，就是加里波第是个要求严格的人，他的部下大部分在他指挥之下已经有四个月，在这个期间足以使他们学会小规模战争中常用的战法和运动方法。路易-拿破侖和维克多-艾曼努尔派遣加里波第到伦巴第，很可能是想借此把他和他的志愿军消灭掉，因为看来他们是这次王朝战争中过于革命的因素。这样的猜测可以从加里波第是在没有必要的支援之下进军的这一事实得到充分证明。但是，不应当忘记，在 1849 年他走的就是这同一条道路，并且摆脱了绝境。至少，他占领了莱科附近的桥梁，并控制了科摩湖上的轮船，这就保证了他在科摩湖以东方向上的行动自由。这里是一大片山地，它向北延伸到什普留根和斯特尔维奥两个山口，向东到加尔达湖，向南到贝尔加莫和布里西亚，——这是一个非常适于进行游击战的地区，在这里，正如乌尔班将军到目前才刚刚相信的那样，要想捉住他，是很困难的。如果以前有 6 000—8 000 人的兵力便足以在华里斯地区消灭他的话，那末现在可能需要 16 000 人以上。因此，加里波第的 1 个旅从此将牵制奥军整整 3 个旅。但是，在提罗耳集中一批兵力（有整整 1 个军沿铁路经过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由波希米亚进入了提罗耳）并且在伦巴第还驻有守军的情况下，尽管加里波第新近在华里斯击败了敌人，我们却不知道他怎样才能坚持下去，除非联军在最近的将来能取得对奥军的决定性胜利。而这却是一件难事。奥军又有 1 个军，即第九军，编入了作战军队，

这样,作战军队便增加到6个军,即不少于20万人;此外,还有其他几个军正在途中。但是,由于路易-拿破侖不能长期按兵不动,所以会战不久一定发生。据报道,他已率大本营和近卫军转到沃格拉——联军阵地的极右翼。这一报道说明会战可能在斯特拉杰拉郊区发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奥军将从正面保卫斯特拉杰拉隘路,并企图通过瓦卡里察附近的桥梁而在法军翼侧和后方作战。

弗·恩格斯写于1859年5月30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1859年6月15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663号

卡·馬克思 馬志尼宣言²¹⁷

在目前情況下，馬志尼的任何聲明都是一個比互相角逐着的各個內閣的外交公文或來自戰場的五彩十色的公報更值得注意的事件。儘管人們對羅馬三執政之一²¹⁸的品格看法多麼不同，但誰也不會否認30年來意大利革命是同他的名字連在一起的，而且在這同一時期歐洲承認他是他的同胞的民族願望的出色表達者。如今他做出了一件英勇過人的、具有愛國主義自我犧牲精神的非凡壯舉。他一個人冒着犧牲自己聲譽的危險，大聲疾呼地反對自我欺騙、盲目狂熱和自私謊言這種巴比倫的混亂語言^①。他對波拿巴、亞歷山大和這兩個暴君的代理人卡富爾之間協商好的行動計劃所作的揭露，尤其應當仔細地加以估量，因為大家知道，在歐洲所有非官方人士中，馬志尼具有最廣泛的手段來洞悉各個占統治地位的大國的見不得天日的秘密。他勸告人民志願軍要劃清自己本身的事業和那些僭稱王者的事業之間的界限，永不辱沒自己的宣言，不讓自己的宣言被路易-拿破侖這個可恥的名字所玷污，這些勸告都被加里波第準確地實行了。據倫敦“泰晤士報”駐巴黎記者報道，路易-拿破侖認為加里波第的宣言中沒有提法國二字²¹⁹

① 見本卷第291頁譯者注。——譯者注

是个奇耻大辱。关于加里波第和羅馬三执政之一有秘密联系的消息引起了很大的恐惧，以致把他的军队从最初所答应给他的1万名 chasseurs d'Alpes [阿尔卑斯猎兵] 削减到4 000名，配屬给他的炮兵部队被召了回去，应他的要求已經派出的唯一的一个炮兵連也被召回，而且还暗中派了两个老练的警探装成志願軍去做他的随員，他們奉命报告加里波第的一言一行。

下面我們把馬志尼宣言的确切譯文刊登出来，該宣言是在倫敦发表的，刊載在最近一期“思想和行动”上，标题是«La Guerra» (“战争”) ²²⁰；

“战争开始了。所以，我們面临的不是应该討論的或然性，而是既成的事实。战争在奥地利和皮蒙特之間爆发了。路易·波拿巴的士兵已在意大利境内。一年前我們告訴大家的那个俄法同盟已在欧洲面前露出了原形。撒丁議會把独裁权交給了維克多-艾曼努尔。托斯卡納公国政府被武装起义推翻了，托斯卡納接受了国王的独裁（后来他把独裁权让給了波拿巴）。很可能，意大利的普遍騷动将在其他地方引起类似的后果。我們祖国的命运現在肯定要在戰場上来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我們的大部分同胞只是醉心于行动，一心向往正規軍的有力支持，迷恋于对引起公憤的奥地利統治的軍事进攻，他們忘記了过去的錯誤及其原因，他們不仅牺牲了自己最深刻的信念，而且甚至放棄恢复自己的信念，他們拋棄任何預見性，任何判断的自由，毫无条件地欢迎任何一个願意作战的人，不加分析地贊同法国和皮蒙特所做的一切事情，他們就这样开始为自由而战，而同时却使自己处于奴隶地位。其他一些人，看到了宣傳家們和追随他們的群众中任何类似政治道德的东西消失了，看到半世紀来作为自由的信徒的人民突然同专制主义結成联盟，看到昨天还信仰蒲魯东的无政府主义的人无条件向国王投降，而霍夫雷多·馬美利的同胞們向那个使馬美利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起丧命的人 ²²¹ 欢呼«Viva l'Imperatore!» [“皇帝万岁!”]，便对未来感到絕望，并声称我們的人民不会享受自由。

至于我們，那我們是既不贊成一些人的盲目的奴才的希望，也不贊成另

一些人的沮喪絕望情緒。戰爭是在最不利的征兆下開始的。但是，意大利人只要願意，就可以把戰爭引向良好的目的；我們也相信我們人民的高尚的本能。這些本能將通過宣傳家們慫恿人民去犯的錯誤堅決為自己開辟道路。如果志願軍不是在會背棄他們希望的各強國的無限權力下統一起來，而是從容地在各自的家鄉組織起義，並爭取主動，以意大利人民的名義來領導這些起義，那也許會好些；但是神聖和崇高的精神推動着他們，他們要確鑿地證明自己對共同祖國的忠誠，而意大利也把最偉大的希望寄托在這個自發產生的未來民族軍隊的核心身上。接受國王獨裁是一個錯誤，這個錯誤的確可以招致致命的結果，並且有辱為自己的解放而奮起鬥爭的人民的尊嚴；羅馬和威尼斯是一個例子，那里的人民大會和國防領導人之間的一致曾是強盛的泉源，也可以回憶一下英國的情形，它經受住了反對第一帝國的長時期和可怕的戰爭而絲毫沒有破壞公民的自由，從這裡就可以看出，在一個具有忠於君主制度的議會的國家中，這種獨裁顯然不外是對聯合起來的暴君的要求的一種讓步，是實現旨在以領土問題偷換自由問題的計劃的第一階段；但是，人民熱情地接受了獨裁，他們相信自己正在為共同祖國的利益而作最高尚的自我犧牲，並且受到了這樣一種意見的迷惑：說什麼戰爭的勝利取決於這種權力的集中，因此願意以自己的贊同來表示他們決心不惜任何代價來進行鬥爭並取得勝利。起義的各省向君主獨裁者的專制政權的無條件投降，幾乎必然會導致不幸的後果。起義的邏輯要求每個起義的省份服從當地的起義政權，並推舉代表去成立全國起義政府；但是，甚至這個重大錯誤也是對民族統一的要求的貢獻；這個錯誤堅決駁斥了歐洲報刊關於我們的分歧的無稽之談，這個錯誤對意大利說來是可以理解的。在意大利，愛國主義在目前已經極其強烈，它一定能克服一切錯誤。善良的公民們不要再灰心喪氣了，而應當給愛國主義指出應有的方向。為了這個目的，他們應該堅決主張說明事情的真相，不怕惡意的曲解。在這樣極其嚴重的關頭，不容許人們去注意直接的利益或各種責難。

事情的真相就是如此。

意大利運動和1848年一樣，是力求爭取，甚至是在更大程度上爭取自由和國家統一。撒丁國王和路易·波拿巴完全是為了別的目的進行戰爭。民族的願望和公認的領導人的願望之間的對抗在1848年會使戰爭徹底失敗，現在，這種對抗和1848年一樣有可能，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有可能使意大利陷

入絕望的境地。

國家統一——這就是意大利所要的東西。路易-拿破侖是不喜歡這個東西的。除了皮蒙特為報償路易-拿破侖幫助它在北部建立王國而已經讓給他的尼斯和薩瓦之外，他還伺機使繆拉特在南部登上王位，使自己的堂弟在中部登上王位。羅馬和教皇國仍舊由教皇暫時管理。

是否真誠，這無關緊要，但是目前執掌皮蒙特最高權力的大臣完全同意這一計劃。

這樣一來，意大利必然要分為四個國家：其中兩個直接由外國人管理，而法國將間接地占有整個意大利。教皇在 1849 年以後成了法國的藩臣，撒丁國王出於感激之情和由於力量不足也將成為帝國的藩臣。

如果奧地利要抵抗到底，那末這個計劃就會全部實現。但是，如果奧地利在一開頭就吃了敗仗，提出像在 1848 年某個時候曾向英國政府提出的那種條件，即在保留威尼斯的情況下讓出倫巴第，——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受到整個歐洲外交界支持的和約將被接受；不過得到實現的將只有一個條件，即擴大撒丁王國并把薩瓦和尼斯轉讓給法國；意大利的統治者們將向意大利大肆進行報復，而朝夕思慕的計劃的完全實現將推到某個更有利的时候。

這個計劃歐洲各國政府都是知道的。因此他們進行了全面的擴軍備戰，因此在整個德意志聯邦掀起了戰爭的狂熱，因此便準備好了英國、德國和普魯士結成同盟的因素，——儘管各國政府作了相反的保證，這個同盟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意大利和波拿巴結成聯盟來捍衛自己的民族生存，那末保護奧地利和 1815 年的各項條約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同盟的中心問題。

路易-拿破侖害怕同盟。因此他就同不可靠的和背信棄義的盟友俄國結成聯盟。但是，即使是做出嚴重危害自由的讓步，例如法國以全部放棄波蘭和承認沙皇對土耳其歐洲部分的全部保護權為代價來使地中海成為法國的內湖，俄國終究還是要進行干涉的。如果戰爭繼續下去，並由於德國的干涉而具有了歐洲規模，那末在此以前早已準備好了的土耳其各省的起義以及匈牙利的起義將使這個聯盟有可能採取一些顯著的形式。

如果事情達到這個地步，就會產生一種把關於人民的權利和自由的任何思想都淹沒在領土的重新瓜分中的意圖。俄國的諸侯將統治在土耳其帝國和奧地利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各個國家，波拿巴王朝的親王們將統治各個新的意大利國家，如果有機會的話，也許還要加上其他一些國家。給不滿的匈牙

利人已經內定了俄罗斯大公康斯坦丁，如同給教皇国和托斯卡納的君主政体的宣傳家們內定了路易-拿破侖·波拿巴一样。像查理五世和克雷門特七世这两个死敌联合起来瓜分意大利各自由市²²²那样，两个真正彼此仇視的皇帝联合起来扼杀对自由的一切希望并使欧洲帝国化。因此便有了在一定时期內消灭被卡富尔备加蹂躪的皮蒙特的自由的法令。于是报刊不能說話，于是不允許对軍事行动作任何解釋，于是人民一无所知，而統治者也就可以一无顧慮地施展他們的策略了。被独立的幽灵迷住了的人民意識，——这种独立归根到底只是改头換面的从屬关系，——就这样疏远了关于自由的思想，而自由却是任何独立的真正泉源。

联合起来的暴君們的計劃就是如此。一些人可能会否认这些計劃，正因为他們自己在准备执行这些計劃，就像路易·波拿巴否认他有举行 coup d'état (政变)的任何企图一样，另一些人由于盲目相信統治者所說的每一句話或者由于使他們头脑模糊不清的盲目希望而否认这些計劃；但是这些計劃的现实性并不因此而有所减少；我知道这些計劃，各国政府也知道这些計劃，并且这些計劃一部分在路易-拿破侖和卡富尔伯爵的講話中，一部分在他們的行动中已經暴露出来了。我只說卡富尔伯爵，因为我觉得，維克多-艾曼努尔沒有参与在普倫貝尔和斯图加特进行的勾当。

如果卡富尔伯爵是意大利的真正朋友，那他就会利用由于掌握重要的物质力量和由于在意大利占优势的普遍趋势而产生的巨大威望来准备意大利的运动，并从皮蒙特方面給这个运动以**刻不容緩**的支持。对于仅仅由意大利的力量发起的斗争，欧洲是会表示贊成和同情的。現今对于应意大利的呼吁并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入意大利的拿破侖采取威懾态度的欧洲絕不会容忍拿破侖沒有得到請求而自动去援助奥地利。这本来是一件神圣和崇高的事业；卡富尔也是能完成这一事业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自由和权利，就必须和意大利革命結成同盟。这种作法是不合这位撒丁王国大臣心意的。对人民和对自由的憎恶促使他去同暴政結成联盟，同那个由于穷兵黷武的老傳統而引起各族人民痛恨的暴政結成联盟。这一計劃改变了意大利問題的原来性质。如果这个計劃由于有了公认的作为意大利保护人的同盟者而获得成功，——那末国家的統一将会丧失，意大利将成为在法国保护下的重新实行分割的場所。如果这个計劃同十二月英雄一起破产，那末意大利就要承担各种損失，意大利将遭受无穷的压迫，而欧洲将不会为我们悲痛，而会说：

‘你們是罪有應得’ (◀Voi non avete, se non quello che meritate▶)。人們的一切策略，所有的打算都是由道德規範主宰的，人民要是破壞這些道德規範，就不能不受到懲罰。一切罪過結果都不可避免地要求贖償。法國——我們當時曾談過這一點——要贖償自己的羅馬征伐。撒丁王國把由於半世紀來的犧牲、痛苦和善意良願而成為神聖的事業同自私自利和暴政連在一起，但願意大利不要去贖償該由撒丁王國承擔的嚴重罪過！

然而戰爭畢竟是**事實**——具有重大意義的事實，它提出了新的義務并根本改變了我們自己的行動。意大利處在卡富爾的陰謀和聯盟的威脅之間，處在路易-拿破侖和奧地利之間，處在這些同樣可悲的可能性之間，——這種危險的情況越是嚴重，全民的力量就越應該聯合起來挽救祖國於危亡。如果我們的各個政府之間進行戰爭，我們盡可以袖手旁觀，等待交戰各方互相削弱和民族自發勢力向前沖去的時刻。但是這種自發勢力已經迸發出來了。全國不管是否受騙都是群情鼎沸，它相信，利用皇帝和國王的戰爭它就能達到自己的目的。托斯卡納運動、意大利兵士和公民的自發運動，志願軍中的普遍的激昂情緒和振奮精神沖破了官方陰謀的圈子，然而這一切都是民族心臟的跳動。必須繼之以實際行動；必須擴大戰爭，使戰爭意大利化 (italianizzare)。共和主義者能夠完成這一使命。

意大利只要願意，就能拯救自己，免除我們所指出的危險。它能夠擺脫目前的危機，達到國家統一。

必須使奧地利失敗。我們可以对法皇的干涉表示遺憾，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奧地利是意大利一切民族發展的死敵。每一個意大利人都應當促使奧地利復滅。這是所有的人的尊嚴和安全所要求的。歐洲應該知道，我們和奧地利之間正不斷地進行戰爭。意大利人民必須維護自己的尊嚴，使之不受侵犯，并使歐洲相信，我們能容忍暴政的幫助，是由于意大利政府請求了這種幫助，但是我們卻沒有要求它，我們並沒有因為它而放棄我們對各族人民的自由和聯盟的信念。意大利人可以真心誠意地高呼◀Viva la Francia!▶〔“法蘭西萬歲！”〕，但是決不會喊◀Viva l'Imperatore!▶〔“皇帝萬歲！”〕……意大利必須到處實行起義……在北部是為了爭取自由，而不是坐享其成；在南部是為了組織民族軍隊的後備隊。在奧地利人設有兵營的一切地方或兵營附近，起義可以相當審慎地接受國王的軍事領導；在南部，起義應當比較獨立地進行……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島能夠保證意大利的事業并建立以民族

陣營為代表的政權…… 無論在哪里，起義的口號都應當是：‘統一、自由和民族獨立！’羅馬的名字應當永遠和意大利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羅馬的義務是不派一個人去參加撒丁軍隊，相反地，要向帝制的法國證明，對任何一個國家說來，一面為了意大利的獨立而戰，同時卻主張支持教皇的專制制度，——這是不體面的事情…… 意大利的命運現在取決於羅馬、那不勒斯和志願民兵隊的行動。羅馬代表祖國的統一，那不勒斯和志願軍能夠組成它的軍隊。責任是重大的；如果羅馬、那不勒斯和志願軍不能履行這些責任，他們就不配得到自由，他們也不能得到自由。聽憑各個政府支配的戰爭將以締結第二個康波福米奧和約²²³而告終。

被那些斷送了1848年起義的人現在宣布為勝利秘訣的紀律，不外是叫人民奴隸似地服從和消極聽命。我們所理解的紀律，可以要求同進行正規戰爭有關的一切緊密一致起來；它可以要求在一切形式問題上保持沉默；但是絕不能要求意大利不實行起義或屈服於專橫暴虐的獨裁者和外國暴君的意志。意大利永遠不會放棄自己獲得自由和統一的崇高決心！”

馬志尼宣言的按語由卡·馬克思於
1859年5月底寫成

載於1859年6月17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5665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弗·恩格斯

軍事行动的經過

在目前的战争中，到现在为止还只有加里波第一个人享有荣誉。根据各种情况看来，他不怕采取拿破仑第三告誡部下避免采取的那种迅速行动和猛攻。这位志愿军的首領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成了意大利的英雄，虽然大西洋这面的波拿巴派报刊企图把他的功績完全归之于他们自己的偉大的庇护人。这位游击将军的荣誉似乎也激起了維克多-艾曼努尔的竞争情緒。結果，便发生了帕勒斯特罗会战。关于这个会战，可惜我們目前只得到一些电訊报道，而且还是由撒丁兵营拍来的。

根据这些报道，查耳迪尼指揮的皮蒙特第四师几天前在韦尔切利附近渡过了塞齐亚河，此后一直与奥軍前哨进行了小战斗，5月30日，該师似乎攻击了帕勒斯特罗、文察利奥和康芬察附近的敌人筑垒陣地。皮蒙特军队击败了占領該陣地的一个旅（很可能是加布倫茨将军指揮的旅），但是据报道，次日（5月31日）晨，25 000名奥軍曾企图夺回这个陣地。他们企图迂迴皮蒙特军队的右翼，但結果却使自己的翼側受到康罗貝尔軍（特罗胥师）的打击，該軍在塞齐亚河上架桥渡河，正好在这个时候来到了战场。法皇立即命令第三朱阿夫团馳援皮蒙特军队。朱阿夫兵“虽然没有得到支援”，但仍向奥軍一个炮台发起攻击，繳获火炮6門，并将掩护

部队赶入运河，据说，有 400 人溺死。撒丁国王在战斗最熾烈的地方，并非常专心杀敌，以致“朱阿夫兵曾试图——不过没有成功——抑制他的热情”。据报道，查耳迪尼将军曾亲自指挥朱阿夫兵。最后，奥军被击退，联军俘获 1 000 人，缴获 8 门火炮。

皮蒙特报道称：“奥军伤亡极为惨重，我方伤亡尚未查明。”

与此同时，在康芬察附近发生了另外一场战斗。在那里敌军被凡蒂将军指挥的师击败。但在下午 6 时左右，奥军又企图攻击帕勒斯特罗，不过没有获得更大的胜利。6 月 1 日，尼耶尔将军看来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率领法军第四军进入了诺瓦拉。

自从 1849 年的和约使 Spada d'Italia [意大利之剑] 纳入鞘中以来，我们就再没有读过比这更含糊不清而且前后矛盾的战报了。²²⁴ 其实在上述战报的摘要中，我们已经略去了关于会战的一些最无法解释的细节。奥军参加进攻的有 25 000 人。他们是否全部都被派去攻打帕勒斯特罗，还是其中包括了被凡蒂将军在康芬察击败的那些部队呢？既然后者的人数没有特别指出，那末如果我们考虑到皮蒙特战报是绝对真实的，从而得出结论说，参加 5 月 31 日会战的奥军一共将近 25 000 人，我们大概不会有错误。至于击败他们的兵力究竟有多少，我们将逐步查明。当皮蒙特军队处境危险时，法皇命令第三朱阿夫团向前开进，指挥他们的是查耳迪尼，而撒丁国王却推开他们，冲向战斗最熾烈的地方，朱阿夫兵还试图阻止他，但是无效。

多么壮丽的场面！角色的分配多么惊人！“皇帝”路易-拿破侖命令朱阿夫兵前进。将军，查耳迪尼，而且还是一个皮蒙特人，率领他们进入战斗，——皮蒙特人指挥法国的朱阿夫兵！“国王”

則投入他們中間，並且在他自己的將軍指揮下在戰鬥最熾烈的地方作戰。但同時我們又聽說，國王曾親自指揮皮蒙特第四師，也就是查耳迪尼的那個師。至於當查耳迪尼率領朱阿夫兵作戰，而國王位於戰鬥最熾烈的地方的時候，第四師的情況如何呢？這個我們也許永遠不會知道。但是，維克多-艾曼努爾這樣的行為是不會使我們奇怪的。在具有決定意義的諾瓦拉會戰中，他也有過同樣幼稚的輕舉妄動，曾把自己那個師棄之不理，因而對會戰的失敗和拉德茨基的勝利起了不小的促進作用。

雖然只有在接到法軍和奧軍的公報以後我們才可能明了這次會戰的真相，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這個自相矛盾的戰報中弄清某些有用的事實。聯軍的極左翼直到目前為止是尼耶爾將軍指揮的法軍的 1 個軍，該軍駐在韋爾切利以西的多腊-巴爾特亞河一帶。距它最近的是在卡薩勒附近的查耳迪尼和杜蘭多指揮的皮蒙特軍隊的 2 個師（第四和第三師）。在亞歷山大里亞和瓦蘭察附近有卡斯泰爾博果和凡蒂指揮的皮蒙特軍隊的 2 個師（第一和第二師），以及麥克馬洪和康羅貝爾指揮的法軍的 2 個軍和近衛軍，他們構成中央。亞歷山大里亞以東，在托爾托納、諾維和沃格拉附近配置有庫克基亞里指揮的皮蒙特軍隊第五師和巴拉蓋·狄利埃指揮的法軍的 1 個軍。

我們知道，帕勒斯特羅和康芬察（這兩個地點彼此相距不超過 3 英里）附近的會戰，不僅查耳迪尼參加了，而且凡蒂也參加了；雖然關於尼耶爾一字未提，但是我們卻在這裡發現了康羅貝爾。我們在這裡還發現了第三朱阿夫團，它既不屬於康羅貝爾軍，又不屬於法軍另外 3 個軍中的任何一個。最後，我們聽說，路易-拿破侖把他的大本營轉移到韋爾切利，並且尼耶爾將軍在會戰的第二天

占領了諾瓦拉。所有这一切都說明，联軍的部署有了根本的改变。原来由尼耶尔軍(26个营)和查耳迪尼师(14个营)共40个营組成的左翼，現在得到了康罗貝尔軍(39个营)和凡蒂师(14个营)共53个营的加强。結果，这部分联軍現在共有93个营。其中，或多或少参加了帕勒斯特罗会战的，无疑有皮蒙特軍队的2个师(28个营)以及康罗貝尔軍的特罗胥师(13个营)，全部共有25000名皮蒙特軍队和至少11000名法軍。这便是25000名奧軍被击退的原因。

但是，加强左翼显然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尼耶尔將軍向諾瓦拉前进和路易-拿破侖将大本营迁至韦尔切利便是证明。其次，近卫軍可能也随后到达了那里，这使我們对联軍的意图几乎不再有所怀疑。有了近卫軍，塞齐亚河一带部队的数量便增加到127个营。此外，利用铁路，就如同在蒙特貝洛会战中那样，可以将极右翼的部队迅速調来适时地参加决战。因此，有两个可能性。或者路易-拿破侖繼續原来已开始的运动，完全迂迴奧軍右翼并把軍队的主力配置在韦尔切利直通米兰的大道上，也就是配置在韦尔切利到諾瓦拉一綫，同时在波河一带进行佯攻以牵制奧軍；或者他将在奧軍右翼进行强有力的佯攻，而把主力集中在瓦兰察郊区。在这里，巴拉盖軍、麦克馬洪軍和近卫軍共有99个营，而庫克基亚里、杜兰多和卡斯特尔博果各师共有42个营，并且这些兵力还要为迅速調往那里的康罗貝尔軍和一定数量的皮蒙特部队所加强，因此在一个地点便可能集中170个营，以这样的兵力可以猛烈地攻击奧軍的中央而将其消灭。

康罗貝尔軍(实际上这里只可能有特罗胥师)和凡蒂指揮的皮蒙特部队在塞齐亚河一带的佯动以及路易-拿破侖的大本营迁往

韦尔切利的这一佯动，似乎說明了第二个可能性更大一些，但这只能是推測。

根据各种情况来判断，这时，奥軍似乎仍然在阿哥尼亚河一带，虽然倫敦“每日新聞”²²⁵报道說，他們已退到提契諾河彼岸。他們的部队愈来愈集中在加尔拉斯科周圍的狹小地区里。双方在某些地点都在互相試探虚实，一个在蒙特貝洛附近，一个在帕勒斯特罗附近，但是都努力避免分散自己的兵力。奥軍至少有 6 个軍，也就是 160—200 个营（根据撥出的守备部队多少而定）。因此，敌对双方兵力看来几乎相等。再过几天，烏云就将变成一場雷雨。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6 月 2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9 年 6 月 17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665 号

弗·恩格斯 軍事事件

从戰場发来的电报片断不全而且互相矛盾，因此关于奧軍退往提契諾河南岸及其在馬振塔的失敗，只能作出一些簡略的評論。看来，震惊于尼耶尔將軍占領諾瓦拉的奧軍在6月3日和4日退往提契諾河南岸。6月4日清晨4点钟，法軍和皮蒙特軍从奧軍右翼的土尔比哥和博法洛拉附近渡过提契諾河后，便以优势兵力向正面的敌人实行进攻，經過浴血苦战之后将敌人逐出了他所占領的陣地。联軍采訪員路易·波拿巴所公布的关于这次会战的詳細情况，证明了这位“神秘的將軍”的想像力，他仍然不能克制自己对 *«armes de précision»* [“綫膛武器”] 的厌恶，因此便夹在輻重队当中跟在軍隊后面走，和戰場保持相当远的距离，但是“御体安康”。

硬把关于皇帝的健康状况的公报向全世界公布，这种令人厌恶的作法，是有其充分的理由的。在法国貴族院討論路易·波拿巴的布倫冒險事件时，目击者发誓作证說，在危急关头，我們这位英雄为了排除心头的煩惱，随心所欲采取各种方法，只是沒有采取表明“御体安康”的方法。

奧軍就像一只准备騰身猛扑的老虎一样，集結了起来，并占領了阿哥尼亚河陣地。他們的失敗，应归咎于放棄这一陣地的居萊。

他們控制了洛美利納并且在米兰前面約 30 英里处占領了陣地，可想而知，他們是不能控制可以通往这个首府的所有要冲的。联軍面前敞开着三条道路：一条是通过奥軍中央，到瓦兰察、加尔拉斯科和貝雷古阿尔多；另一条是通过奥軍左翼，到沃格拉、斯特拉杰拉，然后再在帕維亞和皮阿琴察之間越过波河；最后，第三条是通过奥軍右翼，到韦尔切利、諾瓦拉和博法洛拉。如果奥軍想直接防守米兰，那末他們只能派軍隊擋住这三条道路中的一条。如果每条道路上各派一个軍，那便是分散兵力，結果必然招致失敗。但是，側方陣地可以和正面陣地同样可靠地，甚至是更可靠地防守道路，这是一条現代作战原則。一支集中在不大的地区而且已經准备向任何方向行动的 15—20 万人的軍隊，敌人要想自己不受懲罰地不把它放在眼里，除非在数量上占有极大的优势。当 1813 年拿破侖向易北河方向行进时，联軍虽然在数量上要弱得多，但是有条件向他挑战。因此，他們在呂特岑，在由爱尔福特通往萊比錫的道路以南数英里处，占領了陣地。当联軍使拿破侖的軍隊知道他們就在附近时，有一部分法軍已經通过了。这使全部法軍运动受阻，已經向前推进的纵队被召回，随即展开了会战，結果，法軍虽然在数量上有 6 万人的优势，但也只能招架而已。²²⁶ 第二天，两支軍隊平行地向易北河方向运动，而且联軍的退却沒有受到任何阻碍。如果这两支軍隊的力量不是这样悬殊，那末联軍的側方陣地至少也会和直接橫貫在萊比錫大道上的正面陣地一样成功地阻止拿破侖的运动的。

居萊現在占据的正是这种側方陣地。他率領着一支将近 15 万人的軍隊，駐守在摩爾塔拉和帕維亞之間，截断了由瓦兰察直通米兰的大道。他的两翼都可能受到迂迴，但是他的陣地使他有办

法对付这种迂迴。联军主力于5月30日、31日和6月1日集中在韦尔切利附近。它包括4个皮蒙特师(56个营)、尼耶尔军(26个营)、康罗贝尔军(39个营)、近卫军(26个营)和麦克马洪军(26个营),除骑兵和炮兵外,共计173个步兵营。居莱方面拥有6个军,虽然其中一部分被派往沃格拉,一部分被派去对付加里波第,一部分被派去占领各个据点,等等,因而兵力减少了,但仍然有150个营。按照他的军队的配置情况来看,只有在军事行动所能达到的范围内作侧敌行军才能从右方迂迴它。大家都知道,部队从行军队形改编成战斗队形,总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即使在遭到正面攻击时也是如此,虽然这时行军队形是最适宜于作战了。如果编成行军队形的纵队遭到了侧击,这时打乱部署是极其危险的。因此,避免在敌人可以达到的范围内进行侧敌行军,是一条确定不移的原则。联军违反了这条原则。它向诺瓦拉和提契诺河前进,好像对自己翼侧上的奥军毫不在意。这时居莱本来应当采取行动的。他应该留一个军在阿哥尼亚河下游监视瓦兰察,而在6月3日夜間把自己的军队集中在维吉瓦诺和摩尔塔拉附近,然后在6月4日用现有的全部兵力打击前进中的联军的翼侧。使用大约120个营的兵力对联军的拉得很长的、断断续续的行军纵队采取这种进攻,几乎毫无疑问地是可以获得战果的。如果联军的一部分兵力已经渡过提契诺河,那对居莱就更有利了:他的进攻将迫使这部分兵力折回,但也不见得能及时对会战的结局起决定性影响。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进攻万一不成功,奥军也仍然能够安全地向帕维亚和皮阿琴察退却,例如在乌振塔会战以后,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居莱的整个作战部署表明,奥军原来的计划确实正是这样。军事会议经过详尽的讨论后,决定把直通米兰的大道开放给

法軍，而只通过側敌行軍来掩护米兰。但是，当决定性的时刻来到而居萊也看見他的右側有大量法軍向米兰急速前进时，这个純血統的馬扎尔人躊躇起来了，最后还是退到了提契諾河以东。这样一来，他就給自己准备了失敗。当法軍沿直綫向馬振塔（位于諾瓦拉和米兰之間）前进时，他自己却繞了一个大弯——起初沿提契諾河而下，并在貝雷古阿尔多和帕維亞附近渡过該河，然后又重新沿提契諾河而上，向博法洛拉和馬振塔前进，以便截断直通米兰的大道。結果，他的軍隊一小股一小股地开到，不能集中足够数量的兵力来粉碎联軍的核心。

如果联軍仍然主宰着戰場，即控制着直通米兰的大道，奧軍就应退过波河、阿达河，或者退入自己的强大要塞，以便重新部署力量。尽管这样一来，馬振塔会战就会决定米兰的命运，但是却还远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奥地利有 3 个完整的軍，目前集中在阿迪杰河，如果居萊的犹豫不决这一次又未能“改正”这位“神秘的將軍”的大錯誤的話，那末这三个軍最后也还是能使它的力量保持均勢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6 月 9 日

左右

載于 1859 年 6 月 11 日“人民报”

第 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

弗·恩格斯 奧軍的失敗

“波斯号”輪船昨夜到达后，我們得到了关于馬振塔会战的各种各样极有趣的文件，讀者将在适当的地方看到它們。这些文件的实质可以用几句话概括如下：馬振塔会战对于奧軍說来，是一个决定性的失敗，对于法軍說来，則是打开广闊局面的胜利；联軍进入了米兰并受到狂喜的人民的欢迎；奧軍全綫退却，貝奈德克軍在馬利尼亚諾附近大敗于巴拉盖·狄利埃(关于他的退职，再也没有提到)，被俘 1 200 人。联軍充滿胜利的信心，而奧軍則士气沮丧，軍心不振。

我們倫敦的报界同人照例认为会战是出于奧軍意料之外的。在我們还没有得到現在所掌握的证明材料以前，我們的意見也一直是这样。現在我們明白了，与其說是居萊遭到了突然襲击，不如說是他犯了严重的錯誤。我們現在便来談談这种看法的根据。当奧軍在米兰前面約 30 英里处占領自己的障地时，是无法指望他們能够控制可以通往这个首府的所有的接近路的。联軍面前敞开着三条道路：他們可以經過瓦兰察、加尔拉斯科和貝雷古阿尔多直接在奧軍障地的中央运动；其次，可以經過沃格拉和斯特拉杰拉，并在帕維亞和皮阿琴察之間渡过波河，在奧軍的左翼运动；最后，可以直接經過韦尔切利、諾瓦拉和博法洛拉在奧軍的右翼运动。如

果奧軍想要防守米兰，那末他們只能把軍隊橫置于这三条道路中的一条上而进行防守；如果每条道路各派一个軍防守，那便是分散兵力，必然要遭到失敗。但是，側方陣地可以和普通的正面陣地同样可靠地，甚至是更可靠地防守道路，这是一条公认的現代作战原則。任何一支軍隊，除非在数量上占极大优势，否則从一支集中在不大的地区而且已准备好向任何方向行动的 15—20 万人的敵軍附近經過时，是沒有不受到懲罰的。例如，当 1813 年拿破侖向易北河方向行进时，联軍虽然兵力比拿破侖少得多，却有条件挑战，他們在吕特岑，在由爱尔福特通往萊比錫的道路以南数英里处，占領了陣地。拿破侖的軍隊已有一部分通过后，才知道敌人就在附近，結果，全部法軍的运动受阻，已进到前面的纵队被召回，随即展开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法軍虽在数量上有 6 万人的优势，但也仅能招架而已。第二天，双方軍隊平行地向易北河运动，而联軍的退却，甚至沒有遭到敌人的騷扰。如果双方的兵力不是这样悬殊，那末联軍的側方陣地，至少也会和橫貫萊比錫大道的正面陣地一样成功地阻止拿破侖的运动。居萊將軍現在占領的正是这种側方陣地。他率領着一支軍隊(如果需要，当然他可以使軍隊的数量达到 15 万人以上)，駐守在摩尔塔拉和帕維亞之間，截断了由瓦兰察直通米兰的大道。他的两翼都可能受到迂迴；但这就是他的陣地的特点，而这个陣地如果还有某种价值的話，那末他便应当从这个陣地給他提供的、可以击退敌人迂迴的那些有利条件中，找出对付这种意外情况的有效手段。不过，我們現在完全不去注意奧軍的左翼，而只研究实际上被迂迴的那一翼的情况。5 月 30 日和 31 日以及 6 月 1 日，路易-拿破侖把他的大部分軍隊集中在韦尔切利附近。31 日，他在这里已經有皮蒙特軍隊 4 个师(56 个营)、尼耶尔

軍(26个营)、康罗貝尔軍(39个营)和近卫軍(26个营)。此外,又調来了麦克馬洪軍(26个营),在这里共集中了175个步兵营的巨大兵力,騎兵和炮兵尙未計算在內。居萊則掌握有奧軍6个軍的兵力,虽然其中一部分被派去担任守备部队,一部分被派去对付加里波第,一部分被派往沃格拉,等等,因而兵力减少了,但平均每軍还有5个旅,总共有30个旅,即150个营。

如果像这样的一支軍隊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的話,那末任何一个將軍都不敢冒險地把它留在自己的翼側或后方。此外,按照这支軍隊的配置情况来看,除了在这支軍隊可以达到的範圍內作側敌行軍以外,从右方是无法迂迴它的,而这样的側敌行軍是非常危險的一种机动。一支处于行軍隊形的軍隊常常需要很多時間,才能变换成适当的战斗队形。它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是保持着充分战斗准备的。而如果甚至在正面、也就是在行軍隊形的抵抗力最强的一面遭到攻击时,它都不能有充分的战斗准备的話,那末在行軍纵队遭到来自側面的攻击时,准备程度就更差了。

因此,公认的战略原則要求避免在敌人可以达到的範圍內进行側敌行軍。路易-拿破侖仗着他的軍隊在数量上的优势,有意違反了这个原則。他向諾瓦拉和提契諾河进发,显然对自己翼側上的奧軍毫不在意。居萊正应当在这时采取行动。他应当在6月3日夜間留一个軍在阿哥尼亚河下游監視瓦兰察,而把部队集中在維吉瓦諾和摩尔塔拉附近,并于4日以他現有的全部兵力猛攻前进中的联軍的翼側。使用将近120个营的兵力对联軍綿长的、互不联系的纵队进行这样的攻击,几乎毫无疑问地是会获得战果的。如果这时联軍的一部分兵力已渡过提契諾河,那就更有利了。这一攻击将迫使这部分兵力折回,但是即使折回,他們恐怕也来不及

改变会战的結局了。不过即使这次攻击不成功，奧軍随后也可以安全地向帕維亞和皮阿琴察退却，就像馬振塔会战以后的退却一样。我們有理由假定，这就是居萊原来的計劃。但当6月2日他看到法軍已开始把主力集中在直通米兰的大道上、集中在他的右翼的时候，看来他却失去了果断的精神。如果他把法軍放过，法軍到达米兰的时间也許不比他迟，因为在那里几乎沒有一兵一卒阻擋他們直通米兰的道路。即使法軍一支不大的部队进入米兰，也会在整个倫巴第燃起一場大火。虽然这些意見很可能在居萊主持的軍事會議上多次討論过，并且很可能大家坚持向法軍的翼側进攻，认为这样足以掩护米兰，但是当这样的情况成为事实而法軍和奧軍距米兰已同样近的时候，居萊却躊躇起来，最后还是退到了提契諾河以东。这便决定了他的命运。当法軍沿直綫向馬振塔运动时，他进行了长距离的迂迴：沿提契諾河谷而下，并在貝雷古阿尔多和帕維亞附近渡过該河，然后又重新沿河而上，向博法洛拉和馬振塔前进，企图以此截断敌人直通米兰的大道，但已經太迟了。結果，他的軍隊一小股一小股地开到，不能以足够的大量兵力投入战斗来有效地抵抗联軍的主力。奧軍作战非常勇敢，这是不容怀疑的；至于会战中的战术和战略問題，我們打算另外再談。但是，奧軍的战报企图把奧軍被击败以及这次会战决定了米兰的命运而且必将对整个战局发生影响这个事实隱瞞起来，这是徒劳无益的。奧軍还正在阿迪杰河上集中3个軍，这将使他們在数量上占有相当大的优势。此外，居萊被解除了指揮权，指揮权让給了具有欧洲第一位战略家名声的海斯將軍。但是，据說他身体很弱，不能長時間連續处理事务。

讀者大概会注意到，关于奧軍在洛美利納暴行的报道，既为法

国也为英国的可靠消息所否认。我們請讀者注意这个事实，不只是为了要对双方严守公道，而且是因为我們对于这些报道的不信任曾被曲解为我們对于弗兰茨-約瑟夫的同情；其实，与此相反，我們甚至不希望这位帝王被推翻的日期延迟一天。如果他能和拿破侖互相殘杀而同归于尽，那末这将是历史的公正判决的圓滿結果。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6 月 9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作为社論載于 1859 年 6 月 22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669 号

弗·恩格斯 馬振塔会战²²⁷

法国和奥地利关于馬振塔会战的公报，证明我們决定根据电讯所作出的推断是正确的。

6月4日晨，奥軍完成了东渡提契諾河的退却，向馬振塔和阿比亚帖格腊索进发，目的是向进攻米兰的法軍的翼側进行攻击。克拉姆-加拉斯將軍剛剛率領他那个軍（第一軍）的1个师由米兰开到，就必須立即用这一师的兵力以及在馬振塔附近同他会合的第二軍（由利希頓施坦指揮）的兵力自正面攻击敌軍。他的預备队是第七軍（由措貝尔指揮）的萊沙赫师，配置在距馬振塔数英里的科尔別塔附近。提契諾河一綫由于不适于防守而被放棄以后，奥軍的这七八个旅就需要扼守納維利奧大运河，这条运河几乎与提契諾河平行，并且只能从桥梁上渡过。奥軍必須防守博法洛拉桥和馬振塔桥，这两座桥位于由馬振塔通往提契諾河圣馬尔蒂諾桥的两条道路上。第一軍的1个师（由科尔登將軍指揮）沿着通往土尔比哥的道路运动；第二軍的2个旅占領了桥梁，1个师位于馬振塔附近，而萊沙赫师（屬第七軍），如前所述，配置在科尔別塔附近。

法軍分两路纵队进攻。第一路纵队名义上由薩托里英雄⁷⁰指揮，包括1个近卫擲彈兵师、康罗貝尔軍、尼耶尔軍和巴拉盖·狄利埃軍，共9个师，即18个旅（117个营）。这路纵队直接沿着通

过圣馬尔蒂諾桥的諾瓦拉—米兰道路进攻，应当夺取博法洛拉桥和馬振塔桥。第二路纵队由麦克馬洪指揮，包括1个近卫輕騎步兵师、麦克馬洪軍和全部皮蒙特軍隊，共8个师，即16个旅（109个营，因为皮蒙特軍隊的师比法軍的师多1个营）。这路纵队的前卫沒有遇到什么严重的抵抗就渡过了提契諾河，并在土尔比哥附近渡过了納維利奧河；它必須向奧軍翼側机动，也就是自北方向馬振塔直进，以支援第一路纵队的正面攻击。

正午，麦克馬洪开始攻击。他以优势兵力把当面的科尔登师驅逐到馬振塔。2时左右，追击奧軍前哨的近卫擲彈兵，进抵运河，向博法洛拉桥和馬振塔桥进行了攻击。这时在戰場上，有法軍8个旅对付奧軍5个旅（第一軍的2个旅和第二軍的3个旅），奧軍兵力还不到3万人，因为萊沙赫有2个旅甚至还滞留在科尔別塔附近。法国的“神秘的將軍”模仿福斯泰夫，把不到3万人的奧軍当作是超过了125 000人的兵力。法軍攻占了运河上的桥梁。在馬振塔的居萊，命令萊沙赫轉入进攻，夺回馬振塔桥。这个任务是完成了，但是博法洛拉似乎仍在法軍手中。这时会战停頓了。麦克馬洪軍和近卫擲彈兵的进攻被奧軍成功地击退，而奧軍为此把現有的每一名兵士都投入了战斗。其他各軍到哪里去了呢？

到处都有他們，只是在应当有的地方沒有。从德国調来的第一軍第二师还在途中。当然，奧軍不能等待它的到来。第二軍的另一个旅沒有任何消息。不过居萊本人的电报证明，第二軍只有3个旅参加了会战。由里利阿將軍指揮的第七軍第二师，位于卡斯特列托，距馬振塔6—7德里。第三軍位于阿比亚帖格腊索附近，距馬振塔5德里。第五軍大概是从貝雷古阿尔多向阿比亚帖格腊索运动，会战开始时距馬振塔至少有9德里。第八軍正由比納斯

科向貝斯塔齊亞行軍，離作戰地區 10—12 德里，而第九軍 *incredibile dictu!*〔簡直是不可思議地！〕在帕維亞下方、離作戰地區 20—25 德里的波河沿岸無所事事地游蕩。由於兵力空前地分散，居萊使自己陷入了極其不利的境地，以致從中午到傍晚 5 時左右只能用 7 個旅來抵抗法軍兩路縱隊的猛攻。奧軍之所以能抵住這一猛攻，只是因為人數眾多的法軍僅僅沿兩條道路運動因而前進緩慢的緣故。

當萊沙赫扼守馬振塔橋並繳獲了法軍一門新式綫膛炮的時候，居萊先生動身到羅貝科（運河沿岸的一個村莊，在博法洛拉下方約 3 德里處）去了，目的是加速第三軍和第五軍的行軍並確定他們的進攻方向。結果第三軍的 4 個旅被派到前面去了，其中，哈通旅和朗敏旅位於第一綫，杜爾菲爾德旅作為預備隊，這 3 個旅都沿運河行動，而維茨拉爾旅則沿提契諾河行動。他們應當猛攻法軍的右翼。不過這時法軍也得到了援軍。皮卡爾旅（屬康羅貝爾軍勒諾師）開來援助擲彈兵，並將萊沙赫擊退到橋東。隨後又調來了維努亞師（屬尼耶爾軍）、讓南旅（屬勒諾師）和特羅胥師（屬康羅貝爾軍）。這樣，法軍在這一地點又集中了 2 個擲彈兵旅和另外 6 個旅。而奧軍方面參加作戰的，實際上只有第三軍 4 個旅中的兩三個旅。雖然兵力對比如此不利，奧軍仍然接連幾次地攻占了馬振塔橋，法軍只是在以優勢兵力進行了殊死奮戰以後，才奪取了該橋。

在進行爭奪橋梁的戰鬥時，麥克馬洪在自己的正面地段上準備對奧軍第一和第二軍的四五個旅進行第二次攻擊。他的 2 個師成兩個縱隊再次開始向馬振塔進攻，在他們後面第二綫進攻的是卡穆指揮的近衛輕騎步兵師。因為埃斯潘納斯師和拉莫特盧日師

(屬麥克馬洪軍)被奧軍順利地击退了,所以輕騎步兵赶来增援他們。会战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轉折时机来临了。法軍的第一路纵队通过了馬振塔桥,并向麥克馬洪纵队已經逼近的馬振塔村进行了猛攻。最后,到日落时,在戰場上出現了奧軍第五軍黑森亲王旅。它再一次企图把法軍击退到馬振塔桥以西,但未获成功,实际上也很难指望,一个兵力薄弱、在蒙特貝洛会战中已遭受重大損失的旅能够阻止并击退向馬振塔桥猛扑的大量法軍。正面、翼側和后方都遭到攻击的奧軍,从会战开始起就一直处于敌人毫不間断的火力襲击之下,最后不得不退却,而法軍在进行了反复多次的猛烈攻击之后,到傍晚时占領了馬振塔。

居萊将自己的軍队撤到里利阿师占領着的科尔別塔和第三軍扼守着的罗貝科,而第五軍則在这两地之間露营。居萊企图在6月5日繼續战斗,但是分发下去的命令发生了完全不可理解的混乱,因而打破了他的計劃。半夜,居萊突然得到报告,第一軍和第二軍由于对命令理解錯誤而撤离戰場数德里,而且到清晨3时还在繼續撤退。这一消息迫使居萊放棄了原定在次日进行的会战。这时,奧軍第三軍的一个旅重新向馬振塔进行了攻击来掩护軍队退却,奧軍的退却是非常有秩序的。

根据奧軍的报道,奧軍方面参加会战的兵力有:

第一軍科尔登师·····	2个旅
第二軍·····	3个旅
第七軍萊沙赫师·····	2个旅
第三軍·····	3个旅
第五軍(夜晚才加入战斗)·····	1个旅
<hr/>	
共 計·····	11个旅

根据法軍的材料，联軍方面参加会战的兵力有：

近卫軍 2 个师·····	4 个旅
麦克馬洪軍·····	4 个旅
康罗貝尔軍 2 个师(勒諾师和特罗胥师)·····	4 个旅
尼耶尔軍 1 个师(維努亚师)·····	2 个旅
<hr/>	
共 計·····	14 个旅

法軍 14 个旅，即 91 个营，至少有 8 万人。但是法軍报道中在提到維努亚师的进攻时說：

“損失最大的是第八十五基干团····· 馬丹普雷將軍在率領自己的旅作战时受伤。”

但是，無論第八十五团或者馬丹普雷旅，都不屬於尼耶尔軍的維努亚师。第八十五团屬於拉德米罗师的第二旅(由拉德勒·德·拉·沙尔耶尔將軍指揮)，而馬丹普雷將軍所指揮的是該师的第一旅。拉德米罗师屬於巴拉盖·狄利埃元帅指揮的軍。这便确凿地证明，参加会战的法軍兵力比他們公报中所指出的要多。加上拉德米罗师，法軍就有 16 个旅，即 104 个营，9 万名兵士；既然拉德米罗师竟被这样无礼地隱瞞了，因此可以怀疑，在戰場上作战的法軍数量总的說来比战报中所指出的要多得多。此外，从奥軍报道中显然可以看出，在意大利的联軍作战部队中几乎所有的团都有兵士被奥軍俘获的。看来，法軍在数量上拥有极大的优势，这使奥軍获得了更大的荣誉。他們仅仅让出了曾經作过战的土地，繳获了 1 門火炮，損失了 4 門火炮，而且他們在撤离戰場时坚信，如果兵力与法軍相等，胜利必将屬於他們。但是，关于他們的总司令，皇帝兼国王陛下的將軍，我們可以說些什么呢？6 月 4 日，他等待法軍攻击。他有 13 个旅(初次参加战斗的 7 个旅、里利阿师的 2

个旅和第三军的 4 个旅), 距战场 8 德里; 此外有第五军的 4 个旅, 距战场 9 德里, 第八军的 4 个旅, 距战场 10—12 德里。这就是他的军队在早晨 8 时 30 分的配置情况。如果要求这些军队在发生会战的当天下午 4 时或者至迟到 5 时集中在距馬振塔相当近的地区以便参加会战, 这能够认为是过分的嗎? 在中午 2 时, 当重要的会战开始的时候, 参加会战的兵力难道不是应当至少是 13 个旅, 而不是 7 个旅嗎? 如果这样, 科尔登师和 second 军就不致遭受重大的伤亡。而在第五军調来以后, 奥军便能够轉入进攻, 并将法军驅逐到提契諾河以西。但是, 奥军原有的臭名远扬的行动迟緩的习惯, 看来再度控制了他們。真拿破侖曾經屢次說过, 奥军常把最宝贵的时刻浪费在无益的仪式和空洞的形式上面。居莱又恢复了这些傳統, 这样, 他就輕率地放棄了自己的胜利, 而把它奉送給了“神秘的將軍”。如果奥军兵士不是那么英勇, 如果十二月十日会²²⁸的名誉会长不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人物, 那末法军是可以輕而易举地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的。

6 月 5 日晨, 在居莱指揮的军队中未参加馬振塔会战的兵力有:

第三军 1 个师.....	2 个旅
第五军的部队.....	3 个旅
第七军 1 个师(里利阿师).....	2 个旅
第八军的部队.....	4 个旅
<hr/>	
共 計.....	11 个旅

这一兵力与居莱在会战前夕所掌握的兵力相等。在参加上一次会战的部队中, 只有第一军和 second 军的 3 个师失去了战斗力, 其余的 8 个旅是具有战斗力的; 这样, 居莱一共有 19 个有战斗力的

旅，人数在10万以上。和他們对抗的敵軍，是已参加了6月4日战斗的法軍16个旅以及在6月5日应做好战斗准备的生力軍4个师，此外还有皮蒙特軍隊的一两个师，他們还在离戰場很远的地方，正在行进。可見，居萊在5日可以掌握有19个旅。如果有第九軍的支援（居萊不知为什么把第九軍配置在离戰場很远的地方），这些兵力一定能改变前一天的战斗結局。居萊的錯誤可以簡單概括如下：

第一、当路易-拿破侖在奧軍战斗行动所及的範圍內由韦尔切利向土尔比哥作側敌行軍时，居萊沒有利用敌人这一不利的形勢，沒有以他所有的兵力向易于攻破的敵軍行軍纵队猛攻；如果他那样做，他便能够重复1849年拉德茨基的战法，把敌人截为两段，并将其一部分兵力驅逐到阿尔卑斯山。

第二、他不但沒有这样做，反而退到提契諾河以东，以此采取迂迴行动来掩护米兰，而直通米兰的大道却被敌人所控制。

第三、退却时，他分散了自己的兵力，并且退却又是如此迟緩，漫不經心，这种情况在演习場上也未必能够得到原諒。

第四、他把第九軍完全置于集中地区以外。

第五、在会战过程中，軍隊的集中是如此混乱，以致遭到了无謂的伤亡，而把胜利白白奉送給了敌人。

居萊虽然犯了这一系列严重的錯誤，并且遇到了法軍精銳部队这样的敌手，但是他仍沒有遭到彻底的失敗，在这方面，他完全要感激他的軍隊的英勇和他的敌人“神秘的將軍”的“机智”。居萊的軍隊显示了人民的不可战胜的生命力，而他本人則表現了君主制度的老朽和昏聩。“神秘的將軍”則看到，随着奧軍向明乔河的退却，会战的戏剧性的阶段結束了，真正的战争开始了。他已經确

信真拿破侖經常向他的哥哥約瑟夫提到的一句明智的格言的正确性。这句格言說，在战争中，任何捉迷藏的手法都不能摆脱个人的厄运。最后，康罗貝尔由于麦克馬洪受到器重而感到自己受了委屈，因此威胁要揭穿薩托里英雄在这次出征中所建树的某些功績。所以，这位“英雄”就急于要回到包松涅尔郊区自己爱妻的身旁，并 at any price [不惜任何代价] 力图締結和約。如果不能締結和約，那末即使是进行和談也可以，这样，“他这位要人退返巴黎”就有理由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6 月 16 日
左右

載于 1859 年 6 月 18 日“人民报”
第 7 号和 1859 年 7 月 2 日“紐約
每日論壇报”第 567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并根据
“紐約每日論壇报”校对过

卡·馬克思

斯普累河与明乔河

大家知道，伏尔泰在他費尔涅的家中养了四只猴子，他用他的四个論敌的名字来給它們命名，称它們为：弗萊隆、博麦尔、农諾特和弗兰克·德·龐比尼昂。这位作家沒有一天不亲手喂它們，不賞它們一頓拳脚，不擰它們的耳朵，不用針刺它們的鼻子，不踩它們的尾巴，不給它們戴神甫的高筒帽，用最难以想像的卑劣方式对待它們。費尔涅的这位老头需要用这些批評的猴子来发泄肝火，消仇解恨并抑制他对論战武器的恐惧，就像路易·波拿巴如今在意大利需要革命的猴子一样。目前有人也正是这样在喂养着科苏特、克拉普卡、福格特、加里波第；給他們戴上金項鏈，然后就把他們鎖起来；他們有时受到爱撫，有时則遭到拳打脚踢，这要看什么情緒在他們主子的心中占了上風——是对革命的仇恨还是对革命的恐惧。这些可怜的革命的猴子还应当成为革命的人质，保证十二月二日的英雄⁴⁹同革命党之間实行休战，以便这位英雄能够毫无阻碍地毀掉儲藏奥尔西尼炸彈的軍火庫，能够在他自己的陣营里攻击他在土伊勒里宮长期为之战栗的敌人并置之于死地。

帝国應該重新意味着和平²²⁹，——否則就不值得为了創立它而去干这許多可耻的事，再三再四地違誓背約并忍受那么多的屈辱。現在这个帝国已經无法保证使革命的炸彈不爆炸、使秘密团

体不活动、使蛮横无礼的资产者和放肆的士兵不捣乱了，对这样的帝国是不能忍受的！Marchons！〔前进！〕这些话就是拿破仑观念²³⁰，就是自由、民族原则、独立，就是你所希望的一切；因此，marchons, marchons！

把意大利变成捕捉革命的捕鼠笼的想法是够狡猾的了。不过这种想法不能收到任何效果，因为谁要是让人家把自己诱进捕鼠笼，那末只要他一入笼，他对革命党便立刻失去任何作用了。那种想把科苏特、克拉普卡、福格特和加里波第诸位先生头朝下地塞入革命的火山口来堵死火山的企图实在幼稚可笑，这只能加速火山的爆发。

纵然依靠他们的帮助在意大利清除了一颗奥尔西尼炸弹，另一颗炸弹也一定会在法国、德国、俄国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爆炸，因为对革命的要求和革命的自然必要性，就像你们把自己的宝座建立其肩上的被奴役的各国人民的绝望状态一样普遍存在，就像你们那样得意洋洋地利用其贫困状况来趁火打劫的被掠夺的无产者的仇恨一样普遍存在。只是当革命像闪电一样，像只有在无法防止的致命的雷击发生以后你们才能听到霹靂声的闪电一样，成为无法估计的和无法防止的自然力的时候，革命的爆发才会成为不可避免的。

至于这个爆发可能在什么地方发生以及如何发生，这没有多大的意义。主要的是它一定要发生。看来普鲁士这一次要违反它自己的意愿，成为普遍革命要求的表达者。那个独自“从来没有说过任何蠢话，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聪明事情”的摄政王完全是出于对保守主义的喜爱而不得不认真地扮演革命的角色，而路易·波拿巴只不过是出于恐惧、矫揉造作和任性而同革命玩弄打情骂俏

的把戏。

普魯士的**武装調停**，就是同奥地利結成同盟，就**意味着革命**。

柏林报刊的普遍情緒說明，与动員军队相結合的中立会成为一种經不起批評的立場。“国民报”²³¹ 这家反映着內閣所沾染的自由主义狂热的机关报非常正确地指出：

“在目前条件下，中立对比利时、荷兰或者瑞士是合适的；对普魯士來說，中立就是灭亡。”

这家报纸认为，如果波拿巴实现了他对意大利的“崇高”願望，其唯一的后果就是确立法国对整个半島的軍事保护权，即使战争是局部性的，即使法国并没有因进行战争而直接得到任何領土，情况也将如此。这样一来，最近三年中本来就已十分明显的俄法两国对欧洲大陆的霸权将会大大加强，以致随时都可以开始早在圣海倫島上就已經宣布的划分統治範圍的工作。新帝国完全表现了其先驅者的趋向，不过它的处境更加有利，因为它沒有外来的压力，可以自行选择時間、地点和条件去孤立自己的敌人，然后再把他們 en détail [各个] 击破。为了阻撓这个直到現在总是巧妙地实现着的斗争計劃获得成功，普魯士不得不同奥地利一起行动，但决不是为了尾随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而是为爭取它自己的生存而斗争。

前面提到的那篇被看作是摄政政府的政治綱領的文章的内容大致上就是这样。对于不久前委托威尔特尔先生进行的調停使命的成就，沒有一个人相信。但是，如果拿破侖同意議和（这种和約最多只会助长他的官兵的不滿），那末就不必再同他斗争了。在这种場合，霍雷修·沃尔波尔說的关于撒丁外交家德·維利侯爵的一句話对他倒是适用的：

“他死了，但是他还希望把他的死亡保守一两天秘密。更长的时间他是做不到的。”

如果上述未必会认真进行的調停不能成功，那时候爆发的就将不仅是拿破侖暴政和哈布斯堡王朝专制統治之間在明乔河上的战斗，而且还有在奥得河和維斯拉河上的为爭取自由而进行的战斗。在离普魯士边境两德里的卡利希已經集結了大批軍隊。有一个普魯士軍已奉命經汉諾威开赴萊茵河，另一个軍正开往南方，而且已建議联邦軍隊各軍軍长到柏林参加軍事會議。所有这些措施都只不过是為了动員前卫。进行反对法国和俄国的斗争的軍隊还不存在，这支軍隊只能从人民中征集，但不是从正在朗誦空喊爱国主义的路德維希²³²所写的那些真正德意志的、空喊爱国主义的詩句的人民中去征集，而是从积极行动起来充滿偉大的、所向披靡的革命热情和毅力的人民中去征集。如果不能喚起这种热情，那霍亨索倫王朝的动員、武装調停、宣战、进行战争等等就将是以黃金海岸的一个黑人的幼稚想法为基础的，这个黑人认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敌人的大門口上吊，就会給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卡·馬克思写于 1859 年 6 月 23 日
左右

載于 1859 年 6 月 25 日“人民报”
第 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

弗·恩格斯

奧軍向明乔河的退却

战果通常是在追击敌人时得到的。追击愈猛，胜利愈大。俘虏、火炮、輜重、軍旗等，与其說是在会战过程中获得的，不如說是在会战后的追击中获得的。另一方面，胜利的彻底程度取决于追击的勇猛程度。根据这个观点来看，我們对于馬振塔会战的«grande victoire»〔“巨大胜利”〕能够說些什么呢？在会战結束后的第一天，我們看到法国“解放者”正在“进行休整”，沒有半点追击的企图！向馬振塔进军时，联軍事实上集中了全部战斗部队。相反地，在奧軍方面則是一部分軍队在阿比亚帖格腊索，一部分在通往米兰的道路上，一部分在比納斯科附近，最后还有一部分在貝耳焦伊奧索附近，——这是如此分散、行动如此迟緩、相互之間又沒有任何联系的独立纵队的聚合，看来它們有意要敌人来攻击它們，一举把它們击潰，然后让敌人不慌不忙地把退路已断的整旅和整团抓去当俘虏。在这种場合，拿破侖，即真拿破侖一定会巧妙地运用那些据法軍公报所称在前一天沒有参加作战的 15 或 16 个旅。但是，假拿破侖、福格特先生的拿破侖、«Cirque Olympique»〔“奥林匹克馬戏院”〕的拿破侖、圣詹姆斯街和阿斯特利圓剧場的拿破侖怎样呢²³³？他却吩咐在戰場上用午餐。

直通米兰的道路已向他敞开。戏剧性的效果有了保证。这对

他自然是足够了。6月5、6和7日，整整三天奉送給奧軍，以便讓他們能够脱离險境。他們向波河运动，再順波河北岸沿三条平行路向克雷莫納行进。在这三条道路最北的地点，由距离敵軍行进路綫最近的貝奈德克將軍率領3个师掩护这次退却。他从6月6日的駐地阿比亚帖格腊索經過比納斯科向梅累尼亚諾进发。在后一城中，他留下2个旅扼守陣地，直到中路纵队的輜重前进得相当远时为止。6月8日，巴拉盖·狄利埃元帅接到了把这2个旅驅逐出城的命令，并且为了保障胜利，麦克馬洪軍也归他指揮。10个旅对2个旅！麦克馬洪軍被派到距拉姆布罗河不远的地方去截断奧軍的退路，而巴拉盖的3个师則对梅累尼亚諾进行了攻击；2个旅自正面猛攻，2个旅由右方迂迴，2个旅由左方迂迴。奧軍只有1个旅（罗登旅）在梅累尼亚諾，柏尔將軍指揮的旅还在拉姆布罗河的彼岸（东岸）。法軍攻击非常猛烈，他們以5倍于奧軍的優勢兵力，迫使罗登將軍在进行了頑强的抵抗后放棄了城市并在柏尔旅的掩护下退却。柏尔旅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后方占領了陣地的，完成任务后，也同样秩序井然地退走了。在这次会战中，柏尔陣亡。作战最多的一个奧地利旅的损失无疑很大，但是十二月的crapauds^①所举出的数字（約2400人）完全是臆造的，因为該旅的全部兵力在会战前不超过5000人。法軍的胜利又是沒有战果的。沒有得到一件战利品，沒有繳获一門火炮！

而奧軍虽然在6月6日放棄了帕維亞，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又在8日占領了該城，以便9日再度放棄它。同时，在馬振塔会战后仅仅6天，即在6月10日，奧軍就放棄了皮阿琴察。他們

① 癩蛤蟆們，棍徒們（指路易-拿破侖总參謀部的人）。——編者注

从容不迫地沿波河退却，直到基澤河。在这里，他們轉向北方，向洛納托、卡斯提奧涅和卡斯特尔-霍夫勒多前进，并在那里占領了防禦陣地，似乎在等待着“解放者”的新的攻击。

奧軍起初由馬振塔向南至貝耳焦伊奧索，然后向东至皮亞德納，最后再向北至卡斯提奧涅，实际上成为半圓形的运动，而这时“解放者”却沿这个半圓形的直徑前进，因此，他們走的路程比奧軍近三分之一。但是，除了在梅累尼亞諾以及在卡斯特尔内多洛附近（加里波第曾在那里与奧軍进行了小战斗），法軍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追上奧軍。追击时的这种毫不认真的态度在軍事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这是加西莫多最大的特色，他笨拙地模仿他的伯父（符合拿破侖法典中 «La recherche de la paternité est interdite» 这一条文²³⁴的伯父），甚至在自己胜利时也是这样。

就在奧軍主力在6月18日至20日之間于基澤河的后面占領自己的陣地的同时，联軍的前卫到达了基澤河的前面。他們要把主力調到这里来，需要几天的時間。因此，如果奧軍真正想要在这里应战的話，那末第二次总会战便可能在6月24日或者26日发生。如果“解放者”要想使自己的部队保持进攻的 *élan* [銳气]，并且不給敌人在小战斗中打击他們的机会，他們就不能够在敌人眼前长久延宕。奧軍的陣地非常有利。由洛納托附近的加尔达湖南端到明喬河方向，是一片台地，在靠近倫巴第平原一面以洛納托—卡斯提奧涅—圣卡西阿諾—卡夫里阿諾—沃尔塔—綫为界。在这样的陣地上极便于迎击敌人。这个台地在加尔达湖方向上漸漸隆起，提供了許多不同的良好陣地，而且，就这些陣地的坚固和严密程度而言，从前面到后面一个胜于一个，因此就是攻占台地的边緣也还不能保证获得胜利，而只不过是結束了会战的第一幕。陣地

的右翼为湖所掩护，而左翼向后弯得很深，因此明乔河綫沒有設防的一段几乎有 10 英里。但是，这不仅不是陣地的缺点，而且相反是它最大的优点，因为包括在四要塞——維罗那、培斯克拉、曼都亚和列尼亚哥——之間的沼澤地起自明乔河东岸，敌人如果在数量上沒有极大的优势，是不敢进入这个沼澤地的。由于曼都亚控制着明乔河綫的南端，而明乔河那一面的地区又处于曼都亚和維罗那两要塞控制的範圍以內，所以輕視台地上的奧軍而企图不顾他們在明乔河方向上前进的一切作法都会迅速失敗。进攻軍队的交通綫会遭到破坏，而他們自己却不能威胁到奧軍的交通綫。不仅如此，在明乔河那一面，他們还没有攻击的对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是談不到圍攻的），而由于沒有攻击的对象，他們便不得不重新折回。这样一种机动的主要危險，就在于它必須在台地上的奧軍的眼前进行。奧軍只要全綫轉入进攻，由沃尔塔向戈伊托、由卡夫里阿諾向圭迪佐洛和切列扎拉、由卡斯提奧涅向卡斯特尔-霍夫勒多和蒙特克亚里等方向上襲击敌人的纵队，“解放者”就只能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进行这一会战。这个会战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奥斯特利茨，只是角色更換而已。

馬振塔会战的“英雄”居萊被解除了指揮权。施利克代替他担任第二軍团司令官，而文普芬仍为第一軍团司令官。集中在洛納托和卡斯提奧涅附近的这两个軍团合在一起組成奧地利的意大利軍团，由弗兰茨-約瑟夫担任名义上的司令官，而以海斯为总參謀长。从施利克在匈牙利战争中的經歷来看，他是一个中等才干的將軍。海斯无疑是当前最有才干的战略家。危險在于臭名远揚的弗兰茨-約瑟夫亲自干預指揮。同拿破侖侵入俄国时的亚历山大一世一样，在他的周圍都是些形形色色的老朽的、无远見的、滿腮

鬍鬚的万事通，在这些人中間可能有一些是直接拿俄国人的錢的。如果法軍听任奧軍停留在他們的陣地上而直驅明喬河，奧軍便可以从台地上了如指掌地、一团一团地历数整个法軍。由于在距退却綫最近的道路上出現敌人而产生的强烈影响，很容易使弗兰茨-約瑟夫这样的头脑糊塗起来。那些带有悲观情緒的、佩着肩章的万事通們的饒舌，对他那脆弱的神經來說，可能成为他放棄精选的陣地而退到要塞区的最好的借口²³⁵。当一个国家由一些愚蠢的年輕人來領導时，一切必然都取决于他們的神經状态。深思熟慮的計劃，被当作儿戏，听凭主观想像和一时的兴会任意处置。由于在奧軍大本营有了弗兰茨-約瑟夫这样一个人，奧軍除了指靠敌人兵营里有个加西莫多以外，恐怕就再无其他胜利的保证了。但是后者至少曾在圣詹姆斯街的职业賭徒中間鍛煉过他的神經，所以即使說他不像他的崇拜者所希望的那樣是铁打的，但至少也是橡皮制成的。

弗·恩格斯写于1859年6月23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59年6月25日“人民报”
第8号

俄文譯自“人民报”

弗·恩格斯 战争的消息²³⁶

“亚細亚号”輪船的到达，对于經紐芬兰拍来而在昨天早晨登載于本報的、报道明乔河大捷的簡訊，并没有带来任何补充的消息。会战发生在6月24日星期五，由清晨4时继续到晚上8时，而輪船是在会战的第二天，在尚未能得到某些詳細材料以前启航的。因此，我們必須等到“亚拉哥号”或“文格拉号”輪船到达魁北克才能获得关心时事的讀者所迫切希望获得的詳細报道。不过由于交战双方的人数大致相等，所以由此得出一个結論：奥地利兵不能和法国兵相比。

在英国以及在我們这里，大多数軍事家似乎都曾认为，在拿破侖亲王的那个軍由托斯卡納調来从后方攻击奥軍以前，联軍不会开始大規模的会战；同时还推測，将有一支小舰队被派到加尔达湖，这将使联軍在該地区还能进行側击。但是拿破侖第三什么都没有等待即进行了会战，并获得了胜利。从得自联軍兵营的通訊（其中的一切要点，我們登載在另一个地方）中看得很清楚，会战是唯一现实的出路。迟延会挫伤获胜的联軍的銳气，而使奥軍有可能凭借数量上的优势而在小战斗中击败他們。

在施利克指揮的奥軍軍团的行动中，也出現了在这以前曾造成居萊敗北和失寵的那种躊躇不决和优柔寡断的現象。起初，奥軍曾准备在洛納托—卡斯提奥涅—圣卡西阿諾—卡夫里阿諾—沃尔塔—綫应战。在这里，向加尔达湖和明乔河的方向渐渐隆起的

台地，提供了許多良好的、一道接一道的障地，其中每一道障地都較前一道更堅固、更嚴密，因此占領這個台地的邊緣並不能算是勝利，而只不过是會戰的第一幕。奧軍的右翼為湖所掩護，而左翼則相當靠後，因此明喬河綫幾乎有 10 英里的一段是沒有設防的。但是，這並不是缺點，相反，實際上是這個障地的一個最大的優點，因為在明喬河背後四個要塞之間有一個危險的地區，如果敵人在數量上沒有很大的優勢，便不敢冒險進入這個地區。明喬河綫的南端由曼都亞控制着，而明喬河那一面的地區又在曼都亞和維羅那兩要塞控制的範圍以內。所以無視在台地上占領障地的奧軍而企圖繞過他們在明喬河方向上前進的一切作法都會迅速失敗。向前進的軍隊的交通綫會被破壞，而他們自己却不能使奧軍的交通綫受到威脅。但是，這種機動的最大危險就在於它必須在台地上的奧軍的眼前進行，並且後者只要全綫轉入進攻，由沃爾塔向戈伊托、由卡夫里阿諾向圭迪佐洛和切列扎拉、由卡斯提奧涅向卡斯特爾-霍夫勒多和蒙特克亞里襲擊分散的聯軍縱隊，聯軍就只能在極為不利的情況下進行這一會戰，這個會戰很可能變成又一個奧斯特利茨，只是角色更換而已。

這就是奧軍所占領的障地的情況。他們的另一個有利條件就是對地形很熟悉，因為許多年以來他們的軍隊經常在這個地區進行大規模的演習。如同我們所說的，這個地區對於當前的會戰有着周密的準備，城市和鄉村都已設防。但是由於某種在軍事觀點上完全不能理解的原因，奧軍最後放棄了障地，並順利地退到明喬河的東岸。24 日，聯軍在明喬河發起攻擊，最後擊敗了奧軍。作戰計劃的這個突然的、重要的改變與普魯士（據說它把明喬河和阿迪杰河之間的四邊形要塞區或多或少地看作是德國防禦體系的一部

分)的行动是否有某种关系呢,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今后能得到进一步澄清。至于谈到普鲁士,那末有一个情况似乎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它的态度必然要妨碍路易-拿破仑把大量军队由法国增调到意大利。我们的读者已经知道,普鲁士在它的9个军中已动员了6个,也就是说已经征集了那些服过3年现役而长期归休的、编入这些军的后备军兵士入伍。在这6个军中,有5个要在莱茵河下游及中游占领阵地。因此,在科布伦茨和麦茨之间的一线上,目前应有普军约17万;德意志联邦军队中人数共达10—12万的其他两个军,也就是巴伐利亚军和巴登、维尔腾堡及黑森-达姆斯塔德军,也将在巴登和普法尔茨占领阵地,这是不容怀疑的。为了对抗这样一支兵力,拿破仑第三必须动用目前在法国的几乎全部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认为求助于匈牙利人的起义和利用科苏特是适当的;虽然我们几乎可以确信,在必不得已时,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普鲁士目前是否真正有意参战,这是十分值得怀疑的,但是,它想避免参战也不那么容易。它那种规定大部分身体合格的成年人都要当兵的军事制度,要求全国甚至自第一类后备军召集时起即保持非常紧张的状态,以致使普鲁士不能长期处于旁观地位而不采取军事行动。现在,在8个省的6个省中,所有身体合格的20—32岁的男子都已经武装起来。这种动员给普鲁士的整个工商业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只有在军队迅速出征的条件下国家才能够支持这种局面。否则兵士本身也不能忍受这样一种情况,并且在两三个月以后,全军便会哗变。此外,民族感情的浪潮在德国十分高涨,已走到如此地步的普鲁士再不能后退了。德国人对于巴塞尔和约,对于1805年和1806年的摇摆态度以及对于莱茵联邦²³⁷的记忆犹

新，所以他們抱定決心，不允許他們詭詐的敵人現在又來各個擊破他們。普魯士政府不能壓抑這種感情。它可能企圖引導這種感情，雖然，它如果這樣做，將使自己完全同民族運動聯繫起來，並且使任何一點動搖都被看作是叛變，只會使動搖者本身受到打擊。毫無疑問，進行談判的企圖是會有的；但是，現在各方面已經亂到如此地步，以致不論在哪一個方向都看不到一條走出這座迷宮的道路。

但是，德國一旦參戰，那末沒有疑問，舞台上很快還要出現一個角色。俄國曾通知德國各小邦，如果德國人對奧地利的崩潰不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它將參加戰爭。俄國目前在普魯士邊境附近集中 2 個軍，在奧地利邊境附近集中 2 個軍，並在土耳其邊境附近集中 1 個軍。它可能在今年開戰，但一定會很遲。從巴黎和約以來，俄國沒有征過新兵；由於在最近一次戰爭中傷亡巨大，歸休兵的数量是不會很多的，如果每個軍（甚至在召集歸休兵回隊以後）能有 4 萬人，那已經是很多了。在 1860 年以前，俄國不可能採取進攻行動，但即使到 1860 年它也不會有 20 萬或 25 萬以上的兵力。現在，德國可以用來在北方作戰的有 4 個普魯士軍，共 136 000 人，還有聯邦軍隊的第九軍、第十軍和 1 個預備師，約 8 萬人，並且至少還有 3 個奧地利軍，14 萬人。因此，即使現在在防禦戰中，或者甚至在向俄屬波蘭進攻時，德國對於俄國都是一無所懼的。但是俄國不論在什麼時候參加這次戰爭，都將激起強烈的民族感情並加劇階級矛盾，而在那時鬥爭的規模很可能使第一次法國革命時期的各次戰爭為之遜色。

弗·恩格斯寫於 1859 年 6 月 24 日左右

原文是英文

作為社論載於 1859 年 7 月 8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5682 號

弗·恩格斯 索尔费里諾会战

具有騎士風度、对假拿破侖的荣誉梦寐以求的弗兰茨-約瑟夫向我们表明，当“天生的統帅”^①掌握了指揮权时，其結果将会如何。我們在上星期已經看到，奥軍最初本来应当占領卡斯提奥涅高地上的陣地，但是却在大家都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一次会战的时候，毫无理由地不战而放棄了陣地，退到了明乔河东岸^②。但是弗兰茨-約瑟夫还嫌这样不足以說明自己的軟弱无能和不合邏輯的行为。当軍队剛一到达明乔河东岸，我們这位“年輕的英雄”就改变了他的决定（因为对于哈布斯堡王朝說来，沒有抵抗就退出戰場，是有伤体面的）——命令軍队向后轉，重新渡到明乔河西岸，攻击敌人！

弗兰茨-約瑟夫以这样幼稚的、时而向后时而向前的运动大大地加强了軍队对自己的至圣的統帅的信任之后，就率領軍队去攻击敌人。奥軍最多有 15 万人；甚至连喜欢說实話的波拿巴也沒有說出比这更大的数字。奥軍在至少有 12 英里寬的正面上进攻。这样，每英里（2 100 步）正面上最多有 12 500 人，当正面比較窄

① 双关語：《angestammter》既有“天生的”的意思，也有“世襲的”、“继承的”的意思。——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445—446 頁。——編者注

时，这一密度在一定条件下当然是足够的，但是在如此寬闊的正面上无疑就不够了，而对进攻說来則更不合适，因为不論在什么情况下这一密度都不能保证在个别的重要地点进行足够强大的突击。加以敌人无疑地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因此，奥軍的进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敗；比較强大的敌人几乎必定能在任何地方突破进攻軍队的如此薄弱的队形。6月23日星期四，奥軍开始了总攻；他們到处都輕而易举地击退了敵軍的先头部队，占領了波佐倫哥、沃尔塔和圭迪佐洛，并于傍晚推进到索尔費里諾和卡斯特尔-霍夫勒多。第二天早晨，奥軍又将敵軍前卫向后压缩了一些，而左翼几乎进到基澤河岸，但在这里，他們遇到了敵軍主力，于是会战就全面展开了。奥軍的两翼都取得了胜利，特别是右翼，他們狠狠地打击了和他們对垒的皮蒙特軍队。这里，奥軍显然是胜利了。但是在中央却显出了錯誤的部署所造成的后果。索尔費里諾这一中央的鎖钥陣地，經過頑强的战斗最后落到法軍手中，同时法軍还对奥軍左翼造成了数量上的巨大优势。这两个情况迫使弗兰茨-約瑟夫发出退却的命令，弗兰茨-約瑟夫大概已把自己的全部兵力一直到最后一个人，都投入了战斗。奥軍显然在沒有受到任何軍队追击的情况下秩序井然地退却了，并且毫无阻碍地回到了明乔河东岸。

关于会战的詳細情况的材料，我們沒有及时得到，因此在今天的报上还无法談論。但是無論如何，对于奥軍在这一次作战也非常勇敢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这由以下事实得到证明，那就是奥軍在敌人优势兵力面前頑强地坚持了16小时，特别是他們在沒有受到敌方任何阻扰的情况下秩序井然地进行了退却。看来，奥軍对法国先生們并沒有什么特別尊敬之感；可能，蒙特貝洛、馬振塔和索尔費里諾只不过使他們相信，在兵力相等的情况下他們不仅

能够对付法軍，而且能对付自己將軍們的愚蠢无知的后果。在这样的决战中，繳获30門火炮和似乎俘获了6000名俘虏，这对于一个胜利者來說，是非常渺小的战果；在許多爭夺村庄的战斗中，胜利者所取得的战果也不会比这更小些。但是，奧軍在对数量上占优势的敵軍作战时表现得多么英勇，他們的統帥就又一次表现得多么昏庸无能。猶豫、动搖、朝令夕改——目的好像是在故意瓦解自己軍隊的士气，——正是由于这些，弗兰茨-約瑟夫在3天內在自己軍隊面前无可救药地毀了自己。很难想像有什么人比这个傲慢的年輕人更可怜的了，他竟敢担負起統率軍隊的重任，而同时他自己却像随風搖摆的芦葦，受着极其矛盾的外来影响的支配——今天他遵循着老海斯的指示，明天却又听从与此完全相反的格律奈的建議，今天退却，明天却突然轉入进攻，总之他从来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过，这对于弗兰茨-約瑟夫說来已經够了；他威信扫地，像个可怜虫似地回到維也納，在那里，他将受到应有的接待。

战争只是在現在才开始。只是在現在，奧軍要塞才开始发挥作用。法軍渡过明乔河，他們的兵力就将随之而分散，同时也将展开一系列爭夺各个据点和陣地的战斗，展开一系列次要的战斗，在这些战斗中，奧軍由于現在終於由老海斯來統率，因此总的說來即使兵力少些，仍然有較大的胜利的可能性。一旦由于这一点以及由于增援部队的到来而重新恢复了交战双方的均勢，奧軍将能集中优势兵力，猛攻零散的敵軍，重演索馬康帕尼亚会战和庫斯托查会战²³⁸，只是規模要比过去大10倍。当前6个星期的任务就是如此。不过，奧軍只是現在才調集預备部队，这些預备部队将使奧地利的意大利軍团至少得到12万人的增援，而路易-拿破侖自从普魯士动員以后就处于困境，不知道从哪里能得到增援部队。

这样，索尔費里諾会战只是稍稍改变了战争的前途，但是，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果，这就是使得我們的主宰各邦的“国父”之一的威信完全扫地，并使他的整个奥地利古老的制度发生动摇。在奥地利各地，都流露出了对宗教条約²³⁹訂立后所建立的各种制度、集权管理和官僚統治的不滿情緒，人民要求推翻这种在国内进行压迫、在国外遭受失败的制度。維也納群情激憤，以致弗兰茨-約瑟夫匆忙赶到那里去作出让步。但是与此同时，使我們非常高兴的是，我們其他的“国父”也都出了丑。在具有騎士風度的普魯士摄政王作为一个政治家表现出弗兰茨-約瑟夫作为一个將軍所表现的那种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以后，各小邦由于普魯士軍隊通过了它們的領土又开始与普魯士吵鬧起来，而德意志联邦軍事委员会声称，它至少要經過两星期的考虑，才能就普魯士关于使用上莱茵地区联邦各軍的建議提出报告。事情混乱透頂。不过，执政老爷們的出丑，对于我們民族沒有任何危險。相反地，在1848年革命以后完全变了样的德国人民，現在已足够强大，不仅对付得了法国人和俄国人，而且同时还对付得了自己的33个“国父”。

弗·恩格斯写于1859年6月30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59年7月2日“人民报”
第9号

俄文譯自“人民报”

弗·恩格斯 历史的公断

我們已經把接到的所有关于索尔費里諾会战的公报以及来自双方兵营的大量报道(包括倫敦“泰晤士报”的出色的专訊在內)都发表了。既然这些文件已为我們的讀者所了解，那末現在來說明在这次会战中弗兰茨-約瑟夫之所以战敗和拿破侖第三之所以获胜的真正原因，也許是适时的。

当奥皇为了发起进攻而重新渡过明乔河时，在他指揮下共有 9 个軍，除了要塞守备部队外，每軍平均可有 4 个步兵旅开到战场，总共 36 个旅，各旅的平均人数为 5 000—6 000 人。因此，奥皇用于进攻的兵力大約有步兵 20 万人。虽然以这样的兵力完全足以发起进攻，但是奥軍的人数仍然少于或勉强相当于联軍，因为联軍計有皮蒙特軍队的 10 个步兵旅和法軍的 26 个步兵旅。自馬振塔会战时起，法軍得到了大量归休兵和受过訓練的新兵的补充，这些兵士已分配到各团，法軍的旅无疑比奥軍的旅要强。奥軍的援軍是两个新銳的軍(第十軍和第十一軍)，这样，旅的总数增加了，但各旅的人数未增。因此可以大胆地认为，联軍的步兵是滿額的(即法軍 17 万人，撒丁軍隊 75 000 人)，其中除去战争开始以来的伤亡約 3 万人外，还有步兵約 215 000 人。既然奥軍把希望寄托在迅速而突然的行动上，寄托在自己的部队要求为馬振塔的失敗

雪耻并证明自己丝毫不弱于敌人的这种强烈愿望上，以及寄托在有利的阵地上（奥军只要向卡斯提奥涅背后的高地迅速前进便能重新占领这一阵地），因此，他们自然完全有理由实行进攻，但是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就是他们的部队要尽可能地集中并且迅速勇猛地前进。而这两条他们都没有作到。

他们不是在培斯克拉与沃尔塔之间全军展开进攻以便夺取至洛纳托和卡斯提奥涅为止的一带高地，不是留下骑兵或许还有一个步兵军来防守圭迪佐洛平原，反而留下一个军即第二军在曼都亚防守该要塞，以防备据估计配置在其附近的拿破仑亲王那一个军的突然袭击。如果曼都亚的守备部队没有另一个军的援助便不足以扼守欧洲最坚固的要塞以抵抗敌人偶然的攻击，那末这必然是一支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守备部队。但是，看来这还不是把第二军固定在曼都亚不动的理由。问题在于其他两个军（第十一军和第十军）被派出迂迴在阿左拉（基泽河上的一座城市，在卡斯特尔-霍夫勒多西南约6英里处）附近的联军右翼，也就是说这两个军距战场相当远，在任何条件下都必然会过迟地到达战场。很可能，第二军的任务是在拿破仑亲王一旦到达时掩护这支迂迴部队的翼侧和后方，并防止该部队遭到迂迴。整个这一计划竟在这样大的程度上以奥地利旧学派的思想为依据，它是这样复杂，在任何一个经常研究作战计划的人看来是这样可笑，以致无疑地应当认为奥军参谋部对于该计划的制定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因为除了弗兰茨-约瑟夫和他的侍卫官格律奈伯爵以外，谁也不会想出这种古董来。这样，3个军都顺利地配置在安全地点。对其余的7个军则做了如下的安排：第八军（贝奈德克军）扼守波佐伦哥与加尔达湖之间的高地上的阵地，以圣马尔蒂诺为它的中心和主要据点；第五军

(施塔迪昂軍)占領索尔費里諾；第七軍(措貝尔軍)占領圣卡西阿諾；第一軍(克拉姆-加拉斯軍)占領卡夫里阿諾。向南，在平原上，第三軍(施瓦尔岑堡軍)由戈伊托沿大道經過圭迪佐洛向卡斯提奧涅进攻，而第九軍(沙弗哥特希軍)則向美多列以南进攻。这一翼側向前推进了，为的是驅逐联軍的右翼并在第十軍和第十一軍到达戰場的时候(如果大体說来能够到达的話)支援这两个軍。

因此，奧軍的实际兵力是真正投入战斗的6个軍，他們展开在长达12英里的战綫上，即每一个軍的正面平均寬2英里(3540碼)。陣地拉得这样长，便不可能有足够的纵深。但是这并不是它唯一的严重缺点。第三軍和第九軍由戈伊托发起进攻，他們的退却路綫也通向該地；距他們最近的第一和第七軍的退却路綫通向瓦列卓。看一下地图，我們便可知道，这样就形成了离心退却。在平原上的这两个軍行动一无所获的主要原因无疑就在这里。

这24个旅(如果貝奈德克軍曾得到从培斯克拉守軍中撥出的一些部队的加强，那末这就是25个或者26个旅)的拙劣部署，由于部队前进迟緩而更是漏洞百出。如果奧軍于6月23日重新渡过明乔河时能够迅速进軍，那末兵力集中的奧軍便可能在中午与联軍在德散扎諾、洛納托和卡斯提奧涅附近突出的陣地上接触，而且可能在入夜前把联軍驅逐到基澤河一带，也就是說在会战开始前奧軍便会获得胜利。然而实际上他們在高地上所达到的最远的地点是距明乔河只有6英里的索尔費里諾。在平原上，奧軍的先头部队到达了卡斯特尔-霍夫勒多，也就是說由明乔河前进了10英里。如果有适当的命令，他們也許会到达基澤河。以后在24日，他們不在拂曉出动，而决定在上午9时出动。这就是为什么在夜間2时出动的联軍于早晨5—6时便襲击了奧軍的原因！这一后

果是不可避免的。33个强大的旅与25或26个弱小的旅（因为在这以前他们都参加过战斗并遭受了严重的伤亡）作战，结果只能是奥军失败。只有贝奈德克率领他的5个或6个旅与皮蒙特军队相持了一整天（除了近卫军以外，皮蒙特的10个旅，全部参加了会战）；如果不是中央和左翼的全线退却迫使贝奈德克退却的话，他也许还能坚守阵地。在中央，第五军和第一军（共8个旅）扼守索尔费里诺，与巴拉盖·狄利埃军（6个旅）和近卫军（4个旅）对抗到下午3时，而麦克马洪的4个旅则阻住了奥军的第七军（4个旅）。当索尔费里诺最后被占领时，法军近卫军便对圣卡西阿诺展开进攻，这样，便迫使奥军的第七军放弃了阵地。最后在下午5时左右卡夫里阿诺的陷落决定了在奥军中央的会战的结局，使奥军不得不退却。在奥军左翼，第三军和第九军与尼耶尔军及康罗贝尔军的1个师（勒诺师）展开了混战，一直到后来，在白天的时候，康罗贝尔军的另外1个师（特罗胥师）加入了战斗，才把奥军击退到戈伊托。虽然奥军这8个旅从一开始便和兵力大致相等的敌军作战，但是他们本来是可以起到更大得多的作用的。他们如果自主迪佐洛向卡斯提奥涅方向坚决前进，便能解救在圣卡西阿诺附近的第七军，从而间接援助索尔费里诺的守军，但是因为他们的退却路线通往戈伊托，所以每前进一步都会使退却路线遭受危险，于是他们采取了完全不适于这类会战的谨慎的行动。但是错误应当由命令他们向戈伊托退却的人来负责。

联军除3个旅（康罗贝尔军的2个旅和皮蒙特军队的1个近卫旅）以外，全部兵力都参加了战斗。因此，既然联军方面除了这3个旅以外不得使用全部预备队，才勉强取得了胜利，而且在胜利之后并没有追击敌人，那末如果弗兰茨-约瑟夫能够很好地利用

当时在南面相当远的地方游蕩的那3个軍，会战的結局会怎样呢？假定他派1个軍給貝奈德克，把另外1个軍配置在索尔費里諾和圣卡西阿諾背后作为預备队，再把1个軍配置在卡夫里阿諾背后作为总預备队，那末会战的結局又将怎样呢？对于这种方案是用不着有任何怀疑的。皮蒙特軍队和法軍为夺取圣馬尔蒂諾和索尔費里諾而进行多次徒劳无益的攻击以后，他們的陣綫的中央将会被奧軍全部兵力发起的、有力的和最后的进攻所突破，結果就不会是奧軍向明乔河退却，而是在基澤河两岸結束会战。奧軍失敗了，但不是敗于法軍，而是敗于他們自己的皇帝的傲慢和愚蠢。由于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由于統帅的碌碌无能，他們战敗了，但在退却时仍然保持了队形，除了戰場以外，再沒有留給敌人任何东西。他們证明了自己是不会惊惶失措的，在这方面并不亚于其他一些世界聞名的軍队。

弗·恩格斯写于1859年7月6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作为社論載于1859年7月21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5692号

弗·恩格斯

索尔费里诺会战

关于索尔费里诺的惨败与弗兰茨-约瑟夫的极端愚蠢之间的直接联系，在“人民报”前一号上已经有了说明^①。以后发表的关于这一次会战详细经过的报道证明，我们对“年轻的英雄”的才能还是作了过高的估计。1859年对1849年的胜利者们说来，是一场国家考试，在这场考试中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落第了。

到6月23日，奥军兵力不少于9个军，其中第一、二、三、五、七、八军都已经全部或部分地参加过战斗，而第九、十、十一军还完全是新锐兵力，与敌人一次也没有接触过。前6个军共有13万人左右，后3个军有75000人。这样，奥军可以用来对付敌人的兵力不少于20万。但是弗兰茨-约瑟夫作了些什么呢？他将第十军和第十一军从曼都亚派到阿左拉（在基泽河岸），企图从后方打击法军，而为了掩护军队的这一调动，以免受到据估计配置在附近的法军第五军（由拿破仑亲王指挥）可能进行的袭击，他又将第二军留在曼都亚。结果，弗兰茨-约瑟夫只剩下了6个军，即24个旅，而他就是企图用这些兵力对法国—皮蒙特联军的战线展开进攻的。但是，军队运动得如此缓慢，到6月23日傍晚，奥军还在离明乔河

^① 见本卷第448—451页。——编者注

仅仅 6 英里的地方露营。6 月 24 日的进攻规定在上午 9 时才开始。6 月 23 日联军先头部队被迫全线退却这一情况以及他们的侦察兵的报告,当然在法军中引起了忧虑,结果不是奥军在 9 时开始预定的进攻,而是他们自己在 5 时遭到了袭击。为了对付奥军 24 个旅(共约 136 000 人),联军陆续投入的兵力不少于 33 个旅(皮蒙特军队 9 个旅,45 000 人,法军 24 个旅,15 万人)^①,换句话说,联军用来自对付他们的兵力不少于 195 000 人;此外,联军方面还有皮蒙特军队的近卫军 1 个旅和法军布尔巴基师的 2 个旅作为预备队。这样,在战场上联军的兵力就不少于 21 万人。联军掌握了这样的优势兵力,胜利是有保障的。然而贝奈德克将军率领奥军第八军仍胜利地击退了全部皮蒙特军队的攻击,并在右翼大获全胜,虽然他自己的军只有 4 个旅,可能还从培斯克拉守军中得到了 1 个旅即第五旅的增援。由奥军 12 个兵力薄弱的旅占领的中央阵地,遭到了法军 14 个强大的旅的攻击,结果奥军被击退了。左翼 8 个旅,经过长时间战斗后也被法军配属有大量骑兵和炮兵的 10 个旅的优势兵力所击退。在左翼以及在中央阵地,奥军本应当集中大量炮兵,但是弗兰茨-约瑟夫却宁愿让预备队炮兵的 13 个连(104 门火炮)安然无事地留在瓦列卓一弹未发!由此可见,法军炮兵占有火力优势的原因很简单,这完全不是因为綫膛炮占有优势,而是因为奥地利皇帝的庸碌无能和不可救药的糊涂,他在

^① 皮蒙特军队包括莫拉尔师、凡蒂师、杜兰多师(每师由 2 个旅编成)以及薩瓦各旅。法军方面参加会战的兵力有:近卫军 4 个旅,巴拉盖·狄利埃指挥的第一军(6 个旅),麦克马洪指挥的第二军(4 个旅),康罗贝尔指挥的第三军(4 个旅,另有 2 个旅作为预备队)以及尼耶尔指挥的第四军(6 个旅)。总共有 33 个旅,另有 3 个旅作为预备队。上述资料引自小拿破仑的公报。不过我们只引用了有关步兵的资料。

战斗中根本没有使用自己的预备队炮兵。

但是，第十軍和第十一軍在哪里呢？当战斗在加尔达湖和圭迪佐洛之間进行的时候，他們正在南面相当远的平原上游蕩。据說，第十一軍远远地看到了一些敌军部队，而第十軍甚至连这种情况也沒有遇到。当会战胜敗已成定局的时候，这两个軍不仅沒有来得及放一枪，而且还在很远的地方，因此，原来准备阻止奥軍这一迂迴运动（法軍早就知道了奥軍的这个行动）的康罗貝尔軍，才得以把自己全部兵力直到最后一个师都用去对付奥軍的主力，因而在奥軍左翼赢得了会战的胜利。

这时，第二軍占領着曼都亚陣地，准备抵抗想像中的普隆-普隆亲王的攻击，而普隆-普隆亲王在那一天正和他的全軍在离戰場有 8 日行程远的帕尔馬大設盛宴呢！

这里，在我們面前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它說明，当指揮权掌握在德国“天生的統帅”手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两个軍（5 万人）毫无目的地在远离戰場的地方漫游，另一个軍（2 万人）为了对付假想的敌人在曼都亚扼守着战綫，而 104 門火炮則毫无目的地編在瓦列卓的輜重队里，也就是說整整三分之一的兵力和全部预备队以及炮兵，都被故意調离戰場，以便使其余三分之二的兵力毫无理由地被敌军优势兵力所粉碎，——这种彻头彻尾的蠢事，只有德国的“国父”才作得出！

奥地利軍隊作战非常勇敢，以致兵力相当于他們一倍半的联军，只是在作了最大努力以后才把占領着三个陣地的奥軍从两个陣地上逐出，而且联軍的这些优势兵力甚至不能打乱奥軍的队伍或者試图进行追击。如果把弗兰茨-約瑟夫沒有利用的 7 万人和 104 門火炮配置在沃尔塔和波佐倫哥之間作为预备队，那末，会战

将取得怎样的結局呢？法軍无疑将被击败，而战线将重新由明乔河、基澤河向前推到提契諾河。奥地利军队不是败于联军，而是败于他们自己的皇帝的愚蠢和傲慢。奥軍兵士在前线犯了很小一点过失，就要挨 50 棒。而弗兰茨-約瑟夫如果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錯誤和荒謬行为稍有悔过之意的話，那末他至少也应当到海斯將軍那里去接受自己完全应得的 50 棒的惩罚。

从此以后，战争就在四边要塞区激烈地进行了，而这些要塞对联军的行动已经开始有了初步的影响：**联军不得不分散自己的兵力**。一支部队留在布里西亚附近，监视通往提罗耳的道路。法軍第五軍（由普隆-普隆指揮）配置在戈伊托以便对付曼都亚，并且还得到了 1 个师的增援。皮蒙特军队的大部分被用来圍攻培斯克拉。培斯克拉曾經是一个不大的要塞，但是据現有的資料来看，从 1849 年以来那里构筑了許多向前突出的、配置成半圓形的堡垒，这一要塞已成为一个营垒了（見 1859 年 4 月 1 日“两大陆評論”²⁴⁰）。如果是这样的話，皮蒙特军队恐怕还要花費不小的力量，而用来进行路易·波拿巴所大肆宣揚的“維罗那战役”的兵力，就只剩下 1 个师和在索尔費里諾受到損失而被削弱的法軍部队（25 个旅，略多于 13 万人）。如果現在当真由海斯担任統帅，并且掌握权柄不受限制的話，那末他也許很快就会找到机会进行几次胜利的会战，从而为取得更大的胜利作好准备。法軍的增援部队有里昂軍团的 3 个师，据說还有巴黎軍团的 1 个师，共有 5—6 万人。奥軍的增援部队有：从南提罗耳調来的第六軍，从的里雅斯特調来的第四軍以及从駐意大利的部队中抽出的每团的第四野战营，一共至少有 54 个有战斗經驗的营。这样奥軍增援部队共有 10 万人左右。但是归根到底，对于奥軍說来有重要意义的，与其說是依靠生力軍不

如說是依靠統一而合理的指揮来达到戰場上力量的均勢。而这一点，只有在庸碌无能的弗兰茨-約瑟夫停职、由海斯完全掌握指揮权的情况下才可能做到。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7 月 7 日

載于 1859 年 7 月 9 日“人民报”

第 1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²⁴¹

反动派正在实现革命的纲领。这个似乎是矛盾的现象，说明了至今仍在扮演 1789 年革命遗嘱执行人角色的拿破仑主义具有力量的原因，说明了集中起 1848 年关于统一的朦朧幻想并赋予这种幻想以明确的和实际的形式奥地利施瓦尔岑堡政策获得胜利的原因，而且也正是这个似乎是矛盾的现象给德意志联邦议会改革的怪影增加了力量；承蒙普鲁士的恩典，这个怪影如今正在小德意志的道路上游荡，并同公民雅科布·费奈迭和蔡斯一起，在 1848 年革命的坟墓上跳着离奇的幽灵舞。的确，这个革命的纲领在反动派的手中就变成对相应的革命意图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的最厉害的杀人武器。要知道反动派是照路易·波拿巴实现意大利民族派的要求那样来实现革命的要求的。这个过程悲喜剧因素就在于，那些由于说空话和愚蠢而要被绞死的不幸的罪人在拚命喝采：“做得好！”而当刽子手已经在拉紧他们脖子上的绞索的时候，他们还为他们自己被处死而热烈鼓掌。

正像 1848 年由当时一个号称“革命的”党所提出的、由于传播工作组织得很巧妙而传遍了一切省议会，传遍了一切喧嚣骚乱的人群的著名三月要求²⁴²一样，现在在德国的中部和南部，某种“声明”²⁴³正在凯歌行进。看来，这个“声明”是摄政王给符合他的愿

望的、支持武装調停的“人民运动”提出的 mot d'ordre [口号]。这个由摄政王一手策划出来的綱領有一个富有特征的名称，即“**拿騷声明**”^①，因为它获得了以我們的老相識蔡斯先生为首的拿騷的国父們的首先承认，声明宣布：

“在这次战争中不能不支持奥地利，因为这场战争可能会使德国的利益遭受打击。相反地，德国負有責任（馮·施萊尼茨先生一定会說——負有使命）要求奥地利实行改革，尤其是保证在意大利維持符合当前要求的秩序。在目前的斗争中，軍事的和政治的領導权应当交給普魯士。但是，仅把領導地位授予普魯士，还不能（！）滿足令人經常感到的对于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的需要；德国人民一方面不能再拒絕改造德国的中央政权，另一方面也不能再拒絕制定宪法，这种宪法在德国的人民代議制中应当臻于完善（馮·加格恩則喜欢說——达到頂峰）。”

这个还叫做“宣言”的拿騷声明已經为达姆斯塔德、法兰克福、維尔騰堡的立宪派和民主派的名流們所接受，那里在和諧的混乱中在这个声明上签字的有罗伊謝尔、肖特、費舍、杜維尔努阿、齐格勒等人。它現在也被德国西南部、法兰克尼亚和紹林吉亚的“自由主义的”报刊所接受并吹嘘为一种神奇的福音书，說它能够拯救德国，能从地球上消灭法兰西帝国，把議員的报酬归还給費奈迭先生并使蔡斯先生获得政治威望。

“原来龙犬皮里藏着这家伙。”^②

請看“普魯士使命”的維護者們依靠多么可鄙的詭計，利用年老昏聩的帝国庸人們的极端的愚鈍来进行投机，打算騙取联邦議

① 原文是俏皮話：«nassauisch»（“拿騷的”，“拿騷族的”）和«Nassauer»（“食客”，“寄食者”）发音相近。——編者注

② 見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場；浮士德的书齋。——編者注

会如此俠义地爭得的、以那样的高价换来的布隆采耳桂冠！我們應該承认，对于“使命”的英雄們我們是不特別尊敬的，他們不是当众狠狠地給埃申海麦尔街²⁴⁴的先生們几記耳光（他們很想这样做，但就是不敢），而只是站得远远地嗾使肖特、蔡斯和罗伊謝尔先生去攻击他們，想以此来使他們伤脑筋。如果柏林的国家的圣贤君子除了从 second hand〔第二手〕把已故的馮·拉多維茨先生及其倒霉的^①哥达党人的遗产搶购过来以外，再也不知道有别的办法可以“拯救德国”，那就讓他們随遇而安，乖乖服从法俄专政好了，因为他們对于意大利解放运动所开始的斗争的严重性甚至一无所知。

可見，現在仍然有爱国的代議机关，它們的孱弱无力在“拿騷声明”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它們用幻想安慰自己，以为稍微模仿一下 1848 年那套帝国議会的把戏，它們就能够唤起非常强大的，足以同俄国和法国的联合专制暴政相抗衡的人民运动。这只不过证明亨·海涅是多么正确，他說：

“真正的愚蠢也和真正的賢明一样罕見。”

但是要知道，拿騷族的作者們的愚蠢完全是假装的、虛伪的和怯懦的；这是这些先生們为了被人們看作是疯人院的不負法律責任的住戶而胡乱給自己戴上的丑角的假面具，因为他們内心为自己可悲的优柔寡断和毫无作为而羞愧，想乞求社会的同情以逃避責任。

“实行人民代議制的改革了的中央政权”——这是多么好的武

① 原文是俏皮話：«selig»——“已故的”，«unselig»——“倒霉的”。——編者注

器啊！它可以用来对付疯狂的波拿巴主义和被弄得绝望了的，由于国内遭到了威胁而被迫在德国土地上争取自己生存的沙皇制度。我觉得，在1848年和1849年我们已经充分领略了这二者的滋味，因此我们懂得，把自己的革命力量耗费在高谈立宪的人民代议制上面的任何人民运动，都是注定要灭亡的。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7月9日
左右
载于1859年7月9日“人民报”
第1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意大利贏得了什麼？

意大利戰爭結束了。正像奧地利人突然地開始了這次戰爭一樣，拿破侖也突然地結束了這次戰爭²⁴⁵。這次戰爭雖然為時不久，但是代價昂貴。在進行戰爭的那幾個星期內，不僅功勳、入侵、反擊、進軍、會戰、勝利和失敗比比皆是，而且生命財產遭到了只有在許多歷時長久得多的戰爭中才會遭到的大量損失。這次戰爭的某些後果是十分顯著的。奧地利喪失了土地，它的軍隊的英勇善戰的聲譽一落千丈，它的自豪感遭到了嚴重的傷害。但是，我們擔心，如果說它從這裡吸取了什麼教訓的話，那也只會是軍事方面的教訓而不是政治方面的教訓，我們擔心，這次戰爭的結局只會使它在軍訓、軍紀和軍備方面作一些改變，而不會在政治制度或者管理方法方面作什麼改變。可能，它已相信了綫膛炮的功效。也許，它會在自己的軍隊中實行一些從法國的朱阿夫兵那裡剽竊來的東西。它這樣做的可能性比根本改變仍由它統治的意大利諸省的管理制度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此外，奧地利至少現在對意大利沒有監護權了，它以前一直不顧撒丁的抗議和不滿，堅持保留這種權利，從而引起了這次戰爭。但是，儘管奧地利這次被迫放棄了監護人的身分，然而監護人的位子看來卻沒有空出來。有一個事實非常值得注意，就是關於意大

利問題的新協定是在法奧兩國皇帝短促會見時簽訂的，就是說，是由兩個各自統率一支外國軍隊的外國人簽訂的。還有一個事實也非常值得注意，就是這個協定簽訂的時候不僅沒有遵照手續哪怕表面上征詢一下協定所涉及的各方的意見，甚至也沒有通知他們，而他們也沒有懷疑會有人背着他們搞什麼勾當和宰割他們。從阿爾卑斯山背後開來了兩支軍隊，在倫巴第谷地相遇并打了起來。經過 6 個星期的鬥爭之後，這兩支外國軍隊的外國首領沒有讓一個意大利人參加他們的會議，就動手安排和處理意大利的事務。在軍事方面降到了法國將軍地位的撒丁國王，就參與達成最後協議和對協議的影響來說，他所起的作用顯然不會超過他即使是一個真正的普通法國將軍所能起的作用。

撒丁所以一再大聲疾呼地控訴奧地利，不僅因為奧地利圖謀全面監督意大利事務，而且還因為它支持一切違法亂紀行為，它的政策是要保持現狀，它干涉它的各個意大利鄰國的內政和妄想取得用武力來鎮壓這些國家的居民改變或改善自己政治地位的任何嘗試的權利。意大利人的感情和願望或撒丁所保衛的實行革命的權利在新制度下是否比在舊制度下得到更多的注意呢？儘管在戰爭時期波河以南各意大利公國所提供的援助被接受了，可是根據和約卻又把这些公國交還給它們的被趕走的統治者。在意大利的任何一個地區，對壞的管理制度的埋怨都沒有像在教皇國那樣厲害。這個國家的惡劣管理制度，奧地利對這種惡劣管理制度的同情和支持，不久以前被看作是意大利狀況中的一種糟糕的，甚至是一種糟糕透頂的現象。儘管奧地利被迫放棄了自己對教皇國的武裝保護權，但是這個國家的不幸的居民卻沒有因為這一改變而得到任何好處。法國像奧地利過去一樣廣泛地支持教皇的世俗權

力；因为教皇国政府的違法乱紀行为在意大利爱国者看来是同它的教会性质不可分割的，所以大概沒有改善的希望。目前作为教皇的唯一保护者的法国，对于教皇国政府的違法乱紀行为实际上应当比过去奥地利負有更大的責任。

至于談到构成新制度的一部分的意大利联邦，那末必須指出下述情况：这个联邦或者是一个具有一定程度权力和影响的政治实体，或者只是一种騙局。在后一种情况下意大利絕不会得到統一、自由和发展。如果它确是一个实体，那末只要注意一下它的成員，就可以預料从它那里究竟会得到什么好东西？要知道，被专制制度的利益所联合起来的奥地利（由于占領威尼斯省或王国而加入了联邦）、教皇和那不勒斯国王可以輕易地制服撒丁，即使其余的較小的国家都站在撒丁方面也无济于事。奥地利甚至可以利用这种新的形势来保证自己对其他意大利国家的控制，这种控制至少会像它以前企图通过跟它們簽訂的專門条約而取得的控制一样，是不受欢迎的。

卡·馬克思写于 1859 年 7 月 12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作为社論載于 1859 年 7 月 27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697 号

卡·馬克思 和

“欧罗巴号”輪船带来的消息使我們认为，拿破侖第三所宣布的、作为与弗兰茨-約瑟夫和談基础之一的意大利联邦，是一个非常含糊而又不可靠的东西。目前它只是奥地利同意了的主張，但还必须提交意大利各国政府审查。甚至连撒丁(順便說一句,看来法奥在締結和約时是沒有同撒丁国王商量的),我們也沒有根据认为它已經同意接受这种主張,当然撒丁国王无疑是应当俯首听命的。同时据說預定担任联邦名誉首脑的羅馬教皇,曾給路易-拿破侖写信說,他将請求各天主教大国的保护,而在目前,正当他希望得到法国保护的时候,这种手段是相当值得怀疑的。至于不久前被赶走的托斯卡納、摩地那和帕尔馬的君主,他們显然是要重登自己的宝座,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把什么联邦强加于他們,他們无疑都会接受的。但是,关于当今意大利唯一独立自主的君主——那不勒斯国王^①的态度,我們毫无所知;他断然拒絕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还不能肯定,到底会不会組成什么联邦,即使能組成联邦,也完全不知道它将是什么性质的。

直到現在才弄清楚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奥地利保留着所有

^① 弗兰契斯科二世。——編者注

四大要塞，而且明乔河成了它的領地的西部边界。这样一来，它仍然掌握着北意大利的鎖钥，并能利用任何有利的时机夺回它現在所不得不交出的东西。仅仅这一个事实就已說明，拿破侖肯定說他已經真正將奧地利人赶出了意大利，是多么荒誕无稽。实际上，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如果說拿破侖在战争中战胜了奧地利，那末奧地利在締結和約时显然战胜了拿破侖。奧地利只是放棄了已被夺走的东西，此外再也沒有丧失什么。法国以数亿元的代价和将近5万子弟的生命，取得了對撒丁的控制，为自己的兵士带来了很大的光荣，并使自己的皇帝获得了一个非常幸运的、但战績不太大的統帅的声誉。对于法皇來說，这已經够多了，但是对于負担所有这些开支和蒙受所有这些損失的法国來說，这却太少了，难怪巴黎弥漫着不滿情緒。

拿破侖用来解釋这样突然結束战争的理由，是这次战争的規模日漸扩大，不符合于法国的利益。換句話說，就是这次战争开始变成了以羅馬起义和匈牙利起义为特征的革命战争。很有意思的是，就在索尔費里諾会战以前，正是这个拿破侖还邀請科苏特到兵营去和他会見，实际上促使科苏特采取了革命行动来帮助联军。在这次会战以前他所不怕的危險，在会战以后却立即使他害怕了。情随事迁是由观察得出的一句老話，但是它正适用于目前这种場合。然而，我們用不着多找論据就能证明，拿破侖这个人不但自私自利，而且丧尽天良，他为了滿足个人的虛荣心而使5万人流血牺牲，現在，他甚至打算背棄曾在口头上伪善地承认过的各項原則，而他正是以維護这些原則为名把他們引向屠場的。

这一协定所最先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撒丁的卡富尔政府的垮台——它不得不辞职。卡富尔伯爵是意大利最有远見的人士之

一，而且与締結和約毫无关系，虽然如此，他在憤怒和失望的公众面前也还是站不住的。可能要經過很長時間，他才能重新执政。同样也要經過很長時間，路易-拿破侖才能重新使那些多愁善感和热忱的人們产生錯觉，把他誤认作为自由而奋斗的战士。而在目前，意大利人对他比对其他任何暴君和叛徒都更加仇視。如果意大利恐怖主义者的匕首再次威胁到他的生命，那是不奇怪的，因为他違背了自己的諾言，让奥地利几乎和从前一样稳稳地騎在意大利的脖子上，同时却又装模作样地說，他为意大利爭得了独立。

卡·馬克思写于 1859 年 7 月 15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9 年 7 月 28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698 号

卡·馬克思 維拉弗兰卡条約

如果說路易-拿破侖在解放意大利这个虛偽的借口下所策動的戰爭，引起了認識上的普遍混亂和態度的改變，造成了歐洲歷史上空前的大騙局，那末，在維拉弗兰卡簽訂的和約便破除了這種製造禍患的魔法。不管人們怎樣談論拿破侖的遠見，這個和約還是破壞了他的威信，甚至使法國人民和法國軍隊厭棄了他，而博取他們對王朝的好感卻一直是他的主要目的。如果他向法國軍隊宣布說，締結和約是由于既害怕普魯士，又害怕奧地利的四邊形要塞區，那末他說的這些話正好只能引起他們的反感。如果他向人民（他們的每一個代表人物都是天生的革命者）說，他在勝利的道路上所以停止前進，只是因為再進一步就會不得不與革命聯合起來，那末他可以相信，這些人民對他將比對他借以吓唬人民的稻草人更不信任和更加反感。在現代的整個歐洲中，誰也沒有像路易·波拿巴在意大利戰爭中這樣威信掃地。騙局在維拉弗兰卡暴露了。證券交易所的投機商人因為這件事而興高采烈，垂頭喪氣的煽動家被驚得目瞪口呆，受騙的意大利人氣得發抖，“各調停國”顯出一副狼狽相，而那些相信路易·波拿巴的民主使命的英國人和美國人，則用毫無意義的抗議和無法理解的解釋來掩蓋自己的恥辱。現在看來，只有那些敢于反抗自我欺騙的逆流，不惜冒着被

指責为同情奧地利的危險的人，才采取了正确的立場。

首先我們看一看，和約是怎样締結的。两国皇帝会面了；弗兰茨-約瑟夫把倫巴第割让給波拿巴，波拿巴則把它轉贈給維克多-艾曼努尔，而維克多-艾曼努尔虽然似乎是這場战争的主角，却甚至沒有被允許参加締結和約的會議。有人曾主張征求一下这一被如此粗暴地买进卖出的活商品的意見，哪怕只是为了表示礼貌，但是这仅仅引起了締約双方的輕蔑的冷笑。弗兰茨-約瑟夫好像是在处理自己的財產，拿破侖第三也是这样。即使是轉交庄园，也得有法官在場和履行某些法律手續。但是在轉交 300 万人口时却根本不要这一套。甚至沒有征求最后接受这份財產的維克多-艾曼努尔的同意。对于大臣來說，这样的侮辱是太过分了，因此卡富尔提出辞职。当然，撒丁国王关于給他的这块土地，也可以重复过去羅馬皇帝关于搜刮来的金錢所說的一句話：Non olet〔沒有臭味〕^①。也許，这对他來說並沒有侮辱的气味。

发生的这件事，用 *idées napoléoniennes*〔拿破侖观念〕的語言來說，大概叫做“民族复兴”。如果拿維也納會議的協議和維拉弗兰卡的这桩交易相比，維也納會議也可以被大胆地怀疑为拥护革命原則和同情人民。意大利民族在产生时，就遭到維拉弗兰卡協定的非常尖刻的侮辱；这个协定明目張胆地宣布，意大利不是对奧战争中的一方，因此在締結对奧和約时沒有发言权。加里波第和他的英勇的山地居民，托斯卡納、帕尔馬、摩地那和羅馬尼亚的起义¹⁹⁵，維克多-艾曼努尔本人和他的遭到蹂躪的国土，他的已經枯竭的財力和伤亡很大的軍隊，——所有这些都熟視无睹。战争

① 这是羅馬皇帝韋斯帕西安关于廁所稅所說的話。——編者注

好像是在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拿巴王朝之間进行的。意大利战争似乎沒有发生过。維克多-艾曼努尔甚至不能希望受到一个次要的盟国所能受到的重視。他不是交战的一方；他只是一个工具，因此不能享有按照国际法每一个参战国無論本身多小都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像締結 1815 年和約时被兼并的德国各小邦的諸侯所受到的待遇²⁴⁶，他也沒有受到。让这个寒酸可怜的穷亲戚忍气吞声地去吃他的富足而强大的同伴的殘羹剩飯吧。

如果我們現在轉而研究維拉弗兰卡条約的內容——这里是指条約的正式內容，——那就可以看到，它完全符合于締結条約的方式。倫巴第应当割让給皮蒙特；但是，奥地利也曾在 1848 年向查理-阿尔伯特和帕麦斯顿勳爵提出过这个問題的建議²⁴⁷，不过当时的条件优越得多，而且也沒有目前条約中的缺点。那时，还没有任何一个外国利用意大利的民族运动来为自己服务。土地是打算割让給撒丁，而不是給法国；威尼斯也打算从奥地利分出去，变成一个独立的意大利国家，不屬奥地利皇帝管轄，而由奥地利大公統治。当时，这些条件被寬宏的帕麦斯顿輕蔑地拒絕了，他把接受这些条件看做是意大利独立战争的最可怜的結局。現在，同样是这个倫巴第，却作为法国的礼物贈給薩瓦王朝，而威尼斯，包括明乔河上的四边形要塞区，仍然留在奥地利的魔爪中。

这样，意大利的独立变成了倫巴第对皮蒙特的巨屬，皮蒙特对法国的巨屬。如果說奥地利的自尊心可能因为割让倫巴第而受到伤害，那末奥地利的实力却因为撤出这块土地而更为加强，因为这块土地占用了它的部分兵力，却仍然无法抵禦外国的侵犯，也不能补偿为維持这些兵力所花的費用。在倫巴第白白地耗費的金錢，現在可以有益地用于其他地方。奥地利仍然掌握着具有决定意义

的軍事障地，在任何有利的时机都能从这个障地进击弱小的邻国。后者获得了难以抵御侵犯的边界和住有不安分的、心怀不滿和疑惧的居民的土地区，实际上只是更加削弱了自己，同时，甚至还失去了自命为意大利利益的代表者的口实。皮蒙特进行了一件有利于王朝的交易，但是放棄了自己的民族使命。撒丁由一个独立国变成了依靠別人恩典生存的国家，它为了抵御东方的敌人，不得不在西方的保护者面前卑躬屈节。

然而事情还不仅仅这样。根据条約的条件，意大利应按照德意志联邦的形式，組成以教皇为名誉首脑的意大利联邦。目前，在实现这个“拿破侖观念”方面，看来还有一些困难，我們还要看一看，拿破侖第三怎样克服在实现他的“得意杰作”时所遇到的障碍。因为，不論事情的結果如何，有一点是不用怀疑的，即这个以教皇为首的联邦正是拿破侖第三的“得意杰作”。然而，要知道推翻羅馬教皇的世俗政权向来被认为是意大利解放的 *conditio sine qua non* [必要条件]。馬基雅弗利早就在他的“佛罗倫薩史”²⁴⁸中指出教皇的統治是意大利衰敗的根源。而現在，路易-拿破侖不但想解放罗曼尼亚，反而打算使整个意大利歸屬於教皇的傀儡政权。实际上，如果这个联邦終於組成，則教皇的冠冕将成为奥地利統治的标志。奥地利与那不勒斯、羅馬、托斯卡納、帕尔馬及摩地那分別締結条約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想要建立一个在奥地利領導下的意大利各国君主的联邦。在維拉弗兰卡条約規定建立的意大利联邦中，教皇、奥地利和复位的各公爵——如果他們能够复位的話——为一方，皮蒙特为另一方，这样的和約和联邦真是超过了奥地利的最大胆的期望。从1815年起，奥地利就力图建立意大利各国君主的联邦来对付皮蒙特。現在它可以使这个皮蒙特服从自己

了。既然意大利联邦名义上是以开除撒丁的教籍²⁴⁹的教皇为首，而实际上是由撒丁的死敌来领导的，那末奥地利就可以在这个联邦内，消灭这个小国的生命力。这样一来，不是解放了意大利，而是压迫了皮蒙特。与奥地利对抗的皮蒙特，注定要担任普鲁士的角色，但是它没有普鲁士在联邦议会中使对手难于活动的那些手段。法国从自己这方面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它对意大利可以采取与俄国对德意志联邦所采取的同样的态度，然而，俄国在德国的影响是建立在哈布斯堡王朝与霍亨索伦王朝保持均势的基础上的。皮蒙特能够恢复自己威信的唯一的方法，已由它的保护者明白地给它指出了。路易-拿破侖在告兵士书中说道：

“倫巴第归并于皮蒙特，这就为我们（即为波拿巴家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盟邦，它的独立将归功于我们。”

这样，拿破侖就是在宣布，独立的皮蒙特已经被他的一个总督管辖区取代了。维克多-艾曼努尔没有任何手段来摆脱这种屈辱的境地。他只能诉诸被他欺骗了的信任他的意大利，或者诉诸把赃物分了一部分给他的奥地利。但是，很可能，意大利的革命会干预这件事情，以改变整个半岛的状况并且再次把马志尼和共和党人推上舞台。

卡·馬克思写于1859年7月19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1859年8月4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704号

弗·恩格斯 意大利战争

回 顾

一

“神秘的將軍”急忙把他的近衛軍調回巴黎，以便帶領他們舉行凱旋入城式，然后在卡魯塞爾廣場上讓凱旋的軍隊接受他的檢閱。在這個時候，讓我們再來回顧一下主要的軍事事件，以便弄清這個處處仿效拿破侖的獅子的真正功績到底是什麼。

4月19日，布奧爾伯爵作了一件最輕率的事，他通知英國大使說，他將在4月23日給皮蒙特人規定3天限期，逾期則開始軍事行動並下令進攻。雖然布奧爾知道馬姆茲伯里不是帕麥斯頓，但他卻忘記了，普選的日期即將到來，而眼光短小的托利黨人由於害怕他們會被蔑稱為“奧國佬”因而實際上不得已成了波拿巴分子。4月20日，英國政府急忙將這個情報通知波拿巴先生。隨後，法軍立即開始集中，並下達了用歸休兵編成第四營的命令。4月23日——英國普選前一天，奧地利人當真向撒丁提出了最後通牒。得比和馬姆茲伯里急忙宣稱這種行為是一種“罪行”，他們對此表示最堅決的抗議。波拿巴命令他的軍隊在最後通牒限期以前越過皮蒙特國界；4月26日，法軍進入薩瓦和熱那亞。但是，奧軍為托

利党政府的抗議和威胁所阻，又失去了两天的時間，所以不是在4月27日，而是在29日才进入皮蒙特。

因此，“神秘的將軍”在奧軍入侵前9天便得到了关于他們的情报；并且由于英国內閣同他狼狽为奸，他比奧軍早3天开始了行动。但是，“神秘的將軍”不仅在英国內閣里，而且在奧軍的統帥部里，都有自己的同盟者。原先每个人都认为，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意大利軍团的总司令将是海斯。然而担任总司令的却是在1848年和1849年从未与敌人交过手的居萊这个糊里糊涂、沒有定見的十足的蠢才。海斯不是貴族出身，因此反动的、亲耶穌会的、形成弗兰茨-約瑟夫的权奸的貴族集团对他沒有好感。当时，弗兰茨-約瑟夫同格律奈一起制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作战計劃，这个計劃受到海斯的严厉批評，于是格律奈—图恩—巴赫的三执政就利用这点唆使軟弱的弗兰茨-約瑟夫反对这个老战略家。这样一来，出身高貴的庸才居萊便作了总司令，他那主張侵入皮蒙特的作战計劃也被采用了。海斯当时則建議严格地采取守势并且避免在明乔河以西进行任何会战。当时，奧軍为暴雨所阻，所以在5月3日或者4日才到达波河和塞齐亚河，当然，要想对都灵或者对皮蒙特的一个要塞进行突然襲击，已經太迟了。法軍大量集中在波河上游，这就給了无能的居萊以一种他所期望的按兵不动的借口。为了要充分证明自己确已无能为力，他命令在蒙特貝洛附近进行战斗偵察。这样，奧軍13个营就光荣地同法軍16个营进行了会战，一直到巴拉盖·狄利埃軍的第二师和第三师到达戰場时为止，此后奧軍达到了目的便退走了。但是因为在这次偵察以后，奧軍方面沒有采取任何行动，所以这就证明，即使根本不进行这次进軍，結果也是一样的。

这时，“神秘的将军”必须等待军用物资和他的骑兵，而且很可能，正在研究他爱好的毕洛夫的著作以消磨时光。法军在获得关于奥军部署和兵力的详细情报以后，可以很容易地制定出进攻的计划。一般说来有三种进攻的方法：直接从正面进攻以突破中央，迂回右翼，或者迂回左翼。“神秘的将军”决定从右翼迂回敌军。奥军为征收钱粮而毫无阻碍地把塞齐亚河与多腊-巴尔特亚河之间的整个地区劫掠一空以后，配置在由比耶拉到帕维亚的长长的一线上。5月21日，皮蒙特军队攻击了塞齐亚河一线，并在卡萨勒和韦尔切利之间进行了几天小战斗，这时加里波第率领他的阿尔卑斯猎兵插到了马乔列湖附近，并在维列佐托发动起义，渗入卡马斯科和布里昂察地区。居莱仍然让他的军队处于分散状态，甚至还把他6个军中的1个军（第九军）派到波河南岸。到5月29日，准备工作终于进展到可以开始进攻了。大部分皮蒙特军队参加的、对第七军（措贝尔军）部队进行的帕勒斯特罗和文察利奥的战斗，给联军打开了通往诺瓦拉的道路；居莱命令军队不作抵抗就退出诺瓦拉。皮蒙特军队、法军第二、三、四军以及近卫军便立即被派往该地，第一军也随后开到。对奥军右翼的迂回已经完成，直通米兰的道路已经打开。

于是，奥军又出现在拉德茨基于1849年获得诺瓦拉胜利时所占领的阵地上。联军的纵队拉得很长，沿为数不多的平行道路向提契诺河运动。他们只能用缓慢的速度行军。居莱，即使把分散在外的第九军除外，也还有5个军。当皮蒙特军队于5月29日和30日认真发起进攻时，居莱便应当立刻集中他的部队。至于在什么地方集中，这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因为14—15万人集中于一地，敌人是无法置之不理的；而且任务并不是消极防御，而是 *a tempo*

〔适时地〕打击敌人。如果居莱在5月31日或者6月1日把军队集中在摩尔塔拉、加尔拉斯科和維吉瓦諾之間，那末一方面，当敌人在諾瓦拉迂迴他的右翼时，他便可以攻击敌人的翼側，把敌人的行軍纵队截为两段，将其一部驅逐到阿尔卑斯山，并占領通往都灵的道路，另一方面，即使敌人在帕維亞下方渡过波河，居莱也还能适时赶到，截断敌人去米兰的道路。

军队确实开始集中了。但是在完成集中之前，居莱由于諾瓦拉失守而不知所措。因为敌人距米兰竟比他还近了！不过，这样更好。現在正可以 *a tempo* 打击敌人，因为敌人会被迫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作战。但是不管居莱个人怎样勇敢，他在精神上却是个懦夫。他不但不迅速前进，反而退却，想借强行軍圍繞敌人作弧形运动，重新在馬振塔截断敌人直通米兰的大道。

部队在6月2日开始运动，大本营迁至倫巴第的罗察特。6月3日晨5时半，海斯將軍到了那里。他要求居莱对于自己不可寬恕的錯誤加以說明，同时立刻命令军队停止运动，因为他认为还有可能向諾瓦拉方向进行突击。整整两个軍，第二軍和第七軍，已經在倫巴第境內，正由維吉瓦諾向阿比亚帖格腊索行进。第三軍正在通过維吉瓦諾附近的桥梁时接到了停止运动的命令，它便折回，并在皮蒙特境內的河岸占領陣地。第八軍通过了貝雷古阿尔多，而第五軍通过了帕維亞，第九軍相距还是太远，完全在戰場以外。

当海斯詳細了解了军队的部署后，发现要想在諾瓦拉方向上取得胜利已經太迟，現在只剩下馬振塔方向了，于是在上午10时向各纵队发出了繼續向馬振塔进軍的命令。

居莱把馬振塔会战失败的过錯推到海斯身上，认为这是由于他的干涉以及由于纵队的停頓而耽誤了四个半小时所造成的。这

个借口是多么沒有根据,由下列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維吉瓦諾附近的桥梁距馬振塔 10 德里,也就是短短一日的行程。第二軍和第七軍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时,他們已經在倫巴第,因此,他們平均最多还有 7—8 德里的路程。虽然如此,第七軍只有 1 个师到达了科尔別塔,而第二軍只有 3 个旅到达了馬振塔。第七軍的第二师到 5 月 3 日才到达卡斯特列托,即到达阿比亚帖格腊索附近,第三軍至迟在上午 11 时就已接到由維吉瓦諾附近桥梁出动的命令,因此还有大半天的時間,但是該軍竟沒有走到距离 5—6 德里远的阿比亚帖格腊索,因为它只在第二天下午 4 时左右才在罗貝科附近(阿比亚帖格腊索以北 3 德里)进入战斗。毫無疑問,由于指揮官缺乏应有的指揮能力,纵队堵塞了道路,以致减慢了行軍速度。如果一个軍需要一昼夜以上的時間才能通过 8—10 德里的距离,那末耽誤 4—5 个小时确实不起什么作用。經過貝雷古阿尔多和比納斯科行进的第八軍一定走了很多弯路,以致它即使不失掉那四个半小时,也仍然不会适时赶到戰場。由帕維亞出发經過兩日真正的强行軍赶到的第五軍,在 6 月 4 日晚才仅仅以一个旅加入了会战²⁵⁰,这个軍用加速运动的办法弥补了它失去的時間。因此想把軍隊分散的責任推到海斯身上的这个企图,是根本沒有任何理由的。

这样看来,馬振塔会战胜利的有战略意义的序曲是:第一,路易·波拿巴自己的真正錯誤,因为他在敌人行动範圍內进行了側敌行軍;第二,居萊的錯誤,因为他不集中兵力去襲击敌人拉得很长的行軍纵队,反而进行反行軍(而且是安排不当的反行軍)和退却,以致完全分散了自己的兵力,把疲劳而又飢餓的部队投入了战斗。战争的第一阶段便是这样。关于第二阶段的情况,我們下一次再談。

二

关于我們的“真正神秘的”拿破侖的情况，我們談到他在馬振塔戰場为止。居萊給了他极大的恩惠，这样的恩惠只有总司令才能賜給他的敌人；居萊使自己的軍隊如此分散地开到馬振塔，以致在会战时他只有相当少的部队，甚至到了傍晚軍隊也沒有全部到齐。第一軍和第二軍退向米兰；第八軍由比納斯科开来，第五軍由阿比亚帖格腊索开来，第九軍被派到遙远的波河一带游蕩。这正給真正的統帥造成了机会。这时候应当用夜間到达的大量生力軍冲入分散的奧軍纵队，这样便能得到**真正**的胜利，迫使整个整个的部队連同軍旗和火炮一齐投降！平凡的拿破侖在蒙特諾特和密雷栖摩、在阿本斯堡和累根斯堡²⁵¹便是这样做的。但是，“高尚的”拿破侖却不这样做。他比这样愚蠢的經驗主义要高明。根据毕洛夫的著作他知道离心退却是最有利的。因此，他对居萊的巧妙的退却战术給了相应的报答；他不向奧軍前进，反而拍电报告知巴黎：軍隊正在休整。即使不这样，他也相信，全世界是很懂礼貌的，一定会把他在馬振塔的笨拙的行动称为“巨大胜利”！

最可爱的居萊已經如此成功地对敌人进行过一次弧形的迂迴机动，現在又来重复这个試驗，并且这一次的規模更大。他硬要他的軍隊先向东南、向波河行进，然后以3个纵队沿3条平行道路順波河到奥利奥河上的皮亚德納，然后再轉向北朝卡斯提奥涅前进。并且，他絕沒有着忙。他到卡斯提奥涅需要走的路程約有120英

里，也就是說有 10 天正常行軍或者 8 天強行軍的路程。因此，6 月 14 日，至遲 15 日，他便可以在卡斯提奧涅附近占領陣地，但是實際上，他的軍隊大部分在 19 日才到達加爾達湖以南的高地。然而，信任換來信任。如果說奧軍前進緩慢，那末“高尚的”拿破侖則證明，甚至在這方面他也勝過他們。平凡的拿破侖在這時一定會首先命令軍隊以強行軍取捷徑（全長不到 100 英里）向卡斯提奧涅前進，以便先于奧軍到達加爾達湖以南的陣地和明喬河一帶，並在可能的地點再次攻擊奧軍行軍縱隊的翼側。但是，這個“完美無缺的”拿破侖却不這樣做。他的座右銘是：“前進時切勿着忙。”他從 5 日到 22 日才把軍隊集中在基澤河一帶，也就是說 100 英里的路程走了 17 天，或者說一晝夜僅僅行軍兩小時！

這些便是法軍縱隊所必須忍受的千辛萬苦，而且是引起英國報紙的記者對 pioupiou^① 的那種堅韌不拔精神和無窮的朝氣贊嘆不止的千辛萬苦。法軍只有一次企圖進行後衛戰。這是指法軍把奧軍一個師（貝格爾師）逐出梅累尼亞諾這件事。該師有一個旅堅守城市，另外一個旅已在拉姆布羅河背後，準備掩護前者的退却，因此幾乎沒有加入戰鬥。正是在這個地方，我們這位“神秘的將軍”就證明了：如果非這樣做不可時，他也是通曉拿破侖的戰略的，這就是集中主力於決戰地點！根據這一原則，他派出了整整 2 個軍，也就是 10 個旅，來對付這個唯一的一個旅。受到法軍 6 個旅攻擊的奧軍這一個旅（羅登旅）支持了約 3—4 個小時之久，直到人員傷亡三分之一以上的时候才退過拉姆布羅河，在退却時沒有遭受敵人的追擊；奧軍只以第二個旅（柏爾旅）的兵力就完全抵住了

① 普尤普尤（法國步兵的綽號）。——編者注

占巨大优势的法軍。由此可以看出，法軍作战是非常有礼貌的。

在卡斯提奥涅，舞台上出现了另一位英雄——奥地利的弗兰茨-约瑟夫。真是棋逢对手！一个到处宣传自己是亘古以来最聪明的人，而另一个却喜欢把自己装扮成骑士。一个无论如何也要坚持成为当代最伟大的统帅，因为他的使命就是要继承真拿破仑的衣钵，你看他不是出征时也还带着拿破仑用过的酒杯和其他遗物吗？另一个硬是要把胜利同自己的旗帜联系在一起，因为他毕竟是自己军队的“天生的最高统帅”啊！在十九世纪革命的间歇时期盛行各处的各式各样的模仿者在战场上大显身手的现象，再也不能比这更为明显了。

弗兰茨-约瑟夫的最高统帅事业是这样开始的：他首先命令他的军队在加尔达湖以南占领阵地，以便而后立刻撤至明乔河的东面。但是当部队刚刚退到明乔河的东面，他又立刻派遣他们去进攻。这样的战法也许使“完美无缺的”拿破仑也吃了一惊，而他很有礼貌，不能在自己的战报中公开承认这一点。由于他恰好也在同一天率领他的军队向明乔河运动，因此两支军队才发生了冲突，也就是索尔费里诺会战。我们不打算在这里重述这次会战的详细经过，因为本报过去已刊登了这方面的材料^①，况且奥军关于索尔费里诺会战的公报又故意混淆视听，以掩饰“天生的统帅”的那些令人吃惊的失策。但是，由此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索尔费里诺会战失败的责任主要应由弗兰茨-约瑟夫及其权奸来承担。第一，海斯被故意地、经常地置于次要地位。第二，弗兰茨-约瑟夫本人贪图海斯的职位。第三，由于权奸的弄权，一群无能的、有时甚至在

^① 見本卷第457—461頁。——編者注

个人勇敢方面也令人怀疑的人担任了重要的指挥职务。由于这种种原因，不用说什么原定计划，就是在会战的当天还这样乱七八糟，以致军队的指挥、运动的协调、战斗行动的方法和顺序都不存在了。看来在中央特别混乱。在这里的3个军（第一、五、七军）的行动是如此矛盾和不协调，在决定性时刻是如此缺乏联系，而且经常是互相妨碍，以致从奥军的报告中我们只能得出一个、但却是不容争辩的结论：这一次会战的失败与其说是因为人数少，不如说是因为指挥极端拙劣。从没有一个军及时支援过另一个军。预备队到处都有，就是在需要他们的地方偏偏没有。尽管索尔费里诺、圣卡西阿诺、卡夫里阿诺在顽强而巧妙的防御下是一道攻不破的阵地，但是它们就这样一一失陷了。既然索尔费里诺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据点在两个小时內便失掉了，所以会战也就随之失败了。索尔费里诺的失陷是因为受到了向心攻击，这种攻击只有用反攻才能击退，但是恰恰没有反攻。继索尔费里诺的失陷之后，其他居民点也同样因为受到向心攻击而失陷了，奥军仅以十分不够的、消极的防御来抵抗这种攻击。不过奥军仍然还有生力军，因为奥军的伤亡统计表证明：在参加会战的25个基干团中有8个团（罗斯巴赫、约瑟夫大公、哈特曼、梅克伦堡、海斯、格律贝尔、维恩哈尔德、文普芬各团），也就是三分之一的团，每团伤亡不到200人，这说明他们只有少部分兵力参加了会战！而在上述的8个团中，有3个团和格腊迪斯卡边屯团一样，每团损失不到100人，至于在猎兵中，大多数的营（5个营）每营伤亡都在70人以下。因为右翼（贝奈德克的第八军）在敌人占巨大优势的情况下确实被迫以全部兵力加入了战斗，所以这就是说，所有上述那些仅以部分兵力参加战斗的各团和各营必定都是在中央和左翼，而且他们中间的大部

分一定是在中央。这便说明，在这里的指挥是怎样的糟糕。其实原因很简单：弗兰茨-约瑟夫本人以及他的权奸既然在这里，那末这里的一切必然是毫无计划的。预备队炮兵的 13 个连一炮未放！在左翼，似乎也同样缺乏指挥，特别是骑兵，在“老懦夫”们的统率下没有在战斗中使用。凡是有奥军骑兵团出现的地方，那里的法军骑兵便扭头奔逃；但是，8 个团中仅有 1 个骠骑兵团真正参加了攻击，另有 2 个龙骑兵团和 1 个枪骑兵团只以部分兵力参加了攻击。普鲁士骠骑兵损失 110 人，2 个龙骑兵团共损失 96 人，西西里枪骑兵的损失不明，其余 4 个团一共损失了 23 人！炮兵总共只损失 180 人。

这些数字比其他一切更能说明奥地利的将领从皇帝到各军军长在指挥军队作战时的那种毫无信心和优柔寡断。如果再考虑到法军在数量上占优势以及因不久前获胜而士气高涨的条件，那末我们便可以明了奥军不能取胜的原因了。唯一没有气馁的军长是贝奈德克，他完全独立地指挥右翼作战，而弗兰茨-约瑟夫无暇干预。因此，虽然皮蒙特军队在数量上比奥军多一倍，但是贝奈德克仍然有力地打击了皮蒙特军队。

“高尚的”拿破仑在指导战争方面不是像弗兰茨-约瑟夫那样的一个新手。他已经在马振塔取得了教训，根据经验知道自己在战场上应如何行动。他让老瓦扬计算应当占领的战线的长度，由此自然得出了各军配置的方法；此后，他便让各军长自行指挥，因为他对他们的指挥能力是不用特别担心的。他自己则前往那些最便于为下星期六的一期巴黎“画报”²⁵² 提供自己肖像的地方，从那里，他发出了虽然神气十足但却毫无意义的琐碎命令。

三

很多年以前，在杜塞尔多夫学院有一个俄国画家，他以后因为无能和懒惰而被送到西伯利亚。这个可怜人非常崇拜自己的尼古拉皇帝，常常带着激动的心情说：“皇帝是伟人！皇帝万能！皇帝也能作画，但是他没有时间，所以皇帝常买一些风景画，然后在上面画一些兵士。皇帝是伟人！上帝伟大，但是皇帝还年轻！”

“高尚的”拿破仑和尼古拉有共同之处，他认为风景画只是为了在上面画兵士而存在的。但是因为他甚至连在风景画上画兵士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就满足于自己摆好姿势让别人来作画。Il pose〔他正在摆姿势〕。马振塔、索尔费里诺和整个意大利对于他只是一幅画的背景，只是一种借口，以便重新把他那装腔作势的精彩肖像登在“画报”和“伦敦新闻画报”²⁵³上。因为这件事只要少量金钱就可以做到，所以他总是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向米兰人说：

“如果世界上竟有不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的人（这个时代是广告宣传 and 投机取巧的时代），那末我是不属于这类人的。”

老拿破仑伟大，但是“完美无缺的”拿破仑已经不再年轻了！

关于他已经不再年轻的这种想法，使他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或许已经是应该缔结和约的时候了。单纯 succès d'estime〔靠名声〕所能达到的一切，他已经达到了。“在四次战斗和两次会战中”，他损失了5万多人（这只是在战场上的损失，病员不算在内），

夺取了与奥地利要塞毗連的地区,关于这个地区,奥地利通过它在明乔河上构筑要塞的事实早已向全世界表明,它并不打算在敌人兵力占优势的条件下认真防守这个地区,而这次之所以防守它,只是为了同海斯元帅嘔气而已。“高尙的”拿破侖迄今一直以典型的鎮靜姿态和带着可疑的胜利統率自己军队所走的那条 *Via sacra* [神圣之路]²⁵⁴ 忽然走不通了。在那边有一片乐土,这不仅是現在的“意大利軍团”命中注定看不到的,也許連他們的子孙也是注定看不到的。里沃利和阿尔科列不在計劃之內。維罗那和曼都亞馬上就要給他們点顏色看,而“高尙的”拿破侖直到目前同他的軍事隨員所能进入的唯一的要塞是阿姆要塞,——当他能够离开这个要塞时,即使不举行任何仪式,他已經心滿意足了。²⁵⁵ 落在他身上的赫赫战果是太少了;固然,他进行过 *grandes batailles* [大会战],但說他曾获 *grandes victoires* [巨大胜利],甚至連电报綫都不会相信的。爭夺营壘的战争,对付老海斯的战争,双方互有勝負而胜利机会逐漸减少的战争,需要作极大努力的战争,也就是說**真正的战争**,——这不是拿破侖这个圣馬丁門劇場²⁵⁶ 和阿斯特利圓劇場的英雄所能进行的。此外,还要加上这样一个情况:他这方面如果再前进一步就会引起萊茵河上的战争,而在那时也許要出現一些困境,会使他立刻收起那些矯装英雄的丑相和装模作样的 *poses plastiques* [优美姿态]。但是,“高尙的”拿破侖不是喜欢这种事情的人,所以他締結了和約,收回了自己的計劃。

当战争一开始,我們“高尙的”拿破侖便立刻想起了平凡的拿破侖的意大利远征,想起了蒙特諾特、德果、密雷栖摩、蒙特貝洛、馬連峨、洛迪、卡斯提奧涅、里沃利和阿尔科列这条 *via sacra*。現在讓我們把摹制品和原作比較一下。

平凡的拿破侖，是当法国財政混乱，不能得到任何借款，但又不仅要在阿尔卑斯維持两个軍团，而且还要在德国也維持两个軍团的时候，担負起了指揮 3 万名半飢餓的、赤足的、衣衫襤褸的兵士的責任。撒丁和其他意大利国家不是和他站在一起而是反对他。与他对敌的軍队無論在数量上或者在組織上都超过了他的軍队。虽然如此，他仍然率軍进攻，迅速地連續不断地給奧軍和皮蒙特軍队 6 次打击，并且每一次都能够保证自己在数量上占优势，因此逼得皮蒙特求和，而自己則渡过波河，又在洛迪附近强渡阿达河，圍攻曼都亚。他将奥地利的第一支援軍击潰于洛納托和卡斯提奥涅附近，并在它发起第二次进攻时又以勇敢的机动迫使它困守于要塞之內。他将馳来援救被圍的曼都亚的第二支援軍阻于阿尔科列，使它蒙受打击达两个月之久，这支軍队一直等到它的增援部队开到后才得以前进，但是在里沃利又被击败。然后他迫使曼都亚投降，迫使南意大利各国君主乞和，并越过朱利恩阿尔卑斯山脉直抵塞美林山麓，在那里締結了和約。

平凡的拿破侖是这样行动的。而“高尚的”拿破侖怎样行动呢？他握有一支法国从未有过的最好的和最强的軍队，而国内的財政情况至少能使他通过借款很容易地弥补战争的費用。他有 6 个月的时间在完全和平的条件下准备战争。拥有坚固的要塞和数量众多的优良軍队的撒丁站在他这一面。羅馬在他手中；意大利中部只要一接到他的信号，就会参战并和他联合。他的作战基地不在濱海阿尔卑斯山，而在波河中游亚历山大里亚和卡薩勒附近。在他前輩走过的只有山間小道的地方，現在已經有了铁路。但是他怎样行动呢？他向意大利派出 5 个强大的軍，兵力众多，連同撒丁軍队一起在数量上始終远远超过了奧軍，并且超过奧軍那样多，

以致他还能够把第六軍作为一支游覽的軍队让給他的堂弟来完成軍事游历的任务。虽然有铁路，但他还需要整整一个月的時間来集中他的軍队。最后，他进攻了。居莱的无能对他是一种难得的有利条件，借助于这一条件，本来打成平局的馬振塔会战，却由于两軍在会战后所处的偶然的战略情况（“高尚的”拿破侖完全沒有錯，而过錯只应由居莱一人来負責）而变成了他的胜利。拿破侖不去追击奧軍，而出自感激的心情放走了他們。在索尔費里諾，弗兰茨-約瑟夫几乎是硬要他得胜，即使如此，他也沒有得到比馬振塔会战更好的战果。正是現在出現了平凡的拿破侖施展他的全部本領的局面。战争正在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进行，并且它的規模能使巨大的野心得到滿足。但是剛剛达到平凡的拿破侖的 *via sacra* [神圣之路]的起点，剛剛看到光輝的前景，“高尚的”拿破侖却已請求議和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7 月 20、28 日
和 8 月 3 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

載于 1859 年 7 月 23、30 日和 8 月 6 日
“人民报”第 12、13 和 14 号

卡·馬克思 被证实了的真理

克勞塞維茨在他的論 1796 年和 1797 年意大利戰局的著作中有一個地方指出：戰爭歸根到底不完全像許多人所設想的那樣是演戲，如果從科學的觀點來看，戰爭勝敗是往往與政治吹牛家們想像中描繪的景象截然相反的。²⁵⁷ 當我們對不久以前的那場戰爭的各個軍事事件作出評價的時候，我國各種殷勤的然而不大明理的波拿巴派報紙——不管它們是用法文還是用英文出版的——常常情緒激忿地大叫大嚷。知道了上面這條真理，我們就可以對此處之泰然了。現在我們高興地知道，我們對這些事件的看法得到證實的時間比預料的要早得多，而且是由最主要的戰爭參加者——弗蘭茨-約瑟夫和路易-拿破侖——證實的。

撇開細節不談，我們那些評價實質是什麼呢？一方面，我們認為，奧軍的失敗不是由於聯軍表現了什麼卓越才能，不是由於綫膛炮的神話般的作用，不是由於臆造的各個匈牙利團的叛變，不是由於法國士兵的大受贊揚的勇敢，而完全是由於弗蘭茨-約瑟夫和他的私人顧問們所任命的用來代替像海斯將軍這樣人的奧地利將軍們犯了戰略上的錯誤。正是由於這種糟糕的戰略，結果不僅聰明到在每一個據點上都用很弱的兵力去抗击敵人，而且在戰場上竟能以最沒有意義的方式去調遣現有的兵力。另一方面，即使在這

种状况下奥地利军队仍然顽强抵抗；虽然双方兵力不等，但在各大会战中差不多互有胜负；法国人犯了許多战略上的大錯誤；法軍不可饒恕地按兵不动而使胜利大为减色，并且由于错过了追击的机会而几乎使他們丧失胜利的果实，——这一切使我們可以断言，如果奥軍的最高指揮权由庸碌无能的人手中轉交給有才能的人，交战双方的处境一定会同現在截然相反。早在战争开始以前我們就坚持的第二个論点，而且也是最重要的論点是：从奥軍由进攻轉入防御的时候起，战争就将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戏剧性的，在倫巴第表演；另一部分是认真的，在明乔河战綫的后方，即在四个要塞組成的威力很大的要塞网內开始。我們說过，同法国人将会在前面陣地上遇到的考驗比起来，他們的全部胜利是不足道的。为了攻克那个陣地，甚至真拿破侖也花費了9个月的时间，虽然在他那个时候，維罗那、列尼亚哥和培斯克拉在軍事方面是不值得一提的，全部进攻的压力都只得由曼都亚来单独承担。海斯將軍当然比我們更加了解奥地利最高軍事领导的 *status quo* [現狀]，現在我們从維也納報紙上知道，他从战争剛一开始就建議不要攻入皮蒙特，而是撤出倫巴第，只在明乔河以东应战。現在我們来听听弗兰茨-約瑟夫和路易·波拿巴在他們的辯护詞中說了些什么——一个說他放棄了一部分領土，一个說他改变了他在战争开始时提出的作战計劃。

弗兰茨-約瑟夫在談到战争时，证实了“通报”并没有反駁的两件事實。他在告軍隊书²⁵⁸中說，同奥軍对抗的始終是优势的兵力。“通报”不敢反駁这种說法，而这个說法只要能正确地看待，就会把全部罪責加到奥皇本人的身上。无论如何，我們认为我們的功劳是，从“特派記者們”的矛盾百出的各种說法中，从法国的謊言和奥

地利的虛夸中，我們能够吸取說明真实情况的东西来，并且在只有有限的不可靠的資料的情况下，在我們对从蒙特貝洛开始到索尔費里諾为止的历次会战所做的述評中，弄清楚了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弗兰茨-約瑟夫着重强調了另一个論点，这个論点在某些报纸的帮閑文人听起来应该是十分不平常的。現在把他的原話引在下面：

“尽管我們的敌人尽了最大的努力，用尽了为发动他們策划的战争而早就訓練好了的大量兵力，甚至还付出了巨大牺牲，也沒有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同样也是不容怀疑的事实。他們在战斗中所获得的一切，只是次要的胜利。而奥軍則以其坚毅不拔的力量和英勇气概守住了陣地，掌握这个陣地，就为它在将来收复失地的一切尝试中提供了很好的获胜的机会。”

弗兰茨-約瑟夫在他的告示中不敢明讲的，就是他和他的权奸們使奥軍在整个战争中吃了敗仗，因为他們把战争的指揮权交给了他所寵信的人，用自己荒唐的想法来束縛那些虽然出身于平民但是有才干的將軍，并且用不可理喻的障碍来堵塞他們的道路，——就連这个罪过他現在也完全公开地承认了，即使不是在口头上，起碼也是在事实上承认了。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海斯將軍的建議一直不被重視，他曾被剝夺了按他的履歷、他的年齡，甚至按他在奥地利官阶表中的职位來說都是理所当然的地位，現在却授予了他以元帅的称号；把意大利軍团的最高指揮权交给了他，弗兰茨-約瑟夫在到达維也納之后，首先有意張揚地拜訪了老將軍的夫人。总之，哈布斯堡的专制君主对这个無論就其平民出身、自由主义的同情心、有点粗魯的坦率性格、軍事才干說来对雪恩布龙²⁵⁹的自命不凡的貴族界都是一种侮辱的人現在所采取的全部态度，就是对于不管具有哪种社会地位的人說来都是有失体面的認錯，

而对于主宰人們命运的世襲君主們說來更是有失体面的認錯。

現在我們來看看奧地利告示的法國仿制品，也就是波拿巴的辯護詞²⁶⁰。他是否也同他那些以為他贏得了許多決定性勝利的崇拜者們一樣在自欺自慰呢？他是否在想，將來局勢也不會發生根本的轉變？他是否暗示過事件已達到決定關頭，只要堅持就能獲得徹底勝利呢？完全相反！他承認，戲劇性的鬥爭已經結束，戰爭很快就將不可避免地要改變性質，往後失敗在等待着他，不僅革命的威脅，而且“他所面臨的、隱蔽在大型要塞後面的敵人”的力量也使他感到害怕。他看到自己所面臨的只是一場“長時間的沒有結果的戰爭”。他一字不差地說了如下的話：

“當戰雲籠罩着維羅那城的時候，鬥爭不論在軍事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不可避免地要改變性質。敵人隱蔽在大型要塞的後面，他的兩翼由於周圍的領土都已經中立而得到了掩護，我就不得不对這樣的敵人的正面發動進攻，在臨近長時間的沒有結果的戰爭的時候，我迎面碰到了武裝的歐洲，它不是準備奪取我們的勝利，就是準備加重我們將遭到的失敗。”

換句話說，路易-拿破侖之所以簽訂了和約，不僅是因為他害怕普魯士和德意志，以及害怕革命，而且还因為他害怕四個大型要塞。根據“比利時獨立報”上一篇半官方的文章來看，圍攻維羅那需要6萬人去增援。如果他同時在法國留下佩利西埃所指揮的北方軍團所必需的兵力，他就不可能從法國調出這麼大數量的人來，而且即使他拿下了維羅那，他還要為奪取列尼亞哥和曼都亞而鬥爭。簡言之，拿破侖第三和弗蘭茨-約瑟夫在戰後完全證實了我們早在戰前和戰時關於兩國的軍事力量和戰爭的性質所說的話。我們所以要引用這兩個證據，是因為它們無意中維護了正確的看法和歷史的真理，反對了肆意誇大和愚蠢妄想的洪流，这股洪

流在最近两个月里泛滥得这样厉害，恐怕不久以后未必能再次达到这种程度。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7 月 22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8 月 4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704 号

卡·馬克思 入 侵！

在当代伪善政策的一切信条中，沒有一条像“如果你希望和平，就要准备战争”这一信条那样，闖下了这么多的灾祸。这个以包含着大谎言为主要特征的大实话，是一个战斗号召，它呼吁全欧洲武装起来，并且使那些雇佣兵产生了这样一种狂热，以致每一个新和約的签订都被看做是一次新的宣战，都成为进行有关的各种投机活动的对象。现在欧洲各国都已变成兵营，兵营内的雇佣兵都渴望互相厮杀，以便为了和平而互相割断咽喉，这样，在每一次新战争爆发之前必须弄清楚的就只剩下一个无足轻重的問題：站在哪一边。一旦负责外交的議員們借助于 «si vis pacem, para bellum» [“如果你希望和平，就要准备战争”] 这个经过考驗的例律，滿意地解决了这个次要的問題，一次文明战争便开始了；这种文明战争，按其残酷野蛮的程度来说，应该是强盗騎士阶层繁荣鼎盛时代的东西，而按其阴險詐伪的背信棄义性质来说，又毕竟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最新时期所特有的产物。

在这种形势之下，对野蛮行为的普遍爱好成了正常的事情，不道德行为成了常规，非法行为有了它自己的立法者，暴力統治有了它自己的法典，那就毫不足怪了。因此，现在所以还有人常常回过头来請教 «idées napoléoniennes» [“拿破侖观念”]，其原因就在于

阿姆要塞昔日的囚徒²⁵⁵的这些荒謬的狂想已經成了一种現代詐騙宗教的摩西五經，成了皇帝进行軍事冒險和搞証券投机勾当的政策の启示录了。

路易-拿破侖当年在阿姆要塞中說过：

“偉大的事业很少是在第一次就成功的。”²⁶¹

由于确信这一条真理，所以他具有在必要时实行后退，以便随即准备做新的跳跃的本領，并且在沒有使他的敌人丧失警惕性，而他自己所宣布的那些 mots d'ordre [口号] 尙未变得陈腐可笑，因而还是危險的东西的时候，一直不断地使用这种手法。这种为了欺騙社会輿論而伺机行动的本領，这种为了更加无阻碍地重新前进而后退的本領，一句話，ordre, contre-ordre, désordre [朝令夕改，毫无秩序] 的規則的奥秘，曾經是他在政变时期的最有力的同盟者。

至于入侵英国这样一个拿破侖观念，那末看来他还是想采用老战术。这个曾經经常被正式地加以否认的观念，多次受到嘲笑，多次沉浸在貢比泉的香檳酒洪流中，它虽然似乎遭到过許多次失敗，却一再地被提到欧洲的政治磋商和閑談的議事日程上来。誰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但是任何人都感觉到，单只是它的存在就是一种还没有被战胜的力量。像 84 岁的林德赫斯特勋爵或胆略过人的埃倫伯勒这种正派人，由于害怕这种观念的神秘力量而向后退却了。如果一句普通話竟能对政府、議會和人民产生如此强烈的印象，那末，这只不过是证明大家都本能地領悟到和意識到，这句話有 40 万大軍作为后盾，你要想摆脱这种可怕の观念，就非去同这支軍队拚个你死我活不可。

“通报”上那篇根据对英法两国海軍預算所作的比較把英国說成是应对昂貴的軍备开支負責的禍首的文章，由至圣的手草就的这个文件²⁶²的开头和結尾部分的激憤語調，“祖国报”上那篇干脆急不可耐地进行威胁，随后又立即发出命令要把法国的軍事力量轉入平时状态的半官方評論，——所有这一切都是构成波拿巴策略的最有代表性的要素，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报刊和社会輿論要十分严肃认真地討論入侵問題了。当有人說法国“**沒有武装起来**”的时候，——在意大利战争开始以前，瓦列夫斯基先生由于意識到自己的、誰也不承认的清白无辜，曾經特別明确地声明了这一点，——紧接着就爆发了历时三个月的“解放战争”；如果法国把沒有武装起来的軍队**解除武装**，那我們可要提防着最突然的 coup [攻击]。

毫無疑問，除了入侵英国以外，波拿巴先生不可能率領他那帮御用軍队去进行別的、在法国和大部分欧洲大陆更受欢迎的事业。布呂歇尔訪問英国騎馬經過倫敦街道时，由于他所固有的兵士本性，竟不禁得意忘形地感叹說：“天呀，这才是最适合于掠夺的城市啊！”对这个呼喊的誘惑力，法皇的御用軍是能够作出評价的。但是，入侵的观念可能也会受到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阶级的欢迎，理由也就是“泰晤士报”为了保持«entente cordiale» [“誠意协商”]²⁶³关系而提出来的那一条：

“我們高兴地看到法国的强大。只要我們是作为秩序的保卫者和文明的朋友而携手并进，它的力量也就是我們的力量，它的繁荣也就是我們的强盛。”

有一支由 449 艘战舰（其中 265 艘是蒸汽軍舰）組成的舰队，有一支在意大利流过血和得到过光荣的 40 万軍队，口袋里又有从

圣海倫島得到的遺囑，并且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大災禍，波拿巴先生恰好是能够把最后賭注押在入侵英国上的人。他一定会 va banque [孤注一擲]！他早晚总是要下这笔賭注的。

卡·馬克思写于 1859 年 7 月 28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9 年 7 月 30 日“人民报”

俄文譯自“人民报”

第 13 号

卡·馬克思

法国在裁軍

拿破侖第三在他的“通报”上发表了一个关于他打算把他的陆軍和海軍轉入平时状态的声明，如果把把这个声明同战争即将开始之前同一个专制君主在同一家“通报”上郑重声明从 1856 年以来他的陆軍和海軍从来没有轉入过战时状态²⁶⁴ 的事实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这次声明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他想要在官方机关报上发表一篇巧妙的短文就馬上能使英国陆軍和海軍停止軍备竞赛，这种意图太明显了，以致連怀疑都用不着。可是，如果把“通报”的报道看做是一个简单的圈套，那也是很大的錯誤。拿破侖第三的誠意是出于不得已：他不过是在做他不能不做的事情。

自从签订了維拉弗兰卡条約以后，路易-拿破侖就必须把自己的陆軍和海軍裁减到与平时預算相适应的程度。在意大利的冒险使法国付出了将近 2 亿美元和 6 万名最精銳的兵士的代价，而得到的除了某些軍事荣誉以外，沒有任何东西，况且就連这些軍事荣誉，也是頗令人怀疑的。用繼續征收軍稅的办法来加深不受欢迎的和約所引起的絕望，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試驗。周期性地向法国国外实行襲击，以战争的胜利来使居民陶醉，从而克服他們的敌对情緒——这就是复辟帝国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在把法国拖到全欧战争的边緣以后，又儼然装成使法国免遭这场战禍的救主——

这就是十二月政变的英雄⁴⁹存在的第二个条件。在战争引起了不可避免的工商业的凋蔽以后，和平不论在任何条件下不仅成了一件美事，而且具有一种新的魅力。在朱阿夫兵和密探的老一套的治理下，忧伤使和平变成了沉重的负担，可是一旦单调的生活被战争所破坏，这种忧伤就会为适意的快感取代了。当法国人想到一个虽然不无机智但是毫无原则的冒险家篡夺了统治人民的权力时，强烈的屈辱感会使他们的意识感到压抑；但是当他們看到其他国家的人民和统治者即使不是实质上，而只是表面上也屈服于这同一个最高权力时，这种屈辱感便暂时得到减轻。大大缩减了的生产现在按照弹性规律获得了新的推动。骤然中断了的生意加倍兴隆起来了，突然瘫痪了的投机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这样一来，拿破仑战争之后出现的和平又保证王朝得到了一个极其必要的间歇，在这以前不久，这种间歇看来只有靠宣战才能获得。当然，经过一段间歇以后，旧时的分解因素又会起导向战争的作用。市民社会和 coup d'état [政变] 之间的根本的对抗又会重新出现，当内部斗争再次达到一定的紧张程度时，又会诉诸新的武打的幕间剧，把这当做唯一现实的出路。十分明显，“社会救主”不得不借以拯救自身的条件会逐渐变得越来越危险。在意大利的冒险比克里木的冒险危险得多。但是，与莱茵河上的冒险和更遥远的冒险，即入侵英国（这两场冒险拿破仑第三无疑正在考虑之中，而且也是他的臣民中最没有理智的人所渴望的事情）相比，意大利战争简直是一场儿戏。

但是，在进行这些新的冒险之前，还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克里木战争和意大利战争相隔四年。但是现在，当路易-拿破仑还活着并掌权的时候，恐怕不会出现这样长的间歇了。他所赖以维持政

权的劫运注定的必然性，将愈益頻繁地打攪他，而且間歇将一次比一次短。軍队的渴望，他給人民造成的日益恶化的状况，将迫使他一步比一步快地走下去。战争是使他能够保住皇位的条件，但是，由于他毕竟只是一个假波拿巴，所以看来战争将始終是徒劳的，是在欺騙的借口下发动的，是浪費鮮血和物质財富而不会給他的臣民带来任何好处的。克里木战争是如此。剛剛結束的战争也是如此。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法国才能享有賦予它的幸福——成为这个人攫为己有的国家。可以說，法国不得不无休止地訴諸十二月日子的实践。只不过破坏行动的地点从巴黎的林蔭道轉移到倫巴第的平原上或者克里木的赫尔松涅斯去了，而大革命的可怜后裔不是被利用来屠杀自己的同胞，而是被利用来屠杀操別种語言的人們罢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59 年 7 月 30 日
左右

作为社論載于 1859 年 8 月 12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71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QUID PRO QUO²⁶⁵

一

克勞塞維茨將軍在他的一篇論 1796 年奧法戰爭的文章中說，奧地利經常打敗仗，是因為它的作戰計劃無論在戰略上还是在策略上都不是考慮要實際地去取得勝利，而是要利用似乎已經取得了的勝利。²⁶⁶ 從兩翼迂迴敵人，包圍敵人，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在各個最遠的據點上，以圖截斷想像中已被擊潰的敵人的一切退路，——為了利用臆想出來的勝利而採取的這些措施和類似措施，每次都成了保證打敗仗的最可靠的辦法。對奧軍作戰方法的這一段評語完全適用於普魯士外交。

普魯士無疑是力圖少花錢而辦大事。某種本能會使它感覺到，庸碌無能之輩青雲直上的有利時機已經來到。維也納條約的法國，路易-菲力浦的法國由於一道簡單的命令就從王國改稱為帝國²⁶⁷，而在歐洲却連國境上的一個界樁也沒有移動。為了通過 12 月 2 日搞出一個零月 18 日的摹製品來，不必再進行 1796 年的意大利遠征和對埃及的討伐²⁶⁸，只要成立騙子手十二月十日會和舉行一次薩托里的臘腸檢閱就夠了。普魯士知道，各大國並不完全贊同法國農民關於真拿破侖復活的幻想。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認為，那個要在法國扮演拿破侖的冒險家擔任了一個危險的角色，因此

对官方欧洲說来他随时都可能成为危險的人物。法国之所以能容忍了假帝国,仅仅是由于它觉得欧洲相信这出笑剧。因此,問題曾在于使小丑能够輕松愉快地扮演他的角色,保证在池座和下等楼座上都有一批热心的捧場者。过去每当法国国内的局势动蕩不定的时候,——看来,这个洛可可式的帝国繞它自己的軸心旋轉的最大周期是两年,——都要允許这位阿姆要塞昔日的囚徒²⁵⁵进行一場国外的冒險。那时在欧洲的議事日程上就出現了只有在法国国境的那一边才能实行的拿破侖綱領的某一条条文的摹制品。奥当斯的儿子一再被允許去进行战争,但是必須遵照路易-菲力浦的口号:«La France est assez riche pour payer sa gloire»〔“法兰西非常富有,足以为自己的荣誉付出代价”〕。普魯士的老国王^①,这个有头沒有脑的人有一次說,他的普魯士和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普魯士不同的地方在于,后者处于对基督教的抽象对立之中,而前者則克服了庸俗教化的过渡时代,达到了对神的启示的深刻的內心理解。老拿破侖也曾抱有庸俗的純理性主义的偏見,认为只是在战争費用由其他国家負担,而战争果实由法国享受的时候,战争对法国才是合算的。与此相反,他的滑稽可笑的继承者得出一个意义深刻的結論,认为法国自己应当为自己的軍事荣誉付出代价,保持法国的旧疆界是自然規律,他进行的一切战争都应该是“局部性的”,即在欧洲每次恩准他扮演他的角色的有限範圍內进行。因此,他进行的战争实际上只不过是周期性地給法国做放血手术罢了,这些手术每次都使法国增加一笔新国債,丧失一支旧军队。

但是,每經過一次这样的战争,总要发生一場紛爭。法国感到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編者注

不滿意，但是歐洲千方百計地極力勸說這個愛耍脾氣的 belle France [美麗的法國]。它對 Dutchfish^① 扮演著巴納姆的角色。難道在對俄戰爭以後，歐洲不是極力把他描繪成為具有一切戲劇性特征的仲裁者嗎？難道馮·澤巴赫男爵沒有從德勒斯頓到巴黎，又從巴黎到德勒斯頓往來奔走嗎？²⁶⁹ 放毒者奧爾洛夫和偽造者布隆諾夫沒有向他逢迎討好嗎？²⁷⁰ 難道門的內哥羅的公爵和雅科布·費奈迭沒有相信過他的萬能嗎？²⁷¹ 難道沒有允許過他打着反對英國的背信棄義的招牌來實現俄國的要求嗎？帕麥斯頓用對卡爾斯的叛賣行為和對他自己的將軍威廉斯的反面的贊揚²⁷² 來確證的對俄和約，難道不是被“泰晤士報”宣布為波拿巴對英國的背叛嗎？難道他沒有博得歐洲最機靈的人這份光榮嗎？難道在戰爭期間他沒有占領即使不是現代世界那也是古代世界的一切首都嗎？²⁷³ 他傲然掃蕩了達達尼爾海峽不是說明他有一套深深隱藏著的計劃嗎？老拿破侖通常都是從那些最近的任务著手的。新出現的拿破侖的表面上的恭順却說明權謀家的深奧莫測。他拒絕了好的東西，只不過是力求得到更好的東西。最後，難道巴黎和約不是以歐洲對比利時這樣的“大國”的反波拿巴主義的記者的 «Avis» [“警告”] 而告成的嗎？²⁷⁴

那時，假拿破侖的法國兩年正常循環的時間過去了。歐洲的官方人物以為，他們為了這個人的尊嚴所盡的力現在已經够多了。他們曾允許他作為英國人的隨行人員坐船到中國去²⁷⁵，並且受俄國的委託讓庫扎上校做多瑙河兩公國的統治者¹⁴⁸。但是，只要路易-拿破侖想試一試跨越英雄和扮演英雄的小丑之間的難以辨別

① 直譯是：“荷蘭的小魚”；轉意是：“荷蘭的無賴漢”。——編者注

的界限，他立即就会被人以嘲弄的口吻命令回到为他划定的活动场所的范围內去。他反对北美合众国的阴谋、他想恢复贩卖奴隶的企图²⁷⁶、他对英国的装模作样的威胁、他就苏伊士运河問題进行的反俄示威（他在俄国授意下負責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是在約翰牛面前替帕麦斯顿在俄国的策动下对解决方案采取的反对立場作辯解），——所有这一切都告吹了。只是对于小小的葡萄牙，人們还允許他作威作福²⁷⁷，为的是勾划出他对待大国的那副可怜相。連比利时也开始构筑工事了，連瑞士也朗誦起“威廉·退尔”来了²⁷⁸。显然，正式控制着欧洲的那些势力碰到了—一个过去經常把天文学家們弄得蒙头轉向的問題——錯算了天体运轉的周期。

那时，«lesser Empire»〔“小帝国”〕两年循环的时间过去了。在从1852年到1854年的第一次循环期間，发生了无声无息的風化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嗅到，但是不能听到。对俄战争在这时成了safety valve〔通风口〕。在1856年到1858年的第二次循环中，情况就不同了。法国的内部发展把假波拿巴抛到政变的关头。奥尔西尼的炸彈預告了暴風雨的到来。庫茨小姐的不幸的情夫不得不把政权让給他的將軍們。法国被破天荒地按西班牙的习惯分成了5个鎮守司令区²⁷⁹，而且全部手續都是在患有气臟病的欧仁妮的星光照耀下进行的。成立摄政王职位实际上是从加西莫多皇帝手中把政权交給奥尔良火烤阿拉伯人的专家佩利西埃手中。²⁸⁰但是，恢复terreur〔恐怖手段〕已經不再使人感到可怕了。奥斯特利茨会战的荷兰侄子⁵²不是显得令人可怕，而是显得丑陋可笑了。N'est pas monstre qui veut!〔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怪物!〕蒙塔郎貝尔能够在巴黎扮演汉普敦²⁸¹，蒲魯东則能够在布魯塞尔宣揚附有Acte additionel〔补充条例〕的路易-菲力浦主义²⁸²。夏龙起义²⁸³证

明，軍隊本身就把复辟帝国看做是一出即将演到最后一幕的哑剧。

路易·波拿巴又达到了决定命运的关头，这时官方欧洲应当明白，只有用旧拿破侖綱領的某一新条文的摹制品才能防止革命的危險。摹制品已从拿破侖用来收場的事件，即从俄国的远征开始了。那末，为什么不能用拿破侖用来開場的事件即意大利战争把它繼續下去呢？在欧洲的所有主要成員中，奥地利是最不 *grata* [討人喜欢的]。魯普士希望为华沙會議、布隆采耳会战和对北海的远征向奥地利报仇雪恨。帕麦斯顿早就用对奥地利的仇恨来证实他的文明傳播者的意願。俄国满怀恐惧地看到，奥地利已再次宣布它的銀行将用現款支付。当 1846 年奥地利国库自远古以来第一次沒有出現赤字的时候，俄国就发出了发动克拉科夫革命²⁸⁴的信号。最后，奥地利对自由主义的欧洲說来是 *bête noire*^①。所以，波拿巴的第二次戏剧性的阿梯拉远征应当是反对奥地利，但是有一定的条件：不支付战費，不扩大法国的疆界，把战争“局限”在明智的界限內，即为了給法国再做一次光荣的放血手术所必需的范围內。

喜剧既然开了場，普魯士在这种形势下就认定，在上司批准和十分保險的情况下大显身手的时机对它說来也来到了。維拉弗兰卡和約使它在全欧洲面前受到愚弄，搞得臭名远揚。当它在立宪主义运动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表现在它的国債正以几何級数增加——的情况下，它认为，把 *blue book of its own make*²⁸⁵ 像一块膏药一样貼在伤口上是一个好办法。下一篇文章我們將要听取它自己的辯护詞。

① 直譯是：“黑色的野兽”，意即駭人的怪物，令人憎恨的东西。——編者注

二

当实行摄政的普魯士所說的就像所写的一样的时候，那就很容易发现它在欧洲的“錯誤的喜劇”^①中不仅表现出有曲解别人的天才，而且还有被人曲解的天才。在这方面，它同不仅自己說刻薄話而且也使别人对他說刻薄話的福斯泰夫有某些相似之处。

4月14日阿尔勃萊希特大公来到了柏林，在那里待到20日。他要告訴摄政王一个秘密，并向他提出一个建議。秘密有关将要发出的奥地利給維克多-艾曼努尔的最后通牒。建議涉及萊茵河上的战争。預計阿尔勃萊希特应率領26万奥軍和联邦的几个南德意志軍在萊茵河上游西岸行动，而普魯士軍和几个北德意志軍将在普魯士統率下組成萊茵河上的北方軍团。軍隊不設“联軍总司令”，而应当受弗兰茨-約瑟夫和摄政王共同組成的大本营領導。

普魯士不仅立刻忍怒拒絕了战争計劃，而且“強烈反对阿尔勃萊希特大公突然提出最后通牒”。

普魯士只要使出了它饒舌的 donkeypower [駱力]（大家知道，大型机器的功率是由 horsepower [馬力]来計算的），那是誰也不能抵擋的，最不能抵擋的則是奧地利人。摄政王和他的四个婁罗——施萊尼茨、奧尔斯瓦特、博宁和察貝尔博士先生——“深信不疑”，他們已使奧地利“深信不疑了”。

① 莎士比亚的一个著名的喜劇，——編者注

有一篇普魯士的半官方通告說：“阿尔勃萊希特大公 4 月 20 日离开柏林的时候，大家都**相信**，已提到日程上来的大胆的計劃被擱置起来了；但是，——alas! [可叹!] ——他起程几小时以后，維也納来的电报就报道說**最后通牒已經提出。**”

在战争开始以后，普魯士拒絕宣布自己**中立**。施萊尼茨在标明“6 月 24 日于柏林”“給普魯士駐德国各邦宮廷使节的紧急指示”中，为我們揭开了这个英勇的决定的秘密。

他低声細語地說：“普魯士任何时候都不会放棄自己的**調停国**（在另一个紧急指示中說是**調解国**）的立場。不但如此，从战争开始的时刻起，它的**主要意图**就是要保持这个**立場**，为此，**它才拒絕保证自己的中立**，坚持不向任何一方面承担任何責任，所以它的**調停活动**才始終能完全不偏不倚地和**自由地**进行。”

換句話說，奥地利和法国这两个敌对的方面在一場“局限”在意大利舞台上的战争中將互相消耗自己的力量，英国則作为中立国（！）远远居于次要地位。各中立国自己使自己失去了活动能力，而交战双方又因为在斗争中要使用拳头而被縛住了双手。在这两者之間，“完全不偏不倚的和自由的”普魯士像欧里庇得斯的 *deus ex machina*^① 一样 在展翅翱翔。調停者历来总是比受調停的各方所得的东西多。基督所得的比耶和华多，圣彼得又比基督多，神甫又比圣徒多，而武装調停者普魯士所得的將比敌对的和中立的各国都多。說不定俄国和英国就要发出結束這場喜劇的信号。那时，它們将会悄悄地把它們的秘密指示塞进普魯士的口袋里去，而普魯士將給自己戴上布倫²⁸⁶ 的假面具。法国不会知道，

① 見本卷 338 頁編者注。——譯者注

普魯士进行調停是不是会让奥地利占便宜,奥地利也不会知道,普魯士进行調停是不是会让法国占便宜,而它們两者都不会知道,普魯士进行調停是不是会损害它們两国而让俄国和英国占便宜。普魯士将有权要求“一切方面”的信任,也有权使人不信任一切方面。它的无拘束将会拘束一切人。如果普魯士宣布自己中立,那就不能阻止巴伐利亚和德意志联邦的其他成員国倒向奥地利方面。而作为武装調停者,既有各个中立大国掩护它的两翼和后方,又有那副老是虚張声势說将来要建树“德国的”功績的难以捉摸的神气,它就能专心致志地去实现挽救奥地利的既神秘莫测又經過深思熟虑的措施,从而就有权利希望有朝一日用詐騙的手段去貼現德国霸权的期票了。作为英国和俄国的傳声筒,它可以使德意志联邦尊敬自己,而作为德意志联邦的安撫者,它又可以騙取英国和俄国的信任。

普魯士不仅是德国的一个大邦,而且是一个欧洲大国,同时又是一个“調停国”,并且还是德意志联邦的霸主!在事件的进程中将会看到,施萊尼茨怎样越来越陷入这个如此机智而又如此高超的思想进程中而不能自拔。至今都是欧洲国家这辆馬車的第五个輪子、*«by courtesy»* 大国、*«on sufferance»* 而成为欧洲要員的这个普魯士人,現在居然被授予了*«quos ego!»* 的大权²⁸⁷!这一切都不必拔劍相向,而只要把枪扛上肩头,并且除了摄政王的眼泪和他的走狗的墨水以外,什么东西也不会流出。普魯士竟然沒有博得歌德的长篇小说“亲和力”中的米特勒的光荣,那实在不是它的过错。

普魯士懂得,在第一幕中应当对奥地利板着面孔,使路易·波拿巴不致有絲毫的怀疑,而首先要到俄国和英国面前大显一下

身手。

施萊尼茨在他那个我們已經引证过的紧急指示中自认：“在許多德国邦都籠罩着激憤情緒的情况下，要达到这个对我们的利益說来如此重要的目的，并不容易。加之我們政策的方針在这方面同大多数德国邦政府的政策有分歧，尤其是奥地利不同意我們的政策，这个情况未必需要贅言了。”

尽管有这一切困难，但是普魯士还是成功地扮演了德意志联邦宪兵的角色。从4月底到5月底，它展开了它的調停活动，迫使它的德意志联邦中的伙伴们不得不按兵不动。

施萊尼茨委婉地說：“我們努力的**第一件事**，是要防止联邦过早地卷入战争。”

同时，柏林內閣打开了自由主义报刊的閘門。这些报刊直截了当地向市民解釋說，波拿巴冲进意大利，只是为了让德国摆脱奥地利，并在英雄的庇护下建立德国的統一。这个英雄无疑地是属于民族的，因为他早已被宣布为“民族的财产”了。

普魯士“当时”所負的使命不是简单地作为調停者，而是作为“武装的”調停者出現，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它的行动发生了困难。它必須一方面抑制好战的貪欲，另一方面又要号召拿起武器来。它一面分发武器，同时又警告說不得动用武器。

“不要玩弄火枪，
它和你一样觉得疼痛。”

施萊尼茨說：“但是，如果我們为了保卫处于两个交战大国之間的德国而同时采取一切措施，如果联邦各机关在我們的协助下也不倦地采取防御措施，那末对我们說来，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責任**——注意不要使这些措施突然变成进攻的手段，不要因此而使联邦的立場和**我們自己的立場**的名声大受损伤。”

可是，完全可以理解，“調停国”不能总是片面地朝着同一个方

向行动。何况还发现了危险的征兆。

施莱尼茨说：“我们深感遗憾的是，有些迹象说明，正在策划签订同我们的政策方针不一致的特别协定，局势的严重性理应引起我们的担忧，因为到头来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拆散联邦的趋势。”

为了防止发生这种“纷争”并揭开“调停”的第二幕，便把维利森将军的使团派到维也纳去了。使团活动的结果在施莱尼茨6月14日从柏林寄给普鲁士驻维也纳大使威尔特尔的紧急指示中，已经讲过了。当施莱尼茨只给德意志联邦的成员国写公文的时候，他用的是 in ordinary [普通的] 普鲁士公文体。当他给外国大国写公文的时候，幸而此事是用他不懂的语言办理的。但是，他给奥地利的是些什么样的紧急公函呀！全是长得不得了的句子，像一团团绞在一起的条虫，经过“哥达主义”肥皂液的浸渍，又撒上了乌凯马尔克²⁸⁸的文牘主义的沙糖，一半还泡在诡譎多端的柏林 treacle [糖浆] 的洪流中。

我们之所以要对现在已经出世三个星期的柏林 Blue book [蓝皮书] 的某些部分仔细加以分析，并不是由于嗜古的怪癖，也不是由于对于勃兰登堡的历史感到兴趣。因为这里谈的是现在正被德国自由派和民主派当做普鲁士未来帝国使命的凭借来加以吹嘘的那些文件。

施莱尼茨给维利森将军的最近一次紧急指示，是5月27日送到维也纳的。威尔特尔就奥皇内阁对维利森的接待给施莱尼茨的两个紧急报告标明的日期是5月29日和31日。这两个报告在半个月中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为了掩饰原来的“使命”和事后对它所作的“解释”之间的各种矛盾，在普鲁士的 blue book 中，施莱尼茨给维利森的那些紧急指示、威尔特尔给施莱尼茨的那些紧急报告

以及摄政王和布斯特拉巴²⁸⁹之間的全部会談情况都被抽掉了。奥地利外交大臣萊希堡无论如何也无法恢复原文，因为維利森和威尔特尔本来就不是要用书面把普魯士的那些急件通知他的，而只是对他宣讀一遍。可以想像一下，一个不能讀到而只能听到下面这种长句子的大臣，处境是怎么样：

施萊尼茨說：“我切望把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完全澄清，所以就关心要在我給馮·維利森將軍的函件中把我們對我們在一定情况下准备采取的措施以及那些必須成为我們安排采取的行動的基礎的先决条件的观点十分明确地加以闡明。”

施萊尼茨在准备正式解釋維利森去維也納的使命以前，以他所特有的謹慎态度让事件自然发展。奧軍在馬振塔会战中打了敗仗，撤出了所有倫巴第的要塞，急速地退到基澤河东岸。哥尔查科夫照会德国各小邦，以鞭子相威胁，責成它們严守中立。这个照会上报了刊。²⁹⁰ 被怀疑暗中同情奥地利的得比，把政权让给了帕麦斯顿。最后，在6月14日，即施萊尼茨給威尔特尔发出紧急指示那一天，普魯士政府通报²⁹¹ 刊登了关于动員6个普魯士軍的命令。維利森使团被派往維也納，随后便是这个动員令！整个德国都紛紛議論普魯士的英勇的謹慎和普魯士的謹慎的英勇。

最后，我們来看看施萊尼茨給普魯士駐維也納大使的紧急指示。摄政王脫口說出了“寬宏大量的話”。接着，維利森就以先知的口吻預言了“最誠实的意图”、“最无私的計劃”和“最真摯的信任”；萊希堡伯爵“表示同意我們所持的观点”。但是，同一位萊希堡，这位維也納的苏格拉底，終于表示希望从漫无边际的空談轉入对平淡无奇的现实事实的討論。他认为，“看到普魯士的意图已經表达出来”这一点，具有“特別的意义”。根据这一点，普魯士企图

利用施萊尼茨的筆來“進一步明確”維利森的“使團”的“意圖”。因此，他“進一步概述了在維也納**交換思想**時我們所表述過的意圖”。我們在這裡把這個“進一步概述”扼要復述一下。維利森使團的用意是這樣的。普魯士“在具有一定的先決條件的情況下”，有“確定不移的意圖”。施萊尼茨本來應該說，普魯士在具有確定不移的先決條件的情況下，有不一定的意圖。**先決條件**就是要奧地利把德意志聯邦的首倡權讓給普魯士，不同德國各王朝單獨簽訂條約，總之，就是暫時把德國的霸權讓給普魯士；**意圖**就是要保證奧地利“根據 1815 年條約對意大利一些地區的占有權”，並“爭取在這個基礎上締結和約”。普魯士認為，奧地利與意大利其他各國的關係和“這些意大利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如果奧地利“在意大利的領地”“遭到了嚴重的威脅”，普魯士就將試圖“進行武裝調停”，並且

“在調停成功時，它將繼續採取行動以達到上述目的，因為作為歐洲大國的責任和德意志民族的崇高使命要求它這樣做”。

非當事人施萊尼茨說：“我們自己的利益責成我們**不能延緩**干涉。但是，選擇調停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以後的行動的時機，應由**王室自由決定**。”

施萊尼茨斷言：第一，由維利森所轉達的“交換思想”被萊希堡說成是“交換意見”；第二，普魯士的意圖和先決條件“應當取得皇室的同意”；第三，萊希堡大概是純思維的敵人，他想要把“交換思想”變成“交換外交照會”，變成“兩個內閣的有成文的文件作證明的協商”，總而言之，他希望把普魯士的“先決條件”和普魯士的“意圖”看做是白紙黑字、“有案可查的”東西。但是，這時施萊尼茨的高尚意識感到憤慨了。萊希堡的要求所追求的是什麼目的呢？就是要實際上變我們的“**最秘密的、由於信賴而通知的政治思**

想为束縛我們的諾言”。

施萊尼茨正在做政治思維方面的实际的、秘密的练习。而萊希堡却想把高不可攀的思想同卑微下賤的照会联系起来！对于柏林的思想家說来这是 *Quelle horreur* [多么可怕的事] 呀！况且这种交换照会会像是对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那些領地的“保证”。好像普魯士想保证什么似的！更何况被冒瀆地变成了交换照会的交换思想“馬上就会被法国和俄国理解为——这是完全合乎邏輯的——是 *engagement formel* [正式的责任]，是加入战争”。好像普魯士什么时候曾打算参战，或者希望在什么人面前，尤其是在法国和俄国面前使自己名誉扫地似的！最后，也是主要的，这种交换照会“显然会使原定的調停企图无法实现”。奥地利应该了解，問題不在于它在意大利的那些領地，不在于 1815 年的条约，不在于法国的篡位，不在于俄国的世界霸权，不在于一般的卑賤的利益，而在于要引起欧洲糾紛，以便出乎意外地为普魯士造成一个“調停国”的新的崇高地位。莎士比亚作品中那个入睡时是补鍋匠，醒来就成了勋爵的流浪汉²⁹² 所說的話，并不像施萊尼茨沉湎在普魯士作为欧洲“武装調停国”的使命这个念念不忘的思想时所說的那样冠冕堂皇。《uneasy conviction, that he ought to act up to his newborn sublimity of character》[“关于他的行动必須符合于他性格中新出現的高貴品质的令人煩惱不安的信念”]像毒蜘蛛咬住他一样，老是縈繞在他的心头。

施萊尼茨凑近萊希堡的耳边把关于普魯士作为一个調停国的使命这个念念不忘的思想悄悄告訴他时所表现的“信任态度”，正像他所說的，使他也“希望获得皇室的与我們的信任相当的信任”。萊希堡也要求得到施萊尼茨这份稀奇的照会的副本。威尔

特尔宣称，为了有文件证明普魯士的信任态度，“根据自己得到的指示”，他受命宣讀照会，但是無論如何沒有权利留下这个 *corpus delicti* [物证]。于是萊希堡要求威尔特尔和他一起到維罗那去見弗兰茨-約瑟夫，以便让后者“至少是从口头上能够准确地、詳尽地知道普魯士的看法”。但是，普魯士的“信任”同样也起来反对这个要求，于是萊希堡便以諷刺性的恭順态度指出，“如果他在他的回答中也許沒有能够完全正确地把握柏林紧急指示的思想的全部进程”，那末这就应当归咎于施萊尼茨的这些长句子只是对他宣讀的。

萊希堡給奥地利駐柏林大使科勒尔的回答标明的日期是：6月22日于維罗那。这个回答很使人怀疑5月底維利森使团的用意和6月中柏林对这一使命的解釋之間是否一致。

萊希堡說：“根据我过去同他〈威尔特尔〉和馮·維利森將軍的会談，我沒有得出結論，认为柏林內閣对我们仍将保持高度的戒备，以致避免用任何文件来证明自己的意图。”

但是，維利森的使团更沒有使萊希堡准备承认普魯士作为欧洲武装調停国的崇高使命。按萊希堡的說法，主要的，即問題实质的真正所在，是“欧洲摆脱法国的最高领导而独立”。事件本身就揭穿了“我們的敌人在真实意图尚未成熟以前想冠冕堂皇地用来掩飾这些意图”的“那些借口”是空洞无物、不值一提的。“此外，普魯士作为德意志联邦的成員国所負的責任，同保持調停的作用随时都可能变得无法相容。”最后，奥地利希望看到普魯士成为站在自己这方面的“盟国”，所以，一开始就否认它作为“調停者”的使命。因此，奥地利既然从意大利紛爭一开始就反对普魯士“采取調停者立場的企图”，那末显然它就更不会在某个时候贊成“普魯士

的武装調停”了。

萊希堡說：“武装調停这个概念就其实质說来，包含有发生反对交战双方的战争的可能性。幸而在普魯士和奥地利之間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所以，我們不能設想，在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中普魯士能进行武装調停。无论这个名称，还是它所隱藏的内容，看来都应当永远被排除于两个国家的关系之外。”

可見，萊希堡反对施萊尼茨的紧急公函及其对維利森所負使命的解釋。他认为，从5月底起，普魯士的調子变了；他坚决否认奥地利已經承认普魯士負有作为武装調停国的崇高使命。施萊尼茨有責任說明这第二号誤会（第一号誤会是在阿尔勃萊希特大公和摄政王之間发生的），办法是公布他給維利森的紧急指示和威尔特尔給他的那些紧急报告。

可是，萊希堡是以奥地利人的身分来回答的，那为什么奥地利人在同普魯士人談話时要改变自己的本性呢？为什么普魯士就不“保证”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那些領地呢？难道这种保证——萊希堡問道，——不符合維也納条約的精神嗎？

“如果法国希望推翻由条約規定的欧洲局面的最重要的部分，它在从維也納會議直到我們今天这个时代中难道能希望哪怕有一个敌人是孤立的嗎？法国根本不想用局部战争去侵犯那些領地的已定疆界。”

可是，“交換照会”还不是“有条約做根据的保证”。按萊希堡的說法，奥地利“只想了解”普魯士的善良意图。但是，为了討好施萊尼茨，对于他的絕對秘密的政治思想，它将絕對保守秘密。至于媾和，萊希堡指出，普魯士可以向法国随便提出多少媾和建議，“条件是，这些建議要保持奥地利和其他意大利君主的1815年的版图和自主权利不受侵犯”。

換句話說，奧地利在給作為調停國的“普魯士的秘密通知”中，根本不想越出沒有任何意義的共同地區的界限。相反地，既然普魯士“以積極的盟國的身分出現，那末，關於擬定媾和條件的問題也就只有在兩國一致同意的情況下，才能談得上”。

最後，萊希堡觸動了普魯士的隱痛。照他的話說，奧地利同意普魯士想在聯邦議會中得到首倡權的“意圖”，只是有一個“前提”：普魯士的交換思想將變成交換照會。但是，結論連同前提一起失去了意義。甚至施萊尼茨以他所固有的理解能力也“會理解到”，由於柏林“無論在哪一方面都沒有承擔過束縛它的義務”，由於他自己“把做出關於武裝調停的決定的時機推延”到未定的“將來，並且保留了選擇這種時機的權利”，維也納也“應當完全保持在德意志聯邦關係方面的自由”。

這樣一來，普魯士誘使奧地利承認它在德國的優先地位並且具有充分權利擔任歐洲調停國的崇高角色的企圖便以徹底的失敗而告終了。在這一段時間內，曾動員了6個普魯士軍。普魯士应当向歐洲解釋。因此，施萊尼茨在他“6月19日致普魯士駐歐洲各國使館的通函”中宣布：

“普魯士通過動員，採取了更加符合當前局勢的立場，同時它並不放棄自己的溫和原則……**普魯士的政策仍然是它從意大利問題的紛爭開始時起就一直遵循的政策。**可是現在它根據既成局勢，也拿出了自己的解決這一問題的办法。”

為了使人不致對政策及其辦法產生任何懷疑，通函最後聲明，“普魯士的意圖是防止德國的分裂”。

攝政王政府認為，甚至連它的這個懺悔的罪人的聲明也必須用給法國的“極秘密的”通知來緩和一下。早在戰爭即將開始之

前，布斯特拉巴和摄政王两人共同的朋友、战争画画家吉^①第一个受委托前往柏林。他带回来了对友谊的保证。在进行动员期间，也向巴黎发出了许多官方的和半官方的保证，内容是这样的：

“法国无论如何不应当向坏的方面解释普鲁士的军事措施。我们不抱任何幻想，我们知道，同法国作战是多么不理智，这种战争将招致多么危险的后果。但是，请法皇体谅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困难。各方面都向摄政王政府施加压力。我们处于别人对我们心存戒惧的状况下，对这点不得不加以考虑。”

或者：

“我们正在进行动员，但是无论如何不应认为这是进攻法国的措施。quasi（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德意志联邦首脑的摄政王，应该不是简单地捍卫联邦的利益，而且在国内也应该居于使他能够防止各种轻率行为并迫使德国其他各邦遵循他的温和政策的地位。请法皇重视这一点，并尽力使我们能比较容易地完成我们的任务。”

普鲁士在设置它那些滑稽可笑的圈套时，竟然要求法国政府：

“让政府的报纸不要过于贬损巴伐利亚、萨克森等而抬举普鲁士；这只会损坏普鲁士的名誉。”

于是，瓦列夫斯基便有充分权利在他6月20日的通函中声明：

“普鲁士所采取的新军事措施并没有使我们感到任何不安……普鲁士政府动员它的一部分军队，这说明它除了保卫德国的安全，并确立使它能够同其他两个大国一起对今后的调停进程产生公正的影响的地位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意图。”

普鲁士作为武装调停国的崇高使命在各国已家喻户晓，以致瓦列夫斯基甚至敢于说出很难听的俏皮话，说普鲁士宣布动员并

① 大概指吉南。——编者注

不是反对法国,而是反对“其他两个大国”,因为它们想使普魯士对“簽訂协定”失去“公正的”影响。

普魯士調停的第二幕就这样收場了。

普魯士調停的第一幕(从4月底到5月底)給德国做出了一个判決:«La mort sans phrase»²⁹³。在第二幕中(从5月底到6月24日)，“偉大祖国”的瘫痪状态被关于維利森使团的漂亮言詞和普魯士动員的阿拉伯图案裝飾起来了。这第二幕的最后一場是在德国各小邦宮廷里演出的，它們在听取施萊尼茨的照会。施萊尼茨像施梯伯一样，喜欢“混合的”口述程序。在这里我們从他那个我們已經提到过的，标明日期是“6月24日于柏林”的“給普魯士駐德意志各邦宮廷使节”的照会中，只援引两个地方。为什么普魯士不同意实现奥地利想使“交換思想”变成“交換照会”的愿望呢？

施萊尼茨向德国各邦宮廷悄悄地說：“实现这个愿望，就等于是保证奥地利占有倫巴第。对那些不确定的事件承担责任对普魯士來說是不现实的。”

所以，从柏林的观点看来，失去倫巴第并不是“对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那些領地的严重的威胁”，也不是使普魯士伺机拔劍而起的“确定事件”。

施萊尼茨接着說：“今后甚至是任何形式上的責任，只要会改变我們的調停国的地位，都应当拒絕承担。”

可見，普魯士的調停并不是致力于为奥地利的利益而改变“不确定的事件”；可以說恰好相反，一切可能发生的事件，其宗旨都在于使“普魯士作为調停国的地位”仍然保持不变。正当普魯士断然要求奥地利把德意志联邦的首倡权交給它的时候，它自己却献給了奥地利一件值得怀疑的等价物，这就是有善良的普魯士意图作保证的普魯士的善良意志。正如柏林的短工們²⁹⁴所說的，放了葡

荷酱的葱花湯。

在調停的第三幕中，普魯士终于以欧洲大国的角色出場了，施萊尼茨在准备两份同样的紧急公函，一份給倫敦的伯恩施托尔夫伯爵，另一份給彼得堡的俾斯麦男爵；第一份应向約翰·罗素勳爵宣讀，第二份应向哥尔查科夫公爵宣讀。紧急公函中有一半全是賠礼求恕。普魯士动員了它的一部分兵力，而施萊尼茨不遺余力地論证了这一大胆步驟。在6月19日給欧洲各大国的共同照会中，这个步驟被宣布是为了保卫德意志联邦的領土，为了普魯士实现自己武装調停国的作用，特別为了“防止德国的分裂”。在給德意志联邦各成員国的公函中說，“这个措施应当束縛法国的軍事力量，大大改善奥地利的处境”。在給英国和俄国的紧急公函中，作为动因的是“各邻国的軍备活动”、“注意到事件的进程”、“軍事行动临近德国的边境”、尊严、利益、使命等等。但是，“另一方面”，“而且”，“我再重复一遍，伯爵先生和男爵先生”，普魯士进行軍备活动沒有任何不好的想法。它的意图“当然并不包括要制造新的紛爭”。它所追求的，“仍然只是它最近在英国和俄国的同意下所力求达到的那个目的”。*Nous n'entendons pas malice!*〔我們不打算干什么坏事!〕——施萊尼茨这样大声說道。

“我們只希望和平”，并且“我們滿怀信任地向倫敦內閣和彼得堡內閣呼吁，以便同它們联合起来寻求停止流血的办法”。

为了表明自己是值得英国和俄国信任的，普魯士像捍卫不可动摇的教条一样捍卫着英俄的两个論点。第一个論点是，奥地利以它的最后通牒惹起了战争；第二个論点是，斗争是为了实行自由主义的行政改革，为了廢除奥地利对毗邻的意大利各国的保护权而进行的。使奥地利皇室的权利迁就民族自由主义的“改組活

动”——这就是普魯士极力追求的东西。最后，正如施萊尼茨所說的，普魯士相信路易·波拿巴的 selfdenying declarations [大公无私的声明]。

这些空洞无物的无稽之談就是普魯士“以充分的信任，光明磊落的坦率态度”，羞答答地悄悄告訴各中立大国关于它的“調停計劃”的一切。“头脑清醒、态度謙恭的小伙子”施萊尼茨担心“更明确地說出自己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会把問題弄糟”。但是，他那念念不忘的思想終究还是迸发出来了。普魯士认为自己的“使命是起武装調停国的作用”。但願英国和俄国承认这个使命！但願它們“对于如何解决当前的紛爭，怎样才能使这种解决办法为互相斗爭的各方面所接受，发表自己的看法”。但願它們首先向普魯士发出指令，使它可以在最高上司的批准下，可以說是 avec garantie du gouvernement [在政府的保证下]，承担調停的獅子的角色！总之，普魯士想扮演欧洲的 lion [獅子] 的角色，但是要像細木工史納格那样扮演这个角色。

獅子：但是請你們放心，我实在是細木工史納格，
既不是凶猛的公獅；也不是一头母獅，
要是我真的是一头獅子而冲到这儿来，
那我自己会大倒其霉！

提修斯：一头非常善良的畜生，有一颗好良心。

萊散特：这头獅子按勇气說只好算是一只狐狸。

提修斯：对了，而按他那小心翼翼的样子說起来倒像是一只鵝。^①

施萊尼茨的紧急公函标明的日期是6月24日，也就是索尔費里諾会战的日子。当奥地利战败的消息傳到柏林时，这个紧急公

①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五幕第一場。——編者注

函的两份副本还放在施莱尼茨的写字台上。同时，邮局也把約翰·罗素勋爵的急件²⁹⁵送到了，“其中布魯姆先生过去的 little man [小人物]”，tom-tit of English liberalism [英国自由主义的小鳥]，爱尔兰 «coercion bills»²⁹⁶ 的喉舌把帕麦斯顿的意大利计划告诉了普魯士。馬格德堡不在明乔河上，而比凱堡也不在阿迪杰河上，正像哈里季不在恒河上，而索尔福特也不在薩特里日河上一样。但是，路易·波拿巴声称，他并不向往馬格德堡和比凱堡。为什么要用条頓人的粗魯行为去激怒高卢雄鸡呢？約翰·罗素甚至发现，如果戰場上的“胜利”是“决定性的”，那“敌人一定非常願意同意停止消耗精力的斗争”。依据这个絕頂聪明的发现，罗素一面指責德国的好战貪欲，一面又贊揚普魯士的“温和的、开明的行为”，并且建議施莱尼茨要“在德国局势許可的範圍內尽可能”准确地模仿英国！最后，这个 Jack of all trades [万能行家]回忆起了普魯士的“崇高的調停使命”，带着一般的又酸又甜的微微的冷笑，向他这位立宪主义方面的学生說了下面一段安慰的話作为临別贈言：

“很可能，各友好的調停国的声音将被认真地听取，而簽訂和約的建議也不再是毫无成效的时间就在眼前了！”（罗素寄給柏林布卢姆菲耳德勋爵的紧急公函，日期：6月22日于倫敦。）

卡·馬克思写于1859年7月底—
8月中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

載于1859年7月30日和8月
6、13、20日“人民报”第13、14、
15和16号

弗·恩格斯 卡尔·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

1859年柏林弗兰茨·敦克尔出版社版，第一分册²⁹⁷

一

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領域內，他們与其余的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領域內甚至胜过它們。只有一門科学，在它的大师們当中，沒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經济学。原因很清楚。政治經济学是現代資產階級社会的理論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資產階級关系为前提，而在德国，这种关系自从宗教改革战争和农民战争，特别是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的几百年間，都沒有可能产生。荷兰同帝国的脱离²⁹⁸，把德国从世界貿易中排挤出来，使它的工业发展一开始就限于极小的規模；当德国人如此艰辛如此迟緩地从內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当他們把从来就不很大的全部市民精力耗費于毫无結果的斗争，以反对每个小邦主和帝国小貴族强加在他們臣民的产业上的关税壁垒和专橫的貿易条例的时候，当帝国城市在行会习气和貴族驕橫中衰落下去的时候，荷兰、英国和法国在世界貿易中取得了首要地位，接二連三地开拓着殖民地，使工場手工业的发展达到最高度的繁荣，直到最后，英国由于蒸汽使它的煤铁矿藏有了价值，站到現代資產階級发展的最

前列。但是，陈腐可笑的中世纪残余直到 1830 年还束缚着德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发展，当还需要同这种残余进行斗争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德国的政治经济学。随着关税同盟¹⁶⁹的建立，德国人才达到能够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地步。从这时起，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学才真正开始输入，以适应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不久，学者和官僚就抓住了输入的材料，用一种并不替“德意志精神”特别增光的方式把它加工制造。于是，从那些耍笔杆的投机家、商人、学究和官僚的杂凑班里，产生了德国的经济学著作，这种著作就其乏味、肤浅、空洞、冗长和抄袭情况来说，只有德国的长篇小说才能与之相比。在那些讲求实际的人们当中，最先形成了产业家的保护关税派。他们的权威是李斯特，虽然他的全部洋洋大作是从大陆体系的理论创立者法国人费里埃那里抄来的，但是总不失为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同这一派相对立，在四十年代产生了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份商人的自由贸易派，他们怀着幼稚的然而自私的信仰，重复英国自由贸易派的论据。最后，在从理论方面研究这门学科的学究和官僚中，有像劳先生那样干瘪而无批判能力的采集家；有像施泰因先生那样把外国的原理译成没有弄懂的黑格尔语言的自作聪明的思辨哲学家；或者有像黎尔先生那样在“文化史”方面舞文弄墨拾人唾余的人。从这一切最终得出的是官房学²⁹⁹，这是一种澆上了一些折衷主义经济学调味汁的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对于准备应考官职的人倒是有用的。

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做不可侵犯的教条拼命死记，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出现了。它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这种德

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后者的要点，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作了扼要的阐述^①。这篇序言的主要部分已经在“人民报”上刊载过，因此我们请读者去参看一下。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②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

① 见本卷第7—11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8—9页。——编者注

們的面前。

人們的意識決定于人們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細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結論就給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給最隱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傳統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論证的全部傳統方式崩潰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自由、平等、博爱) 的符咒来翻轉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談家极大的憤怒。尽管如此，他們还是力图剽窃新的思想，然而对这些思想又极端无知。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說空話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資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二月革命把我們党推上了政治舞台，因此使它不可能进行純科学的探討。虽然如此，这个基本观点却像一根紅綫貫穿着党的一切文献。在所有这些文献中，每个事件都证明，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而不是从伴随着物质动因的辞句产生，相反地，政治辞句和法律辞句正像政治行动及其結果一样，倒是从物质动因产生的。

1848—1849 年革命失敗之后，这样一个时期到来了，在这个时期从国外来影响德国愈来愈不可能了，我們党把流亡者之間爭吵——因为这成了唯一可能的行动——的場所让給了庸俗民主派。他們心滿意足地热衷于爭吵，今天大吵大鬧，明天握手言欢，后天又公开自己的丑事，他們在美洲到处行乞，接着立刻在瓜分几

文討来的銀錢上重新出丑,在这个时候,我們党却因为重新得到了几分宁靜从事研究工作而高兴。我們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論的基础,研究这个世界观已經够忙了,单是这一点,我們党就不可能堕落到像流亡中的“大人物”那样深的程度。

这些研究的最初成果就是我們面前的这本书。

二

我們面前的这部著作，絕不是对經濟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絕不是对經濟学的某些爭論問題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統地概括經濟科学的全部复杂內容，并且在联系中闡述資產階級生产和資產階級交換的規律为目的。既然經濟学家无非是这些規律的解釋者和辯护人，那末，这种闡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經濟学文献的批判。

自从黑格尔逝世之后，把一門科学在其固有的內部联系中來說明的嘗試，几乎未曾有过。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从老师的辯证法中只学会搬弄最簡單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在他們看来，黑格尔的全部遺產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論題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識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詞汇語录。結果，正如一位波恩的教授所說，这些黑格尔主义者懂一点“无”，却能写“一切”。情况的确如此，这些先生們虽然自命不凡，却深感自己的虛弱，因此尽可能迴避一切重大的問題；陈腐的旧科学由于在实证知識方面較强而保持着它的地盘；只是在費尔巴哈宣布廢棄思辨概念以后，黑格尔学派才逐漸銷声匿迹，于是，旧的形而上学及其固定不变的范疇似乎在科学中又重新开始了它的統治。

这个現象是有它的自然原因的。在黑格尔学派的狄亚多希們³⁰⁰的統治下空談成風，在此之后，自然就出現一个科学的实证

内容重新胜过其形式方面的时代。同时，德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致力于自然科学，这是与1848年以来资产阶级的强大发展相适应的；在这种科学中思辨倾向从来没有多大地位，随着这种科学的时兴，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直到沃尔弗式的极端浅薄的程度为止，也就重新流行起来。黑格尔被遗忘了，新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在理论上同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几乎完全没有差别，它胜于后者的地方主要只是拥有较丰富的自然科学的材料，特别是化学和生理学的材料。我们从毕希纳和福格特身上看到这种康德以前的狭隘庸俗思维方式的极为浅薄的翻版，甚至表示效忠费尔巴哈的摩莱肖特也极其可笑地每时每刻都在最简单的范畴上纠缠不清。平庸的资产阶级理性这匹驾车的笨马，在划分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面前就一筹莫展了；可是，在抽象思维这个十分崎岖险阻的地域行猎的时候，恰好是不能骑驾车的马的。

由此可见，在这里就得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它具有完全抽象的“思辨的”形式，黑格尔就是在这种形式上把它留下来的；另一方面是平庸的、现在重新时兴的、实质上是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他们那些缺乏联系的大部头著作时采用的方法。后一种方法，曾被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在理论上摧毁，只是由于惰性和缺乏一种别的简单方法，才使它能够在实际上继续存在。另一方面，黑格尔的方法在它现有的形式上是完全不适用的。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一种自己承认是“从无通

过无到无”³⁰¹的方法，在这种形式上在这里是根本不适用的。虽然如此，它却是一切现有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利用的唯一材料。它没有受到过批判，没有被驳倒过；任何反对这位伟大的辩证法家的人都没有能够在这个方法的巍然大厦上打开缺口；它被遗忘，是因为黑格尔学派不知道可以用它干些什么。因此，首先应当对黑格尔的方法作一番透彻的批判。

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何况黑格尔不同于他的门徒，他不像他们那样以无知自豪，而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³⁰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

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如果这个被遗忘了的辩证法从“纯粹思维”的观点出发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果，而且，如果它轻而易举地就结束了过去的全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那末，在它里面除了诡辩和烦琐言辞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东西。但是，对这个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哲学过去

害怕而且现在还害怕把这件事承担下来。

馬克思过去和現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邏輯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內核剥出来，使辯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辯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簡單形式上建立起来。馬克思对于政治經濟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們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对經濟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經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邏輯。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整个說来，发展也是从最簡單的关系进到比較复杂的关系，那末，政治經濟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綫索，而且，整个說来，經濟范疇出現的順序同它們在邏輯发展中的順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須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許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經濟学史又不能撇开資产階級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作。因此，邏輯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

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我們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們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簡單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們所遇到的最初的經濟关系出发。我們来分析这种关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們分別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們相互关联的性质，它們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現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但是因为我們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們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际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經得到了解决。我們研究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們現在又需要加以說明，等等。

政治經濟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別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結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間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費者之間的关系，在这里，两者已經不再結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了。在这里我們立即得到一个貫穿着整个經濟学并在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的例子，这个事实就是：經濟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結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現；誠然，这个或那个經濟学家在个别場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經濟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難的問題变得如此簡單明了，甚至資產階級經濟学家現在也能理解了。

如果我們从不同的方面来考察商品，并且所考察的是充分发

达了的商品，而不是在两个原始公社之间的原始物物交换中刚在艰难地发展着的商品，那末，它在我們面前就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这里，我們立即进入了經濟学的爭論范围。誰想要找一个鮮明的例子，来证明現今发展阶段上的德国的辯证方法比旧时庸俗嘮叨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优越，至少像铁路比中世紀的交通工具优越一样，那就請他讀一讀亞当·斯密或其他某位著名的官方經濟学家的著作，看看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使这些先生受了多大折磨，看看把两者分清并理解它們每个特有的規定性对这些人來說是多么困难，然后再把馬克思的簡單明了的說明与之对比一下。

在說明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后，商品就被按照它进入**交换过程**时那样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統一起来叙述。这里产生了怎样的矛盾，讀者可以在第20—21頁^①上看到。我們仅仅指出，这些矛盾不只有理論的抽象的意义，而且同时反映出从直接的交换关系、即簡單的物物交换的性质中产生出来的困难，反映出这种最初的粗陋的交换形式所必然遇到的不可能性。解决这种不可能性的办法，就是把代表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特性轉給一种特殊的商品——**貨幣**。然后，在第二章中闡述貨幣或簡單流通，即（1）作为**价值尺度**的貨幣，并且在这里，用貨幣計量的价值即**价格**得到了更切近的規定，（2）作为**流通手段**的貨幣，（3）作为两个規定的統一体，作为**实在的貨幣**，作为資產階級一切物质財富的代表。第一分册的叙述到此为止，从貨幣到資本的轉化留待第二分册叙述。

① 見本卷第31—33頁。——編者注

我們看到,采用这个方法时,邏輯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純抽象的領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因此这里举出了各种各样的例证,有的指出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现实历史进程,有的指出經濟文献,以便从头追溯明确作出經濟关系的各种規定的过程。对于个别的、多少是片面的或混乱的見解的批判,实质上在邏輯发展本身中已經作出了,因此可以叙述得很簡略。

在第三篇論文中,我們將說明本书的經濟內容。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8 月 3—15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9 年 8 月 6 日和 20 日“人民报”
第 14 号和 16 号

卡·馬克思 不列顛的貿易

不列顛貿易部剛剛公布了今年前 6 个月的出口情况报告，可是該部的进口申报价值的表格却只包括 5 个月，到 5 月 31 日止。³⁰³ 和 1858 年及 1859 年同期相比，我們就会发现，除了某些不大的、不值得一提的例外，不列顛从美国的进口总的說来是减少了，至少按价值來說是减少了，而不列顛对这个国家的出口，不論是数量，还是价值，却都增加了。为了說明这个事实，我們引用官方报告中的下列图表：

6 个月內(到 6 月 30 日止)不列顛对美国的出口情况

出口項目	数 目		申 报 价 值 (单位:英鎊)	
	1858	1859	1858	1859
棉織品(碼)……	60 150 771	110 360 198	1 031 724	1 924 951
五金商品(担) ^①	35 349	78 432	242 914	534 101
亞麻織品(碼)……	17 379 691	31 170 751	515 416	961 956
鑄鐵錠(吨)……	22 745	39 370	68 640	111 319
鐵條、鐵螺絲、 鐵棒……	21 463	56 026	175 944	457 384
鍛鐵……	9 153	19 368	113 436	238 903

① 英担为长吨(1 016 公斤)的 $\frac{1}{20}$ ，或 50.8 公斤。——編者注

(續)

出口項目	數 目		申 报 价 值 (单位:英鎊)	
	1858	1859	1858	1859
铁板和铁釘(担)	5 293	15 522	28 709	77 840
鉛(吨).....	1 214	1 980	27 754	44 626
油类(植物油) (加侖).....	411 769	930 784	50 950	111 103
絲織品(磅).....	47 101	134 470	51 277	144 413
毛呢(匹).....	76 311	81 686	273 409	421 006
各种毛織品(碼)	13 897 331	30 893 901	562 749	1 188 859
精梳毛織品(匹)	185 129	489 171	229 981	758 914
陶瓷器.....	—	—	168 927	279 407
裝飾品和帽类...	—	—	456 364	861 921
白铁(張).....	—	—	397 027	607 011

5 个月內(到 5 月 31 日止)不列顛从美国的进口情况

进口項目	1858 年	1859 年
小麦.....	371 452 英鎊	7 013 英鎊
面粉和玉米粉.....	693 847 英鎊	14 666 英鎊
棉花(皮棉).....	11 631 523 英鎊	10 486 418 英鎊

总的說来,不列顛出口报告說明 1859 年出口不仅超过了 1858 年,而且也超过了 1857 年,这可以从下面的图表中看出:

6 个月內(到 6 月 30 日止)不列顛的出口情况

申 报 价 值		
1857 年	1858 年	1859 年
60 826 881 英鎊	53 467 804 英鎊	63 003 159 英鎊

但是,如果更仔細地研究一下,那就非常清楚,1859 年出口总

值之所以比 1857 年有所增加，是因为扩大了同印度的貿易額，此外，如果印度沒有超額地弥补了不列顛的出口差額，1859 年不列顛出口貿易總額將比 1857 年減少 200 萬英鎊以上。可見，1857 年危机的痕迹在世界市場上還沒有完全消失。毫無疑問，貿易部報告中最重要、最令人惊奇的特点是 不列顛对东印度的出口貿易的迅速发展。首先，我們用官方的数字材料来证明这个事实：

6 个月內(到 6 月 30 日止)对英屬东印度的出口情况

(单位: 英鎊)

	1856	1857	1858	1859
啤酒和麦酒.....	210 431	130 213	474 438	569 398
棉布和細布等.....	2 554 976	3 116 869	4 523 849	6 094 433
棉紗.....	579 807	540 576	967 332	1 280 435
陶瓷器.....	30 374	23 521	43 915	43 195
裝飾品和帽类.....	39 354	70 502	77 319	105 723
五金商品.....	84 758	101 083	139 813	153 423
馬鞍和馬具类制品	12 339	15 587	35 947	19 498
机器、蒸汽发动 机和其他机器...	156 028	313 461	170 959	179 255
铁条、铁螺栓、铁 棒(不包括鋼軌)	306 201	228 838	166 321	172 725
鋼軌.....	—	272 812	475 413	578 749
鍛铁(不包括鋼軌)	266 355	217 484	192 711	242 213
原銅.....	62 928	34 139	9 018	51 690
铁板和铁釘.....	144 218	228 325	318 381	205 213
盐.....	23 995	91 119	21 849	4 468
文具.....	66 495	19 968	86 425	89 711
呢絨.....	96 045	166 509	202 070	174 826
共 計.....	4 634 304	5 571 006	7 905 760	9 934 955

如果我們回想一下，从 1840 年到 1856 年这大約 16 年間，不列顛对印度的出口貿易額虽然有时有少許增加，有时也有明显的减少，但一般說来是稳定的，平均数字是 800 万英鎊，那末，就会感到惊奇：这种稳定的貿易額在短短的两年內竟增长了一倍，而且这种突然的增长还是发生在激烈的奴隶起义³⁰⁴的时期。这种貿易額的扩大只是由于暫时的因素呢，还是同印度的需求的真正发展有关？这个问题由于印度目前的財政状况而使人特別感到兴趣。印度的財政状况迫使不列顛政府不得不請求議會批准在倫敦发行新的印度公債，而且甚至迫使倫敦“泰晤士报”提出一个问题来討論：归根到底，只占領原来的三个省份，把半島的其他領土归还給当地統治者，对英国說来是否更好一些呢？

由于我們掌握的材料很少，不可能对不列顛突然扩大对印度的出口貿易的真正性质作出定論，但是，我們已知的一些材料使我們倾向于这样一种意見：可以說是暫时的因素使这种貿易額突然膨脹到大于它所固有的数量。首先，我們沒有发现不列顛从印度的进口情况有什么特殊的变动可以引起对印度的出口增加。誠然，某些商品的进口有些增长，但这几乎被其他商品进口的减少所抵銷；总的說来，印度的出口情况波动之小，是不足以用任何方法来解釋这个国家的进口发生的突然变化。当然，奴隶起义能够帮助英国人去探索以前不大了解的那些省份，因此，士兵也会为商人扫清道路。此外，近年来白銀大量輸入印度并在那里堆积起来，即使是印度人，在被剛剛經歷的惊心动魄的場面稍微打扰了一下以后，大概也会改变他們历来的爱儲藏的癖好，多多少少会花費一些他們的白銀，而不再埋藏起来了。但是，我們还是沒有理由认为这种推測有多大的意义，何况另一方面我們还看到一个不容置疑的

事实：政府一年內的非常支出近 1 400 万英鎊。虽然这种情况足以說明英国对印度的出口貿易的突然增长，但是很难設想，它預告着这种新的变动会比较长久地繼續下去。这种形势最久远的后果自然就是印度的民族工业遭到彻底破坏，因为讀者从最后一个图表中已經看到，不列顛对印度的出口余額主要是由于不列顛的棉布和棉紗的輸入所造成的。曼彻斯特方面的銷售量的过度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使不列顛出口图表数字膨脹起来。

卡·馬克思写于 1859 年 8 月 5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作为社論載于 1859 年 8 月 19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717 号

卡·馬克思

路易-拿破侖和意大利

拿破侖第三在意大利的言行，一天天明朗化了，這有助於我們了解他所說的“從阿爾卑斯山到亞得利亞海”的自由的含義。對他自已來說，這次戰爭只是法國對羅馬的第二次遠征，誠然在各方面都具有更大的規模，可是就其動機和結果而論却和那次“共和主義”壯舉³⁰⁵毫無二致。通過締結維拉弗蘭卡和約，把法國從歐洲戰爭中“拯救”出來之後，這位“解放者”現在又打算通過使那些被土伊勒里宮的主人一言廢黜了的君主強行復位的辦法，通過對意大利中部和教皇國的人民運動進行武力鎮壓的辦法，來“拯救”意大利社會。當英國報刊上充滿了關於蘇黎世會議大概會修改維拉弗蘭卡條約的條款的模糊的臆測和 on dits [傳聞] 的時候，當約翰·羅素勛爵持着他那固有的不可救藥的輕率態度（這種輕率態度曾促使帕麥斯頓勛爵任命他為外交大臣），認為自己有权在向下院作的莊嚴聲明中宣布波拿巴將拒絕把自己的刺刀交給那些被推翻的君主支配的時候，8月8日“維也納日報”第一版上登載了如下的官方消息：

“蘇黎世會議即將召開，以締結最後和約，其主要條款已在維拉弗蘭卡達成協議。任何一個注意到會議的明顯作用的人都難以理解，為什麼不僅國外報刊，甚至連奧地利的報刊，都敢於對維拉弗蘭卡條約條款的實現或實現的可能性表示懷疑。為兩位皇帝的親筆簽名所固定下來的和約的預備條款的

执行,是有两位君主的庄严諾言和权力作保证的。”

这說得非常明确。一方面,我們看到了受騙的意大利人在徒然地抗議,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了用刺刀、綫膛炮以及其他 «armes de précision» [“綫膛武器”] 作后盾的弗兰茨-約瑟夫和路易·波拿巴則是 «sic volo, sic jubeo»³⁰⁶。如果意大利的爱国者不願听从甜蜜的劝导,他們就得对武力让步。別的选择余地是沒有的,尽管罗素勋爵作了相反的断言。他这样說也許是完全出于真誠,因为通过他的口說出这种断言来,只是为了在預定让意大利遭到联盟暴君铁蹄踐踏的期間,搪塞一下不列顛議會而已。至于教皇在教皇国的世俗政权,路易-拿破侖甚至不等到战争結束就宣布,它将保存下去。維拉弗兰卡預备条約的条款規定让奥地利的君主們在托斯卡納和摩地那复位。让帕尔馬女公爵重新执政的規定沒有包括在这些条款里,因为弗兰茨-約瑟夫想对这位公主公开拒絕把自己的命运同奥地利的命运联結在一起的行为实行报复;但是,路易-拿破侖出于自己天生的寬宏大量,俯允听取这个 *donna errante* [流浪妇女] 的委婉哀求。他通过瓦列夫斯基向西班牙駐巴黎大使,同时也是女公爵的全权代表圣芒先生保证說,她的宝座将得到恢复,并且她的公国也将保有原来的疆界,唯一可能的例外是皮阿琴察要塞,——如果維克多-艾曼努尔在苏黎世會議上表現好的話,这个要塞應該轉交給他。使这个暴发戶感到无限欣慰的不仅是充当出身波旁皇族的姊妹的保护人这一念头;而且他还以为,他終於找到了博得圣热尔門郊区³⁰⁷ 的好感的可靠手段,这个郊区至今对他的巴結蔑然視之并且对他表现出高傲矜持的态度。

但是,这位“各民族的解放者”怎样才能成为“法制和秩序”的傳教士、“現存社会”的救主呢?怎样才能成功地扮演这个不大富

于詩意的角色呢？这是急轉直下的一步。使公众对維拉弗兰卡条約的預备条款的真正意义抱怀疑态度，并对这种态度加以支持，既纵容荒誕的傳聞，又听任合理的猜測，其目的显然在于逐漸把欧洲引导到最坏的境地。憎恨奥地利、自称热爱意大利而且被公认为是拿破侖第三的代理人的帕麦斯顿勋爵支持了这位站在不可靠基础上的十二月英雄⁴⁹。帕麦斯顿利用得比政府对奥地利的同情把这个政府赶下了台，他显然已在全欧洲，尤其是在意大利面前，替自己至圣的盟友，即拿破侖第三的意願的真誠性作出了保证。这样一来，他有意識地把議會引入歧途，然后沉着鎮靜地推开了議會，或者可以說，甚至解散了它。他曾明确地声明，英国还没有决定是否参加欧洲會議（这个會議可能会批准苏黎世會議的决定，从而把責任分攤到欧洲各国身上，以減輕否則要由拿破侖一个人承担的仇恨的重担）；这一声明遭到了普魯士報紙的駁斥，它們发表了一則半官方消息，肯定說，英国和俄国已經一起向柏林宮廷提出了参加这次欧洲會議的建議。

拿破侖只是在輿論的激烈憤懣稍微平息之后才在撒丁王国采取了第二个步驟。他企图說服維克多-艾曼努尔代他去做这件棘手的事情。看来，維克多-艾曼努尔得到了奥地利及其藩屬所丧失的一切。虽然还没有相称的封号，但他实际上已經成了意大利中部和教皇国的統治者，那里的居民到处都承认了他的王朝，虽然这不是出于对皮蒙特的热爱，而是由于对奥地利的憎恨。法国的自由保卫者向自己的这个新藩臣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他放棄对人民运动的正式領導。維克多-艾曼努尔无力拒絕他的这个要求。他命令撒丁全权代表离开各公国和教皇国，并且从佛罗倫薩召回了邦康帕尼，从罗马尼亚召回了馬西莫·德·阿塞利奧，从摩

地那召回了法里尼(至少是作为正式全权代表)³⁰⁸。

但是,这位戴皇冠的“解放者”还不满足。他以前在法国的經驗使他有足够的根据得出这样的結論:在适当的指导下,人民的投票是世界上可以把专制制度建立在巩固的、名正言順的基础上的最好的一种手段。因此就要求撒丁国王設法影响那些起义的省份的人民投票的进程,以便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些省份的君权是由人民的意志恢复起来的。自然,維克多-艾曼努尔对这种要求連听也不想听,因为实现这种要求,必定会永远断送意大利自由的前途,必定会把整个半島高喊 «evviva!» [“万岁!”]的呼声变成同声咒罵。据說,維克多-艾曼努尔用下面的話回答了法国誘惑者德·萊澤伯爵:

“閣下,我首先是一个意大利君主。請不要忘記这一点。对我說来意大利的利益比你們需要暗示的欧洲利益有更大的意义。我不能利用自己的声望来支持被推翻了的統治者复位,我絕不会这样做。我让这些事件自然发展,已經是非常寬容了。”

甚至有人說,这位俠义的国王还說了下面的話:

“如果要通过关于武装干涉的決議,你們还必須听听我的意見。至于說到联邦,我的利益和荣誉,都同样迫使我反对,因此我将同它斗争到底。”

这一回答轉交給巴黎后,很快就出現了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的一篇有名的責斥意大利人忘恩負义的文章³⁰⁹,这篇文章包含着一个人不祥的暗示:如果保护者抽回了强有力的手,那末奥地利的鷹徽很快就会挂到都灵王宮的前面。維克多-艾曼努尔立即得悉:他能否得到皮阿琴察,将依他的表現好坏而定,而意大利各国君主对正在准备成立的联邦能有多大影响,仍然是一个值得討論的問題。对薩瓦居民的民族归屬問題的討論,使他受到了彻底

的打击；同时，这也暗示出，如果波拿巴帮助維克多-艾曼努尔把意大利从奥地利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維克多-艾曼努尔也未必能拒絕把薩瓦从撒丁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这些威胁很快就具有了一种明显的形式——騷动，这一騷动根据从巴黎发出的信号突然在薩瓦的拥护封建制度的和天主教的人士中开始了。

一家巴黎的报纸大声疾呼道：“为意大利的事业花费自己的金錢，让自己的儿子流血牺牲，薩瓦人对这种事已經厌倦了。”

对于維克多-艾曼努尔來說，这就是有力的 *argumentum ad hominem*^①，如果他不直接承担摆在他面前的任务，那末就有一定的理由担心，他至少已經答应为法国的武装干涉扫清道路。8月9日帕尔馬来电說：“皮蒙特军队已被逐出城市，紅色共和国宣告成立，有产者和秩序之友慌忙逃命。”如果可以相信这則消息，那末，它对于未来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不管怎么样，不論这則消息是真是假，它对于“秩序和财产的救主”來說，完全可以成为进行干涉，派遣他的朱阿夫兵去反对“不可救药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为各国君主的复位扫清道路的一种信号。这些君主当中的一个，托斯卡納大公(已逊位予子)的儿子^②，已經在土伊勒里宮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而正在撤回来的法国军队，接到了留駐意大利的命令，因此，苏黎世順利談判道路上的障碍很快就将消失。

卡·馬克思写于 1859 年 8 月中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9 年 8 月 29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725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① 针对具体的人提出的理由；不是根据客观材料而是根据被說服者的感情提出的論据。——編者注

② 列奧波特二世和斐迪南四世。——編者注

卡·馬克思 政治評論

倫敦。建筑工人的罷工，或者确切些說，是企业主宣布的 lock-out [同盟歇业]，还在繼續³¹⁰，并且敌对双方的态度也不像有什么重大改变。星期二工人代表开了会，到会的还有其他行业的代表；会上一致决定，不到任何一个要求保证不参加“协会”的老板那里去干活。同一个時間，“联合的”企业主在“自由石匠”小酒館里开了会，不准任何記者采訪。后来知道，这些害怕秘密会泄露出去的先生們經過热烈的商談以后，决定在建筑工人沒有正式放棄“协会”以前，在“特罗洛普先生的工人們沒有停止罢工”以前，同业协会的任何會員都不应开业。后一点很快就調解好了，因为不久以前特罗洛普先生同工人們举行了談判，他郑重其事地断言，对他的指責（解雇向他提交要求实行 9 小时工作制等的請願书的工人），是出于一种誤会。至于另一个条件，“因同盟歇业而被解雇的工人”无论如何不会同意，除非是迫于极端的貧困。他們觉得，放棄“协会”、放棄任何組織，對他們說来就是变成資本家的真正奴隶，并且会丧失一个現代无产者还保有的那一点点独立性。老板們一意坚持，妄想得到像美国种植場主对待他們的奴隶那样的权力来对待自己的“人手”，这甚至引起了某些資產階級記者的譴責。自然，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对企业主表示不滿；讓他們尽自己的力量

去加深勞資之間本來就很深的鴻溝吧，去加深已經積累起來的、自覺的階級仇恨吧！這種階級仇恨正是社會變革最可靠的保證。

倫敦總共有 1 000 多家建築企業。其中只有 88 家关了門，然而却都是最大的。lock-outs（因同盟歇業而被解雇的工人）人數達到 19 000—20 000 人，而不是起初說的 40 000 人。全國各地給“協會”送來了大批捐款，但是挨餓的工人直到現在還拒絕接受這種支援。光榮歸于勇士們！難道追求自己的階級利益的資產者們能夠做出這種自我犧牲的行為嗎？

星期六閉幕的下院會議在最後幾天幾乎一直是處理議會中層出不窮的競選丑事。這種賄賂的沖天惡臭同太晤士河的芳香混為一氣，如果可尊敬的議員們不習慣這種氣味的話，一定會聞之作嘔的。事情時而牽涉到那些公開地（他們的罪行正在於此）像買賣羊群一樣買賣一羣羣選民的人，時而又牽涉到某個自願放棄自己高價買來的席位的可憐蟲，因為他由於有人提出反對他當選的請願書而無法保持這個席位了；這件事情至少也要花他 3 000 英鎊。但是我們不去談這些東西。為什麼要去翻這堆髒東西呢？我們只想再補充一句，被揭露進行賄賂的議員幾乎全是“自由”黨³¹¹的黨員。

御前演說未必值得一提。這是一個空洞無物的官方文件。關於正在醞釀的歐洲會議，御前演說中說，似乎女王陛下還沒有作出明確的決定。這是撒謊！在維拉弗蘭卡和約簽訂以後，帕麥斯頓勳爵立即向俄國政府聲明，他準備派代表出席俄國建議召開的會議。可見，早在四個星期以前，他就已“作出了明確的決定”。

巴黎。我們不想用對巴黎慶祝勝利的宴會的描寫去打攪我們的讀者。皇帝雖然使盡了各種鬼蜮伎倆想讓人們忘記維拉弗蘭卡的失敗，沖淡巴黎居民的注意力，並且逼着被收買來的人從喉嚨里

吐出祝詞來，但是皇帝本人还是非常不滿意对他的这种接待，所以，他不顧自己的“十二月的”顧問們的大力劝阻，毅然決定鋌而走險，宣布大赦。巴黎的报刊也获得了大赦，从此以后各种“警告”全部廢除了。³¹²

从柏林沒有傳來任何消息，听到的还是老一套空話和繼續无望地鼓吹在普魯士的霸权之下对德意志联邦进行改革。哥达党同民主党人合并現在已成定局，这可以从下列报道中看出来。国王^①的处境仍然沒有好轉。

在爱森納赫 8 月 14 日举行了一次新的“德国爱国者”會議，目的是要圣上恩賜宣布哥达党的一套看法是救国的唯一办法。³¹³ 出席这次會議的有名人物有：汉諾威的馮·卞尼格先先生、柏林的察貝尔(你知道你是什么人?)、“薩克森立宪报”³¹⁴的編輯济格尔、班堡的梯图斯、舒尔采-德里奇等。新成立的德国政党所提出的綱領自然包括联邦改革、普魯士的霸权、廢除联邦議會有关反对出版和結社权利的決議等。最后，下一届大会定于法兰克福召开，大概是为了距离圣保罗教堂³¹⁵近一些。

汉諾威消息，当地政府为了同亲普魯士的爱国者进行竞争(为了反对这些爱国者，它采取了警察手段)，再次提出了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問題。

卡·馬克思写于 1859 年 8 月 19 日
左右

載于 1859 年 8 月 20 日“人民报”
第 1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編者注

卡·馬 克 思

人口、犯罪率和赤貧現象

1859年8月23日于倫敦

在議會最近一次會議上，向兩院提出了一個題為“聯合王國從1844年至1858年最近15年歷年簡要統計一覽”³¹⁶的藍皮書。不管這個官方出版的文件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的一行行的數字看起來多么枯燥，這些數字事實上對英國總的發展歷史提供了比充滿了漂亮廢話和政治胡說的幾部巨著都更珍貴的材料。它引起我們注意的第一件東西就是人口數目表；但是，令人奇怪的是，15年內愛爾蘭的人口變動數字根本沒有。蘇格蘭的表格表明人口數目變動不大，我們且不去談它。下面的數字說明英格蘭和威爾士人口變動的情況：

年 份	人 口 數	出 生 數	死 亡 數	結 婚 數
1844.....	16 520 000	540 763	356 950	132 249
1845.....	17 721 000	543 521	349 366	143 743
1846.....	16 925 000	572 625	390 315	145 664
1847.....	17 132 000	539 965	423 304	135 845
1848.....	17 340 000	563 059	399 800	138 230
1849.....	17 552 000	578 169	440 853	141 883
1850.....	17 766 000	593 422	368 986	152 788

(續)

年 份	人 口 數	出 生 數	死 亡 數	結 婚 數
1851.....	17 983 000	615 865	395 174	154 206
1852.....	18 205 000	624 171	407 938	258 439
1853.....	18 403 000	612 391	421 097	164 520
1854.....	18 618 000	634 506	438 239	159 349
1855.....	18 787 000	635 123	426 242	151 774
1856.....	19 045 000	657 704	391 369	159 262
1857.....	19 305 000	663 071	419 815	159 097
1858.....	19 523 000	655 627	450 018	154 500

除了这个人口表以外，我們还可以引用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犯罪率和赤貧現象的材料：

年 份	被 控 告 者			被判罪者
	男	女	共 計	
1844.....	21 549	4 993	26 542	18 919
1845.....	19 341	4 962	24 303	17 402
1846.....	19 850	5 257	25 107	18 144
1847.....	22 903	5 930	28 833	21 542
1848.....	24 586	5 763	30 349	22 900
1849.....	22 415	5 401	27 816	21 001
1850.....	21 548	5 265	26 813	20 537
1851.....	22 391	5 569	27 960	21 579
1852.....	21 885	5 625	27 510	21 304
1853.....	20 879	6 178	27 057	20 756
1854.....	22 723	6 636	29 359	28 047
1855.....	19 890	6 082	25 972	19 971
1856.....	15 425	4 012	19 437	14 734
1857.....	15 970	4 299	20 269	15 307
1858.....	13 865	3 990	17 855	13 246

說明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各管理委員會所屬的不同組織和教區領取補助金的赤貧者(流浪的赤貧者除外)的人數的表格是從 1849 年算起的。

年份	赤貧者總數	年份	赤貧者總數
1849.....	934 419	1854.....	818 337
1850.....	920 543	1855.....	851 369
1851.....	860 893	1856.....	877 767
1852.....	834 424	1857.....	843 806
1853.....	798 822	1858.....	908 186

我們把關於人口變動情況、犯罪率和赤貧現象的三個表格比較一下，就可以發現，在 1844 年至 1854 年間犯罪率比人口增加得快，而 1849 年至 1858 年間雖然不列顛的社會狀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赤貧現象的數字幾乎沒有變動。1849 年到 1858 年的 10 年中最突出的有三件大事，這些大事使我們可以把這個時期同十六世紀那些最輝煌的時代加以比較。廢除了谷物法，發現了金礦³¹⁷，進行了大規模的移民。還有其他一些情況，也進一步推動了工商業的發展。歐洲從革命的震動轉入了工業熱潮。占領旁遮普³¹⁸、俄國戰爭和幾次亞洲戰爭开辟了到那時為止幾乎不知道的市場。最後，不列顛輸入合眾國的商品量增加到 10 年以前不能想像的程度。整個世界市場都擴大了，它的容量似乎增加了一倍或兩倍。儘管如此，在這難忘的 10 年中，幾乎穩定在 100 萬左右的英格蘭赤貧者的數字卻只減少了 26 233 人，如果我們把 1853 年和 1858 年比較一下，那末這個數字甚至还增加了 109 364 人。

這種一方面擴大自己財富，但貧困現象又不見減少，而且犯罪率甚至增加得比人口數目還快的社會制度內部，一定有某種腐朽的東西。誠然，如果我們把 1855 年同以前各年加以比較，那就會

看出，表面上 1855 年到 1858 年間犯罪率有相当的减少。1854 年被控告的人总数为 29 359 人，而 1858 年則减少到 17 855 人；被判罪的人的数目也有很大减少，虽然不是以同样的比例减少。但是，1854 年以后犯罪率的这种表面上的减少，其实应该完全看作是由于不列颠诉讼程序的某些技术性的改变所造成的，首先是少年犯处治法³¹⁹，其次是 1855 年的刑事裁判法，这个法律规定治安法官在被捕人同意接受他的审判时，有权判处短期拘禁。违法行为通常是由不以立法者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因素造成的；但是，正如实施少年犯处治法所证明的，判定某些违犯由官方制定的法律的行为是犯罪还是过失，在一定程度上则取决于官方。这种名词上的区别远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决定着成千上万人的命运，也决定着社会的道德面貌。法律本身不仅能够惩治罪行，而且也能捏造罪行，尤其是在职业律师的手中，法律更加具有这方面的作用。例如，像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所正确指出的，在中世纪，天主教僧侣由于对人的本性有阴暗的看法，就依靠自己的影响把这种观点搬到刑事立法中去了，因而他们制造的罪行比他们宽恕的过错还要多。

令人奇怪的是，联合王国中犯罪率大大减少（减少将近 50%，甚至 75%）的唯一的—一个地方是爱尔兰。这个事实怎么能同英格兰流行的一种意见调和起来呢，这种意见认为，爱尔兰人的过失不能由糟糕的不列颠管理机关负责，而要由爱尔兰人的性格负责！归根到底仍然不是不列颠统治者的什么措施，而仅仅只是饥饿的影响，大批的移民和促进了对爱尔兰劳动力需求的各种情况的总和这一切因素引起了爱尔兰性格上的幸运的变化。无论如何，下列表格的意义是很明显的。

I. 爱尔兰的犯罪率

年 份	被 控 告 者			被判罪者
	男	女	共 計	
1844.....	14 799	4 649	19 448	8 042
1845.....	12 807	3 889	16 696	7 101
1846.....	14 204	4 283	18 492	8 639
1847.....	23 552	7 657	31 209	15 233
1848.....	28 765	9 757	38 522	18 206
1849.....	31 340	10 649	41 989	21 202
1850.....	22 682	3 644	31 326	17 108
1851.....	17 337	7 347	24 684	14 377
1852.....	12 444	5 234	17 678	10 454
1853.....	10 260	4 884	15 144	8 714
1854.....	7 937	3 851	11 788	7 051
1855.....	6 019	2 993	9 012	5 220
1856.....	5 097	2 002	7 099	4 024
1857.....	5 458	1 752	7 210	3 925
1858.....	4 708	1 600	6 308	3 350

II. 爱尔兰赤貧者的人数

年份	教区 数目	赤貧者 人 数	年份	教区 数目	赤貧者 人 数
1849.....	880	82 357	1854.....	883	78 929
1850.....	880	79 031	1855.....	883	79 887
1851.....	881	76 906	1856.....	883	79 973
1852.....	882	75 111	1857.....	883	79 217
1853.....	882	75 437	1858.....	883	79 199

可惜在关于移民人数的統計表中沒有联合王国各地区的資料,也沒有指出,每个地区的移民人数在总数字中占的百分比。根据現有的表格可以得出結論, 1844 年至 1847 年間迁往英屬各北

美殖民地的移民人数接近迁往合众国去的移民人数，甚至可能还要多一些。但是从1848年起，迁往英屬北美去的移民人数就只是迁往合众国去的移民人数的一个零头了。另一方面，1844年至1858年这15年中，迁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人数大大增加了。迁往北美殖民地的移民人数在1847年达到了顶点，迁往合众国的移民人数在1851年达到顶点，迁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人数却在1853年达到最高点。从此以后直到1858年，移民人数不断下降，在1853年总数达368 784人，而1858年则下降到113 972人，即减少了75%以上。现在把上述表格援引在下面：

联合王国向各国移民的人数

年 份	向北美各 殖民地	向合众国	向澳大利 亚和新西 兰	向其他 国家	共 計
1844.....	22 924	43 660	2 229	1 873	70 686
1845.....	31 803	58 538	830	2 380	93 551
1846.....	43 439	82 239	2 347	1 826	129 851
1847.....	109 680	142 154	4 949	1 487	258 270
1848.....	31 065	188 237	23 904	4 887	248 093
1849.....	41 367	219 450	32 191	6 490	299 498
1850.....	32 981	223 078	16 037	8 773	280 869
1851.....	42 605	267 357	21 532	4 472	335 966
1852.....	32 873	244 261	87 881	3 749	368 764
1853.....	34 552	230 885	61 401	3 129	329 967
1854.....	43 761	193 065	83 237	3 366	323 429
1855.....	17 966	103 414	52 309	3 118	176 807
1856.....	16 378	111 837	44 584	3 755	176 554
1857.....	21 001	126 905	61 248	3 721	212 875
1858.....	9 704	59 716	39 295	5 257	113 972

卡·馬克思写于1859年8月23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59年9月16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5741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卡·馬克思

工厂工业和貿易

1859年9月5日于倫敦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們研究了联合王国的人口变动情况，現在我們就来研究一下生产动态。在下列表格中，每年出口的数字是从1844年算起的，而每年进口的数字則从1854年算起。产生这种不一致的原因，是已經計算出来的1854年以前的进口实际价值尚未得到正式证实。

1. 出 口

联合王国出口的不列顛和爱尔兰 产品的实际申报总值

年份	英 鎊	年份	英 鎊
1844.....	58 534 705	1852.....	78 076 854
1845.....	60 111 082	1853.....	98 933 781
1846.....	57 786 876	1854.....	97 184 726
1847.....	58 842 377	1855.....	95 688 085
1848.....	52 849 445	1856.....	115 826 948
1849.....	63 596 025	1857.....	122 066 107
1850.....	71 367 885	1858.....	116 614 330
1851.....	74 448 722		

2. 进 口

联合王国进口的商品
的实际计算总值

年份	英 鎊	年份	英 鎊
1854.....	152 389 053	1857.....	187 844 441
1855.....	143 542 850	1858.....	163 795 803
1856.....	172 544 154		

从第一个表格中可以看出，1844年至1857年期间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生产自然也是一样，然而，正如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引用的数字所表明的，在同一段时期中，人口的增加还不到18%。这对于职闲薪厚的马尔萨斯神甫的学說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而且第一个表格表明了一个生产规律，只要对比一下1797年以来关于不列颠出口的报告材料，这个规律就可以用数学的精确性加以证明。这个规律就是：虽然由于生产过剩和过度的投机活动而发生了危机，可是国内的生产力和世界市场的容量毕竟增长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它们只是暂时离开已经达到的最高点，经过持续几年的若干波动以后，在商业周期的一个时期中繁荣的最高点所达到的生产水平就成为下一个时期的起点。例如，在1837年至1847年这个商业周期中，生产力的发展在1845年达到了最高水平。1846年开始逆转，1847年发生了灾变，其影响只是在1848年才充分表现出来，当时出口数量甚至下降到1844年的水平以下。但是，在1849年就不仅已经恢复了1845年——前一周期中最繁荣的一年——的水平，而且还超过了300万，而在整个新的周期中，出口绝不会再降到这一年所标志的水平了。新的最高点是在1857年即在危机的那一年达到的，而危机爆发的表现则是1858

年出口的减少。但是，1847年至1857年期间的最高水平在1859年就成了新的商业周期的起点，生产力大概不会再下降到这个起点了。

把1、2两个表格比較一下，我們就会发现，不列顛的出口大大落后于它的进口，这种比例失調的現象像出口数量一样，在經常增长着。某些英国著作家这样来解釋这种不寻常現象，說什么不幸的不列顛人对其他国家負了很多債，或者說他們賤卖貴买，結果把自己的一部分工业品当做礼物白白送給了別国。其实問題只是在于，大不列顛用从別国进口的方式得到某些收入，而自己却不拿出任何等价物来交換，例如，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榨取印度貢賦和用斂收以往各个时期借出的資本的利息的方式得到其他收入，就是这样。因此，不列顛进出口之間不断扩大的比例失調現象只是证明，英国对世界市場發揮它的債主作用比發揮工厂主和商人作用的速度还要快。

在进口商品中有四項很引人注意：貴金屬、谷物、棉花、羊毛。过去“紐約每日論壇报”不止一次地闡述过不列顛輸入和輸出貴金屬的情况；例如在最近一次貿易危机期間，該报根据官方的数字证明，从开始开采新金矿³²⁰以来，流通的英格兰銀行的銀行券与其說是增加了，不如說是减少了。因此，我們不再談这个題目，而只想弄清楚一个据我們所知还没有被英国著作家們指出的事实。关于在国内流通的硬币数量，根据国家造币厂的工作状况可以做出相当可靠的結論。因此，为了闡明在开采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的金矿的时期大不列顛国内硬币流通的情况，我們在下面引用一个表格來說明皇家造币厂鑄造的硬币数量：

皇家造币厂鑄造的金币、銀币和銅币的数量

(单位:英鎊)

年 份	金 币	銀 币	銅 币	共 計
1844.....	3 563 949	626 670	7 246	4 197 865
1845.....	4 244 608	647 658	6 944	4 899 210
1846.....	4 334 911	559 548	6 496	4 900 955
1847.....	5 158 440	125 730	8 960	5 293 130
1848.....	2 451 999	35 442	2 688	2 490 129
1849.....	2 177 955	119 592	1 792	2 299 339
1850.....	1 491 836	129 096	448	1 621 380
1851.....	4 400 411	87 868	3 584	4 491 863
1852.....	8 742 270	189 596	4 312	8 936 178
1853.....	11 952 591	701 544	10 190	12 664 325
1854.....	4 152 183	140 480	61 538	4 354 201
1855.....	9 008 663	195 510	41 091	9 245 264
1856.....	6 002 114	462 528	11 418	6 476 060
1857.....	4 859 860	373 230	6 720	5 239 810
1858.....	1 231 023	445 896	13 440	1 690 359

我們將对比一下总数，因为銀币和銅币必須看做是代替金币的普通符号，因此，在研究金屬货币流通的总的变动情况时，不論在流通中的是金币，还是它的由金屬符号代表的輔币，都无关紧要。

上述表格所包括的 15 年可以划分为两个几乎相等的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中感觉不到开采黄金的新国家对大不列顛的影响；第二个时期的特点則是黄金从新产地迅速流入。1844 年到 1850 年我們算作第一个时期，1851 年到 1858 年算做第二个时期；1851 年值得注意的事件是，在这一年新南威尔士和維多利亞的金屬开采

开始发生影响，同时从加利福尼亚州流入的黄金大量增加，它从1848年的11 700英鎊，1849年的160万英鎊，1850年的500万英鎊增加到1851年的8 250 300英鎊。把1844年到1850年这个时期和1851年到1858年这个时期鑄成硬幣的金屬数量分別加起来，然后算出各个时期每年平均的鑄造数量，我們就会看到，前7年中每年平均的鑄造量是3 643 144英鎊，后8年中鑄造量則达到7 137 782英鎊。可見，在开发新的黄金产地期間，大不列顛的金屬流通量几乎增长了100%。这无疑地证明了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对英国国内貿易发展的影响，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結論說，金屬流通量的增长是直接受新黄金流入的影响，那就完全錯了。把发现金矿的前后两个时期逐年加以对比就可以证明相反的情况。例如，1854年鑄造量下降到1845年和1846年的水平以下，而1858年則下降到大大低于1844年的水平。可見，以硬幣形式投入流通的黄金的数量并不是由进口的金条来决定。但是，进口的黄金大部分通常都是在第二个时期中用于内部流通的，因为工商业活动总的說来是扩大了；而这种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由于开采黄金的新国家的影响而造成的。

卡·馬克思写于1859年9月5日

載于1859年9月23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574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卡·馬克思 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侖

1859年9月5日于倫敦

讀者想必還記得，大約一年以前，我在“論壇報”上曾經做過一些有趣的揭露，那些揭露涉及一個叫班迪亞的人，涉及他到切爾克西亞去的使命以及因此在君士坦丁堡的匈牙利和波蘭流亡者之間發生的糾紛。³²¹ 我當時所敘述的那些事實後來上了歐洲報刊，而且誰也沒有一次試圖否認過這些事實的確凿性。今天我想使貴報的讀者注意現代史上另外的秘密的一章。我指的是科苏特和波拿巴之間的聯繫。同樣一些人，他們一只手從扼殺法蘭西共和國的兇手那里得到金錢，另一只手却打着自由的旗幟，他們同時扮演著受難者和帝王廷臣的角色，他們已經變成了殘酷的僭位者的工具，却依然說自己是被壓迫民族的全權代表，對這種狀況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我認為此刻最适于披露我早已獲悉的事實，就是波拿巴和他的走狗們以及科苏特和他的擁護者們都同樣地極力掩蓋這筆買賣，因為這筆買賣可能使他們一個在各國君主面前，一個在全世界各國人民面前威信掃地。

科苏特先生那些最盲目的崇拜者都同意這樣一種意見，即儘管科苏特有其他許多優點，可是遺憾的是，他始終缺少一種重要的品質——始終如一。在其一生中，他更像是一位觸景生情的即興

詩人，而不是要給世界打上自己独特思想的烙印的創造性的人物。这种思想的不稳定性不能不反映在他的行为的两面性上。有些事实可以证实这种說法是正确的。在居塔希亚，科苏特先生同戴維·烏尔卡尔特先生发生了密切的 liaison〔联系〕，他馬上就接受了这位罗曼蒂克的苏格兰人的偏見，毫不犹豫地說馬志尼是俄国的密探。他正式答应一定避开馬志尼，可是剛一到倫敦，他就又同馬志尼和賴德律-洛兰一起建立了三人同盟³²²。戴維·烏尔卡尔特紳士在倫敦的“自由新聞”³²³上发表的拉·科苏特和他的来往书信，向英国公众提供了这种耍两面派手法的无可爭辯的证据。科苏特在他剛一登上英国海岸时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中，就称帕麦斯顿是他的知心朋友。帕麦斯顿通过一位頗为知名的議員^①告訴科苏特，說願意在自己家里和他見面。科苏特要求英国首相把他当做匈牙利的执政者来接待，但是，这个要求当然被輕蔑地拒絕了。而科苏特先生却通过烏尔卡尔特先生和他的其他熟人告訴英国公众，說是他拒絕了帕麦斯顿的邀請，因为他在居塔希亚仔細地研究了关于匈牙利事件的藍皮书³²⁴，证实他的这位“知心朋友”帕麦斯顿取得了彼得堡朝廷的秘密同意，出卖了“亲爱的匈牙利”。1853年，当米兰爆发了由馬志尼发动的 émeute〔起义〕时，在这个城市房屋的牆壁上出現了告匈牙利士兵书，号召他們站到意大利起义軍方面来；在这个告示上署名的是拉約什·科苏特。³²⁵当 émeute 遭到失敗后，科苏特先生又赶紧通过倫敦各家報紙宣布那些告示是假的，这样就等于公开罵他的朋友馬志尼 démenti〔造謠〕。其实与这种說法相反，告示是眞的，馬志尼的做法是得到了

① 达德利·斯图亚特。——編者注

科苏特的同意的。

根据只有匈牙利和意大利共同努力才能推翻奥地利的暴政统治这一固定的信念，馬志尼一度企图以一个更加可靠的匈牙利領袖来代替科苏特。但是，因为匈牙利流亡者内部发生糾紛，他的努力失败了。他寬宏大量地原諒了他的不可靠的盟友，沒有揭露那些会使科苏特在英国的威望一扫而光的事实。

談到过去不久的事件，我可以提醒讀者，1858年秋天，科苏特先生周游了苏格兰，在周游中，他在各个城市作了許多次讲演，郑重地警告英国人要防备路易·波拿巴的叛卖阴谋。例如，下面就是他于1858年11月20日在格拉斯哥所作的讲演的一段摘录：

科苏特先生宣称：“我在一次讲演中已經指出，現在路易·波拿巴正在制造一种民族仇恨的毒药。我不打算暗示，說他正图謀入侵你們的国家：毫無疑問，他是希望这样做的，但是，正像寓言中的狐狸一样，酸葡萄并不使他垂涎。不久以前，波拿巴以其在瑟堡的大規模备战使得世界上一切外交家困惑莫解，——大概只有圣彼得堡的先生們是例外，因为他們一定知道其中的一切底細——那次备战耗尽了他那枯竭的国庫中最后一些先令，那次备战他进行得那样匆忙，仿佛是否能赢得一分钟時間都关系着他的存亡…… 現在瑟堡仍旧是单为反对英国而筑的工事…… 波拿巴阴谋同俄国結伙在东方挑起新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他打算限制英国海軍机动的自由，把一大部分英国海軍牵制在你們的岸边，同时給你們在东方的切身利益以致命的打击…… 难道克里木战争按其結果來說符合大不列顛和土耳其的利益嗎？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維亚得到了一部在我們这个时代的可詛咒的秘密外交的办公室中制定的宪法，一部在俄国和奥地利协助下由波拿巴炮制的宪法，而它們——当然都是人民自由的忠实朋友！这部宪法实际上恰恰就是奉送給俄国让它在多瑙河两公国作威作福的一部宪章…… 但是，不仅如此！难道亲爱的盟友波拿巴不是派他的軍官們到門的内哥罗去教野蛮的山民們使用枪枝了嗎？…… 只要他口袋里还没有一份新的提尔西特条约，他就一心想簽訂这样的条约。”

1858年秋天，科苏特就是这样公开揭露过他现在这位亲爱的盟友波拿巴。不但如此。1859年初，当波拿巴的争取自由的意大利远征计划初露端倪时，就是这位科苏特在馬志尼的“思想和行动”上以激烈的言词揭露了荷兰的騙子手，并且警告一切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意大利人、匈牙利人，甚至还有德国人——不要替这位加西莫多皇帝火中取栗。总之，在当时情况下，他像回声一样重复着馬志尼在他的5月16日的宣言^①中发表的观点——在波拿巴远征期间，科苏特仍然相信这种观点，而且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在“論壇报”轉載的另一个宣言中，他再次庄严地复述了这种观点。

可見，1859年1月科苏特不仅清楚地看穿了波拿巴的騙局，而且尽了他的一切能力向全世界揭露这个騙局。他竭力促使“自由派的报刊”采取一种方针，这种方针后来使波拿巴的密探們惊呼为“反拿破侖狂”的“突然爆发”，并被他們譴責为有害地“同情奥地利”的症状。但是，在1859年1月至5月这一段时间里，在偉大的即兴作者的感情上和思想上发生了某种奇怪的革命。这个为了警告英国人要防备波拿巴的血腥阴谋曾于1858年秋天在苏格兰做过巡迴讲演的人，1859年5月又进行了一次新的巡迴旅行，从伦敦的市长官邸到曼彻斯特的自由貿易大厅³²⁶，到处大作讲演，宣揚对十二月英雄的信任，并拿支持中立作为虛伪的借口，引誘英国人站到至圣的无賴那一边去。而在此以后他很快就最明确无疑地表现了他自己的中立。

这类回忆要多少我就可以补充多少，它們应该在科苏特的誠实的敬仰者头脑中引起某些忧虑——他們不是响亮名字的盲目崇

^① 見本卷第406—412頁。——編者注

拜者，也沒有因一己私利同民主派的達官貴人連結在一起。無論如何他們不會否認，我現在打算報道的事實絕不是同這位號稱自由英雄的過去不相容的。巴黎有三位匈牙利的領袖曾經巴結過著名的普隆-普隆，或者說 prince rouge [紅色親王]，波拿巴家族的后裔普隆-普隆也像他的更高尚的堂兄向“宗教、秩序和財產”頻送秋波那樣，維妙維肖地扮演了向革命賣弄風騷的角色。這三個人就是：基什上校、泰列基伯爵和克拉普卡將軍。En passant [順便]指出，普隆-普隆按其品行來說是海利奧加巴爾，按其個人的胆小懦弱來說是伊萬三世，按其虛偽成性來說是真正的波拿巴。可是，除此以外，正如法國人說的，他是一位 homme d'esprit [精明機靈的人]。這三位先生說服了普隆-普隆（顯然根本不是措手不及地被抓住了）同科蘇特舉行會談，把科蘇特叫到巴黎去，甚至答應把匈牙利的前任執政者介紹給土伊勒里宮詭計多端的執政者。

因此，科蘇特先生弄到了一張英國護照，護照上他化名為布朗先生，於5月初離倫敦前往巴黎。在巴黎他首先同普隆-普隆作了一次長談，陳述了自己對匈牙利發動起義的計劃的看法。他希望派4萬名法國軍隊在阜姆沿岸登陸，馬扎爾流亡者有一個軍會接應他們。而且他還陳述了對他的愛國主義的心靈來說是最重要的問題，即成立（哪怕是為了裝門面）以科蘇特先生為首的臨時政府的問題的看法。5月3日下午，普隆-普隆坐自己的馬車陪送科蘇特去土伊勒里宮，介紹他同十二月英雄認識。在這次同路易·波拿巴會見的过程中，科蘇特先生總算沒有施展他那演說家的卓越才幹，而是讓普隆-普隆代表他講話。後來，他對親王幾乎準確得一字不差地轉述了他的看法表示欽佩。

路易·波拿巴仔細聽完了堂弟的敘述後說，有一個很大的障

碍使他难于接受科苏特先生的方案，这就是后者的共和主义的原则和共和主义的联系。于是科苏特放棄共和主义信念这件事便以最庄重的形式发生了。科苏特声称，他现在和过去都不是共和主义者，只是由于政治必要性和各种情况的不平常的凑合，才迫使他暂时同欧洲流亡者的共和派結合在一起。同时，科苏特为了证明他的反共和主义，竟以自己国家的名义建議把匈牙利王冠禪让給普隆-普隆亲王。实在說，被他这样支配的王冠并不是沒有人戴着的，同时他根本沒有权力拿王冠来做买卖，但是，凡是留心观察科苏特在国外的活动的人，一定都会发现，他早就习以为常地用近于地主貴族談論自己的庄园的語調来談論“亲爱的匈牙利”了。

至于說科苏特先生放棄共和主义信念的事，我认为这是真心誠意的。为了保持他的执行权的外表上的光彩，他在佩斯要了30万弗罗倫的皇室費；他把原来屬於奥地利大公妃的对医疗机关的庇护权交給了他的亲妹妹；他企图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某些团；他希望在他的周圍有一群佞臣；他在国外的時候頑固地抓住执政者的称号不放，虽然在匈牙利革命遭到浩劫的时刻他放棄了这个称号。他沾染上了一套与其說是流亡者不如說是覬覦者的派头，——所有这一切都說明这是同共和主义的傾向截然相反的傾向。無論如何我可以坚决地断言，拉約什·科苏特在法国篡位者面前放棄了共和主义信念，当着十二月英雄的面建議把匈牙利的王冠禪让給普隆-普隆这位波拿巴主义的薩尔达尼拔。关于他在土伊勒里宮会見波拿巴的事实的某些流言蜚語，或許成了下面这个显而易見的訛傳产生的原因。这个訛傳就是：科苏特出賣了他过去的共和主义同道們的秘密計劃。誰也沒有要求他泄洩他們正在策划的秘密，何况他也不会同意这种卑鄙无耻的提議。在他完全打消了

路易-拿破侖对他的共和主义倾向的顾虑以后，在他承担了按照波拿巴王朝的利益行事的义务以后，便签订了一项合同，于是 300 万法郎就交由科苏特先生支配了。对于这项协定，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要按军事方式把匈牙利流亡者组织起来，就需要钱，在整个反雅各宾战争的过程中，欧洲各个专制国家都领过英国的补助金，科苏特先生为什么就不能拿自己新盟友的这笔补助金呢？可是，我不能沉默的是，科苏特竟为了他个人的需要马上就在这样交给他支配的 300 万法郎中，把一笔为数 75 000 法郎的巨款攫为己有，而且除此以外，还讲定如果意大利战争没有导致攻入匈牙利的話，他还要领取一年的津贴。在科苏特离开土伊勒里宫以前，已经商妥，他将在英国展开一个拥护中立的运动来反对众所猜疑的得比内閣的亲奥地利倾向。大家知道，輝格党人和曼彻斯特学派³²⁷的自愿支持使他在返回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以后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的这个第一部分。

从 1851 年以来，稍许有名的、有政治威望的匈牙利流亡者大部分都离开了科苏特先生；但是，由于看到依靠法国军队的援助可能攻入匈牙利的前景，由于看到颇有说服力的 300 万法郎的动力，——正如从前真拿破侖有一次突然蛮横无耻地说出的，要知道世界是受«le petit ventre»〔“胃”〕的要求支配的，——除了几个值得尊敬的人以外，欧洲的匈牙利流亡者全都蜂拥到在拉約什·科苏特所举的波拿巴主义的旗帜之下。不能否认，科苏特同流亡者们签订的合同具有某种“十二月的”收买味道，因为，为了使那笔法国的钱大部分都落到他的新搜罗的信徒们手中，他就把他们提升为高级军官。首先，他们每个人都领到了到皮蒙特去的旅费，然后又领到了闊气的军官服（制服的价值达 150 英鎊），預支 6 个月的

薪金,并得到了在和約簽訂以后支付 1 年薪金的諾言。所謂的总司令的薪俸是 1 万法郎,將軍們每人 6 000,准将 5 000,中校 4 000,少校 3 000 法郎,等等。

下面就是那些伙同科苏特,侵吞波拿巴那笔錢的最显要人物的姓名:將軍有克拉普卡、佩尔采尔、費特尔、切茨;上校有埃梅里克·薩博和埃蒂耶納·薩博、基什、亚·泰列基伯爵、貝特倫伯爵、梅德尼揚斯基、伊哈斯以及几个中校和少校。在文职人員中,可以指出拉·泰列基伯爵、普基、普尔斯基、伊兰尼、路德維希、西蒙尼、亨什尔曼、維勒什等人;除了少数几个人——舍·武科維奇(在倫敦或埃克斯敏斯特)、罗奈(在倫敦,匈牙利的科学家)和貝·瑟美列(在巴黎,曾任匈牙利部长會議主席)——,住在英国和大陆上的匈牙利流亡者实际上全都在这里了。

如果以为这些人全都是出于自私的动机而这样行动,那是不对的。其中大多数恐怕都只是些受騙的、有爱国主义情緒的軍人,这样的人我們不能設想会具有明确的政治原則,或者具有使他們能够看穿各种外交上的陰謀詭計的洞察力。他們之中有些人,例如佩尔采尔將軍,当事件刚一揭示出波拿巴主义的騙局时,便馬上走开了。可是,拉約什·科苏特本人早在 1859 年 1 月在馬志尼的“思想和行动”上发表的他的那些文章中就已表明,他对波拿巴的陰險手段是一清二楚的,因此他无论如何是不能像这些軍人一样被认为是无罪的。

卡·馬克思写于 1859 年 9 月 5 日

載于 1859 年 9 月 24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74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卡·馬克思 新的对华战争

一

1859年9月13日于倫敦

当英国由于从天朝居民那里逼出了“天津条約”³²⁸而到处受人祝賀的时候,我曾設法指明:实际上从这次海盜式的英中战争中取得实利的唯一强国是俄国,而英国根据条約所得到的商业利益是很微小的;同时,从政治观点看来,这个条約不仅不能巩固和平,反而使战争必然重起³²⁹。事变的进程,完全证实了这个看法。“天津条約”已成过去的历史,在战争的严酷现实面前,和平的景象已經烟消云散了。³³⁰

首先让我来叙述最近欧洲大陆邮电傳來的一些事实。

可敬的普魯斯先生已偕同法国的全权代表布尔布隆先生启程,英国远征舰队已得到命令沿白河上駛护送两国公使进京。該远征舰队是由海軍司令賀布統率的,包括有7艘輪船、10艘炮艇、2艘載运部队和軍需品的运输船,以及几百名海軍陆战队和英国工兵队。中国人方面反对公使經由这条道路进京。因此,海軍司令賀布发现白河口已被防栅所阻塞;他在河口停留了9天(自6月17日至25日)以后,就企图用武力开路前进(两国公使于6月20日赶上該舰队)。海軍司令賀布进到白河时,才知道在最近一次战争中所拆毀的大沽炮台,已經修复了,——我們應該 en passant 〔順

便)指出,这个事实他早应知道,因为“京报”³³¹上曾正式报道过。

6月25日,英国人企图强行进入白河时,約有两万蒙古军队做后盾的大沽炮台除去伪装,向英国舰队进行猛烈的轰击。陆战水战,同时并进,結果进攻者完全失败。远征队只得退却,并且在战斗中损失3艘英国战舰:“海鹭号”、“破風号”和“呼潮鳥号”,英軍方面死伤464人,而参加作战的60个法国人当中,則死伤14人。英国軍官死5人,伤23人,甚至海軍司令賀布也受了伤。这次失败以后,普魯斯和布尔布隆两位先生就回到了上海,而英国舰队則不得不停泊在宁波附近的鎮海对面。

当这些不愉快的消息傳到英国时,帕麦斯頓派的报纸就立刻跨上不列顛獅子,一致高声要求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当然,倫敦的“泰晤士报”在激发自己同胞們的嗜血本能时还多少故作庄重,但帕麦斯頓派的下流报纸却簡直荒謬絕倫地扮演了 Orlando Furioso [疯狂的罗兰]^①的角色。

例如,倫敦“每日电訊”³³²写道:

“大不列顛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領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宮,并得到物质上的保证,担保以后不再发生襲击…… 我們應該用九尾鞭抽打每一个敢于侮辱我国民族象征的穿蟒袍的官吏…… 應該把这些人〈中国將軍們〉个个都当做海盜和凶手,吊在英国軍艦的桅杆上。把这些渾身鈕扣、滿面杀气、穿着丑角服装的坏蛋,吊上十来个在桅杆上示众,讓他們随風飄动,倒是令人开心和大有裨益的場面。無論如何應該实行恐怖手段,再不能纵容了!…… 應該教訓中国人重視英国人,英国人高出于中国人之上,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 我們至少應該夺取北京,如果采取更大胆的政策,則應該在夺取北京以后永远占領广州。我們能够像占有加尔各答那样把广州保持在自己手里,把它变为我們在远东的商业中心,从而使我們为俄国在帝国滿洲边境所取得的势力找到补偿,并奠定新領地的基础。”

① 阿里欧斯托的同名长詩中的主人公。——編者注

然而我們姑且擱下帕麥斯頓派下流作家的這些胡言亂語而來看看各種事實，以便根據現有的一點材料來說明這個不快事件的真實意義。

這裡首先應該回答一個問題：即使天津條約規定允許英國公使立即前往北京，中國政府反抗英國艦隊強行駛入白河，是否就破壞了這個用海盜式的戰爭逼迫中國政府接受的條約呢？據歐洲大陸的郵電傳來的消息，中國當局反對的不是英國外交使節前往北京，而是英國軍艦沿白河上駛。中國當局曾經請普魯斯先生由陸路入京，無須用軍艦護送。天朝居民因為對不久以前炮轟廣州的事件³³³記憶猶新，所以不能不認為這支艦隊是實行入侵的工具。難道法國公使留駐倫敦的權利就能賦予法國公使以率領法國遠征隊強行侵入太晤士河的權利嗎？應該明白地承認：英國人如此解釋英國公使前往北京的權利是極其奇怪的，這至少和英國人在上次侵華戰爭中所發明的那種說法同樣奇怪；當時他們說炮轟帝國的一個城市，並不是與帝國本身作戰，而只是與帝國一個省份發生地方性質的衝突。據英國人自己的記載，他們為回答中國人所提出的關於賠償損失的要求，“曾採取一切辦法，以便在必要時用武力進抵北京”，就是說統率威武十足的艦隊沿白河上駛。即使中國人應該讓英國和平的公使前往北京，那末中國人抵抗英國人的武裝遠征隊，毫無疑義地也是有理的。中國人這種行動，並沒有破壞條約，而只是挫敗了英國人的入侵。

其次，人們可能提出這樣的問題：雖然天津條約賦予英國以設立使館的抽象權利，但是額爾金勳爵難道沒有至少在目前時期拒絕實際應用這種權利嗎？如果翻閱一下“女王陛下特諭刊行的額爾金伯爵赴華特別使命有關文件匯編”³³⁴，每個公正無私的人都

能深信：第一，允許英国公使前往北京原不应在現時实行，而应在較晚的时候实行；第二，英国公使留駐北京的权利附有各种条件；最后，第三，英文条約底本中关于允許公使前往北京的一款，即有絕对意义的第三款，曾根据中国使节的要求，在条約的中文底本中加以修改了。額尔金勋爵本人也承认条約两个底本之間的这个不同之处，但是額尔金勋爵，据他本人說，

“根据自己所得的訓令，曾不能不要求中国人接受他們一字不識的条約底本作为国际协定的正式文本。”

中国人的行动不是根据英文条約底本而是根据中文条約底本，同时据額尔金勋爵承认，英文条約底本与“协定的精确意思”本来稍有出入——試問能否根据这一点就来斥責中国人呢？

最后，我要援引前任英国駐香港首席檢察官托·契澤姆·安斯提先生的正式声明，他在致倫敦“晨星报”³³⁵ 編輯的信中写道：

“無論这个条約是怎樣的，但既然英国政府及其官吏采取了强力行动，它早已失去了效力，因而大不列顛王国至少已沒有权利享受这个条約所赋予它的优先权和特权。”

印度的糾紛使英国感到不安，同时英国又得武装自己以防万一发生欧洲战争，因而在中国发生的这场新灾难——这大概是帕麦斯顿一手制造的——也許会使英国遭到巨大的危險。最近将来的結果必然是現政府的垮台，因为該政府的首脑是这次对华战争的罪魁，而它的主要成員却因为这次战争而对他們現在的首脑表示了不信任。無論如何，米尔納·基卜生先生和曼彻斯特学派應該采取下列行动：或者是退出现在的自由派联盟，或者是（这很少有可能）与約翰·罗素勋爵、格萊斯顿先生及其同道皮尔分子³³⁶ 联合，迫使政府的首脑服从他們自己的政策。

二

1859年9月16日于倫敦

內閣會議決定于明日舉行，以求決定採取應付中國事變的方針。法國“通報”和倫敦“泰晤士報”煞費苦心寫出的文章，使人確信帕麥斯頓和拿破侖第三已達成協議。他們想要發動另一次對華戰爭。我從可靠方面得來的消息說：在即將舉行的內閣會議上，米爾納·基卜生先生首先將爭論主張戰爭的理由是否正當；其次他將反對任何事先未經議會兩院批准的宣戰；如果他的意見為多數票否決，他將退出內閣，從而又發出向帕麥斯頓內閣進行新攻擊和自由派聯盟瓦解的信號（這個聯盟過去曾引起得比內閣的倒台）。據說帕麥斯頓對於米爾納·基卜生先生企圖採取的行動感到有些驚惶不安，因為基卜生是他的同僚中唯一使他害怕的人，而且他曾不止一次地說過基卜生是一個特別善於“吹毛求疵”的人。可能和這篇通訊同時，你們會從利物浦獲得關於內閣會議結果如何的消息。此刻判斷這個問題的真實情況，最好不要根據報紙上已經發表的材料，而要根據帕麥斯頓派的報紙在起初發表最近的歐洲大陸郵電傳來的消息時故意瞞過的那些事實。

首先，他們隱瞞了中俄條約已經批准，中國皇帝^①已經諭令他的官員接待並護送美國公使進京交換中美條約³³⁷批准書的消息。

① 咸豐皇帝。——編者注

隱瞞這些事實的目的，是為了消除一種自然會產生的猜疑，這就是：對英法公使執行職務時遇到阻礙這件事，應負責任的不是北京朝廷，而是他們自己，因為他們的俄國或美國同僚並未遭遇到這些阻礙。另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事實最初也為“泰晤士報”和其他帕麥斯頓派的報紙所瞞過，但現在它們已公開承認，這個事實就是：中國當局曾經聲明願意護送英法公使進京；而且中國官員們的確在白河的一個河口等候接待他們，並且只要他們同意離開他們的兵艦和軍隊，就給他們派一支衛隊。既然天津條約中並無條文賦予英國人和法國人以派遣艦隊駛入白河的權利，那末非常明顯，破壞條約的不是中國人而是英國人，而且，英國人預先就決意要在規定的交換批准書日期以前向中國尋衅了。誰都不會相信，可敬的普魯斯先生破壞上一次對華戰爭所抱的表面目的，是他本人自作主張的行動，相反的，他只不过執行了從倫敦接到的秘密訓令而已。誠然，普魯斯先生並不是由帕麥斯頓派遣而是由得比派遣去的。然而，我只需提醒這樣一件事：在羅伯特·皮爾爵士首屆內閣任內，阿伯丁勳爵長外交部期間，英國駐馬德里大使亨利·布尔韦尔爵士因向西班牙宮廷尋衅，結果被迫離開西班牙³³⁸；而當上院辯論這個“不快事件”時，證明了布尔韦尔並非遵循阿伯丁的官方訓令，而是奉行當時坐在反對派席位上的帕麥斯頓的秘密訓令。

最近幾天，帕麥斯頓派的報紙又在玩弄着一種手腕，這至少使那些熟悉近30年英國外交秘史的人們可以斷定：究竟誰是白河慘案和迫在眉睫的第三次英中戰爭的真正罪魁。“泰晤士報”暗示說，安設在大沽炮台上使英國艦隊遭受極大損失的大炮，是來自俄國而且是由俄國軍官指揮的。另一家帕麥斯頓派的報紙說得更明白，現引述于下：

“現在我們看出俄国的政策与北京的政策是如何紧密地糾纏在一起；我們发觉在黑龙江一带有大規模的軍隊調动；我們見到大批哥薩克軍隊远在貝加尔湖以东、在旧大陆阴暗边陲的严寒奇境里进行演习；我們发现无数商队的来往；我們偵察到一位俄国专使（东西伯利亚总督木哩斐岳幅將軍）正帶着秘密陰謀，从遥远的东西伯利亚向与世隔絕的中国京城进发；一想到外国勢力會参与使我們蒙受耻辱并屠杀我們的陆海軍士兵这件事，那末，我国輿論一定会憤激不已的。”

这只不过是帕麦斯頓勋爵的一套老把戏。当俄国要跟中国締結通商条約时，他曾用鴉片战争把中国推入它北方邻邦的怀抱³³⁹。当俄国要求割让黑龙江时，他曾用第二次对华战争促其实现³⁴⁰，既然現在俄国想巩固它在北京的势力，帕麦斯頓便要匆匆发动第三次对华战争了。帕麦斯頓在和亚洲弱国——中国、波斯、中亚細亚、土耳其等国的一切交往关系上，总是抱着这样一个始終不变的定則：在表面上反对俄国的陰謀，但不去向俄国寻衅，反而向那个亚洲国家寻衅，采取海盜式的战争使这个国家和英国疏远，并且用这种繞圈子的方法逼得它不得不对俄国作某些本非情願的让步。你們可以相信，帕麦斯頓的整个过去亚洲政策这次将要重新受到审查，因此，我請你們注意 1859 年 6 月 8 日下院命令刊行的阿富汗文件³⁴¹。这些文件比以前发表的任何文件都更能說明帕麦斯頓的陰險政策以及近 30 年来的外交史。簡短地說，事情是这样的：1838 年帕麦斯頓对喀布尔統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发动了战争，結果英軍遭到复沒³⁴²。他发动这次战争的借口，是說多斯特-穆罕默德与波斯和俄国締結了一个反对英国的秘密同盟。为了证实这种說法，帕麦斯頓于 1839 年向議會提出了藍皮书，其內容主要是英国駐喀布尔公使亚·白恩士爵士与加尔各答政府之間的来往信件³⁴³。白恩士在喀布尔发生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暴动时被杀，但是

由于他生前对英国外交大臣不信任，曾把他的某些官方信札的副本寄给他住在伦敦的哥哥白恩士博士。1839年帕麦斯顿编辑的“阿富汗文件”发表时，白恩士博士曾谴责他“篡改和伪造了已故的亚·白恩士爵士的信件”，并且为了证实他的声明起见，刊印了若干文件的原稿。但这些隐情，直到今年夏天才暴露出来。在得比内阁任内，下院根据哈德菲尔德先生的提议，命令将一切有关的“阿富汗文件”全部发表。这个命令以这样一种形式付诸执行，即令最愚钝的人也会明了：帕麦斯顿为了俄国的利益而篡改和伪造文件确是实情。在蓝皮书的扉页上印有下述字句：

“注：这些信札在以前的文件汇编中仅部分刊载，今将其全部发表，以前省略之处以括号（ ）标出。”

保证这个文件汇编确属真实的官员姓名是“约·威·凯，政务机密司秘书”；凯先生是“研究阿富汗战争的公正历史学家”。

帕麦斯顿曾诡称他发动阿富汗战争是为了反对俄国，要说明他与俄国的真正关系，暂且只需举出一个实例就够了。俄国代办维特凯维奇于1837年到喀布尔，他携有沙皇给多斯特-穆罕默德的一封信。亚历山大·白恩士爵士弄到了这封信的抄件，并把它寄给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白恩士在他本人的发文以及他所附上的各种文件内，曾一再提到这件事。但这份沙皇书信的抄件在1839年帕麦斯顿所提出的文件中整个被删去了，而且在凡是提及这件事的每一份文件内，都作了必要的修改，以求隐瞒“俄国皇帝”与出使喀布尔这件事情之间的联系。这种伪造文书的目的，在于隐瞒沙皇与维特凯维奇之间有联系的证据，以便在维特凯维奇回到圣彼得堡后，尼古拉可以正式声明不同意他的言行。举例来说，在蓝皮书第82页上，可以找到一封致多斯特-穆罕默德书信的译

文，譯文如下，括弧內的字句是当初被帕麥斯頓刪去的：

“一位由俄国(或皇帝)方面派遣的使节(从莫斯科)到达德黑兰，他奉命在坎大哈拜訪酋长，然后从該地去晋見阿富汗国王……他携有(皇帝的密函和)俄国駐德黑兰大使的书信。俄国大使推荐此人极其可靠，并有全权(代表皇帝和他本人)进行任何談判等等。”

帕麥斯頓为顾全沙皇的名誉而作的諸如此类的伪造还不是“阿富汗文件”所显露的唯一的奇迹。帕麥斯頓为入侵阿富汗辯护的理由是，亚历山大·白恩士爵士曾主張以此作为破坏俄国在中亚細亚的阴谋的适当手段。但是亚·白恩士爵士所做的原来恰好相反，因此他为多斯特-穆罕默德而作的一切呼吁，在帕麥斯頓版的“藍皮书”中就全被删除了；而且，还用篡改和伪造的办法使得发表的信札与原意完全相反。

正是这个人現在打算用制止俄国在中国的阴谋这一虛假借口来发动第三次对华战争。

三

1859年9月20日于倫敦

英国要对天朝人民进行另一次文明战争这件事，看来英国报纸现在一般都加以肯定了。然而，自从上星期六举行了内阁会议以来，正是那些过去叫嚷要流血叫得最凶的报纸，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起初，伦敦“泰晤士报”显然由于爱国狂热而不能自己，对这种双重的背约行为大发雷霆，这就是：怯懦的蒙古人^①用精心伪装阵容和隐蔽炮队的办法来诱骗英国海军司令这样的 bonhomme [老实人]；北京朝廷以更狡猾的奸诈伎俩让这些蒙古吃人妖魔去干这种不可饶恕的恶作剧。奇怪的是，“泰晤士报”虽然是在狂热的浪涛中翻腾，然而在转载报道时却费尽心机地把其中对于天教已尽的中国人有利的各节，都小心谨慎地删掉了。混淆事实也许是热情狂发时干的事，但篡改事实似乎只有冷静的头脑才能做到。无论怎样，在9月16日，也就是说仅仅在举行内阁会议的前一天，“泰晤士报”做了急剧的转变，悄悄地把它那像雅努斯的两个面孔一样的双重指责去掉了一个。

该报说：“我们恐怕不能责备那些抵抗我们向白河炮台攻击的蒙古人背约”；

① 这是指蒙古科尔沁旗亲王僧格林沁及其蒙古部队。1859年他们驻守于天津的两个主要海口大沽和北塘，但在1860年被入侵的英法侵略军所击溃。——译者注

但为了弥补这个无可奈何的让步，該报益发死皮賴臉地硬說“北京朝廷存心背信棄义地破坏这个庄严的条約”。

內閣會議举行后过了三天，“泰晤士报”經過进一步考虑，甚至认为：

“毫無疑問，如果普魯斯先生和布尔布隆先生悬請滿清官員护送他們进京，他們是有可能使这个条約获得批准的。”

既然如此，还能說北京朝廷背約嗎？連絲毫背約的形迹也沒有，但是“泰晤士报”对此还有两点疑虑。

該报說：“企图用这样的舰队去打开我們通往北京的道路，作为一种軍事措施來說，是否明智，也許值得怀疑。而动用武力，作为外交手段來說，究竟是否合适，就更值得怀疑了。”

这家“主要的机关报”在一味发怒之余，竟做出了这样一个有破綻的結論，不过，根据該报自己的邏輯，尽管它說不出作战的理由，但并不放棄战争本身。自从詹·威尔逊先生就任印度财务大臣以来，另一家半官方刊物，即曾以热烈辯护炮轰广州事件而著称的“經濟学家”，現在似乎更多地采用經濟的观点而較少空談了。“經濟学家”就这个题目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政治性的，另一篇是經濟性的³⁴⁴；前一篇文章用下面的話做結尾：

“就上述一切而論，显然，規定我們的公使有权去北京观光或在北京居住的条文，确实是强迫中国政府接受的；如果认为遵守条文對我們的利益來說，是絕對必要的話，我們觉得在强制执行这一条文的时候，仍有不少表示諒解和忍耐的余地。毫無疑問，人們會說：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政府，采取延緩和容忍的态度，会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懦弱的表示，因而會是我們所能执行的最有害的政策。难道根据这样的理由，我們在处理同这些东方政府的关系时就有权利改变我們对任何文明国家所应坚决奉行的原則嗎？我們已經利用他們的畏惧心理强迫他們作了一次不愉快的让步，那末再利用他們的畏惧心理，

用对我们最便利的方式强迫他们立刻执行条约的规定，这也许是最彻底的政策。但是，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中国人在当时克制了他们的畏惧心理，而显出相当的实力，坚持要我们同他们协商关于使条约生效的方式——那末，我们能够理直气壮地责备他们背约吗？他们不正是对我们采用了我们自己所用的说服方法吗？中国政府也许——很可能就是这样——准备引诱我们落入这个凶险的陷阱，而且从未打算履行这个条约。如果事实确是如此，我们就必须而且应该索取赔偿。但也可能是这样：守卫白河口，以防止再发生类似额尔金勋爵去年使用暴力进入河口的事件，并未含有任何背弃条约所有条文的意图。既然敌对行动完全由我方发动，而且我们的司令官当然在任何时刻都能从中国方面只是为了保护炮台才发射的凶猛炮火中退却，那末，我们就不能确证中国方面有任何背信弃义的企图。在没有得到这种存心破坏条约的证明之前——我们认为有理由保留我们的判断，而仔细想一想，我们对待野蛮人所采用的原则，是否能和野蛮人对付我们所用的没有什么差别。”

在同一论题的第二篇文章中，“经济学家”详细论述了英国对华贸易的直接的和间接的重要性。在 1858 年，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达 2 876 000 英镑，而最近三年来英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平均每年在 900 万英镑以上，因此中英直接贸易的总额约计 1 200 万英镑。但是除了这种直接交易外，另有其他三种重要的贸易，在国际结算的范围内英国或多或少地与它们发生密切的联系，这就是印度与中国、中国与澳大利亚、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

“经济学家”写道：“澳大利亚每年从中国得到大量茶叶，却没有什麼可以在中国找到销路的货物作为交换。美国也得到大量茶叶和若干生丝，其价值远超过它直接对中国的出口额。”

这两种有利于中国的差额，必须由英国来弥补，英国靠澳大利亚的黄金和美国的棉花来补偿这种交换的平衡。因此，英国除了它本身对中国的贸易差额外，又由于澳大利亚黄金和美国棉花的

进口，要支付给中国大宗款项。目前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差额，大部分已由中国转移到印度，与中国方面由于输入印度鸦片和棉花而产生的贸易差额相抵销了。en passant〔顺便〕指出，中国输入印度的总额从未达到过100万英镑，而印度输入中国的总额折算起来竟达1000万英镑。“经济学家”根据这些经济上的观察推论道：英国对华贸易的任何严重停顿，将“是一场很大的灾难，它比仅凭乍一看进出口数字所能想像的灾难要大得多”；这种窘况所引起的困难，不仅在英国的直接茶丝贸易方面会感觉到，而且必然也会“影响”到英国对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贸易。“经济学家”自然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在前次对华战争中，贸易并未如一般人所担心的那样因战争而遭到很大的阻碍；而且在上海这个口岸，简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然而，“经济学家”要人们注意“现时争论中的两个新特征”，这两个新特征可能会根本改变新的对华战争给予贸易的影响；这两个新的特征是：目前的冲突具有“全帝国的”而非“地方的”性质，以及中国人对抗欧洲军队第一次获得了“大胜”。

“经济学家”的这种论调和它在划艇事件时的声嘶力竭的战争叫嚣相比，是多么不同啊。

正如我在上一篇通讯中所预料的，米尔纳·基卜生先生的确在内阁会议上反对战争并威胁说，如果帕麦斯顿按照法国“通报”上所泄露的早已安排好的决定行动的话，他就退出内阁。帕麦斯顿为了暂时防止内阁和自由派联盟的任何分裂，声明说，保护英国贸易所必需的武力必须集中于中国海面，但是在英国公使的更详尽的报告到达以前，关于战争问题将不作决定。这样一来，这个紧急问题就被搁下了。然而帕麦斯顿的真正意图，却通过他的黄色

报纸“每日电讯”透露出来，该报在最近某一期上写道：

“如果明年有任何事件会引起不利于政府的表决，那必将诉诸全体选民了…… 宣称蒙古人完全有理的那些没有国家观念的人们，应当归入以迪斯累里先生为首的一贯不怀好意的分子之列，下院有鉴于此，将要用对于中国问题的决定来考验自己的活动的结果。”

至于托利党人由于听任自己受骗去对帕麦斯顿所策划、由他的两个代理人额尔金勋爵和普鲁斯先生（额尔金勋爵的弟弟）所执行的事件负责而陷入尴尬境地，我也许会找到别的机会来加以评论。

四

1859年9月30日于倫敦

我在以前的一篇通訊中肯定地說過，白河沖突并非偶然發生的，相反地，是由額爾金勳爵預先準備好的，他遵照帕麥斯頓的秘密訓令行事，并迫使托利黨的外交大臣馬姆茲伯里勳爵採納當時的反對黨首領，尊貴的子爵的計劃。現在首先，認為中國的“意外事件”是由于英國現任首相所擬定的“訓令”而發生的看法，已經毫不新穎了，因為在討論划艇事件所引起的戰爭的時候，像迪斯累里先生這樣一位熟悉真相的人物已經向下院暗示過這種看法了，而且奇怪的是，帕麥斯頓勳爵這樣一位權威人士本人也已經確認了。1857年2月3日，迪斯累里先生曾用以下的話警告下院說：

“我不能不相信，在中國發生的事件，不是所援引的那種借口的結果，而實際上是很久以前從國內收到的各種訓令的結果。如果情況是這樣，那末，我覺得現在下院要是不認真考慮一個問題，那就違背自己的職守。這個問題就是：下院有沒有方法來控制這樣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如果保持下去，依我看來足以危害我國的利益。”

帕麥斯頓勳爵非常冷靜地回答道：

“這位可敬的紳士說，事變進程似乎是英國政府預定的某種制度的結果。事實確是如此。”

現在，我們約略看一下標題為“1857年至1859年額爾金伯爵赴華赴日特別使命有關文件匯編”這份藍皮書，就會知道，6月25

日在白河发生的事件，是額尔金勋爵在3月2日就打定主意要实行的。在該书第484頁，我們找到下面两件发文：

額尔金伯爵致海軍少将西馬糜各厘爵士

1859年3月2日于“猛烈号”战舰

“爵士閣下：关于我在2月17日致閣下的发文，請允許我說明：我希望我在昨天的談話中已經告知閣下的、女王陛下政府关于英国公使常駐北京問題所通过的決定，可能促使中国政府在女王陛下的代表前往北京交換天津条約批准书时，給以相当的接待。同时，毫无疑义，这种希望也可能并不会实现。無論如何，我相信当我国公使前往天津时，女王陛下政府將願意他有强大的兵力护送。在这种情况下，謹請閣下考虑，既然普魯斯先生抵华日期不会推迟太久，可否尽速在最短期間，將足够的炮舰集中在上海以作此用。

額尔金并金喀尔田二郡伯爵”

馬姆茲伯里伯爵致額尔金伯爵

1859年5月2日于外交部

“勋爵閣下：閣下今年3月7日来文已收到。現謹通知閣下，女王陛下政府同意閣下随件抄附的关于通知中国欽差大臣謂女王陛下政府將不坚持女王陛下公使常駐北京的照会。

女王陛下政府对閣下业已建議西馬糜各厘海軍少将將炮艇舰队集中在上海，以便护送普魯斯先生沿白河上駛一事，亦表贊同。

馬姆茲伯里”

这样，額尔金勋爵預先就知道英国政府“將願意”用“强大的炮舰”来护送他的弟弟普魯斯先生沿白河上駛，而且他曾命令海軍少将西馬糜各厘作好准备“以作此用”。馬姆茲伯里伯爵在他5月2日的发文中，贊同了額尔金伯爵对舰队司令提出的建議。全部信件表明額尔金勋爵是主人，而馬姆茲伯里勋爵則是僕从。額尔金勋爵經常采取主动，根据原先从帕麦斯頓方面得到的各种訓令行

事，甚至不等待唐宁街的新訓令；而馬姆茲伯里却滿足于一味服從他那傲慢的屬僚預期他会感觉到的“意願”。額爾金說條約還沒有批准，英國人無權進入中國內河，他點頭稱是；額爾金認為英國人在執行條約中有关公使駐京的條款時，對中國人應持更多的容忍態度，他點頭稱是；額爾金直接違反他本人過去的聲明，而主張有權用“強大的炮艇艦隊”強行駛入白河，他也毫不猶豫地點頭稱是。他的點頭稱是，和道勃雷對教堂司事的提議點頭稱是可謂一模一樣^①。

如果回想一下托利黨內閣上台時倫敦“泰晤士報”及其他有勢力的報紙所發出的叫喊，馬姆茲伯里伯爵的那副可憐相和他的卑恭態度，就容易理解了。這些報紙說托利黨內閣的上台，對於額爾金勛爵遵照帕麥斯頓的指示而行將在中國取得的輝煌成就是嚴重的威脅；說托利黨政府即使只是為了嘔氣，為了證明他們對帕麥斯頓炮轟廣州事件投不信任票的正確性，也要破壞這個成就。馬姆茲伯里被這種叫喊吓住了。何況他還沒有忘掉埃倫伯勒勛爵的命運。埃倫伯勒勛爵竟敢公然反對尊貴的子爵對印度的政策，為了報答他的這種愛國勇氣，他在得比內閣中的同僚竟把他做了犧牲品³⁴⁵。因此，馬姆茲伯里就把全部主動權交到了額爾金手里，結果使額爾金能夠執行帕麥斯頓的計劃，而將責任推卸給帕麥斯頓的官場敵手——托利黨。正是這種情況使托利黨人必須在對白河事件應採取何種方針這一點上進行難堪的抉擇。現在他們或者是和帕麥斯頓一同鼓吹戰爭，從而使帕麥斯頓繼續當政；或者拋開他們在最近一次意大利戰爭期間曾經令人作嘔地拚命加以恭維的馬姆

① 莎士比亞“無事煩惱”第四幕第二場、第五幕第一場。——編者注

茲伯里。

因为迫在眉睫的第三次对华战争并不受英国商界方面的欢迎，所以这个抉择更难解决了。在1857年，商界曾跨上不列颠狮子，因为他们当时希望强迫开放中国市场以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现在却相反，眼见已经到手的条约果实忽然被从他们手里抢去，他们感到愤怒了。他们知道，即使没有大规模对华战争的更多纠缠，欧洲和印度的事情看来已经够危急了。他们并未忘记，在1857年茶叶进口量曾减少了2400多万磅，这种商品几乎完全是从广州输出的，而当时广州正好是唯一的战场。因此，他们担心因战争而妨碍贸易的现象现在可能扩展到上海和天朝的其他商埠。既然英国人曾为鸦片走私的利益而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为保护一个海盗的划艇而进行了第二次对华战争，那末，现在要想达到一个高潮，只需马上发动一次旨在以公使常驻北京这件麻烦事情来和中国为难的战争就是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9月13、
16、20和30日

载于1859年9月27日，10月1、
10和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750、5754、5761和576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馬克思

英国的賄选活动

1859年10月18日于倫敦

被委派去調查格羅斯特和威克菲爾德兩個選區情況的委員會每天的發現，只是證明了曾經做過改革俱樂部³⁴⁶競選代理人的柯波克老頭兒的話。他說，英國下院的真正憲法可以用一個詞來表達——**賄賂**。格羅斯特歷來就是一個“腐朽的市鎮”³⁴⁷，而威克菲爾德則是由於議會改革³⁴⁸而建立的選區，在格羅斯特搞賄選活動的是托利黨的头子，博得了道勃雷這一榮稱的羅伯特·卡登爵士，而在威克菲爾德搞賄選活動的則是激進主義者布萊特先生的妹夫里瑟姆先生，這一情況使得目前的調查特別有趣。議會候選人在這兩個地方表現出來的幼稚的天真，在我們這個懷疑主義的墮落時代，實在令人感到歡欣不已。兩位候選人都搞錢來收買選票，但是，兩個人都盡力不讓人知道這筆錢的用途。從選舉開始直到結束，他們的代理人的帳單以幾何級數在增加着，而他們認為選民們潔白無疵這個信心也以同樣的級數在增加。拿他們的話來講就是，在議會中代表這些選民是他們平生最大的宿願。譬如，拿這位標準的戰栗教徒，可敬的里瑟姆先生來瞧瞧吧。1857年他是威克菲爾德區的候選人，當時曾得力於據說是他的一位名叫威因萊特的代理人的“律師朋友”的幫助。威因萊特出於一片赤誠，把他這

位战栗教徒朋友拉到一旁去谈话；天真无邪的里瑟姆先生感到非常惊讶，他本来认为自己是个 *l'homme qu'on aime pour lui-même* [由于他本人，他个人的品德而受人爱戴的人]，人们应该为了 *pour le roi de Prusse* [那双美丽的眼睛而无报酬地] 把他选入议会，而现在有人却很刺耳地告诉他，选举首先是英镑、先令和辨士的问题，因此“所需要的东西”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弄到。威因莱特肯定说所需的款项是 1 000 英镑。里瑟姆感慨地说：“我没有这笔款子，但我一定设法借到。”于是，忠于诺言的里瑟姆靠伦敦伦巴特街的两位战栗教徒银行家奥维伦德和葛尼的帮助，寄给了威因莱特 1 000 英镑。此后不久，这位威因莱特（看来他是一个喜欢进行秘密 *pourparlers* [商谈] 的人）又把里瑟姆叫到“一旁”，悄悄地对他说，原来竞选的开销比他以前估计的要大，还需要 500 英镑。天真无邪的里瑟姆“觉得这有点奇怪”，但是，他仔细一想，记起 1852 年的竞选花了 1 600 英镑，于是又借了 500 英镑。这件事里面最有趣的是，他好像不太清楚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又过了两个星期，不讲情面的威因莱特又坚决要求再给他 1 000 英镑。这时我们的里瑟姆——这位天真无邪的化身——表演了一出传奇剧。

他说：“这个要求使我很生气，我把这一点直接对他讲了，并且还说，在他办事房里搞的许多事情很不合我的胃口。我发现那里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人物，但是，我仍然希望那里不会发生任何不光彩的事情。威因莱特说：‘您应该把这件事交给我，并且不要提出任何问题。您应该把 1 000 英镑交给我支配，虽然我不认为这笔钱是我需要的。’当时我没有很好考虑，就同意了他的要求；钱，我想，仍然是用那个老办法弄到的。”

“取钱的”那位神秘的陌生人是里瑟姆先生的伙伴，但是，当现在进行追查的时候，他却不露面了，因为尽管现在季节很不适宜，

他却突然决定去周游大陆了。

战栗教徒里瑟姆虽然具有輕信的性格，但仍然有点担心，他只是別出心裁地用“不提出任何問題”的办法来安慰自己的良心，罗·卡登爵士——要知道，“对于清白人一切都是清白的”，——却由于他有 1857 年参加格罗斯特竞选的經驗而感到非常兴奋，所以，1859 年他又提出要做这个地方的候选人，虽然这一次沒有成功。促使他企图踩着格罗斯特选民的肩膀走进圣斯蒂凡教堂³⁴⁹的真正动机在于，他认为格罗斯特真是完美无缺的，能成为它在議會中的代表真是一种荣幸和特別受尊敬的标志，“而柯波克同他那些侏儒通常却把格罗斯特称为干酪”，因为它“腐烂得令人馋涎欲滴”，說得簡單点，是因为这个污水坑发出了一股贿选的臭气。竞选开支由最先談妥的 500 英鎊猛增到近 6 000 英鎊，而且甚至当監察員在报告中查明合法开支为 616 英鎊 8 先令 1 辨士以后，卡登勋爵认为在格罗斯特办的事无可指責的信念仍然毫不动摇。

“就在几天以前他还相信，选举工作的进行是无可指責的，但是当他一听到那些揭露出来的駭人听闻的事实以后，他不禁大为震惊。这些揭露对他說来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

可見，議會候选人的全部竞选哲学就在于，他們不让自己的左手知道右手在做什么，以便在天真无邪的水里洗淨双手。打开自己的腰包，不提出任何問題，相信人类的美德，——这一切使他們感到最愜意不过了。

至于談到法律界——竞选时要請来帮忙的辯护士、代理人、律師，那末，他們当然完全有合法的权利得到報酬。总不能要求他們花自己的時間去白“干”一場吧。

有一位这种格罗斯特的議員制造者大叫道：“我为什么要白白地投他們

的票呢？看看那 24 位律师吧，他们每人一次就得到 25 英镑，每天还要拿 5 基尼；因此要白白地投他们的票我可不干！”

同罗·卡登爵士一起拉票的绅士乔治·布卡南先生说：

“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在拚命搞钱。使我感到不快的是，每天只挣 3 先令 6 辨士的穷人那样任人辱骂，不做什么事情而得到巨款的职业家们却一身清白。”

至于这些议员制造者们本身，只要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他们的特征了。罗·卡登爵士的代理人和拉票人符·克拉特尔巴克先生暗笑着说，“格罗斯特的贿卖价格并不比英国任何其他地方高”。他立即看中了“库比一家”。库比这一家有八九口人，历来就在格罗斯特选举中起卓越的作用。克拉特尔巴克说：“这是些需要别人来逗乐的人。”因此他就到库比家中去了，他同库比全家人一起抽烟，一起聊天，但是，没有直接对他们许下什么诺言，是的，根本没有！但是，到底还是“给了他们一点希望”。在他之后，包工头约翰·华德先生接踵而去，提出给库比全家每人 5 英镑，据他说，有两个人收下了钱。诚然，其中一个已经死了，不过有人代他投了票。

包工头约翰·华德说：“我给库比家九口人每人 5 英镑，而已故者给了 3 英镑。在 1857 年选举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世了，但是，他那一票还是投给了罗·卡登爵士。”

接着梅西先生发言。

他说：“我开一个小杂货铺，而我的职业是理发师。”

梅西确信，“贿选进入了高潮”，因此，他就以每张票 2—12 英镑的价钱来收买选民。有个叫伊文思的普通人幸运地得到了 12 英镑。

我們這位可尊敬的理发師說：“伊文思非常了解一切**下层选民**的情況。這個人作為一個選民和一個通風報信的人，能值 20 英鎊。”

顯然是這位能干的理发師梅西唆使了一個叫克雷門特的人率領一批暴徒，在提出候選人的那一天，綁架了“白獅子”小飯館的一個名叫沃爾頓的老選民（不過他——梅西——本人沒有露面），以便從這只“獅子身上剝一層皮”。梅西在審訊時說，這個人“又老又瞎，無力反抗，而且還喝醉了酒”。在威克菲爾德，價錢比格羅斯特高，每張選票值 5—70 英鎊。而競選者在這裡也使用了更厲害的強迫手段。一位有多年經驗的斯密斯先生認為，威克菲爾德是全歐洲賄賂之風最盛行的選區，在那裡只要有錢和啤酒，就可以把隨便什麼人選出來。在戰栗教徒、激進主義者里瑟姆同保守黨人查理瓦特先生之間競爭的最後階段，“全城都知道”，在我們那位潔白無疵的戰栗教徒的代理人“威因萊特的公事房裡，你要多少錢就可以得到多少錢”。保守黨人同自由黨人不同的唯一的重大特點是，後者一有機會就不擇手段地發行“假銀行券”，而前者付的則是足值的鈔票。半打左右的威克菲爾德選民成立了一個俱樂部，為的是要在投票接近尾聲時按他們的意願來左右秤盤的輕重。有個叫特·弗·陶爾的理发師投了里瑟姆的票，因為里瑟姆的一個拉票人花了 40 英鎊買了他的一把頭髮刷子。有個特別謹小慎微的人物，名叫約翰·威爾柯克斯，根本沒有投票，因為他得了 25 英鎊，答應投里瑟姆的票，又得了 30 英鎊，答應投里瑟姆的競選對手的票。結果“他認為擺脫困境的辦法就是根本不參加投票”。有個叫本杰明·英加姆的，投了里瑟姆的票，但他甚至說不上他得到多少錢，因為“當時他照例是喝醉了酒”。托利黨人把一個叫做詹姆士·克拉克的算命和觀星卜卦的先生騙進了一個旅館，把他灌醉，

并“在旅館的一个客房里把他关了好几天，让他尽情吃喝”。但是他最后还是溜走了，他投了里瑟姆的票，“这一方面是想气一气穿藍衣服的家伙，因为他们把他关了起来，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捞到50 英鎊。”

其次，还有个叫威廉·狄克逊的，論职业是自来水工人，这天早晨他在提耳先生的漂白厂里干活。

“当他到楼上一个房間去想再拿几根水管把活干完的时候，突然有人从外面一下子把門关上了，上了鎖并把門釘死。房間里有三个男人和一个小孩，强迫他要放老实些；他們拿着绳子，在必要的时候好把他捆起来。”

一句話，自由党人以造“假銀行券”为特色，保守党人則因使用强力而出名。

鉴于对英国选举制度作了这些令人憤慨的揭露，布魯姆勛爵认为有必要在布萊得弗德发表长篇演說，公开承认同贿选有关的罪行正在迅速增加，这些罪行在 1832 年以前比較少，但从 1832 年議会改革以来，却大大增加了。布魯姆勛爵打算减少这种罪恶。布魯姆勛爵找到的减少这种罪恶的奇妙办法是怎样的呢？在受贿的小資产阶级和收买小資产阶级的各上等阶级沒有改正过来以前，不給各劳动阶级以选举权！这种奇談怪論只能用年老昏聩来解釋。

卡·馬克思写于 1859 年 10 月 18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9 年 11 月 4 日“紐約每日
論坛报”第 5783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坛报”

卡·馬克思 对和平的激进看法

1859年10月20日于巴黎

法国和奥地利的全权代表在苏黎世簽訂的和約，就其要点而言，不过是維拉弗兰卡协定³⁵⁰各条款的翻版。由于有关最后和約的談判所占的时间几乎比在曼都亚城下突然停止的軍事行动的时间长一倍，因此有很多輕信的人便以为，和平締造者們之所以裹足不前，是因为路易·波拿巴的某种經過深思熟虑的秘密計劃。他們說，波拿巴想給意大利人充分的行动自由，即允許他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以便在意大利的統一巩固起来之后，这位法国解放者能够輕易地摆脱他向弗兰茨-約瑟夫所作的令人悔恨的让步和承担的义务而訴諸最高的力量，即訴諸 *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的力量。政治协定也不能摆脱私人契約可能遇到的那种偶然事件的影响，按照 *Code Napoléon*〔拿破侖法典〕的規定，一旦受到 *force majeure*³⁵¹ 的阻撓，这种契約应予廢除。持这种見解的人又一次暴露了他們不仅對他們心愛英雄的性格无知得可怜，而且对于从“紅衣主教”^①到十二月英雄⁴⁹以及从执政內閣的“恶棍”到1848年的“藍色分子”³⁵²的法國的傳統外交也无知得可怜。这种傳統

① 黎塞留。——編者注

外交的第一条原则是：法国的首要义务是不允许在它的周围成立强大的国家，因而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支持意大利和德国的反统一的宪法。《斯德和约》和《康波福米奥和约》³⁵³ 都是在这同一政策的指使下缔结的。无限期拖延下去的苏黎世谈判所追求的真正目的，现在已经昭然若揭了。如果路易·波拿巴企图在7月初，就是说他自己的军队正陶醉于胜利、意大利人民正热情澎湃、法国正妄诞地以为自己在家里忍受奴役是为了把自由赋予其他民族，并以此安慰自己受了很大委屈的自尊心的时候，来实现维拉弗兰卡条约的条件，那末，这位荷兰的僭位者就会助长狂暴的敌对势力的气焰，而同这种势力作斗争要比攻破明乔河和阿迪杰河之间的四边形要塞区的坚固堡垒困难得多。这样他也许就不能依靠自己的军队，也许就会促使意大利行动起来，而且很可能就会为巴黎起义发出信号。要从为了适应当时情况而演出的崇高的传奇剧转到事先设下的骗局的细枝末节上去，除了时间之外，再不需要什么东西了。法军仍驻留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但是它已经从解放军变成占领军了，而且它和当地居民的日常关系远不是友好的，因为，像常见的那样，密切的接触产生了厌恶感。从法国方面来讲，它已从短暂的睡梦中醒了过来，它对出现欧洲同盟这个危险感到震惊，它在反复思虑：它丧失了旧的军队同时又欠下了新的国债；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对 *idées napoléoniennes* [拿破仑观念] 的不可信。至于意大利本身，它的状况我们应该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官方的声明来判断。我们看到加里波第不能筹出钱来替他的志愿军购买武器³⁵⁴，我们看到这支军队本身的力量和独立战争³⁵⁵ 期间汇集在普鲁士（当时它的领土比伦巴第小得多）旗帜下的广大群众比较起来几乎是滑稽可笑的。

馬志尼本人在給維克多-艾曼努爾的信中³⁵⁶承認，全民族的热情的洪流正迅速地在各省的水洼里凍結起來，恢復原狀的条件正迅速成熟中。誠然，在維拉弗蘭卡條約和蘇黎世和約之間的沉悶的間歇期間，在各公國和羅馬尼亞上演了好幾出由皮蒙特一手導演的、場面很大的官方把戲；儘管全歐洲的所有下等樓座上紛紛響起了掌聲，但是這些政治魔術家所玩的把戲只是對自己的隱蔽的敵人有利。托斯卡納、摩地那、帕爾馬和羅馬尼亞的居民被允許建立臨時政府，把他們的逃跑的統治者的矮小的寶座掀倒，並宣布維克多-艾曼努爾為 *re eletto* [選舉的國王]。但同時，他們接到了嚴格的訓示：應滿足於這些表面成就，要恭順，其餘一切都應聽從打算在蘇黎世決定他們的命運並對热情的奇想、人民激情的迸發和一切 *allures révolutionnaires* [革命的越軌行為] 特別不滿的法國太上皇的旨意。他們不應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努力上而應寄托在自己的品行端正上，不應寄托在自己的力量強大上，而應寄托在外國暴君的仁慈上。就是把一份地產從一個所有者手中轉交到另一個所有者手中，也不會像中意大利從外國的枷鎖下轉到民族自治那樣平靜了。在內政方面什麼也沒有改變，人民運動被完全鎮壓下去了，出版自由被取締了，也許，看起來在歐洲歷史上這是第一次沒有經過革命的考驗而收穫了革命的果實。由於這一切，意大利的政治氣氛大大地消沉下來了，以致路易·波拿巴能夠提出他事先擬就的決議，而任憑意大利人去發泄他們無力的憤慨。一支法軍駐紮在羅馬，另一支法軍駐紮在倫巴第，一支奧軍從提羅耳高地進行威脅，另一支奧軍占據着四邊形要塞區，在這種情況下，首先是在皮蒙特統治者如此成功地抑制了人民的热情的情況下，意大利目前沒有多少希望了。至於蘇黎世和約本身，我們特別

注意条約初稿³⁵⁷中所沒有的两个条款。由于第一个条款,撒丁担負了 25 000 万法郎的債務,其中一部分应偿付給弗兰茨-約瑟夫,一部分是由于倫巴第一威尼斯銀行的五分之三的債務轉到它的身上而来的。除了在克里木远征和最近这次意大利战争期間举借的債款(路易·波拿巴在几天前提出的一笔数目不大的作为武装保护費的期票还不算在內)而外,再加上 25 000 万法郎的新債款,撒丁在財政繁荣方面很快就会处于和它所憎恶的仇敌相等的水平。我們所提到的另一个条款規定:

“沒有参加最近这次战争的意大利各个独立国的疆界如需更动,必須征得参加建立这些国家并保障它們存在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同意。”同时“托斯卡納、摩地那和帕尔馬的君主們的權利則由崇高的締約国专门予以規定。”

这样,扮演完了分配給它們的角色的各意大利临时政府現在被极輕蔑地忽視了,而被它們抑制在那样寻常的消极状态下的居民,如果他們願意的話,可以到維也納条約締造者的大門口去乞求施舍。

卡·馬克思写于 1859 年 10 月 20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9 年 11 月 8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786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卡·馬克思

德国的动蕩局勢

1859年11月15日于巴黎

現在 querelle allemande [德国紛爭] 提到日程上來了，不管這個紛爭在廣大群眾心目中是多麼無關緊要，但是它却可能釀成全德國的、甚至是全歐洲的災難。作為主要條頓大國之間紛爭口實的一個小國，在合眾國的歷史上名聲很壞。大家都知道，英國曾經在德國買了成千上萬的受過嚴格訓練的奴隸，經過大西洋送到自己的起義的殖民地去，奴隸主要靠黑森—加塞爾提供，因為黑森—加塞爾的宗法制的選帝侯通常是靠用自己忠實的農民去換不列顛黃金的方法來取得收入的。從這個值得紀念的時代起，直到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發出黑森—加塞爾革命的信號為止，歷任選帝侯和他們的臣民之間的关系看來變得越來越敵對了。這場革命得到現任選帝侯^①的暗中支持，當時他非常希望同他的最親愛的父親^②分擔最高權力。小小的革命為1831年1月5日的黑森憲法掃清了道路，而憲法現在則是奧地利和普魯士之間的鬥爭中的主要戰鬥口號。1850年，這部憲法使它們在布隆采耳進行了一場不流血的戰鬥，而在路易·波拿巴用“意大利問題”使大家厭倦了以後，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編者注

② 威廉二世。——編者注

如果情况順利，这部宪法可能很快会使他从事“德国問題”的“研究”。为了說明当前的冲突，不妨簡略地評述一下 1831 年的黑森宪法、它所經歷的变迁沿革以及使它的命运同爭霸的奥地利和普魯士的野心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事件。

1831 年的黑森宪法，抛开它所規定的选举办法，即由各旧有等級（貴族、城市居民、农民）选举代表的方法不談，可以认为是欧洲曾經宣布过的一部最自由主义的根本法。沒有哪一部宪法对执行机关的权限作过这样严格的限制，在更大程度上使政府从屬于立法机关，并且給司法机关以如此广泛的监督权。为了說明这个奇怪的事实，可以說，1831 年的黑森革命实际上是同各个“等級”中怀有不滿情緒的人們一致行动的律师、文武官員所进行的反对专制君主的革命。根据宪法第一条的規定，凡是拒絕對宪法宣誓的黑森亲王都要被剝夺王位继承权。关于各部大臣的責任的法令絕不是空話，它使人民代表能够依靠国家法庭来解除任何一个只要被认为是犯有哪怕是曲解立法議会的某項决定之罪的大臣的职务。君主被剝夺了赦免权。他既无权让政府的成員退休养老，也无权違反政府成員的意志將他們革职，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們随时可以向高等法院起訴。高等法院有权对有关任免制度的一切問題作出最后决定。众議院从議員中选出一个常任委员会，組成类似雅典最高法院的机构，对政府的活動实行监督，并把違反宪法的官員送交法院审判，即使是下級执行上級的命令时違反宪法，也不得例外。于是，官員便摆脱了王权的控制。另一方面，高等法院由于握有对行政机关的一切行动作出最后决定的全权，便成为全能的了。由人民选举的市議會議員，不仅应关怀地方当局的各种决定的执行，而且应当关怀国家的一般法律的实施。軍官們在就职

之前必須宣誓效忠憲法，他們在對王權的關係上享有同文職人員一樣的權利。代議機關只由一院組成，它在同執行機關不論發生什麼衝突時，有權停止征收一切賦稅。

1831年的黑森—加塞爾憲法就是如此。當今執政君主的父親威廉二世選帝侯“在各個等級的完全同意下”宣布了這部憲法，並且

“衷心地希望它將作為君主和他的臣民之間和睦一致的牢固紀念碑永世長存下去”。

這部憲法的草案當時是由黑森政府提交聯邦議會的，而聯邦議會雖然沒有批准，可是顯然把它作為 *fait accompli* [既成事實] 接受下來了。可以預料，儘管有一切 *pia desideria* [良好的願望]，憲法機器在黑森—加塞爾也是注定不能順利開動的。從1832年到1848年，立法議會的成員至少更換了十次，其中有两屆甚至任期沒有滿就更換了。1848—1849年革命使1831年憲法具有了更加民主的精神：等級選舉制廢除了，最高法院成員的任命權轉交給了立法機關，最後，從君主手中收回了對軍隊的最高指揮權並把它轉交給了要對人民代表負責的人——陸軍大臣。

1849年，當根據新選舉法選出的第一屆黑森立法議會開幕的時候，德國已經開始了全面的反動；不過，一切都還處在蠢蠢欲動之中。舊聯邦議會被革命浪潮掃除了，而德國的國民議會連同它那虛有其表的執行機關也被用刺刀消滅了。這樣一來，全德意志聯邦的總的中心便不復存在了。在這種情況下，奧地利要求恢復法蘭克福的舊議會，那里它的影响始終是占居優勢的，而普魯士則力圖建立北方聯盟，想利用這個聯盟來為自己的利益服務並把它置於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有四個德意志王國和巴登支持的奧地

利，实际上已經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把旧联邦議会的渣滓聚集到自己周圍，而普魯士也稍微嘗試了一下在一些較小的邦的参加下在爱尔福特組織联邦議会。不言而喻，受自己的自由主义的立法議会領導的黑森一加塞尔被列入了奧地利的主要敌人之中，并且是普魯士的拥护者。但是，当选帝侯剛一确信奧地利有俄国的支持，很可能在这场角逐中获胜时，他就抛开了假面具，表示贊成奧地利議会，反对普魯士联盟，扶植以声名狼籍的哈森普弗魯克为首的反动內閣上台执政，解散了拒絕表决通过賦稅和持反政府立場的立法議会，并且在他企图依仗自己的权力去征收賦稅而由于得不到軍隊、官僚和司法机关的支持遭到了失敗以后，便在黑森一加塞尔实行了戒严。他采取了非常理智的預防措施，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去了，以便在那里受奧地利的直接保护。奧地利以它所恢复的旧議会的名义派出了联邦的一个軍去廢除黑森宪法，使选帝侯重登宝座。普魯士則被迫表示贊同黑森宪法，反对选帝侯，以便加强它自己对恢复联邦議会的抗議，加强在它自己的庇护下建立北方联盟的嘗試。于是，黑森宪法就成了奧地利和普魯士之間斗爭的口号。当时事态日益危急。联邦軍隊和普魯士軍隊的前卫在布隆采耳附近相遇，但是，双方都吹了后退号。普魯士首相馮·曼托伊費尔于1850年11月29日在奧里繆茨会晤了奧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公爵，向他屈膝求和，在有关議会、黑森一加塞尔和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所有問題上完全放棄了普魯士实行独立自主政策的一切要求。普魯士作为低头認錯的罪人回到了議会。奧地利的一个軍向北海海岸的胜利进军，使普魯士的屈辱又加了一等。1831年的黑森宪法自然被坚决廢除了，代之而起的最初是戒严状态，后来是1852年由哈森普弗魯克一手炮制、經选

帝侯本人稍作更动并由联邦議會訂正和批准的反动宪法。这部 1852 年宪法成了經常使国家和选帝侯之間发生糾紛的緣由，而且無論怎样調解，都是徒劳。不久以前的意大利事件和随后发生的德国的运动，在普魯士政府看来，为洗雪奥里繆茨失敗之耻，并恢复自己以往同奥地利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普魯士知道，1850 年曾經使奥地利取得优势的俄国，这一次将会朝相反的方向行动。直到現在角逐双方除了紙上交战以外，还没有任何别的接触。至于說 1831 年和 1852 年的两部黑森宪法，那只是它們斗争的口实。这从下面这一簡單的情况中就可以看出：奥地利主張根据 1831 年宪法的条文来修改 1852 年宪法，而普魯士則坚持 1831 年宪法要根据联邦議会的总的（君主制的）原則加以修訂后再行恢复。人民和黑森—加塞尔的議會依靠普魯士的支持，要求恢复过去的宪法。如果德国人民不在适当时机轉过身来反对“自己的两个統治王朝”，这一切由利害相关的顧問們从外面进行操纵的事情，可能会以德国的內战告終。

卡·馬克思写于 1859 年 11 月 15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9 年 12 月 2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807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卡·馬克思 对华貿易

过去有个时候，曾經流行过一些十分虚妄的見解，說什么由于打开了天朝的大門，美国和英国的商业一定会得以推进；当时我們曾根据对本世紀开始以来中国对外貿易的精密考察指出，这些奢望是沒有可靠的根据的³⁵⁸。我們证明过鴉片貿易的增长与西方工业品的銷售成反比。我們曾认为，除了鴉片貿易之外，对华进口貿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結合的中国社会經濟結構。为了证实我們以前的論断，我們現在可以援引題为“額尔金伯爵赴华赴日特別使命有关文件汇编”³⁵⁹的藍皮书。

每当亚洲各国的任何地方对于輸入商品的实际需要与假定需要——这种假定需要，在大多数場合下，都是以新市場的大小，那里人口的多寡，以及某些重要的口岸外貨銷售情况等表面資料为根据而推算的——不相符时，商人們由于切望扩大交換范围，极易于把自己的失望归咎于这样一种情况，即认为野蛮政府所設置的人为措施阻碍了他們，因此，可以用强力清除这些措施。正是这种謬見，在我們这个时代里，使得英国商人拚命支持每一个答应以海盜式的侵略强迫野蛮人締結商約的大臣。这样一来，假想中的对外貿易从中国当局方面所遇到的人为障碍，事实上便构成了商界人士认为能证明对天朝施加的一切暴行均屬正当的主要借口。額

尔金勋爵的藍皮书中所包含的宝貴材料，将会使一切沒有成見的人大大消除这些危险的謬見。

藍皮书中附有 1852 年广州的一位英国官員米契尔先生致乔治·文翰爵士的报告书，我們現在从这份报告书中引录如下的一段：

“我們与这个国家〈中国〉的商約充分生效，至今〈1852年〉已将近十年，每一个可能設想的障碍都已清除，1 000 英里长的新海岸已对我們开放，新的商埠已經直接在生产地区和沿海最方便的地点建立起来。但是，就我們所預期的对我国工业品的消費数量的增加而論，其結果又怎样呢？老实說来結果就是：經過十年以后，貿易部的表报告我們，亨利·璞鼎查爵士在 1843 年簽訂附約时所見到的当时的貿易量，較之他的条約本身在 1850 年底所证明給我們的还要大些！这里是就我們本国制造的工业品而論的，而我們本国制造的工业品正是我們現在所考虑的唯一問題。”

米契尔先生承认，自从 1842 年条約³⁶⁰ 訂立以来，几乎完全是以白銀与鴉片相交换的中印貿易，已經大大地发展了。但甚至对于这种貿易，他还补充說：

“它从 1834 年到 1844 年的发展，与从 1844 年到現在的发展，速率是相同的，而在后一个时期內，可以认为它是在条約的假想的保护之下进行的。另一方面，从貿易部的表报上，我們看到一件彰明昭著的事实，即在 1850 年年底，我們向中国出口的工业品，与 1844 年年底比較起来，几乎少了 75 万英鎊。”

1842 年的条約在促进英国对华出口貿易方面，沒有发生絲毫影响，这可以从下表看出：

申报价值(金鎊)

	1849	1850	1851	1852	1853	1854	1855	1856	1857
棉織品	1 001 233	1 020 915	1 598 829	1 905 321	1 408 433	640 820	883 985	1 544 235	1 731 909
毛織品	370 878	404 797	373 399	434 616	203 875	156 959	134 070	268 642	286 852
其他商品	164 948	148 433	189 040	163 662	137 289	202 937	259 889	403 246	431 221
共 計	1 537 109	1 574 145	2 161 268	2 503 599	1 749 597	1 000 716	1 277 944	2 216 123	2 449 982

現在我們把这些数字与据米契尔說 1843 年达 175 万英鎊的中国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額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最近九年內，英国的輸出，有五年远远低于 1843 年的水平，而 1854 年只有 1843 年的十七分之十。米契尔先生首先用一些过于籠統而不能确切证明什么东西的理由来解釋这惊人的事实。他說：

“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以致他們穿的衣服正是以前他們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說他們除了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論卖给他們的东西多么便宜，他們一概不需要。”“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并且在这个期間还要能經得住干极沉重的粗活时的磨損，不然他們是添置不起的。而像那样的衣服所需的棉花，至少要相当于我們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棉織品所用棉花的重量的三倍，換句話說，它的重量必須相当于我們能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斜紋布和普通棉布的重量的三倍。”

缺乏需要以及对于傳統服式的偏愛，这些乃是文明貿易在一切新市場上都会遇到的障碍。至于說到斜紋布的厚密和結实这一点，难道英国和美国的工厂主不能使他們的产品适合中国人的特殊需要嗎？但是这里我們就接触到問題的实质了。1844 年，米契尔先生曾将各种质料的土布的一些样品送到英国去，并且注明其价格。同他通信的人告訴他，他們不能在曼彻斯特依照他所开列的价格生产那种布匹，更不能将其运往中国。为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制度出卖其布匹的价格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織机上用手工織成的更便宜呢？我們上面已經指出过的那种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結合，解答了这个謎。我們再来引述米契尔先生的話吧：

“当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紡紗和織布；他們就用这种家庭自織的料子，即粗重而結实、可以經得起两三年粗穿的布料，来縫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来的拿到附近城鎮去卖，城鎮的小店老板就把这种土布买来供給城鎮居民及河上居民的需要。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

人都穿这种手織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布到最細的紫花布都有，但都是在农家生产出来的，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簡直只有原料的价值，或者說得更恰当些，只有他交换原料所用的糖的价值，而糖又是他自己的产品。我們的工厂主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制度的令人贊叹的节儉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說是巧妙的穿插配合，那末就会一目了然，就較粗的織造品而論，他們是沒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織布机，世界各国中也許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在其他各国，人們只限于梳棉和紡紗，生产过程至此为止，而把紡成的棉紗送交專門的紡織工去織成布匹。只有节儉的中国人才把全部工作做到底。中国人不但梳棉和紡紗，而且还依靠自己的妻女和佣工的帮助自己織布；他的生产并不以仅仅供給自己家庭的需要为限，而且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匹供应附近城鎮及河上居民作为他那一季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

因此，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是庄稼汉又兼工业生产者。他生产这样的布匹，除原料的成本外，簡直不費分文。如前所說，他是在自己的家里經自己的妻女和佣工的手而生产这种布匹的；既不要額外的劳力，又不費特別的时间。在他的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完毕以后，以及在无法进行戶外劳动的雨天，他就使他手下的人們紡紗織布。总之，一年到头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时间，这个勤于家庭劳动的人就去从事他的副业，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

下面是額尔金勋爵对于当他溯航揚子江时所見到的农民的描述，可以看做是对米契尔先生的記載的补充：

“我所看到的情形使我相信，中国农民一般說来是过着丰衣足食和心滿意足的生活的。我曾竭力想（虽然收获不大）从他們那里得到关于他們的土地面积、土地占有的性质、他們必須繳納的税金以及諸如此类的材料。我得出了这样的結論：他們大部分拥有一块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須繳納一定的不甚繁重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們特別刻苦耐劳，就能充分供应他們衣食方面的簡單需要。”

曾經在长期內阻擋了而現時仍然妨碍着英国商品輸往东印度的，正是这种同样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結合。但在东印度，那种农业

与手工业的结合是以土地所有制的特殊性质为基础的，而英国人凭着自己作为当地至高无上的土地所有者的势力，能够破坏这种土地所有制，并从而强使一部分印度自給自足的村庄变成了生产鴉片、棉花、靛青、大麻以及其他原料去交换英国貨的簡單农場。在中国，英国人現在还没有这种势力，而将来也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

卡·馬克思写于 1859 年 11 月中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9 年 12 月 3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808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卡·馬克思

英国对法国入侵的恐惧

1859年11月25日于倫敦

恐慌早已是英国工业体系中的通常现象，最近这一现象看来在英国政治生活中也成为通常现象了。只要善于利用，恐慌能够给各个所谓自由国家的政府提供许多好机会。当人们被吓得神经错乱的时候，能够很容易使他们的头脑摆脱危险的幻想。就拿英国实行改革的问题来说吧。正当英国在研究是否永远放弃它对北美的监督的问题的时候，格雷勋爵提出了一项关于议会改革的冠冕堂皇的法案，以便消除上院对下院的传统影响。1780年里士满公爵提出了一项法案，他在这个法案中甚至要求每年进行一次议会选举和实行普选制。皮特（他的百年诞辰根本没有受到同胞们的注意就悄悄地过去了，因为那时他们完全为亨德尔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奔忙）最先在他的旗帜上写上了“议会改革”的口号³⁶¹。十八世纪统治阶级中最先进的人物梦寐以求的争取改革的运动现在消逝得无影无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运动被法国革命引起的恐慌所扫除，继法国革命之后又发生了反雅各宾战争，欠下了骇人听闻的国债，出现了可耻的禁口律³⁶²。几年以前对俄国的丧胆的恐惧断送了两个改革法案³⁶³，现在对法国入侵的恐惧大概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可以对布莱

特先生领导的英国激进党人的阴暗的预感做出应有的评价。他们公开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寡头政体及其出版机关故意散布使人恐惧的谣言，利用法国入侵的怪影来破坏改革，使糟糕透顶的管理制度万世长存。这件事情确实具有某些令人憎恶的、可疑的特征。制造将受到侵略的恐慌情绪的，主要是帕麦斯顿的报刊，而帕麦斯顿本人被公认为是路易·波拿巴的挚友。一个由于没有征得自己同僚们的同意就承认 coup d'état [政变] 而被从一届政府中撵了出来，又由于提出关于法国阴谋家的法案而被逐出另一届政府的人³⁶⁴，能够是反对波拿巴阴谋的最合适的人物吗？帕麦斯顿的报刊一方面警告英国人民要提防波拿巴背信弃义的行为，同时又号召英国人民同这个人一道进行一次新的对中国的远征。

但是，不能否认，英国目前对战争的恐慌情绪，虽然被利用来为贵族政党的政策服务，但这种情绪并不是没有合理根据的。每当波拿巴签订一个新的和约，英国总会本能地自问，现在它该要遭到攻击了吧？可见，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欧洲的统治集团由于害怕革命而承认了路易·波拿巴的制度，但是，周期性地发动战争却是这个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他只有在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下，才能使各国政府摆脱对于可怕的革命的恐惧，这个条件就是各国政府让他逐一地征服自己。波拿巴登上他篡夺来的宝座还不到两年，对俄战争就成了延长他执政的时间所必须的条件了。同俄国签订和约还不到两年，又感到只有在意大利进行一场冒险才能使他免遭可耻的灾祸了。诚然，接二连三的战争并没有减轻他的困难，战争的结果从一方面说只不过是骗局，从另一方面说则是国债的增加和御用军的日益蛮横，更不用说除了国内已经存在的不稳定局面的其他因素以外，还出

現了教权反对派。在同俄国作战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心怀不滿的奥尔良党人就大胆地发表冷嘲热諷的言論,陷于悲观失望的革命家們又使用了炸彈。最近一場战争所引起的絕望情緒最明显的表現是:法国貿易陷于停滯、皇帝的大赦彻底失敗、对报刊的迫害日益加剧、奥尔良派的希望正在复活。大多数法国人民都在抱怨毫无意义的战争耗尽了他們平时的全部积蓄,而軍队却在咒罵和平,认为和平使它失去了战争的果实。再过几个月,路易·波拿巴所面临的困难就会充分表現出来,那时他就只有一条出路——发动新的战争。但是,他迫于自己的处境而进行的这些接二連三的战斗,对他本人以及欧洲(英国可以說是它的最强大的代表)都是越来越危險了。克里木战争确切些說不是在欧洲領土上进行的。意大利战争之所以沒有蔓延开来,只是由于它突然停止了。假如萊茵河上爆发了战争,特别是入侵英国,那末从一开始就会是全欧洲性的战争。可是,在确定下一次进攻的对象时,路易·波拿巴只能在普魯士和英国中間进行选择。在两种情况下,英国都将参战,在一种情况下是作为交战的主要方面,在另一种情况下是作为盟国。后一种情况可能性最大。但是,法国和普魯士之間的战争在法国和英国的相互关系中将引起哪些复杂变化,还不能預測。我們准备以后再来研究英国鉴于即将发生的冲突而进行的备战活动。

卡·馬克思写于1859年11月25日

載于1859年12月9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581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对摩尔人的战争的进程

我們早就在預料西班牙軍隊會在摩洛哥採取某種堅決行動，以便結束戰爭的第一階段即準備階段。³⁶⁵ 但是，出乎我們預料之外，奧當奈爾元帥似乎並不急於離開他在塞拉利奧高地上的兵營，所以我們不得不在他的軍事行動差不多剛剛開始的時候就來加以評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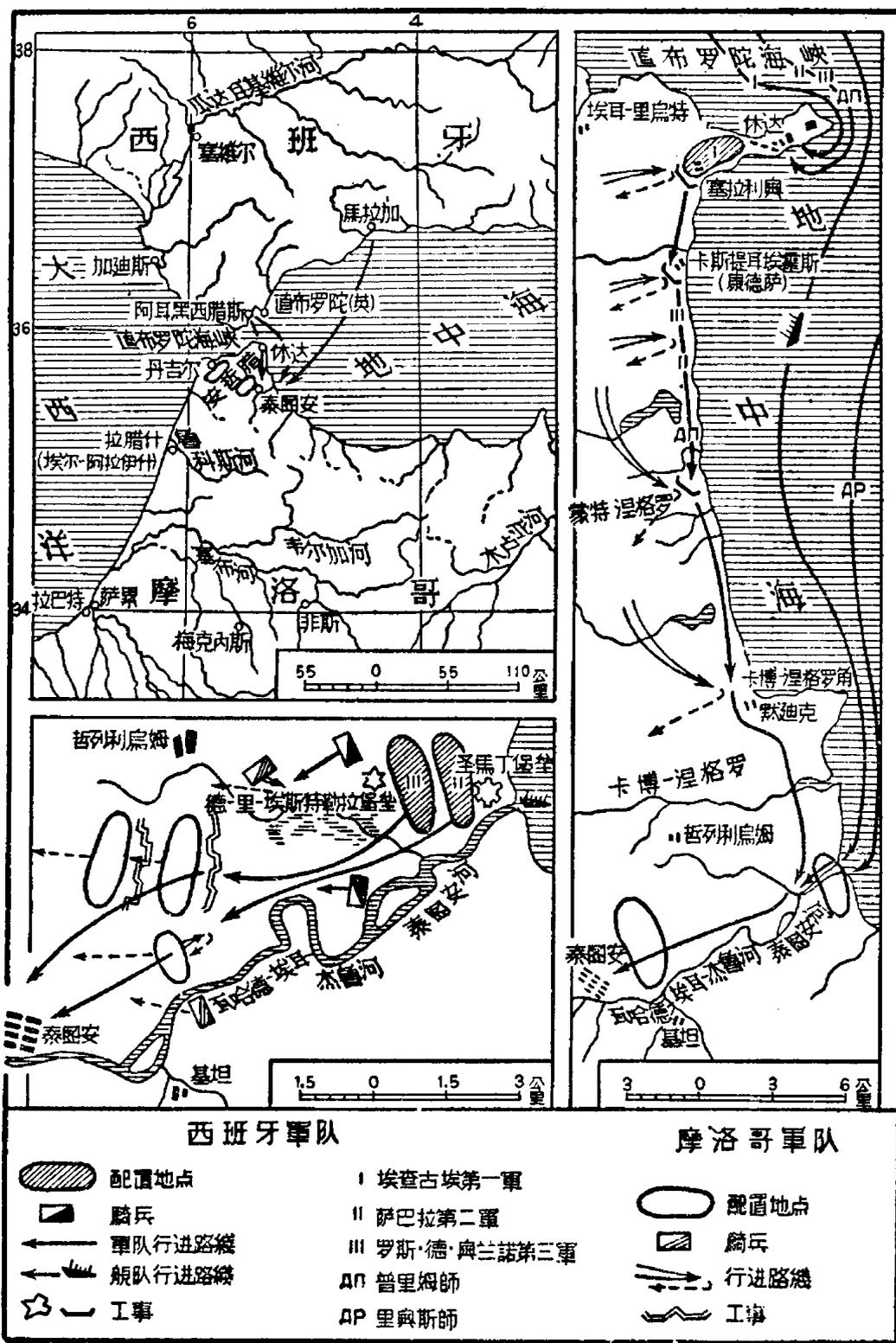
11月13日，埃查古埃將軍指揮的西班牙作戰軍隊第一師在阿耳黑西腊斯上船，幾天以後在休達登陸。17日，這一師人開出休達，占領了塞拉利奧（或稱白宮），即在休達的障地前方約1.5英里的一座巨大建築物。這一帶的地形很不平坦、起伏很大，非常有利於散兵戰和非正規戰。當天夜間，摩爾人試圖奪回塞拉利奧，沒有成功，于是就退卻了。而西班牙人則開始構築營壘，作為以後軍事行動的基地。

22日，塞拉利奧遭到了休達附近地區的摩爾族部落安哲腊人的攻擊。從這一次戰鬥開始，整個戰局到目前為止充滿了一連串的毫無結果的戰鬥，而且每一次戰鬥同所有其餘戰鬥都極相像。摩爾人用或大或小的兵力攻擊西班牙人的障地，試圖靠突然襲擊或機智奪取部分障地。據摩爾人報道，他們的這些行動通常是成功的。但是由於他們沒有火炮，所以只得放棄所奪得的多面堡。

西班牙人則說，沒有一個摩爾人看見過西班牙多面堡的內部是怎麼樣的，摩爾人的所有的攻擊都是完全不成功的。在第一次攻擊時，安哲腊人不超過 1 600 名，第二天他們得到了 4 000 人的援軍，於是立即重新發起進攻。22 日和 23 日全是小接觸，但是在 25 日，摩爾人以全力進攻，於是發生了一場激烈的戰鬥，埃查古埃將軍在這次戰鬥中手部負傷。摩爾人的這次攻擊如此厲害，以致使奧當奈爾這位西得·康佩亞多爾從他在進行戰爭時一直保持着的那種昏睡狀態中稍稍清醒過來。他立刻命令薩巴拉將軍指揮的第二師和普里姆將軍指揮的預備師上船，並且親赴休達。26 日夜間，西班牙的作戰軍隊全部在休達附近集中。29 日，摩爾人發動了另一次攻擊，30 日再次攻擊。在這以後，西班牙人開始設法改變他們所處的局限於一隅的地位；他們第一個行動的目標是休達南面約 20 英里、離開海岸 4 英里的泰圖安。他們開始修築一條通往該城的道路；摩爾人在 12 月 9 日以前一直沒有進行任何抵抗。12 月 9 日晨，摩爾人突然襲擊了兩個主要多面堡的守軍，但是，像往常一樣，到日終便又放棄了多面堡。12 日，在離開休達約 4 英里的西班牙兵營前面發生了另一次戰鬥；20 日，奧當奈爾發出電訊說，摩爾人再度攻擊兩個多面堡，但是像往常一樣被勝利地擊退了。可見，12 月 20 日同 11 月 20 日相比，情況沒有絲毫進展。西班牙人仍然採取守勢，而且，同兩三個星期以前的預告相反，看不出有任何前進的跡象。

西班牙軍隊的數量，包括 12 月 8 日以前所得到的全部援軍在內，約有 35 000—40 000 人，因而有 3 萬人可於進攻。有了這樣一支隊伍，奪取泰圖安不應當有什麼困難。誠然，沒有好的道路，而且軍隊的給養全部要從休達運去。但是法國軍隊在阿爾及利亞

1859—1860 年摩洛哥战争图



以及英国军队在印度是怎样做的呢？何况西班牙的騾子和挽車馬并没有被它們本国的好路嬌慣到不肯在摩尔人的土地上行走。不管奥当奈尔怎样替自己辯解，这样繼續按兵不动是絕對解釋不通的。西班牙人現在拥有的兵力一般估計已是他們在这次战争中要派出的最多的兵力了，除非有意外的挫折要求他們作特殊的努力。相反地，摩尔人一天比一天强大。由哈治·阿布德-薩勒姆指揮的、曾于12月3日派出部队进攻西班牙人陣地的泰图安兵营，其军队已經扩充到了1万人，城內的守軍还不算在內。另外一个由穆萊·阿巴斯指揮的兵营在丹吉尔，它源源不断地得到由內地开来的援軍。单是这一情况，就应当使奥当奈尔一等到天气許可时便发动进攻。但是，虽然有好天气，他却沒有进攻。勿庸置疑，这是一种完全沒有决断的表现，这表明，摩尔人不是像他所預計的那种不堪一击的敌人。无疑地，摩尔人作战非常出色；西班牙兵营里紛紛抱怨休达前面的地形对摩尔人有利，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西班牙人說，摩尔人在丛林和山谷中是十分厉害的敌人，并且他們对每一寸土地都很熟悉，但是，一旦走进平原，西班牙步兵的坚强力量很快就会迫使摩尔人的非正規部队掉头逃跑。但是現在每次战斗都有四分之三的时间用来在起伏地上进行散兵战，在这种条件下，这样一种辯解是大可怀疑的。如果說西班牙人在休达附近停留了6个星期以后还不能像摩尔人一样熟悉那里的地形，那他們就够糟糕了。起伏地比平原更有利于非正規部队，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即使是在起伏地上，正規的步兵也应当比非正規部队优越得多。在散兵綫后面配置支援队和預备队的現代散兵战的方法，军队运动的規律性，保持对部队的指揮并且使它們相互支援以使用全部力量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的可能性，——所有这一

切,使正規部队比非正規部队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以致在最适合于进行散兵战的地形上,非正規部队即使以二对一,也抵擋不住正規部队。但是在休达,力量的对比正好相反。西班牙人拥有数量上的优势,但是他們却不敢进攻。唯一的結論是,西班牙军队完全不懂散兵战,因此士兵个人对这种作战方法缺乏素养,紀律和正規訓練所应当給予的优越性就抵消了。事实上,大概他們不得不經常使用长剑和刺刀来进行白刃战。摩尔人在西班牙人相当接近的时候,就像土耳其人所常做的那样停止射击,拿着刀劍向他們冲杀,而这对于像西班牙军队这样由新兵組成的军队确实是不很愉快的。但是經常发生的战斗,应当使他們熟悉摩尔人作战的特点和找到对付它的合适的办法;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位統帅仍然迟疑不决并且繼續滯留在自己的防御陣地上的时候,我們就不能对他的军队作出很高的評价了。

根据現有事实来推測,西班牙人的作战計劃,似乎是把休达作为作战基地而把泰图安作为第一个进攻目标。同西班牙隔海对峙的那一部分摩洛哥的地方,形成一个半島似的地带,寬約 30—40 英里,長約 30 英里。丹吉尔、休达、泰图安和拉腊什(埃尔-阿拉伊什)是这个半島上的主要城市。占領了这四个城市(其中休达已在西班牙人手中)就很容易征服这个半島,并使它成为进一步进攻非斯和梅克內斯的基地。所以,夺取这个半島可以說是西班牙人的目标,而攻占泰图安則是达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这个計劃看来是相当明智的;它把作战行动限制在一块不大的地区內,这个地区三面环海,第四面为两条河(泰图安河和魯科斯河)所环繞,因此夺取这个地区要比夺取它南面的地区容易得多。这个計劃也避免了进入沙漠的必要性,而如果把摩加多尔或拉巴特作为作战基地的

話，那就不可避免地要进入沙漠；同时，这个計劃使戰場接近西班牙的国境，其間只有直布罗陀海峽之隔。但是不論这个計劃有什么优点，如果計劃不能实现，这些优点就都是毫无用处的。如果奥当奈尔照原来那样繼續下去，那末，不管他在公报上說得多么漂亮，他也会使他自己和西班牙軍隊的名誉蒙受耻辱。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12 月 10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作为社論載于 1860 年 1 月 19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846 号

弗·恩格斯 对摩尔人的战争

摩洛哥的战局终于真正开始了，随着这个战局的开始，西班牙的报纸和热情的西班牙民众用来刻画奥当奈尔的一切浪漫色彩都消失了。奥当奈尔原来只是一个平庸的普通将军。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加斯梯里亚和累翁的骑士，而是公主驃騎兵³⁶⁶，战争不是用托勒多的刀剑，而是用綫膛炮和圓柱錐形炮弹进行的。

12月20日前后，西班牙人开始修筑一条供炮兵和輜重队通行的道路。这条道路要经过在休达城下的兵营南面的山地。摩尔人从未试图破坏这条道路；他们有时攻击掩护筑路队的普里姆将军的那个师，有时也攻击兵营，但都没有成功。这些接触从未超出前卫散兵战的范围；12月27日的战斗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西班牙人的损失也不过是6人死亡和30人负伤。这条不过两英里长的道路在年底前就修筑好了，但是一场新的暴风雨的袭击阻止了军队的行动。与此同时，好像是要把军队即将开始的调动通知摩尔人的兵营一样，由1艘帆力战列舰、3艘螺旋推进式巡航舰和3艘明輪式蒸汽舰组成，共有246门火炮的一支西班牙舰队开到泰图安河口，并且在12月29日炮击河口的堡垒。在大约3小时内，这些堡垒被压制住了，它们的土质工事也被摧毁了。不要忘记，这些正是法军大约在一个月以前以少得多的兵舰轰击过的

堡垒。367

29日天气好转，西班牙军队终于在1月1日开始前进了。最先在非洲登陆的、由埃查古埃指挥的第一军（2个师），仍然留在休达前面的障地上。这个军在最初几个星期虽因疾病而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现在已经能服水土了，并且，由于以后获得了增援，人数已达1万名，比第二军或第三军多得多。第二军由萨巴拉指挥，第三军由罗斯·德·奥兰诺指挥，这两个军和普里姆的预备师一起，共21 000—22 000人，已在新年的第一天出动。每个兵士随身携带6天的口粮，另有100万份口粮，即军队一个月的给养，由随同这支军队行动的海船载运。这支军队以普里姆师为前卫，由萨巴拉担任支援，罗斯·德·奥兰诺殿后，通过了休达南面的山地。新辟的道路向下通往离兵营2英里的地中海，这里有一片相当大的半圆形的平原，地中海形成它的弦，起伏地带构成它的圆周，这一地带愈来愈高，逐渐变成陡峭的山岭。普里姆师的大部分人刚刚离开兵营，散兵战就开始了。西班牙的轻步兵轻易地把摩尔人赶回平原，又从平原迫使他们退入位于西班牙军队行进路线侧方的山岗和丛林中去。在这里，公主驃骑兵的两个人数不多的连因为某种误会而投入了进攻。他们进攻得这样勇猛，以致一直穿过了摩尔人的战线而进入了他们的兵营。但是四面都是起伏地，而在有利地形上又找不到可以攻击的骑兵或步兵，于是他们只得退回来，除了损失兵士以外，还损失了7个或者说差不多他们全部的军官。直到目前，战斗主要是由成散开队形的步兵和一两个山炮连来进行的，有几艘炮艇和蒸汽舰在一些地方以火力进行了与其说是实际的不如说是精神上的支援。看来，在没有巩固地占领形成这片平原南端的山岭以前，奥当奈尔想停留在平原上。可是，为了

保证在夜間能守住自己的陣地，奥当奈尔命令普里姆把山岭北坡上的摩尔猎兵赶走，然后在傍晚时撤回。但是普里姆这位西班牙军队中最勇猛的将军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结果占领了整个山岭，当然他自己也遭到重大的损失。他的前卫在山岭上宿营，并沿正面筑起了工事。这一天西班牙人的损失共计死 73 人，伤 481 人。

这一天夺取的陣地就是因两座白色建筑物而得名的 Castillejos [卡斯提耳埃霍斯——双堡]，其中一座在靠近平原的内山坡上，另一座在普里姆白天占领的山岭上。但是这个兵营的正式名称大概是 Campamento de la Condesa [伯爵夫人兵营]。同一天，摩尔人攻击休达城下兵营极左端两个多面堡之间的間隙地和极右端的一个多面堡，试图对这个兵营进行一次小规模的牵制战。但是埃查古埃的步兵和炮兵火力轻易地击退了他们。

作战军队在伯爵夫人兵营停留了 3 天。野炮和 1 个火箭连以及余下的骑兵（整个骑兵旅，包括 8 个骠骑兵连、4 个无胸甲的胸甲骑兵连和 4 个枪骑兵连，共 1200 人）都来到了这个兵营。只有攻城炮兵纵列（其中有 1 个十二磅綫膛炮连）还未到达。1 月 3 日，奥当奈尔向南面的一道山岭即蒙特涅格罗方向进行偵察。天气仍然晴朗，午間很热，夜間有重露。霍乱仍在一些师里严重流行，有一些部队因疾病而受了严重的损失。例如，受疾病危害特别严重的两个工兵营，各连人数已由 135 人减到 90 人。

到此刻为止，我們掌握有詳細的报道，至于以后的情况，我們就只有根据内容貧乏而且互有出入的电訊来叙述了。5 日，军队向前推进。6 日，军队“通过了山口，沒有遇到抵抗，然后在涅格罗谷地的北面”宿营。这是不是說军队已經越过了蒙特涅格罗，并且

在它的南坡宿营，还不清楚。9日，据报道军队距离泰图安1里加^①，并且击退了摩尔人的一次攻击。13日，夺取了卡博-涅格罗的全部障地，大获全胜，并已兵临泰图安城下；只等火炮运到，就开始攻城。14日，原在馬拉加集結的里奧斯將軍的师（有10个营的兵力）在泰图安河口登陆，占領了两星期前被舰队击毀了的堡垒。16日，据报道說，这支军队即将渡河攻打泰图安。

为了說明这一切情况，必須指出，军队由休达到泰图安要通过四道各自分开的山岭。第一道就在兵营的南面，通向卡斯提耳埃霍斯平原；第二道在这个平原的南面。这两道山在1日被西班牙人占領。再往南，与地中海岸垂直的是蒙特涅格罗，和这一道山岭平行而位于更南面的，則是另一道更高的山岭，它一直到卡博-涅格罗海角为止，卡博-涅格罗的南面就是泰图安河。摩尔人在1月1日紧逼入侵軍的翼側，后来改变了战术，繼續向南面移动，企图从正面堵住通往泰图安的道路。估計爭夺这条道路的决战将在最后一道山岭即卡博-涅格罗的一些山口发生，而这一会战大概就在1月13日发生了。

从战术上来說，在这些战斗中双方都沒有什么可炫耀的。对于摩尔人，除了以半野蛮人的勇猛和机灵进行非正規的战斗以外，我們不能再期望什么別的东西。但是即使在这方面，他們看来也还不够强。他們似乎沒有表现出阿尔及利亚海岸山区的卡拜尔人甚至是里菲人所有的那种反抗法国人的狂热。在休达附近的多面堡正面进行的长时间的、沒有成功的搏斗，似乎已經挫折了大多数部落原有的銳气和毅力。而在战略上，他們也不能同阿尔及利亚

① 西班牙的1里加約等于5.5公里。——編者注

人相比。經過第一天战斗，他們便放棄了他們的正确計劃，即襲扰进攻纵队的翼側和后方，并且切断或威胁它和休达之間的交通綫。他們不这样做，却竭力赶到西班牙人的前面，想从正面去堵住西班牙人前往泰图安的道路，这样便引起了他們本应避免的一場决战。也許他們还会懂得，对于他們所拥有的这样的士兵來說，在像他們所居住的这样的国土上，小規模战争正是可以用来拖垮敌人的斗争方法，——尽管这个敌人在訓練上和装备上占有优势，但是它的一切行动都被摩尔人所沒有的那种龐大的 *impedimenta*〔輜重〕所拖累，而且它在一个不好客的又沒有道路的国土上調动軍隊是十分困难的。

西班牙人繼續像开始时那样作战。在休达按兵不动两个月之后，他們在 16 天內推进了 21 英里，速度是每 4 天 5 英里！即使把道路上的所有困难都估計进去，这种緩慢的速度仍然是現代战争中前所未聞的。西班牙的將軍們大概完全忘記了怎样指揮大部队、准备大規模的軍事行动和調遣一支按人数來說未必能够同上次意大利战争中法国的一个軍相比的軍隊。否則怎样解釋这种延宕呢？1 月 2 日，奥当奈尔所有的炮兵（除攻城炮兵纵列以外）都調到了卡斯提耳埃霍斯障地，但是他还是等待了两天，直到 5 日才出发。行軍看来还組織得不錯，但这是行程很短的行軍，所以也不算高明。在火綫上，西班牙人很蔑視敌人，这是較严格的訓練和一連串成功的战斗的必然結果；但是，当气候和战争（它最后必将变为困扰性的小規模軍事行动）的困难大大削弱了軍隊的士气和体力的时候，这种对胜利的信心是否还能保持，这要在将来才能看出。至于指揮方面，到目前为止我們所能說的还很少，因为除了第一次战斗以外，我們还没有得到关于整个战况的詳細报道。但是，这第

一次战斗就暴露了两个明显的錯誤，即騎兵的攻击和普里姆將軍的推进超过了預先規定的范围。如果这种事情成为西班牙軍隊中常有的現象，那末他們就更糟糕了。

泰图安的防禦很可能是短暫的，然而却是頑強的。工事無疑是不好的，但是正像在康士坦丁³⁶⁸和阿尔及利亚的其他許多城鎮中的战斗所表明的那樣，摩尔人在要塞圍墙掩护下作战时是出色的战士。下次的邮件可能給我們带来泰图安已被攻陷的消息。如果确是如此，我們可以預期战斗会暫時停息，因为西班牙人需要時間来改善泰图安和休达之間的道路，把泰图安变成第二个作战基地，并等候援軍。然后再从这里开始下一步行动，即进攻拉腊什或丹吉尔。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1月18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作为社論載于1860年2月8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5863号

弗·恩格斯 薩瓦与尼斯

莎姆伯里省长肯定地宣称撒丁国王从来无意要把薩瓦让給法国，而英国外交大臣本月 2 日在下院却断然声明，去年夏天瓦列夫斯基伯爵就以法国皇帝的名义拒絕了这个方案。但是，約翰·罗素勋爵的声明談的是几个月以前的情况，那时被否定了的事，可能現在已經实现了。当然，要使人相信在薩瓦居民中最近发展起来的拥护并入法国的运动純粹是地方性的运动，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大概这个运动是由法国代理人煽动起来的，而維克多-艾曼努尔国王的政府則批准了这个运动，或者至少也是对它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薩瓦像瑞士西部各州一样，是法兰西民族占有完全和无疑的优势的一个省份。人民都操南法兰西方言（普罗凡斯方言或利木贊方言），但标准的和正式的語言到处都是法語。可是这絲毫也不能证明薩瓦人願意并入法国，特別是并入波拿巴的法国。据一位于 1859 年 1 月为了軍事目的曾經在这个地区旅行的德国軍官的見聞录記述，除了莎姆伯里和下薩瓦的其他几个城市以外，主張并入法国的人無論在哪里都毫无影响，同时上薩瓦、莫里延和塔兰特茲认为最好是保持現狀，沙布累、佛西尼和热涅維这三个北部地区則认为最好是加入瑞士联邦，組成它的一个新的州。但是，既然薩

瓦居民完全是法兰西人，它无疑会日益倾向于法兰西民族的基本中心，并且最后会并入这个中心，这不过是一个時間問題罢了。

尼斯的情况却不同。伯爵領地尼斯的人民也操普罗凡斯方言，但是这里的标准語、教育、民族精神都是意大利的。北意大利方言和南法兰西方言非常接近，几乎无法說明某种方言止于何地，某种方言起于何地。甚至皮蒙特和倫巴第的土語按其后綴來說也完全是普罗凡斯語，而具有拉丁語詞根的詞的构成法实质上与意大利語相同。以这种土語为依据要求尼斯并入法国是不可能的。因此，現在只是根据設想中的尼斯对法国的同情要求它并入法国，可是是否存在这种同情，那还是大大值得怀疑的。即使有这种同情，即使有特殊的土語，尼斯也完全是意大利的一个省份。最令人信服的证明，就是朱澤培·加里波第的士兵 *par excellence*〔主要〕是由尼斯提供的。把加里波第看成法国人，那簡直是个笑話。

单純从財政观点来看，把这两个省割让出去并不会使皮蒙特受到很大的損失。薩瓦是一个穷省，虽然能为撒丁軍隊提供优秀的士兵，但是它自己的行政費用从来都是入不敷出的。尼斯的財政状况也好不了多少，而且只是那么一小块地方。損失显然是不大的。尼斯虽然是意大利的一个省份，但是为了北意大利和中意大利的統一可以把它牺牲，而失去像薩瓦这样的一个外族人居住的省份甚至可以认为是合算的，因为这样能促使意大利的統一。但是，如果从軍事观点看这个問題，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現在法国和撒丁从日內瓦到尼斯这一段疆界几乎是一条直綫。南面的海和北面中立的瑞士把通向意大利的一切道路都切断了。在这个意义上說，如果意大利和法国之間发生战争，交战双方的处境是一样的。但是薩瓦和尼斯都位于阿尔卑斯山主脉的后

面，阿尔卑斯山的主脉則以一个寬广的半圓包圍着皮蒙特，而且这两省都向法国敞开着。所以，在皮蒙特和法国的疆界綫上双方各占有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斜坡，而在疆界的北部和南部，意大利却占有阿尔卑斯山的两个斜坡，因此它完全控制着各个山口。

此外，由于商业不很发达，由皮蒙特經阿尔卑斯山通往法国的一切道路全都秽塞不堪，而由皮蒙特經蒙塞尼山口通往薩瓦的道路和由皮蒙特經田达山口通往尼斯的道路却是欧洲貿易的干綫，維修得非常好。所以，在意大利和法国之間的历次战争，如果进攻的方面是意大利的話，尼斯和薩瓦都是意大利进攻法国的天然的作战基地，而如果进攻的方面是法国的話，它就必須夺取这两个省，才能向阿尔卑斯山后面的意大利发动进攻。纵然意大利人面对着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军队不能守住尼斯和薩瓦，这两个省仍然使他們有可能及时把意大利的兵力集中到皮蒙特平原，从而保证意大利免遭突然的攻击。

如果意大利占有薩瓦和尼斯所得到的軍事上的利益仅限于这些积极的利益，那末牺牲这两个省份，仍然不致有什么严重的損失。但是最重要的是消极的利益。我們假定勃朗峰、蒙特伊澤兰山口、蒙塞尼山口和田达山口都是标示法国疆界的一个个大界桩。在这种情况下，疆界就不是像現在这样的一条直綫，而是以一个巨大的圓弧包圍着皮蒙特了。莎姆伯里、阿尔貝維耳、穆蒂埃这样一些主要道路的汇合点就会变成法国的基地。法国人会在蒙塞尼山口的北坡构筑防御工事并保卫北坡；两个国家的前哨就将在距离都灵只有两天行程的这个山脉的各个山頂上相遇。在南面，尼斯将会成为法国各个基地的中心，而前哨将設置在距离热那亚只有四天行程的奥涅利亚。这样一来，即使在和平时期，法国人也仍

然待在意大利西北部两个最大城市的門口，而且由于他們的領土差不多从三面包圍了皮蒙特，他們就可以阻撓意大利軍隊在波河上游谷地集結。把意大利兵力集中到亚历山大里亚以西的任何企图，都可能使軍隊在集中尙未完成以前就遭到攻击的危險，換句話說，可能使他們遭到被各个击破的危險。这样一来，皮蒙特的防禦中心便会立即从都灵移到亚历山大里亚；換言之，皮蒙特本身将会无法进行认真的防禦，而处于法国人的控制之中。路易-拿破侖正是把这一点称为

“自由的和感恩图报的意大利，它的独立只能归功于法国”。

注意一下北方，我們可以看見，那些經常威胁着意大利的东西，对瑞士來說也可能会成为致命的打击。如果薩瓦成了法国的領土，那末从巴塞尔到大圣伯納德山口的整个瑞士西部就会四面都受法国領土的包圍，一旦发生战争，連一天也守不住。这一点是这样明显，以致維也納會議决定让北薩瓦和瑞士都中立化，一旦发生战争瑞士有权占領并防禦这个地区。只有400万人口的小国撒丁不可能反对这个决定，但是法国是否可能并願意让它的一部分領土因此在軍事方面歸属于一个别的而且还是較小的国家呢？一旦发生战争，瑞士能不能够試图占領法国的一个省份并把它置于自己的軍事控制之下呢？当然不能。在这种場合，法国会在任何它觉得合适的时刻像吞并薩瓦和尼斯一样，輕而易举地吞并整个瑞士法語区——伯尔尼汝拉山区、紐沙特尔、窩州、日内瓦以及弗里布尔和瓦勒的那些它认为合适的地区；而在这个时刻尙未到来以前，瑞士会一直处于法国强有力的控制和監督之下，以致它会像是法国的一个简单的附庸。至于說到瑞士在战时保持中立，其实

只要一宣战这种中立就不会再存在了。如果一个强大的和好战的国家随时都可能击溃它的中立的邻邦,那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中立。

这个表面看来是无恶意的吞并薩瓦和尼斯的计划无非是要在意大利和瑞士建立法国的统治,即保证法国在阿尔卑斯山的统治地位。在这个小步骤实现以后,到我们亲眼看到在莱茵河上也建立起法国统治的企图以前,难道还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吗?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1 月 30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60 年 2 月 21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874 号

弗·恩格斯 对摩尔人的战争

西班牙在摩洛哥发动的战争的第一幕，同时也可能是最后一幕，现在已告结束，而且所有详细的公报已经到来，因此我们可以再次谈谈这个问题。

1月1日，西班牙军队离开休达的阵地，去进攻距离仅21英里的泰图安。奥当奈尔元帅虽然从未受到过敌人严重的攻击或拦阻，却花了不下一个月的时间才把他的军队开到这个城市附近。没有道路的困难和必要的谨慎，都不能成为行动这样闻所未闻地迟缓的理由；而且西班牙人显然没有充分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制海权。如果说不得不修筑一条道路以便运送重炮和辎重，这也不是一个理由。重炮和辎重都可以主要由舰船载运，军队只要带一星期的给养和山炮（用骡子驮载）而不带其他的火炮，至多5天就可以到达控制泰图安的高地，并与里奥斯的师会合，这个师在那时，正像在3个星期以后一样，也可以不受任何阻碍地在瓦哈德-埃耳-杰鲁河口登陆。2月4日的会战也许便可以在1月6日或7日进行，而且形势也许会更有利于西班牙人；这样，因疾病而丧失战斗力的数千人大概就可以保全下来，而且也许在1月8日就可以攻占泰图安。

这似乎是一个大胆的论断。的确，奥当奈尔渴望攻进泰图安

的心情并不比他的任何一个兵士差；他表现了勇敢、谨慎、冷静以及军人的其他素质。既然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到达泰图安城下，那末他用什么办法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做到同样的事情呢？当时奥当奈尔有两个办法把他的军队开到目的地。第一个办法是主要依靠陆上交通，舰船完全作为辅助。他就是这样做的。他组织了一个正规的陆上运输队来运送给养和弹药，并且给军队配备了大量的装备着十二磅炮的野战炮兵。在必要的情况下，他的军队可以完全不依赖舰船；舰船只是作为与休达联系的次要的交通路线，虽有用处，但绝不是必不可少的。按这个计划自然就要组织一支庞大的辎重队，有辎重队就要修筑一条道路。因此，就花了一个星期来铺设从已占领的障地到海岸的道路；而且差不多每走一段路，整个行军队伍——军队、辎重队等等就都得停顿下来，等待供次日前进用的另一段路筑成。因此，行军时间的长短，便以西班牙工兵每天所能筑成的道路的长短来计算；而筑路的进度看来是每天平均半英里左右。这样，所选择的这种运送给养的方法本身，又要求大大扩大辎重队，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军队在途中停留的时间越长，它消耗的粮食当然也就越多。虽然如此，但是当1月18日左右暴风雨迫使汽船离开海岸时，军队就只好挨饿了，尽管他们休达的基地近在咫尺；要是再来一天暴风雨，那末三分之一的军队就不得不回去为其余的三分之二的军队搬运给养。奥当奈尔元帅就是这样在整整一个月中使18 000名西班牙兵士沿着非洲海岸散步，每天前进三分之二英里。军队一旦采用了这种供应办法，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显著地缩短这个无可比拟的行军的时间了。但是采用这种办法难道不是一个错误吗？

如果泰图安是一个内陆城市，离开海岸不是4英里而是21英

里，那末自然不能有其他的选择。法国人在远征阿尔及利亚的内地时遇到过同样的困难，并且用同样的方法克服了这些困难，当然他们做得更努力，更迅速。英国人在印度和阿富汗由于比较容易找到牲畜和饲料，所以避免了这种麻烦；他们的炮艇，不需要良好的道路，因为战斗行动只是在干燥的季节里进行的，这时军队可以越野行进。但是带着一支军队沿海岸走整整一个月，而且在整个这段时间内总共只走 21 英里这样一段遥远的路程，这种事情只有让西班牙军队和奥当奈尔元帅来干了！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西班牙军队的实践和理论都是非常陈旧的。既然军队经常备有一支由蒸汽舰船和帆力舰船组成的舰队，那末这样行军就十分可笑了，而在行军期间因霍乱和痢疾丧失战斗能力的兵士则是偏见和无能的牺牲品。工兵修筑的道路并不是与休达联系的安全交通线，因为西班牙军队只是在他们偶尔宿营的地方才控制这条道路。在后方，摩尔人随时都可以使这条道路不能通行。要送一个情报，或者护送一个运输队回休达，至少需要一个有 5 000 人的师。在全部行军期间，与休达的联络都是靠汽船来保持的。尽管费了那么大的力气，随军的给养还是非常不足，以致不到 20 天，军队就濒于饥饿，只是靠舰船上的储备粮才得以幸免。那末，修筑这条道路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炮兵吗？西班牙人一定很清楚地知道摩尔人没有野炮，他们自己的线膛山炮就足以胜过敌人所能用来对付他们的任何武器。那末，为什么还随军携带所有的火炮（既然全部火炮可以在一两个小时內沿海路从休达运到瓦哈德-埃耳-杰鲁河口或泰图安河河口的圣马丁）？充其量，随军带一个野炮连就可以了。西班牙的炮兵如果不能以每天 5 英里的速度在任何地区行进，那末它们就太笨拙了。

里奥斯师在圣馬丁的登陆证明，西班牙人拥有的舰船每次至少可以載运一师人。如果进攻的是英国军队或者法国军队，那末无疑地，他們会从休达进行几次佯攻，把摩尔人吸引到該地，然后这一师人就立刻在圣馬丁登陆。这样一个拥有 5 000 人的师一夜之間就可以筑起輕型的野战工事，有这样的工事就可以无所畏惧地等待任何数量的摩尔人的攻击。但是，如果天气好，每天都可以有一个师登陆，这样，军队便可以在 6 天或 8 天之内集中到泰图安附近。假定奥当奈尔不愿意让他的一個同其余军队隔絕的师在三四天内遭受攻击，因为他的军队是由新兵組成的，还没有战争經驗，那我們就不能責备他没有采取这种做法了。

但是无疑地他可以做到下面这一点。他可以让每个兵士带一个星期的口粮，同时携带他的全部山炮（可能再带一个野炮連）以及用騾馬所能馱載的給养品，从休达出发，尽快地到达泰图安。即使把一切困难都考虑在内，日行 8 英里当然是够慢的了。不过就算 5 英里吧，那也只需要 4 天的行軍就够了。再假定需要用两天的时间来作战，虽然战果不会很大，爭不到 5 英里的土地。这样一共需要 6 天，包括因气候而耽擱的时间在内，因为一支不带輜重的军队差不多在任何气候下每天都可以走四五英里。这样，军队在耗尽他們所携带的給养以前就可以到达泰图安平原；必要的时候，汽船可以在行軍期間把給养运給军队，而他們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做的。就地形和气候条件來說，摩洛哥并不比阿尔及利亚更差，要知道法国人在严冬季节在阿尔及利亚的行軍要远得多，并且要深入山区，沒有汽船进行支援和运送給养。其实只要一到蒙特涅格罗的高地并控制住通往泰图安的山口，就可以保证通过圣馬丁的道路与舰队保持联系，而海就可以成为作战基地。所以，只要稍微

大胆一些，军队处于除自身以外别无作战基地的状态的时间就可以从一个月缩短到一个星期。可见，两种计划中最大胆的计划会是最可靠的计划，因为摩尔人越是可怕，奥当奈尔的迟缓的行军就越加危险。如果军队在前往泰图安的途中被击败了，退却起来也会比带着累赘的辎重和野炮时要容易得多。

奥当奈尔差不多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通过了蒙特涅格罗，此后的行进还是完全同以前一样的迟缓。他在这里又赶筑和加固了多面堡，好像与他对敌的是一支组织得最优良的正規军队。整整一个星期就这样浪费掉了。其实只要挖一些简单的野战工事就足以对付这样的敌人了。他不可能受到相当于他的6门山炮的火力的炮兵的攻击，因此，构筑这样的兵营，本来只要几天就足够了。4日，他终于去进攻敌人的营垒。西班牙人在这次行动中看来表现得很不错。关于战术措施的优劣，我们无法判断，因为西班牙兵营中的少数几个记者把所有枯燥的军事细节略而不提，而醉心于绘声绘色的描写和热情的夸张。像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所写的，要判断一片地形的特点，就应当自己去看看，我给你描写一番有什么用处呢。摩尔人完全被击溃，泰图安在第二天便投降了。

这样就结束了战局的第一幕，如果摩洛哥皇帝^①不是过于固执的话，那末整个战争很可能就此结束。可是，西班牙人到现在为止所遇到的困难（这些困难由于他们进行战争的方法而大为增加）表明，如果摩洛哥坚持到底，西班牙人还要花费不少的力气。问题不在于摩尔人的非正规部队的抵抗，因为他们绝不可能击败训练有素的军队，只要后者集结在一起而且能够得到给养；问题在于这个国

① 西迪-穆罕默德。——编者注

家非常落后，除了城市以外不可能夺取到任何别的东西，而且甚至从城市也不可能取得给养，因此必须把军队分散在大量的小据点上，而这些小据点终究不足以保证夺得的城市之间的交通经常畅通无阻，而且这些小据点要取得给养，就得派出大部分军队去护送运输队通过没有道路的、经常出现摩尔猎兵队的地区。大家知道，法国人在征服非洲的战争的最初五六年间，是怎样向布利达和梅代阿这样的城市供应粮食的，更不必说离开海岸较远的驻地了。应该知道，在这里的气候条件下欧洲军队很快就会疲惫，因此进行历时6个月或12个月的战争对于像西班牙这样的国家是非同儿戏的。

如果战争继续下去，首先进攻的目标当然是丹吉尔。从泰图安到丹吉尔要经过一个山口，然后往下进入一个河谷。这完全是内陆地区，附近没有汽船运送给养，也没有道路。距离大约是26英里。奥当奈尔元帅要用多长时间才能走完这一段距离而且必须留多少人在泰图安呢？据报道，他曾说好像需要两万人来扼守该城，但是这显然过分夸大了。用一万人驻守泰图安及其郊区，以一个旅驻守圣马丁的营垒，这一个地区就很安全了。这样一支队伍随时都可以作战，而且有足够的兵力击退摩尔人的任何进攻。对丹吉尔，可以由海上进行轰击来夺取，守备部队也可以由海上运往这个城市。关于拉腊什、萨累和摩加多尔情况也是一样。但是如果西班牙人打算这样做的话，他们为什么要长途行军到泰图安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摩洛哥再坚持一年，那末西班牙人要迫使摩洛哥求和，还必须在军事方面好好学习一番。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2月初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60年3月17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5896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
薩瓦、尼斯与萊茵³⁶⁹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2 月
1860 年 4 月初以单行本出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单行本译的

自从波拿巴、皮蒙特、俄国三者之间的阴谋开始暴露在大众眼前以来，已经一年了。起初是新年谈话，接着是向“意大利的伊菲姬尼亚”求婚，然后是意大利的哀鸣，最后是哥尔查科夫承认他和路易-拿破侖締結了书面条约。³⁷⁰而在这中间，又是扩军备战，调动军队，威胁恫吓和调解的尝试。当时，在最初的时刻，整个德国都本能地感觉到：现在问题不在于意大利，而是关系到我们自身的利害。问题将起于提契诺河，但最后将在莱茵河结束。一切波拿巴战争的最终目的，只能是夺回法国的“自然疆界”——莱茵河疆界。

但是，因为法国人对于莱茵河这一自然疆界的隐蔽要求而陷于不可言状的恐怖中的那一部分德国报纸，即以奥格斯堡“总汇报”为首的报纸，却以同样不可言状的狂热替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统治作辩护，所持的理由是：明乔河与波河下游是德国与意大利之间的自然疆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奥尔格斯先生发动了他的全部战略机构来证明：没有波河和明乔河，德国就要灭亡，放棄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就是背叛德国。

这样，事情就被弄颠倒了。非常明显，说莱茵河受到威胁只不过是借口，其目的在于保持奥地利在意大利的专制统治。所谓莱茵河受到威胁，就是要唆使德国一致拥护奥地利对北意大利的奴役。这里还出现了一种滑稽的矛盾：同样的理论，用在波河他们就

加以维护，用在萊茵河他們却加以非难。

本文作者当时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波河与萊茵河”^①。正是为了民族运动的利益，作者反駁了明乔河疆界論；他试图从軍事理論的观点来证明：德国为了自己的防御不需要意大利的任何一块領土；如果仅仅从軍事观点出发，那末法国要求占有萊茵河的理由无論如何要比德国要求占有明乔河的理由充分得多。总而言之，作者想使德国人能以洁白之身投入当前的斗争。

作者的目的是究竟达到了多少，可以让別人去判断。我們沒有見到有任何人企图本着科学的精神反駁那本小册子所作的分析。虽然那本小册子反对的主要对象——奥格斯堡“总汇报”曾答应要就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論文，但它并没有这样做。它只是从“东德意志邮报”³⁷¹轉載了三篇論文，而这些論文的批評也仅仅限于宣称“波河与萊茵河”的作者是“小德意志派”，因为他想放棄意大利。但是无論如何，据我們所知，奥格斯堡“总汇报”从此以后就不再提明乔河疆界論了。

然而，这种迫使德国一致拥护奥地利对意大利的統治和政策的企图，却为北德意志的哥达党的庸人們造成了反对民族运动的有利借口。最初的运动是真正的民族运动，它比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旧金山的一切席勒紀念活动³⁷²都具有更强烈得多的民族性质；这个运动是自然地、本能地、直接地发生的。至于奥地利对意大利是否享有权利，意大利是否要求独立，明乔河綫是否需要，——这一切在当时对这个民族运动來說都无所谓。既然我們之中的一个遭到攻击，并且是遭到与意大利毫无关系而对于夺取萊茵河左

① 見本卷第 247—299 頁。——編者注

岸地区却有很大兴趣的第三者的攻击，那我们就应当联合起来反对他，反对路易-拿破侖和法兰西帝国的傳統。人民本能地而且是完全正确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但是，哥达自由派的庸人們老早就不把德意志奥地利看做是“我們之中的一个”了。战争正合乎他們的心意，因为战争可以削弱奥地利，从而最后促成小德意志帝国或大普魯士帝国的产生。北德意志的庸俗民主派有許多人附和他們，这些人指望路易-拿破侖能打败奥地利，然后讓他們把整个德国統一在普魯士的霸权之下；有一小部分住在法国和瑞士的德国侨民也附和他們，这些人竟恬不知耻地公开和波拿巴主义勾結。但是，我們坦白地說，他們的最有力的同盟者是那些永远不敢正視危险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怯懦性；为了哀求把自己的死刑緩期一年执行，他們会背叛自己的忠实的同盟者，从而在沒有同盟者的情况下为他們自己今后的失败作出更可靠的保证。和这些怯懦之輩携手同行的是某些过于聪明的人，他們經常有千百个决不采取任何行动的理由，但是却有更多的借口来高談闊論。除了上述借口之外，他們对一切都表示怀疑。对于規定把萊茵河左岸地区让給法国的巴塞尔和約表示欢迎、而当奥軍在烏尔姆³⁷³和奥斯特利茨敗北时又暗中庆幸的，就是这班过于聪明的人，他們永远看不到自己的耶拿^①的来临，柏林是他們的聚集地。

这伙人的同盟胜利了。德国背棄了奥地利。然而，奥軍在倫巴第平原上打得非常英勇，使敌人为之惊讶，使所有的人都为之赞叹，但只有哥达党人及其追随者除外。操場上的刻板操练、駐地內

① 耶拿——德国中部的一个城市。1806年10月14日普軍在耶拿城下遭到失败。由于这次失败，普魯士向拿破侖法国屈膝投降。——譯者注

的严酷管教、軍士的棍棒，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磨灭德国人的无穷无尽的战斗能力。虽然装备简陋、装具沉重，但这些未經战火、沒有經驗的部队面对着久經战斗、服装輕便、装备灵巧的法軍，行动像老兵一样鎮定；只是由于奧軍指揮的极端无能和步調不一，才使这样的部队打了敗仗。但这是怎样的敗仗呢？敌人沒有得到战利品，沒有得到軍旗，几乎沒有得到火炮，也几乎沒有俘虏；敌人所繳获的唯一的軍旗是在戰場上尸体堆中撿来的，而未受伤的俘虏也只是意大利或匈牙利的逃兵。奧軍从普通兵到少校都获得了荣誉，而这个荣誉差不多完全屬於德意志奧地利人。意大利人是不能用的，他們大部分已被遣散，匈牙利人不是成群結队地投降，便是非常不可靠，克罗地亚人在这次战争比平时的表現坏得多^①。只有德意志奧地利人才完全有資格享受这个荣誉，尽管他們因为指揮不良而首先蒙受了耻辱。

这种指揮是道地的旧奧地利式的。居萊一人的无能所不能做的事，却由于权奸和弗兰茨-約瑟夫的在場而造成的指揮不統一所完成了。居萊向洛美利納进攻，剛一到卡薩勒-亚历山大里亚地区，便立即停止前进；結果进攻全部失敗。法軍毫无阻擋地和撒丁軍队会合了。为了充分表明他确已无能为力，居萊命令在蒙特貝洛附近进行偵察，就好像他預見想要表示，在軍事指揮上那种猜疑摸索和慎重考虑的旧奧地利精神至今仍然存在，犹如在已寿終正寢的宫廷軍事會議³⁷⁴时代一样。他把主动权完全让与敌人。他把自己的軍队由皮阿琴察一直摆到阿隆納，以便按照慣用的奧地

^① 参看“泰晤士报”記者自奧軍兵营发出的关于索尔費里諾会战的报道。在卡夫里阿諾，以志願者資格参战的老炮兵总司令努根特，曾尽一切力量派遣一些边屯营投入战斗，但枉費心机。

利方式，做到各地都有直接掩护。拉德茨基的傳統仅仅过了 10 年就被遺忘了。当敌人在帕勒斯特罗附近进攻的时候，奧軍各旅进入战斗如此緩慢和分散，以致每一个旅总是在其他旅还未到达以前便被逐出陣地。而且，当敌人真正进行机动（这一机动的可能性使洛美利納附近的整个陣地具有了一定的意义），即由韦尔切利向博法洛拉側敌行軍的时候，当终于有机会向諾瓦拉攻击，以阻止敌人这个大胆的机动，并利用敌人所处的不利态势的时候，居萊却惊惶失措，急忙回头渡过提契諾河，想繞一个弯从正面拦阻进攻的敌人。6 月 3 日晨 4 时，正在退却的时候，海斯到了罗察特的大本营。在維罗那重新恢复了的宮廷軍事會議，看来恰好在这个决定性时刻对居萊的能力发生了怀疑。因此，現在这里便出现了两个总司令。根据海斯的提議，所有纵队都停止不动，一直到他确信对諾瓦拉攻击的时机已經錯過而不得不让事态自然发展时为止。这其間几乎过了 5 小时之久，而部队的运动也中断了 5 小时。^① 在 6 月 4 日整整一天內，零零落落的纵队才陸續到达馬振塔，既疲倦又飢餓；但是他們仍然英勇作战并且获得了卓越的胜利，一直到麦克馬洪違反由土尔比哥直取米兰的命令，轉向馬振塔并襲击奧軍翼側时为止。这时，法国其余各軍都来到了，但奥地利各軍却迟迟不到，于是会战失敗了。奧軍的退却非常緩慢，以致有一个师在梅累尼亚諾遭到法国整整两个軍的攻击。其中一个旅抗击法国六个

① 参看“泰晤士报”駐奧軍的第一个記者布莱克利上尉的說明，他曾就这一事实在“泰晤士报”上做了报道。达姆斯塔德的“軍事总汇报”³⁷⁵替居萊辯护，說行軍中断 5 小时乃是由于一种从工作上考虑不能向外宣布的事件所致，不过不管居萊的意願如何，这一事件却决定了战斗的失利。但是，布莱克利已經說明了这个事件是什么。

旅，坚守这个据点达数小时之久，一直到损失了一半以上的人员以后才开始退却。最后，居莱被撤换了。军队由馬振塔繞过米兰沿一个大圆弧退却，但是仍然来得及比沿較短的弦运动的敌人先到达卡斯提奥涅与洛納托附近的陣地（对追击竟考虑得这样少！）。据说这个多年以来便为奥軍周密勘察过的陣地，好像是弗兰茨-約瑟夫亲自为他的部队选择的。事实上这个陣地早已列入四边要塞区的防御体系，是一个可以用反冲锋的方法进行防御的极好的陣地。在这里，奥地利军队终于与現在开来的或在这以前一直留作预备队的增援部队会合了。但是当敌人剛到达基澤河的西岸时，又立刻发出了退却的信号，于是军队退到了明乔河东面。这个行动剛結束，奥軍就又回头渡过这条明乔河，想从敌人手中夺回剛才自願让給敌人的陣地。奥地利军队就是在这种 *ordre, contre-ordre, désordre* [朝令夕改、一片混乱] 的情况下，在对最高統帅已失去信任的情况下在索尔費里諾进入战斗的。这是一场混乱的厮杀；無論在法軍方面或者在奥軍方面，都談不上战术的指导。奥地利將軍們的較严重的庸碌无能、惊惶失措和怕負責任的情况，法軍师、旅长們的較坚强的信心，以及法軍所固有的并在阿尔及利亚达到了完善地步的那种成散开队形和在居民点作战的优越性，——这一切正是使奥軍最后被逐出戰場的原因。于是，战争便結束了。有誰能比可怜的奥尔格斯先生更欢欣若狂呢？他的責任就是用一切方法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夸奖奥軍的最高統帅，而且用一些明智的战略理由为他的行动辯解。

路易-拿破侖也完全滿意了。馬振塔和索尔費里諾会战給与他的荣誉虽然不算很大，但已經比他有权期望得到的为多了；并且在險恶的四要塞之間，奥軍不再由于自己將軍的无能而挨打的时

刻总是会到来的。此外，普魯士也进行了动员，而无论是法国在萊茵的軍团，或者是俄国軍队都沒有作战准备。简单地說，在直至亚得利亚海的地区內建立自由意大利的想法被放棄了。路易-拿破侖提議媾和，于是签订了維拉弗兰卡条約。法国沒有得到一寸土地；它把割让給它的倫巴第慷慨地贈給了皮蒙特；它是为了观念而战，它怎么能考虑萊茵疆界呢！

在这时候，中意大利暂时并入皮蒙特，北意大利王国成为当时頗为可观的力量。

意大利本土旧有各省和撒丁島共有人口.....	4 730 500 人
倫巴第(曼都亚除外).....	約 2 651 700 人
托斯卡納.....	1 719 900 人
帕尔馬与摩地那.....	1 090 900 人
罗曼尼亚(博洛尼亚、費拉拉、腊万納与佛利).....	1 058 800 人
<hr/>	
共 計(根据 1848 年資料).....	11 251 800 人

国家的面积由 1 373 平方德里^①增加到 2 684 平方德里。因此，如果北意大利王国最后能建成，它就可能是头等的意大利国家。除它以外，剩下的只有：

威尼斯.....	2 452 900 人
那不勒斯.....	8 517 600 人
教皇国的其余部分.....	2 235 600 人
<hr/>	
共 計.....	13 206 100 人

因此，仅仅北意大利拥有的人口就相当于意大利其余各地区人口的总和。根据財政和軍事力量以及居民的文明程度，这样一

① 1 德里等于 7 420 米。——編者注

个国家在欧洲可以要求取得高于西班牙而仅次于普鲁士的地位，而且，因为它确信意大利其余各地对它日益增长的同情，所以它无疑是会要求这个地位的。

但这却不是波拿巴政策所希望的。法国大声疾呼地宣称，它现在不能容许，并且将来也不会容许意大利统一。法国人把意大利的独立和自由理解为在波拿巴庇护下以教皇为名誉首脑的意大利的莱茵联邦之类的东西，理解为以法国霸权代替奥地利霸权。同时，在中意大利建立厄特鲁里亚王国，即为日罗姆·波拿巴的继承者建立意大利的威斯特伐里亚王国³⁷⁶ 这种善良的想法也流传开来了。但是北意大利王国的团结把所有这一切计划都打破了。junior [小] 日罗姆·波拿巴在周游各公国时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甚至连一张选票也没有得到；建立波拿巴主义的厄特鲁里亚，和复辟一样，都是不可能的；除了并入皮蒙特以外，别无他法。³⁷⁷

但是，随着北意大利统一的不可避免性的日益明显，法国进行这次战争所追求的“观念”也就更为明确了。这就是把萨瓦和尼斯并入法国的观念。还在战争期间，便已经发出了种种呼声，指出这种合并是法国干预意大利事务的代价。但是没有人听。难道维拉弗兰卡条约不是驳倒了这种说法吗？虽然如此，全世界还是突然得知：在 *rè galantuomo* [温雅的国王]^① 的民族的和立宪的制度下，两个法国省在外国的统治下呻吟，这两个只是由于粗暴的力量才离开了祖国的法国省，以充满泪水和期望的双眼凝视着伟大的祖国；路易-拿破仑再不能对于由尼斯和萨瓦发出的绝望呼号充耳不闻了。

① 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编者注

無論如何現在已經非常清楚，尼斯和薩瓦是路易-拿破侖同意威尼斯和倫巴第歸并于皮蒙特而要求的代價，他所以要求以這個為代價而同意中意大利并入皮蒙特，是因為目前不能取得威尼斯。現在，波拿巴在尼斯和薩瓦的代理人開始玩弄無恥的手腕，被收買的巴黎報紙也開始叫囂說，皮蒙特政府在这些省份中壓制大聲疾呼地要求與法國合併的人民的意志。現在，在巴黎竟有人公開地說，阿爾卑斯山是法國的自然疆界，法國有權占有這些山脈。

二

如果法国报纸說，薩瓦在語言上和風俗上和法国接近，那末这种說法至少用于瑞士法語区、比利时瓦倫区以及拉芒什海峡的英屬諾曼底群島也是同样正确的。薩瓦人民讲的是南法兰西方言；受过教育的人所使用的語言和标准語到处都是法語。意大利語的成分在薩瓦是如此之少，以致法兰西民間語（即南法兰西或普罗凡斯民間語）甚至越过阿尔卑斯山滲入皮蒙特直到多腊-里帕里亚河和多腊-巴尔特亚河上游地区。虽然如此，在战前並沒有听到过任何同情并入法国的說法。只是在同法国有某些貿易来往的下薩瓦的个别人中間偶尔有过这样的想法；这种想法，对当地广大居民來說，就像在其他所有与法国接壤而操法語的地区一样，是毫不相干的。总之，值得注意的是，在1792年到1812年期間曾受法国統治的那些地区中，沒有一个有絲毫想要回到法国鷹的卵翼之下的願望。虽然它們已尝到了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果实，但是它們极端厌恶严格的集权統治、地方长官的管轄以及巴黎派来的文明傳教师永无过錯的說教。七月革命和二月革命重新喚起了人們对于法国的同情，但是波拿巴主义立刻又断送了这种同情。誰也不願意輸入拉姆別薩、凱恩和 loi des suspects³⁷⁸。此外，法国对一切进口貿易几乎都采取了中国式的閉关自守政策，这一点在边境地区感到特別厉害。第一共和国在各个边境地区遇到的都是被压迫的、民生凋蔽的省份，都是四分五裂的、被剝夺了普通的自然利益的民

族，它使这些省份和民族的农村居民得到了解放，使那里的农业、商业和工业得到了振兴。但是第二帝国在各个边境地区所碰到的情况，却是那里原来享有的自由比它所能给与的自由还要多；它在德国和意大利所碰到的是强烈的民族感情；在各个小国内所碰到的是結合在一起的个别的利益，在这工业发展非常迅速的45年中，这种利益增长了，并且在各方面都和世界貿易交織在一起。除了羅馬凱撒时代的专制統治，除了把商业和工业关闭在它那关税壁垒的大牢獄之内，第二帝国沒有給它們带来任何东西，最多不过是給它們一个可以自願滾开的权利。

薩瓦与皮蒙特被阿尔卑斯山主脉隔开，因而薩瓦所需要的一切物資差不多都是从北面的日内瓦和部分地从里昂取得的，正如位于阿尔卑斯山山口以南的德森州仰賴于威尼斯和热那亚一样。即使这种情形是使薩瓦和皮蒙特分离的理由，但无论如何不能成为薩瓦并入法国的理由，因为薩瓦的商业主要仰賴于日内瓦。这不仅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緣故，而且也是法国的关税立法过于聪明和法国海关吹毛求疵的結果。

但是，尽管种族上血統亲近、語言上有共同性，并且还有阿尔卑斯山脉，但是薩瓦居民似乎沒有半点願望想要人家用偉大的法兰西祖国的各种帝制設施去为他們造福。他們有一种傳統的意識：不是意大利征服了薩瓦，而是薩瓦征服了皮蒙特。当时，全省强悍的山民以下薩瓦为中心，联合起来組成了一个国家，后来又下山进入意大利平原，采用各种軍事和政治措施，依次兼并了皮蒙特、蒙費拉托、尼斯、洛美利納、撒丁和热那亚。这个王朝建都于都灵，成为意大利王朝，但是薩瓦仍然是这个国家的发源地，并且薩瓦的十字徽号到現在还是由尼斯到里米尼、由桑德里奧到錫耶納

的北意大利的国徽。法国在 1792—1794 年的战争中征服了薩瓦，在 1814 年以前，該地被称为 Département du Mont-Blanc [芒勃朗省]。但是在 1814 年，它根本不想再成为法国的領土了；当时唯一的问题是：并入瑞士呢，还是与皮蒙特恢复旧关系。虽然如此，这个省仍然是法国的，一直到“百日”³⁷⁹ 終了时为止；后来，它被归还給皮蒙特。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历史傳統逐渐减弱了；薩瓦不被注意了，而皮蒙特的意大利各省却获得了压倒一切的意义；皮蒙特的政策愈来愈着重于关心东方和南方。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立主义傾向表现得最多的仍是那个自命为历史傳統的特权代表的阶级——旧的、保守的、教皇至上主义的貴族；当旧的寡头政治的貴族制度还在瑞士居于統治地位时，这个阶级一直企图使薩瓦并入瑞士；只是从瑞士普遍施行民主制时起，他們这种企图看来才改变了方向；在路易-拿破侖統治之下，法国已变成了极其反动的、教皇至上主义的国家，因此它就成了薩瓦貴族逃避革命的皮蒙特政策的避难所。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根本不存在任何想要使薩瓦与皮蒙特分离的要求。在薩瓦的上部地区，即在莫里延、塔兰特茲和上薩瓦，居民坚决主張維持 status quo [現狀]。在热涅維、佛西尼和沙布累，如果什么时候有必要变动时，居民宁願并入瑞士。只是在下薩瓦的某些地方，以及在全省的反动貴族中間，有人发出贊成并入法国的呼声。但是这种呼声是这样微弱，甚至在莎姆伯里絕大多数的居民都坚决表示反对，連反动貴族（見科斯塔·德·波勒加尔的宣言）也不敢承认他們同情这种呼声。

这便是关于薩瓦民族成分和民意的全部情形。

那末，从問題的軍事方面来看，情形怎样呢？占有薩瓦对于皮

蒙特有什么战略上的利益，而对于法国又有什么利益？薩瓦轉入他人之手，对毗邻的第三个国家——瑞士又有什么影响呢？

由巴塞尔到布里昂松，法国的疆界形成一个凹度很大的大圆弧；瑞士的很大一部分和薩瓦的全部都在这里嵌入法国疆界。如果我们在这个圆弧上作一弦，那末为它所切断的这一块弓形地将几乎完全为瑞士法語区和薩瓦所填满。如果法国的疆界推进到这个弦上，那末从洛特布尔到弗列茹斯的一段疆界便会形成一条像从洛特布尔到敦克尔克那样的直綫，不过这条綫在防御上具有与洛特布尔—敦克尔克綫完全不同的意义。北部疆界仍然是完全暴露的，而东部疆界的北段則有萊茵河作掩护，南段則有阿尔卑斯山作掩护。事实上，在巴塞尔和勃朗峰之間的那段疆界，沒有一处是用自然界綫划分的；正确些說，这里的“自然疆界”是沿着到埃克留斯堡垒的汝拉山脉这一条綫走的，从那里起再經過阿尔卑斯山支脉，这些支脉从勃朗峰向南延伸，环繞阿尔夫河谷，最后也伸展到埃克留斯堡垒附近为止。不过，如果自然疆界成为一个凹形的圆弧，那末它便不能完成它的任务，因此也就不再是自然疆界了。既然如此不自然地使我們的疆界向里弯进去的这个凹曲的弓形地带的居民在“語言、風俗和文化”方面說来又都是法国人，那末难道就不应当改正自然界所造成的錯誤，实际上恢复理論所要求的外凸形状或者至少使它成为一条直綫嗎？难道住在自然疆界那一边的法国人就应当作为 *lusus naturae*〔自然界恶作剧〕的牺牲品嗎？

这种种波拿巴主义的理由不是沒有任何意义的，在兼并的阴谋沒有彻底失敗以前一直接二連三地实行兼并的第一帝国已經证实了这一点。最完善的疆界也有可以修正和改善的缺陷；如果不是需要节制一下的話，这种兼并可以无止境地繼續下去。至少从

上述論据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無論从民族成分方面或者从法国的軍事利益方面來說，为吞并薩瓦而制造的一切說法，实际上也同样适用于瑞士法語区。

由田达山口向北北西方向延伸的阿尔卑斯山脉，在很像皮蒙特、薩瓦和法国三国边界上的界桩的蒙塔博尔山整个轉向北北东，而在皮蒙特、薩瓦和瑞士三国交界处热安峰更向东偏折。所以，要想使阿尔卑斯山脉成为法国由蒙塔博尔山到热安峰的自然疆界，就只有使这一疆界从热安峰成一直綫直达巴塞尔。換句話說，就是使薩瓦并入法国的要求內包含着兼并瑞士法語区的要求。

在阿尔卑斯山主脉形成两国目前疆界的这整个地段上，总共只有一条石鋪的山道——蒙热涅夫尔。除此以外，还有达尔仁特腊山口，这个山口由巴尔塞洛內特通至斯图腊河谷，这里可以通行炮兵；另外可能还有一些騾馬道，这些道路稍事修补，便可以通过各种兵器。但是，因为薩瓦和尼斯各有两条石鋪山道穿过阿尔卑斯山主脉，所以任何一支进攻的法国軍隊，如果还没有控制这两个省，至少要先占領其中的一条山道，才能越过阿尔卑斯山。不仅如此，如果法国进攻，出蒙热涅夫尔山口只能保证对都灵的直接攻击，而薩瓦的两个山口——蒙塞尼，特别是小圣伯納德却造成側击的可能。对于进攻的意大利軍隊來說，經由蒙热涅夫尔山口去攻击法国的心臟必須进行很大的迂迴运动，而通过蒙塞尼山口却有由都灵去巴黎的大道。因此，任何一个統帅都不会想到把蒙热涅夫尔山口作别的用途，除非是把它用作輔助纵队的通路，然而主要的作战綫則一定要通过薩瓦。

所以，占有薩瓦，首先就会使法国获得一个进攻意大利时必不可少的地区，不然，它就得預先夺取它。采取守势的意大利軍隊当

然任何时候也不会为了保卫薩瓦而进行决战，但是他們可以用积极的山地战和破坏道路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把敌人的进攻牵制在阿尔克河和伊澤尔河上游河谷（蒙塞尼大道和圣伯納德大道正經過这里），然后凭借封鎖山道的堡垒，在阿尔卑斯山主脉的北坡再据守一些时候。在这里，就像在一般的山地战中一样，当然談不到絕对的防守；决战将拖到敌人冲下平原时进行。但是，这**无疑将保证贏得時間**，这对集中兵力进行大会战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于像意大利这样一个狭长而缺乏铁路的国家（和密集地布满良好的战略铁路网的法国来比較），这一点特別重要。如果法国在战前就已占有薩瓦，意大利**无疑会失掉这段時間**。意大利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单独与法国作战；如果它在将来有同盟者的話，那末两軍在薩瓦可能势均力敌。这样一来，阿尔卑斯山脉的爭夺战将具有持久的性质；在最坏の場合，意軍总能在山脉的北坡支持一段時間，如果北坡失守，它就会与法軍爭夺南坡，因为只有控制了这两面山坡并越过山脉，才能成为山脉的主人。但是，进攻者是否有力量和决心在平地上追击防御者，这就非常值得怀疑了。

1792—1795年間在薩瓦进行的各次战局便是这种持久的山地战的例子，当时双方的軍事行动都拖沓、犹豫和沒有信心。

1792年9月21日，孟德斯鳩將軍侵入薩瓦。防守該地的1万名撒丁軍隊以当时慣用的方法分散为极长的哨兵綫，以致他們在任何地方都不能集中足够的兵力进行抵抗。莎姆伯里和蒙美利安被占領，法軍迅速地沿山谷一直挺进到阿尔卑斯山主脉的山麓。当时山岭还完全在撒丁軍隊手中，他們于1793年8月15日經過几次小战斗后，即在戈登將軍指揮下轉入进攻，当时法軍因派遣部队圍攻里昂而被削弱，被他們从阿尔克河和伊澤尔河谷地赶回蒙美

利安。被击败的法军纵队在这里同他们的预备队会合。凯勒曼从里昂折回，立即（在9月11日）转入进攻，没有遇到很大困难又把撒丁军队击退到阿尔卑斯山的山口；不过他的力量也因此而用尽了，于是他到了山麓附近就不得不停止前进。但是，1794年阿尔卑斯军团增加到75 000人，而与之对抗的皮蒙特军队则只有4万人，此外大概还有一支未担负任务的由1万名奥地利人组成的预备队。虽然如此，法军起初的攻击，无论在小圣伯纳德山口或者在蒙塞尼山口，都没有成功，直到4月23日法军才终于占领了圣伯纳德，5月14日才占领了蒙塞尼山口，于是整个山岭才落入法军之手。

总之，为了在山这面从皮蒙特军手里夺得进入意大利的通道，法军曾不得不进行三次战局。如果说在目前条件下已不可能在这种有限的地区内在几次战局中这样毫无效果地作战，那末在双方兵力处于一定的均势的情况下，法军不仅将难以强行通过阿尔卑斯山山口，而且也将难以保留充分的兵力，以便迅速冲到平原。虽然萨瓦不能给意大利更多的贡献，但是这一点也已经足够了。

反过来说，我们假定萨瓦与法国合并。那时意大利的处境将怎样呢？阿尔卑斯山的北坡在法军手中，意军只能够防守南坡，法军却可以从高高的山顶上瞰制南坡的堡垒和意军的阵地，或者至少可以监视它们，在大多数场合，甚至可以在距离很近的地方对它们进行迂回。这样，山地防御便成了意军最后的、最软弱的、而且可能引起重大伤亡的行动。萨瓦山地战所能提供的那种进行侦察的可能性也就完全没有了。但还不仅如此。法国在夺取萨瓦以前，它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以此为满足，从而迫使意大利采取消极防御；得到一定的结果后，它可以把军队更好地用到其他地方去；不把过

多的兵力放在这个战场上，对法国是有利的。相反，如果薩瓦完全成为法国的一个省，那末按法国方式进行攻势防御是有利的。消极防御在整个战局过程中造成的人员牺牲会和进攻意大利时同样的多；进攻所需的兵力多不了多少，而前途却完全两样！

在兼并薩瓦后的第二天，法国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将进入阿尔克河和伊澤尔河的河谷，探索偏谷，翻山越岭，讯问最好的阿尔卑斯山的向导，丈量距离，测繪地形，詳細地记录一切情况；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出于旅行者偶然的兴会，而是根据既定的，也許是現在就已經准备好的计划进行的。随着这些军官的到来，很快就会出现工程师和承包商；经过一段很短的时间，在这些高山中最僻靜的深处，将会敷設道路，建筑石质工事，不管是当地的居民或偶然的旅行者大概都不能說出它們的用途来。它們既不是为当地农民而修，也不是为旅行者而建，它們的目的仅在于使薩瓦天然的战略特性臻于完善。

蒙塞尼山口和蒙热涅夫尔山口一样，都是通往苏扎的。如果这两个山口的南坡受到法軍攻击，防守山口的意大利部队就会陷入真正的陷阱。他們无法知道，主攻将来自何方；但是，他們預先知道，如果法軍强行通过其中的一个山口并占領苏扎，那末防守另一个山口的部队将被截断后路。如果蒙塞尼山口首先被强行通过，那末防守蒙热涅夫尔山口的部队还可以由山徑避入費涅斯特雷利谷地而仅仅損失其馬匹、火炮和輜重；但是如果进攻者通过蒙热涅夫尔山口进入苏扎，那末蒙塞尼山口的守軍就会丧失一切退却的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两个山口的防御就只限于采取简单的佯动。同时，构成法軍的两条作战綫的两条道路，即由格勒諾布尔到布里昂松和由莎姆伯里到兰列布尔的两条大道，大致上是

平行的，中間只隔着一條起自蒙塔博爾山的密布着許多人行山道和騾馬道的山脈。只要在這個山脈上修築一條4德里長的橫貫道路，法軍便能夠随心所欲地把兵力由這條大道調到那一條大道；這樣，陷阱就將發揮更大的作用，阿爾卑斯山戰綫為對付來自意大利的進攻而進行的防禦在這一邊也將會格外加強。

其次，在薩瓦還有一個通過阿爾卑斯山的山口——小聖伯納德。法國許多權威人士都斷言，如果拿破侖在跨越阿爾卑斯山時所選擇的山口不是大聖伯納德而是小聖伯納德，那也許要更正確一些，因為小聖伯納德比較低，因此春季融雪較早，並且一般比較容易通過。由里昂和伯桑松出動的法軍縱隊至少可以同樣容易地在阿爾貝維耳和洛桑會合；這兩個山口又都可以通往阿奧斯塔和伊符雷。關於究竟哪一個山口對於拿破侖在1800年的戰局更有利這個問題竟能引起爭論，這一事實本身就已經證明，小聖伯納德山口在軍事上多么重要。當然，要想使小聖伯納德山口能夠用來重復以前在馬連峨進行過的那種戰略的迂迴運動，必須有完全特殊的條件。在現代戰爭中，作戰的兵力要巨大得多，排成一個縱隊任何時候都不可能越過阿爾卑斯山；在我們時代，誰敢用3萬人的縱隊去進行迂迴運動，在大多數場合無異是自取滅亡。對於第一次或第二次戰局說來，這都是正確的。但是，當雙方頑強進行的一切戰爭由於出現了現代的要塞群和營壘而具有另一種性質——持久性的時候，當雙方的力量沒有被一連串的戰局逐漸消耗殆盡，戰爭的結局就不能最後決定的時候，軍隊的人數最後就會愈來愈少。假定說，戰爭在北意大利平原上進行數年之久而雙方互有勝負；這時已占領了卡薩勒或者亞歷山大里亞，或者把兩個城市全都占領了的法軍，後來又被逐回阿爾卑斯山那邊；在這裡雙方兵力都已

大大削弱，那他們就会停止行动。但是，在現代，在有铁路网以及到处都已把火炮的重量減輕了的情况下，通过小圣伯納德山口把3—4万或者更多的軍队調到伊符雷去，难道还会費很大的事嗎？法軍可以由伊符雷开向他們平原上的筑垒基地，他們在那里可以得到必需的一切，并且可以从守备部队中得到补充；如果这是不可能的話，那末即使更强大的敵軍部队也不能把他們通往都灵的道路和通过这两个最近的山口的退路截断。那时，上述的3—4万軍队加上守备部队便会形成相当可观的力量；在最坏の場合也可以先击退当面的敵軍，然后在自己营垒周圍作战，并且有很大的希望获得胜利。我們只要回忆一下到1814年时軍队縮減得多么厉害，而拿破侖在这一年又以怎样少的兵力获得了怎样大的战果，这就可以明白了。

如上所述，通往圣伯納德山口的大道是沿着伊澤尔河谷走的，而通往蒙塞尼山口的大道則是沿着阿尔克河谷走的。这两条河流都发源于蒙特伊澤兰山口附近。在布尔克-圣莫里斯上方，通往圣伯納德山口的大道离开河流而越过山岭，而狹谷（廷恩谷地）則往右轉向南逐漸升高。在兰列布尔下方，即特尔米尼昂附近，有一小偏谷（圣巴特耳米谷地）伸入阿尔克河谷。自廷恩谷地起，有三条小道經過蒙特伊澤兰山口与蒙沙弗卡列之間的山岭通往圣巴特耳米谷地。这三条小道中有一条完全可以鋪成石路。如果在这里敷設一条道路，同上述的橫貫道路联結起来，薩瓦——作为法国边境的一省——的战略道路网就相当发达了。如果在阿尔卑斯山主脉后面直接有一条道路連結三个主要山口，就可以在两天內把主力部队从圣伯納德和蒙热涅夫尔調到蒙塞尼地区，并在四五天内从这一翼調到另一翼。如果再在这个道路网上加上两条道路：一条

从穆蒂埃经过普罗洛尼恩的山口到圣巴特耳米和兰列布尔，一条从穆蒂埃到圣让德莫里延，那就很难再增加什么了。留下的事情仅仅是为了加强（但不是为了完全阻塞）而构筑一些必要的工事，并保护作为中央基地的主要道路交叉点穆蒂埃不受强大敌人的攻击。在这里，问题只在于铺设不到 25 德里的新道路。

如果这些道路或类似的道路修成了的话——毫无疑问，法国总参谋部已经有了在战略上充分利用萨瓦的现成计划，——阿尔卑斯山南坡的防御将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如果有这样的道路网使得新的勒库尔布能够调动他的军队，那末他凭借着筑有工事的中央基地和小堡垒，在防御的情况下能够打出怎样出色的仗来呢？还是不要说，山地战在我们现代军队庞大的条件下已不再是可能的了。只有在军队真正庞大和决定的优势在某一方时，这种提法一般说来才是正确的。但是，在夺取现代要塞时，军队在数量上将受到相当大的损失，而优势为均势所代替的情形也会经常出现。当然，没有必要是不会进入山地的，但由巴黎到意大利或者由意大利到巴黎的道路总是要通过萨瓦或者瓦里斯的。

总而言之，萨瓦由于它的地理位置，特别是由于它那些通过阿尔卑斯山的山口，如作为法国的一个省，能够使法军甚至在数量优势不大的情况下占领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境内的山坡，并向谷地出击，因而会发挥比本身力量大得多的作用。如果在战场上事先构筑一些工事，法军就会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即使在其他方面完全处于均势，他们也能够立即取得对敌人的优势；不仅如此，小圣伯纳德山口还会迫使意军向很远的地方派出掩护部队，那时法军在某些情况下就可以利用这个山口进行决定性的攻击。

萨瓦在法国手中，与在意大利手中相反，只能成为进攻的武器。

那末，从瑞士的利益来看，情形怎样呢？

在現在的形势下，瑞士的一切邻国只能从正面进攻它。在这里，我們把不包括奥地利的南德意志看作一个邻国，而把奥地利看作另一个邻国，因为我們剛才已經看到，这两个国家并不总是一定采取一致行动的。南德意志只能沿巴塞尔到康斯坦茨的方向进攻，奥地利只能沿兰涅克到閔斯德一綫进攻，意大利只能沿波思基亚伏到日内瓦的方向进攻，而法国也只能沿日内瓦到巴塞尔一綫进攻。瑞士軍队的退却綫到处都是在正面之后，与正面垂直；而与瑞士接壤的中立国家的領土到处都或多或少地掩护着它的翼側。因而，如果只有一个邻国进攻瑞士，那末在战斗开始之前，是无法进行战略迂迴的。只有奥地利在格劳宾登州附近占有側击之利，但是，即使不是这样，瑞士軍队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再在格劳宾登州附近进行决战来回击奥軍的进攻，而会在更靠西北方，在阿尔卑斯山麓进行决战。奥地利放棄了倫巴第，就使瑞士的这种有利形势变得更加有利；無論如何，在去年以前，奥地利本来有可能对瑞士的西南部进行向心进攻，这种可能性在山地的条件下而且在敌人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往往是不可忽視的。但是，这样一种进攻的威胁也只限于格劳宾登、德森、烏利和格拉魯斯諸州，就是說只限于人口最稀少而又极为貧困的这部分地区。此外，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敌人由意大利来的道路不得不越过哥达山口，他們的兵力就必然会大为分散。諸邻国目前这种对瑞士有利的配置，对瑞士來說具有比欧洲保证中立还要大的价值。这样一种配置使瑞士在受到一个邻国的进攻时，能够长期支持战斗，而这一点归根到底是这样一个小国所能指望的唯一的東西。

如果薩瓦屬於法国或者为法軍所占領，那就談不上保卫由伯

尔尼汝拉山脉到下瓦里斯的整个瑞士法语区了。那时，日内瓦可能在一昼夜之内变成法军的基地；汝拉山脉如同策勒河到纽沙特尔湖和比尔湖防线一样，都是可以绕过的；法军将用不着在狭谷中作战，然后强行通过位于这两湖之间并穿过大沼泽的狭道，他们可以安然地通过瓦得州富庶的丘陵地区进行迂回，于是进行真正抵抗的第一道障地也就会成为在伯尔尼之前、萨涅河和森泽河之后进行第一次大会战的障地，因为由萨瓦经过维耳訥夫和斐维进行迂回的纵队将使在瓦得州进行的一切抵抗毫无作用。

截至目前为止，汝拉山仍是瑞士对付法国的第一道防线，对缺少经验但熟悉地形并有居民援助的民兵来说，这是一个出色的战场。但是由于蜿蜒曲折的国境线常常横断汝拉山的平行山脉，所以也不能够过分看重它。第二道更为重要的防线是策勒河，策勒河连接纽沙特尔湖和比尔湖并由比尔湖流入阿勒河。这道防线在右方为阿勒河下游所补充，左方为奥尔勃河所补充；后者在伊韦尔登附近流入纽沙特尔湖上端。策勒河在这两湖之间的长度仅半德里，而由比尔湖到阿勒河的长度也只是一德里。实际上，这个障地的正面仅在这两个湖之间；它为低洼地上的大沼泽所加强，因为这个大沼泽由纽沙特尔湖扩展到阿尔堡，而且只有沿大道才可以通过。当敌军从右翼经过比尔格伦迂回这个正面时，可以用预备队在阿尔堡附近将其击退。更为深入的迂回则须要在阿勒河上架设桥梁，而且迂回者的交通线也会受到威胁。从左翼的迂回只有经过瓦得才可能实现，并且会依次遇到奥尔勃河、曼丘河、布鲁阿河等障碍。瑞士军队在这一线上的抵抗也不可能被敌人沿日内瓦湖向弗里布尔进行的迂回所粉碎，因为沿纽沙特尔湖退却的瑞士军队总是掌握有较短的道路。因此，虽然只有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

在敌人犯了很大錯誤的条件下，策勒河上的障地才适于进行决战，但是它仍然能够滿足瑞士对它的一切要求：它能使瑞士阻滯敌人，甚至能使瑞士从西南部抽調出部队来。

但是，如果薩瓦掌握在敌人手中，由圣让哥尔弗經過維耳訥夫和夏特耳-圣德尼进攻的纵队就将使得在瓦得州进行的一切抵抗毫无作用，因为这个纵队既然到达斐維附近，它距弗里布尔的距离就差不多只比奥尔勃河上的瑞士軍隊距弗里布尔的距离远 2 德里，因此能够截断他們的退路。由圣让哥尔弗到弗里布尔約 12 德里；弗里布尔处在两湖之間的策勒河障地左后方約一天行程的地方，距彼得林根(佩埃恩) 3 德里，通过瓦得前进的法軍纵队和薩瓦部队可能在彼得林根会合。因此，进攻者如占有薩瓦，便能够在三四天内通过罗尼河谷截断瑞士軍隊与瓦里斯的交通，夺取日内瓦、瓦得和弗里布尔直到薩涅河一带，而且主力能直搗策勒河障地的后方，于是巴塞尔、左洛图恩、伯尔尼汝拉山脉和紐沙特尔便会落到他們手中。这些地方絕不是荒无人烟的高山地区，恰恰都是瑞士最富庶、工业最发达的州。

因为瑞士感觉到薩瓦在战略上对它的压力非常大，所以它在 1814 年便完成了它的北部地区的有名的中立化，而在 1816 年又从撒丁取得条約的許諾：沙布累、佛西尼和热涅維除瑞士以外将不让与其他任何国家。因此路易-拿破侖到处放出風声，說他仅仅要求得到薩瓦的南部，而沙布累、佛西尼和到伊斯河畔为止的热涅維的一部分应归屬于瑞士。但是要礼尚往来，据“泰晤士报”消息，他正利用福格特先生順便詢問一下瑞士州議會，問它是否同意因此而赋予他自由支配辛普朗山口的权利。这是第一次暗示說：辛普朗也是法国的一个自然界桩，正像它在第一帝国时代真的曾經是

法国的界桩一样。

假定說瑞士多了一个新的州——北薩瓦，那末，疆界就会由在勃朗峰和小圣伯納德山口之間离开阿尔卑斯山主脉而通向罗尼河峡谷(埃克留斯堡垒)的那条山岭所形成，而且，看来这条疆界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这个山岭却为来自伊澤尔河谷与罗尼河谷的下列道路所截断：(1)塞塞耳—日内瓦道路，(2)安訥西—日内瓦道路，(3)安訥西—崩維耳道路，(4)阿尔貝維耳—薩兰什道路。崩維耳和薩兰什一样，都有道路經過阿尔夫河谷的北面山岭通往托农。因此，瑞士是毫无屏障来阻擋对日内瓦湖南岸的托农的入侵的，并且因为由塞塞耳或者阿尔貝維耳到托农不超过 15 德里，所以占有北薩瓦，最多只能使瑞士多防御 5 天。但是因为对于这个新州的防御除了民团以外再不能派出什么部队，所以进攻的纵队也同样可以成功地由日内瓦直扑托农(5 德里)，而由这里去圣让哥尔弗仅約 4 德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北薩瓦只能使瑞士赢得仅仅 3 天的時間。况且，这只能使瑞士分散防御力量。受法国攻击的瑞士军队的退路，显然是沿低洼地区經過伯尔尼的这——路綫，在那里如有可能就沿阿勒河到苏黎世，不然便是到琉森，然后由这两地进入莱茵河上游谷地。因此，瑞士军队不应当把他們的陣地向南推移得过远，以免被敌人赶出这些防綫而逼进高山地区。我們已經看到，把瓦得州包括到瑞士的防御体系中还比較容易，但北薩瓦和因薩瓦不复中立而被暴露出来的瓦里斯肯定是不能够包括在这一体系中的。但是，大家知道，在这个以民兵担任防御的联邦制国家里，一旦遭到威胁时，每个公民都会多么强烈地希望保卫自己的乡土。显然，如果整个整个的城市和州毫无抵抗就让給敌人，军队就会抱怨，国民院議員就要大声疾呼，何况这还是

瑞士专门为了自己的防御而取得的一个新州呢！在总参谋部里，每个人都会竭力设法特别有效地保卫自己的疆土，而在民兵中，由于受平时那种无所谓的温和态度的影响，纪律至少也是很松弛的，所以官长将很难维持部队的秩序。可以断定，在这种情况下，官长十次有九次会犹豫不决，或者不得不忍让妥协。因此，占领北萨瓦的部队，将不会对防御有什么好处，而在退却之际还一定会吃尽苦头，其中有一部分会被驱逐到瓦里斯，在那里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通过格米或者富尔卡的山岭重新和主力军会合。

对瑞士来说，唯一的保证就是北萨瓦既不属于法国也不属于瑞士；在这种情况下，北萨瓦在战时就能对于两国切实保守中立，而实际上却掩护了瑞士。如果它属于瑞士，那对于瑞士来说并不比它属于法国要好多少。萨瓦的意义只在于使瑞士赢得3天至多5天的时间，但是这些时间大部分将会在以后防御瓦得州时失去。这与肯定敌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够在巴塞尔和日内瓦湖之间进攻比较起来，还有什么价值呢？

北萨瓦对瑞士来说等于丹璫人的礼物³⁸⁰。不仅如此，这种礼物还包藏着一种威胁。在这种场合下，法国将在军事上控制整个瑞士法语区，使它无法进行任何积极的防御。法国兼并南萨瓦以后，就会立刻提出把瑞士法语区也归并于它的要求。

三

大家知道，伯爵領地尼斯位于濱海阿尔卑斯山麓，它和热那亚省的疆界，通过切尔沃河附近的奥涅利亚以东一德里处向下一直伸到海边。尼斯西部操普罗凡斯方言，东部，即卢艾亚河东岸地区，则操意大利方言。但是除瓦尔河上一些村庄以外，标准語到处都是意大利語，只是在尼斯城里，由于外国人大量流入，法語和意大利語才不相上下。

为了正确地研究民族成分問題，我們必須了解一下阿尔卑斯山脉西部地区各种語言的相互关系。

在阿尔卑斯山脉一带，凡是意大利語和其他語言交錯的地方，意大利語总是处于劣势。它沒有滲入阿尔卑斯山脉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格劳宾登和提罗耳的罗曼方言完全与意大利語无关。相反，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南，一切边缘地区的語言却夺取了意大利語的地盘。在威尼斯省的西部山区烏迪訥，說的是克萊納—斯洛文尼亚語。在提罗耳，德語的成分在整个南坡和艾契河上游谷地占統治地位；更向南，在意大利語地区的中部，只有 Sette comuni 和 Tredici comuni³⁸¹ 是孤島般的德語区；格里斯山南麓、德森的卡維爾諾谷地、皮蒙特的福尔馬察谷地、辛普朗山麓附近的上迪韦德罗谷地，最后，还有玫瑰峰的整个东南坡、利斯、上塞齐亚和安察斯卡等谷地，都說德語。法語的疆界起自利斯谷地，包括整个阿奧斯塔谷地和从蒙塞尼起的科特阿尔卑斯山的东坡，因此，一般都认为，

波河上游所有河流都发源于法語区。通常认为，这个疆界是由德蒙特(斯图腊河畔)起，即田达山口稍西的地方起，到卢艾亚河并且沿卢艾亚河直到海边。

关于德語或斯拉夫民間語与意大利語之間的界限的問題，是不会引起什么怀疑的。但是如果两种罗曼語相遇，而且它們既不是意大利标准語即 *il vero toscano* [真正的托斯卡納語]，也不是北法兰西受过教育的人的語言，而是意大利語的皮蒙特方言和行吟詩人所使用的已經衰落了、变成无数种方言的南法兰西語(为了簡便起見，我們用一个不太确切但却是通用的叫法——普罗凡斯語——来称呼它)，那末問題就不同了。無論誰，只要他哪怕是肤淺地研究过罗曼語比較語法或者普罗凡斯文学，都一定会立即看出，倫巴第民間語和皮蒙特民間語与普罗凡斯語非常近似。固然，在倫巴第語中，这种类似处仅仅限于方言的外形，例如：阳性元音詞尾要省略，而阴性詞尾在单数中仍然保留；同样，大部分元音詞尾在变位时使这种語言带有普罗凡斯語的性质，而鼻音 <n> 以及 <u> 和 <oeu> 的发音却好像北法兰西語；但是构詞法和語音实际上仍然是意大利語的，而特殊变化則正如勒托—罗曼語³⁸² 中的特殊变化一样，多半很像葡萄牙語^①。皮蒙特方言在主要特点上和倫巴

① 钥匙在拉丁語是 *clavis*，意大利語是 *chiave*，葡萄牙語是 *chave*，倫巴第語是 *ciàu* (其发音为“恰烏”)。去年夏天奧格斯堡“总汇报”上登載的来自維罗那的一篇通訊(見奧地利大本營的报道)說：在街上，大家見面時常常說“恰烏，恰烏”。这家常常在語言方面犯錯誤的聰明的報紙，显然找不出一个钥匙来打开这个“恰烏”之謎。这个字应讀为 <s-ciau> (斯恰烏)，类似于倫巴第語中的 <schiaivo>——奴隶，僕役，就如在我国彼此寒暄時說：“您的僕人，順从的僕人”等一样。在倫巴第方言中，真正普罗凡斯語的形式我們記得只有两个：阴性过去时形動詞的詞尾为 <da> (*amà, amada*) 与動詞現在时第一人称的詞尾为 <i> (*ami*——我爱，*saludi*——我致敬)。

第方言非常类似，但是它比后者更接近于普罗凡斯方言，而且无疑的，科特阿尔卑斯山和滨海阿尔卑斯山一带这两种方言非常相近，很难在它們中間划出一个确切的界限^①。此外，南法兰西方言大部分甚至并不比皮蒙特方言更接近于北法兰西标准語。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民間語并不能作为解决民族归属問題的标准。操普罗凡斯語的阿尔卑斯山一带的农民既容易学会法語，又同样容易学会意大利語，但是两种語言都同样用得很少；他們非常熟悉皮蒙特語，并且这一種語言也完全够用了。如果需要确定比較巩固的联系，那末只有使用标准語，而这种标准語在全皮蒙特和尼斯，显然是意大利語；唯一的例外是阿奧斯塔谷地和瓦尔德錫谷地，在这两个地区有些地方占优势的是法兰西标准語。

可見，企图以普罗凡斯方言作为論据（况且只是在半个省份使用的普罗凡斯方言）来論证尼斯在民族上屬於法国，这根本沒有道理。如果注意到在比利牛斯山的西面，包括阿腊貢、卡塔卢尼亚和瓦倫西亚，普遍都說普罗凡斯方言，虽然它在这些西班牙省份里受到加斯梯里亚語的一些影响，但不仅在总的方面仍然保持着远較法国任何地方都純粹的形式，甚至还作为书面語存在于民間文学中，——如果注意到这点，那末，上述論证就更沒有道理了。如果路易-拿破侖在最近的将来也以这三个省份在民族上屬於法国为

① 意大利方言和普罗凡斯方言的不同点是：（1）在意大利語中«l»在輔音后面要元音化（fiore, piu, bianco），普罗凡斯語則不然；（2）名詞复数由拉丁語的主格构成（donne, cappelli）。固然普罗凡斯方言和古法兰西方言，在中世紀同样有过这样一种主格的构成法，而其余各格則由拉丁語的宾格（詞尾—s）构成。但是据我們所知，所有現代的普罗凡斯方言，都只是保存着后面这种形式。然而，在这两种方言交錯的地区，还可能发生疑問：現在保留下来的主格形式是来自意大利方言还是来自普罗凡斯方言。

理由而要求占有它們，那西班牙該怎么办呢？

在伯爵領地尼斯要博得对法国的同情，似乎比在薩瓦还要难些。在农村中沒有半点反应，在城市中，一切嘗試遭到了比在莎姆伯里更加彻底的失敗，虽然在这个海濱胜地，糾合一批波拿巴分子要容易得多。想使尼斯人加里波第成为法国人，——这个念头倒真是不坏！

如果薩瓦对于皮蒙特的防御具有巨大意义，那末尼斯就具有更巨大的意义。由尼斯去意大利有三条道路：一条是沿海岸直达热那亚的科尔尼切大道，第二条是經過奥涅利亚附近的納瓦山口进入塔納罗河谷到达切瓦的道路，最后，第三条是經過田达山口到达庫內奧(科尼)的道路。固然，第一条道路最后为热那亚所遮断，但是进攻的纵队在阿尔班加附近以及更往下在薩沃納附近都有机会經由良好的石鋪大道越过亚平宁山，此外还有許多通过山脉的騾馬道和人行小徑；至于作战时如何利用这些道路，拿破侖在1796年已經做出了榜样。第三条道路(經過田达山口)对于尼斯說来，等于蒙塞尼对于薩瓦；它直通都灵，但沒有任何側击之利，即使有，也很少。而中間那条經過納瓦山口的道路則直通亚历山大里亚，它在南方的重要性和小圣伯納德在北方的重要性相同，不过它的作用更直接得多，偶然条件的影响也更小得多。另外，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距沿海道路非常近，在进攻时能够从那里得到很大的援助。沿納瓦大道进攻的纵队在加列西奧附近便可以与順沿海道路进抵阿尔班加的军队重新会合，因为由阿尔班加有一条橫貫道路通到这里；过了切瓦以后，这条大道往下直通亚历山大里亚，途中經過位于切瓦与薩沃納之間的卡尔卡勒，而与来自薩沃納的另外一条路相連接。但是，在切瓦、薩沃納和奥涅利亚之間有一些高

山，因此不能固守。此外，塔納羅河的发源地一带的納瓦山口的北坡也在尼斯境內，因此，誰在战前占有尼斯，山口便屬於誰。

如果法国軍隊在战争开始之前便控制了尼斯，他們就可以由此地威胁向亚历山大里亚以西出动的任何意大利部队的翼側、后方和交通綫。所以，把尼斯让給法国，在軍事上就等于把意大利軍隊的集結地点向后移到亚历山大里亚，并放棄皮蒙特本土的防御，因为整个說来，只有在薩瓦和尼斯才能够防守皮蒙特。

革命战争的历史在这方面可以作为最好的例证。

1792年10月1日，昂塞尔姆將軍率領9000人的一个师渡过瓦尔河，同时法国舰队（12艘战列舰和巡航舰）在尼斯前面离海岸1000步远的水面上抛了錨。尼斯居民因为同情革命而起义，力量薄弱的皮蒙特守备部队（2000人）匆匆退到田达山口，在薩沃尔日附近占領陣地。尼斯城热烈欢迎法軍，但是法軍却到处搶掠，焚燒农民的房屋，强奸农民的妻女，无论昂塞尔姆將軍的命令或国民公会委員們的布告都无法維持秩序。这便是后来的意大利軍团的最初的核心，波拿巴將軍以后靠他們为自己取得了最初的荣誉。看来，波拿巴主义在初期总是要依靠流氓无产者的；沒有十二月十日会他就永无出头之日。

交战双方对時很久而不采取任何行动；法軍占領了尼斯城及其四郊，以一个奥地利师加强了了的皮蒙特軍隊占領了以薩沃尔日附近地带为中心的坚固的筑垒陣地，在山上居高临下。1793年6月間，法軍进行了几次总的說来沒有什么效果的攻击；7月間，他們占領了通向敌人陣地后方的达尔仁特腊山口。在占領土倫（1793年12月）后，意大利軍团得到很大的增援，同时波拿巴將軍也暂时被派遣到他們那里。第二年春天，他向薩沃尔日附近的敌方兵营

发起进攻，4月28日大获全胜，于是法軍就控制了濱海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切山口。当时波拿巴建議让法軍的阿尔卑斯軍团与意大利軍团在斯图腊河谷会合而攻占皮蒙特；但是他的計劃未被采纳。不久以后，由于热月九日的政变³⁸³，波拿巴失掉了自己最有力的庇护者小罗伯斯比尔，同时也就丧失了他在軍事委员会中的势力；他又成为一个普通的师长了。軍队轉入守势。只是在奥地利將軍科洛勒多开始以慣常的迟緩行动向薩沃納前进，企图截断法軍与中立的热那亚之間的对法軍极端重要的交通綫时，波拿巴才有了攻击他的机会，并打敗了他。虽然如此，通热那亚的道路仍然受着威胁；同时1795年的战局一开始就是把法軍驅逐出整个热那亚沿海地区。这时，由于法国与西班牙媾和³⁸⁴，东比利牛斯軍团得以抽出来調往尼斯，到11月已全部在那里集中。在濱海阿尔卑斯山一带負責指揮的舍勒尔，根据馬森納制定的計劃立即轉入了进攻。当塞律里埃把皮蒙特軍队箝制在田达山口时，馬森納沿高山地区作迂迴运动，从后方到达洛阿諾，同时奥热罗又从正面攻击洛阿諾（11月23日）。計劃完全成功了，奥軍陣亡2000人，被俘5000人，損失火炮40門，并且同皮蒙特軍队的联系完全被截断了。与热那亚的交通現在又有了保障，于是法軍在整个冬季就穩然成为山地的主人。1796年春，波拿巴終於取得意大利軍团的指揮权，于是情势大变。他凭借原由他控制的尼斯和波南特海岸，从薩沃納向山地运动，在蒙特諾特、密雷栖摩和德果⁸⁷大破奥軍，并把他們与皮蒙特軍队隔开，后者因被法軍优势兵力包圍，陷于孤立，經過几次后卫战以后，即匆匆签订和約。这样，在博尔米达河上游谷地与塔納罗河谷地的四次胜利的会战保证了法軍对整个皮蒙特的軍事占領，直接攻击都灵甚至已經沒有必要了。战争立即轉移到倫

巴第，皮蒙特則成了法軍作战基地的一部分。

这样看来，在战争的头三年中，意大利是完全以尼斯为屏障的。只是在第三次战局中，意大利才丧失了滨海阿尔卑斯山的山口，最后，只是在第四次战局中这些山口才被利用，并且是非常坚决地被利用了。在第一个星期的山地战斗后，仅仅经过一次有力的佯攻，就使皮蒙特军队了解到自己已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必须投降了。这一次进攻几乎可以向米兰长驱直入；博尔米达河、德森州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整个地区，就轻易地落入了法军手中。

如果尼斯成为法国的一个省，那末，意大利对于法国就陷入了1794年战局后所处的那种地位。对法军敞开的就不仅是经田达山口到斯图腊河谷地的道路和经纳瓦山口到塔纳罗河谷地的道路了。因为要阻挡转入攻势的法军优势兵力向阿尔班加和萨沃纳前进是不可能的。因此，法军在攻势开始三四日后就将位于1796年战局的出发地点。意大利军队的主力应当在哪里抵抗法军呢？在热那亚的沿海地区，没有他们展开的余地；而在贝尔博河和塔纳罗河以西，他们和亚历山大里亚、伦巴第及亚平宁半岛之间的交通线将受到威胁。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亚历山大里亚以南进攻并以联合兵力攻击由山地走出的独立纵队。但是，这当然一开始就要以放弃阿尔卑斯山疆界的防御为前提，因为不然的话，位于田达山口附近及其西部和西北部的部队就会被截断。换句话说，占有尼斯就会使法国控制阿尔卑斯山脉，使阿尔卑斯山不再成为意大利的屏障，同时，又使法国在军事上控制皮蒙特。

尼斯在南方给法国提供的侧击之利，和萨瓦在北方给它提供的侧击之利一样，只是尼斯提供的侧击之利更加直接、更加充分。既然尼斯和萨瓦各自都有使皮蒙特本土完全暴露在法军攻击面前

的作用，那末法国同时占有了这两省，会对皮蒙特具有多么巨大的优势啊！皮蒙特将被这两省像钳子似地夹住；沿着由小圣伯納德四周直到納瓦山口和薩沃納上方的山道的全綫，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佯攻，直到在一个翼側陣地上发动真正的攻击并截断死死地堵在山地中的一切意大利部队时为止。意大利軍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集中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卡薩勒附近，在阿尔卑斯山一带仅留下警戒部队，一当发现主攻方向，立刻把集中的兵力派往該处。如果这竟成为事实，那末換句話說，这就等于不仅把阿尔卑斯山脉，而且把皮蒙特境內整个波河流域都拱手让給敌人，而意軍抵抗法国的第一道防御陣地就将位于亚历山大里亚筑垒綫以后。有薩瓦和尼斯作为前进堡垒，皮蒙特就是意大利的第一个作战基地；如果没有它們，从軍事观点来看，皮蒙特便成了法国进攻体系的一部分，只有在皮蒙特領土上取得胜利并夺回在薩瓦和尼斯的各个山口，才能从法軍手中重新夺回皮蒙特。

法国兼并薩瓦和尼斯，在軍事上（就算不是在政治上）同兼并皮蒙特本身具有同样的意义。将来維克多-艾曼努尔由都灵附近的 Villa della Regina [女王別墅] 眺望那雄偉的但是一座山峰也不屬於他的阿尔卑斯山时，他就会明白这一切了。

但是有人說，既然在北意大利正在形成一个軍事强国，那末法国为了它本身的防御便需要占有尼斯和薩瓦。

薩瓦会显著加强法国的防御体系，这我們已經看到了。至于尼斯，如果說它能加强法国的防御体系的話，那只是因为敌人想侵入法国阿尔卑斯各省时不得不預先占領它。但是，是否会有一个軍事上强大的意大利国家对法国造成极大的威胁，以致法国需要对它进行特别的防御，这还是一个問題。

意大利纵然完全統一了，也永远不可能靠它的 2 600 万居民去进攻法国，除非它同德国联合。但在这样的战争中，主要的兵力总是德国提供的，意大利只会起配角作用。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进攻的主力从阿尔卑斯山转移至莱茵河和麦士河。此外，还应当看到，进攻的最终目标——巴黎——位于法国的北部。对法国最致命的攻击总是来自比利时；如果比利时保持中立，那这种攻击总是来自德国的莱茵河左岸和来自巴登的莱茵河上游。一切其他的攻击都要采取迂迴运动，而且多多少少总是偏向一旁，而不是直接指向巴黎。克劳塞维茨（在他所著的“論战争”第 6 篇第 23 章中）早就嘲笑过 1814 年那一支 20 万人的军队，他们不直接进攻巴黎，却按照最愚蠢的理论，经过瑞士向兰格尔高原迂迴；如果他看到一个企图经过北意大利和薩瓦或者甚至经过尼斯来对巴黎进行主攻的作战计划，他会作何评价呢？一切经由薩瓦的进攻比起从莱茵的进攻来都有极大的缺陷，首先，交通綫长，并且还要经过阿尔卑斯山，其次，离巴黎远，最后，里昂的巨大营垒具有很大的箝制力，——所有这些情况在大多数场合下将迫使敌人中止进攻。因此，在 1814 年战局中，经过意大利向法国进攻的那部分军队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法国在它这段本来就掩护得很好的疆界上，握有这样一些防御手段来对付最軟弱的邻国，实际上是无需乎扩充領土了。如果法国現在的国境綫到处都和法意交界綫一样，距离巴黎很远，都有天然的障碍、人为的工事以及不利于敌人的交通綫，因而都那样可靠，那末法国会是无法攻克的。如果波拿巴主义正好看中了这一点，才借口法国沒有自然疆界便无法进行防御而提出所謂自然疆界的要求，那它为占有莱茵河的要求找根据就不知要容易多少倍！

尼斯即使現在割让給法国，它也将永远屬於意大利。薩瓦可能自願归并法国，将来当欧洲的各大民族在更大的規模上統一起来的时候，它很可能会願意这样做。但是，在德国和意大利从政治和軍事方面实现了民族的統一从而显著地提高了自己在欧洲的威望以后，是薩瓦自願成为法国的領土呢，还是像路易-拿破侖这样一个靠征服別人过日子的統治者，为了永远統治薩瓦，并为了給自然疆界論創立先例而从还处于分裂状态的意大利取得薩瓦——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四

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在围绕尼斯和萨瓦问题进行的这场交易中，关系重大的是下面三个主要情况。

第一，是路易-拿破侖在实践上这样宣布了意大利的独立：意大利至少被分裂为三个或者甚至四个国家；威尼斯属于奥地利；法国由于占领萨瓦和尼斯而控制着皮蒙特。教皇国在罗曼尼亚分出去以后将把那不勒斯同北意大利王国完全分割开来，从而使北意大利王国无法向南方作任何扩张，因为领地的其余部分必须“保证”归教皇占有。同时，对北意大利王国来说，威尼斯仍然是一种诱饵，意大利的民族运动也就会以奥地利为直接的和主要的敌人；而为了使这个新的王国能够按照路易-拿破侖的愿望出来反对奥地利，法军占领了可以控制阿尔卑斯西部的一切障地，并把前哨推进到距都灵9德里的地方。这便是波拿巴主义在意大利布下的障势，一旦发生争夺莱茵河疆界的战争，这种障势可以代替它整整一个军团。而奥地利从这里得到的，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派遣自己盟军的好借口——甚至这一点也未必做得到。在这里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完全改变德国对意大利的政策。德国并不需要到明乔河和波河为止的威尼斯领土，这一点我们认为已经在别的地方说明了。对于教皇的统治和那不勒斯的统治，我们也完全不感兴趣，相反，我们所关心的只是重新建立一个能奉行自己政策的、统一而强大的意大利。因此，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可以比波拿巴主义对意

大利作更多的貢獻。也許不久会发生一些情况，那时注意到这一点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是法国公开宣揚自然疆界論。法国报纸重新高唱这种論調，不仅是得到政府的同意而且是根据政府的直接命令，这是毫无疑义的。这个理論目前只应用于阿尔卑斯。这件事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无害的。薩瓦和尼斯只是两个不大的省份，一个只有 575 000 人，另一个只有 236 000 人，总共不过使法国人口增加 811 000 人；它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意义也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但是，由于对这两个省份的領土要求，使法国人重忆起了自然疆界論的观点；欧洲人不得不再习惯于听这个口号，就好像习惯于听 10 年来不同时期所宣布而后又被拋棄的一些波拿巴的口号一样，——这些就特別同我們德国人有关了。在“国民报”³⁸⁵ 的共和主义者們十分卖力地繼續使用的第一帝国的語言中，所謂法国自然疆界 *par excellence* [主要] 是指萊茵河。就是今天，一談到自然疆界，任何一个法国人都不会想到尼斯或者薩瓦，而只会想到萊茵河。哪一个政府，并且是依仗自己国家的侵略野心和侵略傳統政府，有权重新宣布自然疆界的原则，却建議法国满足于尼斯和薩瓦呢？

法国重提自然疆界論，是对德国的直接威胁，这件事不能小看，它证明一年前在德国表露出来的民族感情是正确的。固然，現在不是路易-拿破侖，而是他操纵的报纸在大叫大嚷說：当然，过去和現在都仅仅是指萊茵河而言。

第三，这是最主要的，就是俄国对于这整个阴谋的态度。去年爆发了战争，哥尔查科夫本人承认俄国对路易-拿破侖有“条约上的义务”，那时这些义务的内容就已经逐渐傳开了。这些傳說来自

各个不同的方面,并在主要問題上都互相印证了。俄国答应动員 4 个軍配置在普魯士和奥地利边境上,使路易-拿破侖更容易施展他的計謀。对于战争过程本身,似乎已經預先考虑了下面三种情况。

或者是奥地利同意以明乔河为边界而締結和約。在这种情况下,它将丧失倫巴第,同时,由于与英国和普魯士隔离,就很容易被拉入俄法同盟,而这个同盟下一步的目的(瓜分土耳其,把萊茵河左岸地区让給法国)将用其他方法来实现。

或者是奥地利为占有威尼斯而繼續战斗。那时,它将被彻底逐出意大利,匈牙利将爆发起义,并在适当的情况下被轉交給俄国康斯坦丁大公;倫巴第和威尼斯将归屬于皮蒙特,而薩瓦和尼斯将归屬于法国。

最后,或者是奥地利繼續战斗而德意志联邦支持它。这时俄国将积极地加入战斗;萊茵河左岸将轉归法国,俄国則将得到在土耳其行动的自由。

再說一遍:关于法俄同盟协定中最重要部分的这些材料,自战争爆发时就开始为大家获悉并且已經公布出来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經为各种事件所证实。其余的部分情况怎样呢?

对于事态的真相,現在不可能提出文件来作证据。只有在事件本身成为历史陈述的时候,这些证据才会出現。只有根据事实与文件(例如 1830 年在华沙发现的俄国的公文³⁸⁶)查明的俄国在以往各个历史时期的政策,才是揭开这个錯綜复杂的阴謀的钥匙。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查明政策就足够了。

在这个世紀內,俄国曾两次与法国結成同盟,并且每一次都是以瓜分德国为其目的或者基础。

第一次是在提尔西特附近的木筏上。³⁸⁷ 俄国当时让法国皇帝

完全支配德国而自己仅取得普魯士的一部分作为交换条件。为此它取得了在土耳其行动的自由，于是就赶忙夺取貝薩拉比亚和莫尔达維亚，并驅軍渡过多瑙河。但是不久以后，拿破侖就开始“研究土耳其問題”并根本改变了他对于这个問題的看法；这个情况对俄国說来便成了 1812 年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次在 1829 年。俄国与法国締結了一个条約，根据这个条約，法国应取得萊茵河左岸，俄国則再度取得在土耳其行动的自由。这个条約后来被七月革命廢除了；达来朗在准备对波林尼雅克內閣的起訴时，发现了有关的文件，但为了避免使法国和俄国的外交出丑，他把这些文件付之一炬。在广大群众面前，各国外交家結成了一个秘密的同盟，他們永远也不会公开地彼此詆毀的。

在 1853 年战争中，俄国曾把希望寄托在神圣同盟¹⁴² 身上，据它的估計，神圣同盟已經由于对匈牙利的干涉和华沙的失敗而复活了，而且由于奥地利和普魯士对路易-拿破侖的不信任而加强了。但是它打錯了算盘。奥地利已經以其忘恩負义的崇高行为³⁸⁸（其实，它早已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和华沙用高額利息偿还了它欠俄国的債）和它在多瑙河地区傳統的反俄政策的彻底复活，使全世界吃了一惊。俄国在这个問題上是失算了，但在另一个問題上，敌人陣营中的叛卖行为却挽救了它。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夺取君士坦丁堡这个固执的想法，現在只有和法国結盟才能够实现。另一方面，在法国又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像路易-拿破侖政府那样需要夺取萊茵河左岸。因此情况比 1829 年更为有利。形势对于俄国是有利的；路易-拿破侖只能为它火中取栗。

首先必須消灭奥地利。奥地利从 1792 年到 1809 年在战场上

頑強地反抗過法國，而從 1814 年以來它又在同樣頑強地（這是它仅有的然而無可爭辯的功績）從外交上反對俄國侵略維斯拉河和多瑙河的計劃。在 1848—1849 年間，當德國、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使奧地利有徹底崩潰的危險時，俄國拯救了奧地利——它的崩潰不應該是革命的結果，因為革命會使帝國的已解放的地區擺脫俄國政策的統治勢力。然而，從 1848 年起就具有獨立性的各個民族的運動，使奧地利失去了反抗俄國的可能性，從而也使奧地利的存在失去了最後的內在的歷史根據。

這個反奧的民族運動現在應當成為分裂奧地利的因素，運動首先是在意大利，然後（如果需要的話）是在匈牙利。俄國的作法和拿破侖第一不一樣；在西方，特別是在那些人口稠密、文明程度超越它本國人民之上的地方，它前進得很慢。俄國征服波蘭的最初階段在彼得大帝時代就開始了，可是直到現在還沒有徹底完成。緩慢的然而可靠的勝利使俄國得到的滿足，和迅速堅決而收穫巨大的攻擊使它得到的滿足相同；但是，它總是同時考慮到這兩種可能性的。它在 1859 年戰爭中利用匈牙利起義的作法，即把這次起義留作第二步使用的作法，清楚地暴露了俄國的手法。

難道俄國會只滿足於在短促的 1859 年戰局中削弱奧地利，而沒有考慮到任何其他的可能性了嗎？難道它動員第一批的 4 個軍就只是為了得到這種滿足嗎？如果奧地利不讓步，那又將怎樣呢？如果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局勢迫使普魯士和德國其餘各邦（在戰爭繼續的條件下是不得不如此的）出來援助奧地利呢，那時又將怎樣呢？在這種場合下，俄國對法國又會承擔些什麼義務呢？

提爾西特條約和 1829 年條約給這個問題做出了答案。如果俄國把它的領土擴張到多瑙河並且直接或者間接地統治了君士坦

丁堡，法国也应当取得它自己的那一份战利品。俄国所能提供給法国的唯一的抵償就是萊茵河左岸。德国只得再次承受牺牲。俄国的自然的和傳統的对法政策，是允許法国占領萊茵河左岸或者在某种場合在这方面加以帮助以換取法国对俄国侵占維斯拉河和多瑙河的承认和支持；对由于感恩图报而承认俄国侵占行为的德国，則帮助它从法国手中收复失地。自然，这个計劃只有在发生重大的历史危机时才有可能实现，但是这絕不妨碍俄国在 1859 年很好地考虑到这些可能性，像在 1829 年那样。

侵占君士坦丁堡是俄国对外政策一貫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是不擇手段的，如果現在还來論证这个事实，那就可笑了。我們在这里只准备提醒一点，就是俄国除非与法国或者英国結盟，否則永远不能实现瓜分土耳其的目的。1844 年，当俄国感到向英国直接提出建議是适时的时候，尼古拉皇帝曾去英国并亲自带去了俄国关于瓜分土耳其的备忘录，当时还把埃及許給了英国人。建議被拒絕了，但是阿伯丁勛爵把这份备忘录放在一个小匣內，加了封签傳給了他外交部的继任者。以后历任外交大臣都看了这个文件，然后重新加封傳給自己的继任者，直到 1853 年上院辯論时，这件事才終於被公开出来。同时公布的还有尼古拉一世同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之間关于“病夫”的有名会談，会談中埃及和克里特島同样被許給了英国，而俄国似乎只得到一点小小的好处就滿意了。³⁸⁹ 可見，俄国在 1853 年对英国的許諾和在 1844 年是一样的，那末在 1859 年对法国的許諾难道会比 1829 年吝啬些嗎？

無論从所处的地位或个人的品格来看，路易-拿破侖都注定要替俄国計劃服务。他既然自命是偉大的軍事傳統的继承人，所以也把 1813 年和 1815 年的失敗作为遺產接受了下來。軍隊是他的

主要支柱；他必須以新的軍事胜利使軍隊得到滿足，必須懲罰那些使法国在这几年来遭受失敗的国家，恢复法国的自然疆界。只有当法国的三色国旗飄揚在整个萊茵河左岸时，才能洗雪巴黎两次被占領¹³²的耻辱。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須有强大的同盟者；而同盟者只能在俄国与英国之間選擇。英国的內閣經常更換，即使有一个英国首相能同意这些計劃，这个国家至少也是不可靠的。那末俄国呢？它已經两次表示願意在这个基础上与法国結为同盟，只要求得到适中的代价。

从所处的地位对俄国的政策有利这一点来讲，俄国的政策从来沒有找到过比路易-拿破侖更为适合的人了。居于法国王位的是这样一个統治者，他被迫进行战争，他仅仅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得进行侵略，他需要同盟，并且只能和俄国締結这个同盟，——这样一种形势是俄国从来沒有遇到过的。自从在斯图加特会見³⁹⁰以来，法国政策的全部最后的原动力便不应到巴黎，到路易-拿破侖的头脑中去寻找，而應該到彼得堡，到哥尔查科夫公爵的办公室里去寻找。德国的庸人們如此敬畏的这位“神秘的”人物被降为俄国外交所玩弄的傀儡，俄国外交让他摆出偉人的姿态而自己却享受实际的利益。俄国从来都是非万不得已不肯牺牲一个戈比和一名兵士，但一有机会就要在欧洲各国間挑起紛爭并削弱它們，因此，在路易-拿破侖还没有得意洋洋地摆出意大利解放者的姿态以前，当然要由俄国通过哥尔查科夫的条約来加以认可的。当俄屬波兰的民情报告已經证实形势非常不妙，以致在毗邻的匈牙利不能允許发生任何起义的时候，当动員俄国第一批4个軍的嘗試表明国家的元气尚未恢复的时候，当农民的騷动和貴族的抵抗的規模在对外战争期間会成为一种威胁的时候，俄皇的將軍銜侍卫长

就来到了法軍大本营，于是就締結了維拉弗兰卡和約。俄国暂时可以滿足于既得的成就了。奥地利因为 1854 年的“忘恩負义”而遭到了殘酷的懲罰，其殘酷程度远比俄国所能指望的要厉害得多。在战前眼看就能整頓就緒的奥地利財政，受到了惨重的破坏，要几十年才能恢复，整个国家机构搖搖欲墜，它对意大利的統治不存在了，領土被割据了，軍心涣散了，軍隊对自己的长官失去了信任，匈牙利、斯拉夫和威尼斯的民族运动已經大大加强，与奥地利分离現在已經成了他們公开提出的目标。自此以后，俄国可以完全不再把奥地利的抵抗放在眼里，可以指望逐漸把奥地利变成自己的工具。这就是俄国的成就。而路易-拿破侖，除了为他的軍隊爭得了极为渺小的荣誉，为自己爭得了非常值得怀疑的荣誉，以及取得了关于有权占有薩瓦和尼斯的极不可靠的許諾而外，什么也沒有得到；而这两省对他說来至多也不过是丹璫人的礼物³⁸⁰，它們会使他更加仰承俄国的鼻息。

进一步的計劃暂时擱了下来，但並沒有放棄。擱多久，那就要看欧洲国际关系的发展情况，要看路易-拿破侖能把自己的御用軍隊控制多久以及新的战争对俄国有多大的利害关系而定了。

俄国在对我們德国人的关系上将要扮演什么角色，去年哥尔查科夫公爵致德国各小邦的有名的照会³⁹¹已經作了清楚的說明。从来还没有人以这样的口气对德国說过話。我們希望，德国人永远也不会忘記，俄国竟敢禁止他們去援助遭到攻击的德国的一个邦。

我們想，德国人一定不会忘記俄国以及其他許多事情。

1807 年在簽訂提尔西特和約的时候，俄国曾坚持要把它的全盟者普魯士的領土——別洛斯托克省划归自己，而把德国出卖給

了拿破侖。

1814年，甚至奥地利也承认波兰有独立的必要（見卡斯尔里回忆录³⁹²）时，俄国还把华沙大公国（也就是以前屬於奥地利和普魯士的几个省³⁹³）几乎全部并入了自己的版图，从而对德国采取了进攻的立場，直到我們把它从那里驅逐出去以前，它将一直威胁着我們。在1831年后筑成的要塞群——莫德林、华沙、伊万城——甚至連亲俄派哈克斯特豪森也认为是对德国的直接威胁。

1814年和1815年，俄国采取了一切手段来使德意志联邦条例³⁹⁴以現在这种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使德国永远孤立无援。

自1815年到1848年，德国处于俄国的直接控制之下。奥地利在多瑙河上會同俄国抗衡，而在来巴赫、特劳波和維罗那等會議³⁹⁵上，它却实现了俄国对西欧所抱的一切希望。俄国能这样控制是德意志联邦条例造成的直接后果。普魯士在1841年和1842年會企图立刻摆脱这一条例的約束，但立即就被迫恢复原状。因此，当1848年革命爆发时，俄国发出了一个通告³⁹⁶，把德国的运动說成是儿童室里的吵鬧。

1829年，俄国和波林尼雅克內閣締結了自1823年就开始由沙多勃利昂草拟的（并經他正式确认的）条約，根据这个条約，萊茵河左岸被割让給了法国。

1849年，俄国在匈牙利支持了奥地利，条件是要奥地利恢复联邦議會和摧毀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抵抗；倫敦議定书³⁹⁷保证俄国在最近期間获得对整个丹麦君主国的继承权，并使它有希望实现自彼得大帝以来就渴望实现的进入德意志联邦（以前是德意志帝国）的計劃。

1850年，奥地利和普魯士被召到华沙受沙皇审判。虽然許多

庸俗的政客认为只有普魯士受到了屈辱，其实奥地利所受的屈辱并不見得少些。

1853年，俄皇尼古拉一世在同汉·西摩尔爵士交談中任意摆布德国，就好像德国是他的世襲領地似的。他說奥地利是忠实于他的；至于普魯士，他根本不屑于一提。

最后，1859年，当神圣同盟看来已彻底瓦解的时候，俄国就同路易-拿破侖締結条約，法国在俄国的同意和支持下进攻奥地利，哥尔查科夫还发出照会，非常放肆地禁止德国人向奥地利提供任何援助。

这就是从这个世紀开始以来我們要感激俄国的一切，但願我們德国人永远不要忘記。

就是現在，我們也还受到法俄同盟的威胁。法国本身只有在个别时机并且也只有在与俄国結盟后才能威胁我們。但是俄国却时时刻刻在威胁我們，侮辱我們，每当德国起来反抗时，它就以萊茵河左岸作为許諾来策动法国宪兵。

难道我們應該永远容忍俄国这样玩弄我們嗎？俄国把我們最美丽、最富庶、工业最发达的一个地区永远当作誘使法国御用軍政权上鈎的誘餌，难道我們4500万人民还要繼續忍受下去嗎？难道萊茵地区除了作为战争的牺牲品，帮助俄国取得在多瑙河和維斯拉河上行动的自由以外，就再沒有其他任何用处了嗎？

問題就是这样摆着。我們希望德国能迅速地手持利劍来回答这个問題。只要我們能團結一致，就一定能把法国御用軍和俄国“毛虫”一起驅逐出去。

同时，我們已經有俄国农奴这样一个同盟者。現在俄国統治階級和被奴役的农民階級之間的斗争正如火如荼，它正在动摇俄

国对外政策的整个体系。这个体系只有当俄国内部在政治上还没有发展以前，才可能存在。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由政府与贵族共同大力促成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使现存的社会关系不能再继续下去的程度。这种社会关系的废除一方面是必要的，而另一方面，不经过暴力变革又是不可能的。随着从彼得大帝到尼古拉一世的俄国的毁灭，它的对外政策也将遭到毁灭。

看来，德国注定不仅要用笔墨而且要用刀剑来向俄国说明这一点了。如果事情到了**这一步**，那时德国就将恢复自己的名誉，洗净几世纪来蒙受的政治耻辱。

附 录

“人民报”編輯部的声明

为了消除关于本报編輯部成員的一切謬傳和荒誕譫言，我們必須声明，編輯部成員沒有变更，而且也不打算作任何变更。但是，本报撰稿者的范围扩大了，我們可以滿意地告訴本报讀者：**卡尔·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斐迪南·弗萊里格拉特、威·沃尔弗、亨·海澤**——也就是我們党的最出色的一批写作力量——决定支持“人民报”，并通过撰稿使編輯部能够很好地和全面地代表我們党的利益。

載于 1859 年 6 月 11 日
“人民报”第 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报 刊 述 評³⁹⁸

“我們的讀者都是通情達理的人，有時，當我們接到他們對‘海爾曼’³⁹⁹的批評時，我們總覺得，不可數計的多數讀者〈要知道，600個讀者中的不可數計的多數，就是599個〉比我們自己要通情達理得多。”（“海爾曼”）

自願坦白總是好的，即使像這次這樣，做得稍微遲了一點也不妨。但是，儘管如此：

“老人們，你們鼓起勁來吧，
血管里的血液不應該冷卻！
履行你們神聖的義務吧，
你們有力氣把戰壕挖掘，
並且用筐子挑走泥土。”

（圖斯涅爾達安慰海爾曼⁴⁰⁰）

“在那些值得稱道的州中最值得稱道的威斯康星州派出它最卓越而有才干的演說家卡爾·叔爾茨先生到馬薩諸塞去，為了用他大膽的言詞去鼓動…… 他在他一篇出色的、陳辭激昂的演說中证明了……”

什麼？——實在很難說，如果沒有下文的話：

“他不認為他是那個叫做德意志民族的思想家輩出的偉大民族的代表。”
（大學生叔爾茨扮演了完全可以數計的少數和自傳作者的角色⁴⁰¹）

“呵，青年們，把劍磨快！
願你們像海爾曼一樣勇敢！”

（圖斯涅爾達）

“我們親眼看到了這種耐火的凡而紗的貨樣，並且在燭火上檢驗過它。

如果把它在火上慢慢地移過，它一點也不會燒着，但是，如果把它在火中稍微放得久一點，它就會燒成灰，不過，火不會向旁邊燒開去。可是，聽在展覽會上見過一塊大幅料子的一位英國太太說，這種布不像未經加工的凡而紗那樣閃閃發光，色澤也沒有那樣鮮艷奪目。”（“海爾曼”。——編者注）

“呵，婦女們，你們的使命
你們應該在祈禱中找尋！”

（圖斯涅爾達）

我們的世界主義的心臟很高興地看到，當阿爾米紐斯記起他把西方革命奉獻給科蘇特先生以交換東方革命⁴⁰²的崇高時刻，他庇護了

“奧地利的1700萬斯拉夫人”，並且“因此他不僅把緊靠社論的地方辟給相應的通訊員，而且呼請他代表他的人民在‘海爾曼’上發表言論”。因為“對於共和黨人說來，在意大利戰爭中站在哪一方面，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所以，該報表示部分地贊同普魯士，部分地贊同路易一拿破侖，部分地贊同意大利，部分地贊同小德意志，部分地贊同大德意志，部分地贊同成立攝政王職位，部分地贊同帝國議會，而它表示完全贊同的，則是“小新港街萊斯特廣場8號的本德爾”。“任何一個學過閱讀（“出版界和印刷所”）的人”，只要請教一下這位本德爾，“用不着在書籍和演講錄上下功夫，”就可以通曉各種自然科學的奧秘。

* * *

在最近一號“海爾曼”上，有一位捷克人聲明說：

“我們是……第一批……為社會思想……而鬥爭的人。”

現在是這個“論壇”的所有主的這個牧師⁴⁰³關於這一點指出：

“難道在捷克人之前瑞士人不是第一批嗎？”

瑞士人真的第一批为之而斗争的唯一的**社会思想**，可以用如下的话表述出来：«Point d'argent, point de Suisses»（“没有克劳泽，就不会有瑞士人”）⁴⁰⁴。初露头角的“瑞士人”福格特和新近铸造的“克劳泽”金克尔⁴⁰⁵当然会善于按其功绩来评价这一社会思想的全部的全世界历史意义的。

这个“论坛”上还說：

“我们认为，英国各家保险公司以后不愿意再接受〈！〉准备销到海外的世界市场去的德国商品的保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位“牧师”究竟知道几个“世界市场”呢？

下面就是“伦敦周报”，即“海尔曼”的**条理分明的叙述**的标本：

“在撒满了桂冠的洪堡的坟墓上，栖息着一对小燕子。刚在萌芽状态就应当用颞相学和物理疗法的各种手段加以根除的儿童犯罪行为，又被施米德堡一个九岁的男孩最骇人听闻地表现出来了。”

“海尔曼”对梅特涅的判断。——对梅特涅政策的看法是这样表达的：

“在梅特涅及其同伙在几乎整整一百年中捉弄别人、做尽各种卑鄙勾当的地方，任何和平天使也不能在小溪旁安身，以便像席勒所说的那样，甜甜地打一个盹。”“他〈即席勒〉倒会设法比如說在明乔河上做这件事。”

只有“海外的世界市场”的发明者能够把明乔河变成“小溪”。

“海尔曼”在文章中关于

“伦敦的萨瓦教堂的空缺”声明說，“它〈“海尔曼”〉无论对它在伦敦还是在祖国的同乡們來說，都一天天变得愈来愈**珍贵**了”。

也许这是符合事实的。价值三辨士的海尔曼提供的材料一星期比一星期少了。很可能，这也就是要对那些自由的“收入条款”

进行精确計算的原因，——順便指出，这种計算泄露了想把“論壇”迁移到“薩瓦教堂”去的秘密願望。

* * *

在“哥特弗利德”第26号上刊登了“海尔曼”^①的一篇辞职声明。声明說：

“致我們的讀者

今天的这一号出版后，完成了我作为本报編輯的活动。我辞职的唯一原因是，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許我除了我过去的教育家的职业以外再从事另一种如此消耗精力的活动。〈就是說，教育家的职业是除了那个另一种活动以外的一种活动。〉由于我根据这一点〈根据哪一点？〉今后将不再对本报的内容負責〈不如說是他将不对本报今后的内容負責〉，所以，我同时也把所有权轉交給別人。这个成就現在已經有了保证〈由于金克尔离去了〉的企业，将根据过去的精神进行工作〈价格低廉，服务周到〉。由于以前我自己几乎没有時間和地方来为它〈即为这个企业〉撰稿，所以，在将来〈以后〉摆脱了与問題的外部方面相联系的操劳的負担以后，我作为一个通訊員将提供更加大量的材料。〈如果哥特弗利德过去为这些材料找到的地方愈少，将来作为通訊員就愈能提供“更加大量的材料”，那末，由于沒有哥特弗利德作編輯而成就現在應該有所保证的这个企业的情况，将会怎么样呢？〉值此同讀者和同事們分別之际，我深深銘感你們友好的同情和支持。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上述的“哥特弗利德”最后刊登了下面这篇編輯部的短文，作为那种海尔曼对之說这样友好的“再見”的如此“消耗精力的活动”的标本：

“当我们〈正就是哥特弗利德〉哪怕是有一次能够从我們的哪一个通訊員那里捉到一个好跳蚤的时候，我們每次总是体验到一种特殊的幸災乐禍的感

① 指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編者注

情,因为在我們的**全体讀者**中**照例**总会找到一个人〈!〉,这个跳蚤将推动〈为什么不是推开呢?〉他对**所涉及的事情**〈即对于被捉到的跳蚤的这件令人非常难堪的事情〉发表一篇有教益的,**包含全部細节的**〈包含**有关的**全部細节的〉报道。正是由于这种粗枝大叶的**錯誤**,我們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什么情况?〉也就能够刊登有价值的更正,根据这个更正,每一位讀者〈但無論如何不是一位通訊員!〉立即就会断定,它的作者是像萊茵河上人們常說的那种**大人物**〈不是这样嗎,美丽的女讀者?〉。遺憾的是,刻不容緩的政治材料,特别是我們的通訊員們关于**令人极端厌恶的崇高的政治**的那些文章急剧涌来,使我們直到今天才得以刊登**这篇文章**〈即这个編者注〉。”

于是,我們看到,海尔曼不顾自己如此深摯的感激之情,不无苦痛地同“通訊員們”告別。这个苦命人“以前”在他自己的論壇上沒有为关于“被捉到的跳蚤”和“大人物”的“这篇文章”找到地方。

而我們在分別之际向“以前”的“哥特弗利德”的編輯感叹地說道:«De mortuis nil nisi bene». [“对于死者,是記善不記惡的。”]但是,我們对“以后”的“海尔曼”的通訊員說:“菲力浦城下再見!”⁴⁰⁶

战略外交的发明

“海尔曼”声称:

“据說,普魯士的武装調停要以明乔河綫为基础。很好,在索尔費里諾会战之后这一綫是划得更加明显了。只是曼都亚和培斯克拉那些要塞的墙壁的阴影仍然还遮掩着它。但是,圍攻应当照亮它。”

“海尔曼”的机智的小品文作家^①在倫敦使用了他的那些文章以后,又把它們寄給萊比錫的“凉亭”⁴⁰⁷。为了把“德国大人物协会”組織的洪堡紀念会⁴⁰⁸描写得尖刻潑辣,有人通知我們說,

① 亨利希·貝塔。——編者注

“某个现在正出版一家周报的共产主义团体，抱有特殊的目的，想用最卑鄙的方式不仅诬蔑金克尔的报纸，而且诬蔑他本人；而且他们甚至不惜使用最明显不过的谎言等等”。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想指出，我们的报纸完全不是“某个团体”的机关报，这一点小品文作家从我们历次的言论中是应当知道的，而我们对金克尔先生的指责，是不应当称为谎言的，除非它被驳倒，但是这一点直到现在谁也没有做到，而且永远也做不到。顺便指出，我们感谢通讯员先生报道说，

金克尔的“散发着节日气氛的芳香”的說教的基础，是一句名言：“如果你忘记了錫安，那你自己也会被人忘记。”他是“拜倒在黑紅黃三色旗之下”开始說教的。

“海尔曼”在說俏皮話。“海尔曼”关于奥地利的一篇文章中說，哈布斯堡王朝对其世襲的領土是以继父的身分出現的，而对德意志帝国是以继母的身分出現的。至于一个老头儿或者一个青年人可能成为一个老嫗，这一点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也就是从佩利茨著的“世界通史”⁴⁰⁹中为少女們作了大量摘录的那篇文章的作者已經作了充分的論证。但是，继父同时又是继母——这一点直到現在我們还认为是不可能的。

* * *

由于爱·約·尤赫之流担任主編而以返老还童的面貌出現的“海尔曼”是值得我們刊登詳尽的短文来談談的。我們就立即从关于“普魯士的立場”的 first leader [第一篇社論] 开始吧。

如果法国和奥地利簽訂了和約，

“普魯士在一段时間內所处的状态将同它在此之前所处的状态大体相同。可是，它慢慢地将处于另一种状态中。但是，既然〈！〉战争将会繼續下

去，那它就應該**还要更快地**〈比慢慢地还要更快嗎？〉**改变自己的立場**，因为那时它將被迫采取行动，如果它沒有及时地为自己**找到**〈！〉一个可靠的立場，那它就將失去任何坚固的支柱，以便同德意志联邦的其余各邦一起灭亡〈也許普魯士并不反对失去“任何坚固的支柱，以便灭亡”吧〉。”

接着，作者让普魯士表演各种不同的多少有些奥妙难解的 poses plastiques [优美姿态] 給我們看。首先，普魯士可能会把自己装扮成欧洲大国，而且这也有两种方式。

“普魯士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出面采取行动，独自承担全部風險〈独自？〉。这个〈行动！〉是純粹欧洲的观点，其目的〈观点的目的〉……将会确定为权力問題，因为簽訂条約是为了保持均勢，而保持均勢就是要使为国家〈什么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权力均等。在这种情况下普魯士可能会以这一次战争所引起的**違背 1815 年条約**的行为作为出发点，因为它是这个条約的締約国〈不是几个父亲之一，而是一个父亲〉，并且它可能会企图**得到物质保证**，以奖励它在这种情况下〈在違背条約的情况下〉为欧洲君主制度立下的**功劳**。”除了这个苦心孤詣的安排以外，“普魯士可能会以一个欧洲大国的身分采取**純粹政治的立場**，从保全自身的考虑出发，反对它的法国对手**加强力量**〈non bis in idem [一事不重罰]——要知道，关于使力量均等的問題已經提到过了〉。这时它可能会借口說，英国目前还是公开的敌人，而俄国已經是法国的秘密的盟友——奥地利的敌人了〈！！〉”，等等。

在普魯士作为欧洲大国如此多方面地表現了自己以后，

“它在今后可能会采取**完全是德国的观点**。在这里它也可以进行自由的选择。就是說，它可以作为德国的一个大邦使其余各邦〈包括土耳其〉听命于它，或者以**联邦的一个謙逊的、平等的成員国**行事，听命于各个小国〈是瑞士各州嗎？〉，或者同它們并立。〈叫人弄不太清楚，为什么联邦的**平等的成員国**必須听命于人。〉”

換句話說，或者是普魯士帝国，或者是保全德意志联邦。

前者“意味着一个懂得需要可以产生法令〈对于普通凡人說来是需要可

以不顾法令，但是对于哥达党人說来是需要可以創造法令，不过絕對不是严格的法令〉的大国要坚决充当德国的魁首，由于需要可以創造法令，所以它〈需要〉被迫不得不拒絕那些束縛着它的框框等等，因为它的存亡处于决定关头〈也就是說，需要的存亡处于决定关头〉”。

“普魯士可能会用来为这种革命政策辯解”的那些根据，对于我們的作者說来真是 *embarras de richesses* [貨多难选]。

其中“敌視德国統一的外国大国俄国和英国依靠一个德国均势的秋千的复杂体系，通过經常的相互削弱的办法阻碍了德国各大邦的壮大，在成立联邦时它們更多的是关心自己，而不是德国等等〈好一个独出心裁的計劃，为了防止普魯士实力的壮大，外国大国俄国和英国應該彼此削弱！〉。最后，它〈普魯士〉表明它已經完全領悟了目前这场战争的实质，这场战争像三十年战争一样，目的是要完成 1848 年革命。由于这个原因〈即由于三十年战争的目的是要完成 1848 年革命〉，所以普魯士不再承认联邦議會，并且

……认为其他一切德国諸侯的主权已經失效等等。”最后，“如果它〈即普魯士〉觉得这种革命政策太冒险，普魯士政府可能也会选择保守的观点。它可能会选择保守的观点……因为統治着普魯士的王朝作为平等的〈与誰平等？〉的王朝，应当支持保全其余的〈其余的什么？〉……因为普魯士不是独立的，它应当使自己的立場同中立的英国将要采取的立場相一致，等等。”

到这个时候，它“动搖了”。它也容許它的“对手奥地利”被击潰了。

“它依靠条约經常企图扯各个小邦〈是把它們的財富扯出来，扯起鞭子抽它們，或者把它們扯到自己方面来嗎？〉，它几乎带着就是那些建議回到了法兰克福〈从爱尔福特〉⁴¹⁰，这些建議如果是来自汉諾威或巴伐利亚的話，普魯士就不会接受了。”

最后，作者把这一点称为“巧妙的一步”，虽然这里在 *consecutio temporum* [時間的一致] 方面，表現得不很高明。

很遺憾，維拉弗兰卡条约一举把哥达党人的幻想所能企及的

普魯士的一切步驟全盤粉碎了。因此，我們且把尤赫之流的“崇高的政治”撇下不談，而去請教一下通過返老還童的“海爾曼”歌頌索爾費里諾會戰的梯爾泰。看來這位梯爾泰是個好心腸的人。他連一分鐘也不懷疑，在索爾費里諾城下彼此撕殺的一切朱阿夫兵、土爾科兵、克羅亞特兵、塞爾維亞兵、捷克兵 et autres Zéphyres⁴¹¹，

“如果不是有兩個皇帝的話，偶然的機會無論在世上的什麼地方把他們湊合在一起，他們都會像不懷惡意的、彬彬有禮的人們一樣彼此相待，他們會彼此致敬、吃、喝（彼此吃掉、喝掉！什麼禮貌——吃人的禮貌！）。”

歌頌會戰的那首詩的韻律是英雄史詩的韻律，是六腳韻。大家知道，克萊斯特在六腳韻前面增加了一個短音節。我們這位歌頌英雄的詩人超過了克萊斯特：他非常慷慨；韻腳多少對他說來是無所謂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六腳韻剛從沙場上回來，缺少一個腳，或者膝蓋脫了骹，那也不能責怪六腳韻。

我們來舉幾個例子：

“十分疲憊，

精疲力竭！炎熱逼人，口乾舌焦。”

“在這可詛咒的年代，在這十年中，”

“在灼熱的太陽的曝曬下，在血泊中，活活地渴死，有時

幸而身受一刀當即斃命，多數只是被砍斃得半死不活，遍體鱗傷，痛不欲生。”

“酷熱的、光禿禿的小丘鮮血遍染，

一個個殘缺不全的軀體在血泊中輾轉，”

“有的少腳，有的缺手，有的沒有了下巴，有的剩下半個腦瓜。”

“最後，

萬籟俱寂，黑暗降臨。

只是山谷里和小丘上傳來了呻吟，

忽此忽彼，在幾個鐘頭的距離以內，隨處可聞。”

“在艱苦的热战中，他們連一滴水也沒有，

其他的人都渴死了，

在临死前的嘶哑声中，他們那永远熄灭了的視線碰上了来得太晚了的外科医生。”^①

在歌唱了会战之后，紧接着便是历史性的批評。返老还童的“海尔曼”的“思想家”在从巴黎寄来的一篇文章中向我們披露了路易·波拿巴对革命的态度。

“革命是合法的，因为它受到皇帝的庇护并且經他批准…… 但是，它保留着自己过去的性质并且应当被镇压，因为它同皇帝的利益发生矛盾，或者破坏他的計劃。”

① 这些詩的韵脚中文难以标出，这里附上原文以供参考。——譯者注

„Ermattet zum Tode,
in Er / schöpfung. / Hitze und / langsam ver / sengendem / Durste.“
„Wenigstens / dieses / letzten, / fluchbe / ladenen / Jahrzehnds.“
„Unter / glühender / Sonne, ver / blüetet, ver / durstend, manch / mal von
dem Gnadenstoße eines herabstürzenden Bajonetts getroffen,
in den meisten Fällen aber nur durch
Schnitte und / Stöß' auf / klaffende / Wund'
zum ent / setzlichsten / Todschmerz aufgeschreckt.“
„Die heißen, / kahlen / Kuppen / strömten von / rauchendem / Blut, in
welchem sich Verstümmelte wälzten.“
„Hier fehlte ein / Arm, dort ein / Bein, dort
/ eine / ganze / Kinn / lade / oder /
Seite des / Kopfes.“
„Endlich wurde es
still und / dunkel. Von / Bergen und Tälern / zuckte und / schrie und
jammerte es auf, bald da, bald dort, überall *stundenweit*.“
„Sie hatten am Schlachttage
dem heißen, / glühenden, / keinen / Tropfen / Wasser be / kommen.“
„Andre lechzten und
gurgelten / noch und / zeigten das / weiße, / brechende / Auge
dem zu spät gekommenen Wundarzt.“

这就是全部奥妙所在。

“我终于摸到了海底，
我的锚牢牢地扎在这里。”

我们从“如此令人厌恶的崇高的政治的领域”，从隆隆的炮声和历史性批评的领域中跌了下来，落到一间简朴的孤单的修道院——“印刷所”中，我们的老朋友哥特弗利德已经作为新的通讯员在这里隐居下来。他见到我们就喃喃地抱怨道：

“这家报纸由于经常的战争和一味谈论政治，直到现在还没有腾出地方来，等等。”

这种老一套的抱怨话我们是熟悉的。哥特弗利德作为有很好的艺术素养的向导，建议陪我们去参观“特拉法加广场的科学院展览会”。

“这个几乎是英雄的人物，像甚至在有毒的花卉上采蜜的蜜蜂一样”（见“凉亭”），

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说了一大堆众所周知的悦耳动听的话，他告诉我们说，

“列斯利那些欢快活泼的画……是美术的真正的珍珠。”

但是，他最感兴趣的是前拉斐尔派⁴¹²，因为具体的实例胜于一切说教，所以他在自己的“印刷所”展出了几幅前拉斐尔派的wordpaintings〔文字绘画〕，这就使我们不必再劳神去游览特拉法尔加广场了。

前拉斐尔派的第一幅画

“从上午 11 点起，大厅里整天都为上流社会的钟式裙所统治，在观众喜爱的那些作品的旁边经常总是磨破了长裙的下襞。”

前拉斐尔派的第二幅画

“一切在某一点上来看是达到了完善地步的东西，都是珍贵的。例如裤子，如果缝制得很好，又不窄不紧。”

前拉斐尔派的第三幅画

“在修道院的墓地上，有两个尼姑正在从事挖墓……这是两个粗里粗气的妇女，她们在轮流交替着从事黄昏的忧郁的劳动。〈两个粗里粗气的人在轮流交替，而黄昏在替她们从事劳动。〉其中有一个跳进坟墓，用洗衣妇的青筋条条的手抛出沉重的、潮湿的黑土，它长满了树根，她是一个平庸的、冷淡的、普普通通的人物。”

也许长满了树根的人物是十分平庸的，但无论如何她是绝非普普通通的。这个人不是用自己的手，而是用洗衣妇的手挖土所表现的那种 sansgêne [不讲礼貌的神气]，的确说明了某些冷淡。

这几个实例已足以使任何一个“手工业者”懂得，哥特弗利德如此执拗地强迫他“考虑”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就是说，强迫他们考虑：这些被阉割了艺术趣味的人

“在他的事业中对他来说”，会比“星期日到埃平的森林或居尤郊区的植物园去作任何游玩”，比“城郊的任何热闹的饭馆”，比“那些傍晚的聚会”和“关于即使在下一次革命以后会不会出现打着工人专政的招牌的裁缝匠帮工们的千年统治这个陈腐问题的无休止的议论”，“要有益得多 〈utile cum dulci [愉快而有益]〉”。

但是，我们同前拉斐尔派画家相反，我们像从前一样坚持一句古代明智的格言：«Cacatum non est pictum» [“涂抹并不是绘画”]。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6月3日和24日，
7月8日和15日

载于1859年6月4日和25日，7月9日
和16日“人民报”第5、8、10和1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 釋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釋

- 1 馬克思的卓越著作“政治經濟学批判”是在1858年8月—1859年1月写成的。这一著作标志着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創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馬克思在写作这本书以前，进行了15年的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研究了大量的社会經濟文献，制定了自己的經濟学說的原理。

1857年8月，馬克思开始系統地整理他搜集的材料，并着手写作經濟学巨著。1857年8—9月，馬克思草拟了这一著作的提綱的初稿。在以后的几个月中，馬克思更加詳細地拟定了自己的計劃，并在1858年4月决定把整个著作分成六册来写。第一册打算考察資本，并且作者想在闡述資本之前先写若干緒論性章节；第二册——土地所有制；第三册——雇佣劳动；第四册——国家；第五册——对外贸易；第六册——世界市場。預定第一册包括四篇，而在馬克思称为“資本一般”的第一篇中包括三章：(1)价值，(2)貨幣，(3)資本。

在写作第一册即“資本”时，馬克思从1857年8月到1858年6月写的手稿就約有50个印張，这些手稿已由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1939—1941年期間用德文出版，书名是《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政治經濟学批判大綱(草稿)”）。这一手稿包括总的导言、关于貨幣部分以及篇幅相当大的关于資本的部分，在这里馬克思粗略地闡述了自己多年的經濟研究工作的初步成果，其中包括他的剩余价值理論的基本原理。1857—1858年的手稿实际上是那时馬克思所計劃的一部經濟学巨著的第一部分的未完成初稿。

1858年初，馬克思决定分册出版自己的著作。他同柏林出版家弗·敦克尔簽訂了初步合同后，就写作第一分册。1858年8月—1859

年1月間，他對貨幣一章進行了加工，寫成商品一章，校訂了手稿的最後定稿，加上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標題，並於1859年1月26日寄給柏林的出版者。第一分冊超過計劃中的5—6個印張，而擴大到12個印張，並且不像預計的那樣包括三章，而是兩章：“商品”和“貨幣或簡單流通”。1859年2月，馬克思把序言寄給出版社。同年6月，“政治經濟學批判”問世。“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小標題是：“第一冊。資本”、“第一篇。資本一般”，這證明這本書是所計劃的六冊書中的第一冊的開端。

第一分冊出版後，馬克思會準備出版第二分冊，這一冊本應闡述資本問題。但是，進一步的研究使馬克思改變了他寫作這部巨著的原定計劃。他擬定了四卷“資本論”的計劃以代替六冊書的計劃。因此，馬克思不再準備出版第二分冊和其他各冊，而着手寫作“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某些基本原理經加工後也包括到“資本論”中去。

馬克思在世時，“政治經濟學批判”沒有再版。只有序言是個例外，它曾於1859年6月4日發表在倫敦德文報紙“人民報”上，但發表時作了某些刪節。本書第二章中批判格雷關於勞動貨幣的空想主義理論的部分，恩格斯曾作為附錄列入馬克思“哲學的貧困”一書1885年和1892年的德文版。1896年在莫斯科出版了本書俄文第一版。編入本卷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以作者準備付印的德文第一版原文為基礎。同時參考了：第一，馬克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的修改和注；第二，馬克思在1859年8月19日贈給威廉·沃爾弗的那本書上所加的修改和注。作者的某些修改和注，已由恩格斯在準備付印第三卷“資本論”時加進去了。恩格斯引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各段文字都以馬克思修改過的和表述得更加準確的文字為準。在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檔案館里，藏有這些帶有馬克思的修改和注的原本的照相複製品。——第3頁。

- 2 指馬克思為一部經濟學巨著寫的、但沒有完成的“導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733—762頁）。——第7頁。
- 3 “萊茵政治、商業和工業日報”（*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自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

科倫出版。該報是萊茵省一些對普魯士專制政體抱有對立情緒的資產階級人士創立的。該報曾吸收幾個青年黑格爾分子撰稿。1842年4月馬克思開始為“萊茵報”撰稿，同年10月起，成為該報編輯之一。“萊茵報”也發表了恩格斯的許多文章。在馬克思擔任編輯期間，該報日益具有明顯的革命民主主義性質。政府當局對“萊茵報”進行了特別嚴格的檢查，後來把它封閉了。——第7頁。

- 4 指馬克思的著作“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三篇論文）。關於林木盜竊法的辯論”和“摩塞爾記者的辯護”（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35—181、210—243頁）。——第8頁。
- 5 “總匯報”（*Allgemeine Zeitung*）是德國的一種反動日報，1798年創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奧格斯堡出版。1842年發表了捏造的空想共產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思想，馬克思在其“共產主義和奧格斯堡‘總匯報’”一文中揭露了這種捏造，該文發表在1842年10月“萊茵報”上（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30—134頁）。——第8頁。
- 6 “德法年鑑”（*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編是卡·馬克思和阿·盧格。僅僅在1844年2月出版過第一期雙刊號。其中載有馬克思的“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以及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55頁）。這些著作標誌着馬克思和恩格斯從革命民主主義最終地轉到了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雜誌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馬克思和資產階級激進分子盧格之間存在着原則上的意見分歧。——第8頁。
- 7 指恩格斯的第一篇經濟學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96—625頁）。——第9頁。
- 8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頁。——第9頁。
- 9 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 中文版第3卷第11—640頁)。——第10頁。
- 10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頁和第444—459頁。——第10頁。
- 1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頁。——第10頁。
- 12 指馬克思的著作“僱傭勞動與資本”(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73—506頁)。——第10頁。
- 13 德意志工人協會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47年8月底在布魯塞爾建立的，目的是對僑居比利時的德國工人進行政治教育和向他們宣傳科學共產主義思想。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戰友的領導下，協會成了團結比利時的德國革命無產者的合法中心，並跟佛來米和瓦倫工人俱樂部保持了直接的聯繫。協會中的優秀分子加入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布魯塞爾支部。1848年法國資產階級二月革命後不久，由於該會成員被比利時警察當局逮捕和驅逐出境，協會在布魯塞爾的活動即告停止。——第10頁。
- 14 “新萊茵報。民主派機關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從1848年6月1日到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倫出版，總編輯是馬克思。編輯有恩格斯，還有威·沃尔弗、格·維爾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萊里格拉特、亨·畢爾格爾斯。

作為民主派中無產階級一翼的戰鬥機關報，“新萊茵報”起了人民群众的教師的作用，它動員人民群众起來向反革命作鬥爭。決定報紙對德國革命和歐洲革命的重大問題的立場的社論通常都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寫的。

“新萊茵報”的堅決的、不妥協的立場，它的戰鬥的國際主義精神，它對普魯士政府和科倫地方當局的政治上的揭發，使該報在創刊後的最初幾個月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資產階級報刊的攻擊，並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這種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魯士的反革命政變以後更變本加厲。

“新萊茵報”不顧種種迫害和警察局的刁難，英勇地捍衛了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捍衛了無產階級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進

攻的情況下，普魯士政府借口馬克思沒有普魯士國籍而下令把他驅逐出境。由於馬克思被驅逐出境和“新萊茵報”的其他編輯遭受迫害，該報停刊了。1849年5月19日“新萊茵報”用紅色油墨出了最后一號即第301號。在致科倫工人的告別書中，該報編輯們宣布：“無論何時何地，他們的最后一句話始終將是：工人階級的解放！”——第10頁。

- 15 “紐約每日論壇報”(《*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國報紙，1841年到1924年出版。該報由著名的美國新聞工作者和政治活動家霍拉斯·格里利創辦，在五十年代中葉以前是美國輝格黨左翼的機關報，後來是共和黨的機關報。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該報站在進步的立場上反對奴隸占有制。參加該報工作的有許多著名的美國作家和新聞工作者，受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的查理·德納從四十年代末起是該報編輯之一。馬克思於1851年8月開始為該報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繼續了10年以上；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馬克思約恩格斯寫的。恩格斯的文​​章多半是在曼徹斯特寫的，許多文章上注明的日期並不是寫作的真正日期，因為馬克思在論文上通常標明的是寄往紐約的日期。有些論文是在倫敦寫的，而馬克思注明的却是巴黎、維也納或柏林。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寫的文章，涉及國際和國內政治、工人運動、歐洲各國的經濟發展、殖民地擴張、被壓迫國家和附屬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等等極其重要的問題。在歐洲的反動時期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這家發行很廣的美國報紙以具體材料來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病態和這個社會所固有的各種不可調和的矛盾，並且說明資產階級民主的局限性。

“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隨意處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為編輯部的社論刊登出去。自1855年中​​期起，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的一切文章都給去掉了署名。有時編輯部還刪改文章的原文，并任意加注日期。編輯部的這些行為會一再引起馬克思的抗議。從1857年秋天起，由於美國發生經濟危機，報紙的財政狀況受到影響，編輯部向馬克思提出減少他對“紐約每日論壇報”通訊的數量。到美國國內戰爭開始時，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馬克思所以和“紐約每日論壇報”斷絕關係，很大的一個原因是編輯部內主

- 張与实行奴隶占有制各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场。
——第 10 頁。
- 16 馬克思引用威·配第匿名出版的著作“賦稅論”1667年倫敦版(《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 London, 1667)。——第 24 頁。
- 17 “旁观者”(《The Spectator》)是英国每日出版的文学杂志,1711—1714年在倫敦出版。——第 42 頁。
- 18 李嘉图在他的著作“論农业的保护关税”1822年倫敦第 4 版第 21 頁(《On protection to agriculture》. Fourth ed., London, 1822, p. 21)上提到欧文的平行四边形。欧文在闡述他的社会改革的空想计划时证明,从經濟上以及从建立家常生活的观点看来,最适当的是建筑平行四边形的或正方形的住宅区。“欧文的平行四边形”这一名詞就是由此而来的。——第 50 頁。
- 19 馬克思称为《Theory of Exchanges》的这篇著作是亨·丹·麦克劳德的文集“政治經濟学原理”1858年倫敦版(《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58)的第 4 章。——第 51 頁。
- 20 1844年英国政府力图防止銀行券兌換黄金的困难,根据罗·皮尔的創議,实施了英国銀行改革法,把英格兰銀行分为两个独立部門,即銀行部和发行部,并規定了銀行券的黄金保证的固定定額。沒有黄金保证的銀行券的发行額限 1400 万英鎊。但是,1844年的銀行条例沒有起到作用,实际上流通中的銀行券的数量不是取决于抵补基金,而是取决于流通領域內对銀行券的需要量。在經濟危机时期,对货币需要特别感到尖銳,英国政府暂时停止实行 1844 年的条例,增加了沒有黄金保证的銀行券的总額。——第 54 頁。
- 21 指 1707 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这次合并的結果,使苏格兰最終归并于英格兰。由于这次合并解散了苏格兰的議會,两国間存在的一切經濟上的障碍也消除了。——第 62 頁。
- 22 野蛮人的法典(*Leges barbarorum*)是五世紀至九世紀期間所編纂的

- 日耳曼各部落的習慣法的紀錄。——第 64 頁。
- 23 馬克思引自約·洛克的著作“略論降低利息和提高貨幣價值的結果。給一議員的信，1691 年”（《Some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Lowering of Interest, and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 In a Letter sent to a Member of Parliament, 1691》），根據“約翰·洛克全集”四卷集 1768 年倫敦第 7 版第 54 頁（《The Works of John Locke》. In four volumes. The seventh edition, London, 1768, p. 54）。——第 68 頁。
- 24 指《*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動產信用總公司”），是法國的一家大股份公司，由貝列拉兄弟於 1852 年創立並為 1852 年 11 月 18 日法令所批准。Crédit Mobilier 的主要目的是充當信貸的中介和濫設企業（參加工業企業和其他企業的創立）。該公司廣泛地參加了法國、奧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國的鐵路建設。它的收入的主要來源是靠證券交易所的投機買賣。Crédit Mobilier 用發行本公司的股票得來的資金收買各種公司的股票，它自己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業的有價證券作擔保，而各種公司的股票則是以它們本身財產的價值作擔保的。因此，同一實際財產產生了兩倍的虛擬資本。Crédit Mobilier 同拿破侖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關係，並受它的保護。1867 年該公司破產，1871 年停業。Crédit Mobilier 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作為新型金融企業出現，是由反動時代的特徵所引起的，在這個時代里交易所的買空賣空、投機倒把活動異常猖獗。中歐的其他許多國家也仿照法國的 Crédit Mobilier 建立了類似的機關。馬克思在發表於“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的幾篇文章中揭露了 Crédit Mobilier 的真正實質（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23—40、218—229、313—317 頁）。——第 85 頁。
- 25 指詹·穆勒的著作“為商業辯護。對斯賓斯先生、科貝特先生等人借以證明商業不是國民財富的來源的證據所作的回答”1808 年倫敦版（J. Mill. 《Commerce defended. An Answer to the Arguments by which Mr. Spence, Mr. Cobbett, and others, have at-

- tempted to prove that Commerce is not a Source of National Wealth». London, 1808)。——第 87 頁。
- 26 “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 是英國經濟、政治方面的周刊, 1843 年起在倫敦出版; 大工業資產階級的機關刊物。——第 96 頁。
- 27 彼得·施萊米爾是德國浪漫派詩人夏米索的中篇小說“彼得·施萊米爾奇遇記”中的主人公, 他用自己的影子換來一個神奇的錢袋。——第 106 頁。
- 28 *Patrem familias vendacem, non emacem esse*(家長該賣不該買) ——這是老卡托在他的著作“論農業”(«*De re rustica*») 中的用語。——第 118 頁。
- 29 指 1810—1826 年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爭取獨立的戰爭。經過這次戰爭, 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擺脫了西班牙的統治。——第 125 頁。
- 30 指 1727 年 10 月 21 日中俄簽訂的關於貿易和邊界的恰克圖條約。由於恰克圖條約的簽訂, 中俄貿易, 主要是以貨易貨的貿易大大擴大了。——第 140 頁。
- 31 指英法為了獲得新的在華特權并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的附庸國而對中國進行的侵略性的、所謂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戰爭的結果中國失敗, 簽訂了掠奪性的天津條約。——第 140 頁。
- 32 馬克思引證昂吉埃措(殉道者彼得)的著作“新大陸”(«*De Orbe Novo*») 是根據下面這本書: 威·希·普雷斯科特“墨西哥征服史——附古代墨西哥文化概述。征服者艾爾南·科爾特斯的生平”1850 年倫敦版第 1 卷第 123 頁(W. H. Prescott.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 with a Preliminary View of the Ancient Mexican Civilisation, and the Life of the Conqueror Hernando Cortez*». Vol. I, London, 1850, p. 123)。——第 144 頁。
- 33 Jakob Grimm.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Bd. I—II, Leipzig, 1848. ——第 145 頁。

- 34 法的历史学派是十八世紀末产生于德意志的历史学和法学中的一个反动流派。关于这一学派的特征，見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7—106頁和第454頁）。——第157頁。
- 35 英国財政經濟学家約翰·罗企图实现他的根本站不住脚的主張：似乎国家可以依靠把不可兌銀行券投入流通的办法来扩大国内的财富。1716年他在法国創辦了一家私人銀行。1718年这家銀行改組成国家銀行。罗氏銀行在无限发行信貸券的同时从流通中收回了硬币。結果交易所的买空卖空和投机倒把活动空前風行，直到1720年国家銀行完全倒閉和“罗氏制度”本身彻底破产才告完結。——第159頁。
- 36 針錢街是倫敦的一條街，英格蘭銀行的所在地。——第160頁。
- 37 大陸封鎖，或大陸体系，是拿破侖第一于1806年宣布的。它禁止歐洲大陸各国和英国进行貿易。参加实行大陸封鎖的有西班牙、那不勒斯、荷兰、普魯士、丹麦、俄罗斯、奥地利等国。——第168頁。
- 38 指1807年为反对拿破侖第一宣布的大陸封鎖政策而頒布的一些“敕令”(orders in council)，即禁止中立国家同法国以及加入大陸体系的国家进行貿易。——第168頁。
- 39 汉普斯泰特是倫敦29个区之一。——第172頁。
- 40 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伊索寓言中的“牧童和农夫”的故事。——第178頁。
- 41 法国和奥地利的軍隊从鎮压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时起就駐扎在羅馬和教皇国的領土上，瑞士雇佣軍則是羅馬教皇的近卫軍。——第178頁。
- 42 1847年底和1848年初，在并入奥地利帝国版图的威尼斯和倫巴第发生了意大利居民反对奥地利的群众性发动。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在1848年初被奥地利当局封閉的帕維亞城內的一个大学是运动的策源地之一。当时到处都发生了要求实行行政改

革和經濟改革的請願运动。为了对苛捐杂稅、对限制意大利工商业的措施以及对奥地利人实行的烟草壟断表示抗議，居民一致抵制奥地利的工业品和烟草；共和党人的地下小組組織了游行示威，示威者經常与軍警发生冲突。——第 179 頁。

43 指 1848 年 3 月 18—22 日米兰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为 1848—1849 年意大利革命奠定了基础。經過人民群众五天的斗争，奥地利軍隊被逐出米兰，3 月 22 日成立了有意大利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参加的临时政府。——第 179 頁。

44 1859 年 1 月 1 日，拿破侖第三在土伊勒里宮接見外交使团时，向奥地利大使許布納尔表示遺憾，說法奧之間的关系“变得不如以前那样友好”。这次談話引起了拿破侖第三与奥地利的外交冲突。而关于对奥发动战争的問題早在这以前很久就已决定了：1858 年 7 月法国和皮蒙特在普龙比埃尔簽訂了一項秘密协定，規定法国将参加即将发生的对奥战争，为此，皮蒙特答应把薩瓦和尼斯割让給法国。——第 179 頁。

45 1842—1846 年，加里波第参加了烏拉圭人民反对阿根廷独裁者罗薩斯的民族解放斗争。他所建立的意大利侨民革命軍团在烏拉圭共和国的首都蒙特維多的保卫战中和其他决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烏拉圭政府會頒发特令表彰加里波第軍团的功勋。

1849 年 2—7 月，加里波第实际上領導了由于人民起义而建立的羅馬共和国的保卫战。共和国的軍隊在几个月內胜利地击退了法国、奥地利和那不勒斯軍隊为鎮压革命而举行的进攻。1849 年 7 月 3 日，由于反革命力量占优势，同时法国將軍烏迪諾背信棄义地破坏停战协定，占領了羅馬城，因而羅馬共和国被顛复。——第 180 頁。

46 指 1858 年 8 月俄国和皮蒙特所达成的协定，根据这项协定，俄国航运貿易公司有权临时使用尼斯附近的維拉弗兰卡港灣的东部来停泊船只、添燃料和修理船只。——第 180 頁。

47 馬克思諷刺奥地利因为沙皇俄国帮助它鎮压了 1848—1849 年的匈牙利革命而“感恩图报”。五十年代初期，由于东方問題的尖銳化奥地利在对外政策上轉而敌視俄国，这种轉变表现在据說是奥地利政府首腦

- 施瓦尔岑堡說的、后来成了成語的一句話中：“奥地利还要以其忘恩負义的崇高行为使全世界惊奇。”——第 180 頁。
- 48 阿尔比昂 是不列顛群島的古称。“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这个字眼是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开始被人使用的。由于英国政府进行了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許多阴谋活动并多次組織反法同盟，所以法国共和党人这样称呼英国。——第 180 頁。
- 49 指拿破侖第三。他在 1851 年 12 月 1 日夜間实行了法国的反革命政变，推翻了第二共和国(1848—1851 年)。——第 182、196、307、435、501、543、592 頁。
- 50 皮蒙特国王查理-阿尔伯特因害怕意大利的共和主义运动扩大，千方百计地拒絕帮助在 1848 年 3 月发动起义反对奥地利統治的威尼斯和米兰。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他被迫对奥地利宣战，但是在皮蒙特軍隊最初几次失利以后，他却在 1848 年 8 月与奥地利簽訂了停战协定，1849 年春季又恢复了軍事行动，虽然皮蒙特軍隊和意大利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是他在諾瓦拉会战失败(1849 年 3 月 23 日)后，竟向奥地利投降。恩格斯在 1849 年給“新萊茵报”写的許多文章中揭露了皮蒙特君主国的这种叛变行为（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458—468 頁）。——第 183 頁。
- 51 这篇注明写于巴黎的文章是馬克思在倫敦写的。根据同“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的協議，馬克思把引用了欧洲大陆个别国家的材料的某些文章相应地分別注明巴黎、柏林或維也納，有时注明的日期也比实际写作的時間早。——第 185 頁。
- 52 指拿破侖第三，他是拿破侖第一的弟弟的，即 1806—1810 年期間占据荷兰王位的路易·波拿巴的儿子。馬克思称拿破侖第三为“奥斯特利茨会战的侄子”，是暗示下面这个事实，即 1851 年 12 月 2 日的政变正好安排在拿破侖第一粉碎了俄奥联軍的奥斯特利茨会战(1805 年 12 月 2 日)的周年紀念日。——第 185、506 頁。
- 53 指的是普魯士亲王威廉(从 1861 年起即位为国王)在 1858 年 10 月开

始攝政时宣布的“自由主义的”方針；資產階級报刊高呼这个方針是“新紀元”。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魯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陣地的。資產階級所期望的自由主义改革，一項也沒有实行，同时在 1860 年却实行了早就策划好的軍事改革，这项改革把从 1813—1815 年反对拿破侖第一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以来在普魯士軍隊中还保留着的一点民主主义殘余也消除淨尽了；改革規定后备軍（按民团形式組成的軍隊）以后只用于警备勤务，規定在平时要大大扩充軍隊人数。“新紀元”实际上为 1862 年 9 月俾斯麦执政时开始的公开的容克地主的軍事專政作好了准备。——第 186 頁。

54 *Crédit Mobilier*——見注 24。——第 186 頁。

55 “通报”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的簡称；从 1789 年至 1901 年在巴黎出版；从 1799 年至 1869 年是官方政府机关报。——第 186 頁。

56 礼拜堂街、倫巴特街都是倫敦西蒂区的街道，那里有英国最大的銀行和商业企业；針綫街——見注 36。——第 186 頁。

57 指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俄国在中亚細亚和远东的陣地的加强。在这个时期俄国在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和浩罕汗国的势力大大加强了；由于同中国簽訂了各种条約，1858 年黑龙江北岸地区歸属于俄国，此外，为俄国貿易开辟了五个中国商埠。——第 187 頁。

58 “小拿破侖”是維克多·雨果給路易·波拿巴起的帶諷刺性的綽号，在他的抨击性小册子“小拿破侖”（1852）問世以后，这个綽号得到了广泛流傳。——第 187 頁。

59 指的是亚历山大二世自 1855 年即位以后，懼于国内农民騷动的声势浩大而不止一次約許过的关于廢除农奴制的諾言。——第 188 頁。

60 *«L'Empire c'est la paix»*（“帝国就是和平”）是 1852 年 10 月 9 日路易·波拿巴在波尔多发表的讲话中的話。——第 188 頁。

61 根据 1859 年 1 月 15 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写的，在寄往美国以前經馬克思修改和补充。——第 189 頁。

- 62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是一家資產階級日報，1831年創辦于布魯塞爾；是自由派的機關報。——第189頁。
- 63 “泰晤士報”（《The Times》）——英國最大的一家保守派的日報；從1785年起在倫敦出版。——第189頁。
- 64 巴黎條約是1856年3月30日由法國、英國、奧地利、撒丁、普魯士和土耳其的代表為一方和俄國代表為另一方在巴黎會議上所簽訂的和約，也就是結束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戰爭的和約。在戰爭中遭到失敗的俄國應當讓出多瑙河河口和南貝薩拉比亞的部分地區，放棄對多瑙河各公國的保護權和對土耳其基督教臣民的庇護權，同意黑海中立化，即禁止外國的軍艦通過海峽，同意俄國和土耳其在黑海不能有海軍軍火庫和艦隊；俄國把卡爾斯歸還給土耳其，以此來換回聯軍在克里木占領的塞瓦斯托波爾和其他城市。媾和條件雖然對俄國來說是苛刻的，但是英國和奧地利仍未能全部實現其侵略意圖。影響談判結局的原因之一，是俄國外交方面很好地利用了英法之間的矛盾。在會議上法國不支持英國想從俄國手中奪取高加索的要求以及奧地利想使貝薩拉比亞併入土耳其的要求。在會議上形成的法國和俄國之間的接近後來又進一步加強了。——第190頁。
- 65 意大利燒炭黨最高溫特是十九世紀初出現的，以把外國侵略者趕出意大利和實行資產階級改革為目的的燒炭黨人的密謀性團體的領導機關。1831年，路易·波拿巴在意大利加入了燒炭黨人的團體，一度還參加過該黨的活動。——第190、196頁。
- 66 埃普塞姆——倫敦的一個郊區，那里每年春天都舉行賽馬會。——第191頁。
- 67 指的是費利切·奧爾西尼在1858年2月11日和3月10日寫的信，根據官方的說法，這些信件是奧爾西尼由馬扎斯監獄和拉-羅克特監獄寄給拿破侖第三的，這位意大利愛國者在行刺拿破侖第三未遂後被囚於這兩個監獄。第一封信是在審訊奧爾西尼時宣讀的，後來於1858年2月27日載於“通報”；第二封信是奧爾西尼被處死后公布的。奧爾西尼寫這兩封信給路易-拿破侖的事實是否確鑿，直到現在還是歷史文獻中

- 的疑案。——第 191 頁。
- 68 *Crédit Foncier* (土地信用公司) 是法国的一家股份銀行。它是 1852 年在前巴黎土地銀行的基础上建立的。*Crédit Foncier* 发放以不动产作抵押并支付一定利息的短期和长期貸款 (期限为 50 年)。*Crédit Foncier* 得到政府的大量津貼。——第 191 頁。
- 69 德意志联邦是 1815 年維也納會議上成立的德国各邦的联盟, 最初它包括 34 个邦和 4 个自由市。在联邦的两个最大的邦奥地利和普魯士之間曾不断地进行爭夺領導权的斗争。——第 193 頁。
- 70 暗指当时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于 1850 年 10 月 10 日在薩托里平原 (靠近凡尔賽) 举行总閱兵一事。正在策划政变的波拿巴, 为了博得兵士和軍官的好感, 在閱兵时犒賞了他們。——第 196、307、427 頁。
- 71 指七月王朝时期路易·波拿巴通过軍事叛乱实行政变的企图。1836 年 10 月 30 日, 他依靠一些具有波拿巴主义情緒的軍官的帮助, 煽动了斯特拉斯堡守备部队的两个炮兵团实行叛乱, 但是, 仅仅經過几个小时, 叛乱者就被解除了武装。路易·波拿巴本人被逮捕并流放到美洲。1840 年 8 月 6 日, 他趁波拿巴主义情緒在法国又有抬头之际, 同一伙阴谋分子在布倫登陆, 企图在当地守备部队中掀起叛乱。这一企图也彻底失败了。波拿巴被判处无期徒刑, 但是, 他在 1846 年逃往英国。——第 196 頁。
- 72 “立宪主义者报” (*«Le Constitutionnel»*) 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 1815—1870 年在巴黎出版; 在四十年代是奥尔良党人温和派的机关报; 它在 1848 年革命时期反映了聚集在梯也尔周圍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 1851 年 12 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 197 頁。
- 73 暗指拿破侖第一出于政治考虑而同奥皇的女儿瑪丽亚-路易莎結婚一事。——第 198 頁。
- 74 指 1858 年 7 月拿破侖第三在普侖貝尔 (法国) 同皮蒙特首相卡富尔会晤时所簽訂的协定。协定規定, 取消奥地利对倫巴第和威尼斯的統治,

- 建立在薩瓦王朝領導下的北意大利國家，皮蒙特把薩瓦和尼斯割讓給法國。1859年1月以前，這個協定一直是秘密的。——第198頁。
- 75 帕勒-樂雅爾宮是巴黎的一座皇宮，在五十年代是約瑟夫·波拿巴（普隆-普隆）親王的官邸。——第198頁。
- 76 “新聞報”（*«La Presse»*）是法國的一家資產階級日報，1836年起在巴黎出版；五十年代站在反對第二帝國政體的立場上；該報的編輯是艾米爾·德·日拉丹。馬克思把這一報紙諷稱為普隆-普隆的“通報”，即普隆-普隆的官方通報。——第198頁。
- 77 1815年6月9日維也納會議的最後決議規定，恢復法國1792年的疆界，並將法國置於列強的嚴格監督之下。根據這一決議，法國不得再占有歐洲的領土。但是，對於作為法國掠奪性的殖民政策對象的北非和其他領土，沒有作出保留聲明。——第199頁。
- 78 指1859年1月30日“立憲主義者報”第30號上發表的、由法國記者路·博尼法斯署名的一篇文章。——第200頁。
- 79 “美國信使報”（*«Le Courrier des États-Unis»*）是一家法文日報，從1828年到1938年在紐約出版，反映法國政府的立場。——第200頁。
- 80 指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戰爭。——第201頁。
- 81 朱阿夫兵是從1830年起在阿爾及利亞建立的由當地居民和法國移民組成的法國殖民部隊，後來，這支部隊完全由法國人組成。當地居民被劃出組成阿爾及利亞獵兵特別團。
捷菲爾兵是法國軍隊中由犯人組成的非洲步兵部隊的非正式名稱。——第202頁。
- 82 近衛軍是拿破侖第三在1854年仿照1815年解散的拿破侖第一的皇家近衛軍建立的。——第204頁。
- 83 邊屯區——十六至十九世紀時期奧地利帝國南部地區（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斯拉窩尼亞、巴納特）被稱為邊屯區。邊屯區居民必須擔任邊防勤務，才能耕種土地。——第207頁。

- 84 指1848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奧軍強攻革命的維也納時參加戰鬥的斯拉夫部隊。——第209頁。
- 85 瑞士武裝力量是在民兵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平時，凡是能夠服兵役的公民都要進行短期的訓練，一旦發生戰爭就宣布總動員。——第210頁。
- 86 巴塞爾和約是參加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普魯士在1795年4月5日同法國單獨締結的。這一和約的締結，不僅是法軍勝利的結果，而且是反法同盟的成員國首先是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發生分歧的結果。
- 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會戰中，普魯士軍隊被拿破侖第一的軍隊擊敗，這促使普魯士向拿破侖法國投降。
- 關於奧斯特利茨會戰見注52。
- 1809年7月5—6日在瓦格拉姆會戰中，拿破侖第一對奧軍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第212頁。
- 87 指1796—1797年波拿巴在對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戰爭中在意大利戰局最初階段進行的幾次會戰。1796年4月，波拿巴的軍隊從尼斯經由山道向波河河谷發起進攻，4月12日在蒙特諾特擊敗了一股奧軍；4月13—14日在密雷樞摩粉碎了與奧軍結盟的皮蒙特軍隊編制中的一股奧軍；4月14—15日在德果擊敗了前來援救這一股軍隊的奧軍。1796年4月22日，法軍在蒙多維與皮蒙特軍隊進行決戰，結果皮蒙特軍隊向都靈潰退。——第213、234、665頁。
- 88 波拿巴圍攻曼都亞是在1796年6月開始的。當時，波拿巴的主要兵力正在對那些企圖替要塞解圍的奧軍作戰。1796年8月5日，波拿巴在卡斯提奧涅擊敗了烏爾姆捷爾指揮的奧軍，1796年9月上半月在布蘭塔河河谷再次擊敗了烏爾姆捷爾的軍隊；1796年11月15—17日，法軍在阿爾科列會戰中粉碎了新派往曼都亞解圍的奧軍；1797年1月14—15日波拿巴在里沃利會戰中又一次打敗了奧軍。經過9個月的圍攻，法軍終於在1797年2月2日迫使曼都亞守軍投降。——第213頁。
- 89 拿破侖的軍隊圍攻但澤（格但斯克）是在拿破侖第一對歐洲各國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戰爭期間，於1807年3月開始的。守備要塞的普魯士軍

队和俄国部队进行了頑强的抵抗。守軍的行动得到另一支曾多次企图解圍的俄国部队的支援。直到 1807 年 5 月底，在不受侮辱的条件下，要塞守軍才向优势敌人投降。——第 213 頁。

- 90 1515 年 9 月 13—14 日的馬利尼亚諾会战，是法国、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在 1494—1559 年进行的意大利战争中最重大的会战之一。在会战中，法国国王弗朗斯瓦一世的軍队打败了米兰公爵的瑞士雇佣軍。1525 年 2 月 24 日，弗朗斯瓦一世的軍队在帕維亚被德国皇帝查理五世的軍队所击败。

1706 年在都灵会战中，意大利軍队粉碎了圍攻都灵 117 天的法軍。

1799 年 8 月 4 日(俄历 15 日)在諾維会战中，由亚·瓦·苏沃洛夫指揮的俄奧联軍，粉碎了茹貝尔的法軍，最后把法軍逐出北意大利。

1800 年 6 月 14 日在馬連峨会战中波拿巴的軍队击败了奧軍。

1848 年 7 月 25 日在庫斯托查，由拉德茨基指揮的奧軍使皮蒙特軍队遭受了惨重的失敗。

关于諾瓦拉会战見注 50。——第 213 頁。

- 91 原文是双关語，«captain» 既有“統帥”的意思，又有“上尉”的意思。前瑞士炮兵上尉是指路易·波拿巴，他在瑞士住过很長時間，曾入瑞士國籍，1834 年曾任伯尔尼州炮兵团的上尉。——第 214 頁。

- 92 1830 年法国政府开始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掠夺性的殖民战争。由于殖民者遇到了阿尔及利亚人民頑强的抵抗，这一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了 40 年。直到 1871 年，法国资产阶级才最后把阿尔及利亚变成自己的殖民地。——第 218 頁。

- 93 指 1800 年的意大利战局。奧軍总司令梅拉斯最初在瓦尔河附近胜利地攻击了法軍右翼，但是在 1800 年 5 月下半月，波拿巴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了奧軍的后方。6 月 2 日，法軍占領米兰，并渡到波河南岸，1800 年 6 月 14 日奧軍在馬連峨被击潰。——第 220 頁。

- 94 指“工厂視察員向女王陛下內政大臣所作的截至 1858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报告” 1858 年倫敦版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8». London, 1858)。——第 221 頁。
- 95 阿本斯堡会战和 埃克繆尔 会战是 1809 年法奥战争期間拿破侖第一的軍隊和奥軍于 1809 年 4 月在累根斯堡(巴伐利亚)地区进行的历时 5 天的会战的两个阶段。累根斯堡会战以奥軍的失敗和退却而告終。——第 234 頁。
- 96 1848 年 7 月 23 日在索馬康帕尼亞会战中,奥軍在拉德茨基指揮下打敗了皮蒙特軍隊,这一会战之后皮蒙特軍隊紧接着就在庫斯托查被击潰。——第 234 頁。
- 97 除了本文以外,馬克思还在 1859 年 3 月 22 日和 4 月 1 日写了兩篇文章,論述 1859 年的議會改革法案,但是它們沒有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我們也沒有搜集到。——第 235 頁。
- 98 1851 年 2 月提交下院討論的 洛克·金法案 規定把土地租賃者的选举資格限制从每年收入 50 英鎊降低为 10 英鎊,从而就使他們同城市中房屋租賃者在权利上平等了,这一法案遭到議會否決。——第 235 頁。
- 99 自由农 是英国小土地所有者的一种,这种名称起源于中世紀的“自由所有者”。自由农向貴族繳納少量固定的貨幣地租,并且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为自由农規定的选举財產資格限制是很低的,即每年純收入为 40 先令(2 英鎊)。——第 235 頁。
- 100 1831 年經英国下院通过、1832 年 6 月經上院最后批准的选举法改革的目的是反对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的政治壟斷,它为工业資產階級的代表进入議院打开了大門。在爭取改革的斗争中作为主力的无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受了騙,沒有获得选举权。有一条条文規定,只有每年繳納租金 50 英鎊以上的租地者才能享有选举权,这一条文是被当作对契安多斯(格倫維耳)公爵法案的修改而提出的。——第 235 頁。
- 101 1852 年 2 月,約翰·罗素作了一个关于提出改革法案的預先声明。法案規定的各項措施——取消 1832 年改革以后仍然保留下来的居民在

500 人以下的、过去曾經选派議員的所謂“腐朽的市鎮”，重新分配議員的席位，使之有利于大城市，以及降低选举資格限制和財產資格限制——是为了加强工业資產階級的政治权力；但是，这一法案也沒有提交議院討論。

1854 年 2 月，約翰·羅素提出了一個新法案，提出对农村选区和城市选区应权利平等，凡是每年薪金达 100 英鎊以上的人，或者持有国家有价证券、銀行股票或东印度公司股票而每年收入的利息在 10 英鎊以上的人，或者在儲蓄所有 50 英鎊以上存款的人，都可以享有选举权；并且提出要給持有大学毕业证书的人以选举权。約翰·羅素的这个法案遭到下院否决。——第 237 頁。

102 指埃倫伯勒起草的印度管理法案。1858 年春天提出的这个法案規定要通过英国各居民阶层的代表进行选举的极其复杂的程序来成立印度事务委员会。这一法案遭到議會否决。——第 237 頁。

103 契約农是根据租佃权而占用土地的人，租种的期限和条件由大地主和佃农訂立的契約来确定。契約农同时也可能是小土地所有者。——第 237 頁。

104 指“倫敦官报”(《The London Gazette》)，英国政府的机关报；1666 年起，以这个名称每周出版两次。——第 239 頁。

105 1859 年 3 月—4 月初在二讀时，选举改革法案因为没有获得多数票的通过，遭到議會否决。——第 239、355 頁。

106 指 1844 年的法律，該法律禁止工厂雇用 8 岁以下儿童，并把 8 岁至 13 岁儿童的工作時間限制为六个半小时。这一法律同时也承认了 1833 年法律所規定的对童工的义务教育，但作了若干改变。——第 240 頁。

107 指的是由于通过 1844 年的法律而更改 1833 年的法律。按照新法律，絲織业中年齡在 11 岁以上的童工可以不上学。——第 242 頁。

108 “波河与莱茵河”这一著作是弗·恩格斯在下述情况下写的，当时在意大利即将发生冲突，有必要明确无产階級革命家和欧洲的民主派对德国統一和意大利統一的道路問題所应采取的立場，以反对資產階級的，

首先是德国資產階級的观点。在这一著作中恩格斯还提出了一项任务：揭穿欧洲各国統治集团用来为其侵略和掠夺政策辯护的各种沙文主义理論，并证明这些理論从战略的观点来看都是不能成立的。

这一著作恩格斯在2月計劃撰写，3月9日就已写成，并将手稿送給馬克思校閱。馬克思看过以后，給予很高的評价。1859年3月10日他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说：“妙极了，就連很难处理的这一問題的政治方面，也闡述得非常出色。”根据馬克思的建議，为了避免官方以沉默来抵制的陰謀，这一著作是在德国匿名刊印的。1859年4月它由柏林敦克尔出版社出版，印数是1000册。这一著作对当时德国的社会輿論有很大的影响。它在軍界也很有影响；許多人都以为，作者是一位著名的將軍。1859年5月，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有必要让广大讀者了解这一著作出自哪一党派，于是就在“人民报”第2号指出，它的作者是无产階級政党的一位著名活动家；稍晚一些时候，在6月4日“人民报”第5号上公布了恩格斯的姓名。——第247頁。

109 指1848年8月12日拉多維茨在德国国民議会會議上的講話。从1848年5月18日到1849年5月30日，国民議会的會議都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举行的。——第250頁。

110 威·維利森“1848年意大利战局”1849年柏林版(W. Willisen. «Der Italienische Feldzug des Jahres 1848». Berlin, 1849)。——第250頁。

111 根据1648年結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約，原来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阿尔薩斯和部分洛林轉归法国。1766年整个洛林都归屬法国。——第251頁。

112 德意志民族神圣羅馬帝国是創立于962年的一个中世紀的帝国，其領土包括整个德国和部分意大利。后来，法国的部分領土、捷克、奥地利、尼德兰、瑞士和其他国家也加入了这个帝国。这个帝国不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而是承认皇帝的最高权力的各封建公国和自由市的不巩固的联盟。1806年对法战争失敗后，哈布斯堡王朝被迫放棄神圣羅馬帝国皇帝的封号，这一帝国便不复存在了。——第251、395頁。

- 113 指南尼德兰 (即現在的比利时和卢森堡)。南尼德兰从 1714 年到 1797 年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領地, 当时被称为奥屬尼德兰。——第 251 頁。
- 114 指对拿破侖第一的大陆体系 (見注 37) 的模仿。——第 251 頁。
- 115 見注 90。——第 253 頁。
- 116 七年战争 (1756—1763 年) 是歐洲两个国家联盟間的战争: 一方是英、普, 另一方是法、俄、奥。这次战争是由于各封建专制大国 (普魯士、奥地利、俄国、法国) 之間的利益发生冲突以及法国和英国的殖民竞争而引起的。战争的結果是, 不列顛殖民帝国靠占有法国的領地而得到扩张和俄国实力的增长; 奥地利和普魯士基本上保持原来的疆界。——第 262 頁。
- 117 这是若米尼在他著的“軍事学术概論, 或战略、大型战术和軍事政策的配合的新分析表解” (《Précis de l'art de la guerre, ou Nouveau tableau analytique des principales combinaisons de la stratégie, de la grande tactique et de la politique militaire》) 一书中所用的术语。該书的第一版于 1838 年在巴黎出版。——第 263 頁。
- 118 見注 43。——第 265 頁。
- 119 在 1848 年的三月日子里, 在全意大利奋起反对奥地利統治的人民群众的压力下, 教皇庇护九世和那不勒斯的国王斐迪南二世被迫派军队去北意大利参加反对奥地利的斗争; 但是这些军队参加解放战争是暫时的, 不久斐迪南二世和庇护九世便公开投入意大利革命的敌人的陣营。——第 266 頁。
- 120 1848 年 5 月 15 日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实行了反革命政变, 殘酷地镇压了那不勒斯的人民起义。原来在倫巴第支援革命軍的一个那不勒斯軍被斐迪南二世召回那不勒斯, 这減輕了拉德茨基在北意大利的負担。——第 266 頁。

- 121 所列举的是 1796—1797 年波拿巴所进行的意大利战局中在圍攻曼都亚时期(見注 88)发生的几次会战:在美多列,奥軍败于法軍;在巴薩諾,波拿巴于 1796 年 9 月 8 日击败了武尔姆澤尔指揮的奥地利軍队;由于在 1796 年 11 月 6—7 日的卡利阿諾会战中遭到失败,法国軍队被奥地利軍队击退到里沃利。——第 268 頁。
- 122 指 1809 年提罗耳农民在安德列阿斯·霍弗领导下进行的反对拿破侖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这次起义战争中,提罗耳人广泛地采用了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法。1809 年 10 月奥地利政府同拿破侖法国签订和約以后,提罗耳农民由于得不到奥地利正規軍的支持,于 1810 年被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所击潰。——第 269 頁。
- 123 指法国反对第二次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时期于 1800 年 12 月 3 日发生的霍根林登会战。法国軍队在莫罗指揮下击败了約翰大公的奥地利軍队。——第 269 頁。
- 124 指毕洛夫著的“德国和意大利 1800 年战局史”(Bulov. «Histoire de la campagne de 1800 en Allemagne et en Italie»)一书。該书第一版于 1801 年在柏林以德文出版。——第 269 頁。
- 125 指 1808—1814 年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占領者的民族解放斗争。在反对拿破侖軍队的斗争中,西班牙人广泛地采用了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法。——第 271 頁。
- 126 萊茵联邦是 1806 年 7 月在拿破侖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的各邦的联盟。由于 1805 年击潰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侖能够在德国建立这种軍事政治堡垒。有 16 个德国邦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 5 个邦加入,它們实际上成了拿破侖法国的藩屬。1813 年拿破侖的軍队在德国遭到失败以后,萊茵联邦便瓦解了。——第 272 頁。
- 127 根据 1805 年 12 月 26 日法国和奥地利在普勒斯堡(布拉的斯拉发)签订的和約,奥地利承认法国对意大利部分領土(皮蒙特、热那亚、帕尔馬、皮阿琴察等)的占領,并把亚得利亚海的沿海地区(威尼斯省、伊的利亚半島和达尔馬威亚)让給了意大利王国(也就是让給当了意大利

国王的拿破侖第一),自己仅保留了的里雅斯特。拿破侖把提罗耳轉让給了与他結盟的巴伐利亚。——第 272 頁。

128 指 1806 年 10 月 14 日法軍在耶拿和奧埃爾施太特战胜了普魯士軍隊以后,在拿破侖第一率領下在普魯士疾速地、几乎毫无阻擋地向前推进的事实;10 月 28 日法軍就已进入施特廷(茲杰辛)。——第 277 頁。

129 公元前 321 年,在第二次薩姆尼特战争时期,薩姆尼特人在古羅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中击败了羅馬軍团,并强迫他們通过軛形門,这对战败的軍隊來說是最大的耻辱。从此便有了“通过卡夫丁峡谷”的說法,即遭受莫大的侮辱。——第 278 頁。

130 指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初意大利的革命事件。1820 年 7 月資產階級革命者燒炭党人在那不勒斯发动起义,反对专制制度,争取实行了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的宪法。1821 年 3 月皮蒙特发生起义。领导起义的自由党人頒布了宪法,并企图利用北意大利反对奥地利統治的运动,将整个国家在皮蒙特执政的薩瓦王朝的統治下统一起来。由于神圣同盟各大国的干涉以及奥地利軍隊占領了那不勒斯和皮蒙特,这两个国家又恢复了专制制度。——第 278 頁。

131 1808 年秋,当拿破侖第一到爱尔福特同俄皇亚历山大一世进行談判时,几乎整个德国都向法国屈服了,只有奥地利还对拿破侖作过抵抗。为了向拿破侖表示忠誠而聚集到爱尔福特的德国各邦君主,同意共同反对奥地利。

1850 年 5 月和 10 月,在华沙举行了有俄国、奥地利和普魯士参加的會議,會議是由于奥地利和普魯士爭夺德国霸权的斗争尖锐化而由俄国倡議召开的。在會議上,俄皇以奥普爭端的調停人的身分出現,他利用自己的影响,迫使普魯士放棄了在它的保护下建立德国各邦的政治联盟的企图。

布隆采耳会战在这里是对庫尔黑森(黑森—加塞尔)起义时期于 1850 年 11 月 8 日普魯士和奥地利先头部队发生的一次小战斗的諷称;当时普魯士和奥地利彼此爭夺干涉庫尔黑森內政以鎮压起义的权利。在与普魯士发生的这次冲突中,奥地利又得到了俄国在外交上的支持,

- 普魯士被迫让步。——第 280 頁。
- 132 指反拿破侖同盟的軍隊于 1814 年 3 月 30—31 日和 1815 年 7 月 6—8 日占領巴黎的事實。——第 282、676 頁。
- 133 奧登納德會戰發生在 1708 年 7 月 11 日，在爭奪西班牙王位繼承權的戰爭時期。法軍被英奧聯軍所擊敗。
- 1792 年 11 月 6 日，法國革命軍在杜木里埃指揮下于熱馬普大勝奧軍。1794 年 6 月 26 日在弗略留斯會戰中，法軍擊潰了科堡公爵的軍隊。這項勝利使法軍得以進入比利時境內并占領比利時。
- 1815 年 6 月 16 日，普魯士軍隊在布呂歇爾指揮下于利尼被拿破侖的法軍所擊敗。這是拿破侖第一獲勝的最后一次會戰。1815 年 6 月 18 日在滑鐵盧會戰中，拿破侖的軍隊被威靈頓和布呂歇爾指揮的英荷聯軍和普魯士軍隊所擊潰。——第 285 頁。
- 134 指 1814 年 2—3 月拿破侖第一在蒙米賴、梯叶里堡、里姆等會戰中戰勝了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優勢兵力。——第 286 頁。
- 135 威塞爾、卡斯特爾和克爾于 1808 年并入法國；在聯軍粉碎了拿破侖法國以後，這些萊茵河上的築壘據點歸還給了普魯士。——第 288 頁。
- 136 丹麥到埃德爾河！——十九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的丹麥自由黨（即埃德爾丹麥人黨）提出來的口號，他們要求把居民主要是德國人并且與鄰近的其他德國地區有埃德爾河一河之隔的什列斯維希公國完全與丹麥合并。——第 293 頁。
- 137 羅伊斯-格萊茨-施萊茨-羅賓斯坦 是諷指德國的各小邦，它們的正式名稱是弟系羅伊斯和長系羅伊斯。——第 293 頁。
- 138 根據 1815 年維也納會議的決定，比利時和荷蘭組成一個統一的尼德蘭王國，而比利時實際上是求屬於荷蘭。由于 1830 年的資產階級革命，比利時成了獨立的君主立憲國。——第 294 頁。
- 139 暗指德國資產階級政論家格·弗·科爾布在 1859—1866 年由他擔任編輯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報紙“新法蘭克福報”上發表的充滿普魯士大國

政策精神的好战言論。——第 295 頁。

- 140 这是 1748 年 8 月 14 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給騎兵少將們的訓示中的話。——第 296 頁。
- 141 七年战争(1756—1763 年)时期,在 1757 年 11 月 5 日的罗斯巴赫会战中,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打败了法国和与普魯士为敌的德国各邦的联合兵力。1758 年 8 月 25 日(俄历 14 日)在措尔恩多夫,弗里德里希二世同俄国军队进行了会战,結果双方都遭到了惨重的損失,未分胜敗。
在爭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权的战争(1740—1748 年)时期,在 1745 年 6 月 4 日的霍恩弗里德贝尔格会战中,普魯士军队在弗里德里希一世指揮下击败了奥地利—薩克森的联军。在这几次会战中,普魯士騎兵都起了巨大的作用。——第 296 頁。
- 142 神圣同盟 是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魯士为了鎮压一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和維護那里的封建君主制度于 1815 年建立的欧洲各专制君主的反动联盟。——第 296、673 頁。
- 143 指波拿巴分子拉·格隆尼埃尔匿名出版的小册子“皇帝拿破侖第三和意大利”1859 年巴黎版(«L'Empereur Napoléon III et l'Italie». Paris, 1859)。——第 297 頁。
- 144 1858 年底到 1859 年初,在 1815 年确立了英国保护权的伊奥尼亚群島上当地居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加强了,他們要求取消不列顛高級專員对該島的专制統治,并与希腊合并。从 1815 年以来一直延續不断的斗争在 1864 年以伊奥尼亚群島轉归希腊而告終。
1857—1859 年印度发生了反对英国統治的大規模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是 1857 年春在孟加拉军队中由当地居民組成的所謂西帕依部队发动的,起义席卷了印度北部和中部极其广大的地区。起义的主要动力是农民和城市貧苦的手工业者。由当地封建主所领导的这次起义,由于印度的封建割据状态、宗教和种姓上的分歧以及殖民者在軍事技术上占着优势,結果遭到了失敗。——第 298 頁。

- 145 恩格斯关于一些小民族的历史命运的看法，即他认为这些小民族通常没有能力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下去，而在集中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被更大的、生命力更强的民族所吞并的意見，是不确切的。恩格斯正确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集中的趋势，建立大国的趋势，但是没有充分估計到另一种趋势——小民族反对民族压迫、爭取独立的斗争的趋势，它們力求建立自己的国家的趋势。历史表明，有許多小民族，而且首先是以前参加了奥地利帝国的那些斯拉夫民族，不仅表现了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发展的能力，而且成了建立新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参加者(关于这一点詳見本版第6、8和11卷的說明)。——第298頁。
- 146 本文和下一篇文章“土伊勒里宮的叹息”原是馬克思写的一篇文章，但“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把它作为两篇独立的社論分別发表在該报的两号上。——第300頁。
- 147 指1859年3月5日“通报”非官方栏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紐約每日論壇报”曾予轉載。——第300頁。
- 148 法国外交曾利用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公国希望合并成一个統一国家的願望来巩固拿破侖第三帝国在巴尔干的势力。1859年1月在法国和俄国的协助下亚历山大魯·庫扎上校被选为两个公国的国君(执政者)。統一的羅馬尼亚国家到1862年才建立。——第301、505頁。
- 149 指拿破侖第三写給英国作家弗兰西斯·赫德的信。这封信刊載在1859年3月5日的“泰晤士报”上。——第302頁。
- 150 暗指弗·赫德的著作“拿騷泉源的肥皂泡”。在該书出版后不久他就获得了从男爵的封号。——第302頁。
- 151 暗指路易·波拿巴亲王在1838—1840年和1846—1848年間作为流亡者侨居英国一事。——第302頁。
- 152 指路易·波拿巴在1836年和1840年先后企图在法軍中掀起叛乱都遭到失敗的事实(見注71)。——第303頁。

- 153 1846年2月在波兰領土上准备进行一次爭取波兰民族解放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貴族的叛卖行为和起义领导人被普魯士警察所逮捕,总起义遭到了破坏,只是发生了个别的革命爆发。只有在从1815年起由奥地利、俄国和普魯士共管的克拉科夫,起义者在2月22日获得了胜利,成立了国民政府,頒布了廢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鎮压下去了。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魯士和俄国簽訂了条約,把克拉科夫归并奥地利帝国。——第306頁。
- 154 指1848年奥地利的尖銳的財政危机。危机的表現是:国債大量增加,货币貶值,紙币大量发行。——第306頁。
- 155 指拿破侖第三在1859年1月1日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上所作的反对奥地利的談話(見注44)。——第306頁。
- 156 1858年2月在指責英国允許政治侨民避难的法国政府的威胁的影响下,帕麦斯頓在下院提出了一个外侨管理法案。根据这一法案,参加阴谋活动的外国人,同英国人一样,要受到严厉的懲罰。这个法案在群众抗議运动的压力下被下院否決了,帕麦斯頓也被迫辞职。——第307頁。
- 157 唐宁街是倫敦中心区的一条街道,英国政府的所在地。——第307頁。
- 158 1852年法国政府制定了一个从非洲(包括葡屬非洲領地)把黑人迁移到法屬西印度殖民地的种植場去劳动的計劃。这个实际上恢复了奴隶买卖的計劃的实行,引起了法国和葡萄牙之間的冲突。1857年11月載有黑人的法国軍舰“沙尔和若尔日号”在东非洲海岸的葡屬領地被扣留了,欧洲报纸对这件事反应頻繁。——第307頁。
- 159 1801年法国和奥地利之間簽訂的呂内維尔和約和1802年法国和英国之間簽訂的亞眠和約結束了法国和第二次反法同盟之間的战争。但是,和平是非常短暫的。由于英国不履行亞眠和約中規定的撤出它在1800年占領的馬尔他島并将其交由各列强共同保护的条款,拿破侖第一便以此为借口重新恢复战争。1803年3月拿破侖在土伊勒里宮接見

- 英国大使惠特沃思勋爵結束談話时尖声喊道：“馬耳他或者战争！”——第 307 頁。
- 160 1858 年秋，帕麦斯顿（他当时是反对得比-迪斯累里托利党内閣的輝格党反对派的領袖）应拿破侖第三的邀請到貢比臬去闡明他对行将来临的法国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的态度。在会見时，帕麦斯顿并不反对把奥地利人从意大利赶出去。但是在 1859 年 2 月 3 日議會開幕时，帕麦斯顿在演說中譴責了法国的行动。——第 307 頁。
- 161 英国公爵的幼子們获得“礼貌上尊称的”（«by courtesy»）勋爵的封号，就是說，他們只是由于习惯而获得这样的封号，在法律上并没有继承这个封号和成为上院議員的权利。「by courtesy」这个常用語适用于一切不是由法律保证的，而是恩赐的或相沿成习的东西。——第 308 頁。
- 162 1840 年 7 月 15 日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魯士背着法国在倫敦簽訂了关于援助土耳其苏丹以反对受法国支持的埃及統治者穆罕默德-阿利的协定。由于这个协定的締結，法国和欧洲各国同盟之間便产生了爆发战争的危險。但是路易-菲力浦国王没有下定决心打仗，放棄了对穆罕默德-阿利的支持。——第 309 頁。
- 163 奥地利在 1859 年 2 月 22 日向普魯士递交了一份照会，該照会同时分发给加入德意志联邦的德国其他各邦，在照会中奥地利要求普魯士履行自己对盟邦所負的义务，参加行将来临的反法斗争。——第 309 頁。
- 164 暗指意大利燒炭党人的秘密团体（見注 65）。
菲麦（*Vehme*）是中世紀德国秘密法庭的名称，它們以秘密审判的方式对被告做出缺席判决，并且秘密加以执行。——第 310 頁。
- 165 指奥地利，它曾在 1855 年和羅馬教皇庇护九世簽訂了一个宗教条約。根据这个条約，1848—1849 年革命期間被廢除了的許多天主教会的特权恢复了。主教們重新获得了同羅馬直接联系的权利，設立了最高宗教檢查机构，学校的課程受到教会的监督。为监督宗教条約的执行，在維也納成立了一个特別宗教會議，由圣使担任主席。——第 311 頁。
- 166 拉姆別薩（拉姆別茲）是在北非古羅馬的一个同名城市的廢墟上建立

起来的感化移民区；从 1851 年至 1860 年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

凱恩 是法屬圭亚那(南美)的一个城市，政治犯流放和服苦役的地方。——第 312 頁。

167 关于华沙會議和布隆采耳会战 見注 131。

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問題是 1848—1850 年間奧普关系尖銳化的原因之一。1848 年 3 月，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爆发了反对丹麦的民族解放战争，普魯士站在起义者方面，参加了战争。奥地利在此时期和其他的欧洲列强一起支持丹麦君主国，并对普魯士施加压力，迫使它在 1850 年 7 月和丹麦締結和約。1851 年冬，德意志联邦的军队(奥軍是其組成部分之一)对起义者进行了討伐，迫使后者放下武器。

在克里木战争(1853—1856 年)期間，在俄国和西方列强之間投机取巧的普魯士在奥地利以及英国和法国的压力下，被迫在 1854 年同意奥地利关于俄軍必須从多瑙河两公国撤退的要求，并答应在战争結束时支持奥地利向俄国提出的敦促沙皇政府接受联軍的条件作为和平談判基础的最后通牒。——第 312 頁。

168 指 1858 年 5—8 月在巴黎召开的各大国(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土耳其、普魯士、撒丁)會議上普魯士所持的反奧立場，在会上普魯士不顾奥地利的反对，支持了关于把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公国合并成一个統一国家的建議(見注 148)。

联邦議會 是德意志联邦(見注 69)的中央机关，設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德国各邦的代表組成。联邦議會是执行德国各邦的反动政策的工具。

普魯士駐联邦議會的全权代表从 1851 年起是俾斯麦。他在开始进行活动时力求和奥地利結盟，后来采取了坚决反奧的立場。1859 年初烏澤多姆被任命为普魯士的全权代表以代替俾斯麦。——第 313 頁。

169 确定了共同稅界的德国各邦的 关税同盟，是 1834 年在普魯士领导下成立的。后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国所有各邦。由于必須建立統一的德国市場而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也促进了德国在政治上的統一。——第 313、525 頁。

- 170 关于巴塞尔和約 見注 86。——第 313 頁。
- 171 “新普魯士報”（*«Neue Preuß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 年 6 月起在柏林出版，它是反革命宫廷权奸和普魯士容克地主的机关报。这家报纸也称为“十字报”，因为在它的报头上印有一个十字。——第 313 頁。
- 172 指 1859 年在柏林出版的小册子“普魯士人和意大利問題”（*«Preußen und die Italienische Frage»*）。——第 313 頁。
- 173 貝奧提亞人——貝奧提亞省的居民，这个省被认为是古希腊的一个經濟文化落后的省份。——第 314 頁。
- 174 指 1848 年 6 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議會宣布奥地利大公約翰为帝国摄政王，授权他在帝国宪法生效以前掌管执行权；1849 年 12 月以前担任摄政王的約翰实际上是德国君主們的反革命政策的执行者。——第 314 頁。
- 175 1855 年 4 月拿破侖第三和皇后欧仁妮一起訪問了英国。——第 317 頁。
- 176 指倫巴第的王冠。——第 317 頁。
- 177 指的是 1836 年和 1857 年的危机前夕在 1836 年和 1856 年出現的經濟上的景气現象。——第 317 頁。
- 178 暗指 1848—1849 年意大利革命初期托斯卡納、摩地那和帕尔馬的公爵們从自己的領地上逃跑一事。——第 318 頁。
- 179 根据克里木战争结束后于 1856 年簽訂的巴黎和約（見注 64），俄国丧失了多瑙河河口和南貝薩拉比亚的部分地区，并被迫放棄对多瑙河公国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的保护权。

后来，俄国由于力图加强自己在巴尔干的势力，援助了巴尔干各国人民反对土耳其統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俄国和法国一起，支持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合并和建立羅馬尼亞國家的要求，俄国还支持了 1858 年 11 月底發生的塞爾維亞王朝政变，由于政变的結果，在对外政策上

- 依附于奥地利和土耳其的卡拉格奥尔基耶維奇王朝被奥布廉諾維奇王朝所代替。——第 323 頁。
- 180 見注 144。——第 325 頁。
- 181 獎金 是政府決定授予參加消滅或截獲敵人船隻以及走私的中立船隻的戰艦艦員的款項。——第 325 頁。
- 182 1854 年墨西哥爆發資產階級革命，接着發生了內戰，一直繼續到 1860 年底，結果封建主和僧侶的反動勢力被粉碎了。——第 328 頁。
- 183 指的是孟買，根據英屬印度的行政區劃，孟買和孟加拉、馬德拉斯一起被劃為由總督統轄的特別管區。——第 330 頁。
- 184 馬克思譏笑印度的英國統治者是大莫臥兒王朝的繼承者。大莫臥兒帝國（當時對一個執政王朝的稱呼）是 1526 年由突厥族征服者——莫臥兒人（現代人認為就是蒙古人）建立起來的，它在十七世紀中葉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領土和一部分阿富汗的領土以後，達到全盛時期。但是，由於多次的農民起義和印度各族人民對征服者不斷反抗，同時它內部經常發生內訌以及封建分離主義的傾向日益加強，大莫臥兒帝國開始衰落，十八世紀上半期實際上就已經瓦解了。——第 331 頁。
- 185 指的是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58 年）——英法反對中國的掠奪性戰爭——以後，於 1858 年 6 月簽訂的不平等的天津條約的附件。這個條約規定，除了以前已經開辟的 5 個中國對外通商口岸以外，在揚子江、滿洲、台灣和海南島再開辟 5 個商埠；允許外國在北京駐經常的外交代表，外國人有权在中國國內自由來往和在內河自由航行，保證傳教士受到保護。英國殖民者根據天津條約大大擴大了在中國的的特權以後，同意限制鴉片貿易；鴉片貿易耗盡了中國的資源，同時也限制了殖民者本身開發這些資源的可能性。
- 條約的附件談到要調整英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規定向中國輸入鴉片要征收高額稅款；外國商人只能在條約嚴格規定的商埠上販賣鴉片，外國人在中國國內貿易方面的一切優惠條件不適用於鴉片貿易。——第 333 頁。

- 186 克拉科夫在 1846 年起义(見注 153)遭到鎮压以后被并入奥地利帝国。
1848—1849 年的匈牙利革命被鎮压后,奥地利当局在匈牙利建立了残酷的恐怖制度,不仅匈牙利革命期間通过的一切法律被廢除了,而且匈牙利早在革命前所享有的部分自治权也被取消了。——第 335 頁。
- 187 四项条款是参加克里木战争的各大国——英国、法国和奥地利——在 1854 年 8 月 8 日的照会中作为开始和談的先决条件向俄国提出的四项要求,就是:俄国必須放棄对莫尔达維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維亚的保护权,这些地区由全欧洲共同保护;开放多瑙河,使各国可以自由通航;同意修改 1841 年簽訂的关于海峡的倫敦公約;放棄对土耳其基督教臣民的保护权。俄国政府起初拒絕接受这些条款,但是 1854 年 11 月它同意以这些条款作为将来进行和談的基础。——第 335 頁。
- 188 1815 年維也納条約規定,奥地利有权在費拉拉、科馬基奧和皮阿琴察駐軍。——第 335 頁。
- 189 1818 年 11 月 15 日的亞琛議定书是五大国(英国、奥地利、普魯士、俄国和法国)在神圣同盟(見注 142)第一次會議上簽訂的。議定书重申忠实于 1815 年的条約以及維也納會議上确定的欧洲的国家制度;議定书宣布各大国願意支持各地的封建专制制度并鎮压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第 339 頁。
- 190 “祖国报”(«*La Patrie*»)是 1841 年創辦的一家法国日报,1850 年它代表了联合保皇派,即所謂秩序党的利益;1851 年 12 月 2 日政变以后,它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 342 頁。
- 191 从 1859 年 4 月 22 日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来,馬克思會根据新的材料对恩格斯写的这篇文章作了修改和补充。——第 343 頁。
- 192 指 1821 年 5 月神圣同盟在来巴赫(柳布梁納)举行的會議。在来巴赫會議上,神圣同盟各大国公开宣布了干涉他国内政以維持当地的封建君主制度的原則。根据这一原則,来巴赫會議决定派遣奥地利军队到意大利去鎮压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根据由于英国外交大臣卡斯

- 尔里的坚决要求而加入 1818 年亚琛議定书中的限制性条款的規定，意大利各国君主集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會議。按照这一条款，干涉別国内政，只能按照这些国家的“願望”进行，并应給予它們以参加談判的权利。——第 344 頁。
- 193** 1850 年 11 月，奥普两国的关系由于爭夺德国的霸权而尖锐化，普魯士因而宣布总动員。这次动員暴露了普魯士軍事制度的严重缺点和普魯士軍隊装备的落后，这促使普魯士政府采取了克服这些缺点的有力措施。——第 346 頁。
- 194** 指的是 1859 年 3 月 3 日(俄历 2 月 19 日)俄国和法国在巴黎簽訂的关于如果法国和撒丁同奥地利之間发生战争时实行中立和合作的秘密条約。报刊披露了关于条約的消息，但是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公开否认存在对法国有任何书面規定的义务。关于丹麦参加条約的消息后来沒有得到证实。——第 352、371 頁。
- 195** 1859 年 4 月，在托斯卡納、摩地那和帕尔馬都爆发了人民起义，統治这些地方的公国王朝中的人物紛紛逃出他們的領地請求奥地利軍隊保护。由于起义的結果而建立起来的国民議會宣布各公国的人民願意加入皮蒙特。关于各公国并入皮蒙特的問題，1860 年 3 月通过全民投票得到了彻底的解决。——第 355、361、473 頁。
- 196** 1859 年 2 月中，英国得比政府建議正式調解法奥之間的冲突。为此目的，1859 年 2 月末，考萊勋爵經拿破侖第三的同意，被派往維也納。他同奥皇弗兰茨-約瑟夫进行了談判。但是考萊勋爵的使命沒有胜利完成。——第 356 頁。
- 197** 哥达党于 1849 年 6 月在哥达城成立，它的成員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即在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絕国民議會給他加冕和国民議會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建立帝国援政的決議之后退出法兰克福議会的右翼自由派。这个党由于害怕革命的胜利，提出了下述目标：把全德国統一在霍亨索倫王朝的普魯士的領導之下，并把奥地利排除在外。——第 361 頁。

- 198 暗指在薩托里閱兵時犒賞士兵一事(參看注 70)。——第 361 頁。
- 199 «*Caveant consules ne quid respublica detrimenti capiat*» (“为了共和国不受損失，执政官應該警惕”)是古羅馬元老院在国家遭到外部或内部危险的威胁时所使用的一句名言；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官就被赋予独裁的权力。——第 362 頁。
- 200 “科倫日报”(«*Köln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从 1802 年起即以此名称在科倫出版；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間和随之而来的反动时期，反映着普魯士自由資產階級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第 362 頁。
- 201 指卡尔·福格特。关于福格特的詳情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14 卷卡·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第 362 頁。
- 202 指劳麦的文章“普魯士的观点”(«*Der Standpunkt Preußens*»), 1859 年春发表于“施本納报”(«*Spencersche Zeitung*»), 不久后又和他的其他一些文章一起轉載于名为“論当代政治”(«*Zur Politik des Tages*»)的文集中。——第 362 頁。
- 203 指拿破侖第一对毕洛夫所著的“德国和意大利 1800 年战局史”一书的一条批語。1819 年拿破侖第一在圣海倫島讀过該书。关于这一点詳見本卷第 269—272 頁。——第 365 頁。
- 204 威·維利森最有名的著作是：“关于 1831 年俄波之战中运用的大規模战争的理論”，共分两册，1840 年柏林出版 («*Theorie des großen Krieges angewendet auf den russisch-polnischen Feldzug von 1831*». In zwei Theilen. Berlin, 1840)；“1848 年意大利战局”1849 年柏林版 («*Der Italienische Feldzug des Jahres 1848*». Berlin, 1849)。——第 371 頁。
- 205 1848 年 3 月威尼斯发生革命，奧軍被驅逐，政权轉入以丹尼尔·馬宁为首的临时政府手中。临时政府在威尼斯宣布成立共和国，它一直存在到 1849 年 8 月。——第 372 頁。
- 206 1848—1849 年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期間，奧軍于 1849 年 6 月 28 日在

- 腊布(迪厄尔)城下击潰了匈牙利軍隊并占領了該城。——第 373 頁。
- 207 指 1849 年 8 月 3 日奧軍被匈牙利革命軍击败于阿契(在科莫恩附近)。——第 373 頁。
- 208 指 1848 年三月革命时期在維也納建立的大学生武装組織——大学生軍团的战士。——第 373 頁。
- 209 “維也納日报”(«*Wiener Zeitung*»)是官方政府报纸“奥地利帝国維也納日报”(«*Oesterreichisch Kaiserliche Wiener Zeitung*»)的简称,从 1780 年起以該名称出版。——第 376 頁。
- 210 馬克思把 1833 年在的里雅斯特成立的輪船公司称为奥地利的劳埃德。劳埃德是倫敦一家咖啡館的老板,他在倫敦成立了英国第一家海船保險公司(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因此欧洲国家有許多輪船保險公司都以劳埃德的名字命名。——第 377 頁。
- 211 馬克思指 1857 年 11 月周期性危机时期在漢堡成立保证貼現公司,以及发行 1500 万馬克的有息证券作为以商品或国家证券作抵押的貸款;貸款数应相当于作抵押的商品价值的 50%至 66 $\frac{2}{3}$ %(参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366—371 頁卡·馬克思“歐洲的金融危机”一文)。——第 377、393 頁。
- 212 指 1846 年 2—3 月加里西亚农民大起义期間奥地利統治集团所采取的政策,加里西亚农民大起义是和克拉科夫的民族解放起义(見注 153)同时发生的。奥地利当局利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在起义的加里西亚农民和准备支援克拉科夫的波兰小貴族之間挑起了冲突。农民起义从解除波兰小貴族起义部队的武装开始,随后具有了大規模摧毀地主庄园的性质。奥地利政府在平息了波兰小貴族的起义运动之后,又鎮压了加里西亚的农民起义。——第 388 頁。
- 213 从本文开始恩格斯給“人民报”撰稿。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馬克思的請求而写的。

“人民报”(«*Das Volk*»)是一家日报,从 1859 年 5 月 7 日至 8 月 20 日在倫敦用德文出版。該报是作为倫敦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正

式机关报而創办的。第1号由德国政論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埃拉尔特·比斯康普編輯出版。从第2号起，馬克思就积极地参加了該报的出版工作，他非正式地为該报撰稿，經常提出建議和幫助，为报纸审稿，組織对該报的物质援助等等。在6月11日的第6号上，該报編輯部正式宣布馬克思、恩格斯、弗萊里格拉特、威·沃尔弗、亨·海澤为該报撰稿（見本卷第683頁）。从此以后，馬克思实际上是該报的編輯，該报也成了无产階級革命者的机关报。从7月初起，馬克思成了該报的編輯和行政負責人。

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理論問題和无产階級斗争的策略問題的研究在“人民报”上得到了反映，他們在該报上闡明了无产階級的階級搏斗，对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不調和的斗争。在該报上，从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立場出发，分析了1859年奧意法战争的各个事件、德国統一問題和意大利統一問題，揭露了英国、普魯士、法国、俄国和其他反动国家的对外政策，对波拿巴主义及其公开的和隱蔽的拥护者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在“人民报”上刊載了馬克思为他的著作“政治經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馬克思的5篇文章（其中包括一組未完成的文章《Quid pro quo》）、恩格斯的9篇文章、恩格斯給馬克思的著作“政治經济学批判”所写的評論、馬克思在比斯康普参加下写成并发表在“报刊述評”栏的对德国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报纸“海尔曼”的評論。此外，許多文章和政治評論都帶有馬克思直接参加編輯工作的痕迹。該报总共出版了16号。1859年8月20日該报因缺乏資金而停刊。——第397頁。

214 1849年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科莫恩(科馬罗姆)要塞是匈牙利革命軍的一个据点，他們在那里經受住了奧軍两次(1—4月和7—9月)長時間的圍攻。——第397頁。

215 在羅馬共和国傾复（見注45）前夕，当羅馬制宪議會決定停止斗争以后，加里波第于1849年7月2日率領4000人的一支志願軍离开了羅馬，前去援助反抗奧軍的威尼斯共和国。加里波第巧妙地在奧軍后方进行机动，多次突出重圍，但是未能冲入被圍困的威尼斯，1849年7月30日他被迫进入中立国圣馬力諾的國境，解散了自己的队伍。——第

404 頁。

- 216 指倫巴第志願軍在阿勒曼迪將軍指揮下反對奧軍的行動。倫巴第志願軍于 1848 年 4 月封鎖了提羅耳從托納列至斯特爾維奧的各個山口。——第 404 頁。
- 217 本卷刊登的馬克思為馬志尼的宣言“戰爭”所寫的按語，表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必須給予在波拿巴干涉意大利解放事業這個問題上採取正確立場的馬志尼以支持。馬克思和恩格斯贊許馬志尼就這個問題所發表的反波拿巴言論，然而就在這個時期他們仍繼續不斷地批評馬志尼的整個觀點和策略。——第 406 頁。
- 218 從 1849 年 3 月起馬志尼是三執政的首領（馬志尼、薩費和阿尔美利尼），羅馬共和國制憲議會授予三執政以執行權和保衛共和國的全權。——第 406 頁。
- 219 指的是加里波第在 1859 年 5 月在他的志願軍進入倫巴第領土時所發表的告倫巴第居民書。——第 406 頁。
- 220 “思想和行動”（*«Pensiero ed Azione»*）是由馬志尼主編的意大利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機關報；1858—1859 年在倫敦出版，1860 年在羅迦諾和熱那亞出版，每月兩次。
馬志尼宣言“戰爭”發表在 1859 年 5 月 16 日的“思想和行動”上，後來轉載於“紐約每日論壇報”，略有刪節。——第 407 頁。
- 221 指的是意大利詩人和愛國者霍夫雷多·馬美利於 1849 年 7 月在保衛羅馬共和國、抵抗路易·波拿巴派去的法國軍隊時犧牲一事。——第 407 頁。
- 222 指查理五世在最後戰勝了教皇過去的盟友法國人並把他們趕出意大利之後，於 1528 年在博洛尼亞同教皇克雷門特七世所簽訂的條約。從那時起，帝國政權和天主教會便團結一致來消滅意大利各城市國家殘存的獨立活動。——第 410 頁。
- 223 康波福米奧和約是法國同參加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奧地利於 1797 年 10

月簽訂的。根據這個條約，法國把威尼斯共和國的一部分領土連同威尼斯城以及伊斯的利亞半島和達爾馬威亞轉讓給奧地利以換取奧地利在萊茵河疆界上的讓步；另一部分則并入拿破侖第一於 1797 年夏季在意大利北部奪來的土地上建立的南阿爾卑斯共和國，歸屬法國的還有伊奧尼亞群島和威尼斯共和國在阿爾巴尼亞沿岸地區的領地。——第 412 頁。

224 暗指關於 1849 年 3 月 23 日諾瓦拉會戰（見注 50）的內容含糊的戰報。恩格斯在“皮蒙特軍隊的失敗”（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458—468 頁）為題的那組文章中分析了這些戰報。皮蒙特在諾瓦拉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國王查理-阿爾伯特行動胆怯。在這以前，各君主集團和擁護在薩瓦王朝政權下統一意大利的人們，百般頌揚這位國王的“英勇”。他們稱查理-阿爾伯特是“意大利之劍”（«Spada d'Italia»）。在查理-阿爾伯特退位後，他的兒子維克多-艾曼努爾被迫於 1849 年 8 月在米蘭與奧地利締結和約，根據和約規定，奧地利保住了它在意大利的全部領地，並得到皮蒙特的賠款 7 500 萬法郎。——第 414 頁。

225 “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是英國自由派的報紙，工業資產階級的機關報；從 1846 年到 1930 年以這個名稱在倫敦出版。——第 417 頁。

226 1813 年 5 月 2 日（俄曆 4 月 20 日），拿破侖第一的軍隊和維特根施坦指揮下的俄普聯軍在呂特岑（屬薩克森）發生了會戰，雙方都未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第 419 頁。

227 本文在略加修改後曾以“歷史的一章”（«A Chapter of History»）為標題用英文發表在 1859 年 7 月 2 日“紐約每日論壇報”上，這個修改稿曾譯載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內。——第 427 頁。

228 十二月十日會是 1849 年成立的波拿巴派的秘密團體，它的成員多半是游民。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73—176 頁）一書中對這個團體作了詳盡的評述。

- 第 432 頁。
- 229 暗指路易·波拿巴說的一句話：“帝國就是和平”（見注 60）。——第 435 頁。
- 230 暗指 1839 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易·波拿巴寫的“拿破侖觀念”（Napoléon-Louis Bonaparte, «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 Paris, 1839）一書。——第 436 頁。
- 231 “國民報”（«National Zeitung»）是德國資產階級的一家日報，1848—1915 年在柏林出版；該報在五十年代具有自由主義的傾向。——第 437 頁。
- 232 指在德國庸人中間流行一時的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一世的詩，他的詩是崇尚辭藻而內容空洞的詩歌的典型。——第 438 頁。
- 233 “奧林匹克馬戲院”（«Cirque Olympique»）——巴黎的一個劇院。
聖詹姆斯街——倫敦的一條街道，那裏有許多俱樂部和賭場。
阿斯特利圓劇場——倫敦的一個露天馬戲院。——第 439 頁。
- 234 拿破侖法典是 1804 年拿破侖第一頒布的民法典。恩格斯稱它為“典型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法典”。
“不許尋究父方”（«La recherche de la paternité est interdite»）是拿破侖法典第 340 條的條文。——第 441 頁。
- 235 這裏，“人民報”編輯部加了如下的附注：“大家知道，據最近報道，奧軍確實退到了他們在明喬河東岸的要塞區。這一退却即使在戰略上沒有帶來任何損失，但是終究不能不對軍隊的士氣造成極有害的影響。”——第 443 頁。
- 236 本文（特別是開頭部分）被“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篡改過。——第 444 頁。
- 237 指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政策。他在歐洲各大國第三次反法同盟和拿破侖第一之間採取隨風轉舵的策略，結果使拿破侖第一起初在 1805 年擊敗了奧地利，接着又在 1806 年擊敗了普魯士。

- 关于巴塞尔和約 見注 86。
- 关于萊茵联邦 見注 126。——第 446 頁。
- 238 見注 90 和 96。——第 450 頁。
- 239 見注 165。——第 451 頁。
- 240 “两大陆評論”(«*Revue des deux Mondes*») 是一种資產階級文艺和政論性的双周刊, 从 1829 年起在巴黎出版。——第 460 頁。
- 241 暗指普魯士同汉諾威和薩克森的国君以及支持他們的德国其他十七个邦的君主結成同盟, 排除奥地利, 以普魯士为霸主統一德国, 并实现建立“小德意志”計劃的企图。这个計劃得到了反革命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联合組成所謂“哥达党”(見注 197) 的右翼自由派的支持。哥达党曾积极参加为了通过根据反革命精神修改的全德意志宪法草案 而于 1850 年 3 月 20 日在爱尔福特召开的德国議会的选举。在奥地利君主国和俄国沙皇政府的压力下, 以前支持普魯士的許多德国邦倒向了奥地利那边, 而普魯士政府也因为害怕違抗尼古拉一世的意旨, 而于 1850 年 4 月 29 日解散了爱尔福特議會。——第 462 頁。
- 242 三月要求是表达了人民情緒的四个基本政治要求, 这些要求是 1848 年 2 月由巴登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提出来的, 它們很快就傳遍了德国的西南部。这些要求就是: 一, 武装人民, 人民有权选举軍官; 二, 出版自由不受限制; 三, 成立陪审法庭; 四, 立即召开德国議會。德国各邦的自由資產階級在人民的压力下把这些要求变成了他們在同君主制作斗争中的綱領, 但是, 剛剛依靠人民群众的革命发动掌握了政权, 就出卖了人民的利益, 同君主集团进行妥协。——第 462 頁。
- 243 指“拿騷公民們的声明”, 1859 年 6 月 21 日在維斯巴登发表, 是图謀以普魯士为霸主統一德国的德国各邦的資產階級的政治綱領。——第 462 頁。
- 244 埃中海麦尔街——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条街道, 1816—1866 年德国联邦議會設在这里。——第 464 頁。
- 245 1859 年 7 月 8 日在維拉弗兰卡城举行了法奧两国皇帝在沒有皮蒙特

国王参加下的单独会晤。这次会晤是根据拿破侖第三的建議举行的，因为他害怕战争拖下去会加强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中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这次会晤中签订了停战协定。7月11日法奥双方签署了初步和約，根据和約，倫巴第(曼都亚和培斯克拉两要塞除外)轉归法国(但是拿破侖第三后来为了换取薩瓦和尼斯，把倫巴第让給了撒丁)，威尼斯仍然受奥地利統治，托斯卡納公爵和摩地那公爵應該复位。和約規定建立以教皇为首腦的意大利联邦。尽管初步和約中的某些条文沒有实行(例如，建立意大利联邦、托斯卡納公爵和摩地那公爵复位等条)或者有了改变，但整个說来和約的条件为1859年11月10日在苏黎世签订的最后和約打下了基础。——第466頁。

- 246 指那些丧失了政权的德国小邦君主，他們的領地被兼并了，即在拿破侖战争和維也納會議(1814—1815年)期間由于德国版图的重新划分而被并入德国較大的各邦。許多被兼并的小邦的代表应邀参加了維也納會議。——第474頁。
- 247 1848年，帕麦斯頓为了限制意大利革命运动的发展并执行英国傳統的“欧洲均势”政策，曾力求使倫巴第归并于皮蒙特君主国。奥地利政府慑于国内的革命事件和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被迫在5月24日的备忘录中同意让出倫巴第，并让威尼斯分立，成为一个以奥地利大公为首的独立国家，但在皮蒙特战败以后，奥地利又收回了自己的意見。——第474頁。
- 248 尼·馬基雅弗利著：“佛罗倫薩史”(N. Machiavelli, «Le Istorie Fiorentine»)。該书的第一版于1532年在羅馬和佛罗倫薩出版。——第475頁。
- 249 由于席卷北意大利和教皇国的爭取和皮蒙特合并的运动日益加强，教皇庇护九世于1859年6月发布通告，威胁說凡是敢于侵犯教皇世俗政权的人，一律开除教籍，这首先是針對維克多-艾曼努尔二世說的。——第476頁。
- 250 “人民报”刊登恩格斯这篇文章时在这里加了一句話：“如果不停留这四个半小时，这个軍未必能經受住它赶往戰場时的那种极端緊張的行

- 軍。”1859年7月25日恩格斯在他給馬克思的信中指出，這句話與上下文的意思是矛盾的，因此在本版中取消了這句話。——第481頁。
- 251 見注87和95。——第482頁。
- 252 “畫報”(«*L'Illustration*»)是一種法國文藝畫刊，從1843年起在巴黎出版。——第486頁。
- 253 “倫敦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是一種英國畫報周刊，從1842年起在倫敦出版。——第487頁。
- 254 神聖之路(*Via sacra*)是指古羅馬獲勝而歸的軍隊凱歌行進的道路；後來“神聖之路”變成了一個普通名詞，泛指一般勝利的戰局或勝利的進軍。——第488頁。
- 255 暗指1840年路易·波拿巴在布倫兵變失敗後被囚禁於阿姆要塞一事；1846年路易·波拿巴從要塞逃出(見注71)。——第488、497、504頁。
- 256 聖馬丁門劇場——巴黎的一個劇院，1851年12月政變時，在該劇院附近曾發生波拿巴兵痞毆打共和黨人的事件。——第488頁。
- 257 克勞塞維茨在他的“論戰爭”(«*Vom Kriege*»)一書中提出了這種思想。該書第一版於1832年在柏林出版。——第491頁。
- 258 指1859年7月15日的弗蘭茨-約瑟夫宣言，宣言發表在1859年7月16日的奧地利官方機關報“維也納日報”上。——第492頁。
- 259 雷恩布龍——維也納的一個宮殿，奧皇的夏宮。——第493頁。
- 260 指1859年7月19日拿破侖第三在聖克魯接見國務會議、參議院和立法團成員時的講話。講話載於1859年7月20日“通報”第201號。——第494頁。
- 261 見路易-拿破侖·波拿巴著：“1688年和1830年的歷史片斷”(Napoleon-Louis Bonaparte, «*Fragments historiques 1688 et 1830*»)。該書是路易·波拿巴被禁於阿姆要塞時寫的，第一版於1841年在巴黎出版。——第497頁。

- 262 指 1859 年 7 月 26 日刊登在“通报”第 207 号的非官方栏中的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第 498 頁。
- 263 “誠意协商”(«*Entente cordiale*»)是英法之間在 1830 年七月革命以后建立的,由于 1834 年 4 月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了所謂四国同盟条約而形成的同盟关系。但是在签订这一条約的时候,就已經暴露出了英法利益之間的矛盾,这些矛盾后来不止一次地导致两国关系的尖銳化。——第 498 頁。
- 264 拿破侖第三关于把陆軍和海軍轉入平时状态的声明載于 1859 年 7 月 28 日“通报”第 209 号;在战争前夕所作的声明也发表在 1859 年 3 月 5 日“通报”第 64 号上。——第 500 頁。
- 265 «*Quid pro quo*» (“偷梁換柱,混淆視听”)是 1859 年 7 月底—8 月中在“人民报”上发表的馬克思的一組文章的标题;由于“人民报”停刊,这組文章沒有登完。——第 503 頁。
- 266 克勞塞維茨著“1796 年意大利战局”(Clausewitz. «*Der Feldzug von 1796 in Italien*»)。——第 503 頁。
- 267 指路易·波拿巴总統 1852 年 12 月 2 日頒布的关于在法国恢复帝制并宣布路易·波拿巴本人为皇帝、号称拿破侖第三的命令。——第 503 頁。
- 268 对埃及的討伐是根据拿破侖·波拿巴的提議并在他的指揮下于 1798 年 5 月进行的,其目的是要征服埃及并破坏英国和印度的交通綫。这场延續三年多的冒險的远征結果破产了。
 雾月十八日(1799 年 11 月 9 日)是完成法国资产阶级反革命过程的一次政变;政变結果,建立了拿破侖·波拿巴的軍事专政。——第 503 頁。
- 269 指 1855 年法国和俄国之間的秘密和談,这次談判是通过在俄国宫廷有广泛联系的薩克森駐巴黎公使澤巴赫男爵进行的。——第 505 頁。
- 270 1856 年,在巴黎會議上,俄国代表团团长奥尔洛夫伯爵和团员布隆諾

夫把自己的策略建立在利用英法矛盾的基础上；在會議上形成了法俄的接近。——第 505 頁。

271 在 1856—1860 年間，拿破侖第三力图加强他在巴尔干的影响，因此他支持門的內哥罗的公爵丹尼洛一世反对土耳其蓄謀侵犯門的內哥罗的斗争。因此，丹尼洛一世寻求同拿破侖第三建立私人的密切关系；后者便成了門的內哥罗的继承者的教父。

在 1851—1852 年間，費奈迭在他于波恩出版的“北德意志报”（«Zeitung für Norddeutschland»）上发表了許多关于路易·波拿巴及其政变的文章。——第 505 頁。

272 由英軍据守的土耳其要塞卡尔斯于 1855 年 11 月投降俄軍。虽然领导要塞防御的是以威廉斯將軍为首的英国軍官，但是，英国政府由于暗中关心的是削弱“盟国”土耳其，所以对卡尔斯守軍的行动极其曖昧。卡·馬克思对这点的看法詳見“卡尔斯的陷落”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1 卷第 673—712 頁）。而且威廉斯被俄国俘擄后于 1856 年回国时，英国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給他以各种奖賞和荣誉称号。——第 505 頁。

273 指 1849 年被法軍占領的羅馬，以及在克里木战争期間，法国軍队曾經駐扎的雅典和君士坦丁堡。——第 505 頁。

274 指法国外交部长瓦列夫斯基在 1856 年巴黎會議的最后一次會議上的发言，他要求比利时报刊停止对拿破侖第三的人身攻击，这个发言得到了其他各国代表的支持。——第 505 頁。

275 暗指法国参加反对中国的第二次“鴉片”战争（1856—1858 年）（見注 31）。——第 505 頁。

276 見注 158。——第 506 頁。

277 見注 158。——第 506 頁。

278 暗指拿破侖第三干涉瑞士內政在瑞士引起的不滿，拿破侖第三于 1858 年初要求瑞士政府引渡被控参与奥尔西尼陰謀的那些政治流亡者。——第 506 頁。

- 279 指 1858 年 1 月 27 日的命令，該命令按照西班牙的榜樣，把第二帝國的領土劃分為五個軍區，分別由元帥管轄。——第 506 頁。
- 280 關於攝政和建立樞密院的命令是 1858 年 2 月 1 日，在奧爾西尼行刺拿破侖第三以後不久頒布的。佩利西埃做了樞密大臣，如果皇太子即位時年歲尚幼，樞密院就成為攝政會議。
馬克思暗指 1845 年佩利西埃的野蠻行為，他在鎮壓阿爾及利亞起義期間，曾命令燃起煙火熏死躲藏在山洞中的一千名阿拉伯起義者。——第 506 頁。
- 281 暗指 1858 年底的對法國政論家蒙塔郎貝爾的審判案，因為他發表文章譴責了第二帝國的制度。拿破侖第三赦免了被告者，但是，蒙塔郎貝爾拒絕赦免，要求宣判無罪。馬克思諷刺地把這個案件比做是對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卓越活動家之一約翰·漢普敦的審訊，漢普敦在 1636 年曾拒絕向皇家收稅官交納未經下院批准的賦稅——“造船費”。由於漢普敦拒絕納稅而引起的審判案大大促進了英國社會中反對專制政體的反對派的壯大。——第 506 頁。
- 282 馬克思指的是蒲魯東於 1858 年在布魯塞爾出版的一本小冊子“教會所恪守的正義”（«La Justice poursuivie par L'Eglise»）。在這本小冊子中，蒲魯東把波拿巴王朝和奧爾良王朝作了对比以後，認為奧爾良王朝宣布的帶有关于必需進行一些民主改革的保留條件的管理原則比較好。馬克思諷刺地把這些保留條件比作是補充條例（*Acte additionel*）——拿破侖第一在他從厄爾巴島上回來以後於 1815 年在法國實行的憲法。——第 506 頁。
- 283 指 1858 年 3 月 6 日在索恩河岸夏龍發生的軍隊的共和主義發動，發動遭到了失敗。——第 506 頁。
- 284 見注 153。——第 507 頁。
- 285 *Blue book of its own make*（自制的藍皮書）——是馬克思對 1859 年奧意法戰爭的那些很像英國的藍皮書的外交文件的稱呼，這些文件於 1859 年 7 月由普魯士政府在“新普魯士報”上發表，隨後於 7 月 30—

31 日由奧格斯堡“总汇报”加以轉載。

藍皮書是英國議會和外交部發表的資料和外交文件的總稱。藍皮書因藍色封面而得名，英國從十七世紀開始發表藍皮書，它是英國經濟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資料。——第 507 頁。

286 據傳說，公元前 390 年，侵入羅馬帝國的高盧軍在長期圍攻卡皮托里以後，表示同意在獲得大量贖金的條件下撤離該城，但是，當黃金已經稱出的時候，高盧人的領袖布倫高呼 «Vae victis!»（“戰敗者罪該萬死！”），把自己沉重的劍扔在放有砝碼的稱盤上，於是破壞了最初的協定。——第 371、392、509 頁。

287 «*By courtesy*»（“禮貌上尊稱的”）。——見注 161。

«*On sufferance*»（“出于體恤”，“由于恩賜”）——在英國法律中表示一個人由于恩賜，而不是根據法律得到某領地或封號的權利。

«*Quos ego!*»（“看我来教訓你！”）——在味吉爾的長詩“亞尼雅士之歌”中，尼普頓向未經他同意就在海上掀起了風暴的風這樣厲聲喝道。——第 510 頁。

288 “哥達主義”——馬克思對哥達黨（見注 197）擁護者的裝腔作勢的言詞的稱呼。

烏凱馬爾克是勃蘭登堡省（屬普魯士）的北部地區，反動的普魯士容克地主的堡壘。——第 512 頁。

289 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綽號，由布倫、斯特拉斯堡、巴黎三個城市名稱的第一個音節組成；這個綽號暗指他曾經企圖在斯特拉斯堡和布倫舉行波拿巴主義的暴亂（見注 71），也指 1851 年 12 月 2 日的巴黎政變，這次政變在法國確立了波拿巴的專政。——第 513 頁。

290 哥爾查科夫 1859 年 5 月 27 日（俄曆 15 日）給俄國駐德國各邦的外交代表的緊急指示全文刊載在“比利時獨立報”上，並於 1859 年 6 月 16 日在奧格斯堡“总汇报”第 167 號上轉載。——第 513 頁。

291 指“普魯士王國國家通報”（«*Königlich-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這是德國的一家日報，普魯士政府的官方機關報；該報從

- 1851 年到 1871 年在柏林出版。——第 513 頁。
- 292 指莎士比亚的戏剧“馴悍記”中的人物补鍋匠克里斯多弗·史賴(見序幕、第一場和第二場)。——第 515 頁。
- 293 «*La mort sans phrase*» (“无話可說,坚决处死”)——据說, 1793 年 1 月在国民公会議員对原任国王路易十六的判決进行記名投票时, 神甫西哀士說了这句话。——第 520 頁。
- 294 馬克思指的是在德国各大城市首先是柏林的十字街头上等待受雇的那一类短工(即所謂«*Eckensteher*»)。这些短工的語言具有独特的人民的幽默感的特点。——第 520 頁。
- 295 指 1859 年 6 月 22 日約翰·罗素給英国駐普魯士大使布卢姆菲耳德的紧急指示; 指示全文刊載在 1859 年 7 月 18 日奧格斯堡“总汇报”第 199 号的附刊上。——第 523 頁。
- 296 «*Coercion bills*» 是为了鎮压爱尔兰革命运动于 1833 年和 1847 年通过的几項特別法律。根据这些法律在爱尔兰范圍內实行了戒严, 并且授予英格兰当局以各种专制的全权。——第 523 頁。
- 297 对馬克思“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的評論是不全的。只发表了开头的两部分。恩格斯打算分析該书經濟內容的第三部分, 沒有在报上发表, 手稿也沒有找到。——第 524 頁。
- 298 荷兰在 1477 年至 1555 年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羅馬帝国的組成部分, 在帝国被分割后, 处于西班牙的管轄下。十六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末期, 荷兰摆脱了西班牙的統治而成为独立的資產階級共和国。
由于荷兰脱离神圣羅馬帝国, 德国丧失了最重要的海上貿易航路, 并且依赖于荷兰人的中介貿易, 这对德国的經濟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第 524 頁。
- 299 官房学是由行政、財政、經濟和其他学科組成的統一的課程, 許多欧洲国家的中世紀大学以及后来的資產階級大学讲授这門課程; 官房学实质上是“各种极其不同的知識的混合物”(馬克思)。——第 525 頁。

- 300 这是諷刺右派黑格尔分子，他們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在德国大学中開設很多講座，并且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攻击哲学上較激进的派別的代表人物；右派黑格尔分子以反动的精神解釋黑格尔的学說。
馬其頓亚历山大大帝的統帥們叫做狄亞多希，他們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为瓜分他的帝国而彼此进行激烈的厮杀。——第 529 頁。
- 301 見喬·威·弗·黑格尔“邏輯学”第 1 部第 2 册；“黑格尔全集”1834 年柏林版第 4 卷第 15、75、145 頁 (G. W. 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Th. 1, Abt. 2; Werke, Bd. IV, Berlin, 1834, S. 15, 75, 145)。——第 531 頁。
- 302 指喬·威·弗·黑格尔的著作“精神現象学”1807 年班堡和維爾茨堡版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Bamberg und Würzburg, 1807)；“美学讲义”第 1—3 卷；“黑格尔全集”1835 年、1837—1838 年柏林版第 10 卷 («Vorlesungen über die Aesthetik». Bd. I—III; Werke, Bd. X, Berlin, 1835, 1837—1838)；“哲学史讲义”第 1—3 卷；“黑格尔全集”1833、1836 年柏林版第 13—15 卷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d. I—III; Werke, Bd. XIII—XV, Berlin, 1833, 1836)。——第 531 頁。
- 303 指发表在 1859 年 7 月 30 日“經濟学家”杂志第 831 期上的出口报告和进口申报价值图表。——第 536 頁。
- 304 指 1857—1859 年間印度反对英国統治爭取民族解放的起义 (見注 144)。——第 539 頁。
- 305 指 1849 年 4 月法兰西共和国總統路易·波拿巴为了武装干涉羅馬共和国和恢复教皇的世俗政权而派遣远征軍到意大利去一事。——第 541 頁。
- 306 «*Sic volo, sic jubeo*» 原文应为：«*Hoc volo, sic jubeo*» (“我怎样想，就怎样下命令”)——尤維納利斯的諷刺詩第六篇中的話，作者在詩中抨击了貴族的貪得无饜的权力欲。——第 542 頁。
- 307 圣热尔門郊区——巴黎的貴族聚居区。——第 542 頁。

- 308 列举出的这些撒丁特命全权代表，是維克多-艾曼努尔派到起义反抗奥地利統治的各公国和罗马尼亚（教皇国）去的，目的是策划这些地区归并于皮蒙特。当在意大利全境引起抗議运动的維拉弗兰卡和約（見注245）簽訂以后，維克多-艾曼努尔在法国的压力下，召回了这些代表。——第544頁。
- 309 指法国記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意大利忘恩負义”，发表在1859年8月3日的“立宪主义者报”上。——第544頁。
- 310 1859年夏天，英国发生了爭取九小时工作制的群众运动；在倫敦，这个运动席卷了組織在工联中的建筑工人。1859年7月底，特罗洛普家族一个公司的建筑工人，由于企业主拒絕滿足在保留原工資的条件下縮短工作日的要求，宣布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有木匠、石匠、磚瓦匠和其他工人。7月27日企业主們在联席會議上向工会公开宣战，一致決定不招收参加工联的工人，而8月6日又对两万多工人宣布实行同盟歇业，在此以后，倫敦和其他城市的罢工运动更加加强了。参加罢工的和因同盟歇业而被解雇的倫敦建筑工人得到了倫敦和英国80个城市其他行业工人的支援。罢工一直持續到1860年2月，并以妥协的办法結束：企业主同意招收工联会员，而工人則被迫收回关于九小时工作制的要求。——第546頁。
- 311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前半期在英国形成了自由党，它的成員包括輝格党人、曼彻斯特派（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皮尔分子（温和的托利党人）。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輝格党人的地位的自由党人遭到了同时期形成的，代托利党而起的保守党的反对。——第547頁。
- 312 指1859年8月16日拿破侖第三宣布的大赦令。
大赦令第一条規定廢除对报刊的各种行政“警告”，在以前如果报刊发表了不利于政府材料，政府当局有权根据1852年的出版法提出警告。这种警告是政府公开压制出版事业的手段之一。——第548頁。
- 313 指1859年8月14日在爱森納赫召开的德国北部和中部各邦自由资产

階級的代表會議，會上討論了自由資產階級的綱領的基本原則，其中規定實行德意志聯邦的改革，組織以普魯士國王為首的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建立統一的武裝力量等。1859年9月15—16日於法蘭克福召開的代表大會上，基於這個綱領成立了定名為民族聯盟的新黨，聯盟的基本核心是哥達黨（見注197）。——第548頁。

314 “薩克森立憲報”（*«Sächsische Konstitutionelle Zeitung»*）是一家德國自由黨的報紙；該報從1850年至1859年以這個名稱在德勒斯頓出版，從1859年4月至1874年該報稱為“立憲報”（*«Konstitutionelle Zeitung»*）。——第548頁。

315 暗指1848—1849年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聖保羅教堂召開的德國國民議會。——第548頁。

316 *«Statistical Abstract for the United Kingdom in each of the last fifteen Years, from 1844 to 1858»*. London, 1859. ——第549頁。

317 關於廢除谷物法的法案是1846年6月通過的。在英國實施旨在限制和禁止從國外輸入谷物的所謂谷物法，是為了大地主的利益。1846年的法案的通過表明在貿易自由口號下反對谷物法的工業資產階級的勝利。

1848年在加利福尼亞州和1851年在澳大利亞的蘊藏豐富的金礦的發現對歐美各國經濟的發展有很大影響。——第551頁。

318 旁遮普（印度的西北地區）由於1845—1846年和1848—1849年兩次英國對錫克教徒的戰爭，被英國殖民者占領；旁遮普被占領後，整個印度都成為英國的殖民地。——第551頁。

319 1854年英國建立了所謂感化學校，12—16歲的少年犯不處短期徒刑，就送入這些學校。——第552頁。

320 指卡·馬克思的文章“英國的貿易危機和貨幣流通”（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579—583頁）。——第557頁。

- 321 指卡·馬克思在“历史上有趣的一頁”和“現代历史中又一奇怪的一章”两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508—515頁和第592—599頁)中所做的揭露。——第560頁。
- 322 指科苏特参加根据馬志尼的倡議于1850年6月在倫敦成立的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該委员会是联合各国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流亡者的組織。这个無論在其成分上和思想立場上都极端复杂不一的組織存在得不久;由于意大利和法国的民主派流亡者之間的关系尖銳化,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于1852年3月实际上已經瓦解。——第561頁。
- 323 科苏特和烏尔卡尔特之間的来往书信发表在1858年5月12日的“自由新聞”报第16号上。
“自由新聞”*«The Free Press»*是反对帕麦斯頓政府的一家資產階級報紙;从1855年至1865年由烏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在倫敦出版;該报发表过几篇馬克思的著作。——第561頁。
- 324 “关于匈牙利事件的函件。1847—1849年。根据女王陛下的命令于1850年8月15日提交議會两院。”倫敦版(«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Hungary. 1847—1849.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August 15, 1850». London)。——第561頁。
- 325 指意大利革命家馬志尼的拥护者于1853年2月6日在米兰发动的,受到匈牙利革命流亡者支持的起义。起义者大多数是意大利的爱国工人,他們的目的是要推翻奧地利在意大利的統治。可是,由于起义是根据密謀性策略組織的,又沒有估計到現实的形勢,所以很快就遭到了失敗。馬克思在他的許多文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93—594、599—602、621、624—625頁)中对这次起义作了評價。——第561頁。
- 326 自由貿易大厅是曼彻斯特的一个大厅,自由貿易派聚會的地方。——第563頁。
- 327 曼彻斯特学派是英国經濟学思想中反映工业資產階級利益的一个派

別。這一派的擁護者即自由貿易派，主張貿易自由和國家不干涉經濟生活。自由貿易派的宣傳中心是曼徹斯特，在曼徹斯特領導這一運動的是1838年組織反谷物法同盟的兩個紡織廠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貿易派組成了一個特別的政治集團，後來加入了英國自由黨。——第566頁。

328 見注185。——第568頁。

329 指卡·馬克思的文章“中國和英國的條約”和弗·恩格斯的文​​章“俄國在遠東的成功”(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621—626頁和第661—665頁)。——第568頁。

330 本文下面所描寫的白河挑釁事件成了1860年夏天開始的第三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綫，英法殖民者發動這次戰爭的目的是要強迫中國接受新的奴役性的條件；由於這次戰爭的結果，於1860年10月在北京簽訂了新的掠奪性的條約，並且批准了天津條約(見注185)。

根據北京條約的規定，英國和法國得到了大量賠款，開天津為商埠，英法有權在中國招募工人到殖民地去做工，英國兼併了九龍半島的南部。——第568頁。

331 “京報”——著名的中國政府的官方通報的名稱，從1644年到1911年在北京出版。——第569頁。

332 “每日電訊”(《Daily Telegraph》)是一家英國日報，起初屬於自由派，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屬於保守派；該報以這個名稱從1855年至1937年在倫敦出版；從1937年起，與“晨郵報”(《Morning Post》)合併，以“每日電訊和晨郵報”(《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的名稱出版。——第569頁。

333 指1856年10月英軍野蠻地炮轟廣州一事；英國人利用廣州的中國當局逮捕走私船“亞羅號”划艇的水手一事作為借口，英國領事硬說這隻船處於英國國旗保護之下。炮轟廣州成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序幕。——第570頁。

334 指“1857年至1859年額爾金伯爵赴華赴日特別使命有關文件匯編”一

- 书, 1859年倫敦版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 1857—1859》, London, 1859.)。——第 570 頁。
- 335**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貿易派的机关报;从 1856 年到 1869 年在倫敦出版。——第 571 頁。
- 336** 皮尔分子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在罗·皮尔周圍联合起来的一批温和托利党人,他們支持皮尔在保持大地主和金融家的政治統治的条件下在經濟政策方面对工商业資產階級让步的政策。1846 年,皮尔为了工业資產階級的利益,廢除了谷物法,結果引起了托利党保护关税派的强烈不滿,导致了托利党的分裂,从而皮尔分子集团便独立出来了。1850 年皮尔逝世以后,皮尔分子成了沒有明确綱領的政治集团。五十年代末,他們加入了当时形成的自由党。——第 571 頁。
- 337** 指 1858 年 6 月中国与俄国和美国在天津分別簽訂的不平等条約,这些条約的内容同中国与英国和法国簽訂的条約相类似。——第 572 頁。
- 338** 指英国駐馬德里公使布尔韦尔粗暴地干涉西班牙的内政,結果使西班牙和英国于 1848 年 7 月断絕外交关系一事。——第 573 頁。
- 339** 指第一次鴉片战争 (1839—1842 年),这次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开始把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战争的起因是中国当局在广州銷毀了外国商人的鴉片儲备。这次战争結束以后,发生了俄国同中国的接近,使俄国能够在 1851 年 7 月与中国簽訂伊宁条約,給予俄国在华北貿易的优惠条件。——第 574 頁。
- 340** 第二次鴉片战争結束时,中国政府在与英国和法国簽訂天津条約以前,就于 1858 年 5 月与俄国簽訂了璦琿条約,根据这个条約,黑龙江北岸土地并入俄国。——第 574 頁。
- 341** “东印度 (喀布尔和阿富汗), 根据下院 1859 年 6 月 8 日的決議刊印”(《*East India (Cabul and Affghanistan),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8 June 1859*》)。——第 574 頁。

- 342 指1838—1842年英国为了对阿富汗进行殖民奴役而发动的第一次英阿战争。1839年8月英軍占领了喀布尔,但是,由于1841年11月喀布尔爆发起义,英軍被迫于1842年1月开始退却,最后英軍完全被击潰。——第574頁。
- 343 “关于波斯和阿富汗的函件”1839年倫敦版(«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Persia and Affghanistan». London, 1839)。——第574頁。
- 344 指1859年9月17日在“經濟学家”杂志第838期上刊载的“中国的貧困”和“中国的貿易”两文。——第578頁。
- 345 指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埃倫伯勒勋爵和印度总督坎宁勋爵之間的冲突。主張对印度的封建上层采取比較灵活的政策埃倫伯勒在1858年4月19日的紧急报告中,激烈地抨击了坎宁关于沒收曾参加民族解放起义的奥德封建主的土地的通告。但是埃倫伯勒的紧急报告并没有得到英国統治集团的贊同,于是他不得不于1858年5月辞去督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得比內閣力图以埃倫伯勒辞职为代价来保持政权。——第584頁。
- 346 改革俱乐部——倫敦一个自由派政治俱乐部,于1834年成立;是自由派反对保守派的政治斗争的中心。——第586頁。
- 347 “腐朽的市鎮”是英国十八至十九世紀对一些居民稀少或根本无人居住的小市鎮和乡村的称呼,这些市鎮和乡村从中世紀起享有选举代表到議會中去的权利。“腐朽的市鎮”的代表,实际上是由支配着当地居民的大土地貴族指派的。“腐朽的市鎮”的这种特权被1832、1867和1884年的改革所取消。——第586頁。
- 348 指1832年的議會改革(見注100)。——第586頁。
- 349 指英国議會;从1547年起,下院历次議會都是在圣斯蒂凡教堂(韦斯明斯特宮)举行的。——第588頁。
- 350 1859年10月16日在苏黎世召开了有奥地利、法国和撒丁参加的會議,

以拟定最后和約的条款；同年11月10日簽訂了和約。略加修改的維拉弗兰卡初步条約（見注245）的条款成了苏黎世和約的基础。苏黎世条約由三个单独的外交文件組成，即奥法条約、法撒关于把倫巴第轉交給撒丁的条約以及奥法撒共同条約。——第592頁。

351 *Code Napoléon* (拿破侖法典)——見注234。

Force majeure (无法抗拒的力量, 无法預見的情况)——从拿破侖法典第1148条中摘引出来的說法, 这一条宣称: “如果由于无法預見的情况或偶然事件妨碍了債務人, 使他不能履行他应尽的义务, 或者做了禁止他做的事情, 不得向其追索任何賠償。”——第592頁。

352 执政內閣 (由五个执政官組成, 每年改选一人) 是法国执行权的领导机关, 它是根据1794年雅各宾派革命专政失败后所通过的1795年宪法建立的。在1799年波拿巴政变以前, 执政內閣是法国的政府, 它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 并維護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1848年“藍色分子”是对法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称呼, 以区别于“紅色分子” (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即所謂山岳派) 和“白色分子” (联合成为秩序党的君主主义者)。以卡芬雅克为首的“藍色分子”的专政是在1848年6月鎮压巴黎无产阶级起义期間建立起来的, 这个专政存在到同年12月总统选举时为止。——第592頁。

353 閱斯德和約 (1648年10月) 是結束了全欧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历史上总称为威斯特伐里亚和約的条約之一。这个条約是在德意志帝国的代表和德国各邦諸侯一方同法国一方之間簽訂的, 根据这个条約, 法国获得了亚尔薩斯(不包括斯特拉斯堡), 法国对麦茨、土尔、凡尔登等三个主教管区的权利得到了确认; 德国各邦諸侯被承认为独立的君主, 他們有权簽訂对外政治条約和协定而不受德国皇帝的干預。閱斯德和約促进了德意志帝国的进一步削弱和法国在中欧和西欧的优势地位的巩固。

关于康波福米奧和約 見注223。——第593頁。

354 由于害怕国内革命运动的加剧, 維克多-艾曼努尔二世在同奥地利作战的过程中千方百计地限制受到人民支持的加里波第志願軍的行动, 使

- 他們处于最不利的条件下。在法国和奥地利之間的維拉弗兰卡和約簽訂之后，加里波第建議繼續对奥地利人进行斗争，但是 1859 年 11 月，志願軍在維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的坚持下被解散了。——第 593 頁。
- 355** 指 1813—1815 年普魯士反对拿破侖法国的民族解放战争。——第 593 頁。
- 356** 指馬志尼于 1859 年 9 月 16 日写給維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的信。他在信中建議国王出来領導解放全意大利的斗争，在加里波第的帮助下发动意大利南部起来斗争，并組織向羅馬进军。馬志尼的信沒有获得結果。——第 594 頁。
- 357** 指維拉弗兰卡初步条約。——第 595 頁。
- 358** 指卡·馬克思的“中国和英国的条約”(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621—626 頁)一文。——第 601 頁。
- 359** 見注 334。——第 601 頁。
- 360** 指第一次鴉片战争(見注 339)结束后英国殖民者于 1842 年 8 月 29 日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的南京条約。根据这一条約規定，为英国对华貿易开辟了五个通商口岸(广州、厦門、福州、宁波和上海)，把香港一島割让給英国作为“永久的屬地”，中国必須付出巨額賠款，实行对英国人有利的新关税税率。1843 年 10 月 8 日簽訂了虎門附約，对外国人作了新的让步：外国人有权在公开的商埠建立租界，享有治外法权，即外国臣民不受中国法庭的审訊，实行“最惠国待遇”的原則，即英国可以机械地获得其他大国从中国得到的特权。——第 602 頁。
- 361** 由于英国工业的蓬勃发展，在十八世紀后半期，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之間爭夺政权的斗争加强了。斗争的表現形式之一是本文列举的主張同工业資產階級妥协的貴族統治集团中的个别人物提出的那些議会改革法案。1780 年里士滿公爵提出的法案規定每年要进行議会选举，給成年的男性居民以选举权，并且重新划分选区。小皮特于 1782 年以下院議員的身分提出，1785 年他又以政府首腦的身分再度提出的法案，規定要消灭“腐朽的市鎮”(見注 347)，重新划分选区，以利于工业中心。

- 查理·格雷在 1793 年和 1797 年提出的那些改革法案也建議消滅“腐朽的市鎮”，規定在农业区要增加选民人数等等。所有这些法案都被議會会否决。——第 606 頁。
- 362** 指“禁口法”(«Gagging act»)——1819 年英国議會通过的廢除人身不可侵犯和限制出版、集会自由的六項特別法。——第 606 頁。
- 363** 指洛克·金的法案和約翰·罗素的法案(分別見注 98 和 101)。——第 606 頁。
- 364** 1851 年 12 月 2 日法国发生波拿巴政变以后，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頓在同法国駐倫敦大使談話时，贊同了路易·波拿巴的篡夺行为。帕麦斯頓采取这一步驟并没有征得輝格党内閣其他成員的同意，結果他就在 1851 年 12 月辞职，虽然在原則上，英国政府同帕麦斯頓的观点并没有分歧，而且它在欧洲第一个承认了法国的波拿巴政体。帕麦斯頓領導内閣后，由于他的外侨管理法案(見注 156)，又于 1858 年 2 月被迫提出辞职。——第 607 頁。
- 365** 1859 年 11 月，西班牙为达到其侵略目的向摩洛哥宣战，派奥当奈尔將軍率軍侵入摩洛哥境内。軍事行动一直延續到 1860 年 3 月，但是西班牙軍队遭到爱好自由的摩洛哥人民的頑强抵抗，并没有取得特別明显的胜利。1860 年 4 月締結了和約，根据該和約西班牙获得了賠款和小块割地。——第 609 頁。
- 366** 公主驃騎兵——西班牙輕騎兵的一个团。——第 616 頁。
- 367** 1859 年 11 月，法国政府再次企图破坏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的边界，但是遭到了摩洛哥人的抵抗。为此，由四艘軍舰組成的一支法国舰队轰击了泰图安堡垒。——第 617 頁。
- 368** 1836 年秋，阿尔及利亚軍队在哈治·阿罕默德貝伊指揮下在康士坦丁胜利地击退了企图以强攻夺取該城的法軍，并給以惨重的杀伤。直到 1837 年秋，在第二次远征时經過圍攻后，法軍才攻占該城。——第 621 頁。

369 “薩瓦、尼斯与萊茵”这一著作是弗·恩格斯于1860年2月写成的，这是他的另一著作“波河与萊茵河”（見本卷第247—299頁）的續篇。写这一著作的直接原因是拿破侖第三声明法国要求占有薩瓦和尼斯。恩格斯的“薩瓦与尼斯”（見本卷第622—626頁）一文也是为揭露这种要求而写的。恩格斯利用他在軍事科学、历史和語言学方面的淵博知識，揭穿了波拿巴对薩瓦、尼斯以及萊茵河左岸地区的要求是没有根据的。恩格斯写这一著作的另一个目的是根据对奥意法战争的經過和結果的分析，证明馬克思和他在对外政策問題上所坚持的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場的正确性。

曾經匿名出版过小册子“波河与萊茵河”的柏林出版商敦克尔，这次由于在对德国各政党的立場的估計上同恩格斯发生分歧，提出只有在作者在扉頁上署名的条件下才同意出版这部新的著作。恩格斯不願意正式署名，以免过早地让軍界讀者知道这两部著作均出于非軍人之手，所以认为只要指出这本新出的小册子出于“波河与萊茵河”的作者之手就够了。于是，这本小册子便于1860年4月在柏林的貝倫茲出版社匿名出版。——第633頁。

370 指：拿破侖第三对奥地利大使所作的新年談話（見注44）、拿破侖第三的堂弟拿破侖亲王（普隆-普隆）和克洛蒂尔达公主的联姻（見本卷第196—197頁）以及1859年的俄法条約（見注194）。馬克思把克洛蒂尔达諷称为伊非姬尼亚，伊非姬尼亚是国王亚加米农的女儿，根据希腊神話，在希腊人进行特洛伊远征前，亚加米农把她当作祭祀諸神的祭品。——第635頁。

371 “东德意志邮报”（《Ost-Deutsche Post》）是奥地利温和自由派的日报，从1848年至1866年在維也納出版。——第636頁。

372 指1859年席勒誕生一百周年的紀念活动。——第636頁。

373 1805年10月17日，奥地利軍队在烏尔姆向拿破侖第一投降。——第637頁。

374 宫廷軍事會議是奥地利宫廷的最高軍事會議（1556—1848年），它在战时掌管軍事部門的工作并对軍事行动执行最高指揮权。宫廷軍事會議

是远离战場的，它經常干預战事，所以箝制了最高指揮官的行動。——第 638 頁。

375 指 1850 年 6 月 10 日登在“泰晤士報”上的一篇通訊。

“軍事總匯報”(«Allgemeine Militär-Zeitung») 是有关軍事問題的一家德國報紙，從 1826 年起在達姆斯塔德和萊比錫出版；六十年代該報曾登過恩格斯的幾篇文章。——第 639 頁。

376 威斯特伐里亞王國是 1807 年拿破侖第一在德國中部建立的，一直存在到 1813 年。威斯特伐里亞的王位授予了拿破侖第一的弟弟日羅姆·波拿巴，其子即拿破侖親王(普隆-普隆)。——第 642 頁。

377 指維拉弗蘭卡條約和蘇黎世條約中規定的摩地那、帕爾馬和托斯卡納各公國王朝的復辟，他們是由于這些公國在 1859 年爆發了起義(見注 195)而被趕下台的。摩地那、帕爾馬和托斯卡納爭取并入皮蒙特的人民運動的加強使過去的執政者無法進行復辟。1860 年 3 月上述各公國都加入了皮蒙特。——第 642 頁。

378 *Loi des suspects* (嫌疑犯處治法) 是 1858 年 2 月 19 日由立法團通過的一個社會治安法的名稱。該法律授予法皇及其政府以無限的權力，可以把一切敵視第二帝國制度的嫌疑分子流放到法國和阿尔及利亞各地去，或者驅逐出一切法國領土。——第 644 頁。

379 “百日”是指拿破侖第一恢復帝制的短暫時期，從 1815 年 3 月 20 日他從埃爾巴島回到巴黎時起，到同年 6 月 28 日他在滑鐵盧失敗後第二次退位時為止。——第 646 頁。

380 丹璫人的禮物是指誰得到誰就可能死亡的禮物。根據關於奪取特洛伊城的傳說，希臘人(根據希臘部族之一的名稱也稱為丹璫人)送給特洛伊人一只木馬表示和解，其中藏有武裝的軍士。這就是羅馬詩人味吉爾的長詩“亞尼雅士之歌”第二部中的一個主人公所說的一句獲得了廣泛流傳的話“我害怕丹璫人，甚至害怕送禮的丹璫人”的由來。——第 659 頁。

381 *Sette comuni* (七村社) 和 *Tredici comuni* (十三村社) 是位於威

- 尼斯省境內阿尔卑斯山南部支脉上由德国人居住的两个小山区的名称。这两个德国移民区出現在十三世紀下半叶；这两个移民区的居民所說的德語方言現在只是在几个村子中还保留着。——第 660 頁。
- 382** 勒托-罗曼語(由古羅馬的勒威亚省的名称而来)屬於罗曼語族；主要是在瑞士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的高山地区作为口語流行。——第 661 頁。
- 383** 热月九日(1794年7月27—28日)是指导致雅各宾派政府倒台和大資产階級統治建立的反革命政变。——第 665 頁。
- 384** 指 1795 年 7 月 22 日法国和参加第一次反法同盟的西班牙在巴塞尔簽訂的单独和約。——第 665 頁。
- 385** “国民报”(《*Le National*》)是法国的一家日报,从 1830 年到 1851 年在巴黎出版;温和的資产階級共和派的机关报。——第 671 頁。
- 386** 在 1830—1831 年的波兰起义期間,波兰起义者占領了康斯坦丁大公在华沙的档案庫,其中有許多沙皇外交文件。这些文件一部分曾发表在戴·烏尔卡尔特于 1835—1836 年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丛刊“国家公文集,公文汇编”(《*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一部分发表在 1854 年巴黎出版的“有关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和未經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Recueil des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Russie pour la plupart secrets et inédits utiles à consulter dans la crise actuelle*》)。——第 672 頁。
- 387** 指 1807 年的提尔西特条約。拿破侖第一和亚历山大一世的第一次会見是在停在尼門河中心的木筏上举行的。——第 672 頁。
- 388** 据說是施瓦尔岑堡說的話(見注 47)。——第 673 頁。
- 389** 关于 1853 年初英国駐彼得堡公使西摩尔公爵同尼古拉一世关于土耳其問題的談判,可參看卡·馬克思的“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148—177 頁)两文。——第 675 頁。

- 390 拿破侖第三 1857 年 9 月 25 日在斯图加特同亚历山大二世会見时，亚历山大二世曾向他保证一旦法国和奥地利因意大利問題爆发战争，一定支持法国。——第 676 頁。
- 391 指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 1859 年 5 月 27 日(俄历 15 日)的照会(見注 290)。——第 677 頁。
- 392 “卡斯尔里子爵的回忆录和书信集”(«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Viscount Castlereagh»)。——第 678 頁。
- 393 华沙大公国 是拿破侖第一在 1807 年根据提尔西特和約划出原来归并于普魯士的一小块波兰領土所建立的藩屬；1809 年，奥地利被击潰后，奥地利占有的那部分波兰領土也并入这个公国。根据 1814—1815 年維也納會議的決定，公国的領土被普魯士、奥地利和俄国所瓜分。——第 678 頁。
- 394 德意志联邦条例 是 1815 年 6 月 8 日在維也納會議上通过的；根据这个条例，为数众多的德国邦形式上联合成为所謂的“德意志联邦”(見注 69)。——第 678 頁。
- 395 特劳波(奥帕瓦)會議——反动的神圣同盟的第二次會議，于 1820 年 10 月开幕，1821 年 5 月閉幕。
关于 来巴赫 會議見注 192。
維罗那 會議——神圣同盟的最后一次會議，于 1822 年 10—12 月举行，通过了关于法国干涉西班牙的決議，延长了奥地利对意大利的占領，譴責了希腊起义者。这几次會議的努力，其目的都是要鎮压欧洲各国的資产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第 678 頁。
- 396 指俄国外交大臣涅謝尔罗迭 1848 年 7 月 6 日給俄国駐德国各邦的代表发出的通告(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342—349 頁)。——第 678 頁。
- 397 指 1852 年 5 月 8 日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魯士、瑞典的代表同丹麦的代表共同簽訂的关于保证丹麦王国領土完整的倫敦議定书。这个議定书的基础是倫敦會議的上述各参加国(普魯士除外)于 1850 年 8

月2日通过的議定书，議定书規定丹麦王室的領地(包括同时加入德意志联邦的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在內)不可分割的原則。倫敦議定书指出，俄皇是丹麦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之一(作为以彼得三世称号在俄国称帝的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查理-彼得-烏尔利希的后裔)；这些继承人都放棄自己的权利，把王位让給了被宣布为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者的克里斯提安·格呂克斯堡公爵。这就为俄国沙皇后来在格呂克斯堡王朝終結时要求取得丹麦王位开創了先例。——第678頁。

- 398** 在“人民报”(見注213)“报刊述評”栏上发表的这篇評論的目的，是反对德国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当时在倫敦出版的报纸“海尔曼”(«Hermann»)。除了馬克思以外，埃拉尔特·比斯康普也参加了这篇評論的某些写作工作。由于1859年的奥意法战争和小資产階級民主派流亡者的活动的活跃，馬克思认为，为反对小資产階級思想意識对无产階級代表的影响而斗争是“人民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評論中，馬克思对小資产階級思想家們在政治上的无原則性和幻想、他們的小市民趣味和不学无术作了淋漓尽致的批判。馬克思的反对金克尔的言論迫使金克尔不得不辞去“海尔曼”編輯的职务。1859年8月“人民报”由于缺乏資金而停刊，这使得馬克思未能彻底地打击这家小資产階級报纸。

在这里发表的評論中，对1859年5月28日、6月18日、7月2日和9日出版的“海尔曼”第21、24、26和27号的内容进行了批判。——第684頁。

- 399** “海尔曼”——德国小資产階級民主派的机关报“海尔曼。倫敦德文周报”(«Hermann. Deutsches Wochenblatt aus London»)的簡称；自1859年在倫敦用德文出版；从1859年1月至7月，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任該报編輯。

該报是以凱拉賽人的領袖阿尔米紐斯的名字命名的，自从十七世紀末洛恩施坦的长篇小说“英勇的人民英雄阿尔米紐斯，或海尔曼”問世以后，阿尔米紐斯也不正确地被称为海尔曼。公元9年，日耳曼人在阿尔米紐斯的率領下，在条多堡森林中击潰了羅馬的总督瓦魯斯的几

个軍团。——第 684 頁。

400 指署名卡田卡·齐茨在該报上发表所引这段詩的作者和“海尔曼”的編輯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据傳說，图斯涅尔达是凯拉賽人的領袖阿尔米紐斯的夫人。——第 684 頁。

401 諷刺地暗指德国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叔尔茨的过去和他与金克尔的联系，叔尔茨在青年时期曾参加过金克尔創建的名为“小金虫协会”的文学团体。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性文章“流亡中的大人物”（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279—284, 296—297 頁）中对金克尔这一个时期的活动作了评价。——第 684 頁。

402 指金克尔在 1848—1849 年革命失敗后欧洲出現的反动时期中的活动。金克尔作为德国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流亡者的首領之一，他的政策不是从当时欧洲存在的客观的經濟和社会政治条件出发，而是从认为欧洲革命随时都可能开始的主观的、唯意志論的概念出发。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2 年所著的抨击性文章“流亡中的大人物”（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259—380 頁）中，揭穿了金克尔和小資產階級流亡者的其他領袖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空想的，也揭穿了他們的策略的冒險主义的性质。——第 685 頁。

403 指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他以一个牧师的助手开始了他的官場生涯。——第 685 頁。

404 *«Point d'argent, point de Suisses»* (“沒有克勞澤，就不会有瑞士人”)——据說是法国国王弗朗斯瓦一世(1515—1547 年)国庫枯竭时，拒絕为他服务的瑞士雇佣兵說的話。法国剧作家拉辛在他的剧作“訟棍”中用了这句话。——第 686 頁。

405 馬克思暗指福格特加入瑞士国籍，福格特在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失敗后流亡瑞士。

馬克思把金克尔称为“克勞澤”（德国的小銅币），是諷刺金克尔在金錢問題上的吝啬小气。——第 686 頁。

- 406 “菲力浦城下再見!”——据傳說,是非力浦(色雷斯的古城)会战前夜布魯士斯夢見被妖魔所杀的凱撒所說的話。公元前 42 年羅馬三执政的巨头馬可·安东尼和屋大維的軍队在菲力浦击潰了由布魯士斯和卡西烏斯所率領的羅馬貴族共和国的拥护者的軍队。——第 688 頁。
- 407 “凉亭”(«Gartenlaube») 是小資產階級派別的一家德国文学周刊“凉亭. 家庭画报”(«Die Gartenlaube. Illustriertes Familienblatt») 的簡称, 1853—1903 年在萊比錫出版, 1903—1943 年在柏林出版。——第 688 頁。
- 408 指卓越的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洪堡逝世(1859 年 5 月 6 日) 的追悼会, 德国流亡者的各种組織以及“海尔曼”报都参加了追悼会。——第 688 頁。
- 409 指十九世紀流傳很广的佩利茨所著的“供有学識的讀者和大学生閱讀的世界通史”(«Die Weltgeschichte für gebildete Leser und Studierende») 一书。該书的第一版于 1805 年在萊比錫出版。——第 689 頁。
- 410 暗指爱尔福特議會(見注 241)。——第 691 頁。
- 411 *Et autres Zéphyres* 以及其他的捷菲尔兵(見注 81)。——第 692 頁。
- 412 前拉斐尔派 是十九世紀下半叶在英国发展起来的写生画的一个流派。前拉斐尔派画家模仿拉斐尔以前的早期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些艺术家(这个流派因此得名)。前拉斐尔派画家的創作是小資產階級对于資本主义制度的丑恶现实的浪漫主义的抗議的表現, 他們以虔信宗教和充滿神秘主义的中世紀来对抗資本主义制度的丑恶现实。脱离当前现实导致前拉斐尔派画家走向象征主义和風格模拟主义。——第 694 頁。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59年1月—12月)

1859

- 1月** 馬克思的旨在研究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批判资产階級政治經濟学的、計劃写成6卷的經濟学巨著的第一分册脫稿,馬克思还在1858年8月就开始了这一分册的写作。在第一分册中他研究了商品、劳动、价值和貨幣等問題;馬克思打算以“政治經濟学批判”为題,把它印成单行本,他根据与柏林出版商敦克尔商定的合同,整理手稿准备付印。
- 1月5日左右** 馬克思写“意大利的統一問題”一文,指出意大利争取民族統一和驅逐奥地利人的运动正在加强,路易-拿破侖企图利用这一运动来为自己王朝的利益服务。这篇文章作为社論发表在1月24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1月6日左右** 馬克思写信給德国詩人、前“新萊茵报”的編輯之一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弗萊里格拉特,希望他不要参加小资产階級民主主义者金克尔办的周报“海尔曼”,因为这家周报的方針是和无产階級运动格格不入的。
- 1月6日** 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請他写信告訴弗萊里格拉特,不能同金克尔作任何妥协。
- 1月11日** 馬克思写“欧洲的战争前景”一文,分析了欧洲各个主要国家的經濟和政治状况,以及国际关系,并得出結論

說：第二帝国的波拿巴統治集团力图发动一場新战争，但是，这场战争可能成为“这一假帝国的丧钟”。这篇文章发表在1月31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1月13日

馬克思校訂和补充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寄来的为“紐約每日論壇报”撰写的“歐洲的金融恐慌”一文。文中揭穿了反革命的波拿巴集团企图用发动局部战争的方法来延长自己在法国的統治的阴谋。文章发表在2月1日該报上。

1月21日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学批判”的手稿整理好以后，写信給恩格斯說，由于沒有錢付邮費，他不能把手稿寄給柏林的出版商，他請求恩格斯寄給他两英鎊；并且还同恩格斯商量該书外文譯本的版权問題。

1月25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一篇經濟評論。这篇文章沒有发表。

1月25—26日

恩格斯写信給詩人弗萊里格拉特，表示自己反对他支持金克尔。

1月26日

馬克思把“政治經濟学批判”的手稿寄給柏林出版商敦克尔。

1月28日

馬克思写一篇关于法国国内政治状况的文章，文中利用了恩格斯寄給他的材料。文章以“路易-拿破侖的处境”为題发表在2月18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由于馬克思标明他这篇文章是巴黎通訊，所以他在文章上写的日期是1月26日。

馬克思写信給恩格斯，請他写一篇关于曼彻斯特工业发展前途的文章。恩格斯写的这篇文章，大概被邮局扣压，沒有送到馬克思手里。

1月31日

恩格斯写“法国軍隊”一文，分析法国的軍事力量；他利用了根据路易-拿破侖的命令在“立宪主义者报”上公

布的官方数字。文章作为社論发表在2月24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2月1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好定期特約文章。文章沒有发表。

馬克思写信給在美国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德国社会主义者約·魏德迈，告訴他已同宪章派領袖厄內斯特·琼斯断絕关系，因为琼斯企图和资产階級急进派訂立協議；同时談到了党内同志、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恩格斯、沃尔弗、弗萊里格拉特、維尔特、德朗克、伊曼特等人的情况。馬克思还告訴魏德迈，正准备在德国出版“政治經济学批判”一书，并向他介紹了該书的大綱。

馬克思回信給紐約一个德国共产主义团体的领导人阿·康普，說他在这段时间沒有和任何組織发生关系，因为他在从事无产階級解放斗争所必需的理論工作。

2月2日

馬克思写信給拉薩尔，对寄給敦克尔的“政治經济学批判”的手稿的下落感到不安，他担心手稿落入了警察手中。

2月4日

馬克思在給拉薩尔的信中，研究了歐洲的战争前景，他相信，战争将导致严重的、而且归根到底是革命的后果。

2月8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一篇文章，評論拿破侖第三在2月7日立法議會開幕时所作的御前演說以及在他的授意下写的一本匿名小册子“皇帝拿破侖第三和意大利”。文章沒有发表。

2月9日

馬克思接到敦克尔的通知，說他已于2月1日收到“政治經济学批判”的手稿。

- 2月10日** 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德国的兵力”一文；他根据德国官方材料估計了一旦发生战争德国各邦可能用来反对波拿巴法国的武装力量；恩格斯得出結論說，战争的进程可能会导致德国革命。这篇文章发表在3月12日該报上。
- 2月12日** 馬克思为了帮助患重病的党内同志、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格·埃卡留斯，在倫巴第典当衣服。
- 2月中** 馬克思向“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之一查·德納打听，能否在美国出版他的著作“政治經济学批判”的英譯本。在美国出书一事未获成功。
- 恩格斯写“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一文，分析了奥地利在明乔河和阿迪杰河，在四边形的要塞区（曼都亚、培斯克拉、列尼亚哥和維罗那）的陣地的战略优势。文章发表在3月4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2月23日** 馬克思把“政治經济学批判”的序言寄給柏林的敦克尔。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原理作了經典性的表述。
- 2月25日左右** 恩格斯写信告訴馬克思，說他打算以“波河与莱茵河”为題写一本小册子，来闡述他和馬克思对正在策划中的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的战争的观点。
- 2月25日** 馬克思請拉薩尔为恩格斯拟写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寻找出版商。
- 馬克思写信給恩格斯，认为“波河与莱茵河”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劝恩格斯尽快把手稿写出来。他建議匿名出版这本小册子，以便給讀者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本书作者是一位著名的軍事权威。
- 2月25日和3月4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两篇以“不列顛工厂工

- 业的状况”为題的文章，分析了英国政府的官方統計报告。这两篇文章分別发表在3月15日和24日該报上。
- 2月28日—12月** 馬克思写研究資本諸問題的“政治經济学批判”第二分册。因此，馬克思繼續在英国博物館里从事研究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的經济学家特別是威兰德、配第、馬尔薩斯、穆勒、莫利納里、加利阿尼等人的著作，并且作了許多摘录。
- 2月底** 恩格斯写“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一文，分析了以奥地利为一方，以及以法国和意大利各国为另一方的作战双方的战略陣地。文章作为社論发表在3月17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2月底—3月9日** 恩格斯写小册子“波河与萊茵河”，闡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德国統一和意大利統一这个問題上的政治立場。
- 3月1、22日和4月1日** 馬克思写三篇評論迪斯累里向議會提出的选举改革法案的文章。第一篇以“英国議會改革的新法案”为題发表在3月17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其余两篇沒有发表。
- 3月10日** 馬克思告訴恩格斯說，他已收到小册子“波河与萊茵河”的手稿，他給这本小册子以很高的評價。当天他就把手稿寄給柏林的出版商敦克尔。
- 3月11日左右和15日** 馬克思写“法国的战争前景”和“普魯士的战争前景”两文，发表在3月31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法国的战争前景”一文，标明写于巴黎，署的日期是3月9日。
- 3月18日左右** 馬克思写“历史上的类似現象”一文，把1813年拿破侖第一的政治状况和1859年拿破侖第三的政治状况加以对比。文章作为社論发表在3月31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3月27日—5月** 馬克思再次接到維也納資產階級自由派報紙“新聞報”編輯麥克斯·弗里德蘭德通過拉薩爾向他提出的為該報撰稿的建議，這一次馬克思同意了，因為自從馬克思由於該報對帕麥斯頓的政策抱同情態度因而拒絕了1857年12月接到的請他為該報撰稿的建議以來，該報已改變了自己的政治方針。但是，和弗里德蘭德的商談，由於奧意法戰爭的爆發未獲成功。
- 3月底** 馬克思接到查·德納請他為其在紐約出版的“美國新百科全書”撰寫“築城學”和“步兵”兩個條目的建議。
- 4月初** 恩格斯就俄國提出的召開和平會議以解決奧法衝突的建議寫了一篇文章。文章以“即將舉行的和平會議”為題，作為社論發表在4月23日“紐約每日論壇報”上。
- 4月5日** 恩格斯的小冊子“波河與萊茵河”在柏林匿名出版，印數為1000冊。
- 4月8日和12日** 馬克思寫了兩篇文章，評論印度的英國殖民當局由於鎮壓1857—1859年印度人民民族解放起義的耗費而引起的嚴重財政困難；文章以“印度財政狀況的嚴重混亂”為題，發表在4月30日“紐約每日論壇報”上。
- 4月11日左右和28日** 恩格斯寫兩篇評論法國、皮蒙特和奧地利的備戰情況的文章。文章以“戰爭的不可避免性”和“戰爭的前景”（社論）為題，分別發表在4月30日和5月12日“紐約每日論壇報”上。
- 4月14日—5月6日左右** 馬克思密切注意國際局勢，尤其是備戰情況；他在許多文章中表述了自己的看法，這些文章分別發表在4月30日、5月12日和18日“紐約每日論壇報”上，標題是：“即將舉行的和平會議”、“財政恐慌”、“甜言蜜語”（社論）。
- 4月19日** 馬克思寫信給拉薩爾，對他的劇本“弗蘭茨·馮·濟金

- 根”提出了批評意見。拉薩尔在这个剧本里,极力頌揚以1522—1523年貴族起义的領袖济金根为代表的十六世紀德国騎士阶层。馬克思在信中指出,拉薩尔把路德-騎士式的反抗看得高于閔采尔-平民式的反抗,从而歪曲地表現了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德国的革命事件。馬克思在信中揭露了拉薩尔主义极其有害的特点之一,就是否认农民运动的革命性质,力图把农民描繪成反动階級。馬克思在分析拉薩尔的剧本时,闡述了一系列有关文学和美学問題的重要原理。
- 4月20日左右** 馬克思和弗萊里格拉特見了面,弗萊里格拉特把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庸俗唯物主义者卡尔·福格特由于战争的日益迫近而提出的政治“綱領”給他看了。馬克思发现福格特的“綱領”对波拿巴颇为推崇。
- 4月21—22日** 恩格斯写“战争逼近的征兆。——德国的扩軍备战”一文。馬克思作了补充并署名写作日期(4月22日)后,把它寄給“紐約每日論壇报”。文章发表在5月9日該报上。
- 5月初左右** 馬克思看到了1859年4月出版的卡尔·福格特的小册子“欧洲現狀研究”。这本小册子使他确信福格特同波拿巴集团有联系。福格特从路易-拿破侖那里領取津貼一事,在1871年为文件所证实。
- 5月1日以后** 馬克思召集一批德国流亡者、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罗赫納、普芬德、李卜克內西等人——开会。在会上他严厉批評了該会机关报“新时代”,因为“新时代”变成了小資产階級政論家埃德加尔·鮑威尔的工具。在这次會議上,对一般无产階級政党及其机关报的問題展开了广泛的討論。
- 5月9日** 馬克思出席英国政治活动家戴·烏尔卡尔特因意大利

战争而組織的一次群众大会，并坐在主席台上。在大会期間，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尔·布林德告诉馬克思說，福格特从拿破侖第三的政府那里領取經費来宣傳波拿巴主义，并企图用收买的办法使某些政論家发表有利于路易·波拿巴的言論。

5月10—24日

馬克思就4月底开始的意大利战争写了“奥地利、普魯士和德国对战争的态度”、“維也納要聞”和“普魯士对战争的看法”三篇文章，分別发表在5月27日、6月6日和10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5月11日

李卜克內西和德国政論家比斯康普拜訪馬克思，請他为比斯康普在不久前創办的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以及其他工人教育协会的正式机关报“人民报”撰稿。馬克思由于時間不够謝絕了这一請求，但是答应帮助該报，为該报在朋友中組織訂戶，給以金錢上的支持，向該报提供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文章等。馬克思提出要他帮助，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人民报”同站在亲普魯士和亲波拿巴立場上的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进行斗争。馬克思在談話中，把福格特“綱領”的內容和1859年5月9日群众大会上从布林德那里得到的关于福格特充当波拿巴走狗的活动材料告訴了他們。比斯康普事先沒有通知馬克思就把这些材料用到他反对福格特的文章“帝国摄政王”中去了，这篇文章发表在5月14日“人民报”上。

**5月12日—24日
左右**

恩格斯写“战争”、“战况沒有进展”、“会战终于发生了！”、“蒙特貝洛会战”等四篇文章，評論意大利軍事行动的进程和最初几次会战。文章作为社論分別发表在5月23日、27日，6月6日和10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5月14日

根据馬克思的建議，“人民报”第2号上发表了一篇評

論恩格斯的匿名小冊子“波河与萊茵河”的文章，文中引証了小冊子的几个地方，指出小冊子的作者是无产階級政党的一位著名活动家。

5月18日左右

馬克思收到約·魏德迈和阿·康普从美国寄来的信。他們告訴馬克思說，在美国預訂他的著作“政治經濟学批判”的已經不下 100 人。

5月18日

恩格斯写信給拉薩尔，对他的剧本“弗兰茨·馮·济金根”提出批評意見，从文学观点和剧本的历史内容的观点分析了这个剧本。和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从党的立場出发分析了拉薩尔的剧本，指出剧本的根本缺点是低估了农民运动的作用。

鉴于拉薩尔的小冊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魯士的任务”出版，馬克思写信給恩格斯，建議出版“党的宣言”，闡述无产階級革命者对战争的态度，并批判拉薩尔所維護的主張德国中立的立場。馬克思认为拉薩尔的小冊子是錯誤的和有害的，他把拉薩尔所維護的对奥意法战争的观点看成是替拿破侖第三和普魯士反革命統治集团的政策作辯护。

5月24日

为了巩固无产階級革命者在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的陣地，馬克思通过普芬德介紹卡·沙佩尔加入协会并担任协会的領導工作。

5月27日左右

馬克思认为恩格斯关于軍事事務的文章可以增加“人民报”的訂戶，因此，在他的請求下，恩格斯为該报写了“意大利战争”一文，发表在 5 月 28 日該报上。

5月30日—6月9日左右

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三篇文章，評論意大利軍事行动的进程和第一次馬振塔大会战。恩格斯这三篇文章分別以“战略”、“軍事行动的經過”、“奥軍的失敗”为題，作为社論发表在 6 月 15、17 和 22 日該报上。

- 5月底** 馬克思給意大利革命家馬志尼发表在5月16日“思想和行动”报上的宣言写按語。馬克思的按語同宣言的譯文一起发表在6月17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6月3日左右—7月15日** 馬克思同比斯康普协作,为“人民报”写評論,嘲笑“海爾曼”报的內容和文風。評論以“报刊述評”为題发表在6月4、25日,7月9日和16日“人民报”上。
- 6月4日** 根据馬克思的建議,“人民报”发表了他的“政治經济学批判”的序言的大部分。馬克思的序言同时也为許多在美国出版的德文报纸所轉載。
- 6月7日左右** 馬克思在1859年6月2日瑞士报纸“瑞士商业信使报”的附录中讀到了福格特的誹謗文章“警告”;这篇文章完全是攻击馬克思及其拥护者的粗野的誹謗性的謠言。为了揭露福格特的誹謗,在馬克思的坚决要求下,1859年6月11日“人民报”发表了这篇文章。
- 6月9日左右** 恩格斯写完了应馬克思請求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筑城学”这一条目,載于同年出版的百科全书第七卷。
- 6月9日左右和16日左右** 恩格斯为“人民报”写两篇評論意大利軍事行动的进程的文章。文章以“軍事事件”和“馬振塔会战”为題,分別发表在6月11日和18日該报上。“馬振塔会战”一文还以“历史的一章”为題发表在7月2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6月10日** 馬克思在和比斯康普商談中,以自己的名义并代表恩格斯表示,願意公开地和更积极地参加“人民报”的出版工作,并建議在最近一期“人民报”上刊登这則消息。
- 6月11日** 馬克思的著作“政治經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在柏林出版,印数为1000册。
- “人民报”征得馬克思的同意,发表了編輯部关于

- 扩大該报撰稿人范圍和吸收无产階級政党最重要的写作力量,首先是馬克思、恩格斯、弗萊里格拉特、威·沃尔弗和海澤参加該报工作的声明。
- 6月12日左右—
7月2日左右** 馬克思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他們討論了有关“人民报”出版工作的一些問題,并同許多熟人商定給“人民报”以物质支援。馬克思还到苏格兰去拜訪了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伊曼特和海澤,并就筹措出版报纸的經費問題同他們进行了商談。
- 6月23日左右** 馬克思为“人民报”写“斯普累河与明乔河”一文,认为随着意大利战争的結束,德国将成为新的革命事件的中心;文章发表在6月25日該报上。
- 6月23日—7月7日** 恩格斯为“人民报”写“奥軍向明乔河的退却”一文和两篇以“索尔費里諾会战”为題的文章。文章分別于6月25日、7月2日和9日发表。
- 6月24日左右和
7月6日左右** 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两篇評論意大利軍事行动的进程的文章:“战争的消息”和“历史的公断”;文章作为社論分別于7月8日和21日发表。
- 7月3日左右** 馬克思从曼彻斯特返回倫敦后,担任了“人民报”的实际领导工作和編輯工作,他打算不仅利用这家报纸作为宣傳革命无产階級思想的讲坛,而且在一旦发生革命事件时就把它变成建立无产階級政党的組織中心。
- 7月9日左右** 馬克思写“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一文,揭露了德国自由資产階級的代表以及同他們勾結在一起的資产階級民主派所发动的主張在普魯士领导下統一德国的运动的反革命性质。文章发表在7月9日“人民报”上。
- 7月12日左右—
8月中**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了五篇評論維拉弗兰卡初步和約的文章:“意大利赢得了什么?”、“媾和”、“維

拉弗兰卡条約”、“被证实了的真理”和“路易-拿破侖和意大利”說明拿破侖第三在7月間匆匆和奧地利簽訂和約，是因为他害怕意大利、法国和其他各国的革命震蕩，同时还揭露了波拿巴集团对意大利人民的真正民族利益的敌視态度。文章作为社論分別发表在7月27、28日，8月4日和29日該報上。

約7月中

馬克思就匿名的反福格特的傳单“警告”一事，同布林德、李卜克內西以及承印“人民報”的印刷厂厂主霍林格尔交談；这份傳单全文发表在6月18日“人民報”和6月22日奧格斯堡“总汇报”上。傳单揭露了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的走狗。由于6月中李卜克內西在霍林格尔的印刷厂中曾发现带有布林德的手迹的傳单校样，并把它寄給了“总汇报”編輯部，所以馬克思认为傳单是布林德写的。但是，布林德由于不願意公开反对福格特，否认他是傳单的作者。

7月20日—8月3日 左右

恩格斯为“人民報”写一組以“意大利战争。回顾”为題的文章，闡述了奧意法战争的各个主要事件。这一組文章发表在7月23、30日和8月6日該報上。

7月23日—8月20日

馬克思在“人民報”上轉載了“自由新聞”发表的外交文件“1837年內閣出版的俄国当今在位皇帝訓誡录”的譯文。馬克思还把这个文件寄給了“紐約每日論壇報”，經略加删节后，发表在8月3日該報上。

7月25日左右

恩格斯写信給敦克尔，指出有必要在報上刊登一个关于馬克思的“政治經济学批判”一书已經出版的廣告。

7月底—8月中

馬克思为“人民報”写《Quid pro quo》这組文章，根据官方的外交文件，批判地分析了普魯士統治集团在奧意法战争期間的政策。文章发表在7月30日，8月6、13和20日該報上；由于“人民報”停刊，这一組文章沒有登完。

- 8月3—15日** 恩格斯給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写評論，认为馬克思的这一著作是无产階級政党的卓越的科学成就和制定无产階級的科学世界观的事业中的重要阶段；評論发表在8月6日和20日“人民报”上。由于“人民报”停刊，評論沒有登完。
- 8月5日左右** 馬克思以“不列顛的貿易”为題写一篇关于英国对外貿易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論发表在8月19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8月13日左右** 馬克思接到德納請他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关于黑格尔这个条目的建議。但是，由于德納提出一个必需的条件，要求这一条目必須写得“絕對公正”，就是說不要对黑格尔的观点进行批判，所以馬克思沒有接受这一建議。
- 約8月中** 馬克思从李卜克內西那里知道，由于奧格斯堡“总汇报”刊登了李卜克內西寄去的傳单“警告”，福格特向法院对該报提出控訴，所以該报編輯部坚决要求为对福格特的指責提供证据，虽然馬克思激烈反对“总汇报”的方針，但是他认为必須帮助該报揭露福格特的波拿巴主义活动。因此，他决定同布林德会晤，要求布林德证实对福格特的指責。但由于布林德不在倫敦，会晤未能举行。
- 8月19日左右** 馬克思为“人民报”写“政治評論”一文，主要是評論倫敦建筑工人的罢工；文章发表在8月20日該报上。
- 8月20日** 由馬克思担任編輯的“人民报”出版最后一号（第16号）。該报由于經費困难而停刊。
- 8月23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人口、犯罪率和赤貧現象”一文，根据对1844—1858年期間英国官方統計資料的分析指出，尽管工业生产有所增长，但英国无产階

級貧困化的过程却加剧了。文章发表在9月16日該报上。

8月底—10月

由于“人民报”停刊，馬克思要用很多時間来清理有关該报出版工作的事务。他不得不用自己的錢来偿付一部分因出版报纸而欠印刷厂厂主的債。

馬克思經受着严重的經濟困难，他没有錢付房租、煤气費、水費，无法繳納子女的学費。恩格斯像往常那样，帮助了馬克思。

9月—10月10日左右

恩格斯应馬克思的請求，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步兵”这一条目，刊载在1860年出版的百科全书第九卷。

9月1日

匈牙利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瑟美列拜訪了馬克思，把奥意法战争开始时科苏特同路易-拿破侖进行談判的情形告知了馬克思。

9月5日

馬克思写“工厂工业和貿易”一文，根据官方統計資料，断定了資本主义生产周期发展所固有的某些規律性。文章发表在9月23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馬克思写“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侖”一文，根据从瑟美列那里得到的材料，揭露了波拿巴集团利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运动以达到自己目的的企图。文章发表在9月24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并摘要刊载在倫敦“自由新聞”、奧格斯堡“总汇报”和“威塞尔报”上。

9月8日和20日之間

恩格斯同从德国来的双亲一起到苏格兰旅行。

9月10日左右—9月底

馬克思获悉布林德9月8日写給李卜克內西的信，布林德在信中坚决否认他曾参与对福格特提出指責一事。馬克思同李卜克內西一起去見倫敦“自由新聞”报的責任編輯科勒特，科勒特证实5月27日“自由新聞”报发表的匿名文章“康斯坦丁大公——未来的匈牙利国王”的作者正是布林德，这篇文章的内容和后来印发

- 的傳单“警告”基本上是相同的。
- 9月13—30日** 馬克思以“新的对华战争”为題写一組文章，揭露了英法殖民主义者的行为，尖銳地抨击了帕麦斯顿政府掠夺性的殖民政策。这組文章发表在9月27日,10月1、10和18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9月17日** 馬克思收到霍林格尔印刷厂的排字工人阿·費格勒的书面声明，他证实傳单“警告”的手稿从笔迹看是布林德写的，并且說霍林格尔亲自告訴他傳单的作者是布林德。
- 10—11月** 馬克思认为在无产者中間傳播自己的經济学說有很大的意义，因此，他給一批工人作关于政治經济学的讲演。
- 10月18日** 馬克思写“英国的贿选活动”一文，揭露資产階級貴族当权的英国的政治制度；文章发表在11月4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10月19日** 奧格斯堡“总汇报”編輯奥尔格斯請馬克思把证明傳单“警告”的作者是布林德的文件寄去，回信时馬克思隨信寄去了排字工人費格勒9月17日的声明，以便在审理福格特控訴“总汇报”一案时把这些文件提交法庭。馬克思的信和費格勒的声明一起发表在10月27日奧格斯堡“总汇报”上。
- 10月20日** 馬克思写“对和平的激进看法”一文，批判地評價了法国、撒丁和奥地利之間的和約的条款；关于簽訂这一和約的談判是1859年10—11月在苏黎世举行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1月8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11月** 恩格斯研究哥特語，并打算进一步精通古挪威語和盎格魯撒克遜語。
- 11月7日** 馬克思寄給汉堡“改革报”和奧格斯堡“总汇报”一篇駁

斥汉堡“自由射手”报編輯爱德华·梅因的声明，梅因毫无根据地断言，布林德不是傳单“警告”的作者，并指責馬克思企图誹謗布林德。馬克思在自己声明的結尾要求布林德承认自己是傳单的作者，从而帮助揭露福格特同拿破侖第三的联系。馬克思的声明以“关于卡尔·福格特控告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案件”为题，发表在11月19日“改革报”第139号的副刊上。奥格斯堡“总汇报”没有发表馬克思的这篇声明。

11月10日

恩格斯参加弗·席勒誕生一百周年紀念会。

11月15日

由于布林德公开拒絕承认自己是傳单“警告”的作者，馬克思給奥格斯堡“总汇报”寄去一篇声明，根据无法辯駁的事实，再一次证实傳单是布林德写的。馬克思的声明发表在11月2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25号的副刊上。

馬克思写“德国的动荡局势”一文，指出奥普矛盾的尖锐化；文章发表在12月2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11月17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一篇关于苏伊士問題的文章，但没有发表。

11月中

馬克思写“对华貿易”一文，以中国为例，揭露了欧洲殖民主义者对亚洲各国的掠夺行为；他指出，由于中国经济落后，欧洲列强对华貿易的发展前景不佳。文章发表在12月3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11月25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英国对法国入侵的恐惧”一文，評論英国社会輿論对法国入侵不列顛群島的威胁的反应。文章于12月9日发表。

1859年12月10日左右—1860年2月初

恩格斯写三篇文章，闡述1859年11月开始的西班牙侵略摩洛哥的战争的进程；有两篇以“对摩尔人的战争

的进程”和“对摩尔人的战争”为题，作为社論分別发表在1月19日和2月8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另一篇以“对摩尔人的战争”为题，于3月17日发表。

12月12日左右

恩格斯写信告訴馬克思，他正在研究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他对这本书的評價很高，同时指出达尔文成功地证实了自然界的历史发展过程，从而給了神学以毁灭性的打击。

12月13日

馬克思写信給恩格斯，談到俄国社会发展的速度比欧洲其他各地快，他一方面指出了农民反对貴族的运动，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貴族反对沙皇的立宪运动。

50年代末—60年代初

恩格斯研究英国經濟学家达布耳德的“英国财政、货币制度和統計史”一书，并且作了詳細的摘录。

人名索引

三 画

凡蒂, 曼弗雷多 (Fanti, Manfredo 1808—1865) ——意大利將軍和国家活动家, 曾参加 1848—1849 年的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皮蒙特师; 1860—1861 年任意大利陸軍和海軍大臣。——第 414—416、458 頁。

大莫臥儿王朝——印度的鉢諦沙赫王朝 (1526—1858)。——第 331 頁。

四 画

尤赫 (Juch) ——德国記者,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从 1859 年 7 月起为“海爾曼”报編輯。——第 689 頁。

尤利烏斯, 古斯塔夫 (Julius, Gustav 1810—1851) ——德国政論家,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第 158 頁。

尤維納利斯 (德齐姆斯·尤尼烏斯·尤維納利斯)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生于一世紀六十年代, 死于 127 年后) ——著名的羅馬諷刺詩人。——第 341 頁。

巴赫, 亚历山大 (Bach, Alexander 1813—1893) ——男爵, 奥地利反动的国家活动家, 君主专制政体的拥护者和教权主义者, 职业是律師, 1848—1849 年任

司法大臣, 1849 年 7 月至 1859 年 8 月任內务大臣, 实际上掌握了奧地利的全部政策。——第 478 頁。

巴贊, 弗朗斯瓦·阿希尔 (Bazaine, François Achille 1811—1888) ——法国將軍, 从 1864 年起为元帅, 在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 曾参加 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 曾参加 1862—1867 年法国对墨西哥的武装干涉, 普法战争期間 (1870—1871) 指揮萊茵軍团, 1870 年 10 月在麦茨投降。——第 402 頁。

巴尔本, 尼古拉 (Barbon, Nicholas 1640—1698) ——英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 认为物的价值是由它的有用性决定的; 他是所謂貨幣国定說的先驅。——第 68 頁。

巴拉宾, 維克多·彼得罗維奇 (Балабин, Виктор Петрович) ——俄国外交家, 1858—1864 年駐維也納大使。——第 338 頁。

巴拉盖·狄利埃, 路易 (Baraguay d'Hilliers, Louis 1764—1812) ——法国將軍, 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侖第一的远征; 他是阿希尔·巴拉盖·狄利埃的父亲。——第 259 頁。

巴拉盖·狄利埃, 阿希尔 (Baraguay

- d'Hilliers, Achille 1795—1878)——法国元帅,波拿巴主义者;1854年指揮法国的波罗的海远征軍;在1859年奧意法战争中指揮一个軍;1870年任巴黎总督。——第350、381、389、390、401、402、415、416、422、427、431、440、455、458、478頁。
- 巴納姆,芬涅阿斯·泰勒(Barnum, Phineas Taylor 1810—1891)——美国私营剧院老板,专演各种各样奇离古怪的戏剧。——第505頁。
-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Bastiat, Frederic 1801—1850)——法国庸俗經濟学家,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利益調和論的鼓吹者。——第26頁。
- 戈登(Gordon)——奥地利將軍,曾多次参加欧洲各国同盟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第649頁。
- 切茨,亞諾什(Czetz, Janos 1822—1904)——匈牙利將軍,在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中任七城市革命軍总參謀长,革命失敗后流亡国外。——第567頁。
- 文普芬,弗兰茨(Wimpffen, Franz 1797—1870)——奥地利將軍,曾参加鎮压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1859年奧意法战争中任第一軍团的指揮官。——第382、442頁。
- 韦尔登,弗兰茨·路德維希(Welden, Franz Ludwig 1782—1853)——男爵,奥地利將軍,1848年参加对革命的意大利的远征;在鎮压了1848年十月起义后任維也納卫戍司令;1849年4—5月任鎮压匈牙利革命的奧軍总司令。——第267頁。
- 韦斯帕西安(梯特·弗拉維·韦斯帕西安)(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 9—79)——羅馬皇帝(69—79)。——第473頁。
- 丹尼洛一世·涅哥什(Danilo I Njegoš 1826—1860)——門的内哥罗公爵(1852—1860)。——第505頁。
- 日拉丹,艾米尔·德(Girardin, Emile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在三十至六十年代曾断續地担任“新聞报”編輯,以政治上毫无原則著称。——第198頁。
- 日尔明尼,沙尔·加布里埃尔(Germiny, Charles Gabrielle 1789—1871)——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和财政家,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1—4月任财政部长,土地信用公司經理(1854—1856),法兰西銀行經理(1856—1867)。——第197頁。
- 比克西奧,雅克·亚历山大(Bixio, Jacques Alexander 1808—1865)——法国政論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国民报”編輯之一,1848年为制宪議会副議長,1848年12月20—29日任农业和貿易部长,1849年为立法議会议員。——第199頁。
- 卞尼格先,魯道夫(Bennigsen, Rudolph 1824—1902)——德国政治活动家,主張在普魯士领导下“自上而下”統一德国;1859—1867年为民族联盟党主席,从1867年起为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自由党右翼首領,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員(1871—1883和1887—1898)。——第548頁。

五 画

布阿(Bouat)——法国將軍,在1859年奧意法战争中指揮一个师。——第367

- 頁。
- 布倫 (Boulogne) —— 據傳說是公元前 390 年入侵意大利并占領了羅馬的高盧人的領袖。——第 509 頁。
- 布雷, 約翰·弗蘭西斯 (Bray, John Francis 1809—1895) —— 英國經濟學家, 空想社會主義者, 羅·歐文的信徒; 他發展了“勞動貨幣”論。——第 76 頁。
- 布阿吉爾貝爾, 比埃爾 (Boisguillebert, Pierre 1646—1714) —— 法國經濟學家, 重農學派的先驅, 法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鼻祖。——第 41—45、51、86、94、114—116、137 頁。
- 布萊克, 威廉 (Blake, William) —— 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英國經濟學家, 著有關於貨幣流通的著作。——第 94、169 頁。
- 布萊特, 約翰 (Bright, John 1811—1889) —— 英國工廠主, 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 自由貿易派的領袖和反谷物法同盟的創始人之一; 從六十年代起為自由黨左翼領袖; 歷任自由黨內閣的大臣。——第 236—238、586、606 頁。
- 布坎南, 大衛 (Buchanan, David 1779—1848) —— 英國政論家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 亞·斯密的信徒和詮釋者。——第 103 頁。
- 布魯姆, 亨利·彼得 (Brougham, Henry Peter 1778—1868) —— 男爵, 英國法學家和文學家, 二十至三十年代是輝格黨的著名活動家, 曾任大法官 (1830—1834); 從五十年代起在政治生活中便不起多大作用了。——第 51、523、591 頁。
- 布奧爾-紹恩施坦, 卡爾·斐迪南 (Buol-Schauenstein, Karl Ferdinand 1797—1865) —— 伯爵, 奧地利國家活動家
- 和外交家, 曾任駐彼得堡公使 (1848—1850), 後為駐倫敦公使 (1851—1852)、首相和外交大臣 (1852—1859)。——第 335、338—341、477 頁。
- 布呂歇爾, 格布哈爾德·勒勃萊希特 (Blücher, Gebhardt Lebrecht 1742—1819) —— 普魯士元帥, 曾多次參加反對拿破侖第一的戰爭。——第 296、498 頁。
- 布朗沙爾 (Blanchard) —— 法國將軍, 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個旅。——第 390 頁。
- 布萊克利 (Blakeley) —— 英國軍官和記者, 1859 年奧意法戰爭期間擔任“泰晤士報”在奧軍中的通訊員。——第 639 頁。
- 布爾韋爾, 威廉·亨利·利頓·厄爾 (Bulwer, William Henry Lytton Earle 1801—1872) —— 英國外交家, 議會議員 (1830—1837), 輝格黨人; 1839 年和 1840 年任英國駐巴黎代辦, 後任駐馬德里公使 (1843—1848)、駐華盛頓公使 (1849—1852) 和駐佛羅倫薩公使 (1852—1855); 1858—1865 年任駐君士坦丁堡大使。——第 573 頁。
- 布爾巴基, 沙爾 (Bourbaki, Charles 1816—1897) —— 法國將軍, 原籍希臘人, 曾參加 1853—1858 年克里木戰爭, 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個師, 曾參加 1870—1871 年普法戰爭。——第 321、458 頁。
- 布爾布隆 (Bourboulon) —— 1859 年法國駐中國全權代表。——第 568、569 頁。
- 布隆諾夫, 菲力浦·伊萬諾維奇 (Брунов, Филипп Иванович 1797—1875) —— 男爵, 俄國外交家, 駐倫敦公使 (1840—1854, 1858—1860), 後為大使

- (1860—1874)，出席 1856 年巴黎會議的俄國代表團團員。——第 505 頁。
- 布斯特拉巴——見拿破侖第三。
- 布卢姆菲耳德，約翰·阿瑟·道格拉斯 (Bloomfield, John Arthur Douglas 1802—1879) ——英國外交家；1851—1860 年任駐柏林公使和全權代表。——第 523 頁。
- 白恩士，詹姆斯 (Burnes, James 1801—1862) ——英國醫生，亞歷山大·白恩士的哥哥。——第 575 頁。
- 白恩士，亞歷山大 (Burnes, Alexander 1805—1841) ——英國軍官，1838—1842 年英國對阿富汗的戰爭期間任喀布尔英軍參謀部政治顧問。——第 574—576 頁。
- 汉利，約瑟夫·沃訥 (Henley, Joseph Warner 1793—1884) ——英國國家活動家，托利黨人，貿易大臣 (1852, 1858—1859)。——第 238 頁。
- 汉普敦，約翰 (Hampden, John 1594—1643) ——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著名活動家，他代表了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貴族的利益。——第 506 頁。
- 加尔涅，热尔門 (Garnier, Germain 1754—1821) ——法國經濟學家和政治活動家，君主主義者；重農學派的模仿者；亞·斯密著作的翻譯者和批評者。——第 63, 64, 99 頁。
- 加格恩，亨利希 (Gagern, Heinrich 1799—1880) ——男爵，德國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溫和自由派；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和議長，屬於中間派右翼，曾任帝國首相 (1848 年 12 月—1849 年 3 月)。——第 463 頁。
- 加布倫茨，路德維希·卡爾·威廉 (Gahlenz, Ludwig Karl Wilhelm 1814—1874) ——奧地利將軍，曾參加鎮壓 1848—1849 年的意大利革命和匈牙利革命，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個旅，曾參加 1866 年奧普戰爭。——第 413 頁。
- 加里波第，朱澤培 (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 ——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義者，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1848 年率領志願軍站在皮蒙特軍隊方面奮不顧身地同奧地利作戰；1849 年 4—6 月羅馬共和國保衛戰的主要組織者；五十至六十年代領導意大利人民為民族解放和國家統一而鬥爭，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阿爾卑斯獵兵。——第 179, 185, 194, 381, 386, 399, 403—407, 413, 420, 424, 435, 436, 441, 473, 479, 593, 623, 663 頁。
- 加利阿尼，斐迪南多 (Galiani, Ferdinando 1728—1787) ——意大利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重農學派學說的批評者；他斷言物的價值是由它的有用性決定的，同時也對商品和貨幣的本性做了許多正確的猜測。——第 22, 47, 62, 79, 95, 144 頁。
- 卡斯尔里子爵，罗伯特·斯图亚特 (Castlereagh, Robert Stewart 1769—1822) ——英國國家活動家，托利黨人，曾任陸軍和殖民大臣 (1805—1806, 1807—1809)，外交大臣 (1812—1822)。——第 71, 678 頁。
- 卡斯特尔博果 (Castelborgo) ——意大利將軍，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個師。——第 415, 416 頁。
- 卡登，罗伯特·瓦尔特 (Carden, Robert Walter 生于 1801 年) ——英國官吏，議會議員，托利黨人。——第 586—589

頁。

卡托(老卡托)(馬可·波尔齐烏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公元前234—149)——羅馬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貴族特权的維護者。——第118頁。

卡穆, 雅克(Camou, Jacques 生于1792年)——法国將軍, 曾参加克里木战争(1853—1856), 在1859年奧意法战争中指揮一个近卫师。——第429頁。

卡尔利, 卓万尼·黎納尔多(Carli, Giovanni Rinaldo 1720—1795)——意大利学者, 著有許多有关货币和粮食貿易的著作; 他反对重商主义。——第141頁。

卡富尔, 卡米洛·本佐(Cavour, Camillo Benso 1810—1861)——伯爵, 意大利国家活动家, 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貴族的思想家和領袖; 撒丁政府首腦(1852—1859和1860—1861), 实行在薩瓦王朝的领导下自上而下統一意大利的政策, 同时指望得到拿破侖第三的支持, 1861年領導第一屆意大利政府。——第179、180、335、406、470、473頁。

让南(Jannin)——法国將軍, 在1859年奧意法战争中指揮一个旅。——第429頁。

本德尔(Bender)——倫敦书商。——第685頁。

圣芒——見芒, 亚历山大罗。

圣西門, 昂利(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偉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85、147頁。

圣阿尔諾, 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勒卢阿·德(Saint-Arnaud, Armand-Jacques-Achille-Leroy de 1801—1854)

——法国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在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組織者之一; 曾任陸軍大臣(1851—1854), 1854年任克里木法軍总司令。——第198頁。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第487、575、576、675、676、679、680頁。

尼耶尔, 阿道夫(Niel, Adolphe 1802—1869)——法国將軍, 后为元帅; 曾参加克里木战争(1853—1856), 在1859年奧意法战争中指揮一个軍。——第199、350、381、415、418、420、423、427—431、455、458頁。

皮特(小皮特), 威廉(Pitt, William 1759—1806)——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的首領之一; 曾任首相(1783—1801、1804—1806)。——第606頁。

皮尔, 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温和派(皮尔派, 因他而得名)的領袖, 曾任內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 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 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廢除了谷物法(1846)。——第54、64、72、164、174、573頁。

皮卡尔(Picard)——法国將軍, 在1859年奧意法战争中指揮一个旅。——第429頁。

皮阿諾里, 卓万尼(Pianori, Giovanni 1827—1855)——意大利革命家, 曾参加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和反对法国干涉者的羅馬共和国保卫战; 革命失败后流亡皮蒙特, 后又流亡法国; 1855年5月因謀刺拿破侖第三被处死刑。——第190頁。

弗萊隆, 埃利·卡特林 (Fréron Élie Catherine 1719—1776) —— 法国批評家和政論家, 伏尔泰的論敌。——第 435 頁。

弗萊里格拉特, 斐迪南 (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 —— 德国詩人, 开始活动时是浪漫主义者, 后来成为革命詩人, 1848—1849 年是“新萊茵报”編輯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五十年代脱离革命斗争。——第 683 頁。

弗略里, 艾米尔·費里克斯 (Fleury, Emile Felix 1815—1884) —— 法国軍官和外交家, 波拿巴主义者,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第 198 頁。

弗兰茨-約瑟夫一世 (Franz-Joseph I 1830—1916) —— 奥地利皇帝 (1848—1916)。——第 185、313、318、334—336、373、379、426、442、443、448—453、455—461、467、469、473、478、484—486、490—494、508、516、542、592、595、638、640 頁。

弗兰契斯科二世 (1836—1894) —— 那不勒斯国王 (1859—1860)。——第 468、469 頁。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 (Friedrich-Wilhelm I 1802—1875) —— 黑森-加塞尔选帝侯 (1847—1866), 1831—1847 年为摄政王。——第 596、598—600 頁。

弗里德里希二世 (弗里德里希大帝) (Friedrich II, der Große 1712—1786) —— 普魯士国王 (1740—1786)。——第 296、504 頁。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 —— 普魯士国王 (1797—1840)。——第 504 頁。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 —— 普魯士国王 (1840—1861)。——第 371、548 頁。

弗兰克·德·庞比尼昂——見庞比尼昂, 让·雅克·勒·弗兰克。

兰斯唐侯爵, 亨利·配第-菲茨莫里斯 (Lansdowne, Henry Pettey-Fitzmaurice 1780—1863) —— 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1806—1807 年任财政大臣, 樞密院院长 (1830—1841, 1846—1852), 不管大臣 (1852—1863)。——第 43 頁。

卢梭, 让·雅克 (Rousseau, Jean Jacques 1712—1778) —— 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者, 民主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第 311 頁。

瓦揚, 让·巴蒂斯特·菲利貝尔 (Vaillant, Jean Baptiste Philibert 1790—1872) —— 法国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陸軍大臣 (1854—1859), 1859 年奥意法战争期间是总参謀长。——第 486 頁。

瓦列夫斯基伯爵, 亚历山大·弗洛里安·約瑟夫·科倫納 (Walewski, Alexander-Florian-Joseph-Colonna 1810—1868) —— 法国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 拿破侖第一和波兰瓦列夫斯卡娅伯爵夫人所生之子; 曾参加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 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 曾任外交大臣 (1855—1860); 曾担任巴黎會議 (1856) 的主席。——第 542、622 頁。

六 画

西迪-穆罕默德 (Sidi Mohammed 1803—1873) —— 摩洛哥皇帝 (1859—1873)。——第 631 頁。

西尼耳, 納騷·威廉 (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 —— 英国庸俗

- 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人，他反對縮短工作日。——第123、134頁。
- 西蒙尼，艾爾紐(Simonyi, Ernő 1821—1882)——匈牙利政治活動家，曾參加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革命失敗後流亡國外，1861年為匈牙利議會議員。——第567頁。
- 西摩爾，喬治·漢密爾頓(Seymour, George Hamilton 1797—1880)——英國外交家，1851—1854年任駐彼得堡公使。——第675、679頁。
- 西馬廩各厘(Seymour, Michael 1802—1887)——英國海軍上將，1854—1856年參加克里木戰爭，在侵略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為海軍指揮官(1856—1858)。——第583頁。
- 西斯蒙第，讓·沙爾·列奧納爾·西蒙·德(Sismondi, Jean Chales 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經濟學家，批判資本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批評家，經濟浪漫主義的著名代表人物。——第41、51、87頁。
- 米契爾(Mitchell)——英國駐廣州代辦。——第602—604頁。
- 米涅，克勞德·埃蒂耶納(Minié, Claude Etienne 1804—1879)——法國軍官和軍事發明家，創造了新式步槍。——第192、208、210頁。
- 米爾納·基卜生——見基卜生，托馬斯·米爾納。
- 米塞爾登，愛德華(Misselden, Eduard 1608—1654)——英國商業家和經濟學家，重商主義者。——第115、119—121頁。
- 伏爾泰，弗朗斯瓦·瑪麗(真姓為阿魯埃)(Voltaire, François 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國自然神論哲學家，諷刺作家，歷史學家，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著名代表人物，進行反對專制政體和天主教的鬥爭。——第311、435頁。
- 達里蒙，路易·阿爾弗勒德(Darimon, Louis Alfred 1819—1902)——法國政治活動家、政論家和歷史學家；他贊同并宣揚蒲魯東的觀點。——第76頁。
- 達來朗-貝里戈爾，沙爾·莫里斯(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 Maurice 1754—1838)——公爵，有名的法國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797—1799, 1799—1807, 1814—1815)，法國出席維也納會議的代表(1814—1815)，以政治上毫無原則和自私自利著稱。——第673頁。
- 達斯普雷，康斯坦丁(D'Aspre, Constantin 1789—1850)——男爵，奧地利將軍，曾參加鎮壓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第267頁。
- 達爾豪西侯爵，詹姆士·安得魯·拉姆西(Dalhousie, James Andrew Ramsay 1812—1860)——英國國家活動家，印度總督(1848—1856)，實行殖民掠奪政策。——第331頁。
- 吉南，路易·歐仁(Ginain, Louis Eugène 1818—1886)——法國戰爭畫家。——第519頁。
- 安諾特，克勞德·弗朗斯瓦(Nonnotte, Claude François 1711—1793)——法國作家，耶穌會教徒，伏爾泰的論敵。——第425頁。
- 安斯提，托馬斯·契澤姆(Anstey, Thomas Chisholm 1816—1873)——英國法學家和政治活動家，資產階級激進

- 主义者；1847—1852年为議會議員，曾任香港首席檢查官(1854—1859)。——第571頁。
- 艾曼努尔——見維克多-艾曼努尔二世。
- 毕希，約翰·格奧尔格 (Büsch, Johann Georg 1728—1800) ——德国經濟學家，基本上持重商主义观点。——第158頁。
- 毕洛夫，亨利希·迪特里希 (Bülow, Heinrich Dietrich 1757—1807) ——普魯士反动的軍事作家，有名的“最新軍事制度的精神”一书的作者。——第269—271、365、479、482頁。
- 毕希納，路德維希 (Büchner, Ludwig 1824—1899) ——德国生理学家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第530頁。
- 多德，乔治 (Dodd, George 1808—1881) ——英国政論家，著有許多有关工业問題的著作。——第99頁。
- 多斯特-穆罕默德 (Dost-Mohammed 1793—1863) ——阿富汗国王 (1826—1863)。——第574—576頁。
- 托倫斯，罗伯特 (Torrens, Robert 1780—1864) ——英国資产階級經濟學家，“通貨原理”学派的拥护者。——第174頁。
- 亚历山大，黑森亲王 (Alexander, Hessischer Prinz 1823—1888) ——奥地利將軍，在1859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个旅。——第401、430頁。
- 亚历山大一世 (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 ——俄国皇帝 (1801—1825)。——第442頁。
-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 ——俄国皇帝 (1855—1881)。——第180、319、394、406頁。
- 亚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公元前384—322) ——古代的偉大思想家，在哲学上动搖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間；奴隶主階級的思想家；按其經濟观点來說是奴隶占有制自然經濟的維護者，他最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第15、31、39、58、107、127、146頁。
- 亚述巴尼拔 (Assurbanipal 在古代作家的著作中叫薩尔达尼拔) ——亚述国王 (公元前668—約626)。——第565頁。
- 色諾芬 (Xenophon 公元前約430—354) ——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奴隶主階級的思想家，自然經濟的維護者。——第125、127、147頁。
- 乔治二世 (George II 1683—1760) ——英国国王 (1727—1760)。——第63、65頁。
- 乔治三世 (George III 1738—1820) ——英国国王 (1760—1820)。——第63頁。
- 齐格勒，弗兰茨 (Ziegler, Franz) ——維尔騰堡資产階級政治活动家，主張在普魯士的领导下統一德国，曾参加創建民族联盟党。——第463頁。
- 列奧波特二世 (Leopold II 1797—1870) ——托斯卡納大公 (1824—1859)。——第545頁。
- 休謨，大卫 (Hume, David 1711—1776) ——英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論者；資产階級历史学家和經濟學家，重商主义的反对者，貨幣数量論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第150—155、158—161、171、172、175頁。
- 休謨，詹姆斯·迪肯 (Hume, James Deacon 1774—1842) ——英国資产階級經濟學家，自由貿易論者。——第169頁。

伊索 (Aisopos 公元前六世紀) —— 半傳說中的古希臘寓言作家。—— 第 178 頁。

伊蘭尼, 丹尼爾 (Irányi, Daniel 1822—1892) —— 匈牙利政治家和政論家, 曾參加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 議會議員, 後為革命政府委員, 革命失敗後流亡國外。—— 第 567 頁。

伊哈斯, 丹尼爾 (Ihász Daniel 1818—1882) —— 匈牙利軍官, 曾參加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 後來流亡國外, 科蘇特的朋友。—— 第 567 頁。

伊萬三世 (Иван III 1440—1505) —— 莫斯科大公 (1462—1505)。—— 第 564 頁。

伊麗莎白 (Elizabeth 1801—1873) —— 普魯士王后,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妻子。—— 第 371 頁。

伊麗莎白 (Elizabeth I 1533—1603) —— 英國女王 (1558—1603)。—— 第 134 頁。

考萊男爵, 亨利·理查·查理·威爾斯里 (Cowley, Henry Richard Charles Wellesley 1804—1884) —— 英國外交家, 駐巴黎大使 (1852—1867)。—— 第 356 頁。

七 画

邦康帕尼, 卡洛 (Boncompagni, Carlo 1804—1880) —— 意大利國家活動家, 溫和自由派, 主張在薩瓦王朝的統治下統一意大利; 1848 年任撒丁教育大臣, 1852 年任農業、貿易、教育和司法大臣, 1853—1856 年為下院議長, 1859 年任撒丁駐佛羅倫薩全權代表。—— 第 543 頁。

芒, 亞歷山大羅 (Mon, Alejandro 1801—

1882) —— 西班牙政治活動家, 自由黨人, 曾任財政大臣 (1837, 1844—1846); 1858—1862 年為駐法國大使, 政府首腦 (1864)。—— 第 542 頁。

亨德爾, 格奧爾格·弗里德里希 (Händel, Georg Friedrich 1685—1759) —— 偉大的德國作曲家。—— 第 606 頁。

亨什爾曼, 伊姆雷 (Henszlmann, Imre 1813—1888) —— 匈牙利考古學家, 曾參加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 革命失敗後流亡國外。—— 第 567 頁。

李斯特, 弗里德里希 (List, Friedrich 1789—1846) —— 德國庸俗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 宣傳極端的保護關稅政策。—— 第 25、525 頁。

李嘉圖, 大衛 (Ricardo, David 1772—1823) —— 英國經濟學家,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 第 41、50—52、87、149、158—169、172—175 頁。

但丁·阿利格埃里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 偉大的意大利詩人。—— 第 11 頁。

沃邦, 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爾 (Vauban, Sébastien le Prêtre 1633—1707) —— 法國元帥, 軍事工程師, 著有許多關於築城學和圍攻戰的著作。—— 第 283—285、290 頁。

沃爾夫, 威廉 (Wolff, Wilhelm 1809—1864) —— 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家, 職業是教員, 西里西亞一個農奴的兒子; 學生運動的參加者; 1834—1839 年被囚於普魯士監獄中; 1846—1847 年是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委員, 從 1848 年 3 月起為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 1848—1849 年是“新萊茵報”編輯之一; 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

-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683 頁。
- 沃尔弗, 克利斯提安 (Wolff, Christian 1679—1754)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形而上学者。——第 530 頁。
- 沃尔波尔, 霍雷修 (Walpole, Horatio 1717—1797) ——英国贵族, 作家和艺术理论家。——第 437 頁。
- 沃尔波尔, 斯宾塞·霍雷修 (Walpole, Spencer Horatio 1806—1898)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内政大臣 (1852, 1858—1859 和 1866—1867)。——第 238 頁。
- 杜兰多, 卓万尼 (Durando, Giovanni 1804—1869) ——皮蒙特军队的将军, 1848—1849 年曾与奥军作战,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第 266、267、415、416、458 頁。
- 杜尔菲尔德 (Dürfeld) ——奥地利将军,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第 429 頁。
- 杜维尔努阿, 亨利希·古斯塔夫 (Duvernoy, Heinrich Gustav 1802—1890) ——维尔滕堡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 曾任自由派内阁的内政大臣 (1848—1849), 省议会議員 (1851—1868), 主張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 民族联盟党的创建人之一。——第 463 頁。
- 坎宁, 查理·约翰 (Canning, Charles John 1812—1862) ——从 1859 年起为伯爵,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邮政大臣 (1853—1855), 印度总督 (1856—1862), 镇压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组织者。——第 326—328 頁。
- 努根特, 拉伐尔 (Nugent, Laval 1777—1862) ——伯爵, 奥地利元帅; 曾参加镇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 1859 年奥意法战争的参加者。——第 216、266、372、638 頁。
- 肖特, 济格蒙德 (Schott, Siegmund 1818—1895) ——维尔滕堡作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主張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 民族联盟党的创建人之一。——第 463、464 頁。
- 貝克, 罗伯特 (Baker, Robert) ——爱尔兰的工厂视察员。——第 228、243、244 頁。
- 貝利, 賽米尔 (Bailey, Samuel 1791—1870)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 但同时他也正确地看出了李嘉图经济观点中的一些矛盾。——第 61、134 頁。
- 貝雷, 若尔日 (Beuret, Georges 1803—1859) ——法国将军, 曾参加 1823 年的西班牙远征、阿尔及利亚远征和罗马远征,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第 390 頁。
- 貝塔, 亨利希 (貝特齐希 (Betzlich) 的笔名) (Beta, Heinrich) ——德国记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侨居伦敦, 金克尔的拥护者。——第 688 頁。
- 貝克尔, 伊曼努尔 (Bekker, Immanuel 1785—1871) ——德国语文学家, 整理并出版了古代作家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阿里斯托芬等) 的许多著作。——第 15、39、58 頁。
- 貝克莱, 乔治 (Berkeley, George 1685—1753) ——英国的反动哲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 主教, 在政治经济学上他是重商主义的批评者; 他认为劳动是财富的主要源泉; 他是货币名目论的代表人物。——第 24、69、108

頁。

貝列拉, 伊薩克 (Péreire, Isaac 1806—1880)——法國銀行家, 波拿巴主義者, 1852 年同他的兄弟艾米爾·貝列拉一起創立了動產信用公司, 他著有許多關於信貸問題的著作。——第 85、86、335 頁。

貝格爾 (Berger)——奧地利將軍, 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個師。——第 483 頁。

貝特倫, 格爾格利 (Bethlen, Gergely)——伯爵, 匈牙利軍官, 曾參加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 革命失敗後流亡國外。——第 567 頁。

貝奈德克, 路德維希 (Benedek, Ludwig 1804—1881)——奧地利將軍, 曾參加鎮壓 1846 年加里西亞農民起義和 1848—1849 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民族解放運動; 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個軍, 1860 年任奧軍參謀長, 匈牙利軍政總督, 1866 年奧普戰爭期間任奧軍總司令。——第 380、381、386、387、422、440、453—456、458、485、486 頁。

貝爾尼埃, 弗朗斯瓦 (Bernier, François 1625—1688)——法國醫生, 旅行家和作家。——第 120 頁。

克萊, 威廉 (Clay, William 1791—1869)——英國政治活動家和經濟學家, “通貨原理”學派的擁護者。——第 174 頁。

克賴, 帕爾 (Kray, Pál 1735—1804)——奧地利將軍, 原籍匈牙利, 曾多次積極參加歐洲各國同盟反對法蘭西共和國和拿破侖第一的戰爭。——第 270、271 頁。

克爾納, 格奧爾格 (Körner, Georg)——十八世紀中葉的德國歷史學家。——

第 146 頁。

克拉姆-加拉斯, 愛德華 (Clam-Gallas, Eduard 1805—1891)——奧地利將軍, 原籍匈牙利, 1848—1849 年參加鎮壓意大利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 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個軍, 1866 年奧普戰爭的參加者。——第 427、454 頁。

克倫威爾, 奧利弗 (Cromwell, Oliver 1599—1658)——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貴族的領袖, 1653 年起為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護國公。——第 43 頁。

克拉普卡, 迪約爾吉 (Klapka, György 1820—1892)——匈牙利將軍, 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間指揮匈牙利一個軍團; 1849 年 7—9 月任科馬羅姆要塞衛戍司令, 該要塞頑強地抗擊了奧軍的侵犯; 1849 年流亡國外; 五十年代同波拿巴集團有過聯繫, 1867 年大赦後返回匈牙利。——第 435、436、564、567 頁。

克勞塞維茨, 卡爾 (Clausewitz, Karl 1780—1831)——普魯士將軍和最大的資產階級軍事理論家; 1812—1814 年在俄國軍隊中服務。——第 491、503、668 頁。

克萊斯特, 艾瓦德 (Kleist, Ewald 1715—1759)——德國詩人。——第 692 頁。

克洛蒂爾達, 薩瓦公主 (1843—1911)——撒丁國王維克多-艾曼努爾二世的女兒, 從 1859 年起為拿破侖親王的妻子。——第 196—198 頁。

里利阿 (Lilia)——奧地利將軍, 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個師。——第 428、430—432 頁。

里瑟姆, 威廉·亨利 (Leatham, William

- Henry 1815—1889) ——英国詩人和政治活动家，激进主义者，議會議員。——第 586、587、590、591 頁。
- 里士滿公爵，查理·倫諾克斯 (Richmond, Charles Lennox 1735—1806) ——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議會議員。——第 606 頁。
- 里奧斯，迪埃哥·德·洛斯 (Rios, Diego de Los) ——西班牙將軍，在 1859—1860 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戰爭中指揮一个師。——第 619、627、630 頁。
- 勞，卡尔·亨利希 (Rau, Karl Heinrich 1792—1870) ——德国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个别問題上贊同斯密和李嘉图的觀點。——第 525 頁。
- 勞麥，弗里德里希 (Raumer, Friedrich 1781—1873) ——德国反动的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第 362 頁。
- 勞埃德，賽米爾·琼斯，奧維爾斯頓男爵 (Lloyd, Samuel Jones, Overstone 1796—1883) ——英国銀行家，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通貨原理”學派的拥护者。——第 174 頁。
- 勞夫塔斯，奧加斯特斯·威廉·弗雷德里克·斯賓塞 (Loftus, Augustus William Fredrick Spencer 1817—1904) ——英国外交家；駐奧地利大使 (1858—1860)。——第 338、341、477 頁。
- 庇護九世 (Pius IX 1792—1878) ——羅馬教皇 (1846—1878)。——第 181、183、266、311、316、318、468、469、475、542、670 頁。
- 蘇格拉底 (Sokrates 公元前約 469—399) ——古希臘唯心主义哲學家，奴隶主貴族的思想家。——第 513 頁。
- 蘇沃洛夫，亞歷山大·瓦西里也維奇 (Суво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730—1800) ——偉大的俄国統帥。——第 257 頁。
- 麥克唐納，雅克·埃蒂耶納·約瑟夫·亞歷山大 (Macdonald, Jacques Etienne Joseph Alexandre 1765—1840) ——法国元帥，曾多次參加拿破侖第一的遠征，1799 年在意大利遠征和瑞士遠征期間為法軍總司令；拿破侖第一退位后，為波旁王朝服務，從 1816 年至 1830 年在王室朝廷中身居要職。——第 255、256、258、259、271 頁。
- 麥克馬洪，瑪麗·埃德姆·巴特里斯·莫里斯 (Mac-Mahon, Marie Edme Patrice Maurice 1808—1893) ——法国反動的軍事和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曾參加克里木戰爭，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个軍，曾任阿尔及利亚總督 (1864—1870)；在色當會戰 (1870) 中率 10 万法軍降敵，絞殺巴黎公社的劊子手之一；第三共和國總統 (1873—1879)。——第 350、381、415、416、420、424、428—431、434、440、455、458、639 頁。
- 麥克勞德，亨利·丹宁 (MacLeod, Henry Dunning 1821—1902) ——英国庸俗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發展了所謂信貸創造資本的理論。——第 51、133 頁。
- 麥克拉倫，詹姆斯 (Maclaren, James) ——十九世紀英国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貨幣流通史的研究者。——第 60、157—159 頁。
- 麥克斯威爾，約翰·霍尔 (Maxwell, John Hall 1812—1866) ——英国农學家和統計學家，蘇格蘭农业協會秘書。——第 244 頁。
- 麥克庫洛赫，約翰·拉姆賽 (Ma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 ——

英国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李嘉圖經濟學說的庸俗化者，資本主義制度的狂熱辯護人。——第 23、42 頁。

沙弗哥特希，約翰·弗蘭茨 (Schaffgotsch, Johann Franz 1792—1866) ——奧地利將軍，曾參加鎮壓 1848—1849 年意大利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個軍。——第 454 頁。

沙培爾，馮 (Schaper, von) ——普魯士反動官僚的代表人物之一；萊茵省總督 (1842—1845)。——第 7 頁。

沙多勃利昂子爵，弗朗斯瓦·勒奈 (Cha-teaubriand, François Rene 1768—1848) ——法国的名作家，反動的国家活動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 (1822—1824)。——第 678 頁。

利希頓施坦，愛德華·弗蘭茨·路德維希 (Lichtenstein, Eduard Franz Ludwig 1809—1864) ——奧地利將軍，曾積極參加鎮壓 1848 年 6 月的布拉格起義；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個軍。——第 386、427 頁。

伯恩施托爾夫，阿爾勃萊希特 (Bernstorff, Albrecht 1809—1873) ——伯爵，普魯士外交家，曾任駐倫敦公使 (1854—1861)，外交大臣 (1861—1862)，駐倫敦大使 (1862—1873)。——第 521 頁。

八 画

金，彼得·約翰·洛克 (King, Peter John Locke 1811—1885) ——英國政治活動家，資產階級激進主義者，議會議員。——第 235 頁。

金凱德，約翰 (Kincaid, John 1787—1862) ——五十年代蘇格蘭的工廠和監

獄視察員。——第 226、227 頁。

金克爾，哥特弗利德 (Kinkel, Gottfried 1815—1882) ——德國詩人和政論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9 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的參加者，被普魯士法庭判處無期徒刑，後越獄逃跑，流亡倫敦；倫敦小資產階級流亡者的領袖之一，“海爾曼”報的編輯 (1859)，進行反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鬥爭。——第 684—689、694、695 頁。

雨果，維克多 (Hugo, Victor 1802—1885) ——偉大的法國作家。——第 309 頁。

羅，約翰 (Law, John 1671—1729) ——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財政家，曾任法國財政大臣 (1719—1720)，以發行紙幣的投機活動最後徹底破產而聞名。——第 154、157、159 頁。

羅登 (Roden 死於 1859 年) ——奧地利將軍，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個旅。——第 440、483 頁。

羅素，約翰 (Russell, John 1792—1878) ——英國國家活動家，輝格黨領袖，曾任首相 (1846—1852 和 1865—1866)，外交大臣 (1852—1853 和 1859—1865)，樞密院院長 (1854—1855)；1855 年英國出席維也納會議的代表。——第 237、238、521—523、541、542、571、622 頁。

羅奈，亞諾什 (Rónay, Janos 1814—1889) ——匈牙利學者和作家，曾參加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革命失敗後流亡國外，1866 年返回匈牙利，匈牙利議會議員。——第 567 頁。

羅巴克，約翰·阿瑟 (Roebuck, John Arthur 1801—1879) ——英國政治活動家和政論家，資產階級激進主義者，

- 議會議員。——第 238 頁。
- 罗斯·德·奥兰諾, 安东尼奥 (Ros de Olano, Antony 1808—1886) ——西班牙將軍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温和派, 1854—1856 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 在 1859—1860 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中指揮一个軍。——第 617 頁。
- 罗倫納, 斐迪南多 (Lorena, Ferdinando 1835—1907) ——托斯卡納大公列奥波特二世的儿子, 1859 年 7 月父亲退位后接受了斐迪南多四世大公的封号。——第 545 頁。
- 罗伊謝尔, 奥古斯特·路德維希 (Reyscher, August Ludwig 1802—1880) ——維尔騰堡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法学家, 主張在普魯士领导下統一德国, 民族联盟党的創建人之一。——第 463、464 頁。
- 罗伯斯比尔, 奥古斯丹 (Robespierre, Augustin 1763—1794) ——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之一, 雅各宾党人; 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的弟弟。——第 665 頁。
- 杰尔貝·德·桑納茲, 毛利齐奧 (Gerbaix de Sonnaz, Mauricio 1816—1892) ——皮蒙特軍队的將軍,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揮一个旅。——第 401 頁。
- 杰科布, 威廉 (Jacob, William 1762 左右—1851) ——英国商业家, 著有許多经济方面的著作。——第 99、125、126 頁。
- 弥勒, 亚当·亨利希 (Müller, Adam Heinrich 1779—1829) ——德国政論家和经济学家, 德国经济学中反映封建貴族利益的所謂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 亞·斯密的经济学說的反对者。——第 62、63 頁。
- 奈, 米歇尔 (Ney, Michel 1769—1815) ——法国元帅, 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侖第一的远征。——第 259 頁。
- 奈斯勒 (Nessler) ——法国軍官, 新式枪彈的发明者 (1857)。——第 192 頁。
- 帕麦斯頓子爵, 亨利·約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1784—1865) ——英国国家活动家, 开始活动时是托利党人, 1830 年起为輝格党的領袖之一, 依靠該党右派; 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4, 1835—1841 和 1846—1851), 內政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307、309、474、477、505—507、513、523、541、543、547、561、569—576、580—584、607 頁。
- 帕尔馬女公爵——見波旁的路易莎, 瑪麗亞-泰莉莎。
- 昂塞尔姆, 雅克·貝尔納·莫迭斯特 (Anselm, Jacques 1740—1812) ——法国將軍, 1792 年在革命的法国同奥地利作战期間, 指揮一个軍。——第 664 頁。
- 昂吉埃腊, 殉道者彼得 (Anghiera, Pietro Martire 1457—1526) ——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 生于意大利, 长期在西班牙宮廷服务。——第 144 頁。
- 味吉尔 (普卜利烏斯·味吉尔·馬洛) (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 70—19) ——杰出的羅馬詩人。——第 510 頁。
- 武科維奇, 舍表 (Vukovics, Sebö 1811—1872) ——匈牙利政治活动家, 曾任革命政府司法部长 (1849), 匈牙利革命失敗后流亡倫敦, 曾同科苏特保持联

- 系。——第 567 頁。
- 林德赫斯特男爵，約翰·辛格爾頓·柯普利 (Lyndhurst, John Singleton Copley 1772—1863) ——英國國家活動家，法學家，托利黨人；曾任大法官 (1827—1830, 1834—1835, 1841—1846)，議會議員。——第 497 頁。
- 叔爾茨，卡爾 (Schurz, Karl 1829—1906) ——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9 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的參加者，曾流亡瑞士；後為美國國家活動家。——第 684 頁。
- 圖恩，列奧 (Thun, Leo 1811—1888) ——奧地利國家活動家，反動分子；按民族是捷克人；弗蘭茨—約瑟夫最親近的顧問之一，曾任宗教和教育大臣。——第 478 頁。
- 圖克，托馬斯 (Tooke, Thomas 1774—1858) ——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接近古典政治經濟學派，他批評了李嘉圖的貨幣論。——第 88、168、169、175、176 頁。
- 圖斯涅爾達——凱拉賽族領袖阿爾米紐斯的妻子。——第 684、685 頁。
- 舍勒爾，巴特爾米·路易·約瑟夫 (Sché-rer, Barthélemy-Louis-Joseph 1747—1804) ——法國將軍和國家活動家，1795—1796 年和 1799 年參加法國在意大利的戰爭，曾任陸軍大臣 (1797—1799)。——第 665 頁。
- 舍伐利埃，米歇爾 (Chevalier, Michel 1806—1879) ——法國工程師，經濟學家和政論家，三十年代為聖西門主義者，後來成為資產階級自由貿易論者。——第 107 頁。
- 征服者威廉一世 (William I, The Conqueror 1027—1087) ——英國國王 (1066—1087)。——第 64 頁。
- 法里尼，魯伊治·卡洛 (Farini, Luigi Carlo 1812—1866) ——意大利國家活動家和歷史學家，主張在薩瓦王朝的統治下統一意大利，曾任教育大臣 (1851—1852)；1859 年為撒丁駐摩地那的全權代表，內政大臣 (1860)，政府首腦 (1862—1863)。——第 544 頁。
- 法利埃羅，馬林諾 (Faliero, Marino 1274—1355) ——威尼斯總督 (1354—1355)，因參與推翻貴族統治的陰謀被處死刑。——第 316 頁。
- 居萊，費倫茨 (Gyulay, Ferenc 1798—1868) ——伯爵，奧地利將軍，原籍匈牙利，曾參加鎮壓 1848—1849 年意大利革命，曾任陸軍大臣 (1849—1850)，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在馬振塔會戰失敗以前，統率奧軍 (1859 年 4—6 月)。——第 185、345、366—369、372、373、379、389、419—425、428—430、432、433、442、444、478—482、490、638、639 頁。
- 門德爾森，莫澤斯 (Mendelssohn, Moses 1729—1786) ——德國反動的資產階級哲學家，自然神論者。——第 157 頁。
- 彼得一世 (Петр I 1672—1725) ——從 1682 年起為俄國沙皇，從 1721 年起為全俄皇帝。——第 106、674、678、680 頁。
- 佩利茨，卡爾·亨利希·路德維希 (Pö-litz, Karl Heinrich Ludwig 1772—1838) ——德國歷史學家。——第 689 頁。
- 佩爾采爾，摩里茨 (Perczel, Mórícz 1811—1899) ——匈牙利將軍，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的參加者；革命失敗後流亡土耳其，1851 年流亡英國。

- 第 567 頁。
- 佩利西埃, 让·雅克 (Pelissier, Jean Jacques 1794—1864) ——法国元帅, 三十至五十年代初曾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 以极端残酷著称; 曾任克里木法軍总司令 (1855 年 5 月—1856 年 7 月); 駐英国大使 (1858—1859), 1859 年任南錫監視軍指揮官。——第 361、494、506 頁。
- 拉·格隆尼埃尔, 路易·埃蒂耶納·阿尔图尔·杜布罗伊-埃尔昂 (La Guéronnière, Louis Etienne Arthur Dubreuil-Héliou 1816—1875) ——法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五十年代为波拿巴主义者。——第 297 頁。
- 拉德勒·德·拉·沙尔耶尔, 茹尔·瑪丽 (Ladreitt de la Charrière, Jules Marie 1806—1870) ——法国將軍, 曾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 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个旅,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的参加者。——第 431 頁。
- 拉德米罗, 路易·勒奈·保尔 (Ladmiraute, Louis René Paul 1808—1898) ——法国將軍,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 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个师,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的参加者, 絞杀巴黎公社的劊子手之一。——第 431 頁。
- 拉博麦尔, 朗朗·安格里維埃尔·德 (La Beaumelle 1726—1773) ——法国作家, 伏尔泰的論敌。——第 435 頁。
- 拉德茨基, 約瑟夫 (Radetzky, Joseph 1766—1858) ——伯爵, 奥地利元帅, 从 1831 年起指揮北意大利的奥地利軍隊, 1848—1849 年殘酷地鎮压了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1850—1856 年为倫巴第一威尼斯王国总督。——第 185、209、216、217、265—268、322、373、415、433、479、639 頁。
- 拉多維茨, 約瑟夫 (Radowitz, Joseph 1797—1853) ——普魯士將軍和国家活动家, 宮廷权奸的代表人物, 1848—1849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右翼領袖之一。——第 250、274—276、278、281、288、314、464 頁。
- 拉莫特卢日, 約瑟夫·爱德华·德 (La Motterouge, Joseph Eduard de 1804—1883) ——法国將軍, 曾参加克里木战争 (1853—1856), 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个师,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的参加者。——第 429 頁。
- 孟德維尔, 約翰 (Mandeville, John 約 1300—1372) ——据說是关于周游世界各国的許多通俗故事的編写人。——第 108 頁。
- 孟德斯鳩, 沙尔 (Montesquieu, Chales 1689—1755) ——杰出的法国資產階級社会学家、經濟学家和作家, 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貨币数量論的拥护者。——第 150、155 頁。
- 孟德斯鳩-費森薩克, 安·比埃尔 (Montesquieu-Fezensac, Anne-Pierre 1739—1798) ——法国將軍, 政治活动家, 正統主义者, 1792 年曾参加征服薩瓦。——第 649 頁。
- 阿梯拉 (死于 453 年) ——匈奴領袖 (433—453)。——第 507 頁。
- 阿伯丁伯爵, 乔治·戈登 (Aberdeen, George Gordon 1784—1860)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从 1850 年起为皮尔派領袖, 曾任外交大臣 (1828—1830, 1841—1846) 和联合內閣首相 (1852—1855)。——第 573、675 頁。
- 阿特伍德, 托馬斯 (Attwood, Thomas

- 1783—1856)——英國銀行家，經濟學家和政治活動家，資產階級激進主義者。——第 72 頁。
- 阿塞利奧，馬西莫·德·(Azeglio, Massimo d' 1798—1866)——意大利國家活動家和作家，溫和自由派，主張在薩瓦王朝的統治下統一意大利，1848—1849 年意大利革命的參加者，曾任皮蒙特內閣首相和外交大臣(1849—1852)，1859 年為撒丁駐羅馬尼亞全權代表。——第 543 頁。
- 阿勒曼迪，米凱萊·拿破侖涅(Allemandi, Michele Napoleone 1807—1858)——意大利將軍，1848—1849 年意大利革命的參加者，曾領導倫巴第、瑞士和熱那亞的志願軍。——第 404 頁。
- 阿伯思諾特，喬治(Arbuthnot, George 1802—1865)——英國財政部官員；著有一系列關於貨幣流通和信貸問題的著作，“通貨原理”學派的擁護者。——第 174 頁。
- 阿列提諾，彼得羅(Aretino, Pietro 1492—1556)——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諷刺作家，著有許多尖銳地揭露教皇宮廷和歐洲各國君主的抨擊性小冊子。——第 158 頁。
- 阿泰納奧斯(Athenæus 二世紀末至三世紀初)——古希臘演說術教師和語法學家。——第 63 頁。
- 阿里歐斯托，洛多維科(Ariosto, Lodovico 1474—1533)——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最大的詩人，長詩“瘋狂的羅蘭”的作者。——第 569 頁。
- 阿爾米紐斯(Arminius, 公元前 17—公元 21)——日耳曼部族凱拉賽人的領袖，曾領導日耳曼部族反對羅馬人的鬥爭，並於公元 9 年在條多堡森林中擊敗了羅馬人。——第 685 頁。
- 阿姆斯特朗，威廉·喬治(Armstrong, William George 1810—1900)——英國發明家，以發明特別的綫膛炮而著名。——第 256 頁。
- 阿爾勃萊希特(Albrecht 1817—1895)——奧地利大公，將軍，1848—1849 年參加鎮壓意大利革命，1851—1860 年為匈牙利軍政總督，1859 年曾負外交使命赴柏林。——第 508、517 頁。
- 波拿巴——見拿破侖第一。
- 波拿巴，路易——見拿破侖第三。
- 波拿巴，日羅姆(Bonaparte, Jérôme 1784—1860)拿破侖第一之弟，威斯特伐利亞國王(1807—1813)，從 1850 年起為元帥。——第 642 頁。
- 波拿巴，約瑟夫(Bonaparte, Joseph 1768—1844)——拿破侖第一之長兄，那不勒斯國王(1806—1808)和西班牙國王(1808—1813)。——第 434 頁。
- 波拿巴，約瑟夫·沙爾·保爾，拿破侖親王(Bonaparte, Joseph Charles Paul, Prinz Napoleon 1822—1891)——日羅姆·波拿巴之子，拿破侖第三的堂弟，在其長兄死後(1847)改名日羅姆，第二共和國時期為制憲議會和立法會議員，1854 年在克里木指揮一個師，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個軍；以綽號普隆-普隆和紅色親王而著名。——第 196—199、300、382、399、444、453、457、459、460、489、564—565、642 頁。
- 波拿巴王朝(Bonaparte)——法國帝國王朝(1804—1814, 1815, 1852—1870)。——第 183、198、205、280、304、472、474、476、501、564、566 頁。

波旁王朝 (Bourbonen) ——法国的王朝(1589—1792, 1814—1815 和 1815—1830)。——第 542 頁。

波旁的路易莎, 瑪丽亚-泰莉莎 (Louise-Marie-Thérèse de Bourbon 1819—1864) ——帕尔馬女公爵, 帕尔馬公国摄政女王 (1854—1859)。——第 542 頁。

波林尼雅克, 奥古斯特·茹尔·阿尔芒·瑪丽 (Polignac, Auguste Jules Armand Marie 1780—1847) ——公爵, 复辟时期的法国国家活动家, 正統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 曾任外交大臣和內閣首脑(1829—1830)。——第 673、678 頁。

波埃利奥, 卡洛 (Poerio, Carlo 1803—1867) ——意大利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1848 年任那不勒斯的警务长官和教育大臣, 1849—1859 年在意大利被监禁, 1861—1867 年为意大利王国議会副議長。——第 185 頁。

庞比尼昂侯爵, 让·雅克·勒·弗兰克 (Pompignan, Jean Jacques Le Franque 1709—1784) ——法国詩人, 伏尔泰的論敌。——第 435 頁。

九 画

約翰 (Johann 1782—1859) ——奥地利大公, 1848 年 6 月至 1849 年 12 月为德意志帝国摄政王。——第 314 頁。

洛克·金——見金, 彼得·約翰·洛克。

洛克, 約翰 (Locke, John 1632—1704) ——杰出的英国哲学家, 二元論者, 感觉論者, 资产階級經濟学家, 他动摇于货币名目論和货币金屬論之間。——第 66—68、110、137、150、154、159 頁。

咸丰(約1831—1861)——中国皇帝(1850

—1861)。——第 572 頁。

勃朗, 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 ——法国小资产階級社会主义者和历史学家, 1848—1849 年革命的活动家, 采取同资产階級妥协的立場。——第 157 頁。

查耳迪尼, 恩利科 (Cialdini, Enrico 1811—1892) ——意大利將軍, 曾参加 1848—1849 年民族解放战争和克里木战争,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揮一个师。——第 413—416 頁。

查理大帝 (Charlemange 742 左右—814) ——法兰克国王 (768—800) 和皇帝 (800—814)。——第 317 頁。

查理二世 (Charles II 1630—1685) ——英国国王 (1660—1685)。——第 43 頁。

查理-阿尔伯特 (Charles-Albert 1798—1849) ——撒丁国王 (1831—1849)。——第 182、474 頁。

若米尼, 昂利 (Jomini, Henri 1779—1869) ——將軍, 初在法軍中供职, 后在俄軍中供职, 原籍瑞士, 资产階級軍事理論家, 著有許多关于战略和軍事史方面的著作。——第 263 頁。

契安多斯——見格倫維耳, 理查, 白金汉和契安多斯公爵。

济格尔, 弗兰茨·路德維希 (Siegel, Franz Ludwig 1812—1877) ——德国記者和律師, “薩克森立宪报”編輯, 主張在普魯士的领导下統一德国, 民族联盟党的創建人之一。——第 548 頁。

威尔逊, 詹姆斯 (Wilson, James 1805—1860) ——英国资产階級經濟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論者, “經濟学家”杂志的創办人和編輯, 1853—1858 年为财政部秘书长; 1859—1860 年为印

- 度財務大臣；貨幣數量論的反对者。
——第 168、176、331、578 頁。
- 威廉斯，威廉·芬威克，卡爾斯從男爵 (Williams, William Fenwick, Baronet of Kars 1800—1883) ——英國將軍，1855 年克里木戰爭期間曾指揮卡爾斯保衛戰，議會議員 (1856—1859)。——第 505 頁。
- 威靈頓公爵，阿瑟·威爾斯里 (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1769—1852) ——英國統帥和國家活動家，托利黨人，在 1808—1814 年和 1815 年反对拿破侖第一的戰爭中統率軍隊；曾任軍械總長 (1818—1827)，總司令 (1842—1852)，首相 (1828—1830) 和外交大臣 (1834—1835)。——第 291 頁。
- 威爾特爾，卡爾 (Werther, Karl 1809—1894) ——普魯士外交家，駐奧地利大使 (1859—1866 和 1866—1869)。——第 437、512、513、515—517 頁。
- 威廉一世 (Wilhelm I 1797—1888) ——普魯士親王，攝政王 (1858—1861)，普魯士國王 (1861—1888)，德國皇帝 (1871—1888)。——第 334、336、436、451、462、463、508、510、513、517—519 頁。
- 威廉二世 (Wilhelm II 1777—1847) ——黑森—加塞爾的選帝侯 (1821—1847)。——第 596、598 頁。
- 柏爾 (Boér 1808—1859) ——奧地利將軍，匈牙利人，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個旅。——第 440、483 頁。
- 柏里——見塞西耳，威廉，柏里勳爵。
- 柏拉圖 (Plato 公元前約 427—約 347) ——古希臘唯心主義哲學家，奴隸主貴族的思想家，自然經濟的維護者。——第 107、196 頁。
- 柯頓，威廉 (Cotton, William 1786—1866) ——英國商業家，英格蘭銀行經理；稱黃金的自動天平的發明者。——第 101 頁。
- 柯波克，詹姆斯 (Coppock, James 1798—1857) ——英國法學家，議會選舉事務代理人。——第 586、588 頁。
- 柯貝特，托馬斯 (Corbet, Thomas) ——十九世紀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第 83 頁。
- 哈通，恩斯特 (Hartung, Ernst 1808—1879) ——奧地利將軍，曾參加鎮壓 1848—1849 年意大利的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個旅，1866 年參加奧普戰爭。——第 429 頁。
- 哈治·阿布德-薩勒姆——1859—1860 年西班牙對摩洛哥的戰爭期間在泰圖安轄下任摩洛哥軍隊的指揮官。——第 613 頁。
- 哈德非爾德，喬治 (Hadfield, George 1787—1879) ——英國政治活動家，資產階級激進主義者，議會議員。——第 575 頁。
- 哈森普弗魯克，漢斯·丹尼爾 (Hassenspflug Hans Daniel 1794—1862) ——德國反動的国家活動家，1832—1837 年任黑森—加塞爾的司法大臣和內政大臣，1850—1855 年為內閣首腦，專制主義的擁護者。——第 599 頁。
- 哈布斯堡王朝 (Habsburger) ——1273—1806 年 (中有間斷) 所謂神聖羅馬帝國的王朝，奧地利王朝 (從 1804 年起) 和奧匈帝國王朝 (1867—1918)。——第 179、395、437、438、448、474、476、493、521、689 頁。
- 哈克斯特豪森，奧古斯特 (Haxthausen,

- August 1792—1866)——普魯士官吏和作家,写过一本描述俄国土地关系中公社制度残余的著作,从政治观点来看,他是农奴主反动分子。——第 678 頁。
- 洪堡,亚历山大(Humboldt, Alexander 1769—1859)——偉大的德国学者、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第 361、686、688 頁。
- 施梯伯,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魯士政治警察局长,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的科倫审判案(1852)的組織者之一,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見证人。——第 520 頁。
- 施利克,弗兰茨·亨利希(Schlick, Franz Heinrich 1789—1862)——伯爵,奥地利將軍,曾参加鎮压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 1854—1859 年指揮加里西亚和布柯維納的奧軍; 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任第二軍团指揮官。——第 442、444 頁。
- 施泰因,罗侖茲(Stein Lorenz 1815—1890)——德国法学家,国家法专家,历史学家,庸俗經濟学家。——第 16、23、525 頁。
- 施特劳斯,約翰(Strauß, Johann 1825—1899)——杰出的奥地利作曲家和指揮家。——第 373 頁。
- 施塔迪昂,菲力浦(Stadion, Philipp 1799—1868)——奥地利將軍,曾参加鎮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个軍。——第 383、386、389、399、401、454 頁。
- 施托尔希,安得列依·卡尔洛維奇(亨利希)(Шторх, Андрей Карлович (Генрих) 1766—1835)——俄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統計学家和历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古典政治經濟学派的模仿者。——第 106、123 頁。
- 施莱尼茨,亚历山大(Schleinitz, Alexander 1807—1885)——伯爵,普魯士国家活动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臣(1848 年 6 月, 1849—1850, 1858—1861)。——第 361、463、508—523 頁。
- 施瓦尔岑堡,艾德蒙(Schwarzenberg, Edmund 1803—1873)——奥地利將軍,曾参加鎮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个軍。——第 386、454 頁。
- 施瓦尔岑堡,費力克斯(Schwarzenberg, Felix 1800—1852)——公爵,奥地利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在鎮压了 1848 年 10 月維也納起义以后任首相和外交大臣。——第 462、599 頁。
- 科貝特,威廉(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小資產階級激进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斗争。——第 87 頁。
- 科斯塔,德·波勒加爾(Costa de Beauregard)——侯爵,意大利貴族,代表薩瓦出席撒丁議会的議員。——第 646 頁。
- 科尔布,格奧尔格·弗里德里希(Kolb, Georg Friedrich 1808—1884)——德国政治活动家,政論家和統計学家,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1859—1866 年为“新法兰克福报”編輯。——第 295 頁。
- 科勒尔,奧古斯特(Koller, August 生于 1805 年)——奥地利外交家,駐柏林大

- 使(1857—1860)。——第 516 頁。
- 科尔登, 弗兰茨 (Cordon, Franz 1796—1869) ——奥地利將軍, 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个師。——第 427、428、430、432 頁。
- 科苏特, 拉約什 (路德維希) (Kossuth Lajos (Ludwig) 1802—1894) ——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領袖, 在 1848—1849 年革命中領導資產階級民主派, 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腦; 革命失敗后流亡国外, 在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第 435、436、446、470、560—567、685 頁。
- 科洛勒多-梅尔茨和瓦尔澤, 温采尔·約瑟夫 (Colloredo-Melz und Wallsee, Wenzel Joseph 1738—1822) ——奥地利將軍, 从 1808 年起为元帥, 曾多次参加欧洲各国同盟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侖第一的战争。——第 665 頁。
- 欧文, 罗伯特 (Owen, Robert 1771—1858) ——偉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50 頁。
- 欧仁亲王——見博阿尔奈, 欧仁。
- 欧仁妮——見蒙蒂霍, 欧仁妮。
- 欧里庇得斯 (Euripides 公元前約 480—約 406) ——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 著有許多古典悲剧。——第 127、509 頁。
- 迪斯累里, 本杰明·貝肯斯菲尔德伯爵 (1871 年受封)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 托利党領袖之一, 十九世紀后半叶为保守党領袖; 曾任財政大臣 (1852, 1858—1859 和 1866—1868), 首相 (1868 和 1874—1880)。——第 235—238、582 頁。

十 画

- 席勒, 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 ——偉大的德国作家。——第 636、686 頁。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傳記材料)。——第 9、10、636、683 頁。
- 紐馬奇, 威廉 (Newmarch, William 1820—1882) ——英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和統計学家。——第 176、235 頁。
- 特罗胥, 路易·茹尔 (Trochu, Louis Jules 1815—1896) ——法国將軍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 曾参加克里木战争; 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个師; 1870—1871 年为巴黎軍事总督和国防政府主席。——第 413、416、429、431、455 頁。
- 特罗洛普 (Trollope) ——英国企业家, 建筑公司經理。——第 546 頁。
- 庫柏, 托馬斯 (Cooper, Thomas 1759—1840) ——美国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美国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著名代表人物, 自由貿易思想的宣傳者。——第 24 頁。
- 庫札, 亚历山大魯 (Cuza, Alexandro 1820—1873) ——羅馬尼亚政治活动家, 1859—1866 年为多瑙河公国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公国于 1862 年成立了統一的羅馬尼亚国家)的君主(統治者), 号称亚历山大·約翰一世, 由于反动派的阴谋, 他被迫退位并流亡国外。——第 505 頁。
- 庫恩, 弗兰茨, 庫南菲尔德男爵 (Kuhn, Franz, Freiherr von Kuhnenfeld 1817—1896) ——奥地利軍官, 从 1866

- 年起为將軍，参加镇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任总参谋长，后来指挥一个旅，1868—1874 年任陆军大臣。——第 372 頁。
- 庫斯托第，彼得罗 (Custodi Pietro 1771—1842) ——意大利经济学家，由于出版十六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的著作而著名。——第 22、23、47、62、100、114、141 頁。
- 庫克基亚里，多美尼科 (Cucchiari, Domenico) ——意大利將軍，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皮蒙特师。——第 415、416 頁。
- 班迪亚，亚諾什 (Bangya, Janos 1817—1868) ——匈牙利記者和軍官，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成为科苏特的国外密使，同时也是秘密警察；后来改名穆罕默德-貝伊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在切尔克斯人对俄战争时期作为土耳其奸细在高加索进行活动 (1855—1858)。——第 560 頁。
- 茹貝尔，巴特爾米·卡特林 (Joubert, Barthélemy Catherine 1769—1799) ——法国將軍，曾参加 1796—1799 年波拿巴对意大利的远征，1798—1799 年任意大利法軍总司令。——第 259 頁。
- 配第，威廉 (Petty, William 1623—1687) ——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始祖。——第 24、41—44、54、114、119 頁。
- 哥倫布，克里斯托弗尔 (Colombo, Christopher 1451—1506) ——发现美洲的杰出的航海家，原籍热那亚。——第 148 頁。
- 哥特謝德，約翰·克利斯托夫 (Gottsched, Johann Christoph 1700—1766) ——德国作家和批評家，十八世纪德国早期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第 158 頁。
- 哥尔查科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維奇 (Горч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98—1883) ——公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駐維也納大使 (1854—1856)，外交大臣 (1856—1882)。——第 513、521、635、671、676—679 頁。
- 埃梅特，安东尼 (Emmett, Anthony 1790—1872) ——英国軍事工程师，从 1855 年起为將軍，曾任圣海倫島工程长官 (1815—1821)。——第 269 頁。
- 埃查古埃，拉斐 (Echagüe, Raphael 1815—1887) ——西班牙將軍，曾参加 1854—1856 年资产阶级革命，屬温和派；在 1859—1860 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中指挥一个軍。——第 609、610、617、618 頁。
- 埃倫伯勒伯爵，爱德华·罗 (Ellenborough, Edward Law 1790—1871)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議會議員；曾任印度总督 (1842—1844)，1846 年为海軍首席大臣，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 (1858)。——第 237、333、584 頁。
- 埃斯潘納斯，沙尔·瑪麗·埃斯普亚 (Espinasse, Charles Marie Esprit 1815—1859) ——法国將軍，波拿巴主义者，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曾参加克里木战争，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第 429 頁。
- 桑納茲——見杰尔貝·德·桑納茲，毛利

- 齐奥。
- 烏尔班, 卡尔(Urban, Karl 1802—1877) ——奥地利將軍, 曾参加鎮压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 在 1859 年奧意法战争指揮一个师。——第 403、404 頁。
- 烏尔卡尔特, 戴維(Urquhart, David 1805—1877) ——英国外交家, 反动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亲土耳其分子, 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 1847—1852 年为議會議員。——第 65、561 頁。
- 烏斯塔里斯, 海罗尼莫(Ustáris, Jerónimo) ——十八世紀前半叶的西班牙經濟学家, 重商主义者。——第 44 頁。
- 烏澤多姆, 卡尔·格奥尔格·路德維希·格維多(Usedom, Karl Georg Ludwig Guido 1805—1884) ——普魯士外交家, 駐法兰克福国民議會全权代表(1848) 和駐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議會全权代表(1858—1859)。——第 395 頁。
- 泰列基, 拉斯洛(Teleki, László 1811—1861) ——伯爵, 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期間为匈牙利共和国駐法国代表, 革命失敗后仍留在法国, 匈牙利議會議員。——第 567 頁。
- 泰列基, 山道尔(亚历山大)(Teleki, Sándor (Alexander) 生于 1818 年) ——伯爵, 匈牙利軍官,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敗后流亡国外。——第 564、567 頁。
- 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 1312—1377) ——英国国王(1327—1377)。——第 65 頁。
- 朗茲, 威廉(Lowndes William 1652—1724) ——英国經濟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財政部秘书长。——第 67、68、72、110 頁。
- 朗敏, 威廉(Ramming, Wilhelm 1815—1876) ——奥地利將軍, 曾参加鎮压 1848—1849 年的匈牙利和意大利革命; 在 1859 年奧意法战争指揮一个旅, 1866 年曾参加奧普战争。——第 429 頁。
- 馬克思, 卡尔(Marx, Karl 1818—1883) (傳記材料)。——第 7—11、532—534、560、568、601、683 頁。
- 馬志尼, 朱澤培(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 ——意大利革命家, 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領袖之一, 1849 年为羅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腦, 1850 年为倫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組織者之一; 在五十年代曾反对波拿巴法国对意大利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干涉。——第 406、407、476、561—563、567、594 頁。
- 馬森納, 安得列(Masséna, André 1756—1817) ——法国將軍, 从 1804 年起为元帅, 拿破侖第一的多次远征的参加者之一, 1814 年倒向波旁王朝方面。——第 271、665 頁。
- 馬丹普雷, 昂日·奧古斯特(Martimprey Ange-Auguste de 1809—1875) ——法国將軍, 在 1859 年奧意法战争指揮一个旅, 曾参加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第 431 頁。
- 馬尔薩斯, 托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 ——英国牧师, 經濟学家, 資产階級化的地主貴族的思想家, 資本主义制度的辯护人, 仇視人类的人口論的鼓吹者。——第 26、87、556 頁。

馬姆茲伯里伯爵,詹姆斯·霍华德·哈里
斯 (Malmesbury, James Howard
Harris 1807—1889) ——英国国家活
动家,托利党人,十九世紀下半叶为保
守党的著名活动家;曾任外交大臣
(1852和1858—1859),掌璽大臣(1866
—1868,1874—1876)。——第335、336、
340、341、477、582—584頁。

馬基雅弗利,尼古洛 (Machiavelli, Ni-
colò 1469—1527) ——意大利政治活
动家,历史学家和作家,資本主义关系
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
一。——第475頁。

馬克西米利安二世 (Maximilian II 1811
—1864) ——巴伐利亚国王 (1848—
1864)。——第336頁。

拿破侖第一·波拿巴 (Napoléon I Bo-
naparte 1769—1821) ——法国皇帝
(1804—1814和1815)。——第182、
192、213、218、230、234、255—259、262、
264、267、269—272、276、277、280、286、
288、295、296、304、306—308、312、313、
317—319、365、378、382、397、398、419、
432、434、439、441、442、482—484、487
—490、492、503—507、566、652、653、
663—665、671—674、678頁。

拿破侖第三 (路易·拿破侖·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3) ——拿破侖
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統 (1848—
1851),法国皇帝 (1852—1870)。——
第179—201、206—208、212、214、249、
288、296、297、300—303、305—309、311
—314、316—320、322、323、335、339—
342、344—346、350、354—358、361、
362、365、371、379、382、392、394、398、
399、404—407、409、410、413—418、

421、423—428、433—441、444、446、
448、450、452、458、460、462、466、467、
469—479、481—484、486—494、497—
507、511、519、522、523、541—545、548、
560、562—566、572、592—596、607、
608、625、635—637、640—643、646、
657、662、669—673、675—677、679、
685、693頁。

拿破侖亲王——見波拿巴,約瑟夫·沙
尔·保尔,拿破侖亲王。

格雷,查理 (Grey, Charles 1764—1845)
——伯爵,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領
袖之一,曾任首相 (1830—1834)。——
第606頁。

格雷,約翰 (Gray, John 1798—1850)
——英国經濟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罗·欧文的信徒;“劳动貨币”論的創始
人之一。——第73—76頁。

格林,雅科布 (Grimm, Jakob 1785—
1863) ——杰出的德国語文学家,德国
民間創作的收集者,柏林大学教授。
——第145頁。

格律奈,卡尔·路德維希 (Grünne, Karl
Ludwig 1808—1884) ——伯爵,奧地
利將軍,宫廷权奸的代表人物,弗兰茨-
約瑟夫皇帝的將軍衛侍卫长 (1850—
1859)。——第450、453、478頁。

格萊斯頓,威廉·尤尔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 ——英
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
子,十九世紀后半叶是自由党領袖之
一,曾任財政大臣 (1852—1855和1859
—1866)和首相 (1868—1874,1880—
1885,1886,1892—1894)。——第54、
571頁。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阿道夫
(Granier de Cassagnac, Adolphe

1806—1880)——法国記者，毫无原則的政治家，1848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代表(1852—1870)，持极右立場；“立宪主义者报”的撰稿人。——第544頁。

格倫維耳，理查，白金汉和契安多斯公爵(Grenville Richard Duke of Buckingham and Chandos 1797—1861)——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輝格党人，議會議員(1818—1839)。——第235、238頁。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偉大的德国革命詩人。——第249、251、464頁。

海斯，亨利希(Heß, Heinrich 1788—1870)——男爵，奥地利將軍，后为元帅，曾积极参加鎮压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1854—1855年任匈牙利、加里西亚和多瑙河两公国奧軍总司令，在1859年奧意法戰爭中，在馬振塔会战(1859年6—7月)失敗后統率奧軍。——第216、369、372、379、425、442、450、460、461、478、480、481、484、485、488、491—493、639頁。

海澤，亨利希(Heise, Heinrich 死于1860年)——德国政論家，民主主义者，曾参加1848—1849年革命，后来流亡英国。——第683頁。

海瑙，尤利烏斯·雅科布(Haynau, Julius Jakob 1786—1853)——奥地利將軍，曾殘酷鎮压1848—1849年的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运动，由于殘酷他得到了一个綽号“疯狂的鬣狗”。——第185頁。

海尔曼——見阿尔米紐斯。

海利奧加巴尔，或埃拉加巴尔(Heliogabalus 或 Elagabalus 204—222)——羅馬皇帝(218—222)，这个名字成了揮

霍、独裁和淫乱的象征。——第564頁。

海尔布隆納尔，卡尔(Hailbronner, Karl 1789—1864)——巴伐利亚軍事作家和旅行家，奥地利統治集团的侵略意图的表达者之一。——第250、278、280、288頁。

俾斯麦公爵，奧托，馮·申豪森(Bismarck, Otto, von Schönhausen 1815—1898)——普魯士和德国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魯士容克地主的代表人物；1851—1859年是普魯士駐联邦議會的全权代表；曾任駐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駐巴黎大使(1862)；普魯士首相(1862—1871)，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他用反革命的方法實現了德国的統一；他是工人运动的凶惡敌人，曾制定鎮压社会主义者的特別法。——第313、521頁。

十一画

荷馬(Homerus)——半傳說中的古希臘敘事詩人，“伊利亚特”和“奧德賽”的作者。——第158頁。

得比伯爵，愛德華·喬治·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Derby, Edwald George Geoffery Smith Stanley 1799—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領袖，后来是保守党領袖之一；曾任首相(1852、1858—1859和1866—1868)。——第309、325、328、343、355、477、513、543、566、572、573、575、584頁。

梯图斯(Titus)——德国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律師，主張在普魯士的领导下統一德国，民族联盟党的創建人之一。——第548頁。

梯尔泰(Tyrtaios 公元前7—6世紀)——古希臘詩人，曾歌頌斯巴达人的軍

- 事功績。——第 692 頁。
- 梯也尔, 阿道夫 (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曾任内政大臣 (1832、1834), 总理 (1836、1840), 共和国总统 (1871—1873), 絞杀巴黎公社的劊子手。——第 197 頁。
- 莫拉尔 (Mollard)——皮蒙特將軍, 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个師。——第 458 頁。
- 莫尔尼伯爵, 沙尔·奥古斯特·路易·約瑟夫 (Morny, Chales-Auguste-Loius-Joseph, Comte de 1811—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拿破侖第三的同母異父兄弟,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組織者之一, 曾任内务部长 (1851 年 12 月—1852 年 1 月), 立法团主席 (1854—1856、1857—1865), 駐俄国大使 (1856—1857)。——第 189、198 頁。
- 莫罗, 让·維克多 (Moreau, Jean Victor 1763—1813)——法国將軍, 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第 271 頁。
- 盖亚尔德, 弗雷德里克 (Gaillardet, Frederick 1808—1882)——法国記者和剧作家, 1839—1848 年在美国发行“美国信使报”; 1848 年回到法国, 仍为该报的經常通訊員。——第 200 頁。
- 培尔西尼, 让·日尔貝尔·維克多 (Perrigny, Jean-Gilbert-Victor 1808—1872)——伯爵, 法国国家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議会议員 (1849—1851),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組織者之一, 曾任内政大臣 (1852—1854、1860—1863), 駐英国大使 (1855—1858、1859—1860)。——第 198 頁。
- 許布納尔, 亚历山大 (Hübner, Alexander 1811—1892)——奧地利外交家和國家活动家, 1849—1859 年任駐巴黎大使。——第 179、186、300、318 頁。
- 基什, 米克洛什 (Kiss, Miklos 生于 1820 年)——匈牙利軍官, 民主主义者, 流亡者, 同波拿巴集团有过联系。——第 564、567 頁。
-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約姆 (Guizot, 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1840 年至 1848 年二月革命期間, 实际上掌握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 代表了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 8、237 頁。
- 基卜生, 托馬斯·米尔納 (Gibson, Thomas Milner 1806—1884)——英国的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派的領袖之一, 后来是自由党人; 曾任貿易大臣 (1859—1865 和 1865—1866)。——第 571、572、580 頁。
- 措貝尔, 托馬斯·弗里德里希 (Zobel, Thomas Friedrich 1799—1869)——奧地利將軍, 曾参加鎮压 1848—1849 年的意大利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个軍。——第 386、427、454、479 頁。
- 勒諾, 比埃尔·伊波利特 (Renault, Pierre-Hippolyte 1807—1870)——法国將軍,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 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个師,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的参加者。——第 321、429、431、455 頁。
- 勒庫尔布, 克勞德·雅克 (Lecourbe, Claude Jacques 1759—1815)——法国將軍, 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侖第一的

远征。——第 257、654 頁。

梅特涅, 克雷門斯 (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 ——公爵, 奧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反动分子; 曾任外交大臣 (1809—1821) 和首相 (1821—1848), 神圣同盟的組織者之一。——第 686 頁。

梅拉斯, 米哈埃尔·弗里德里希·貝奈狄克特 (Melas, Michael-Friedrich-Benedikt 1729—1806) ——奧地利將軍, 曾参加七年战争 (1756—1763), 1799—1800 年任意大利奧軍总司令。——第 220 頁。

梅德尼揚斯基, 山道尔 (Mednyànszky, Sandor 生于 1816 年) ——匈牙利軍官, 曾参加 1848—1849 年的匈牙利革命,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 567 頁。

莎士比亚, 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偉大的英国作家。——第 131、303、508、515、522、584 頁。

曼托伊費尔, 奧托·泰奧多尔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 ——男爵, 普魯士国家活动家, 貴族官僚的代表人物; 曾任內政大臣 (1848—1850), 首相和外交大臣 (1850—1858)。——第 313、599 頁。

雪恩海斯, 卡尔 (Schönhals, Karl 1788—1857) ——奧地利將軍和軍事作家; 曾参加鎮压 1848—1849 年的意大利革命。——第 216 頁。

雪恩奈希, 克利斯托夫·奧托 (Schönaich, Christoph Otto 1725—1807) ——德国詩人, 叙事詩“海尔曼”的作者。——第 158 頁。

康德, 伊曼努尔 (Kant, Immanuel 1724—1804) ——杰出的德国哲学家, 十八世

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德国唯心主义的創始人。——第 530 頁。

康罗貝尔, 弗朗斯瓦·塞尔坦 (Canrobert, François Certain 1809—1895) ——法国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在克里木战争期間任法軍总司令 (1854 年 9 月—1855 年 5 月); 在 1859 年奧意法战争中指揮一个軍,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的参加者。——第 350、381、413、415、416、420、424、427—431、434、455、458、459 頁。

康斯坦丁, 尼古拉也維奇 (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7—1892) ——俄国大公, 尼古拉一世之次子, 海軍元帅, 領導海軍系統 (1853—1881) 和舰队 (1855—1881), 1858—1861 年作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委員参加 1861 年农民改革的准备和实行; 波兰王国总督 (1862—1863)。——第 672 頁。

康斯坦西奧, 弗朗西斯科·索拉諾 (Constancio, Francisco Solano 1772—1846) ——葡萄牙医生, 外交家和作家; 曾把一些英国經濟学家的著作譯成法文。——第 51 頁。

十二画

萊辛, 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 ——偉大的德国作家, 批評家和哲学家, 十八世紀著名的启蒙运动者之一。——第 157 頁。

萊澤, 古斯达夫·阿尔芒·昂利 (Reiset, Gustav Armand Henri 1821—1905) ——法国外交家; 1859 年任駐达姆斯塔特大使时曾負特殊使命去見維克多-

- 艾曼努尔二世，以便簽訂苏黎世和約。
——第 544 頁。
- 萊沙赫，济格蒙德 (Reischach, Sigmund 1809—1878) ——奥地利將軍，曾参加鎮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 1859 年奥意法戰爭中指揮一个师。——第 427—430 頁。
- 萊希堡，約翰·伯恩哈特 (Reichberg, Johann Bernhard 1806—1899) ——伯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保守主义者，曾任首相 (1859—1860)，外交大臣 (1859—1864)。——第 361、513—518 頁。
- 凱，約翰·威廉 (Kaye, John William 1814—1876) ——英国軍事史学家和殖民官吏，曾任印度事务部政务机密司秘书 (1858—1874)，“阿富汗战争史”一书的作者。——第 575 頁。
- 凱撒 (凱尤斯·尤利烏斯·凱撒) (C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約 100—44) ——著名的羅馬統帥和国家活动家。——第 188 頁。
- 凱勒曼，弗朗斯瓦·克利斯托夫 (Kellerman, François Christophe 1735—1820) ——法国將軍，从 1804 年起为元帥，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侖第一的远征，后为正統主义者。——第 650 頁。
- 斯密，亞当 (Smith, Adam 1723—1790) ——英国經濟学家，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学的最大代表人物之一。——第 25、42、44、47—50、59、63、103、116、136、157—159、534 頁。
- 斯宾斯，威廉 (Spence, William 1783—1860) ——英国昆虫学家，同时也研究經濟問題。——第 87 頁。
- 斯密斯，托馬斯 (Smith, Thomas 1513—1577) ——英国国家活动家，民法教授。——第 134 頁。
- 斯坦利，爱德华·亨利，得比伯爵 (1869 年受封) (Stanley, Edward Henry, Earl of Derby 1826—1893)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六十至七十年代为保守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殖民大臣 (1858、1882—1885) 和印度事务大臣 (1858—1859)，外交大臣 (1866—1868、1874—1878)，爱德华·得比的儿子。——第 325、326 頁。
- 斯图亚特，詹姆士 (Steuart, James 1712—1780) ——英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重商主义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貨幣数量論的反对者。——第 47、48、68—71、152、155—158、175 頁。
- 斯图亚特，达德利·庫茨助爵 (Stuart, Dudley Coutts 1803—1854) ——英国政治活动家，輝格党人，議會議員；与波兰保守派君主主义流亡集团有过联系。——第 561 頁。
- 斯巴克斯，杰雷德 (Sparks, Jared 1789—1866) ——美国历史学家，在哈佛大学建立了美国的第一个历史教研室。——第 45、46 頁。
- 斯宾諾莎，巴魯赫 (別涅狄克特) (Spinoza, Baruch (Benedictus) 1632—1677) ——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論者。——第 157 頁。
- 斯特拉本 (Strabon 公元前約 63—公元前約 20) ——古希腊最大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第 146 頁。
- 湯普逊，威廉 (Thompson, William 約 1785—1833) ——爱尔兰經濟学家，利用李嘉图的理論来論证社会主义；欧文的信徒。——第 76 頁。

菲力浦二世 (Felipe II 1527—1598)——西班牙國王(1556—1598)。——第 119 頁。

菲兰杰里, 卡洛, 薩特里安諾公爵 (Filangieri, Carlo, Fürst von Satriano 1784—1867)——那不勒斯將軍和國家活動家, 曾多次參加拿破侖第一的遠征, 1848—1849 年殘酷鎮壓西西里島的起義, 並擔任該地總督直至 1855 年, 曾任首相和陸軍大臣 (1859—1860)。——第 336 頁。

舒尔采-德里奇, 海爾曼 (Schulze-De-litzsch, Hermann 1808—1883)——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政治活動家, 主張在普魯士的領導下統一德國, 民族聯盟黨的創建人之一, 六十年代是資產階級進步黨的首領之一, 他企圖用組織合作社的辦法來使工人脫離革命鬥爭。——第 548 頁。

賀布, 詹姆斯 (Hope, James 1808—1882)——英國海軍上將, 1859—1860 年曾率領遠征艦隊侵略中國。——第 568、569、577 頁。

賀雷西 (昆图斯·賀雷西·弗拉克) (Horatius, Quintus Flaccus 公元前 65—8)——杰出的羅馬詩人。——第 123 頁。

費舍 (Vischer)——德國政治活動家, 曾參加創建民族聯盟黨。——第 463 頁。

費奈迭, 雅科布 (Venedey, Jacob 1805—1871)——德國激進政論家, 1848—1849 年為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 屬於左派, 在 1848—1849 年革命後成為自由派。——第 462、463、505 頁。

費里埃, 弗朗斯瓦·路易·奧古斯特 (Ferrier, François Louis Auguste 1777—1861)——法國庸俗的資產階級

經濟學家, 國家官吏, 重商主義的模仿者。——第 525 頁。

費特爾·馮·多根菲爾德, 安東 (Vetter von Doggenfeld, Antan 1803—1882)——匈牙利將軍, 1848—1849 年是科蘇特的戰友, 革命失敗後流亡國外。——第 567 頁。

費爾巴哈, 路德維希 (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馬克思以前最大的唯物主義哲學家, 德國古典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529、530 頁。

費希泰提奇 (Festetics)——奧地利將軍, 原籍匈牙利, 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指揮一個旅。——第 386 頁。

普基, 米克洛什 (Puky, Miklós 1806—1887)——匈牙利政治活動家, 在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時期為匈牙利議會議員和革命政府委員, 革命失敗後流亡國外, 1867 年大赦後返回匈牙利。——第 567 頁。

普隆-普隆——見波拿巴, 約瑟夫·沙爾·保爾, 拿破侖親王。

普魯士親王——見威廉一世。

普希金, 亞歷山大·謝爾蓋也維奇 (Пуш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99—1837)——偉大的俄國詩人。——第 167 頁。

普魯斯, 弗雷德里克·威廉·阿道夫 (Bruce, Frederick William Adolf 1814—1867)——英國殖民官和外交家, 駐中國公使 (1858—1865)。——第 568—570、573、581、583 頁。

普林尼 (凱尤斯·普林尼·塞孔德) (Pliny (Caius Pliny Secundus) 公元 23—79)——羅馬博物學家, “博物志”(共 37 卷)的作者。——第 122 頁。

普里姆-伊-普腊斯, 璜 (Prim y Prats,

- Juan 1814—1870) ——西班牙將軍和政治活动家, 进步党的領袖之一, 曾参加 1834—1843 年和 1854—1856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 在 1859—1860 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中指揮一个师, 后来指揮一个軍。——第 610、617、618、621 頁。
- 普尔斯基, 弗兰齐舍克 (Pulszky 1814—1897) ——匈牙利政治活动家, 作家和考古学家, 原籍波兰, 曾参加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 革命失敗后流亡国外, 五十年代曾为“紐約每日論壇报”撰稿, 大赦后返回匈牙利, 議會議員 (1867—1876 和 1884—1897)。——第 567 頁。
- 普罗佩尔提烏斯, 塞克斯都 (Propertius, Sextus 公元前約 49—約 15) ——羅馬抒情詩人。——第 16 頁。
- 博宁, 爱德华 (Bonin, Eduard 1793—1865) ——普魯士將軍和国家活动家, 陸軍大臣 (1852—1854、1858—1859)。——第 508 頁。
- 博麦尔——見拉博麦尔, 罗朗·安格里維埃尔·德。
- 博阿尔奈, 欧仁 (Beauharnais, Eugène 1781—1824) ——亲王, 法国將軍, 拿破侖第一的继子, 曾多次参加拿破侖远征 (包括 1812 年对俄国的远征在內); 1805—1814 年为意大利总督。——第 256 頁。
- 博阿尔奈, 奥当斯 (Beauharnais, Hortence 1783—1837) ——拿破侖第三的母亲, 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的妻子。——第 504 頁。
- 博贊克特, 詹姆斯 (Bosanquet, James 1804—1877) ——英国銀行家和經濟学家, 还发表过一系列有关聖經年表的著作。——第 88 頁。
- 博贊克特, 查理 (Bosanquet, Charles 1769—1850) ——英国企业主和經濟学家, 在貨幣流通問題上曾同李嘉图进行論战。——第 160、164 頁。
- 富拉頓, 約翰 (Fullarton, John 1780—1849) ——英国资产阶级經濟学家, 写过一些有关貨幣流通和借貸問題的著作, 貨幣数量論的反对者。——第 176 頁。
- 富兰克林, 本杰明 (Franklin, Benjamin 1706—1790) ——杰出的美国政治活动家, 北美独立战争的参加者, 大科学家, 物理学家和經濟学家, 他最先有意識地用劳动時間来确定价值。——第 45、46、108、154 頁。
- 斐迪南-馬克西米利安 (Ferdinand-Maximilian 1832—1867) ——奥地利大公, 倫巴第一威尼斯王国总督 (1857—1859), 墨西哥皇帝, 号称馬克西米利安一世 (1864—1867)。——第 179、185 頁。
- 斐迪南二世 (Ferdinand II 1810—1859) ——那不勒斯国王 (1830—1859), 由于 1848 年炮轰墨西拿获得了炮彈国王的綽号。——第 183、185、336 頁。
- 斐迪南四世——見罗倫納, 斐迪南多。
-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代表人物, 客观唯心主义者, 最全面地制定了唯心主义辯证法。——第 8、525、529—532 頁。
- 黑森亲王——見亚历山大, 黑森亲王。

十三画

雷德格雷夫, 亚历山大 (Redgrave, Ale-

- xander)——英国的工厂視察員。——第 240—242 頁。
- 瑟美列, 貝尔塔兰 (Szemere, Bertalan 1812—1869)——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曾任內务部长(1848)和革命政府首腦(1849); 革命失敗后流亡国外。——第 567 頁。
- 楊格, 阿瑟 (Young, Arthur 1741—1820)——英国农学家和資產階級經濟学家, 貨币数量論的拥护者。——第 157 頁。
- 路德, 馬丁 (Luther, Martin 1483—1546)——卓越的宗教改革活动家, 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創始人, 德国市民階級思想家, 在 1525 年农民战争时期, 站在諸侯方面反对起義农民和城市貧民。——第 120、131、136 頁。
- 路易-菲力浦 (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 法国国王(1830—1848)。——第 204、309、503、504、506 頁。
- 路易-拿破侖——見拿破侖第三。
- 路易斯, 乔治·康瓦尔 (Lewis, George Cornwall 1806—1863)——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曾任財政部秘书长(1850—1852), 从 1852 年到 1855 年为“爱丁堡評論”杂志的出版者和編輯, 曾任財政大臣(1855—1858), 內政大臣(1859—1861)和陸軍大臣(1861—1863)。——第 333 頁。
- 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第 44 頁。
- 路易十五 (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第 192 頁。
- 路易·波拿巴——見拿破侖第三。
- 路瓦松, 路易·昂利 (Loison, Louis Henri 1771—1816)——法国將軍, 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侖第一的远征。——第 257 頁。
- 路德維希, 亞諾什 (Ludvigh, Janos 1812—1870)——匈牙利記者和政治活动家, 曾参加 1848—1849 年革命; 革命失敗后流亡国外。——第 567 頁。
- 路德維希一世 (Ludwig I 1786—1868)——巴伐利亚国王(1825—1848)。——第 438 頁。
- 路特希尔德家族 (Rothschild)——金融世家, 在欧洲各国拥有許多銀行。——第 318、335、377 頁。
- 塞西耳, 威廉, 柏里勋爵 (Cecil, William, Lord Bugnley 1520—1598)——英国国家活动家, 首席大臣(1558—1598)。——第 134 頁。
- 塞律里埃, 让·馬蒂約·菲利貝尔 (Séru-rier, Jean-Matthieu-Philibert 1742—1819)——法国將軍, 从 1804 年起为元帥, 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侖第一的远征。——第 665 頁。
- 詹諾韦西, 安东尼奥 (Genovesi, Antonio 1712—1769)——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經濟学家, 重商主义者。——第 37、114 頁。
- 奥当斯——見博阿尔奈, 奥当斯。
- 奥热罗, 比埃尔·弗朗斯瓦·沙尔 (Augereau, Pierre François Charles 1757—1816)——法国將軍, 从 1804 年起为元帥, 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侖第一的远征。——第 665 頁。
- 奥朗則布(1618—1707)——印度大莫臥儿王朝的赫諦沙赫(1658—1707)。——第 120 頁。

- 奥普戴克, 乔治 (Opdyke, George 1805—1880) ——美国企业主,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88 頁。
- 奥尔格斯, 海尔曼 (Orges, Hermann 1821—1874) ——德国記者, 从 1854 年到 1864 年为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編輯之一。——第 635、640 頁。
- 奥尔西尼, 費利切 (Orsini, Felice 1819—1858) ——意大利革命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 争取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統一斗争的著名参加者之一; 因謀刺拿破侖第三被处死刑。——第 190、195、307、310、435、436、506 頁。
- 奥当奈尔, 列奥波多, 吕森納伯爵 (O'Donnell, Leopoldo, 1809—1867) ——西班牙將軍和反动政治活动家, 温和派的領袖之一; 1854 年利用了国内革命危机来建立軍事专政; 在担任陸軍大臣期間領導了对资产阶级革命 (1854—1856) 的鎮压; 反动政府首脑 (1856—1857、1858—1863、1865—1866), 在 1859—1860 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期間任西班牙远征軍总司令。——第 609、610、613—618、620、627—632 頁。
- 奥尔洛夫, 阿列克塞·費多罗維奇 (Орлов, 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 1786—1861) ——公爵, 俄国軍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 外交家; 曾率領俄国代表团出席巴黎會議 (1856)。——第 505 頁。
- 奥維尔斯頓——見劳埃德, 賽米尔·琼斯, 奥維尔斯頓男爵。
- 奥克兰伯爵, 乔治·伊登 (Auckland, George Eden 1784—1849) ——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历任大臣职务, 印度总督 (1836—1842)。——第 575 頁。
- 奥尔良王朝 (Orléans) ——法国王朝 (1830—1848)。——第 608 頁。
- 奥尔斯瓦特, 魯道夫 (Auerswald, Rudolf 1795—1866) ——普魯士国家活动家, 接近资产阶级的自由貴族的代表, 曾任首相和外交大臣 (1848 年 6—9 月), 不管大臣 (1858—1862)。——第 508 頁。
- 奥倫治公爵威廉三世 (William III of Orange 1650—1702) ——尼德兰总督 (1674—1702), 英国国王 (1689—1702)。——第 67、72 頁。
- 福雷, 埃利·弗雷德里克 (Forey, Elie Frédéric 1804—1872) ——法国將軍, 后为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1854—1855 年統率在克里木的法軍;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揮一个师。——第 383、387、389、390、399—402 頁。
- 福格特, 卡尔 (Vogt, Karl 1817—1895) ——德国自然科学家, 庸俗唯物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屬左派, 1849 年 6 月是帝国五攝政之一; 1849 年逃离德国; 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本小册子 (1860) 中揭露他是路易-波拿巴的走狗。——第 362、435、436、439、530、657、686 頁。
- 福尔邦奈, 弗朗斯瓦·維隆·杜韦尔瑞·德 (Forbonnais, François Véron Duverger de 1722—1800)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財政家, 货币数量論的拥护者。——第 154 頁。
- 蒙塔朗貝尔, 沙尔 (Montalembert, Charles 1810—1870)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議会和立法議會議員, 奥尔良党人, 天主教党的首領, 在 1851 年十二月二

日政变时期支持路易·波拿巴，但不久就轉为反对派。——第 506 頁。

蒙蒂霍，欧仁妮 (Montijo, Eugenie 1826—1920) ——法国皇后，拿破侖第三的妻子。——第 195、506 頁。

蒙塔納里，杰明揚諾 (Montanari Gemignano 約 1633—1687) ——意大利科学家，数学和天文学教授；著有許多关于貨币的著作。——第 28、143 頁。

十四画

歌德，約翰·沃尔弗干格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 ——偉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 463、510 頁。

赫德，弗兰西斯 (Head, Francis 1793—1875) ——从男爵，英国殖民官，旅行家和作家。——第 302—304 頁。

蒲魯东，比埃尔·約瑟夫 (Proudhon, Pierre Joseph 1809—1865) ——法国政論家，經濟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始祖之一。——第 10、45、52、74、76、506 頁。

察貝尔，弗里德里希 (Zabel, Friedrich 1802—1875) ——德国自由派政論家，柏林“国民报”編輯(1848—1875)，主張在普魯士领导下統一德国，民族联盟党的創建人之一。——第 508、548 頁。

豪格維茨，克利斯提安·奧古斯特·亨利希·庫尔特 (Haugwitz, Christian Heinrich Kurt 1752—1832) ——普魯士国家活动家，外交大臣(1792—1804、1805—1806)。——第 313 頁。

維利 (Very) ——侯爵，撒丁外交家。——第 437 頁。

維里，彼得罗 (Verri, Pietro 1728—1797) ——意大利资产阶级經濟学家，

重农派学說的最早批評者之一。——第 141 頁。

維利森，威廉 (Willisen, Wilhelm 1790—1879) ——普魯士將軍和軍事理論家；1848 年任王室駐波茲南專員，1850 年指揮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軍隊对丹麦作战；著有許多軍事史著作。——第 250、274、278、288、371 頁。

維利森，弗里德里希·阿道夫 (Willisen, Friedrich Adolf 1798—1864) ——普魯士將軍，曾参加鎮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1862—1864 年任普魯士駐意大利大使。——第 371、512—514、516、517、520 頁。

維努亚，約瑟夫 (Vinoy, Joseph 1800—1880) ——法国將軍，波拿巴主义者，在 1859 年奧意法战争中指揮一个师，絞杀巴黎公社的劊子手之一。——第 390、399、402、429—431 頁。

維勒什，山道尔 (Veress, Sandor 1828—1884) ——匈牙利历史学家和記者，曾参加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 567 頁。

維克多-艾曼努尔二世 (Victor Emanuel II 1820—1878) ——撒丁国王 (1849—1861)，意大利国王 (1861—1878)。——第 179、182、183、185、187、193、196—199、298、300、382、402、404、413—415、467、469、473、474、476、508、542—545、594、622、642、667 頁。

維多利亞 (Victoria 1819—1901) ——英国女王 (1837—1901)。——第 240、317、319、547 頁。

維茨拉尔，古斯塔夫 (Wetzlar, Gustav 1813—1881) ——奥地利將軍，在 1859 年奧意法战争中指揮一个旅。——第

429 頁。

維特凱維奇, 伊万·維克多羅維奇 (Виткевич, Иван Викторович 死于 1839 年) —— 俄國軍官, 駐阿富汗外交代表 (1837—1838)。—— 第 575 頁。

維特爾斯巴赫王朝 (Wittelsbächer) —— 巴伐利亞公爵 (1180—1806), 后為國王 (1806—1918) 的王朝。—— 第 395 頁。

十五画

黎尔, 威廉·亨利希 (Riehl, Wilhelm Heinrich 1823—1897) —— 德國反动文學史家和政論家。—— 第 525 頁。

黎塞留公爵, 阿尔芒·让·杜·普勒西 (Richelieu, Armand Jean du Plessis 1585—1642) —— 法國專制主義時期最大的國家活動家, 紅衣主教。—— 第 592 頁。

蔡斯 (Zais) —— 德國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 醫生, 主張在普魯士領導下統一德國, 曾參加創建民族聯盟黨。—— 第 462—464 頁。

德爾, 欧仁 (Daire, Eugène 1798—1847) —— 法國經濟學家, 政治經濟學著作的出版者。—— 第 44、86 頁。

德索爾, 让·約瑟夫·保爾·奧古斯丹 (Dessolle, Jean Joseph Paul Augustin 1767—1828) —— 法國將軍, 曾多次參加拿破侖戰爭, 后為正統主義者。—— 第 257 頁。

賴德律-罗兰, 亚历山大·奧古斯特 (Ledru-Rollin, Alexandre Auguste 1807—1874) —— 法國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領袖之一, “改革報”編輯; 1848 年為臨時政府委員; 制憲議會和立法會議員, 在議會中領導

山岳黨; 1849 年 6 月 13 日示威遊行后, 流亡英國。—— 第 561 頁。

摩來肖特, 雅科布 (Moleschott, Jakob 1822—1893) —— 資產階級生理學家和哲學家, 庸俗唯物主義的代表人物; 生于荷蘭; 曾在德國、瑞士和意大利的學校中任教。—— 第 530 頁。

十六画

穆萊·阿巴斯 (Muley-Abbas 死于 1885 年) —— 摩洛哥親王, 在 1859—1860 年西班牙對摩洛哥的戰爭中任摩洛哥軍隊總司令。—— 第 613 頁。

穆勒, 詹姆斯 (Mill, James 1773—1836) —— 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哲學家, 李嘉圖理論的庸俗化者。—— 第 87、170—172 頁。

穆勒, 約翰·斯圖亞特 (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 —— 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實證主義哲學家, 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模仿者。—— 第 87 頁。

諾曼, 喬治·華德 (Norman, George Worde 1793—1882) —— 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 著有關於貨幣流通和賦稅的著作, “通貨原理”學派的擁護者, 英格蘭銀行經理。—— 第 174 頁。

澤巴赫, 阿尔宾·列奧 (Seebach 1811—1884) —— 男爵, 薩克森外交家, 五十年代為駐巴黎公使。—— 第 180、505 頁。

霍納, 萊昂納德 (Horner, Leonard 1785—1864) —— 英國地質學家 and 社會活動家; 工廠視察員 (1833—1856), 他保護了工人的利益。—— 第 222—225 頁。

霍爾·麥克斯威爾 —— 見麥克斯威爾, 約翰·霍爾。

霍布斯, 托馬斯 (Hobbes, Thomas 1588

—1679)——杰出的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具有明显的反民主的倾向。——第43頁。

霍吉斯金,托馬斯(Hodgskin, Thomas 1787—1869)——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論家;他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从空想社会主义的立場出发并利用李嘉图的理論批判了資本主义。——第40頁。

霍亨索倫王朝(Hohenzollern)——勃兰登堡选帝侯(1415—1701)、普魯士国王(1701—1918)和德国皇帝(1871—1918)的王朝。——第313、361、395、438、476頁。

霍亨施陶芬王朝(Hohenstaufen)——所謂神圣羅馬帝国的王朝(1138—1254)。——第261頁。

霍韦利亚諾斯-伊-腊米雷斯,加斯帕尔(Jovellanos y Ramirez, Gaspar 1744—1811)——西班牙国家活动家,作家,法学家和經濟学家,十八世紀法国启蒙运动者的信徒,持重商主义观点。——第44頁。

十七画

繆拉特,拿破侖·律西安·沙尔(Murat, Napoléon Lucien Charles 1803—1878)——亲王,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政治活动家;拿破侖第三的堂兄弟。——第181頁。

十八画

額尔金伯爵,詹姆士·布鲁斯,金喀尔田伯爵(Elgin, James Bruce, Earl of

Kincardine, Earl of 1811—1863)——英国外交家,在1857—1858年和1860—1861年作为特命全权代表出使中国,印度总督(1862—1863)。——第570、571、581—584、601、602、604頁。

薩伊,让·巴蒂斯特(Say, Jean Baptiste 1767—1832)——法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經濟学家,他最先系統地闡述了辯护性的“服务”論。——第26、51、87、107、158頁。

薩博,伊姆雷(埃梅里克)(Szabó, Imre (Emerich) 1820—1865)——匈牙利軍官,曾参加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曾任陸軍部长(1848),革命失败后流亡倫敦,曾参加1859年奧意法战争。——第567頁。

薩博,伊什特万(埃蒂耶納)(Szabó, István (Etienne) 1825—1862)——匈牙利軍官,曾参加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567頁。

薩瓦王朝——意大利王朝之一,1720年至1861年統治撒丁王国,1861年至1946年統治統一的意大利王国。——第474、543頁。

薩巴拉-伊-德·拉·普恩特,璜(Zabala y de la Puente, Juan 1804—1879)——西班牙將軍,屬温和派,1854—1856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在1859—1860年的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中指揮一个軍。——第610、617頁。

薩尔达尼拔——見亚述巴尼拔。

文学作品和神話中的人物

四 画

巴力——聖經中的天神、太陽神和丰产之神；公元前两千至一千年間在腓尼基、叙利亞和巴勒斯坦普遍祭祀巴力；巴力的崇拜者被基督教傳統斥責为追逐暴利和沾染恶习的人。——第 186 頁。

五 画

史納格——莎士比亚的喜劇“仲夏夜之夢”中的人物，細木工。——第 522 頁。

史賴，克里斯多弗——莎士比亚的喜劇“馴悍記”中的人物，補鍋匠。——第 515 頁。

圣彼得——使徒。——第 509 頁。

加西莫多——雨果的長篇小說“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加西莫多这个名字已成了丑陋的化身。——第 309、441、443、506、563 頁。

六 画

亚倫——根据聖經傳說，亚倫是摩西的哥哥，古犹太人的最高司祭；亚倫在西奈山建立了供崇拜的金犢。——第 317 頁。

米特勒——歌德的長篇小說“亲和力”中的人物；米特勒（意譯为調停人）作为一个僧侶，經常調解在他的教区中发生的糾紛。——第 510 頁。

伊菲姬尼亚——古希腊神話中国王亚加米农的女儿，特洛伊之战前被亚加米农当作了祭品。——第 635 頁。

达摩克利斯——古希腊傳說中叙拉古暴君迪奥尼西修斯（公元前四世紀）的寵信。“达摩克利斯劍”一詞是經常的、迫近的和可怕的危險的同义語；根据傳說，达摩克利斯应迪奥尼西修斯之約赴宴，席間迪奥尼西修斯想使羨慕他的达摩克利斯相信人的安乐是不长久的，就把达摩克利斯安置在自己的宝座上，并用一根馬鬃把一把利劍懸在他的头上。——第 190 頁。

西得·康佩亚多尔——中世紀的“我的西得之歌”（用西班牙文写成的第一部文学作品——約 1140 年）、“西得軼事”和許多抒情詩歌中的主人公；西班牙民間傳說中这位受人愛戴的英雄成了十七世紀法国劇作家高乃依的悲劇“西得”的題材。——第 610 頁。

七 画

麦克佩斯——莎士比亚同名悲劇中的人物，他为了达到自己的虛荣目的，不惜犯血腥罪行。——第 319 頁。

八 画

奈斯托尔——根据希腊神話，奈斯托尔是参加特洛伊之战的希腊英雄中最老最賢明的英雄；在文学傳統中，他經常被当作飽經世故的聰明的長者的典型。——第 43 頁。

彼得·施萊米尔——德国浪漫派詩人夏米索的小說“彼得·施萊米尔奇遇記”中的主人公，他用自己的影子換来一个神奇的錢袋。——第 105 頁。

九 画

耶和華——古犹太教的主神。——第 509 頁。

約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代名詞；1712 年启蒙作家阿伯什諾特的政治諷刺作品“約翰牛傳”問世后，这个代名詞就流傳开了。——第 303、325、326、333、338、506 頁。

威廉·退尔——关于十三世紀末十四世紀初瑞士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解放战争的民間傳說中的英雄；傳說中描写他以百发百中的箭术射死了奥地利地方长官。席勒在他的同名剧作中采用了威廉·退尔的形象。——第 506 頁。

疯狂的罗兰——阿里欧斯托的同名长詩中的主人公。——第 569 頁。

十 画

息息法斯——希腊神話中科林斯之王，由于欺騙諸神，被罰永远向山上推石头，石头推上山后又立即滾下来。由此就产生了“息息法斯式的劳动”一詞，指沉重而又无成果的劳动。——第 305 頁。

十一 画

教堂司事——莎士比亚的喜劇“无事煩惱”中的人物。——第 584 頁。

基督（耶穌基督）——傳說中的基督教的創始人。——第 316、509 頁。

十二 画

道勃雷——莎士比亚的喜劇“无事煩惱”中的人物；自大而愚蠢的官吏的化身。

——第 584、586 頁。

提修斯——莎士比亚的喜劇“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第 522 頁。

萊散特——莎士比亚的喜劇“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第 522 頁。

十三 画

奧菲士——希腊神話中的詩人和歌手；奧菲士的歌唱能馴服野獸，甚至使石头着迷。——第 373 頁。

雅努斯——古羅馬的神，有前后两副面孔；雅努斯的轉义就是口是心非的人。——第 577 頁。

十四 画

瑪門——希腊神話中的財神；在基督教經文中，瑪門是惡魔，是好利貪財的化身。——第 222 頁。

瑪尔斯——古代羅馬人的战神。——第 198 頁。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一些作品（“温莎的風流娘儿們”、“亨利第四”）中的人物，一个爱吹牛的胆小鬼、打諢者和酒鬼。——第 428、508 頁。

十五 画

摩西——根据聖經傳說，摩西是从埃及法老的迫害下解救了古犹太人的先知（見“出埃及記”）。——第 25 頁。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的太阳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活人作祭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殘忍、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第 44 頁。

期 刊 索 引

二 画

“人民报”(*«Das Volk»*)——倫敦出版。
——第 400、421、434、438、443、451、
457、461、465、490、499、523、526、535、
548、683、695 頁。

四 画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
——布魯塞尔出版。——第 189、198、
494 頁。

五 画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
——巴黎出版。——第 197、200—205、
323、353 頁。
“东德意志邮报”(*«Ost-Deutsche Post»*)
——維也納出版。——第 636 頁。

六 画

“自由新聞”(*«The Free Press»*)——倫敦
出版。——第 561 頁。

七 画

“每日電訊”(*«Daily Telegraph»*)——倫敦
出版。——第 569、581 頁。
“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倫敦
出版。——第 417 頁。
“两大陆評論”(*«Reoue des deux Mondes»*)

——巴黎出版。——第 460 頁。

八 画

“京报”(*«Peking Gazette»*)——第 569 頁。
“画报”(*«L'Illustration»*)——巴黎出版。
——第 486、487 頁。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柏林
出版。——第 437 頁。
“国民报”(*«Le National»*)——巴黎出版。
——第 437 頁。
“法国中部报”(*«France Centrales»*)——第
195 頁。

九 画

“美国信使报”(*«Courrier des États-Unis»*)
——紐約出版。——第 200 頁。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奧
格斯堡出版。——第 8、250、280、314、
384、388、635、636、640 頁。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
——巴黎出版。——第 186、300、309、
312、339、343、344、353、361、492、498、
500、572、580 頁。
“軍事总汇报”(*«Allgemeine Militär-Zei-
tung»*)——达姆斯塔德出版。——第
639 頁。
“科倫日报”(*«Kölnische Zeitung»*)——第
362 頁。
“思想和行动”(*«Pensiero ed Azione»*)——

倫敦出版。——第407、563、567頁。
 “祖國報”(《La Patrie》)——巴黎出版。
 ——第342、498頁。

十 画

“海爾曼。倫敦德文周報”(《Hermann. Deutsches Wochenblatt aus London》)
 ——倫敦出版。——第684—689、692頁。
 “旁觀者”(《The Spectator》)——倫敦出版。——第42、150頁。
 “倫敦官報”(《The London Gazette》)——第239頁。
 “倫敦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第487頁。
 “紐約每日論壇報”(《New-York Daily Tribune》)——第10、184、188、194、199、206、212、220、228、234、239、245、301、304、306、310、315、319、324、333、337、342、346、351、355、358、363、370、377、382、388、391、396、405、412、417、426、434、444、447、456、468、471、476、495、502、540、545、554、557、559、560、563、567、585、591、595、600、605、608、615、621、626、632頁。
 “泰晤士報”(《The Times》)——倫敦出版。——第189、239、301—304、353、384、388、406、452、498、539、569、572、573、577、578、584、631、638、639、657頁。
 “涼亭。家庭畫報”(《Die Gartenlaube. Illustriertes Familienblatt》)——萊比錫，柏林出版。——第688、694頁。

十一 画

“晨星報”(《The Morning Star》)——倫敦出版。——第571頁。

十二 画

“普魯士王國國家通報”(《Königlich 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柏林出版。——第513頁。
 “萊茵政治、商業和工業日報”(《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科倫出版。——第7、8頁。

十三 画

“新聞報”(《La Presse》)——巴黎出版。——第198頁。
 “新普魯士報”(《Neue Preussische Zeitung》)——柏林出版。——第313頁。
 “新萊茵報。民主派機關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科倫出版。——第10頁。
 “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倫敦出版。——第96、578—580頁。
 “奧地利帝國維也納日報”(《Oesterreichisch Kaiserliche Wiener Zeitung》)——第376、541頁。

十四 画

“維也納日報”(《Wiener Zeitung》)——見“奧地利帝國維也納日報”。

十五 画

“論壇報”——見“紐約每日論壇報”。
 “德法年鑑”(《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巴黎出版。——第8、9頁。

十八 画

“薩克森立憲報”(《Sächsische Konstitutionelle Zeitung》)——德勒斯頓出版。——第548頁。

地名索引*

三 画

- 土倫——第 193、231、232、334、664 頁。
 土尔比哥——第 418、427、428、433、639 頁。
 大沽——第 569、573 頁。
 大西洋——第 195、389、413 頁。
 大圣伯納德山口——第 210、256、258、260、625、649、650—653 頁。
 小圣伯納德山口——第 256、260、648、650—654、658、663、667 頁。
 上海——第 569、580、585 頁。
 广州——第 569、570、578、584、585、602 頁。
 士瓦本——第 261、262 頁。
 凡尔登——第 283 頁。

四 画

- 切瓦——第 663 頁。
 切尔沃河——第 660 頁。
 切列扎拉——第 442、445 頁。
 切韦达列山口——第 257 頁。
 巴門——第 243 頁。
 巴登——第 211、446、598 頁。
 巴黎——第 8、71、125、143、179、180、185—187、190、200、206、282、283、286、

- 287、289、291、292、306、309、316、323、349、350、354、361、380、434、447、470、477、482、505、506、519、542、544、545、547、548、564、567、593、643、644、648、654、668、676、693 頁。
 巴塞尔——第 212、282、286、287、313、446、625、637、647、648、655、657、659 頁。
 巴薩諾——第 219、254、268 頁。
 巴伐利亚——第 210、211、255、256、261、262、269、270、272、274—277、289、345、395、404、510 頁。
 巴尔德堡垒——第 258 頁。
 巴尔塞洛内特——第 648 頁。
 文洛——第 285、287、289 頁。
 文森——第 185 頁。
 文察利奧——第 402、413、479 頁。
 丹第——第 227 頁。
 丹吉尔——第 613、614、621、632 頁。
 日内瓦——第 231、254、623、625、645、655—658 頁。
 日内瓦湖——第 656、658、659 頁。
 比尔湖——第 656 頁。
 比利时——第 283—285、289、290、292 頁。
 比耶拉——第 231、479 頁。

* 括弧中是现代地图上的名称。在正文中看不出所在地点的地名，则加有简短的说明。——编者注

比凱堡——第 523 頁。
 比尔格倫——第 656 頁。
 比納斯科——第 428、439、440、481、482 頁。
 比利牛斯山脈——第 293、662 頁。
 厄比納尔——第 287 頁。
 厄特魯里亞——第 642 頁。
 什普留根山口——第 255、257—260、404 頁。
 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第 293、312、371、548、599、673、678 頁。
 牛津——第 134 頁。
 天津——第 568、570、573 頁。
 云納河——第 286 頁。
 戈伊托——第 266、442、445、454、455、460 頁。
 太晤士河——第 547、570 頁。
 牙买加島——第 148 頁。
 韦尔切利——第 230、231、366—369、379、384—387、402、413、415—417、419、420、422、423、433、479、639 頁。
 尤列尔山口——第 257、258 頁。

五 画

瓦卡里察——第 389、399、405 頁。
 瓦拉儿亞——第 300、309、314、336、505 頁。
 瓦格拉姆——第 212 頁。
 瓦朗西恩——第 294 頁。
 瓦哈德-埃耳-杰魯河——非洲的一條河流。——第 627、629 頁。
 瓦尔河——第 220、254、660、664 頁。
 瓦兰察——第 366、367、379、381、382、385、398、415、416、419、420、422—424 頁。
 瓦列卓——第 454、458、459 頁。
 瓦瑟河——第 283、286、287、292 頁。

瓦尔山口——第 232 頁。
 瓦尔德錫——第 662 頁。
 瓦尔特林納——第 254、257、258、403 頁。
 瓦得(窩州)——瑞士的一个州。——第 625、656—659 頁。
 瓦里斯(瓦勒)——瑞士的一个州。——第 280、625、654、656—659 頁。
 瓦倫西亞——第 662 頁。
 北区——第 222 頁。
 北京——第 568、570、571、573、574、584 頁。
 北海——第 285、507、599 頁。
 北布拉班特——第 289 頁。
 漢堡——第 88、312、328、377 頁。
 汉鮑洛——第 386 頁。
 汉諾威——第 336、345、395、438、548 頁。
 兰涅克——第 655 頁。
 兰格尔高原——第 668 頁。
 兰列布尔——第 651—653 頁。
 兰德列西——第 284 頁。
 卢比康河——第 196、198、253 頁。
 卢瓦尔河——第 282、292 頁。
 卢艾亞河——第 661 頁。
 卢齐延什泰格——第 259 頁。
 卢克曼尼尔山口——第 257 頁。
 田达——見田达山口。
 田达山口——第 231、232、277、350、624、648、661—666 頁。
 布倫——第 196、198、286、418 頁。
 布隆(布尔諾)——第 377 頁。
 布利达——第 632 頁。
 布拉格——第 377 頁。
 布魯治——第 286 頁。
 布柯維納——第 293 頁。
 布隆采耳——第 280、299、312、464、507、595 頁。
 布里昂察——第 479 頁。

- 布里昂松——法国的城市和要塞。——
第 231、232、647、651 頁。
- 布里西亚——第 185、404、460 頁。
- 布劳利奧——第 258 頁。
- 布兰塔河——第 213、219、254、261、263、
267、272 頁。
- 布魯塞尔——第 8、10、506 頁。
- 布魯阿河——第 656 頁。
- 布魯內克(布魯尼科)——第 254 頁。
-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 377、394
頁。
- 布萊得弗德——第 591 頁。
- 布倫尼奧谷地——第 257 頁。
- 布尔克-圣莫里斯——第 653 頁。
- 卡尔斯——第 505 頁。
- 卡薩勒——第 185、230、231、264、348、
349、366、368、369、379、381、382、385、
398、415、479、489、638、652、667 頁。
- 卡利希——第 438 頁。
- 卡多烈——第 254 頁。
- 卡利阿諾——第 268 頁。
- 卡馬斯科——第 479 頁。
- 卡斯泰卓——第 390、399—402 頁。
- 卡斯特尔——第 288 頁。
- 卡斯特尔-霍夫勒多——第 441、442、445、
449、453、454 頁。
- 卡薩林諾——第 402 頁。
- 卡塔卢尼亚——第 662 頁。
- 卡斯列托——第 428、481 頁。
- 卡斯提奧涅——第 213、268、441、442、
444、445、448、453—455、482—484、
488、489、640 頁。
- 卡斯特努沃——第 387 頁。
- 卡尔卡勒——第 663 頁。
- 卡莫尼卡谷地——第 259 頁。
- 卡維爾諾谷地——第 660 頁。
- 卡斯特內多洛——第 441 頁。
- 卡博-涅格罗角——第 619 頁。
- 卡夫里阿諾——第 441、442、444、445、
454—456、485、638 頁。
- 卡夫丁峡谷——卡夫丁城附近(古羅馬)。
——第 278 頁。
- 卡尔弗利特山口(科巴里特, 卡波列托)
——第 254 頁。
- 加來——第 287 頁。
- 加維阿——第 257 頁。
- 加塞尔——第 377、393 頁。
- 加尔各答——第 326、327、574 頁。
- 加尔达湖——第 214、215、265、273、404、
441、444、453、459、483、484 頁。
- 加列西奧——第 663 頁。
- 加里西亚——第 288、293、314、374 頁。
- 加拉希耳茲——第 227 頁。
- 加尔拉斯科——第 383、387、417、419、
422、480 頁。
- 加斯梯里亚——第 616 頁。
- 皮蒙特——第 178—184、188、193、194、
209、213、229—234、255、260、264—
266、273、274、279、280、313、344、345—
350、365—368、373、378、384—389、
398、455—458、474—480、486、489、
492、543、545、566、594、623—625、641
—648、661—667、670、672 頁。
- 皮佐克——第 257 頁。
- 皮腊諾——第 372 頁。
- 皮阿琴察——要塞——第 260、274、335、
349、366、379、386、389、390、399、419、
420、422、425、440、542、544、638 頁。
- 皮亚德納——第 441、482 頁。
- 皮亚韦河——第 254、263 頁。
- 圣昆廷——第 287 頁。
- 圣馬丁——非洲的堡垒。——第 630、632
頁。
- 圣馬力諾——第 360、404 頁。

圣馬尔蒂諾——第 427、428、453、456 頁。
 圣迪济埃——第 287 頁。
 圣海倫島——第 269、304、437、499 頁。
 圣让哥尔弗——第 657、658 頁。
 圣漂尔頓——第 372 頁。
 圣让德莫里延——第 654 頁。
 圣哥达山口——第 258、260、655 頁。
 圣巴特耳米——第 653 頁。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第 107、180、
 187、305、338、345、373、521、575、676
 頁。
 圣卡西阿諾——第 441、444、454、455、
 485 頁。
 圣伯納迪諾——見伯納丁。
 圣巴尔科拉——第 372 頁。
 东区——第 240 頁。
 东印度——第 538、604 頁。
 弗略留斯——第 285 頁。
 弗列茹斯——港口。——第 647 頁。
 弗里布尔——瑞士的一个州。——第 625、
 656、657 頁。
 弗拉西涅托——第 379 頁。
 弗利得利赫什达特——第 293 頁。
 宁波——第 569 頁。
 白河——第 568—570、573、582—584 頁。
 尼斯——第 231、350、622—626、633、642、
 643、645、648、661—672、677 頁。
 旧金山——第 636 頁。
 边屯区——第 207、209、212、485、638 頁。
 左洛图恩——第 657 頁。
 匹威格頓——第 274 頁。
 印度——第 65、124、130、298、325—328、
 330—333、352、538—540、571、575、
 580、585、602、613、629 頁。

六 画

匈牙利——第 251、314、336、376、470、

561—567、672—674、676—678 頁。
 亚琛——第 339 頁。
 亚尔薩斯——第 251、295 頁。
 亚平宁山脉——第 229、233、254、389、
 663 頁。
 亚平宁半島——第 253 頁。
 亚得利亚海——第 185、214、254、256、
 263、372、541、641 頁。
 亚历山大里亚——第 230—233、264、273、
 274、348、349、366—369、380—382、
 387、398、415、489、625、638、652、663、
 664、666、667 頁。
 多伊茨——第 288 頁。
 多瑙河——第 251、262、269、317、323、
 673—675、678、679 頁。
 多瑙河各公国——見瓦拉几亚和莫尔达
 維亞。
 多腊-巴尔特亚河——第 368、369、379—
 381、415、479、644 頁。
 多腊-里帕里亚河——第 644 頁。
 西区——第 222、238 頁。
 西西里島——第 337、360 頁。
 西里西亚——第 376、394 頁。
 西布罗姆威奇——第 238 頁。
 西克斯-馬敦山口——第 258 頁。
 安訥河——第 283、286、292 頁。
 安訥西——第 658 頁。
 安特卫普——第 285—287、295 頁。
 安察斯卡谷地——第 660 頁。
 伊斯河——第 657 頁。
 伊万城——第 678 頁。
 伊符雷——第 256、368、652、653 頁。
 伊韦尔登——第 656 頁。
 伊扎尔河——德国的一条河流。——第
 274 頁。
 伊澤奧湖——第 259 頁。
 伊澤尔河——第 649—651、653、658 頁。

伊宗察河——第 254、262、266—268、274、276、289 頁。
 伊奧尼亞群島——第 298 頁。
 达尔薩谷地——第 267 頁。
 达尔馬威亞——第 314、372 頁。
 达达尼尔海峽——第 505 頁。
 达姆斯塔德——第 463 頁。
 达尔仁特腊山口——第 648、664 頁。
 托农——第 658 頁。
 托斯卡納——第 181、266、313、318、339、355、359、361、399、444、469、473、475、542、545、594、641 頁。
 托尔托納——第 233、366、379、387、415 頁。
 托納列山口——第 234、254—257、259 頁。
 托勃拉赫山口——第 269 頁。
 列維勒——第 265 頁。
 列尼亚哥——第 214—216、218、233、265、267、442、492、494 頁。
 列姆堡(里沃夫)——第 377 頁。
 吉茲——第 284 頁。
 吉涅斯特列洛——第 390、401 頁。
 艾契河——見阿迪杰河。
 艾塞克斯——第 240 頁。
 朱迪卡里耶——第 234、254、261 頁。
 朱利恩阿尔卑斯山脉——第 489 頁。
 华沙——第 280、299、312、507、672、673、678 頁。
 华里斯——第 403、404 頁。
 休达——第 609、610、613—621、627—630 頁。
 色当——第 285 頁。
 米兰——第 179、183、185、216、220、234、255、262、265、276、318、365、373、388、399、416、419—427、433、439、480、482、561、640、666 頁。

地中海——第 180、183、214、350、617、619 頁。
 圭迪佐洛——第 442、445、449、453—455、459 頁。
 汝拉山脉——第 286、647、656 頁。
 伏尔姆斯山口——見博尔米奧。

七 画

廷恩谷地——第 653 頁。
 杜埃——第 287、289、294 頁。
 杜塞尔多夫——第 487 頁。
 利尼——比利时的一个要塞。——第 285 頁。
 利尔——第 287、294 頁。
 利伏諾——第 399 頁。
 利物浦——第 383、572 頁。
 利斯河——第 284 頁。
 利斯谷地——第 660 頁。
 沃尔塔——第 267、441、442、445、449、453、459 頁。
 沃格拉——第 379、383、387、390、399、405、415、419、422、424 頁。
 伯尔尼——第 371、656、658 頁。
 伯桑松——第 652 頁。
 伯尔尼汝拉山脉——第 625、656、657 頁。
 伯納丁(圣伯納迪諾)——第 257、260 頁。
 苏扎——第 367、651 頁。
 苏格兰——第 42、48、64、104、221、226、244、562、563 頁。
 苏黎世——第 541—543、545、592—594、658 頁。
 苏瓦松——第 283、286、289 頁。
 苏甘納谷地——第 254、261、273 頁。
 苏伊士运河——第 506 頁。
 貝恩利——第 238 頁。
 貝拉諾——第 257 頁。
 貝卢諾——第 254 頁。

貝爾加莫——第 185、404 頁。
 貝爾貝萊——第 71 頁。
 貝爾博河——第 230、264、666 頁。
 貝斯塔齊亞——第 429 頁。
 貝薩拉比亞——第 673 頁。
 貝雷古阿爾多——第 386、419、421、422、
 425、428、480、481 頁。
 貝耳焦伊奧索——第 387、439、441 頁。
 貝爾加莫阿爾卑斯山脈——第 257 頁。
 里昂——第 193、206、231、232、282、286、
 287、349、350、645、649、652、668 頁。
 里姆——第 287 頁。
 里沃利——第 213、267、268、273、488、
 489 頁。
 里米尼——第 254、645 頁。
 里沃利高原——第 267、273 頁。
 佛利——第 641 頁。
 佛西尼——第 622、646、657 頁。
 佛羅倫薩——第 543 頁。
 克爾——第 288 頁。
 克倫地亞——第 254、261、275 頁。
 克倫河——第 258 頁。
 克里木——第 183、365、501 頁。
 克拉科夫——第 335 頁。
 克雷莫納——第 185、260、273—274、440
 頁。
 克勞伊登——第 238 頁。
 克里特島——第 675 頁。
 克拉根富特——第 262、269、273 頁。
 克列申丁諾——第 231 頁。
 克里木的赫爾松涅斯——第 502 頁。
 麥茨——第 193、287、446 頁。
 麥士河——第 283—285、287、289、294、
 668 頁。
 那慕爾——第 285—287 頁。
 那不勒斯——第 178、253、266、313、339、
 360、475、641、670 頁。

呂特岑——第 419、423 頁。
 呂內維爾——第 307 頁。
 沙布累——第 622、646、657 頁。
 肖蒙——第 283、287 頁。
 坎比奧——第 366、379、380 頁。
 芒勃朗省——第 646 頁。
 別洛斯托克——第 677 頁。
 辛普朗山口——第 255、256、260、263、
 280、657、660 頁。
 但澤(格但斯克)——第 213、268、277、
 394、397 頁。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第 560、
 673—675 頁。
 來巴赫(柳布梁納)——第 345、678 頁。

八 画

阿契——匈牙利的一个居民点。——第
 373 頁。
 阿温——第 283 頁。
 阿姆——法国的一个要塞。——第 488、
 497、504 頁。
 阿腊貢——第 662 頁。
 阿尔隆——第 287 頁。
 阿尔堡——第 656 頁。
 阿隆納——第 366、386、638 頁。
 阿拉斯——第 294 頁。
 阿庫伊——第 230 頁。
 阿左拉——第 453、457 頁。
 阿勒河——第 656、658 頁。
 阿达河——第 234、254、256、258、259、
 263、272、274、403、421、489 頁。
 阿斯蒂——第 398 頁。
 阿尔夫河——第 647、658 頁。
 阿本斯堡——第 234、482 頁。
 阿布罗思——第 227 頁。
 阿奧斯塔——第 260、652、660、662 頁。
 阿普里卡——第 257、258 頁。

- 阿穆尔河(黑龙江)——第 574 頁。
- 阿尔登高原——第 285 頁。
- 阿尔克河——第 649—651、653 頁。
- 阿尔科列——第 213、268、488 頁。
- 阿尔多夫——第 258 頁。
- 阿尔班加——第 663、666 頁。
- 阿尔尼亚托——第 381 頁。
- 阿尔貝維耳——第 624、652、658 頁。
- 阿尔及利亚——第 179、197、201、203、205、218、321、334、610、629、630、640 頁。
- 阿尔巴尼亚——第 336 頁。
- 阿克維列亞——第 254 頁。
- 阿姆斯特丹——第 71 頁。
- 阿尔卑斯山脉——第 219、229、231、233、254—260、263、275、347、351、368、433、467、480、489、541、624、626、643—645、647—655、658、660、666—668、670、671 頁。
- 阿哥尼亚河——第 385、386、417、418、420、424 頁。
- 阿迪杰河(艾契河)——第 183、193、206、215—220、229、231、234、250、252—259、261—268、272—274、277、285、288、289、299、314、315、317、421、425、445、523、593、660 頁。
- 阿耳黑西腊斯——第 609 頁。
- 阿耳布拉山口——第 257 頁。
- 阿尔汉格尔斯克——第 636 頁。
- 阿比亚帖格腊索——第 385、427、428、439、440、480—482 頁。
- 羅馬——第 179、181、182、193、194、311、339、360、403、470、475、489、541、594 頁。
- 罗察特——第 480、639 頁。
- 罗貝科——第 429、430、481 頁。
- 罗尼河——第 232、282、321、657、658 頁。
- 罗斯巴赫——第 296 頁。
- 罗马尼亚——第 473、475、543、594、641、670 頁。
- 罗克魯阿——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284 頁。
- 波河——第 213—215、220、229—232、247、249、250、252—255、263—265、269、273、274、277、282、290、293、294、299、314、317、349、366—369、379—387、389、390、393、398、399、416、419、421、422、429、440、441、467、478—480、482、489、625、635、636、661、667、670 頁。
- 波拉(普拉)——在南斯拉夫。——第 372 頁。
- 波尔多——第 197 頁。
- 波罗的海——第 277、293 頁。
- 波希米亚——見捷克。
- 波斯尼亚——第 336 頁。
- 波佐倫哥——第 449、453、459 頁。
- 波思基亞伏——第 655 頁。
- 波南特海岸——第 665 頁。
- 佩斯——匈牙利首都,現在布达佩斯的左岸部分。——第 372、565 頁。
- 佩特耳施坦山口——第 254、261 頁。
- 拉巴特——第 614 頁。
- 拉芒什海峽——第 340、644 頁。
- 拉姆布罗河——第 440、483 頁。
- 拉姆別薩(拉姆別茲)——第 312、335、644 頁。
- 拉腊什(埃爾-阿拉伊什)——第 614、621、632 頁。
- 法国——第 282—298 頁。
- 法兰克尼亚——第 463 頁。
- 帕尔馬——第 181、183、185、266、274、312、318、339、360、387、459、469、473、475、545、594、641 頁。

帕多瓦——第 267 頁。
 帕維亞——第 179、185、213、253、276、
 379、380、385、386、389、399、419—425、
 429、440、479—481 頁。
 帕勒斯特羅——第 402、413—417、479、
 639 頁。
 庞尼克斯山口——第 258 頁。
 庞塔菲尔山口——第 254、259、261 頁。
 庞-迭-博富阿森(勒-庞-迭-博富阿森)
 ——第 256 頁。
 非斯——第 614 頁。
 孟买——印度的城市 and 管区。——第
 327、330 頁。
 明乔河——意大利的一条河流。——第
 193、206、213—220、229、230、232、234、
 252、258、262—269、272—275、277、
 282、288—290、293、294、296、299、314、
 315、317、365、433、435、438、439、441—
 445、448—450、452、454—457、460、
 470、474、478、483、484、488、492、523、
 593、635、636、640、670、672、686 頁。
 玫瑰峰——第 660 頁。
 依朗茲——第 258 頁。
 易北河——第 317、419、423 頁。
 松布尔河——第 284、285、289 頁。
 些耳德河——第 284、285、294 頁。
 舍亨塔尔——第 258 頁。
 居塔希亞——第 561 頁。
 的里雅斯特——第 180、219、220、250、
 372、377、382、460 頁。
 金齐庫尔姆——第 258 頁。
 阜姆(里耶卡)——第 564 頁。
 門的内哥羅——第 309 頁。
 芬斯特閣茨山口——第 256、259、261、
 273 頁。
 彼得林根(佩埃恩)——第 657 頁。
 直布罗陀海峽——第 615 頁。

九 画

柏林——第 291、311、371、392—394、
 438、508、509、511、512、516—520、523、
 548、637 頁。
 柏肯海德——第 238 頁。
 洛林——第 251、295 頁。
 洛桑——第 256、652 頁。
 洛迪——第 185、488、489 頁。
 洛納托——第 441、442、444、453、454、
 489、640 頁。
 洛阿諾——第 665 頁。
 洛美洛——第 366、369、379 頁。
 洛美利納——第 379、380、382、383、385
 —388、399、419、425、638、639、645
 頁。
 洛特布尔——第 282、647 頁。
 美多列——第 268、454 頁。
 美因河——第 276 頁。
 美因茲——第 287 頁。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 313、314、346、
 361、371、377、393、395、463、548、598、
 599 頁。
 迪尔河——第 285 頁。
 迪韦德羅谷地——第 660 頁。
 威爾士——第 549—551 頁。
 威塞爾——第 288、289 頁。
 威尼斯——第 143、178、180、183、262、
 372、474、641、643、645、670、672 頁。
 威尼斯省——第 183、216—220、233、234、
 250、252、264、267、272、289、468 頁。
 威克菲尔德——第 586、590 頁。
 威斯特伐里亞——第 10、642 頁。
 南錫——第 287、361 頁。
 南布拉班特——第 285 頁。
 哈里季——第 227、523 頁。
 哈里法克斯——第 402 頁。

哈特耳普耳——第 238 頁。
 勃朗峰——第 624、647、658 頁。
 勃兰登堡——第 512 頁。
 勃倫納——奧地利和意大利国境上的一个山口。——第 254、256、261、275、276 頁。
 晋河——第 256、259、261 頁。
 晋斯布魯克——第 262、269、273 頁。
 施蒂尔夫——見斯特爾維奧。
 施特廷(茲杰辛)——第 277、394 頁。
 科佐——第 366 頁。
 科摩——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第 403 頁。
 科倫——第 285、287、289、311 頁。
 科摩湖——第 255—257、260、273、403、404 頁。
 科西嘉島——第 297、341、349 頁。
 科尔納列——第 387 頁。
 科尔別塔——第 427、428、430、481 頁。
 科尔尼切——道路。——第 663 頁。
 科馬基奧——第 335 頁。
 科布倫茨——第 446 頁。
 科涅利安諾——第 219 頁。
 科莫恩(科馬罗姆)——第 373、397 頁。
 科特阿尔卑斯山脉——第 660、662 頁。
 科丁納·达姆佩佐(科丁納)——第 254 頁。
 香港——第 571 頁。
 恒河——第 523 頁。
 耶拿——第 212、277、284 頁。
 幽里希——第 289 頁。
 恰克图——第 140 頁。
 郎卡郡——英国的一个郡。——第 222、238、240 頁。
 約克郡——英国的一个郡。——第 222、238、240 頁。
 保加利亚——第 336 頁。

柳提赫(列日)——第 285、287 頁。
 英果尔施塔特——第 276 頁。
 契維达列-德尔-弗里烏利——第 254 頁。

十 画

埃及——第 25、503、675 頁。
 埃德尔河——第 293 頁。
 埃克留斯堡垒——第 647、658 頁。
 埃克繆尔——第 234 頁。
 埃佩尔訥——第 283 頁。
 埃克斯敏斯特——第 567 頁。
 埃倫布萊施坦——第 288 頁。
 烏利——瑞士的一个州。——第 655 頁。
 烏尔姆——第 270、271、276、637 頁。
 烏迪訥——第 256、660 頁。
 烏凱馬尔克——第 512 頁。
 爱尔兰——第 42、43、221、243、244、549、552、553 頁。
 爱森納赫——第 548 頁。
 爱北斐特——第 243 頁。
 爱尔福特——第 280、419、423、599、691 頁。
 索恩河——第 267 頁。
 索恩河岸夏龙——第 506 頁。
 索尔費里諾——第 449—452、454—457、460、470、484、485、487、490、493、522、638—640、692 頁。
 索尔福特——第 523 頁。
 索馬康帕尼亚——第 234、267、450 頁。
 热馬普——第 285 頁。
 热那亚——城市和港口。——第 231—233、260、277、334、341、349、350、365、367—369、379—382、387、388、477、624、645、660、663、665 頁。
 热那亚海岸——第 665、666 頁。
 热涅維(热涅瓦)——第 646、657 頁。
 热安峰(吉甘特峰)——第 648 頁。

- 泰图安——非洲的一个居民点。——第 610、613、614、619—621、627、628、630—632 頁。
- 泰图安——非洲的一条河流。——第 614、616、619、629 頁。
- 庫內奧(科尼)——第 663 頁。
- 庫尔塔唐——第 266 頁。
- 庫斯托查——第 213、234、267、372、450 頁。
- 特雷維佐——第 262、269、273 頁。
- 特勞波(奧帕瓦)——第 678 頁。
- 特爾米尼昂——第 653 頁。
- 特爾多皮奧河——第 385、386 頁。
- 特蘭西瓦尼亞——第 336 頁。
- 特隆皮亞谷地——第 259 頁。
- 桑提亞——第 231 頁。
- 桑德里奧——第 645 頁。
- 桑塔路其亞——第 216、266、268 頁。
- 紐約——第 338 頁。
- 紐芬蘭——第 444 頁。
- 紐沙特爾——瑞士的一个州。——第 625、657 頁。
- 紐沙特爾湖——第 656 頁。
- 格米山口——第 659 頁。
- 格羅斯特——第 586—590 頁。
- 格拉斯哥——第 226、562 頁。
- 格拉魯斯——第 655 頁。
- 格里斯山——第 660 頁。
- 格勞賓登——第 261、655、660 頁。
- 格腊波洛——第 383、386 頁。
- 格勒諾布尔——第 282、651 頁。
- 格腊迪斯卡——第 220 頁。
- 格累夫森德——第 238 頁。
- 格腊韦洛納——第 386 頁。
- 格留恩斯(格洛林察)——第 273 頁。
- 納瓦山口——第 663、664、666、667 頁。
- 納維利奧河——第 428 頁。
- 納維利奧大運河——第 427 頁。
- 倫敦——第 10、88、168、186、239、240、291、325、326、328、330、332、334、345、380、407、498、521、523、539、547、561、563、564、567、570、573、575、587、678、686、688 頁。
- 倫巴第——第 178、181—183、188、192—194、198、213、214、232、234、250、252、255、259、260、262—264、270、272、273、275—281、297、334、335、348、388、397、399、403、404、425、467、473、474、480、481、492、502、520、593、594、623、641、643、655、661、665、666、672 頁。
- 馬賽——第 197、334、365、383 頁。
- 馬爾瓦——第 330 頁。
- 馬振塔——第 418、420—422、425—432、439—442、449、452、480—482、486、487、490、513、639、640 頁。
- 馬連峨——第 213、220、231、234、255、269、380、488、652 頁。
- 馬拉加——第 619 頁。
- 馬德里——第 573 頁。
- 馬里蘭——北美的一个州。——第 64 頁。
- 馬里昂堡——第 284 頁。
- 馬格德堡——第 377、393、394、523 頁。
- 馬喬列湖——第 366、379、386、403、479 頁。
- 馬爾納河——第 283、286、287、292 頁。
- 馬爾納河岸夏龍——第 287 頁。
- 馬達加斯加——第 199 頁。
- 馬丁斯布魯克——第 257 頁。
- 馬斯特里赫特——第 287、289 頁。
- 馬爾鮑爾格(馬爾鮑爾格托)——第 259 頁。
- 馬利尼亞諾(梅晏尼亞諾)——第 213、422、440、441、483、639 頁。
- 根特——第 286 頁。

鬼桥——第 258 頁。
 柴郡——英国的一个郡。——第 222、240 頁。
 拿騷——第 463、464 頁。
 班堡——第 548 頁。
 頁比果——第 283、286、289、307、497 頁。
 旁遮普——第 551 頁。
 涅費尔斯——第 258 頁。
 恩非耳德——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208、210 頁。
 海利布里奇——第 238 頁。
 夏特耳-圣德尼——第 657 頁。
 哥达——第 636、637 頁。
 哥达——見圣哥达。

十一画

莫市——第 283 頁。
 莫貝日——第 284 頁。
 莫德林——第 678 頁。
 莫拉維亞——第 314 頁。
 莫里延高原——第 622、646 頁。
 莫尔达維亞(莫尔多瓦)——第 300、309、314、505、673 頁。
 曼丘河——第 656 頁。
 曼都亞——第 213—219、233、252、262、265—268、272—274、288、293、318、442、445、453、457、459、460、488、489、492、494、592、641 頁。
 曼海姆——第 287 頁。
 曼彻斯特——第 540、563、603 頁。
 基瓦索——第 368 頁。
 基澤河——第 234、254、261、263、441、449、453、454、456、457、460、483、513、640 頁。
 康芬察——第 413—415 頁。
 康德薩(卡斯提耳埃霍斯)——第 618—620 頁。

康士坦丁——第 621 頁。
 康斯坦茨——第 655 頁。
 康波福米奧——第 593 頁。
 梅代阿——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堡垒。——第 632 頁。
 梅克內斯——第 614 頁。
 梅济埃尔——第 284 頁。
 梅累尼亞諾——見馬利尼亞諾。
 密雷栖摩——第 213、234、482、488、665 頁。
 密多塞克斯——英国的一个郡。——第 238、240 頁。
 累翁——在西班牙。——第 616 頁。
 累根斯堡——第 482 頁。
 琉森——第 658 頁。
 第戎——第 287 頁。
 都灵——第 180、185、199、213、230、231、344、349、350、366—368、379、380、401、478、480、544、624、625、645、648、653、663、665、667、670 頁。
 捷克——第 376、404 頁。
 得比郡——英国的一个郡。——第 222、240 頁。
 崩維耳——第 658 頁。
 教皇国——第 178、253、318、341、467、468、541—543、641、670 頁。
 黄金海岸——第 438 頁。
 雲恩布龙——第 493 頁。
 紹林吉亞——第 463 頁。
 莎姆伯里——第 622、624、646、649、651、663 頁。
 培斯克拉——第 214—219、233、252、265、266、272、273、288、442、453、454、458、460、492 頁。
 梯叶里堡——第 283、292 頁。
 措尔恩多夫——第 296 頁。
 盖尔曼尔斯海姆——第 288 頁。

十二画

博岑(博耳察諾)——第 269、273 頁。
 博登湖——第 256、261 頁。
 博法洛拉——第 385、386、418、419、421、422、425—429、639 頁。
 博伊泰河——意大利的一條河流。——第 261 頁。
 博尔戈福特——第 214、267 頁。
 博尔米达河——第 229—231、260、264、366、665、666 頁。
 博洛尼亚——第 641 頁。
 博尔米奥(伏尔姆斯山口)——第 220、255、257、258 頁。
 費拉拉——第 265、335、641 頁。
 費拉河——第 261 頁。
 費涅斯特雷利——第 651 頁。
 斯图加特——第 676 頁。
 斯图腊河——第 648、661、665、666 頁。
 斯普累河——第 435 頁。
 斯佩威亚——第 260 頁。
 斯特拉斯堡——第 196、282、287 頁。
 斯特拉杰拉——第 379、383、387、389、399、405、419、422 頁。
 斯克里維亞河——第 379、387 頁。
 斯特尔維奧(施蒂尔夫)山口——第 231、234、254—256、260、261、273、404 頁。
 萊科——第 255、404 頁。
 萊比錫——第 393、419、423 頁。
 萊茵省——第 7 頁。
 萊茵河——第 191、212、215、220、247、249、250、257、258、261、274、276、282、283、285—290、292—294、308、314、315、317、346、392、438、446、451、488、501、508、608、626、633、635—637、641、647、658、668、669、671—676、678、679 頁。

萊斯河——第 257、258 頁。
 萊斯角——第 383 頁。
 菲森——第 255、273 頁。
 菲利普維耳——第 284 頁。
 普罗凡斯——第 231、232、350 頁。
 普法尔茨——第 446 頁。
 普勒斯堡(布拉的斯拉发)——第 272 頁。
 普罗洛尼恩——第 654 頁。
 普拉格尔山口——第 258 頁。
 提罗耳——山区。——第 215、216、218、219、220、234、255、259、261、266、267、269—272、274—277、404、460、594、660 頁。
 提翁維耳——第 287 頁。
 提契諾河——意大利北部的一條河流。——第 179、217、255、260、263、265、268、274、345、366、367—369、383、385、387、393、403、417、418、420、421、424—429、432、433、460、479、635、639 頁。
 提尔西特(苏維埃斯克)——第 672、674、677 頁。
 提罗耳阿尔卑斯山脉——第 215、219 頁。
 腊布(迪厄尔)——第 373 頁。
 腊万納——第 641 頁。
 黑森—加塞尔——第 596—600 頁。
 黑森—达姆斯塔德——第 211、446 頁。
 斐維——第 656、657 頁。
 琳道——第 262 頁。
 凱恩——第 312、335、358、644 頁。
 森澤河——第 656 頁。
 喀布尔——第 574、575 頁。
 揚子江——第 604 頁。
 策勒河——第 656、657 頁。
 閔斯德——第 257、593、655 頁。
 敦克尔克——第 282、647 頁。
 温斯柏利——第 233 頁。
 富尔卡山口——第 659 頁。

十三画

奥布河——第 286、287 頁。
 奥得河——第 293、438 頁。
 奥尔良——第 282 頁。
 奥尔巴河——意大利的一条河流。——第 230、264 頁。
 奥尔勃河——瑞士的一条河流。——第 656、657 頁。
 奥格斯堡——第 393 頁。
 奥登納德——第 285 頁。
 奥涅利亚——第 624、660、663 頁。
 奥利奥河——第 234、254、259、263、482 頁。
 奥里欧罗——第 390 頁。
 奥里繆茨(奥洛摩茨)——第 599、600 頁。
 奥斯坦德——第 287 頁。
 奥斯特利茨(斯拉夫科夫)——第 185、212、313、442、445、506、637 頁。
 奥屬尼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第 251 頁。
 塞塞耳——第 658 頁。
 塞納河——第 282、283、286、287 頁。
 塞齐亚河——第 229、230、260、264、274、349、366、369、379、380、385—387、398、400、402、403、413、416、478、479 頁。
 塞拉利奧——第 609 頁。
 塞尔維亞——第 309、323 頁。
 塞耳克尔克——第 227 頁。
 塞齐亚谷地——第 660 頁。
 塞瓦斯托波尔——第 291、300、397 頁。
 塞斯托-卡兰德——第 231、256、403 頁。
 塞美林——东阿尔卑斯山的山口。——第 489 頁。
 塔兰特茲——第 622、646 頁。
 塔納罗河——第 230、264、398、663—666 頁。

塔腊門托河——第 254、263 頁。
 瑟堡——第 181 頁。
 滑铁卢——第 180、285 頁。
 葡萄牙——第 293 頁。
 意大利——第 213、214 頁。
 新南威尔士——澳大利亚的一个邦。——第 558 頁。
 雷申-舍迪克山口——第 257、259 頁。
 滨海阿尔卑斯山脉——第 213、260、489、660、662、665、666 頁。

十四画

蒙斯——第 282 頁。
 蒙多維——第 213、234 頁。
 蒙美利安——第 649 頁。
 蒙費拉托——第 645 頁。
 蒙特諾特——第 213、234、482、488、665 頁。
 蒙特貝洛——第 383、387、389—391、398—402、416、430、449、478、488、493、638 頁。
 蒙特維多——第 179 頁。
 蒙特克亚里——第 442、445 頁。
 蒙特科尔諾——第 257 頁。
 蒙特涅格罗——第 618、619、630、631 頁。
 蒙沙弗卡列——第 653 頁。
 蒙塞尼山口——第 231—233、334、350、367、624、648、650—653、660、663 頁。
 蒙塔博尔山(塔博尔)——第 648、652 頁。
 蒙特伊澤兰山口——第 624、653 頁。
 蒙热涅夫尔山口——第 231、232、350、648、651、653 頁。
 維也納——第 209、219、251、255、256、262、267、269、273、276、289、291、294、295、306、318、334、338、340、341、356、362、369、371、373—377、450、451、473、493、503、512—514、517、518、595、625

- 頁。
 維罗那——第 214—219、262、265—268、
 273、442、445、460、488、492、494、516、
 639、678 頁。
 維琴察——第 217、218、262、267、268 頁。
 維阿馬拉——阿尔卑斯山脉的一个山口。
 ——第 257 頁。
 維吉瓦諾——第 366、379、383、385、420、
 424、480、481 頁。
 維多利亞——澳大利亞的一个邦。——
 第 558 頁。
 維爾騰堡——第 211、395、446、463 頁。
 維耳訥夫——第 656、657 頁。
 維列佐托——第 479 頁。
 維斯拉河——第 293、392、438、674、675、
 679 頁。
 維拉弗兰卡——第 472—475、500、507、
 541—543、547、592—594、641、642、
 677、691 頁。
 維蘇威火山——第 178 頁。
 魁北克——第 444 頁。
 福爾馬察谷地——第 660 頁。

十五画

- 德里——第 120 頁。
 德果——第 213、234、488、665 頁。
 德蒙特——第 661 頁。
 德勒斯頓——第 505 頁。
 德散扎諾——第 454 頁。
 德爾維奧——第 257 頁。
 德森(提契諾)——瑞士的一个州。——
 第 645、655、666 頁。
 摩洛哥——第 199、609、614、616、627、
 630—632 頁。
 摩地那——第 181、183、185、266、313、
 318、339、360、469、473、475、542、543、
 594、641 頁。

- 摩加多尔——第 614、632 頁。
 摩尔塔拉——第 380、387、419、420、423、
 424、480 頁。
 摩塞尔河——第 283、284、287、292 頁。
 撒丁——見皮蒙特。
 撒丁島——第 641 頁。
 魯科斯——見魯科斯河。
 魯科斯河——第 614 頁。
 劍橋——第 134 頁。
 慕尼黑——第 269、273、276、277、377、
 393 頁。
 賴興堡——第 377 頁。

十六画

- 諾羅——第 259 頁。
 諾維——第 213、230、380、381、387、398、
 415 頁。
 諾伊斯——第 287 頁。
 諾瓦拉——第 183、213、231、234、366、
 379、380、386、414—422、424、428、479、
 480、639 頁。
 諾瓦列捷——第 386 頁。
 穆蒂埃——第 624、654 頁。
 穆塔塔爾——第 258 頁。
 霍根林登(霍恩林登)——第 269 頁。
 霍恩弗里德貝爾格——第 296 頁。
 錫耶納——第 645 頁。

十八画

- 薩瓦——第 231、260、477、544、545、
 622—626、633、642—651、653—659、
 663、664、666、672、677 頁。
 薩累——第 379、632 頁。
 薩雷——第 240 頁。
 薩涅河(薩寧)——第 656、657 頁。
 薩爾河——第 287 頁。
 薩沃納——第 663—667 頁。

薩克森——第 394、395、404 頁。

薩蘭什——第 658 頁。

薩托里——凡爾賽附近的高地。——第
196、307、308、427、434、503 頁。

薩沃尔日——第 664 頁。

薩爾茨堡——第 261、269 頁。

薩特里日河——第 523 頁。

薩辛納谷地——第 257 頁。

薩比亞谷地——第 259 頁。

鎮海——第 569 頁。

貨币、重量、容量名称表

貨 币

1 鎊(英国金币) = 20 先令
 1 先令(英国銀币) = 12 辨士
 1 辨士(英国銅币) = 4 法寻
 半辨士(英国銅币) = 2 法寻
 法寻(英国銅币)
 1 基尼(英国金币) = 21 先令
 1 索維林(英国金币) = 1 鎊
 1 法朗(法国鑄币) = 100 生丁
 1 利弗尔(法国銀币) = 1 法朗
 1 拿破侖币(法国金币) = 20 法朗
 埃巨(法国鑄币)
 阿西混(法国紙币)

馬克(德国鑄币)
 多布隆(西班牙金币)
 馬拉維第(西班牙鑄币)
 瑞斯(葡萄牙鑄币)
 1 伊彼利阿耳(俄国金币) = 15 卢布
 1 卢布(俄国銀币) = 100 戈比
 戈比(俄国銅币)
 1 鷹币(美国金币) = 10 美元
 杜卡特(欧洲金币, 起源于意大利)
 1 克朗(丹麦、挪威和瑞典的鑄币) = 100 欧耳

重 量

(英国的重量单位)

常 衡		金 衡	
1 夸特	12.700 公斤	1 磅 = 12 盎斯	372.242 克
1 磅	453.592 克	1 盎斯 = 20 本尼威特	31.103 克
1 克拉(也是衡量合金中金的含量的尺度)	0.200 克	1 本尼威特 = 24 克冷	1.555 克
		1 克冷	0.065 克

容 量

(英国的容量单位)

1 夸特 = 8 蒲式耳	290.790 升	1 加侖 = 8 品脫	4.544 升
1 蒲式耳 = 8 加侖	36.349 升	1 舍費耳(普魯士的容量单位)	54.960 升

譯 后 記

本卷中“政治經濟学批判”这一著作是在徐坚的譯文的基础上根据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1961 年所出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十三卷校訂的；这一著作的序言在校訂时还参考了俄、英、日等文譯本。此外，为了便于讀者閱讀这一著作，在附录中加了一个“貨幣、重量、容量名称表”。

“新的对华战争”和“对华貿易”两篇文章是在人民出版社 1961 年所出的“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的譯文基础上校訂的。

参加本卷翻譯工作的有刘暉星、李俊聰、丁世俊、王錦文；負責校訂的是張文煥、張奇方；部分地参加譯校工作的有宋书声、張慕良、杜章智、吳达琼、馮如馥；参加資料工作的有孔令釗、陈瑞麟。“政治經濟学批判”这一著作是集体校訂的，参加的有周亮勋、樊以楠、屈洪、陈国雄、荣敬本、楊启潏、張钟朴、王錫君、麦明尧、王燕华、沈淵、薛中平、孙开煥、于华、鮑世明、王全民、馮文光、孔熙忠、余大章、刘炎等；校訂稿全部經原譯者徐坚审閱过。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